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中）

以书告慰在毛泽东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中卷目录

第 09 章 利用红卫兵造反----------314
一．大字报和大批判----------314
二．大破“四旧” ----------317
三．大辩“血统论” ----------326
四．大斗走资派----------332
五．造反、保皇红卫兵大沉浮----------342
第 09 章附注----------353
第 10 章 文革第一轮大屠杀----------357
一．利用红卫兵大屠杀----------357
二．群体灭绝暴行之一：大兴屠杀----------378
1、鲜血淋漓东方红----------378
2、血肉横飞大辛庄----------383
3、东方红、大辛庄的无碑纪念----------386
三．第二波自杀风潮----------388
第 10 章附注----------394
第 11 章 权力对抗----------405
一．十月进击----------405
二．一月拼杀----------410
三．二月角斗----------421
本章结语----------426
第 12 章 武力夺权----------427
一．整合分裂----------427
二．“七二〇”事件----------435
三．分裂军队挑动武斗的“八四指示”----------449
四．挫败“清君侧” ----------460
1、主动妥协----------460
2、抛出忠君打手“王关戚”----------463
3、打倒“杨余傅”与张柬之情结----------470
第 13 章 文革无义战暨文革第二轮大屠杀----------479
一．全面内战起因----------479
二．各地武斗掠影----------486
三．派性大血战实录----------511
四．武力大镇压暨文革第二轮大屠杀----------523
五．毛泽东的内战休止符----------527

六．人兽之间⑴——杀俘----------530
七．愚弄的见证——重庆红卫兵公墓----------535
第 14 章　绞杀政敌----------540
一．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540
二．浸死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547
三．打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554
四．拷死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557
五．药死贺龙元帅----------563
六．瘐死政治局常委陶铸----------569
七．拖死国家主席刘少奇----------574
八．重伤囚死彭德怀元帅----------584
九．抓叛徒和叛徒集团----------593
十．放过总理周恩来----------599
第 14 章附注----------604
第 15 章“群众专政”暨文革第三、四轮大屠杀----------605
一、“群众专政”在湘南暨文革第三轮大屠杀----------605
1、大屠杀“理由”种种----------608
2、大屠杀组织实施----------611
3、大屠杀模式选择----------614
4、人兽之间⑵：滥杀无辜----------619
5、题外话星空----------625
二、“群众专政”在广西暨文革第四轮大屠杀----------628
1、广西魔头韦国清----------628
2．左派“四二二”的末日----------630
3.《七三布告》前的“群众专政” ----------633
4.《七三布告》后的“群众专政” ----------637
5．人兽之间⑶——兽行种种（人食人等）----------644
本章点评：“群众专政” ----------654
第 16 章　清理阶级队伍暨文革第五轮大屠杀----------656
一．毛氏规律----------656
二．“清队”简介----------664
三．大案剖析（简述六宗血案）----------682
1．镇压蒙族“新内人党”血案----------682
2、广西“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血案-------690
3．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叛徒血案----------690
4．冀东大血案----------693
5、二七机车车辆厂血案----------695
6．新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血案----------702
四．第三波自杀风潮----------707
第 16 章附注----------716

第 17 章　权力更迭（各省建立革委会）----------722
一. 解放右派当权派----------722
二. 整肃左派当权派----------725
三. 取缔左派红卫兵----------727
四. 成立各省革委会----------735
五. 中共九大和选举秘笈----------758
六. 核战危机——两党玩火，美帝灭火----------766
七. 五七干校----------773
第 17 章附注----------776
（中卷完）----------777

第 09 章 利用红卫兵造反

09 章目录

一. 大字报和大批判　　★二. 大破“四旧”　　★三. 大辩“血统论”

★四. 大斗走资派　★1. 应劫而生的《群丑图》　2. 揪斗北京“走资派”

3. 羞辱王光美　4. 揪斗八级“走资派”

五. 造反、保皇大沉浮　1、贵族红卫兵的覆灭　　2、红卫兵五大领袖

★ 3、为平民红卫兵的覆亡放声大哭

第 09 章附注

毛泽东的天才在于，消灭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他不会采用像民间传说“火烧庆功楼”那样的蠢办法，而是借“群众”之手即借红卫兵之手，用大批、大斗、大辩论和大破“四旧”的形式，去大造消灭有理的舆论，再以层层剥笋的战术，使大批、大斗、大辩论和大破“四旧”逐步升级到大虐杀的红色恐怖高度，从而名正言顺地达到逐个消灭对手之目的。

一. 大字报、大批判

毛泽东一贯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的所谓“造成舆论”，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大批判——**妖魔化政敌**！

批判,其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词性有中性的一面；但多数用于否定，即对错误思想、言行进行批驳、谴责和否定。在中国，批判就是否定；“批判”前冠上一个“大”字，就是妖魔化的全面否定。

在毛泽东的中国,作为政治否定的话语方式，历史记录着大批判的轨迹：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 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 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7 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大批判,1965 年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批判，等等。这些后来被**中共否定了的几次批判、大批判**，当时都是那么“理直气壮”、“大义凛然”，调动“千军万马”，以“挟雷霆万钧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势”，矛头直指学者教授、文士墨客、政治异己和弱势群体，其威慑震骇力之强烈，足以使人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到 1966 年，大批判已经普及、定型，其运用手段已达炉火纯青的高度。

从批判到大批判的“第一次飞跃”，是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产生的。那时，毛泽东给大批判规定了它的载体，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

辩论”，即所谓“**四大**”。其实，当年的媒体报纸、杂志、电台都在搞大批判。作为“四大”之一的大字报，实际上承担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即大批判载体的功能，它同其他媒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类同于今日博客、BBS。如果说有区别，仅仅是没有编辑、审核、出版许可证而已。应该肯定，大字报是对媒体高度一元化的抗拒，是“舆论一律”极权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有限民主形式，同其他媒体一样可以为民主服务。但当这种形式**被权力占有**时，同其他煤体一样，会变成权力的喉舌，变成专政的工具，大字报不能例外。毛泽东利用“四大”引蛇出洞，结果右派上钩，大字报这种有限民主形式，变成了铺天盖地、一边倒地大批判大镇压右派的载体，终使55万右派分子束手待毙。

聂元梓那张被毛泽东赞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字报贴出后，大批判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亦即从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发展成唯我独尊，杀气腾腾!（图09-1）以康生、曹轶欧夫妇秘密打造的聂元梓大字报和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清华附中鼓动炮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及其《二论》、《三论》小字报，都是大批判“第二次飞跃”的代表作。这种源自于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大批判，都被毛左们打扮成群众的自发。这时的大批判，已经没有是非之分，没有矛盾性质的界限，一切都以人划线，唯毛是尊。到此，大字报同其他媒体一样，沦为毛泽东独裁权力的喉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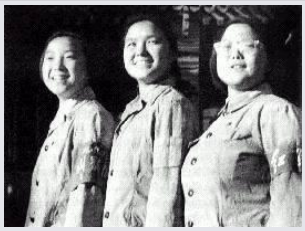
图09-1：南大学生在校园内看批判校长的大字报

在大批判上，红卫兵堪称毛泽东的尖兵!

毛泽东说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据此，有学者认为，红卫兵大造院校领导和教师的反，是对长期填鸭式、经院式、专制式教育路线的反叛；心理学家认为，反抗产生于压抑。应该承认，学者们的分析不无道理。在红卫兵运动和而后的造反派运动中，对压抑的反抗和对专制的反叛，都表现得非常鲜明。但笔者认为，在早期的红卫兵中，**反抗和反叛并非主流，主流是革命**!

早期的红卫兵由工、农、兵、革干、军干子弟等**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他们都是“自来红”，他们的领导骨干大多是中共高级官僚子弟，因而被人们称为“老红卫兵”，亦称“**贵族红卫兵**”。由于他们的骨干出身于官宦家庭，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便得到了中共院校工作组的信赖和支持。例如，邓小平的千金**邓榕**，同残杀校长的嫌犯宋仁穷上将的女公子**宋彬彬**一样，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图09-2）。

贵族红卫兵自成立之日起，都把“**老子革命儿接班**”作为“当仁不让”的权利。他们得天独厚，能从长辈那里得到许多旁人难以得到的政治信息。在大革命面前，他们几乎没有观望，没有“第二次反右”的踌躇和忧患；“狼奶”的哺育，使他们的人类兽性一面急剧膨胀起来：他们自觉怀着父辈们嗜血的激情，踏着父辈们钻营的足迹，背诵着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用红色暴虐乖戾的语言充斥他们的大字报，使他们的大字报满天飞舞——应着毛泽东的革命鼓点弹跳。根据父辈们的指导或暗示，他们把大批判的矛头直指毛泽东选定的目标：旧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彭罗陆杨以及文艺黑线人物等，都成了他们的革命对象；教育部、大中院校负责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技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出身“不好”的大、中学生等弱势人群，已被他们统称为“牛鬼蛇神”，都成了他们刀俎上的鱼肉，都成了他们任意屠宰的对象。


图 09-2：贵族红卫兵——邓小平三个女儿（左起）邓榕、邓楠、邓琳

他们自以为得计，自以为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铁定的接班人；但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利令智昏使他们误判了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要他们为向他们父辈夺权作出牺牲。

为了打倒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毛泽东要发动年青无知的红卫兵特别是平民红卫兵，去为他冲锋陷阵。天才的毛泽东十分清楚，平民红卫兵同他们的领导骨干，大多是工、农、兵家庭出身，没有什么权力背景。基于父辈反右前车之鉴，他们对“横扫”、“造反”，多冷眼旁观，或仅摇旗呐喊而已，不敢冒然造次；他们之所以要另立旗号，仅仅是看不惯贵族子弟们的专横跋扈。为了利用贵族红卫兵们拼杀，从而带动平民红卫兵起来造反，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里有意闪过一笔，不提他曾多次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向党内右派集团暗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算“文五界”即清算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牛鬼蛇神”和他们的支持者彭真等人，使高干们放手让他们的子弟出来革命，使贵族红卫兵无所顾忌，从而带动平民红卫兵造反。用革命鼓动反叛，毛的这一招“阳谋”，果然奏效。

以革命为己任的贵族红卫兵们，以大字报为武器，今天批张，明天批李，今日命令这个人坦白交待，明日勒令那个人低头认罪，他们俨然以无产阶级法官自居。他们又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管理者：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外交事务，小到街头修鞋和日常穿着，都在他们管辖之内。他们本能地喊出了纯血统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想革命跟着老子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其不可一世的傲气宣泄无余！

在贵族红卫兵表率和刺激下，各路平民红卫兵纷纷亮相，他们的反叛精神在革命口号掩护下，踩着贵族红卫兵的革命血迹，杀出校院，杀向社会。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阳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在革命红旗映射下，此时的红卫兵们，已经不满足于大字报的杀伤力，他们开始用拳头、皮鞭、棍棒和刀具来进行革命，使大批判实现了从精神折磨到肉体虐杀的飞跃，从而使人性之恶即人类兽性的一面，得到了淋漓的张扬和宣泄。

二．大破“四旧” （图 09-3：）

图 09-3：大破“四旧”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把藐视文明的破“**四旧**”、立“四新”作为文化革命的重要政治任务。1966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第一条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自 8 月 9 日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各地报刊，都全文刊登《十六条》，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宣传。例如，《解放军报》在社论中提出：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清除，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显然，毛泽东要用丛林乌托邦“四新”亦即所谓无产阶级“四新”，颠覆五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报纸和电台的鼓动下，以贵族红卫兵为先锋的各路红卫兵，纷纷杀向“四旧”。

1966 年 8 月 17 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起草了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四旧”的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第二天受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的鼓舞，他们印刷、散发了他们的《最后通牒》。20 日，北京各路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强行实施他们破旧立新的命令。他们谴责“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等港式发型，谴责“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谴责“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货色”。他们下令城市居民“一星期内销毁你们的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掉你们的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他们所说的“黄色书籍”，就是言情小说，所说的“低级下流的照片”，就是照相馆橱窗里的美女照。他们命令“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消（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许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由于红卫兵大破“四旧”的矛头首先指向广大老百姓，很快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恐慌。对此，在周恩来、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对老百姓的不满和恐慌做出了反应。8 月 21 日，《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发表了《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评论员文章，高度赞扬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革命精神。8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好得很!》的社论。社论说：“**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在中央喉舌助威声中，北京各路红卫兵高举破“四旧”大旗，在破“四旧”中大砍大杀，上海、天津、各省、自治区首府和部分中等城市红卫兵，紧跟其后，纷纷效法。由是，轰轰烈烈的大破“四旧”运动，迅猛席卷全国。

9 月 1 日，北京 26 中的红卫兵在《破旧立新一百例》中规定：“禁止戴手饰、耳环、长命锁等”，禁止“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立即停止出售”香水、雪花膏，“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儿童不许唱“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等等。为了实施禁令，他们便组织上街督促、检查，挨家挨户清理居民家的“四旧”，命令商店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还强行剪毁“奇装异服”。

在红卫兵的威逼下，许多商店、街道、学校，纷纷改为带有革命含义的名字。如：西方国家驻华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大楼”，“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等等。8 月 24 日，北京红卫兵召开 40 万人的大会，隆重宣布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上海红卫兵闻风而动，发誓要用“铁扫帚彻底扫除”南京路上的“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天津红卫兵步其后尘，迅将最大的“劝业场”商场改名为“人民商场”。广州红卫兵紧紧跟上，旋将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铲掉康有为题写的“陶陶居”招牌，更名为“东风楼”。

红卫兵还提出改变交通信号的要求。他们说：“红色象征着前进、象征着革命。……而交通信号灯却与此背道而驰。红灯却成了停止车辆的信号，阻止我们前进，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革命。”要求把红灯改为通行信号。

红卫兵勒令资本家：“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不许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文革期间，没收私房 52 万间，上海市没收私房 124 万平方米，天津市从 8 月 27 日到 9 月 9 日，有 11,525 户“主动”交出私房 49,776 间。中共权宜之计的“赎买”政策，几天间被红卫兵推翻了。对此，毛泽东喜出望外，乐见其成。

大破“四旧”也指向下层贫苦个体户。天津市红卫兵发出通告：“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由有关部门组织修鞋社，修鞋价钱必须减少。” 对失业青年，红卫兵下令：“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天津市人民委员会立即做出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决定，其他各大城市纷纷效法。

当红卫兵在社会弱势群体中大破“四旧”时，一部分红卫兵很快把矛头指向官僚特权阶级。例如，8 月 24 日，沈阳 31 中的学生给辽宁省委贴出通牒：“你们各级高干宿舍太奢侈腐化，……更不合理的是，有的还雇用保姆、佣人。……我们通牒你们，限令你们一天答复，三天之内采取行动。”

为了支持红卫兵的“横扫”、破“四旧”和反工作组的造反行动，毛泽东下令警察不准镇压学生。于是，公安部下达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六条规定(详见第 10 章“公安六条”)。“公安六条”规定，各级政府“**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在红卫兵大破“四旧”中，的确冲击了一些需要改革的陈规陋习和社

会不公；然而，在官方喉舌一片支持、赞扬的鼓噪声中，红卫兵肆无忌惮地冲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一切文明成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大破“四旧”行动全面升级，从而使打、砸、烧、抄家、游斗和驱赶，全面开花，人性之恶也因而找到了全面宣泄的舞台。

一打——在大破“四旧”期间，全国各地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摧残虐杀“牛鬼蛇神”事件不断发生。“牛鬼蛇神”是文革之初，毛泽东给持不同政见者订制的一顶新“帽子”。由于“**不主张打人**”的“最高指示”中有“**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条条，打人之风迅即在北京刮了起来。北京市六中，以“红五类”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在校内设立“劳改所”，关押抓来的“牛鬼蛇神”等“坏人”，对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和折磨。据报导，仅北京市一中、六中两所中学，在“劳改所”里打死、打伤、致残者达 200 人以上。在六中的刑讯室里，红卫兵在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图 09-4）



图 09-4：一打——红色恐怖

这条标语，印证了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反人类罪行的疯狂，记录了红卫兵法西斯罪行的暴虐！其时，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从长白山到青藏高原，从内蒙草地到东海岸边，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哪里没有屈死的冤魂，哪里就没有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哪里就是反革命的天下！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暴力畅通无阻。

据知情人披露，1966 年 10 月，在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至今还不准普通群众查阅的资料。这个资料提供的数字是：在 8 月下旬到 9 月底的 40 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 1,772 人。但一些专家和目击者们则认为，实际被打死者可能高达五千人。又据报导，9 月 1 日至 25 日，上海市区 489 所中学中，有 361 所中学有打人行动，被打者高达万余人，打死 11 人。其他地方呢？由于档案尘封，新闻被控，检查受制，知情者惧惮，许多回忆录作者对敏感问题，不是闪烁其辞、避重就轻，便是推卸责任、掩饰真相，偶有真言者，也痛遭当局封杀。因此，知情者、目击者的文章、专著和报导，不得不按“主旋律”的规则定稿，读者也就难知其真相。但据看过有关档案资料的专家们论证，1966 年的红色恐怖中，全国至少有十万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被打死、虐杀！

二砸——在破“四旧”中，各类宗教均被列为革命对象，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许多寺庙遭到破坏(图 09-5)。1966 年 8 月 23 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红卫兵 273 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8 月 24 日，北京 10 多所学校的红卫兵，冲击了天主教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26 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宣布，接受红卫兵和群众的“要求”，取缔了这个修女会，接管了修女会办的圣心学校。28 日，北京公安局宣布，驱逐 8 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外国修女出境。北京有红卫兵提出“消灭伊斯兰教”，被周恩来制止。各地不断发生砸庙、毁寺事件。上海的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和徐家汇天主教堂，先后被砸。著名的佛教圣地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破坏：15 座寺庙中自唐朝以来铸造塑建的 479 尊佛像、395 尊菩萨和 649 尊罗汉，珍藏千年的 54 部藏经书，503 副贝叶像，大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焚烧掉；从山上拉下来作为废品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 60 余吨。在回族聚集的宁夏海原县，大破“四旧”的三、四天里，就有 67 座清真寺、17 座寺庙被拆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无数个价值连城的小佛像头被砸掉。哈尔滨的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他们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还强迫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



图 09-5：破“四旧”中砸佛像

被毛泽东批判过的海瑞、武训、孔子等历史人物，也在劫难逃：海南岛红卫兵捣毁了海瑞墓；山东柳林红卫兵砸了武训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死了两千多年的孔子也难逃厄运，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等庙碑和泥胎塑像，被疯狂捣毁。

进入 9 月，破“四旧”风暴更猛烈。**同兴**在他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 1958 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 6843 处文物古迹中，有 4922 处被毁掉。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从各个炼铜厂里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 117 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 320 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 18.5 万件，古旧图书 236 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 53 万多件。著名文学家**阿英**写道：

“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

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佛像取乐，游人行至山顶，见到那些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革命，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几乎没有一个幸免。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要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三烧——8 月 23 日，在《造反歌》的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臂着红卫兵袖标的少男少女，闯进了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他们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接着他们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即文艺界精英们常坐的一张张沙发上，都戳上一个个大窟窿，发泄他们对精神贵族们的怒火；然后他们打开库房翻箱倒柜，把库房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泼上汽油，纵火焚烧。火点燃后，他们又命令文艺界精英们，跪在火堆四周陪罪。著名作家**老舍**跪在其中，当他遭到红卫兵揪斗、毒打后，第二天



图 09-6：火烧图书经卷(左)、匾额条幅(右)

投湖自杀。

除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少量被毛的左派认可的著作外，其他中外报章、书刊、史著、外文书籍、古今中外名著和古籍字画等，以及名胜古迹和有纪念意义建筑上的木质匾额、条幅、对联，都被红卫兵当成“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查抄，并付之一炬。(图 09-6)

四抄家——红卫兵对所谓“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等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其私人财产，时称为“抄家”。(图 09-7)



图 09-7：查抄一个中学教师的家

据统计，8、9 月期间，**北京市**有 33,695 户被抄家，被没收的物品计有：黄金 103,131 两，白银 345,212 两，现金 55,459,919 元，外币 4,478 万元，文物、玉器 613,618 件；各区、县抄收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 330.51 万多件，价值达 1,867 万元。

在**上海**，从 8 月 23 日到 9 月 25 日止，全市共抄家 157,700 户，占全市总户数 241 万户的 6.5%，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 1,231 户；全市 6 万多工商业者遭抄家，几乎无一幸免；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 64.9 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 90.7 万件，钻戒、钻石 4 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 27 万余件，美钞 334 万元，其他外币 330 余万元，银元 239 万元，现金、存款、公债 3.76 亿元。

从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共查抄了 1.2 万户人家，抄出 1.3 万辆汽车的财物，装满了约 6 万平方米的 52 座临时仓库。其中，现金 556 万元，存款 4,050 万元，公债 261 万元，黄金 4 万多两，金银饰品 6 万多件，银元 60 多万元。

据**武汉市**不完全统计，红卫兵查抄 2.1 万户人家。全市抄出黄金 1,110 斤，白银 1,800 斤，银元 26.7 万块，现金和存款 440 万元。查抄和揪斗中，发生自杀事件 112 起，死亡 62 人，游斗折磨致死 32 人。

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 64,056 户。查抄搜缴的财物中，仅图书、字画和文物达 17 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三盆盆景。

笔者家处中原一小城，不到两岁的幼儿手戴一副银镯，在街上遭到红卫兵查抄，从幼儿手上强行掠夺而去。小儿大哭，抱着他的外婆差点晕倒。

大破“四旧”的捷报，频频传到北京。对于这种有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法西斯暴行，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大破“四旧”的一线指挥官们，喜形于色。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兴高采烈地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 据占有档案资料的史学家丁抒披露，全国约有一千万户被抄家。

8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86 岁高龄的

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抄他家时的粗暴情景，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由于章在 1920 年曾资助过困难中的毛泽东两万银元，毛泽东知恩报恩，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章士钊由是免受非难。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 月 1 日，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即派江青，代表他去安抚受惊扰的宋庆龄，使宋躲过了一劫。

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参加者、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76 岁高龄的**李达**，就没有那么幸运。当时，他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1966 年 7 月 19 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他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解救他。毛泽东见信后，即时写了**“转任重同志酌处”**的批语（“任重”系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由于是“酌处”，他依然继续遭揪斗、抄家，8 月 24 日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的批语，证明他是毁灭文明的汪达尔主义者，是大破“四旧”法西斯暴行的总后台，而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中共大员，则是他的前台代表、各路红卫兵的指挥官。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之一的**高皋**说：“66 年文化革命刚开始，我们家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被抄的，而且整个家里头，用几个大汽车给搬得一空，地都挖了三尺。但是，实际上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各地所抄出的财物中，大量是生活用品，如家具、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搁置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露蚀。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廉价处理。据知情者披露：**线装古籍抄来品，充塞了毛泽东的书架，古玩字画战利文物，成了康生的收藏品**。

五游斗——破“四旧”中，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刑满释放人员、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人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毛异己分子、代表“封、资、修”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宗教人士等，这些当年被统称为“牛鬼蛇神”的人士，都是红卫兵的活靶子，其中大多数人都惨遭到红卫兵的揪斗、抄家、



图 9-8：游街示众当今“皇上”的老父习仲勋

游街示众(图 9-8)。在北京，除民建外，其他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中，有 104 人被揪斗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 31 人，民盟 36 人，民进 8 人，农工民主党 8 人，九三学社 8 人，工商联 13 人。其时，中共制定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被毛泽东、周恩来等官僚特权阶级和他们豢养的红卫兵们，糟蹋成一具戴着美丽面具的僵尸！

六驱赶——即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等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清扫出城，驱赶到农村。破“四旧”运动中，在周恩来政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发布通令，把那些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家属的市民，驱逐出北京。后来驱赶范围又扩大到右派分子、资本家、以及被中共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据报导，在 1966 年夏天，北京城区有 10 万、全国 50～60 万弱势居民，被抄家、没收财产、注销户口，逐出城镇，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详见第 10 章“血渍斑斑大驱逐”）

由于档案尘封，新闻被控，检查受制，知情者惧惮，回忆录作者按“主旋律”定稿，老百姓很难知其全貌。因此，笔者上述所列数据，很可能只是红卫兵大破“四旧”中的一些凤毛麟角。但对毛泽东和中央大员们来说，全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取得了多大“战果”，他们应当很清楚。

据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回忆：

1966 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其实，吴德不是不知道，早在 8 月 23 日毛泽东就对他们说过：**“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

在毛泽东看来，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等严重侵犯人权的反人类暴行（1），不过是“动动”而已。岂止于此？在“八一八”、“八三一”和“九一五”的“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站在毛泽东身边，大声号召大破“四旧”，高度赞扬红卫兵在破“四旧”中侵犯人权的法西斯暴行**“做得对，做得好！”“好得很！”**这再

次证明，毛泽东和中共是颠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洗劫文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汪达尔主义，而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过是一本摆在橱窗里供人欣赏的花瓶而已！

在这里，笔者敬请读者关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和在他们领导下的中共，在文革的“横扫”、破“四旧”和而后的夺权、全面内战、上山下乡、群众专政、“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夷平沙甸等运动中，都犯了哪几宗“**危害人类罪**”？请读者参照附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对号自断！

在大破“四旧”高潮中，中共其他大员们的态度呢？

大破“四旧”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犯罪！写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决议里的破“四旧”条条，是中共左、中、右派大员们共同作祟的结果：对以毛泽东为首、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为中枢的左派集团来说，破“四旧”是他们发动起来的，旨在大破“四旧”中发动红卫兵，借其无知和蛮悍来摧毁刘、邓右派集团；对以刘、邓为首的右派集团来说，为了对抗摧毁，他们利用固有的强大权力，在大破“四旧”中转移方向，将毛的压力引向中、下层，挑起上、下冲突并从中渔利。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许多人都是打、砸、烧、杀洗劫文明的暴徒，就是中共各派共同施暴的证明！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这种罄竹难书的法西斯暴行没有得到清算！今天，那些御用精英们，那些专家、教授和作家们，紧跟“主旋律”的乐谱弹跳，摈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于不顾，鼓吹明主治国和权威理政，千方百计把秦始皇等暴君“论证”成“明主”，甚至美化成“仁君”，借以为拒绝选票绑架民主的一党专政涂脂抹粉的同时，为“现代秦始皇”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及其破“四旧”等运动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评功摆好！痛定思痛，笔者已无法忍住那句一吐为快的话：迄**今不能清算毛泽东以告慰在其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是我中华民族的耻辱和悲哀！**

三．大辩“血统论”

1966 年 7 月 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贵族红卫兵贴出了这样一副“鬼见愁”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杨健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一书中，把“鬼见愁”对联斥为“法西斯式的、反人道的封建理论”是很有见地的。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鬼见愁”对联同间接从德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一样，是直接从德国引进的**希特勒主义**，两者同是被德国人抛弃的德国货：

上联——是雅利安、日耳曼民族拥有“**最优秀血液**”的种族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翻版；

下联——是“**血液污染**”的反犹太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横批——是**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在中国的有机化合物。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引发了强烈震动：围观者，传抄者，颂扬者，批评者，比比皆是。8 月，这副对联传入北大、清华等北京大专院校后，旋即传遍全国。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最形象、最具煽动力的口号。几乎一夜之间，出身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等“红五类”家庭的子女，成了“英雄”、“好汉”，他们趾高气扬，左右通达；几乎一夜之间，出身“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和而后增加的资本家、“走资派”统称为“黑七类”家庭的子女，成了“贱民”、“混蛋”，他们低三下四，左右是难。尽管有人批评这幅对联不符合“**毛主席‘重在表现’政策**”，尽管陈伯达也批判了这个“血统论”，说它是出自封建君主世袭制的“错误观点”，但不少人特别是高干子弟们，依然高呼“鬼见愁”对联“**好得很！**”

“鬼见愁”对联的出现，是刚刚兴起两个月的红卫兵运动分裂为贵族红卫兵和平民红卫兵的重要标志。

在贵族子弟们“好得很”的高呼下，“鬼见愁”对联继续广传远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不同的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赤色骂：“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以贵族子弟为主的“红旗战斗小组”，在一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文章中，宣誓了他们的希特勒主义：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

贵族子弟们像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党卫队一样，用大字报宣泄了他们的不可一世：

“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

“要是想革命跟着老子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鬼见愁”传入北师大女子附中后，立即生效。1966 年 8 月 4 日上午，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这个班有 40 多名学生，其中：10 人是“自来黑”，即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属“狗崽子”；10 人是“自来红”，即“红五类”家庭出身，大多数是高干子弟，属当然接班人；其余 20 多名出身于“不红不黑”家庭，称“红外围”。斗争会开始，10 名“自来红”坐在椅子上，“红外围”坐在地上，10 名“狗崽子”站在教室前面，面对“自来红”挨斗。一个“自来红”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自来黑”们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自来红”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时“自来红”还动手打、用脚踢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

“鬼见愁”在北大附中里横行霸道。高三的男学生**朱彤**，因父是右派分子而惨遭毒打，并把他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屋里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爬在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动物。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分子。当班里“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男同学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哀求高干子弟红卫兵头头**彭小蒙**同学说：“你见过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出于对“黑五类”家庭出身同学的“义愤”，这位被毛泽东表彰并亲自接见过的彭小蒙，毫不留情地把万红揪到教室里批斗。批斗万红时，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恶作剧地突然把凳子抽走，把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鬼见愁”对联也左右了当时的“大辩论”：在辩论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份；如果所报的家庭成份属于“黑五类”，会马上被轰下台。因此，当时的“大辩论”舞台，成了“红五类”红卫兵横眉怒目、指点山河的专区。

在高呼“鬼见愁”对联“好得很”上，**谭力夫**脱颖而出，成了捍卫贵族纯“血统论”的骁将。

谭力夫何许人也？这位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前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公子。其父虽已过世四年，但在贵族大院内外，谭力夫与贵族们的血脉息息相通。周恩来对其家关爱有加；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等，都是他家庭座上常客；据传，湖

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他的干爹；在贵族大院和学校里，他还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贵族子女交往甚密，堪为好友。三十年后，已挤身于高级干部的谭力夫，以谭斌名子出了几本书，自誉“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这位“一身正气”的谭立夫，于 1966 年 6 月，在以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支持下，在工大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被任命为红卫兵总队长，同当时的工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高干子弟刘京(后飞黄腾达官至公安部副部长)的合作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工大 300 多师生打成“黑帮”、“右派”和“牛鬼蛇神”，出尽了风头。当他发现有些红卫兵向共产党老干部造反时，特别发现“黑五类”子女们蠢蠢欲动时，敏锐地察觉到右派要翻天，贵族子女的“责任感”，使他突发了只**许贵族革命、不许别人造反的决心**。见到“鬼见愁”对联后，8 月 12 日，便与刘京合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他们写道：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

“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

谭、刘文章虽然受到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的“劝阻”，但却得到了**关锋**的明确支持。 8 月，他在国务院接待室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关锋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血统论”是中共阶级路线的本质反映。在中央文革“劝阻”和明确支持下，8 月 20 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了措词蛮横的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红五类”子弟的共鸣，使他须臾变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充斥着**“只许我革命、不许人造反”**的骄横和霸气。在抨击各种对“鬼见愁”指责的同时，他说：

“我爱讲老实话。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谁敢？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

“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

“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

“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破口大骂，骂出了他的“一身正气”，骂出了他未来的飞黄腾达，同时，也骂出了平民红卫兵的崛起和快速壮大。

1966 年 10 月，谭政文生前腐化堕落问题被人揭发，谭立夫已跌到“黑七类”家庭出身的边缘。而此时，陈伯达代表中共批判“血统论”的报告已广为传播，谭立夫由是失宠，当年被捕入狱。周恩来的态度耐人寻味。1966 年 11 月 15 日，他在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说：**“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1967 年 5 月 29 日，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谭力夫被释放出狱。被恩准出狱的谭立夫，摇身一变，成了军官，旋即遁形于部队之中。文革后，已更名谭斌的谭立夫，以文革“受害人”的身份，著书立说，踏入青云直上的官僚坦途，先后担当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和故宫博物馆党委书记等要职。

正当贵族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鬼见愁”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使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正当谭立夫为“血统论”推波助澜肆意诋毁和迫害“黑五类”子女的时候，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拍案而起，投笔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义正词严地批判。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写道：(图 09-9)



图 09-9:《出身论》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遇罗克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他在《出身论》中写道：**“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遇罗克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抨击了刘、邓右派集团工作组的极左面孔：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笔者：意指大兴县的大屠杀），**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

《出身论》还从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批判了“血统论”；批判中引用了许多毛泽东说过的话，作为立论的论据。《出身论》1966 年 9 月定稿。原《中学文革报》在发表《出身论》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

文章一问世，就赢得千百万人的深切同情和强烈支持：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都在传播遇罗克的文章。一时间，遇罗克成了当时中国备受污辱、损害的最底层老百姓的代言人。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横行，固然与贵族子弟们当然革命、当然接班的思潮有关，但长期以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路线”，则是这种思潮发生、发展和肆虐的根本原因。例如：提干要填出身，查三代，只有“根正苗红”者才能得到提拔；在高等学校招生中，成绩优秀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会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等等，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腐朽思想，是毛左派集团**政治上走封建社会主义道路**的活标。“血统论”一经提出，便横行霸道，其根源就在于此。《出身论》以毛泽东语录立论，是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种无可奈何的、哭笑不得的、充满历史滑稽的选择。但这可悲的历史幽默，却触怒了中共当局。它的鹰犬、中央文革小组笔杆子、大权在握的**戚本禹**，诬蔑《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一句话，把热血青年遇罗克送上了断头台：1970 年 3 月 5 日，年仅二十七岁的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枪杀于北京

体育场。（但据其弟遇罗文回忆：“1970 年 3 月 5 日，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

一个鼓吹“血统论”，一个批判“血统论”，一个挤身高官，一个死于非命：“一身正气”颐养天年的谭立夫和父母右派备受歧视的遇罗克，两人在人格和遭际上的鲜明对比，给毛泽东和中共的人权史，写下了无法抹去的最黑暗、最可耻的一页。

“血统论”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为了打倒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清除他们的社会基础，他借助贵族红卫兵的“血统论”以及他们目空一切的骄横、霸气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取得令他欢心鼓舞的“辉煌”战果。但当他按照他打倒刘、邓战略部署把斗争矛头转向刘、邓右派集团成员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他发现，在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立下汗马大功的高干子弟们，正在利用“血统论”来“保爹保娘”。因此，他决定抛弃贵族红卫兵，谕示中央文革小组批判“血统论”。

1966 年 10 月 16 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谕示，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中，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他说：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陈对“血统论”的批判是可贵的，尽管批判是轻描淡写的。由于毛泽东的中共拒绝承认“血统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的必然产物，因此，同是批判“血统论”，陈伯达高官照做，人权先驱遇罗克却被中共“依法”枪杀！

四．大斗走资派

毛泽东命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血统论”，因为他本人就是血统论的制造者，而是为了支持平民红卫兵造反，压制贵族红卫兵“保爹保娘”，从而实现他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的目的。

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谕旨，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报告在捎带着批判“血统论”的同时，公开而激烈地批判了刘、邓右派集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会上，林彪指名道姓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他还按毛常用的倒打一耙策略，斥责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分别作了检讨。毛泽东并没因而放过他们。会后，毛泽东通过林彪、周恩来和他的一线代理中央文革成员，率先在北京掀起了批判刘、邓右派集团的高潮，发出了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的信号。

早在 1966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在“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中说：**“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 1966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如果在十年前，抑或十年后，这是必须坚决镇压的百分之百的右派言论；但此一时彼一时也。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由是，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尽管“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民主的进步，但对毛泽东来说，**“民主是手段”**：当年，他借“民主”牌打败了蒋介石，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今天，他再次祭起“民主”这块法宝，借以打倒刘、邓，实现其向右派集团夺权的目的。

从毛泽东以上言行可以看出，在强大的刘、邓右派集团反抗势力面前，为了独霸权力，他不惜全国大乱，不惜亿万生灵涂炭而号召全面内战。于是，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他的 73 岁生日宴席上，发出了**“祝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的号召，开始向刘、邓右派集团全面夺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法避免的内讧！

全面内战从北京开始。1966 年 10 月 28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以平民为主力的各路红卫兵，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指挥下，开始全面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内讧战斗，为毛左集团夺权而冲锋陷阵。在揪斗“走资派”的内战中，受到批判的贵族红卫兵也不示弱，他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揪斗左派和中间派的领导干部，也给他们戴上“走资派”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的帽子。一时间，揪斗当权派成风。

1、**应劫而生的《群丑图》**（图 9-10）

1966 年 10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口号鼓舞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形成狂潮。十七年来，那些曾经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和将军们，那些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肆意践踏人权的各级权贵们，在红卫兵、造反派面前，都不得不低下他们那颗尊贵的头颅，去接受蹂躏和迫害。在中共左、右两派权力内讧中，1967 年初，一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漫画《**群丑图**》，应劫而生。



图 9-10：**群丑图**　作者：**翁如兰**

这幅曾被誉为“文革第一图”的《群丑图》，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反响。据说，几个月间，全国翻印数高达百万幅以上。与此同时，其他漫画也派生了出来。如《百丑图》，即用 100 个当权派的人物头像进行丑化处理的漫画，翻印颇多；也有流行时间较短的局部地区、行业的《百丑图》、《群丑图》和单个人物漫画。其中，罗瑞卿口衔匕首漫画颇有影响，影射这位惨遭迫害的总参谋长，当年任公安部长时曾杀人如麻……

《群丑图》作者**翁如兰**，是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高才女生。她运用漫画头大身体小的技法，把画中人物描绘得十分像似，也没有刻意丑化，显示了她的艺术功力和素养；《群丑图》是一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丑式写真漫画，即打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旗号，去反映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显示了作者政治洞察力之敏锐。

画家在《群丑图》上所描绘的 39 个人物，都是文革中毛泽东要打倒的高级官员，或者是文革初期毛要消灭的“牛鬼蛇神”，体现了毛借“造反有

理”去打倒和消灭政敌的权力情结。在画家的笔下，人们看到了毛的政敌们曾经的高贵身份和他们反毛的主要“罪行”：

1、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毛打倒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第三号主犯。

2、邓　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第一个自杀的高官，是遭毛批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作者。

3、吴　晗：北京市副市长，是遭毛批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是文革前夕遭毛重点批判的第一人，彭真死党。

4、廖沫沙：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是遭毛批的《三家村札记》和《有鬼无害》的作者，彭真死党。

5、周　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文化部第一号领导人。

6、夏　衍：文化部副部长，电影界第一号领导人，周扬死党。

7、林默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胡风冤案主要制造者之一。

8、田　汉：《国歌》歌词创作者，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是遭毛批的《谢瑶环》的作者，周扬死党，文革中自杀身亡。

9、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济南市副市长，周扬死党。

10、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是遭毛批的《李秀成之死》的作者，周扬死党。

11、郑天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彭真死党。

12、蒋南翔：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刘、邓死党。

13、陆　平：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邓死党，被毛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的被点名批判者。

14、严慰冰：陆定一夫人。

15、刘　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死党，文革中自杀身亡。

16、彭　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刘、邓死党，“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犯。

17、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第四号主犯。

18、肖向荣：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将，贺（龙）、罗（瑞卿）死党。

19、陈鹤桥：中共中央军委通信兵部政治委员，少将，贺、罗死党。

20、罗瑞卿：解放军总参谋长，大将，跳楼负重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第二号主犯。

21、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组织部部长，中将，贺、罗死党。

22、王光美：刘少奇夫人。

23、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邓死党。

24、薄一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刘、邓死党。

25、贺　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元帅，刘、邓死党。

26、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中国头号政敌。

27、林　枫：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刘、邓死党。

28、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邓死党。

29、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邓死党。

30、万　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刘、邓死党。

31、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宣传部部长，中将，贺、罗死党。

32、邓小平：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总书记，是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中国第二号政敌。

33、吕正操：铁道部部长，上将，刘、邓死党。

34、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刘、邓死党。

35、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刘、邓死党。

36、陶　铸：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保皇派”头头。

37、肖望东：文化部副部长（第一号领导），中将，刘、邓死党。

38、钱信忠：卫生部部长，少将，刘、邓死党。

39、王任重：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死党。

此外，尾随最后是杀伐成性的“东纠”、“西纠”、“联动”等，是以贵族子弟为骨干的“保爹保娘”的红卫兵组织。

显然，这是一幅讽刺毛共的政治漫画。画家用古代官员出巡形式，把毛的政敌们排列成“S”形队伍，向着“资本主义”悬崖走去，其风格独特。“S”形队伍的排列顺序，也颇具匠心：从毛的政敌们所持的“道具”，便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发展过程，符合历史记录。因此，可以这么说，《群丑图》是文革运动初期情景的真实写照，因而展现了漫画的艺术美！

什么是美？尽管人们的看法多有不同，定义分歧较大，但笔者认为，“**真**”和与真有密切关联的“**善**”，应当是美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丑图》的丑式写真是美的展示。

首先，《群丑图》的美是展示了她的“真”。画家所描绘的 39 个高级官员和一些“保爹保娘”红卫兵组织，没有一个不是文革初期毛泽东要打倒或要消灭的对象；这些对象手持的“道具”和从喇叭吹出来的声音，没有

一个不是毛泽东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暴行的历史见证。其次，《群丑图》的美还在于她婉约其“善”。善者，仁义礼智信也。“解放”后的十七年间，导致五千多万人死亡的毛泽东暴政，《群丑图》中的人物，不是毛的屠夫、刽子手，便是毛的帮凶和吹鼓手，毛所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他们都有份，都脱离不了干系。文革中，他们被毛视为异己，仅仅是**因权内讧**而已。不仅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毛泽东死后，便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重登政治舞台，用一党专政的铁拳，残酷镇压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使他们得以打着为革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旗号，以权钱交易的腐败，把自己和他们的后代，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特权阶级**，蹿升为**红色资产阶级**，亦即策驭成腰缠亿万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由此可见，他们的灵魂是丑恶的，肮脏的，揭露他们的伪善和罪恶，让中国人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就是写真，因而是美的**善举**。一位俄罗斯著名学者说：“**美是生活**。”《群丑图》以丑式写真形式，揭示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荒诞、恶劣和无奈，因而被誉为“文革第一图”，是实至名归的。

《群丑图》的美是通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在“舆论一律”的专政下，这种表现手法是画家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幅展示艺术美的《群丑图》，周恩来表态说：“**这是一幅反动漫画，打击面太宽**！”毛泽东旋即下令：“**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群丑图》“**反动**”吗？“**丑化**”吗？看看以下各节里毛、周对付政敌的批、斗、抄、游、打、烧、杀等手段，人们只能用野蛮、邪恶和法西斯去定义；而这种野蛮、邪恶和法西斯手段，与毛的“丑化说”和周的“反动说”，无法类比，与《群丑图》对 39 人的丑式写真，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2、揪斗北京“走资派”

周恩来指责《群丑图》“**反动**”，毛泽东则说是“**丑化**”。显然，他俩都在指责，翁女士笔下人物的命运被歪曲了。历史果真如周、毛所说的那样吗？请看，翁女士笔下人物在文革中的凄惨经历：

在 1966 年 5 月 4 日到 26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北京市委第一书纪兼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毛泽东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2 月 12 日下午，北京市红卫兵揪斗了彭真、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 9 名当权派(图 9-11-1)；在此之前，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已先后被红卫兵揪斗多次。12 月 23 日凌晨，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红卫兵造反派，再次揪斗彭真(图 9-11-2)等多人，连跳楼骨折不能行动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也被用箩筐抬到斗争

会上，再从箩筐内架出，坐上“喷气式飞机”(图 9-11-3)。毛式揪殴法的残酷性，可见其一斑。

图 9-11 揪斗当权派



1　　2　　3

揪斗当权派的风暴，很快从学校刮到北京市委，刮到中央各机关部委。

12 月 12 日下午，同彭真一起被揪斗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哲学家**杨献珍**、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图 9-12)



图 9-12：陆定一、林枫、万里，杨献珍和郑天翔暂缺

在揪斗风暴中，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们，国务院各部委部长主任们，已经多次批斗过的“死老虎”即文艺界失宠的御用精英们，都先后被各派红卫兵揪出来批斗。（图 9-13）

曾几何时，这些曾在一个系统、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在一个学术界里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头面大人物，其中有不少人双手还沾着老百姓的鲜血，竟遭红卫兵如此暴虐、蹂躏，历史将如何评说呢？有人说，他们中许多人作恶多端，例如周扬、林默涵，时人称其为“文艺恶棍”，文艺界许多冤假错案，都是他们一手制造的，因此，他们是罪有应得；但也有



图 9-13

说明：1. **范瑾**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2. **周扬** 中宣部副部长　3. **许立群** 中宣部副部长　4. **齐燕铭** 马列主义理论家　5. **夏衍** 马列主义电影家　6. **田汉** 马列主义戏剧家　7. **刘仁** 北京市副市长　8. **吴祖光** 马列主义导演

人认为，他们都曾是中共的功臣，红卫兵这样对待他们，叫人寒心。笔者则认为，即便是罪大恶极的坏蛋，也要通过法律程序给予惩治，因此，无论是**毛式批斗法**或者是在此基础上升级而来的**毛式揪殴法**（见后），都是毛泽东的中共对人类现代文明的野蛮践踏！

毛泽东的中共对异己官员们的批斗、揪殴的残酷性和法西斯性，与《群丑图》对 39 个高级官员所谓“**丑化**”“**反动**”的丑式写真，其野蛮、邪恶程度，毫无类比之处！

3、羞辱王光美

毛泽东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但在他的鼓动和默许下，现实中被批斗的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远比《群丑图》中的丑式写真要野蛮、邪恶、残忍得多！

1967 年 1 月 6 日，在毛泽东前台代表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策划下，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在毛泽东的红卫兵面前，刘少奇已经没有了国家主席的尊严，他无可奈何地按红卫兵的要求留下妻子，独自悻悻而返。井冈山红卫兵把王光美带到清华大学后，王光美签下了随叫随到的保证书。

4 月 10 日，经毛泽东默许和中央文革批准，蒯大富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有毛的政敌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黑帮”现场陪斗（图 9-14）。这种继承中国封建血缘关系的“株连罪”，在文革前已是中共的**准**政策。到了文革，中国人对这种封建株连罪，已习以为常了，尽管毛泽东还在高唱他的“**划清界线**”和“**重在表现**”的颂歌。据统计，因刘少奇一案而受株连的案件，高达两万两千多起，死伤数百人。



图 9-14：批斗王光美——大会会场



肆意丑化王光美

刘少奇听到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后，极为愤怒。他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王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要她代我受过**？”刘的“愤怒”很值得同情；但他可能不愿去想，他是这种封建株连罪的积极推行者，他同毛泽东一起，制造了这种现代中国不成文的**株连法**。

在批斗会上，王光美陪同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过的旗袍，戴过的项链，被红卫兵批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红卫兵们把事前准备好的瘦得难穿的旗袍，强迫王光美穿到身上，又把事先用乒乓球特制的“项链”，硬套在王光美的脖颈上……面对这种毫无人道的恶意丑化和侮辱，王光美提出抗议；但遭到回应的是“要武”式的“触及灵魂”：拳打脚踢！

4、揪斗八级“走资派”

周恩来说《群丑图》“**打击面太宽**”，说的是不是实话？

在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清晰地发现自己已沦为党内少数派，反对他的不仅中央大有人在，而地方各级尤甚。在毛看来，这是一大股不可小觑的复辟势力。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多么准确。然而，他无法扭转乾坤。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确信他个人意志的强大“神力”，足以使“地球停止运转”！

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红卫兵及其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毛泽东的态度，对北京红卫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北京红卫兵敢于造反、敢于冲击党政机关的精神，得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忠实执行者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强而有力的支持，使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先驱和表率。

敢于造**官僚特权阶级**的反，敢于把领导干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对于长期备受官僚特权阶级专权压制的青年学生和平民老百姓来说，诱惑力太强了。于是，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全国各地蜂拥而起，斗争矛头直指曾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级当权派。湖南省红卫兵造反派，率先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炮轰八级司令部”**。

所谓“八级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八个层级。换言之，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连“兵头将尾”的小小生产队队长也不放过。10 月 29 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得意忘形地说：**“到了 9 月，几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围了”**。

全国各地“八级司令部”里的当权派，大多数被揪出示众了。他们中的中、上层官员，大多数都能上镜头，但县以下官员，难有如此“殊荣”。遗憾的是，即使是上层官员，他们的镜头大多数也被尘封在密档中，不许老百姓目睹。值得庆幸的是，有少数正直的摄影记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冒着监牢危险，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能在“主旋律”的密封中，窥见到毛泽东的罪恶记录。对此，人们应向少数正直的摄影记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致谢！

下面一组图片，据信是当年《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的记录。(图 9-15)



图 9-15：批斗黑龙江省委当权派
上行：批斗省长李范五（左）　批斗副书记王一伦（中）　戴高帽的省委成员（右）
下行：批斗省委副书记陈雷（左）　戴高帽+“坐喷气式”批斗（中）　批斗省委书记任仲夷（右）

其他各地也不落后，批斗当权派的镜头也不少，只是人物或地点难以确定。(图 9-16)



图 9-16：各地批斗各级当权派

到此，**毛式批斗法**已逐步升级为全新版本——**毛式揪殴法**：抄家、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坐喷气式”、奸污、吊打或打死！在批斗版本升级的同时，“打击面”也在急剧扩大，数年间，上千万人挨批挨斗，其中被打死、拷死、逼死、整死、囚死的官员和群众，应在百万以上。这是周氏胡言《群丑图》“**打击面太宽**”的多少倍？

经过两年多的批、斗、抄、游、打、烧、杀和派性武斗，导致 200～300 万人丧生、一千多万人伤残后，毛泽东击败了刘、邓右派集团，夺了他们的权，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闲庭信步”地出现在摄影家的镜头里。请看一组“闲庭信步”图片，也许对你有所启迪。(图 9-17)



图 9-17：**闲庭信步**——（从左到右）1. 毛与林彪 2. 毛与周恩来 3. 毛与江青 4. 毛与通房“秘书”

作家鄢烈山这样描写施刑者：**“加害者与其说是在行刑，还不如说在完成一件毁人不倦的艺术品。她是带着创作的激情和审美快感来工作的。……她是在欣赏，欣赏大权在握肆行己志的惟我独尊，品味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乐趣。”**这是否是“闲庭信步”的注脚？

在“闲庭信步”中，毛、林、周、江领导下的中共，犯了危害人类的**滔天大罪**！其罪行的严重性和法西斯性，使《群丑图》的所谓“丑化”相形见绌！

五. 造反、保皇红卫兵大沉浮

陈伯达所作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作为

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后，对“血统论”的争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红卫兵的进一步分裂。

在“横扫”和破“四旧”中为急先锋的贵族红卫兵，在党内左中右派共同支持下，制造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在批、斗、抄、游、打、烧、杀的同时，还私设监狱，制造了大量无辜群众的伤亡事件(详见“红八月”)。但当毛泽东决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走资派”全面夺权时，他们开始“**干挠**”起毛泽东设计的“斗争大方向”来，成了毛左集团必欲搬开的绊脚石。然而，“当然接班”的权力情结，使他们先后在北京西城区、东城区和海甸区，成立了武装纠察队，简称“西纠”、“东纠”和“海纠”，以武力与毛泽东相对抗。

为了搬开绊脚石，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批判了“血统论”之后，贵族红卫兵迅即失势，被贬之为“保爹保娘派”，泛称“保皇派”(2)。为了进一步打击红色贵族势力，1966 年 11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针对贵族红卫兵的暴行，发出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自此，一些无视通告打人、杀人的贵族红卫兵，相继被捕。

以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反路线”为己任的平民红卫兵，则在毛左派及其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成了毛泽东向刘、邓右派兴师问罪的急先锋，蹿升为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被毛和中央文革褒誉为左派或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保爹保娘”的贵族红卫兵，则被贬斥为右派“保皇派”。“造反”与“保皇”两派在党内左、右两派势力的支持下，横眉怒目，针锋相对，因而武斗不断，其规模也迅速升级。

1、贵族红卫兵的覆灭

当中央文革直接指挥平民红卫兵揪斗右派当权派时，贵族红卫兵在刘、邓右派集团和周恩来中摇派集团的暗中支持下，组织了针锋相对的反抗。1966 年 12 月 5 日，主张保护右派当权派（老干部）的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后不久，曾被周恩来委以重任的杀戮成性的“西纠”以及“东纠”、“海纠”等贵族红卫兵组织，也先后加入了“联动”。1967 年元旦，他们

发表了挑战毛泽东的《联动宣言》(3)。在《联动宣言》中，他们把反抗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及其左派集团。

他们以红色贵族的身份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他们宣布“联动”的任务是：**“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笔者：即各级平民红卫兵组织)**。”**

他们号召：**全国各地各级干部子弟“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显然，他们号召武斗。

他们发誓：**“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在“联动”成立前后，贵族红卫兵旗帜鲜明地挑战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他们高呼“**油炸江青**”、“**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口号，张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等大标语。他们甚至公开说：“**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为要求释放被捕的“联动”人员，他们组织数百人呼着“**火烧谢富治**”的口号，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围攻殴打工作人员和其他红卫兵。在批判“血统论”后，贵族红卫兵失势。红色贵族优越感的失落，使他们在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找到了情绪发泄场合：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资修筑工事，等等。

两个多月后的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打人，杀人，杀死了三口人，杀伤三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如贺龙、陆定一的儿女。”**

贵族红卫兵的反毛和反社会的法西斯暴行，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使毛和中央文革有了反击的口实。

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讲话中就提出要对贵族红卫兵“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

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笔者：都是贵族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笔者：谢死后被鞭尸，这是原由之一）

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向“三司”负责人蒯大富下达了用武力绞杀“联动”命令：**“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1 月 21 日，以五大领袖的平民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 101 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1 月 25 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平民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武力拔掉了“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1 月 31 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向“联合行动委员会”等贵族红卫兵的残余势力提出严重警告：**“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在一个多月的武斗中，仅北京先后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和群众伤亡，一百多名贵族红卫兵骨干被捕，监禁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为了缓和一下矛盾，安抚高级干部和军事将领，4 月 22 日，毛泽东下令释放全部双手沾满血污的“联动”骨干成员。

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释放出狱，再次刺激了贵族红卫兵的狂热：他们要最后一搏！他们召开“老红卫兵新生大会”，积极参加武斗，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仇恨。他们已不敢再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就拿“黑五类”出身的子弟开刀。他们扬言：**“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他们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红色贵族们的这种歇斯底里的宣泄，是自我孤立的嚎叫，引起了大多数学生的反感和憎恶，促使中间阶层即“红外围”（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的学生）和“黑五类”出身子女，纷纷加入到平民红卫兵中去，并最后把贵族红卫兵送了终。

尽管他们在文革自我孤立并遭到了镇压，然而，文革一结束，右派复辟，贵族红卫兵们洗掉沾在手上的血污，便以文革**“受害人”**的身份挤入政坛，得到了党内右派的庇护和提拔。其中，许多人自诩为“一身正气”，成为各级党政权力的接班人，有的则成了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历史就这样

被权力炮制成荒谬绝伦的历史！

2、平民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沉浮

当贵族红卫兵被绞杀之日，正是平民红卫兵壮大之时。随着平民红卫兵的发展和壮大，五大红卫兵领袖也随之横空出世。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平民红卫兵们，当时也许没有想到，当他们为毛泽东冲锋陷阵、浴血拼杀的时候，在前头等待他们的是：**兔死狗烹**！

“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大学红卫兵领袖聂元梓(1921-1994) （图09-18）

聂元梓，女，河南滑县人，1938 年 1 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图 09-18：演讲中的聂元梓

1966 年 5 月 25 日，在康生、曹轶欧夫妇的黑箱操控下，她贴出的大字报被毛钦定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而使她名扬天下，成为文革风云人物，也改变她稳当“走资派”挨批挨斗的命运！

6 月 18 日，在聂元梓等毛派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制造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见 07 章“学校大乱”）。

由于大乱北大有功，9 月 11 日，被任命为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领导全校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领袖。后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等要职，成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

当了主任的聂元梓，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部署，炮打和揪斗了彭真等被毛泽东钦定的“死老虎”，炮打了朱德、邓小平等重量级人物。

11 月，毛泽东想要聂元梓带人到上海串连，以群众组织名义配合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夺权。由于碍于身份悬殊，便密派爱女**李讷**向聂传达他的旨意。为了效忠，聂领旨后，旋即于 11 月 19 日成行，12 月 16 日返京。她回忆说，到了上海，“**就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炮打陈丕显、曹荻秋。我参加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批判曹荻秋的大会，并且提议要群众向党中央请求改组上海市委……**”又据她回忆：在上海的 27 天里，她圆满地完成了毛交给的任务。

1967 年 7 月，同蒯大富等其他红卫兵领袖组成了“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聂亲自参加了“揪刘火线”。

被北大左派红卫兵尊为“老佛爷”的聂元梓，已充满了“要武精神”，多次组织和参与武斗，造成重大伤亡。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聂元梓，同其他平民红卫兵领袖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她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终遭抛弃。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恶狠狠地对他们说：**“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就歼灭之**！”一句话把包括她在内的“五大领袖”和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贬值、抛弃后的 1968 年 10 月到 1978 年 3 月，聂被以“反文化大革命罪”隔离审查；右派复僻后的 1978 年 4 月，聂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 17 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在审判中，当审判她到上海串连煽动夺权的罪行时，李讷**否认了曾向聂传达过毛泽东的谕旨**。对此，聂元梓著书反嘴说，**“执行毛主席指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单独地完成的”**，因而也不是李讷一句话就可以推翻的。但紧跟中央的法院，却**采信了李讷的说法**，并在判决书上弄虚作假，硬把毛泽东的谕旨改称江青指派。对此，她忿怒地说，这**“是根本违反事实真相”**的，是**“对我的诬陷”**。

“五大领袖”之二：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图 9-19）

韩爱晶，男，1946 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初受聂元梓的大字报启示，在北京航空学院组建红卫兵“红旗战斗队”，自任“总勤务员”（司令的代名词）。



图 9-19：韩爱晶(右)同陈伯达交谈

8 月 25 日，他率领北航“红旗”学生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国防科委一局长)进行批斗。静坐 28 昼夜后，终使国防科委屈服，交出了赵如璋。由此，北航“红旗”名声大震，成了北京响当当的“左派”。有人诗赞曰：“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从此，年仅 20 岁的韩爱晶，成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红人，不仅荣任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还当上了北航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务委员等要职。

1966 年 12 月，在毛泽东默许下，鹰犬戚本禹要韩爱晶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韩爱晶闻风而动，亲自带人直奔成都，12 月 17 日，将彭德怀挟持来京。批斗中，他亲手殴打彭德怀，随之，其手下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使彭前额出血，两根肋骨骨折，伤及肺部，身负重伤。

1967 年 3 月，根据鹰犬戚本禹授意，韩司令开始了“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革命行动”，为而后的监牢生活埋下了罪证。

据说，韩爱晶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 18 处，170 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 20 余人非正常死亡。

同其他几位“五大领袖”一样，经过毛泽东“要武精神”洗礼的韩爱晶，已成难以驯服野马，热衷于派性武斗，对伤亡视而不见。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韩爱晶，同聂、蒯、谭、王等“五大领袖”命运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终遭抛弃。7 月 28 日凌晨，毛泽东的一句话，把他们赶下了历史舞台。贬值、抛弃后的他，1971 年 3 月 8 日被隔离审查，1978 年 4 月 19 日，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遂以“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等数罪并罚，判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五大领袖”之三：清华大学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图 9-20）

蒯大富，男，1945 年 9 月 13 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1963 年 9 月，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图 9-20：演讲中的蒯大富

1966 年 6 月下旬，由于蒯大富率先提出“炮轰”压制学生运动的工作组，遭到工作组的反击，并被关押 18 天，后又被开除团籍。但当毛泽东否定工作组之后．他获得了“解放”。

“八一八”兴起红卫兵的激浪，也把“解放”后的蒯大富卷了进去。9 月 23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由于他反过工作组、绝过食、受过中央首长的多次接见，名气很大，很快被推举为“井冈山兵团”领导人，人称“蒯司令”。12 月 19 日，蒯大富又串连组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任司令。

由于“蒯司令”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直接听命于他们的一个铁拳，因而先后被任命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等要职，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最革命的“司令”。

在“红司令”毛的支持和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蒯和他的“三司”炮制了多起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

1967 年 1 月，蒯大富和聂元梓一起赴上海参与“一月夺权”和 批判“二月逆流”，为上海夺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4 月 10 日，蒯大富设计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到清华大学，名曰“智取王光美”，对王进行人身侮辱性的批斗。

7 月，为了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蒯大富率领北京及外地各路红卫兵数万人，包围了中南海。接着，他又组织了上百万人在中南海外示威游行，要求揪刘。他还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驻扎在中南海外面，作了长期揪刘的准备。尽管“揪刘”未果，但他由此而名扬天下。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蒯大富发表了《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的文章，为毛、江“揪军内一小撮”推波助澜，使许多高级将领遭殃。

1968 年 4～7 月间，蒯的“兵团”派与“四一四”派，在清华校内厮杀，制造了一起 13 人丧命、400 多人伤残的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蒯大富，同聂、韩、谭、王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终遭抛弃。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他和他领导的红卫兵，被毛泽东赶下了历史舞台。贬值、抛弃后的 1968 年底，他被流放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电解工。1970 年 11 月，他又被押回清华受审。1978 年 4 月 19 日，他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遂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五大领袖”之四：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厚兰（图 9-21）

谭厚兰，湖南人，女，教师，共产党员，1965 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淮海文藏 www.0516sc.com
图 9-21：谭厚兰(右)同毛泽东握手

1966 年 6 月，谭厚兰以聂元梓为榜样，率先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工作组，因而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后，她迅即成了“英雄”，公推为学生领袖。

1966 年 8 月 23 日，谭厚兰在北师大组织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造反组织；同年 12 月 26 日，她又联合其他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被推举为总负责人。

1966 年 11 月，在中央文革小组授意下，谭厚兰率 200 多红卫兵到山东曲阜“孔家店”造反。在曲阜的二十九天里，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经陈伯达批准刨平孔坟，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破坏文物 6,618 件，当场又对其曝尸批判。她还专程押解孔学专家**周予同**教授，逼其亲手挖掘孔坟，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参加过 1962 年“孔子讨论会”的**高赞非**等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葬”。

由于谭厚兰效忠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被任命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等要职，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她的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炮轰八级党政机关，影响力极为广泛。她还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联合，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积极作用。

在 1967 年 3 月，谭厚兰在江青授意下，积极参加反击“二月逆流”，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公开提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3 月 22 日，在北京体育馆由她主持的批斗会上，“要武精神”勃发，把副总理谭震林打得头破血流。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谭厚兰，同聂、韩、蒯、王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她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终遭抛弃。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毛泽东一句话把包括她在内的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贬值、抛弃后的 1968 年 7 月 29 日，工宣队开进北师大，她旋即失去了权力。10 月，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她被发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 年她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随即失去了自由。1978 年 4 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因患宫颈癌晚期，1982 年获准保外就医。不久死于湘谭老家，时年 42 岁，终身未婚。

“五大领袖”之五：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领袖王大宾

王大宾，男，四川凉山人，1946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1961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1965 年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向全国蔓延，王大宾也随即拉起了自己的山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开始了破“四旧”揪工作组的运动。

为了揪斗曾任地院工作组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和支持邹的地质部党委书记、副部长何长工，从 8 月 23 日到 10 月 27 日的六十多天里，王大宾亲率“东方红”红卫兵“四进地质部”，达到了揪斗的目的。“四进地质部”，使王大宾名声大震，成了全国有名的造反派，跃居首都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

当江青等示意揪斗彭德怀时，王大宾随即率“东方红”战斗队跳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但他还是晚到了一步，北航“红旗”先一步将彭德怀挟持到成都地质学院。恼火的王大宾带人赶到成都地质学院，趁北航“红旗”队员和军区警卫吃午饭时，突然一拥而上，打倒看守，抢走彭德怀。由于周恩来的干预，王大宾被迫同意与北航“红旗”、成都军区某部一起，共同将彭德怀压解回北京。

7 月 26 日下午，王大宾和韩爱晶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万人大会”，拉张闻天“陪斗”。

由于王大宾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因而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等要职。

同其他几位“学生领袖”一样，经过“要武精神”洗礼的王大宾，已成难以驯服野马，多次组织、参加派性武斗，对伤亡视而不见。

他的结局同其他红卫兵领袖一样。贬值、抛弃后的 1971 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78 年被捕，不久，以“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等罪名，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9 年，剥夺政治权力 2 年。

3、 为平民红卫兵的覆亡放声大哭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和王大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其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到了 1968 年夏，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完成了夺权任务，先后组成了新的以毛左派为主的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为毛夺权的历史使命已

经结束，毛泽东决定终结平民红卫兵的活动。

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五大领袖”。毛泽东警告他们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尽管“五大领袖”争辩说，把杀人放火都归到他们头上“不公平”，**“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言外之意，杀人放火多都是贵族红卫兵和“保皇派”所为。毛泽东还是毫不留情警告：**“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此刻，毛泽东所借助红卫兵的那口屠刀，已经完成了使命，狡兔死，走狗烹，他毫不犹豫地推翻了 1966 年他批准公安部下达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毛泽东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平民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作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平民红卫兵的使命已经结束。做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学生，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红司令”的心计和手段：他们的单纯、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为毛所利用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是为保卫毛主席而披荆斩棘而冲锋陷阵的，应该是毛的功臣；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暴戾恣睢和穷凶极恶为毛所推崇，仅仅因为他们是口杀人的刀；他们更无法知道，他们朦胧的独立意识和自由价值观，本来就为毛所增恶、所不容，他们原本就不是毛心目中的依靠力量。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杀过人、放过火，当打倒刘、邓的任务基本完成时，他们的利用价值也随之告罄，在任一借口下，都会被无情抛弃，这是必然的。满脸委曲的“五大领袖”们，忽然发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他们所崇敬、所依靠的“红司令”，竟然那么无情，又那么陌生！难以名状的失落感，使他们面面相觑，继而泫然相涕，蒯大富则放声大哭。不过，林彪临走时给他们的赠言，也许对他们有所启迪。林彪说：**“别哭了……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为了给终结红卫兵使命找个令人信服的根据，8 月 8 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此时，在**“理无常是”**哲学海洋里游弋的毛泽东，与他在两年前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善于”出尔反尔的毛泽东，不可能忘记两年来的所作所为：1966 年 8 月，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同年 8～11 月，在天安门上，他先后八次“接见”了 1,200 多万红卫兵，还通过林彪和周恩来的嘴，大声赞扬红卫兵无法无天的残暴精神，说他们**“做得对，做得好！”“好得狠！”**到了 1967 年 5 月 16 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赞扬红卫兵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

一万年也不行。”善弄权术的毛泽东，当时丝毫不露“**历来如此**”的玄机。显而易见，他向红卫兵发出“**就歼灭之**”的狠话，暴露了他利用红卫兵的无知、暴戾的险恶祸心！

贵族红卫兵与平民红卫兵及其五大领袖发迹、得宠、威武和结局，发人深省。终使人们悟到，在毛泽东的导演下：左派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结局，虽令人扼腕，但的确是罪有应得的替罪羊；右派贵族红卫兵、造反派的结局，虽令人不齿，但的确是血债累累的既得利益者！

在中共专政极权下，平民红卫兵与贵族红卫兵的不同结局是必然的，因为平民红卫兵批斗的是中共当权派，而贵族红卫兵残害屠戮的是弱势群体，尽管双方都在党内左右派支持下进行了武斗。两种不同结局，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共手段阴险、狡诈、反复无常及其机会主义的无道性，也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共反人类的封建血统论政策的一贯性。

平民红卫领袖们的泫然相涕和蒯大富的大哭，证明他们愚蠢有余而省悟不足。他们也许认为，他们是他们红司令毛泽东的功臣，让他们当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是不公正的。然而，自他们从 1966 年 6 月被他们的红司令高捧而横空出世，到 1968 年 7 月 28 日遭他们的红司令遗弃而扫地出门，在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在他们红司令的指挥下，同他们的对手贵族红卫兵一样，都干尽了坏事，双手都沾满了血污，都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罪犯！

令人悲哀的是，在一党专政下，中华民族已变成了一个健忘的民族——长期以来，在权贵和御用史家、学者、作家们的鼓噪下，亿万百姓在赞扬毛泽东取缔红卫兵的同时，却对同一个毛泽东在制造、支持和统率红卫兵中所犯下的反人类大罪视而不见！

第 09 章附注：

附 1、反人类罪——危害人类罪：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中文译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规约》将“危害人类罪”归纳为 11 宗罪：

1.谋杀行为：所谓“谋杀”，是指以故意杀害或致死他人的方式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平民人口实施的攻击行为。

2. 灭绝行为：所谓“灭绝”，是指包括故意施加某种生活状况，如断绝粮食和药品来源，目的是毁灭部分的人口。

3. 奴役行为：所谓“奴役”，是指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包括在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的过程中行使这种权

力。

4.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的行为：所谓“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是指在缺乏国际法容许的理由的情况下，以驱逐或其他胁迫方式强迫有关人员迁离其合法居留地的行为。

5. 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所谓“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指严重违反关于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国际法基本原则，采用各种方式长期或无限期地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6. 酷刑：所谓“酷刑”，是指故意使被羁押或受控制者的身体或精神遭受重大痛苦的行为。

7. 性攻击行为：性攻击行为，是指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与性别有关的虐待行为。

8. 迫害行为：所谓“迫害”，是指违反国际法规定，故意严重剥夺某一团体或集体基本权利的行为。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这种迫害行为是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第 3 款所界定的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任何一种本款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

9. 强迫人员失踪的行为：所谓“强迫人员失踪”，是指在国家或政治组织直接授意、支持或默许下，逮捕、羁押或绑架有关人员，并将其长期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继而拒绝承认这种剥夺自由，或者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及下落的行为。

10. 种族隔离罪：所谓“种族隔离罪”，是指一个种族团体出于维持其体制化制度之目的，有计划地针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一个或多个）进行压迫与统治，而实施的与危害人类罪行为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

11. 其他不人道行为：所谓“其他不人道行为”，是指严重损害身体或者心理完整、健康或受害人尊严的行为，例如损害或严重伤害身体。

附 2、“保皇派”：

“保皇派”一词不准确。当年的“皇”是毛泽东，而“保皇派”保的是毛的右派臣子们。“保爹保娘派”一词也欠准确，因为“保皇派”保的不一定是他的爹娘，保的是右派当权派。不过，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说，本文也权按此名。

附 3、《联动宣言》

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

中发秘字 00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 1966 年 10 月 1 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地区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 1967 年元月 1 日

第 10 章 文革第一轮大屠杀

10 章目录

★一、利用红卫兵大屠杀 1、公安六条 ★ 2、血雨腥风泛校园 3、血花飞溅染街巷
★4、血渍斑斑大驱逐 ★二、大兴屠杀 1、鲜血淋漓东方红 2、血肉横飞大辛庄
3. 无碑纪念 ★ 三、第二波自杀风潮 第 10 章注

一．利用红卫兵大屠杀

1、公安六条和“要动动”

在红卫兵大破“四旧”和胡批乱斗的疯狂中，人们已经看不惯了。地方官员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纷纷派出军警干涉学生造反。有二十年代湖南“**痞子运动**”成功经验的毛泽东，一心要在六十年代发动一次使天下大乱的新的“痞子运动”，并在乱中取胜。当他听到军警干涉学生造反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他斥责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副帅林彪闻风在 8 月 21 日下达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谢部长怎敢怠慢？立即起草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文件，经毛点头后，迅速发布全国。历史载明，文件所指的“革命学生运动”,就是毛泽东在 8 月 1 日写回信给清华附中的十几岁中学生号召他们起来造反、夺权从而发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文件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图 10-1）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８月５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８月２０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６月10 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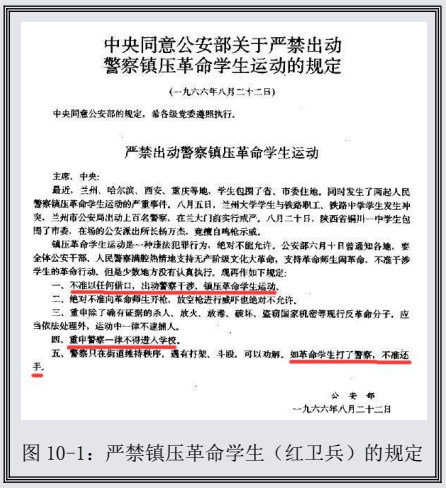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
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扬方态，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网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公 安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图 10-1：严禁镇压革命学生（红卫兵）的规定

公安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的“最高指示”，鼓励无知的学生和地痞、流氓们，像在“横扫”、“破四旧”中那样，可以任意批、斗、打、砸、烧、抄、杀。据此，谢富治秉承毛的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圣意”，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的座谈会上，就打死人事件明确表态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这就是著名的“**杀人无罪**”讲话。打人、杀人之风迅即合法化——新的“痞子运动”在毛的权力鼓动和保护下，变本加厉地疯狂起来。

当全国媒体口径一致地热情讴歌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时候，**当**全国报纸千篇一律地天天把红卫兵的活动作为头版新闻热情报导的时候，**当**人们从官方发行的新闻纪录影片中看到千千万万个红卫兵高呼着“万岁”涌过天安门广场、红卫兵的领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着毛泽东欢呼雀跃的时候，**当**毛泽东笑容可掬地向红卫兵们频频招手寄予无限信赖和支持的时候，**当**天真的人们正在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欢欣鼓舞的时候，**许多善良人可能没有想到**，一股鲜血淋淋的浊流正在以“合法”的形式肆虐中华大地，正在“合法”地用无辜人的鲜血涂抹“三忠于”、“四无限”的红海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被当年红卫兵引以为荣的“**红八月**”（一般指 1966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鼓动、支持、保护下的恣意暴虐和鲜血涂抹的“红八月”里，以贵族红卫兵为首的各路红卫兵，正在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真、善、美的华夏文明，正在穷凶极恶地颠覆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

在人性之恶得到宣泄和张扬的“红八月”里，打死人“英雄”、打死人

“光荣”的氛围已经形成。八月上旬的一天，由于毛泽东在 8 月 1 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回信中，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其负责人高干子女学痞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北京日报》摄影记者便到北大附中采访，拍摄该校开展文革情况的照片。为了迎接采访，**彭小蒙**组织了一次批斗常务副校长、化学教师**刘美德**大会。当时有孕在身的刘美德被逼爬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学痞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踏在她背上，摆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造型，由记者拍摄。这一造型来源于毛泽东 1927 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记者拍完照片后，这个学痞一脚把刘美德踹下桌子。后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因先天性受伤而夭折。当《北京日报》记者拍摄的时候，踩踏老师的学生异常兴奋，把照片见报，当作今生今世莫大荣誉。可惜这张照片没有刊登，被尘封在档案里，人们至今未能见到。

在打死人“英雄”、打死人“光荣”的氛围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十四岁的初中生学痞刘 xx，曾炫耀自己打死过三个人的“英雄行为”。后见风向有变，便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说自己年幼无知，“打死过三个人”是为追求“光荣”而造假，妄自尊大称“英雄”。——你相信她的话吗？

1966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曾被透露过但至今也不准许老百姓查阅的材料。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从 8 月下旬到 9 月底的 40 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 1,772 人（1）。但是，根据当年**“红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和而后从事独立调查、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超过 5,000 人。全国呢？**专家们估算**，仅 1966 年，至少有十万以上的人惨遭杀戮！北京究竟打死了 1,772 还是 5,000？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其中有多少是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多少是下层无辜百姓？在档案尘封和调查扼制的严密监控下，人们无法知道确切数字（2）。9 月 5 日，毛的打手中央文革小组，在内部《简报》上，把红卫兵的流氓大屠杀称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

红卫兵大规模的抄杀行动，显然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破“四旧”刚开始不久，林彪将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 109 号《简报》，呈送给毛泽东。8 月 20 日，毛泽东在《简报》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他毫无保留地支持了“红八月”里红卫兵的大抄杀，使挂常在他嘴上那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教，变成了一张美丽的“画皮”！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上规模的屠杀，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大屠杀，也是中共“解放”中国人民、成立“新中国”十七年后的第二次大屠杀。“新中国”第一次大屠杀是 1950～1953 年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共约杀掉 300～400 万人！不同的是，第一次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的政府行为，这次主要是借刀：借“群众”即借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的刀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进行的屠杀！

人们可能对大规模屠杀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人民日报》多次宣扬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怎么会允许红卫兵胡打乱杀呢？事实上也有不少干部出面制止过打杀，但红卫兵们懂得“伟大领袖”的真意吗？纵观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群众运动**，初期都是“**打破条条框框**”、“**放手发动群众**”，而且都要先拿奉公守法的“传统敌人”祭旗，换句话说，就是“宁左勿右”。所谓“宁左勿右”，就是在运动初期的一段时期中，造成一个群众“积极参加”的乱批、斗、打、抄、杀的无政府主义恐怖局面。——这就是最高统帅“**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信条。毛泽东 8 月 23 日说的“**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就是这种信条的故伎重演。而此次的毛氏“过正”，就是要借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的“刀”，首先镇压战战兢兢做人的“黑五类”弱势群体，借以儆戒一切潜在的异己者，继而乘风借势镇压一切反抗者。于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教，变成了失去法律支撑的官样文章；出面制止打杀的干部，不是出于良心再现，就是不得不作的官样行为；而贵族红卫兵们，特别是十几岁的“娃娃”们，在父辈们的言传身教下，很快读懂了“伟大领袖”的真意，毫无顾忌地成了“红色恐怖”的急先锋。可怜那些被称为“吸血鬼”、“寄生虫”等“人民仇敌”的“地富反坏右”们，在十多年前已经丧失了“宪法”赋予他们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和权利，在而后的历次运动中，被“运动”来“运动”去，早已被整治得战战兢兢，在社会最底层、最贫困中挣扎，这次上层权力拼杀，他们又像翻烧饼那样被翻了出来，再次被拿来祭旗！

文革后，不少中共要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证明”：毛泽东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显然，在横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哲学的国度里，这种“证明”在“主旋律”作用下，就会把**谎言变成真理**。

2、血雨腥风泛校园

毛泽东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而他所支持聂元梓的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则明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因此，各地“诸侯”为了自保，都纷纷找出几个“替罪羊”当牺牲，来“祭祀”上层权力斗争，以表示紧跟、崇敬、

效忠并祈求平安。

在这种中共伦理共识的氛围里，中共江苏省委头头们，首先把曾写过一本书并再三向省委表示“烧书认错”的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和他的妻子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抛出，作为江苏省的“黑帮”进行批判——不准他俩认错!不准他俩投降!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件发出后的第三天，即1966年8月3日傍晚，在江苏省委的示意和放纵下，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流氓学生，冲进吴天石和李敬仪的家，把他们拉到南京师范学院内已经搭好的高台上进行批斗。批斗中，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他们的身上，并进行了殴打和“游街”。李敬仪当天被打死，时年53岁；吴天石被殴致重伤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56岁。事后尸检报告中说，吴身上骨折就有六处。在著名的“**不主张打人**”的“最高指示”发表后，李敬仪很可能是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师，而她和她的丈夫，很可能是被学生打死的第一对夫妇教育工作者。

也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件发出后的第三天，天才诗人、学者、翻译家、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图10-2)，成了北京第一个受难者。



图10-2：吴兴华和他的两个女儿

吴兴华(1921～1966)，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年16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

我应该用些什么来回报世界的宽容？/——如同经文里所说:无赖的流浪之子/期待着雷霆、闪电和连山烧起的烽火/烧焦羞耻的容颜，沾染着绝望的泪；/寻到如旧的笑容，如旧日张开的手臂——/我，在德行里睡眠，罪恶里游荡的人/曾抬头看见青天，在天幕后面有目光/不见辉煌的马，载着如流星的灵魂，/来去在大气当中；我看见永远的幸福/照耀着如一圈光，无边而纯洁，在周围/黑暗如夜间潮水，从四面怒吼着奔上来/一触着她的边缘，便悄悄退了下去……/今天啊，我用眼泪来证实昔日的梦境，/投身在你的脚下，我立起一个善人。

他在诗歌、学术研究、翻译三个领域齐头并进，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陈寅恪、钱钟书同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学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诗歌创作上，他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意境、汉语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力图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在学术研究上，他学贯中西，博通文史，他的《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等著作，被海外学者誉为现代中国真正学贯中西的少数几位学人之一；在翻译领域里，他的《尤利西斯》、《神曲》等译稿，被誉为译林神品。

他的才华令人瞠目，他的命运却令人扼腕。1957 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进入校园“劳改队”并被红卫兵殴打和抄家。这位“被暴虐的缪斯”，1966 年 8 月 3 日在北京大学校内“劳改”时，被红卫兵殴打后又强迫他喝从化工厂流入的污水，迅即中毒，不治身亡。就这样，一代天才毁灭在毛的红卫兵手中，终年 45 岁。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件发出后，拥有一半以上高干子弟被时人称为“皇家女子学校”的北京师大女子附中，迎“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仁穷上将的 18 岁女儿**宋彬彬**和邓小平的女公子 16 岁的**邓榕**，成了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工作组撤走后，贵族红卫兵主导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喝狼奶长大”的红卫兵，根据“红司令”“**要放手发动群众**”和“**不要怕出乱子**”的教导，一改工作组掌权时那种“冷冷清清”的局面，提着棍子，拎着皮带，对学校校长和老师们进行了“触及灵魂”的毛式揪斗殴戮。1966 年 8 月 5 日那一天，她们把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明**和副主任**汪玉冰**打成重伤，而副校长**卞仲耘**，这个有十七年教龄的 50 岁妇女，当天即在南京师院李敬仪被打死后的第三天，便倒毙在“喝狼奶长大”的女红卫兵们的棍棒拳脚下。（图 10-3）



北师大女子附中前校长卞仲耘



图 10-3：卞仲耘和当年红卫兵公布她的尸体照(右)

对于**卞仲耘**被暴打致死的过程，笔者根据目击者林莽、伏生等人的回忆录和王友琴等人的调查文章，综合简述如下：

8 月 5 日的下午，师大女附中的大操场上人群沸腾，敲击声、嘈杂声和嚎叫声响彻校园。只见女红卫兵们压着五个“黑帮”在操场台子上批斗，然后把他们揪下台子进行游斗。他们是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没有正校长，卞是校党总支书记主持全校工作)、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明和副主任汪玉冰。他们有的被戴上高帽子，有的脖子上挂着写着“**反革命黑帮 xxx**”打着红叉的牌子；他们的“**脸全被墨汁涂黑，眼珠子的转动就**

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他们被红卫兵强迫一边敲着破锣、铁簸箕，一边大声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等等。

游斗“黑帮”的两边，都有女红卫兵押着，她们都戴着“红卫兵”的袖章，红布黄字，手上握着短棍和木制长枪。一发现哪个“黑帮”不喊或喊得不够响，照头就是一棍，“**像敲击木盒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目击者看到，其中一个手持大棒“**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的“**竟是 xx**”。（据说，由于她是大名鼎鼎的高贵千金，名子太敏感了，为了安全，作者不得不以“xx”代之。）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

被骂为“装死”的卞仲耘，躺在地上，“**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当七点来钟校工把“装死”的卞仲耘拉到医院时，卞已死了 1 个多小时！

卞校长被打死后，风云激变。“八一八”那天，据信，得知打死卞仲耘的**毛泽东**(其爱女李讷曾是卞的学生，江青也曾约见过卞)，在天安门前，公开接受杀人嫌犯**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并号召“**要武**”。他的言行分明表示，他坚决支持红卫兵批、斗、打、抄、杀的反人类的“革命行动”。于是，揪斗打杀温度直线上升，使 1966 年 8 月，迅速演变成疯狂的鲜血淋漓的“**红八月**”。

在反人类的“要武”精神推动下，北京六中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大多数都参加了被周恩来委以重任的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西城区纠察队”，成了杀戮成性的“西纠”队员。他们把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改造成一座监狱。在监狱的屋顶上，他们搭了一个岗楼，安装上一盏彻夜长明的大功率灯泡，昼夜监视被关压的“罪犯”。这个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学校，引领当时许多外校红卫兵前往参观、学习。

在这座监狱里，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岁”口号，用来镇慑“犯人”。在监狱存活的一百多天中，六中有 9 名老师，自始至终都被关押在这里。他们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经常挨打挨骂，还遭受跪煤渣、跪板凳的体罚。据报导：一位老师股骨被打成骨折；一位老师被学生拉来作练拳的活

靶子打，引起了胃出血；一位教导处副主任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放出一个月后，便死在家里；此外，还有一些为数不详的人关在这里，关押时间长短不一。

又据报导：六中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三人先后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

当年的红卫兵报报导：六中红卫兵头头王 xx、陈 xx，听到徐霈田曾说过“西纠”的“坏话”后，便决定拿已七十六岁高龄的老校工开刀，借以恐吓其他反“西纠”者。10 月 3 日下午，他们把徐挟持到监狱里，对徐说：“给你洗洗澡。”他们先用冷水冲身后再用热水浇身办法去折磨老人。当听到老人“冷啊”“热啊”的惨叫声时，他们竟开怀放声大笑。第二天，他们把奄奄一息的老人，吊死在监狱后院的厕所里，谎报老人“畏罪”上吊自杀！

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文革中升级为“资本家”；文革前，他当过班长，曾与一些学痞有所龃龉；文革中，他竟敢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不符合党的政策；大串连时，他又未经六中红卫兵组织批准，竟敢擅自到外地串连，等等。他的出身和言行，证明他是个“狗崽子”。“西纠”决定对这个不忘反动老子的“混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66 年 9 月 27 日，当王光华从外地刚回到北京，就被“西纠”头头粟 xx 绑架到这座监狱里。一群“西纠”学痞，把他围了起来，其中一个揪着他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今天要触及触及你的灵魂。”说着便拳打脚踢起来；有的则拿着军训用的木枪和木棍毒打他；有的则一边打一边用“要武斗，不要文斗”的暗语大声喊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在连续不断地毒打下，9 月 28 日晚，王光华惨死在狱中，时年 19 岁。

令人尊敬的**王友琴**教授，曾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学生，是当年许多血腥现场的目击者和见证者。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排除万难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向垄断、屏蔽、扭曲历史和阻挠调查的邪恶行径挑战：通过十多年的独立、困难重重地调查研究，为七百多个**下层弱势受难者**树了碑、立了传，为被扭曲了的文革史增添了上百万字真实的珍贵资料。

根据王友琴教授的独立调查和其他一些目击者的回忆，人们从“红八月”的一些文章中，看到了部分校园里的屠杀：

8 月 17 日，北京 101 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

8 月 18 日，还是在这个 101 中学，红卫兵怀疑归国华侨的**体育教员**是个特务和坏分子，便把他扔到学校池塘里。他几次挣扎出池塘边，都被红卫兵用石头打了下去。最后他精疲力尽，终于沉没下去，死于红卫兵们的

欢呼声中。

8月19日，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台上，血流一地。

同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

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

8月25日上午，北师大第二附中高三学生**曹滨海**，遭本班红卫兵抄家。据说，当时曹滨海奋起反抗，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幸免遇害，而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进学校，打死在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关在狱中的曹滨海虽未被打死，却从此精神失常。

同樊希曼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该校语文老师**靳正宇**和校负责人**姜培良**。

8月25日夜里，红卫兵把已经被关押在校园中的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梁光琪，女，时年54岁，已经担任这所女子中学的负责人三年多。她被打死之前，她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受到各种虐待和折磨。

8月26日，在清华附中学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几乎死去。在其他多个班级里，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剪了头发和遭到殴打。

8月27日，北大附中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抄家中抓来的校外人员。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已无从查考。

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36岁的男教员**孙迪**，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里。目击者说，一群女红卫兵在操场上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孙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烂打飞了，形同裸体。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在西安市小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子弟为骨干的“红色恐怖队”，揪斗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姓王的**中学老师（女）。因其美丽便冠以“资产阶级分子”的“罪名”，被拉到桌子上继而又被拉到桌下批斗，百般耍弄和毒打，最后被活活打死于桌下。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文革后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66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打全堂”（评剧术语）的时候。8月26日，她听到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从那天开始，她遭

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在遭毒打、侮辱的“打全堂”中，自杀身亡。

此外，据各方报导和回忆，在那年夏天被打死在校园中的还有：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
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语文老师**齐惠芹**；
北京 138 中学书记**张冰洁**；（她在国务院工作的丈夫向国务院领导反映，请求帮助。上面说，“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们也管不了”。）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
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
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
广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
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
南京第十三中学数学教师**韩康**和体育教师**夏忠谋**；
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师**王冷**和**王伯恭**；
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化学实验室里，红卫兵把一个 18 岁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

据知情人披露，1966 年夏天，仅北京西城区就有一百多名教师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上面纪录的四五十个受难者，仅仅是被打死者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受难者死无其所，冤情难申。——这是毛泽东发出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的“最高指示”的后果之一。

也许有人质疑上面的记录；但你是否应该首先质疑：为什么文革档案 40 年后仍不解密？为什么对文革血案不认真调查反而阻挠民间自费调查？为什么封杀一切揭露文革屠杀的文章？为什么不追究凶手和组织者的责任？为什么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案置若罔闻？

何止于此！中共在继续扭曲、掩盖历史的同时，还在继续有领导地谱写着它那最黑暗、最无耻的篇章：1966 年 8 月 18 日，18 岁的杀人嫌疑人**宋彬彬**在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后，便改名宋要武（图 10-4：①），在“红八月”大屠杀的血浪中，大显身手（据国内著名学者千家驹《自撰年谱》中记载，宋彬彬双手沾染了八个受难者的鲜血），

又是打死校长卞仲耘的重大嫌犯之一；三十九年后的 2005 年初，在八宝山国务院副总理宋任穷追悼会上，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慰问宋夫人的同时，毫无顾忌地慰问了为了避嫌被父母用权保送而悄然移居美国的**杀人嫌犯宋彬彬**（图 10-4：②）。卞仲耘和那些在“红八月”里惨遭屠戮的受难者的在天之灵，如果看见这张逍遥法外的宋彬彬继续招摇过市的图片，能安然瞑目吗？





图 10-4：①.1966.8.18，毛、宋彬彬在天安门前　②.2005 年初，宋母、宋彬彬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八宝山宋任穷追悼会上

2014 年 1 月，为了洗刷“杀人嫌犯”的恶名，从美国归来的宋彬彬，出人意料地向文革中受伤害师生“道歉”！已九十三岁高龄的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周一发表声明（3），指摘宋彬彬等人借“道歉”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由于中共拒绝清算文革，遏制调查，王晶垚为妻子伸冤而寻求“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期望，可能路遥遥而难及；宋彬彬想以“道歉”来洗刷“杀人嫌犯”的恶名，恐也梦迢迢而难圆，尽管她有官方支持。

3、血花四溅染街巷

1981 年 3 月 26 日，“中法 81 中刑监字第 222 号”文件，宣判刘文秀无罪，同时，宣判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刘文秀和**李文波**何许人也？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李文波》一文中写道：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 1966 年 9 月 10 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 1966 年 9 月 25 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

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

人们通过周恩来的讲话得知，在“红八月”里数千名被打死的北京居民之中，**李文波**的姓名“幸运”地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给历史留下权力无法抹掉的篇章。



图 10-5：李文波蒙难处

根据王友琴等学者调查和目击者的回忆：李文波，男，1914 年生，北京崇文区棹杆市广渠门内大街 121 号居民，平时以修自行车为生。因有一处住宅（图 10-5），被定为小业主。1966 年 8 月 25 日，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领导，给他家引来了北京女子十五中的红卫兵“小将”。杀气腾腾的“小将”们，**非法**闯进屋里，勒令李文波、刘文秀夫妇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因没有如愿，她们便翻箱倒柜、掀破屋顶进行全面非法搜查；又因一无所获，她们便气急败坏地用棍棒殴打起李、刘来。面对那些肆意践踏法律、毫无人性的禽兽，52 岁的李文波忍无可忍，**依法**奋起自卫，拿起菜刀大喊道：“我跟你们拼了！”见势不妙，女红卫兵纷纷逃离。不多时，十多名持棒男女红卫兵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当场把李文波打死。年过半百的刘文秀，见丈夫被活活打死，痛不欲生地大骂红卫兵是“土匪！”“强盗！”大喊“拼了！”奋起搏斗，终被制伏。血案发生后不久，曾自诩“**我对待敌人从来不手软**”的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颠倒黑白，将李文波夫妇**合法自卫**定性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属“阶级报复事件”；周恩来还亲自接见了打死李文波的红卫兵，夸奖他们是“英雄”；接着，他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以“行凶杀人”的莫须有罪名，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被红卫兵打死的李文波死刑。1966 年 9 月 13 日，刘文秀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一起千古覆盆大冤，就这样公然地赤裸裸地展示在国人面前！**刘文秀**也因而成为中共和周恩来“依法”枪杀的反抗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人！

李文波、刘文秀夫妇依法自卫的所谓“阶级报复事件”，被周恩来和红卫兵颠倒黑白，大肆宣扬，激起了红卫兵们阵阵狂戮。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此时，李文波的合法自卫又被升级为“白色恐怖”。李文波被打死后的七天里，数千名各路红卫兵丧心病狂，“用红色恐怖来还击”所谓的“白色恐怖”，血洗李文波家所处的崇文区棹杆市一带，无数人惨遭毒打，十多名无辜者倒毙在他们的棍棒之下！

十四年又七个多月后，迫于正义呼声，中共虽不得不重新判决，宣判**刘文秀无罪**，但拒绝宣判李文波无罪。由此可见，文革后的中共，不愿幡然悔悟，彻底自新，仍坚持当年大屠杀“合法”理念：**非法抄杀合法；合法自卫非法**！

在“**红八月**”大屠杀的高潮中，对“阶级敌人”从不心慈手软的总理周恩来，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中共对红卫兵无法无天地抄家和打杀行动的支持。9 月 1 日，面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他在高唱“**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同时，宣布说：“**所以**(你们)**在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这就是“敬爱的周总理”著名的“**支持抄杀**”弱势人群讲话。四十年后，没见有被砍伤的“**女十五中的同学**”出来现身“证明”，也没人见到有女红卫兵被砍伤的资料。

什么是“暗藏”？什么叫“逃亡”？什么算“反动”？毋庸法令规定，勿须政策界定，无用检察推定，不要法院审定，在毛主席号召、周总理拍板后，一切交由居委会那些“只会加减，不识乘除”的大妈大婶们去认定，最后，再把决定和执行鞭刑、棒刑、死刑的权力交给熟背《毛主席语录》的十几岁红卫兵“娃娃”们——这就是毛泽东发明的、周恩来积极执行的“**群众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政府总理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下，红卫兵抄家抄红了眼、杀人杀黑了脸！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学者的调查和目击者的叙述，人们看见了“**红八月**”里血溅街巷的红光：

1966 年 8 月 23 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 29 名“牛鬼蛇神”，被她们押送到“文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强迫他们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在火堆四周，十几岁的红卫兵“女将”们，拎着皮带，提着棍棒，柳眉杏眼，怒视“牛鬼蛇神”，发现有稍不如意者，便用皮带抽或棍子打，对他们进行“触及灵魂”式的毛式批斗。著名作家老舍，在“批斗”之后的第二天，便纵身跳入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里自杀身亡。

1966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 2 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厂胡同 6 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邻居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 70 来岁老人，被绑

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去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老先生叫左庆明，十多年前曾经开有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 50 来岁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毒打，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不忍听到，只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来车拉走了他们的尸体。

8 月 27 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一个退休女会计**孙启坤**。

8 月 28 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 93 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一个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红卫兵恼羞成怒，把李丛贞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为了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一个打他的红卫兵，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割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他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下来。

8 月 29 日，据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一个红卫兵说，在“红八月”里，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就打死了十多个人。其中，8 月 29 日，高二的一些红卫兵，跑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把与他们观点相左的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珉**老人打死。

在北京市 1966 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 20 号的**韩模宁**一家**五口**，傍晚，被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全部杀害。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的是当地派出所民警罗 xx。笔者判断：这很可能与报复杀人相关。

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而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一名被控有“反革命罪”的**年轻女子**，被捆抱在柱子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其背。由于此女拒绝认“罪”，直到贴身衬衫被抽烂了，也一声不吭。于是，她被翻身背绑柱上，狠抽其胸乳。没打几下，只听女子惨叫一声，头耷拉了下去，便香消玉碎，魂断京都。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后，尖叫一声，在街巷里疯狂奔跑……

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竟然踩踏她的肚子，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一群红卫兵在崇文门附近，抄了一个“**地主婆**”寡妇的家。他们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拎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上灌下去，直把寡妇活活烫死。

汪芝麻胡同的居民**傅毅茹、周康玉、张洁凤**等人，是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抄家时先后被红卫兵打死。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但因她的已故夫君曾是“旧社会”的小官僚，自然“罪”不当恕，抄家又从褥垫下搜出一把短刀，更是“罪”不

容赦，瞬即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独居小院周康玉女士，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后代，自然在劫难逃，打成重伤后，挣扎着上吊而死。第三位张洁凤女士，人们尚不知道他历史上的“污点”，便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红卫兵轮番上阵，用皮带抽打，当即撒手人寰。

据北京市八中红卫兵组织发起人之一的**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雅，不像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于是，他们杀向社会，终于干出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他们抓住了一个专同红卫兵作对的名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毛式“触及灵魂”式的殴打和木枪捅刺。目击者这样写道：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至今，无人知道“西山老大”姓甚名谁？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流氓头子”是谁给他定的性？知情者、官方对此讳莫如深，试图把他从历史中抹掉。

“红八月”的腥风从北京刮向全国，也刮到了河南省许昌市。笔者暗访，1966 年 8 月 27 日，地区印刷厂党委书记**朱普华**和厂长**杨新喜**，为了自我保护，表示“紧跟”，招来了县完中的红卫兵，查抄曾当过国民党上尉军医的厂医**祝泽民**的家。抄家时祝泽民逃脱，其妻 48 岁的**孙静珍**（图 10-6）被抓到印刷厂内，当天惨遭毒打而死。厂工人李 x 参与毒打，曾用铁杵捅其阴部。孙死后，印刷厂领导派人用一领苇薄卷住尸体，埋葬于东关乱坟岗。祝泽民的逃跑还株连六个子女：大女儿祝蕴毅，遭批斗，剪秃头发；大儿子祝鸿昌，被红卫兵抓住吊打，幸免于难；幼女被从楼上甩下，侥幸被树枝挡了一下，幸未摔死，遗脑震荡；其他子女逃脱。



图 10-6：孙静珍和她的幼女

在“红八月”的腥风里，许昌市区至少有七八个居民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安怀街居民**王铁锤**、烟厂职工**刘星火**等，都死在红卫兵乱棒之下。在禹县神垕镇，五十岁的钧瓷技师**贾成**，技术精湛，为人耿直，被红卫兵揪斗，打得皮开肉绽，逃跑时遭追杀，跳入钧瓷窑中，被炼成一捧焦灰！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李文波》一文中还写道：

1966 年 8 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随同那场残忍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

面对着这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笔者没有能力将他们一一列出；王友琴教授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独立调查，所掌握的“红八月”受难者名单，也不足北京“历史的黑洞中”受难者的十分之一！全国呢？笔者在 30 多年后的暗访得知，仅中原小城许昌，“红八月”里，至少有七八个人遇难！遗憾的是，因无官方支持，笔者暗访得到的信息，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大多数遇难者饮恨而亡，消失在“**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之中。

从“历史的黑洞中”找出“红八月”受难者名字，并为他们树碑立传，笔者虽没有能力做到，但只要受难者的亲友、目击者和耳闻者，能消除顾

虑，排除干扰，勇敢地说出或写出所见所闻，施刑者能良心再现，勇敢地忏悔、致歉，正义者能像王友琴等学者那样，顽强地进行调查，同时，见闻者和正义者联合起来，齐心协力，追讨杀人凶手和策划者，并向中共当权者施压，敦促他们改邪归正，解密档案，支持调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就会使**“无名无声的死亡群”**里的每一个受难者，大白于天下，冤情得到申张，从而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抚慰！

4、血渍斑斑大驱逐

“红八月”期间，一场“保卫首都”大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北京，约十万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驱赶到农村。当时官方所有“喉舌”，对中共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导，力图把这种**违宪**行动，消泯在无声无息之中。

但中国老百姓在“红八月”半年后，还是从政府的布告里，得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充满血泪的、反人类的大驱逐事件。

1967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时称《三一八布告》。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布告命令被遣送走又**“私自返回北京”**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

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文中可以看出驱赶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即“黑五类”，还包括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摘帽右派”和他们的“家属”等，即“黑六类”及其亲属，而当时大量存在的“小业主”，原属“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在大驱逐中，都被升级为“资本家”加以驱赶。在布告里，“表现不好”同“牛鬼蛇神”一样，是个界线含糊、弹性很大的词语，这种可以随政治标的的变化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使中共掌门人和各级权贵们，都握有生杀大权。

这个布告公开以政府名义，确认了野蛮驱赶这种大规模“奸污”宪法的“合法”性。而“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则再次暴露了他们的欺骗、虚弱和无耻！

“红八月”大驱逐行动，早在 1962 年就开始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阶级成份净化成“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由于有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条，它的第九十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条条规定，因而使他们暂时找不到驱赶的借口，从而使他们暂时没有付诸实施。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最高指示”。周恩来闻风而动，立刻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意见书，经毛泽东批准后立即实施。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不仅增调七十和一八九两个主力师驻京进行威慑，还制定了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驱逐“成份不好”居民的长期计划。但也因有碍于毛泽东《宪法》的有关规定，苦于找不到适当“理由”作借口，迫使大规模驱逐计划再次“搁浅”。

1966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发布了“**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的“最高指示”后，红色恐怖已经形成，给驱赶居民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为了保护党内右派中的朋友和实现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他采用了与毛同样的“借刀”计——利用红卫兵。

据传：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等机构中实力人物的指使下，1966年8月23日，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第二天，“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应声也发出了《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传单。通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这种政出多门的作法，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8月25日，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周借“西纠”的刀，力图在平衡左派红卫兵的同时，来执行他的大规模驱逐居民计划。紧接着，一些类似组织迎风成立，如“东纠”（东城区）、“海纠”（海淀区）。

据悉，“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者**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大员的支持——他们都是当时活跃在台上的党内中摇派权贵。由于周的“亲自关怀”，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许明**和**李梦夫**、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长**梁健**等多名政要，都成了“西纠”的核心参谋；“西纠”的宣言、通令、通告等文件，许多都是经过他们手或起草、或修改、或审定的，而他们的子女，也多是“西纠”的骨干。由于周的“亲自关怀”，石油工业部为“西纠”做了妥善安排：为他们提供了两间办公室，安装了直通电话机，一辆嘎斯69卡车供他们调遣，夜间值班人员都能穿上合适的军大衣，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费用，全部由石油部核消，等等。由于周的“亲自关怀”，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西纠”成员“光荣”地承担起了天安门上下维持秩序的纠察工作。

1966年8月29日，在核心参谋们的合谋下，“西纠”发布了大规模驱逐居民的“第四号通令”。**“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笔者：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给出路就是**“滚出北京”**。在“红八月”里，“西纠”的这个大规模驱逐令统一了其他红卫兵的通告。由于根子粗、后台硬，“西纠”的驱逐令像

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效，各路红卫兵都在警察的帮助下，积极而迅速地用暴力执行之。

在要么被打死、要么“滚出北京”中，那些被中共反复清算过多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战战兢兢做人的“黑五类”弱势人群，以及小业主、资本家和所谓的“牛鬼蛇神”等新增加的弱势群体，都默默而痛苦地选择了“滚出”，忍气吞声吞泪地离开了他们久居的、宪法赋予他们“**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利的北京。

在政府、警察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主持执行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赶行动。驱赶行动包括：抄家、没收财产、注销户口、殴打、处理反抗驱逐而被打死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有的直接被红卫兵押解到农村，等等。在北京火车站，为被驱逐者设立了特别入口，由红卫兵把守。很多被驱逐者在车站遭殴打，有的被打死。被驱逐者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为了减轻运输负担，他们的家具都被没收，每人只准带少量的衣服和炊具。

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便让阶级成份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 8 月下旬至 9 月的 40 天里，北京全市有 8.5 万人在被抄家后，赶出了北京。另一说法是：8 月 13 日至 9 月 15 日，北京 9 个城区和近郊区，共驱赶 7.7 万人。还有一说法：在 1966 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约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 2%。

北京红卫兵的驱逐革命，很快传到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到 10 月 10 日止，上海全市已有 9,260 余居民被驱赶到农村。在广西南宁市，有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被驱赶到农村监督劳动。又有报导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统计，到 10 月 10 日，有 2,650 人被戴上“黑五类”的帽子，他与他们的家庭被驱赶出齐市。又据知情人披露，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上说，到 10 月 3 日为止，全国各地从城市里驱赶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分子 141,700 名，资本家和房产主 11,100 名，其他“牛鬼蛇神”62,300 名，上述人员的家属 182,300 名，驱赶总数为 397,400 名。此外据称，在大驱逐中，“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 起，没收黄金 118.8 万两。

但有学者认为，在“红八月”的大驱逐中，全国至少有 50～60 万城市**弱势人群**被驱赶到农村，他们的家财被没收，估计有一万多人在驱赶中死亡。

据报导：被驱逐的居民中，有很多是随子女在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人。当由红卫兵押送他们回原籍时，不少人被剃成光头、“阴阳头”，

沿路遭受多次凌辱、殴打，其中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例如，1966 年 8 月 29 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就打死了**一个老年女人**。1966 年夏天，有些上海人曾在火车站上，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了**多具尸体**。1966 年 9 月，在广州市十一中召开的学生大会上，三个来广州串连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红卫兵，在指责广州死气沉沉后，向中学生介绍了他们在北京包括驱赶在内的“革命行动”。他们自鸣得意地说：“北京斗争时，是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 10 个、20 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口掉（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在押解中，弱势者究竟死了多少**？

又据报导，被驱赶者到农村后，农村也把他们当成“专政对象”，他们中有的人，一到农村，便遭批斗。例如，北京农业大学职员**何洁夫**、**高吉章**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红八月”里，他们同北农大其他 67 人一起，被逐出了北农大，强行驱赶到广西农村。1967 年 11 月 14 日，何洁夫在“群众专政”中，被村民打死。又如，被驱赶者中，许多人是年老体弱者，在吃、穿、居住等生活条件突然恶化下，他们遭到了贫困、病患和专政的三重交迫，很快便倒毙在农村里。**驱赶到农村的弱势者，究竟又死了多少**？

1966 年年底，根据毛泽东宽猛相济、恩威并举的人治战术思想，中共对红卫兵在“红八月”里乱杀乱打的作法进行了“限制”和“纠偏”，红卫兵打人和驱赶等乱法情况，才有所缓和。

在这种情势下，有些在农村挣扎着活了下来的被驱逐者，看到了重回北京的希望。他们利用中共昭示的“宽”和“恩”，即所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等指示和承诺，到京上访，试图重返北京。但《三一八布告》使他们的希望化成泡影。

不仅如此，有些被驱逐者因上访而获新罪。如北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师**胡秀正**和八中物理教师**张连元**夫妇，全家被驱逐到农村的理由是：张父是“漏划地主”。到农村后，他们对照当年土改政策，认为其父在四清运动中被订为“漏划地主”不实，因而上访；然而，上访使他们获得了“翻四清运动的案”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两项新罪名。胡秀正不服惨遭批斗，终因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在上访中，弱势者因新罪名又死了多少**？

周恩来的“借刀”计没有完全成功。1967 年初，“西纠”等打杀成性的贵族红卫兵组织，被毛左派以“保皇派”罪名加以取缔。做为“西纠”的总后台，周恩来险些被打倒。“西纠”虽倒，但他的大驱逐“功劳”却被中共肯定，《三一八布告》就是证明。

毛泽东曾说过：**“人死应开庆祝会”**。在档案尘封，拒绝调查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知道在大驱逐中死亡的确切人数，无法知道“庆祝会”的规模，因而没有机会表达对“庆祝会”的愤慨和谴责！

二．群体灭绝暴行之一：大兴大屠杀

1、鲜血淋漓东方红

万木惊呆天地暗，
黑烟滚滚冲霄汉。
杀气腾腾心肌颤，
哀声怨，
抢夺人命李恩元！

五入村中驳誓干，
刀光剑影手中看。
虎口难生抛里万，
同心劝，
留得整数梁山汉。（作者注：108 个生命）

这首标题为《渔家傲. 反对杀害无辜》的词，是当年中共北京市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张连和**所写。

据报导：在“红八月”里，在毛泽东“要武精神”和“血统论”的蛊惑下，北京市昌平和大兴两县农村，拿“黑五类”及其家属等弱势群体开刀，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群体灭绝性大屠杀。其中，昌平屠杀人数比大兴县多。据披露：昌平县中越友好人民公社的黄土南店大队，在 1966 年 8 月底，就**打死了 19 人**；离定陵不远的黑山寨大队，地主分子**王占保**全家被揪出批斗，王占保和他的**儿子**都惨死在乱棍之下，九岁的**孙子**也没逃脱，被从野地里抓回来，当众撕成两半。由于昌平县信息控制比较严密，杀人又比较分散，集中报导不多，因而群体杀人事件显现得没有大兴县那么突出，其屠杀名气也没有大兴县那么大。

1986 年 9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名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书。书中披露，从 1966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大兴县 13 个公社 48 个大队，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4**）

有资料显示，位于北京大兴县的西部的东方红公社（现北臧村乡），从

1966 年 8 月 27 日就开始杀人，共**杀 98 人**。其中：新立村**杀 53 人**，马村**杀 34 人**，六合庄**杀 11 人**。

张连和在一篇《**五进马村劝停杀——文革大兴县屠杀侧记**》中写道：

“八三一”（笔者：1966 年 8 月 31 日）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振元**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 10 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 8 月 31 日夜至 9 月 3 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 34 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 108 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张连和目击了马村大队的群体灭绝大屠杀。他写道：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 5 间厢房 3 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着喝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 70 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倒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 30 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内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张连和后来对人说，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都在那次屠杀中

死于非命。

张连和在他的《五进马村劝停杀》文中还写道：

原来，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 8 月 27 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 9 月 3 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那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词中“抢夺人命李恩元”的**李恩元**是什么人？此人是北京市大兴县东方红公社马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人权学者**遇罗文**在北京坐监时，遇上了一个被狱中犯人起了个外号叫“屠户”的犯人，他就是马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遇罗文写道：

据监中犯人们传扬，别的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的马村则不然。他们头一天把“黑五类”老人用棍棒打死，把“黑五类”婴幼儿劈成两半，然后把“黑五类”青少年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双手，拴住拇指吊起来，再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为了不让青年人死得太快，多受些罪，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在这种折磨和毒打下，全部死掉。对于“黑五类”少年，他们也不放过：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他们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他们还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被迫停止了屠杀。由于“屠户”是执行者，不久便被无罪释放！

遇罗文还曾到北臧公社作过调查。他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王先生是北臧村人，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副村长，他的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他们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

他们说，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精心策划。比如，为了顺利杀害一家人，凶手们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叫被害人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被害人没有还过神来就被勒死，然后接着叫他家的其他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电线，人一出来就触电身亡，连气都没有出。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可以毫无顾虑地为所欲为。他们说，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孙儿说：“奶奶，迷眼。”老人痛苦而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最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去要人，单位不放，算躲过了这场劫难。可在村里的表姐和她的三个儿女都没有躲过去，全部遇难，其中一个上中学女儿，被活活打死在放学的路上。

王先生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1966 年 8 月 27 日那天，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大人和小孩押来陪斗，让他们跪在玻璃碴上，并用棍棒朝他们的头上、脸上乱打，当场把陪斗的大人和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吓得学生们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害校长的命。

他们说，刽子手行凶的动机，不少是出于个人恩怨，有的仅仅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私利。有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便急于杀人赖帐。例如，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份，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议。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贫农，欠了陈家的钱，为了赖账，拿起杀猪的通条，不由分说，将这一家人扎死。更有甚者，有好吃懒做、娶不到媳妇的癞皮光棍，也趁杀“黑五类”之机，夺其妻女当老婆，美其名曰“给你换换成份”。

他们说，并不是所有贫下中农都是刽子手。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车把式，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想救她一命，便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车子的颠簸把女孩儿震醒，打手发现后，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式怒不可遏，扔下鞭子不干了。

“屠户”怎么被迫停止了屠杀？张连和写道：

9 月 1 日凌晨 1 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于是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硬是在他们举着棍棒的中间“冲”到村东口第一道防线处。他们仍不让进村，后在王书记“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的厉声硬语中，才经过请示放我们进了村。……在我们站在刑场旁边儿观看他们施

威的时候，王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人谈判，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后来，王书记又把我和刘克一叫进屋内，进一步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随便杀人犯法”等进行说服教育。**李恩元**他们说，我们已经杀红了眼，骑虎难下，停杀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人一把杀猪刀子，磨得贼亮，说到激烈处，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时候，刘克一一个箭步窜到王书记身边护住，如果发生火并，实在不知道谁死谁活。我虽然也站起来了，但心里也在剧烈地扑腾，生怕刚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黄泉。

张连和认为：“一场极小范围的无辜之人被杀事件被制止了。这在大兴县来说，虽然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但毕竟是**挽救了一百多口人的性命**，功不可没。”于是，他赋诗一首，“权当佐证”。

七绝　**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
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
阴转多晴把党夸。

尽管笔者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无法苟同，但当“**阴转多晴把党夸**”的时候，人们应感谢大兴县县委书记**王振元**和《五进马村劝停杀》的作者**张连和**等人，是他们**挽救了 108 人的性命**。除此而外，我们还能“**夸**”谁呢？

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红卫兵眼里，不过一个小小“股级”当权派，竟敢如此大胆地杀人！在“县太爷”县委书记面前，竟敢“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明目张胆地威胁他的顶头上司！他的后台是谁？根子多硬？

当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他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说：**“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吴德把大屠杀的责任推到村支部书记和群众身上，并把支书抓了起来。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但为什么抓起来后又很快放掉？例如这个“屠户”李恩元，关了不久便被无罪释放。这一关一放，使吴德的“调查”露出了破绽：**隐情很深**。后台呢？根子呢？吴德有意回避。

对此，张连和写道：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行动快的“公社”和“大队”都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监管起来，随时拉出来批斗，进而杀害。

显然，这挑动仇恨、制造对立的进行“村村见血”式土改运动的恶果之一。是哪“股腥风刮到大兴县”？张连和写道：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贴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大兴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语录”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最革命的行动，“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打、砸、抢、杀，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思想和行动中遭受毒打或杀戮。

尽管张连和没有指名道姓说出“屠户”李恩元的后台、根子，尽管还有隐情没敢说出，但却明明白白地道出了那个大屠杀的恐怖氛围。仅此一点，就比**吴德**诚实得多。因此，当我们“**夸**”县委王书记和张连和等人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夸**”、去歌颂那些中共权贵们？恰恰相反，我们却有责任去谴责中共、中共大员们和他的掌门人毛泽东：正是他们为了私利，为了权力，不惜撕毁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去制造混乱，破坏安定；正是他们，为了私利和权力，发出了“**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和“**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的乱打乱杀的动员令；正是他们，为了私利和权力，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蛊惑人心，去制造和支撑这种**反人类的兽性大屠杀**！

2、血肉横飞大辛庄

在档案尘封、遏制调查的情况下，人们很难知道大兴县大辛庄公社大屠杀的详情。人权学者**遇罗文**通过艰苦的调查，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二十一世纪初春的二、三月间，遇罗文曾两度到大辛庄做调查，**他**先后采访了当年大队干部**韩玉春、李福荣、王世荣**和**刘尚彬**。

韩玉春在改革开放前几年，曾当过离大辛庄四公里的西白疃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福荣是四清时被罢、1973 年又恢复的红升大队党支部书记，1980 年他辞去书记职务；王世荣是西梁各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村子在公社南面 8 里远，是拒绝屠杀连夜到北京上访的书记；刘尚彬是王世荣上访时留队的村干部。

遇罗文很快了解到，大辛庄公社大屠杀的组织者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在内的“九人小组”。8 月 31 日，高、胡两人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一个新“精神”，要各大队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会议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为了了解屠杀组织者的后台和动机，遇罗文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但其弟拒绝采访，理由是“上级”禁止他向别人提供屠杀史实，使他的采访碰了个钉子。

据韩玉春说，1966 年 8 月 31 日夜里，大辛庄公社一夜就**杀了 106 口人**！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八三一事件”。那天夜里，靠近公社的四个生产大队都采取行动，这四个大队是黎明、中心、昕生和红升。屠杀理由同东方红公社雷同，即“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要先下手。

韩玉春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随部人起义，1955 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但“起义证书”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八三一事件”第二天，韩玉春得知噩耗:姑姑一家五口全部被杀。

提起大屠杀，**韩玉春夫人**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有用铡刀铡，有用绳子勒，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抓住另一条腿，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大队杀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为了杀得快、杀得干净，他们干脆把要杀的活人用绳子套在脖子上往苇塘拖，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四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70 岁的李福荣很健谈，思路十分清楚。他对遇罗文说，在 8 月 31 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 106 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在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多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多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李福荣说，9 月 1 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刘尚彬说他是军代表）、**傅华忠**来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高、胡二人不向其他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 9 月 1 日，又杀了二十多人。

屠杀过程类似东方红。李福荣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说：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以防暴动，然后杀老人和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衣服再杀；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塘里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后来人们管那个低洼苇塘叫“**万人坑**”。（图 10-7）





图 10-7：“万人坑”早已不见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 19 个大队，除六个大队外，其他多数大队采取观望，“八三一事件”当晚没有行动，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后，没有发生屠杀。

农村党员、干部并非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也有反对屠杀者，西白疃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树清**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西白疃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两人是堂兄妹。可能他俩没喝过“狼奶”，平时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仇恨哲学”和“村村见血”等统治权术那一套。据韩玉春说，1966 年 8 月

30 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会上高、胡传达了从天堂河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做出了要各大队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的决定。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会上，生产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分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在张万义坚决反对下，西白疃没有执行公社的决定。

另一个反对屠杀者是西梁各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荣**。

由于王世荣年迈，患胸血栓，口齿不清，遇罗文采访他时，当说了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后，便因激动而无法语言。当年大队干部**刘尚彬**接受了遇的采访。

据刘尚彬说，王世荣从公社开完会回到村里，便同大队干部们研究。研究后他们一致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他们没有处决人的权力。于是，他们决定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好个七天哇！**）但他们在北京市委接待站反映情况后，却受到了表扬。9 月 2 日，当副县长傅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向大辛庄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传达了上级禁止屠杀的明确指示后，他们才肯定自己做对了。从公社回来，他们便召集“黑五类”开会，传达“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十六条》精神，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分子，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当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杀时，都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3、东方红、大辛庄的无碑纪念

从北京农村大屠杀的规模、时间、方法和口实上看，无论是大兴县的屠杀，或者是昌平县的屠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如果说大辛庄公社的屠杀与东方红公社的屠杀有什么不同的话，仅仅是遇罗文在大辛庄发现了大屠杀高一级的组织者——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为首的“九人小组”。

所谓“高一级的组织者”，在红卫兵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科级芝麻官。一个公社、乡镇一级的头头，竟敢如此大胆地组织大屠杀，如果没有更高的根子、后台，他们敢吗？

当年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为了力挺“主旋律”，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大员**吴德，**说谎时脸不红，心不跳，说

得轻松，道得坦然，其**撒谎功夫十分了得。**然而，大辛庄由中共公社党委头头们动员、组织和威迫屠杀的事实，却给了**吴德**大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给**吴**大人一记耳光的还不止于此。有档案资料披露：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 1966 年 8 月 26 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这个“**八二六讲话**”与“**杀人无罪**”讲话精神一致。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因此，有调查者认为，大兴县屠杀组织实施者高、胡和李恩元等人，很可能接受来自于县公安局的指令。这一切在吴大人的回忆里，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一个县公安局敢于组织如此大规模屠杀，没有更高当局的指令他们敢吗？是谁指令县公安局呢？这仍是个谜。

据李福荣说，在受害人亲友的努力追究下，几年后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 8 年徒刑，但随后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 8 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 8 年徒刑；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

当局处理高、胡等人是不得已的，甚至是违心的，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执行者；如果不是民愤太大，他们不会处理他们，甚至还会表彰他们。为了维护党和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他们必须把真相隐蔽得很深很深！

究竟是谁指令、指挥或默许了这场北京农村大屠杀？更高的根子、后台在哪里？这里有很深的隐情待揭发。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大人知道这个隐情，但他不说，却瞒天欺下；县公安局清楚这个隐情，但拒绝调查；直接组织、指挥大屠杀的高福兴、胡德福和李恩元，也可能知道部分隐情，但他们不敢说；调查者也没找到更高更大的根子、后台，仅仅判断农村大屠杀与北京城区里红卫兵的大屠杀有关，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杀人无罪”和“八二六讲话”的两次讲话有关。由于中共当权者掩盖真相，遏抑调查，终使遇罗文的努力无果而终。

尽管调查受阻，笔者仍然认为：指令或暗示县公安局组织屠杀者，应来自于高层或最高层。指令或暗示直接来自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或来自于左派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甚至直接受命于林彪的可能性都

不大。如果来自于左派林、江等人，吴德对此会大书特书，因为，揭批他们的罪行，符合“毛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中共党的权威结论，同“主旋律”完全合拍。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反人类的野蛮抄杀大加赞扬，说“**是大好事**”，因此，笔者大胆推测：北京农村大屠杀的指令或暗示，很可能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有关，特别是与当时处于一线支持、组织红卫兵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的**周恩来及其支持者有关**，因为，在屠杀弱势群体上，以周为代表的右派比以毛江为代表的左派更邪乎，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又受到毛江左派的迫害。笔者猜想是否正确，让历史去验证吧！

如今，埋葬受难者的“万人坑”和填满受难者遗体的井，都被填平了，上面绿意昂然的庄稼和窗明几净的楼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有力“见证”。那些大屠杀所遗留下的斑斑血渍，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似乎已经被“**导向**”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冤魂屈骨，在“主旋律”的催眠曲中，好像也将被“**遗忘**”分解得无影无踪！

这里不应该竖一座纪念碑吗？在“主旋律”的督导中，谁能回答？

三．第二波自杀风潮

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发出后，毛式批斗法在进一步发展中升级为**毛式揪殴法**，很快形成了从 1966 年 8 月到 1967 年中期的第二波自杀风潮。

在“红八月”里，由于无法忍受毛式揪殴法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自我了断成了他们抗议迫害、结束苦难的首项选择。在这里，笔者从掌握的一百多名自杀者名单中挑出几人，以儆省未来。

老　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的作者。他的作品语言生动、幽默、诙谐，风格独特，受到国内外读者喜爱。北京市政府曾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被当时的文艺界一把手、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推誉为中国五大语言大师之一。那五大语言大师是：**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在文革中，前三位挣扎着活到了文革结束，老舍和赵树理却没有那么幸运。1966 年 8 月 24 日晚，老舍因不堪迫害，怀揣《毛主席诗词》，投北京太平湖自杀。（图 10-8）



图：10-8 老舍

老舍投湖自杀前，曾亲口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8 月 23 日，他以**“我没有问题”**的姿态主动参加了北京市文联组织的批斗会。会上女作家**草明，**为了保护自己，突然向他发难，揭发了他把《骆驼祥子》版权卖给美国“不要人民币要美元”的“罪行”。于是，他遭到了女八中红卫兵整整一天的批斗、折磨和毒打。当天深夜，打伤后的老舍被送回家。在家里，他告诉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第二天，他带着“三个理解”，揣着《毛主席诗词》，在太平湖边期待了整整一天，傍晚投水自尽。

一个作家没有留下只字遗嘱，也是少见的。在太平湖一整天，他在想什么？他在读《毛主席诗词》吗？他会读，因为毛泽东“理解”他，知道他在“解放”后所写的东西，都是讴歌党和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但不可能整天在读。也许他在过滤他的一生。

在“旧社会”，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像一只孤傲的苍鹰在天空自由飞翔，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一批世人称道的作品，赢得了荣誉和尊严。从美国回到“新社会”后，他拥护和欢呼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因而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和很高的荣誉。信任、荣誉，使他与自由、民主和人权拉开了距离。他奋笔疾书，写出了《龙须沟》等许多艺术平平但配合政治、讴歌新时代的遵命文字。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命运已同共产党紧紧连结在一起。“解放”初期，在斗争一个“白吃了他（一个卖油饼的老人）的油饼”的“恶霸”时，他义愤填膺，告诫**“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高喊**“该打！该打！”**而不论“恶霸”的罪名是谁人推定、谁人判决。在反胡风中，他对同他共事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大加鞭挞，痛斥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云云。在反右中，他毫不留情地判定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揭露农村生活真实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在反右运动的“巨大胜利”中，他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朋友纷纷中箭落马，严峻的形势可能促使他有所反思。1957 年，他推出了艺术造诣较高的三幕话剧《**茶馆**》，好像要与“遵命文学”拉开一定距离。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他写了不少应景文字。如他在《陈各庄上养猪多》中，就写下这样句子：**“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茶馆》相比，前者是艺术，后者是垃圾，可见他的内心世界充满着矛盾：在遵命和相对自由之间困惑、搏斗和挣扎。到了六十年代，他在思想和创作上已与党内右派、中间派合拍。也许他还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当遭到毛左派敌视时，他还陶醉在**“我没有问题”**上！

他这十六七年的心迹和境遇，是一代中国许多作家、学者的缩影：他们在塑造别人愚昧、冥顽、奴隶意识和奴性灵魂的同时，也被中共伦理共识塑造成盲从、违心、昧着良心和相互攻讦的党棍，如**草明**辈那样；他们在为专制独裁修桥铺路的同时，也使自己失掉了人格、良心和恻隐之心，最终也把自己的精神甚至肉体，都埋葬在这条通向荒诞而野蛮的路上。

1966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说：**“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老舍被列入敌对势力。显然，他说的“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毛泽东，不但不理解他，还要革他的命；他说的“总理最了解我的”周恩来，正处于“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百忙中，可能没有想到或无暇保护他。他对妻子说“三个理解”的那句话，是自我安慰？还是有所期待？抑或是自嘲？人们可以去想象。

他站在太平湖边，有所期待地读着《毛主席诗词》，回顾着走过的一生，内心激烈地搏斗着。整整一天没有人理睬他。他被抛弃了，他悔恨地绝望了，傍黑，他纵身跳了下去。

也许有人指责笔者对受难者过于苛刻，缺乏同情心。笔者认为：历史不仅在于同情，更在于真实，在于“殷鉴不远”——吸取教训！

程贤策，男，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1966 年“横扫”中，被当作“黑帮分子”遭到无数次批斗、侮辱和毒打，撑持了三个月后，于 1966 年 9 月 2 日服毒自杀。

据多位北大老人回忆，程贤策是个欢快、明朗、有理想、体格高大、风度文雅的基层干部。在 1948 年的北大，他是许多学生的领路人：向他们介绍延安，教他们唱共产党的歌曲。1951 年，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师生去江西搞土改，组成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他是这个团的副团长。有一个村子划出了八个地主，按当时明文“政策”规定，有劣迹的才杀，但一个副县长一声令下，把八个地主全部就地处决了，并“陈尸三日”。对此，许多学生都不理解。他教育同学们，**要从革命需要出发去理解这种杀戮的“必然”性，而无庸道德价值判断**。由于这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和立场，使他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找到“必然”性的理论根据而安然无恙，从而逐步升迁，1959 年任北大中文系总支部书记。

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后，几乎一夜之间，他从坚定的革命干部变成了反革命黑帮。这是否也是必然呢？对于他来说，此刻，他已怀疑这种“必然”了。戴高帽子、挂黑帮牌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搡、揪头发、剃阴阳头、罚跪、

辱骂、挨皮带毒打等“触及灵魂”和“没收反动思想”的毛式揪殴法，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尽管他已怀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性，但对毛式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操作规律却烂熟于心：**开始**，制造舆论作报告，**继而**，人人检查，鼓动人人大胆怀疑和揭发，**接着**，分指标，定对象，训练积极分子，进行批斗，**后期**，落实“政策”，舒缓矛盾，为下次运动积蓄能量。他对自己的清白深信不疑，因此，只要忍耐一、两个月后，就会雨过天晴。然而，当 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鼓动造反的回信公布后，他**困惑**了；在“红八月”里，毛式揪殴法越来越血腥，屠杀规模越来越大，北京数万人被打数千人被杀的腥风血雨使他**恐慌**了；他发现这次运动与“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很不相同，特别是 8 月 31 日，当他看见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兴致勃勃地第二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的时候，当他听见林彪在天安门上大声赞扬红卫兵大屠杀“**好得狠**”的时候，联想到井冈山肃反、延安抢救，他**战栗**了；面对那无休无止的、残酷的毛式揪殴，已超越了忍耐限度，他终于**绝望**了。9 月 2 日，他来到距北京大学数公里外的香山，有人看见，他像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一手拿着一瓶烈酒，一手拿着一瓶敌敌畏，边走边喝，向密林深处走去”，他倒下了，在痛苦地蹉曲中结束了生命。

刘澍华，一个年方 26 岁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物理教师。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头头**卜大华**组织的“斗争会”上，刘澍华被以“流氓”罪名惨遭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毒打和侮辱。他的“流氓”罪是：婚前曾追求过另一位姑娘，对方不情愿，曾向领导抱怨他纠缠过她。

卜大华何许人也？他是军干子弟，是中国红卫兵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尔后的《二论》、《三论》大字报的主要作者。在中央文革政要们、他们父辈们的参谋和捉手下，《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二论》、《三论》便先后出笼。毛泽东对自己幕后导演的完全符合自己意图的大字报，给了极高评价。他在 8 月 1 日的回信中，对卜大华等中学生“**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的支持，赋于尚无判断能力的中学生们以生杀予夺的大权。中学生们能分清敌人和朋友、这个主义和那个主义、错误和严重错误以及严重错误和敌人的界限吗？从法理上说，敌我、功罪的概念定义，应十分清晰，但毛泽东不喜欢。他相信个人判断：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黑(帮)、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到叛徒、内奸、走资派等阶级敌人，都是毛泽东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或个人好恶来确定的。这种“需要”、“好恶”的随意性和模糊性，使毛泽东的所谓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说教，**能左右逢源，横竖是理**！这是独裁者的专权。在这种专权“理论”制导下，中学生们便可以根据好恶来界定敌我。于是，刘澍华“流氓”便成了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罪行，对他“当然”不适用“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条

条，而“理应”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专政办法去解决。

在卜大华组织的斗争会上，被中学生们推定为“黑帮”的校长万邦儒，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团委书记顾涵芬，被打成重伤，打瞎了一只眼，倒在自行车棚子里陷入昏迷，被丈夫刘松盛背回了家。据目击者说，那天挨打最厉害是刘澍华。可怜这位刚刚开始教学生涯的刘澍华，在山西老家，上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下有一个怀孕三个月的新婚妻子，他们都倚仗他生活哩。遭到毒打和侮辱后，他想不开，当晚拖着伤痛爬上烟囱，面对山西，呼着老爹，唤着妻子的名字，喊道：“我对不住你们了!”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当人们在煤灰堆中扒出他的尸体时，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在他的腹腔里。

傅雷朱梅馥夫妇，一对文革殉难者。

1966 年 9 月 3 日凌晨，翻译巨匠**傅雷**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左右，他的夫人**朱梅馥**吊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图 10-9）

傅雷，1908 年 4 月 7 日生于上海南汇,1924 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1927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1931 年秋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 年起闭门译书，翻译了法国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翻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鉴赏力。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图 10-9：傅雷朱梅馥夫妇和儿子傅聪

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命运几乎一样：他们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建设新中国”的感召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也获得了一些奖历，被政府指定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或挂名什么长等荣誉闲职。但随着“**思想改造**”、“**批胡风**”、“**一化三改造**”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他们的自由、民主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专制独裁主义冲突起来，因而受到了冲击和打压，他们的“统战”价值也随之衰减以致告罄。挨到 1957 年，他们中许多人跌入“**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阳谋**”圈套中，成了“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具有民主意识的傅雷焉能例外？1958 年，他在“反右补课”中，被以“亲美”、“反苏”的罪名，后补打成右派。

当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他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朋友们说：“我快要走了！”但生命只有一次，强烈的本能使他对生存抱有一线希望。

在自杀前的“红八月”里，他在给儿媳的一封信中，曾表露愿意向专制独裁低头认“错”的心扉：“**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他想错了。**毛泽东不准投降**！毛要把他心目中的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他的嫡系造反派的话来说，叫“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生存之路被堵死了，自我了断成了他和他的同路人们的唯一选择！

从 8 月底开始，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戴高帽、罚跪、辱骂和殴打，他，傅雷，一代名扬中外文化巨人的尊严和权利，**不，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一个普通人做人的最基本权利，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9 月 3 日凌晨，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剧毒药水仰首喝下，离开了人间，享年 58 岁。同傅雷共同生活了 34 年的妻子朱梅馥，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在辗转绝曲中死去。她痛苦地抽泣者，从容地扶正丈夫的遗体，擦掉丈夫遗体上的血污，摆放好他们晚上才写好的遗书（**5**），然后从被单上撕下两段布条，搓成绳子，在丈夫走后约两小时，吊死在铁窗横框上，终年 53 岁！（笔者读着他俩的遗书，不禁老泪横流！）

傅雷夫妇的死，像“瘟疫”一样向周围扩散！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上海交响乐团钢琴家 29 岁的**顾圣婴**及其**母亲**、**胞弟**三人，面对毫无人性的迫害，分别于 9 月 6 日、9 月 9 日和 1967 年初自杀，紧随傅雷夫妇撒手而去，离开了这个野蛮、残忍、令人诅咒的世界！

据笔者了解，仅 1966 年的夏天，夫妇同时、或全家自杀的还有：

上海市医药公司职员**王德明**，同父母三人一起自杀；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同妻子、儿子、女儿全家四人一起自杀；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一级教授**黄国璋**和夫人同时自杀；

北京新华社摄影记者**陈正清**同夫人**何慧**，遭批斗后同时自杀，留下四个未成年孩子；

北京协和医院病理学家**胡正祥**教授同夫人双双自杀；

上海华东师大外语教师**吴迪生**同夫人双双上吊；

北京四中数学教师**苏庭伍**和妻子地理教师**汪含英**同时自杀；

北京库司胡同在丹麦使馆工作的无名氏居民，夫妻双双吊死；

天津市前资本家**李 xx** 同妻子一起自杀；

北京第 65 中学生边涌珍的父亲和母亲，双双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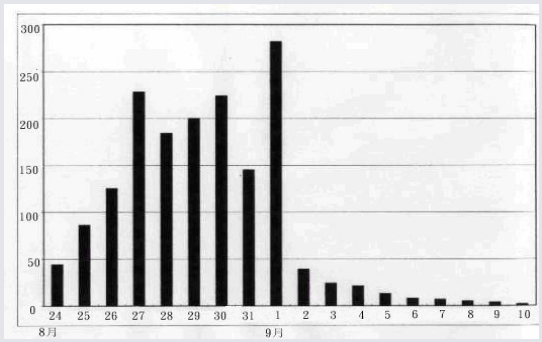
天津文化用品公司职工**张宗颖**和妻子**吕乃朴**，夫妻双双自杀；儿子张佑慈因扬言要“给父母报仇”的“反革命罪行”，被判刑 15 年。

据专家们估计，1966 年 8 月 1 日到 1967 年中期的第二波自杀风潮中，全国约有 10～15 万人丧生。笔者搜集到的 143 个自杀者名单（6），仅占这一时期自杀总量的千分之一左右！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第 10 章 附注：

附 1、 “红八月”部分血案统计表（据说是官方统计）



1966 年“红八月”北京大屠杀情况表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从 1966 年的 8 月 26 日到 9 月 1 日，每天有数百人被打死：8 月 26 日，126 人；8 月 27 日，228 人；8 月 28 日，184 人；8 月 29 日，200 人；8 月 30 日，224 人；8 月 31 日，145 人；9 月 1 日，228 人；

……

附 2、1966 年 8 月～12 月部分被枪杀、打死、监毙和重伤不治身亡者名录表——资料来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少数为笔者补充。

编号	姓名	职业	性别	死亡年龄	死亡月份	死亡地点	死亡方式				何种运动、说明
							枪杀	打死	监毙	迫死	
1	白素莲	小师	女		8	西安		*			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
2	卞仲耘	中师	女		8	北京		*			北京师大附属女中副校长
3	陈葆昆	中师	男		8	北京		*			北京 101 中美术教师
4	陈彦荣	工人	男	37	8	北京		*			科学院气体厂其母富农成份
5	陈玉润	居民	女	60	8	北京		*			北京玻陶水泥设计院技术
6	李秀蓉	居民	女	82	8	北京		*			员黄瑞五，因有房产，同
7	黄瑞五	工程	男	30	8	北京		*			母陈、外婆李、姐炜班和
8	黄炜班	医生	女	35	8	北京		*			老佣人，一家五口，同时
9	老佣人	居民	男		8	北京		*			被红卫兵打死。
10	陈沅芷	中师	女	42	9	北京		*			北京 25 中
11	程　珉	干部			8	北京				*	北京通县一中领导干部
12	储安平	主编	男	57	夏	北京		?			原《光明日报》主编、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3	党晴梵	民主	男	81	9	西安		*			民主党派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14	董思林	中师	男		夏	上海		*			上海 58 中校长
15	樊希曼	干部	女		8	北京		*			被儿子的同学打死
16	方俊杰	农民	男	30	8	北京		*			大兴县同时遇害 325 人
17	向　达	高师	男		10	北京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8	郭文玉	小师	女		8	北京		*			北京东城区宽街小学校长
19	孟昭江				8	北京		*			郭文玉的丈夫
20	韩　康	中师	男		8	南京		*			南京 13 中数学教员
21	夏忠谋	中师	男		8	南京		*			南京 13 中体育教员
22	朱庆颇	中师	男		8	南京		*			南京 2 中历史教员
23	王　金	工人	男		9	南京		*			家庭出身不好
24	韩志颖	民盟	男		7	西安		*			西安市第五中学校长
25	韩宗信	农民	男		8	北京		*			大兴县大辛庄公社农民，
26	何汉成	居民	男		8	北京		*			死于北京六中监狱
27	贺定华	小师	女	66	8	北京		*			退休小学教员
28	华　锦	干部	女	52	8	北京		*			北京八中支部书记
29	黄厚朴	医生	女		8	北京		*			协和医院退休理疗科主任
30	姜培良	干部	男		8	北京		*			北师大附二党支部书记
31	靳　桓	中师	男	40	8	北京		*			北京 65 中化学教员
32	靳正宇	中师	男		8	北京		*			北京师大附二中语文教员
33	孔海琨	居民	男		8	北京		*			家住北大承泽园
34	寇惠玲	居民	女		8	北京		*			东打磨厂 2 号居民
35	李长恭	右派	男		7	湖南		*			湖南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
36	李丛贞	看门	男		8	北京		*			朱广相医生家的门房
37	李翠贞	高师	女		6	上海		*			上海音乐学院二级教授
38	李　达	学者	男		8	武汉				*	武汉大学校长
39	李济生	干部	男		9	山西				*	太原市教育局长
40	李敬仪	干部	女	53	8	南京		*			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

41	吴天石	干部	男	56	8	南京		*			江苏省教育厅长、李敬仪
42	李锦坡	工友	男		8	北京		*			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工友
43	李文波	居民	男	52	8	北京		*			北京广渠门内大街 121 号
44	刘文秀	居民	女	50	9	北京	*				李文波之妻
45	栗剑萍	居民	女	40	夏	北京		*			北京武王侯胡同 16 号居
46	梁光琪	干部	女		8	北京		*			北京十五女中支部书记
47	林修权	中师	男		8	上海		*			上海市同济中学语文教师
48	刘盼遂	高师	男	60	8	北京		*			北京师大中文系古文教授
49	吕贞先	小师			8	北京		*			北京宽街小学教导主任
50	南保山	居民	男		8	北京		*			北京太平桥大街 179 号居
51	南鹤龙	居民	男	26	8	北京		*			破“四旧”时遇难
52	庞乘风	干部	男		9	广州		*			广州 17 中总务主任
53	庞玉来	工人	男		7	武汉	*				因打贴大字报的人，被处
54	齐惠芹	中师	女	50	8	北京		*			北京四女中教师有房产
55	祈式潜	学者	男		8	北京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员
56	钱颂祺	会计	男	50	8	上海		*			上海市第 56 中学会计
57	沙　坪	校长	女		8	北		*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
58	邵庆玉	校长			10	北京		*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
59	史青云	中师	男		8	西安		*			陕西师大第一附中校长
60	孙　迪	中师	男	36	夏	北京		*			北京十女中美术教师
61	孙启坤	会计	女		?	北京		*			北京永定门外台型机床厂
62	孙玉坤	居民	女	58	?	北京		*			退休会计，姐妹双双被杀
63	孙琢良	居民	男		8	北京		*			北京东厂胡同居民，夫妻
64	孙　妻	居民	女		8	北京		*			双双被杀
65	孙静珍	居民	女	48	8	许昌		*			河南省许昌市印刷厂家属
66	谭润方	农民	男	30	8	北京		*			北京大兴县大辛庄农民
67	唐　政	中师	女	47	夏	浏阳		*			湖南省浏阳一中教师
68	田　悦	学生	男			北京		*			北京 123 中学学生
69	王伯恭	中师			夏	西安		*			西安 37 中退休语文教员
70	王　冷	中师	女	39	夏	西安		*			西安 37 中语文教员
71	王光华	学生	男	19	9	北京		*			北京第六中学学生
72	王　金	工人	男		9	南京		*			南京市的一个普通工人
73	王升倌	校长	男		?	北京		*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
74	王小晶	学生	男	11	8	北京		*			北京市少年宫
75	王占保	农民			?	北京		*			北京昌平县黑山寨大队，
76	王　儿				?	北京		*			一家三口被打死。
77	王　孙				?	北京		*			
78	王铁锤	居民	男		夏	许昌		*			河南省许昌市安怀街居民
79	吴兴华	高师	男	45	8	北京		*			北京大学英语教授
80	武素鹏	学生	男		夏	北京		*			北京十三中初中三年级
81	夏忠谋	中师	男		8	南京		*			南京 13 中体育教员
82	萧士楷	居民	男		夏	涿县				*	北京广安门内大街退休教
83	萧　妻		女		夏	涿县				*	师，“遣返”到河北省涿县后，两位老人贫病交迫而死
84	徐霈田	校工	男	76	10	北京		*			北京第六中学退休校工
85	杨春广	员工	男		?	北京		*			北京水暖一厂工作人员，
86	杨　妻		女		?	北京		*			夫妻双双被打死

87	杨寒清	中师			8	上海		*			上海复旦大学附中语文老
88	杨九皋	中师	男		8	上海		*			上海七宝中学英语教师
89	姚启均	高师	男		9	上海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90	姚学之	中师	女		7	武昌		*			武昌实验中学政治老师
91	叶祖东	小师	女		11	昆明				*	昆明师专附小语文老师
92	于秀云	中师			11	石家				*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教师
93	喻瑞芬	中师	女		8	北京		*			北京师专附中生物教师
94	张冰洁	书记	女		夏	北京		*			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
95	张炳生	居民	男		11	上海		*			上海漕溪北路居民，父子双双被打死
96	张 子	居民	男		11	上海		*			
97	张辅仁	中师			8	北京		*			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教员
98	张福臻	职员			8	北京		*			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总务处
99	张继旭	干部	男		8	石家				*	石家庄六中学教导副主任
100	周志刚	中师	男		8	石家				*	石家庄第六中学教师
101	张秀敏	干部	女		8	石家				*	石家庄第六中学教导主任
102	赵丹若	高师			8	上海				*	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
103	周文贞	中师	女	55	8	武汉		*			湖北武汉长江航运管理局
104	周福立	职工	男		8	北京		*			北京南郊南口农场二分场
105	周志刚	中师	男		8	石家				*	石家庄第六中学教师
106	朱庆颐	中师	男		夏	南京		*			南京市二中历史老师
107	左奶奶	居民	女		8	北京		*			两人都是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马给左的丈夫报
108	马大娘	居民	女		8	北京		*			
109	朱代杰	高师	男		6	北京				*	北京铁院教授，死后妻子
110	无名氏	农民	322 人		8	大兴		*			北京大兴无名死难者
111	无名氏		女	19	?	北京		*			北师大女附中附近饭馆服
112	无名氏		女		8	北京		*			北大附中打死的老年妇女
113	无名氏	居民			8	上海		*			郊区梅龙公社牛行大队居
114	无名氏	学生			9	上海		*			外地来上海串联的学生
115	无名氏	校工			8	北京		*			北京第 25 中学校工
116	无名氏	中师	女	40	8	北京		*			北京第四女中语文老师
117	无名氏		女		夏	北京		*			居民，被人大附中红卫兵
118	无名氏		男		?	上海		*			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居民
119	无名氏	学生	女	15	8	北京		*			27 中初二学生“家庭出身
120	无名氏		女		8	北京		*			北京居民七个孩子的母亲
121	无名氏		女		8	长沙		*			北京居民驱赶出北京
122	无名氏	高师	男		夏	北京		*			北京铁道学院俄语教授
123	无名氏				8	南宫		*			河北南宫县南宫中学教导
124	无名氏	校工	男		夏	北京				*	北京第三中学的看门校工
125	无名氏	农民	19 人		8	昌平		*			北京昌平县黄土南店
126	无名氏	居民	2 人		夏	北京		*			四中红卫兵打死的校外人
127	无名氏	居民	女		8	北京		*			居民，右派葛佩琦的二嫂
128	无名氏		男	50	8	北京		*			北京市粮食局右派分子
129	无名氏	职工	男	45	8	北京		*			北京包头章胡同 1 号居民
130	无名氏				9	北京		*			打死在新街口银行的老人
131	无名氏	居民			夏	北京		*			北京库司胡同 2 号居民
132	郝 xx	居民	男		夏	北京		*			北京库司胡同 2 号居民
133	向 达	高师	男		10	北京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附 3、 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1966 年 8 月 5 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 3 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 5 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 8 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 年 8 月 18 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宋彬彬从此改名为宋要武。

1966 年 8 月 18 日之后，北京市又有 1772 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 48 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

2014 年 1 月 12 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 年 1 月 27 日

附 4、 大兴县大屠杀部分统计表

公社名称	大队名称	屠杀时间	屠杀人数
大兴县	全县合计	1966.8.24～9.1	325

大辛庄公社	**公社合计**	1966.8.31～9.1	**130 多**（？）
	黎明大队	1966.8.31 （**杀 106 人**）	60 多（？）
	中心大队		20 多（？）
	昕生大队		20 多（？）
	红升大队		2
	杨各庄大队	1966.9.1	20 多（？）
	东黄垡大队		
	东梁各庄大队		1
东方红公社 （北臧乡）	**公社合计**	1966.8.24～9.1	**98**
	新立村大队	1966.8.24～9.1	53
	马村大队		34
	六合庄大队		11
其他公社	**其他公社合计**		**97 以下**（？）

附 5、 傅雷的遗书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笔者：傅雷长子，逃亡英国的青年钢琴家）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 55.29 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 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剩余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见，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由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 370 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妮给敏儿与XXX，但恐怕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便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附6、 1966年8月～1967年中期部分自杀身亡者名录

资料来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少数为笔者补充。令人遗憾的是，除农民周鹤祥外，其他均为城市知识界等人士，农村记录甚少。

编号	姓　名	职业	性别	年龄	死亡月份	死亡地点	说　　明
1	白京武	中师	女		8	北京	北京47中美术老师
2	曹天翔	中师	男		8	北京	北京女二中体育教员
3	陈笑雨	干部	男	49	8	北京	人民日报社工作
4	陈应隆	高师	男	30	8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教师
5	陈正清	记者	男	44	8	北京	遭批斗后同妻子何慧一块自杀，留下四个
6	何 慧	员工	女	40	8	北京	未成年孩子
7	成卓如	中师	女		8	上海	上音学院附中副校长
8	杨嘉仁	高师	男		8	上海	上音教授，两人为夫妻
9	丁晓云	员工	男		8	上海	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馆员
10	董尧成	中师	女		8	北京	北京二女中语文教员
11	董　母	居民	女		8	北京	与女儿尧成一同自杀
12	老　舍	作家	男	67	8	北京	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13	傅曼芸	居民	女	50	8	上海	复旦大学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妻子
14	高万春	干部	男	39	8	北京	北京第26中学的校长
15	郭兰蕙	学生	女	19	8	北京	清华附中，家庭出身不好
16	胡正祥	高师	男		8	北京	北京协和医院病理学家，夫妻双双自杀
17	胡　妻				8		
18	黄祖彬	中师	男		8	厦门	厦门八中物理教师

19	萨兆琛	中师	男		8	厦门	厦门八中教师
20	李德辉	中师	男		8	武汉	武汉市一中英文老师
21	张百华	小师	女	41	8	北京	北京市北门仓小学教员
22	刘克林	干部	男	42	8	北京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
23	刘澍华	中师	男	26	8	北京	清华附中物理教师
24	陆家训	高师	男		8	西安	西安交大理力教研室教师
25	吕献春	干部	女		8	上海	上海市财政局副处长
26	彭鸿宣	中师	女		8	北京	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校长
27	祈式潜	学者	男		8	北京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员
28	萨兆琛	中师	男		8	厦门	福建省厦门八中学教师
29	宋励吾	高师	男		8	南京	南京解放军气象学院教授
30	王一民	学生	男		8	上海	上海市外国语学院附中初二（5）班学生
31	吴迪生	高师	男		8	上海	上海华东师大外语教师同妻子（无名氏）
32	无名氏		女		8	上海	一起上吊
33	徐跻青	校长			8	南宫	河北省南宫县南宫中学校长
34	阎巨峰	校长	男		8	南宫	河北省南宫县南宫中学副校长
35	杨　俊	中师	男	39	8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教师
36	俞大因	高师	女		8	北京	北京大学英语教授
37	张国良	工人			8	上海	上海市油画雕塑创作室石膏模型翻制工人
38	张岩梅	中师	女		8	北京	北京第三女中数学老师
39	郑思群	干部			8	重庆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40	无名氏	干部			8	哈尔滨	哈尔滨师院党委书记
41	华 XX	馆长	男		8	北京	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长
42	无名氏	居民	女	65	8	北京	北京包头章胡同居民
43	白　辛	作家	男		9	黑龙江	《冰山上的来客》编剧
44	陈邦鉴	中师	男		9	武汉	武汉十四中数学老师
45	陈梦家	学者	男	55	9	北京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46	程贤策	干部	男		9	北京	北大中文系总支书记
47	傅　雷	学者	男		9	上海	著名翻译家 同妻子朱馥梅一同自杀
48	朱馥梅	居民	女		9	上海	
49	高本锵	中师	男		9	广州	广州铁中英语教师
50	韩俊卿	演员	女	51	9	天津	天津著名表演艺术家
51	陆进仁	高师	男		9	北京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52	吕静贞		女		9	北京	陆进仁妻子
53	马铁山	校工	男		9	北京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校工
54	王宗一	处长	男	42	9	北京	宣传部国内宣传处处长
55	言慧珠		女	47	9	上海	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
56	郑兆南		女	36	9	北京	北京第 52 中学教师

57	周瑞磐	中师	男		9	上海	上海七宝中学物理教师
58	无名氏	高师	男		9	哈尔滨	哈尔滨师院中文系副教授
59	冯世康	中师	男		夏	绍兴	浙江绍兴二中语文教员
60	申先哲	中师	男		夏	北京	北京八中历史老师
61	石之宗	中师			夏	北京	北京三中语文老师
62	江　枫	干部	男		夏	北京	北京戏剧学校负责人
63	李培英	中师	女		夏	北京	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
64	莫　平	干部	男		夏	北京	北京外国语学校支部书记
65	南汉宸	干部	男	70	夏	北京	全国人大常委、判为“叛徒”
66	邱凤仙	干部	女	40	夏	上海	上海红旗中实验室管理员
67	石之琮	中师			夏	北京	北京三中语文教师
68	苏庭伍	中师	男		夏	北京	夫妇分别为北京四中数学、地理教师，双
69	汪含英	中师	女		夏	北京	双自杀身亡
70	仝俊亭	高师	男		夏	郑州	郑州师范学院教师
71	王季敏	高师	男		夏	郑州	郑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
72	王德明	职员	男	30	夏	上海	
73	王 父		男		夏	上海	上海市医药公司职员同父母三人一起自杀
74	王 母		女		夏	上海	
75	王桂兰	居民	女		夏	北京	北京市民 判为“反革命老婆”
76	王思杰	高师	男		夏	厦门	
77	妻 子		女		夏	厦门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遭到残酷斗争后，
78	儿 子		男		夏	厦门	全家四人一起自杀
79	女 儿		女		夏	厦门	
80	吴新佑	职员	男	40	夏	上海	上海市 56 中学化学实验室管理员
81	萧　静	校长			夏	北京	北京月坛中学校长
82	谢家荣	专家	男		夏	北京	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
83	姚福德	校工	男		夏	天津	天津虹桥区金钟桥小学
84	袁玄昭	中师	男		夏	西安	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
85	张　筠	干部	女		夏	扬州	江苏省扬州湾头公社小学副校长
86	赵谦光	小师	男		夏	北京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
87	赵香蘅	小师	女		夏	北京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
88	赵宗复	高师	男	51	夏	太原	太原工业大学教师
89	郑之万	中师	女		夏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教师
90	褚国成	干部	男		夏	北京	北京阜外医院人事科干部
91	无名氏		女		夏	河北	北京居民作家锺阿城的姥姥，“遣返”老家
92	无名氏	居民	女		夏	北京	北京库司胡同居民，在丹麦使馆工作，夫
93	无名氏	居民	男		夏	北京	妻双双吊死
94	沈乃章	高师	男		10	北京	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

95	贝管城	中师	男	26	10	上海	资产阶级家庭出身
96	徐行清				11	昆明	云南昆明师院附属小学教导主任
97	骆凤峤	高师	男	50	12	西安	西安交大动力系教授
98	施于力	中师			12	个旧	云南省个旧一个中学老师
99	张瑞棣	学生	男		12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
100	陶 xx	学生	男		?	天津	南京测绘学院 66 届学生
101	庞 xx	学生	男		?	天津	天津某较富裕居住区
102	李 xx		男		?	天津	天津某较富裕居住区，前资本家，夫妻双双自杀
103	李 妻		女		?	天津	
104	边 xx		男		?	北京	北京第 65 中学生边涌珍的父亲和母亲
105	边 妻		女		?	北京	
106	杨素华	高师	女		?	石家庄	河北师大中文系教师
107	杨昭桂	军干	男		?	上海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训练部副政委
108	杨振兴	小师	男	40	?	江阴	江苏江阴县青阳镇中心小学老师
109	叶绍箕	干部	男	50	?	北京	复旦大学中层干部
110	叶以群	作家	男	55	?	上海	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111	翟毓鸣	高师	男		?	石家庄	河北师大化学系讲师
112	邢之征	中师			?	南宫	河北省南宫县南宫中学数学老师
113	徐维廉	硕士	男	72	?	北京	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教育学硕士
114	申先哲	中师			?	北京	北京第八中学语文老师
115	吕乃朴	职员	女		?	天津	天津文化用品公司，夫妻双双自杀
116	张宗颖	职员	男		?	天津	
117	卢治恒	高师	男		?	北京	北京师大中文系辅导员
118	李 文	小师	女	35	?	上海	上海岳阳路小学语文教师
119	孔 厥	作家	男		?	北京	《新儿女英雄传》作者
以下为 1967 年**自杀身亡者名录**							
120	陈 琏	干部			?	上海	华东宣传部，国民党高官陈布雷的女儿
121	范造深	医生	男		?	天津	天津广济医院院长
122	范 妻	医生	女		?	天津	河北师范学院校医
123	冯大海	作家	男	40		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124	顾圣婴	高师	女	29	1	上海	上海交响乐团钢琴家，获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最高奖，三人同时自杀。
125	顾 母		女		1		
126	顾 弟		男		1		
127	胡俊儒	干部	男	48	5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长
128	罗广斌	作家	男		2	四川	四川省文联作家，小说《红岩》作者之一
129	孟秋江	干部	男			天津	天津统战部工作
130	沈知白	高师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131	盛章其	干部	男	40		上海	上海市敬业中学人事干部

132	孙　斌	书记	男		6	重庆	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133	孙　泱	高师	男		10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134	王绍炎	中师	男		夏	萧山	浙江省萧山县二中退休教师，夫妻双双自杀
135	王 妻	居民	女		夏	萧山	
136	伍必熙	高师	男			上海	复旦大学新闻系副主任
137	许政扬	高师				天津	天津南开大学教师
138	杨雨中	学生	男		5	北京	北京地质学院探工系学生
139	姚　苏	干部	男		7	遂宁	四川省遂宁县县长
140	余丙禾	工程	男	34		兰州	兰州水电局工程师
141	张怀怡	干部			3	北京	清华大学举重体操队
142	周鹤祥		男			无锡	无锡县南桥镇人
143	无名氏	编辑	男		夏	北京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 11 章　权力对抗

11 章目录

一、十月进击　★二、一月拼杀　1、臥轨对抗　2、绞杀赤卫队　3、点火特使　4、导演夺权
三、二月角斗　1、大闹京西宾馆　★2、怀仁堂内外硝烟弥漫　第 11 章结语

一. 十月进击

1967 年 5 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时说:“**《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什么呢？在“横扫”、破“四旧”运动中，特别是在批工作组和发动红卫兵运动中，他遇到党内右派集团的顽强抵抗，因而发现了一条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是这条路级的嚣张表现;“**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是这条路线对他的公然挑衅。对此，毛十分恼火，决定乘胜追击，不给刘、邓喘息机会，要“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他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

善搞**群众运动**即暴民政治的高手毛泽东，通过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信，煽起了红卫兵造反狂热；他还通过免费供吃、供喝、供穿、供住和供车的红卫兵大串连，任意挥霍国家财产，使红卫兵纵欲天下，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枪弹和炮灰；他还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指导“横扫”和大破“四旧”，鼓励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肆意践踏人权，任意屠杀弱势群体，培植他们暴戾恣睢的兽性。毛泽东的“群众”终于被发动了起来。他要借助“群众”的暴力乘胜追击，为向刘、邓全面夺权扫清道路。

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向党内右派发动总攻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按照毛泽东的圣谕，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高调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吹响**十月进击**的号角。会上，毛泽东借红卫兵造反之势，严厉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陶铸和其他中央大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迫使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等大员，协调一致地按照毛泽东的统一口径，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指责他们是“**一条压**

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起者和推行者，等等。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一线推动和指挥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揪斗包括那些“想不通”在内的各级当权派的狂潮，席卷全国。

对此，三十多年后，当年被毛泽东投入监牢的枪手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一书中说，“**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认为那是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以自己为革命对象”，主要革“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的命，破“四旧”干扰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等等。这位临终不忘颂扬恩师的枪手，却忘记了他不该忘记也不可能忘记的几件大事：他“**忘记**”了毛泽东授权和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那篇社论号召“**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忘记**”了他本人在毛泽东授意下起草的包括破“四旧”在内的《十六条》，那个文件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他“**忘记**”了他本人参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个讲话大反“四旧”，大声赞扬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好得很**”；他还“**忘记**”了毛泽东发出的“**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的“最高指示”，那个指示酿造了全国十万人丧生的“红八月”大屠杀，等等。尽管我们没有理由否定“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这句话的真实性，但也没有理由因毛要批判“资反路线”就去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如果说“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是句真话，那么，是否可以证明，“**大破‘四旧’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犯罪**”的这个历史公论不可推翻？是否还可以证明，王力这位当年毛的枪手，正是“集体犯罪”中的重要罪犯，因而他的倒台是罪有应得？枪手的“反思”，有意回避毛泽东为打倒刘、邓所设计的“**层层剝笋**”的战略战术：批《海瑞罢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舆论准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大破“四旧”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大破“四旧”所煽起来的红卫兵疯狂，为批判刘、邓党内右派势力的“资反路线”，积聚了能量，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制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首先在学校里发动，接着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扩展。北京红卫兵遵照指示，派出学生到各地“串连”，发动和指导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中共建政十七年来，尤其是在 1957 年反右以后，那些省部级大员们，那些地、县级官老爷们，甚至一个小小单位的党的领导人，在他们面前，都是党的化身，都是真理的传人，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各级官老爷面前，他们只能诚惶诚恐地躬身哈腰，听从他们“一贯正确”的训导，服从他们“一贯正确”的驱使，听凭他们“一贯正确”的宰割。因此，他们多么希望能站起身来，挺起胸来，同“一贯正确”的官老爷们**平等对话**！毛泽东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给了

他们一个机会。但在毛、周、江左派的统一指挥下，不平等对话的毛式揪殴法，**强暴**了他们“平等对话”的愿望：全国从中央到各地，各级党委和单位的主要领导者，许多人被毛的“**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和愚昧分子——拉到台上批斗、殴打。“回去仍然不通”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中央局”级大员，自然首当其冲，使毛泽东能在“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中得以让毛的“群众”用毛式揪殴法去“**检验**”他们。

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老百姓的批判锋芒，并不局限在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问题上：他们还要借机批判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的当权派，**清算**他们文革前的种种恶行、劣迹：

他们批斗那些曾欺压过老百姓、对老百姓进行过打击报复的当权派；他们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公开给文革前受过政治迫害的老百姓平反昭雪；他们还要求党、政、军各级当权派，向在“四清”运动中受迫害的老百姓赔礼道歉、平反昭雪，甚至要求那些因错划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公职或押解回乡的老百姓回城、复职；上海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人们，则提出了取消等级歧视政策，要求与国营工、集体工政治待遇平等，经济上同工同酬，等等。

这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对此，湖南红卫兵造反派杨曦光先生，首先提出“两种文革”的概念：一种是“**毛泽东文革**”，一种是“**群众文革**”。在“群众文革”里，就体现这种老百姓的民主诉求。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里，这些民主诉求原本是“非法”的，但为了打倒右派当权派，毛泽东便赐予老百姓以“大民主”，让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暂时“合法”化。显然，这是毛的权宜之计。尽管老百姓借助毛倡导的所谓的“大民主”，向当权派提出的一些民主诉求是合理的，但在独裁的政治氛围里，这些合理的民主诉求，只能是一种原始的、初级的淹没在批判“资反路线”汪洋大海里的微弱呼声。如果将这种微弱的民主呼声理直气壮化，就会遭到毛泽东的无情镇压：上海工人合理的经济要求，被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批判，杨曦光因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打成反革命并判十年徒刑，就是这种“理直气壮”民主诉求的结局！

应当指出的是，老百姓的民主诉求同红卫兵造反派用新的不平等对话——毛式揪殴法揪殴当权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诉求：前者是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体现，后者是痞子、流氓无产者颠覆真、善、美华夏文明的法西斯暴政。面对这种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诉求，毛泽东因要利用其不满情绪打倒右派，故能暂时容忍前者，积极支持后者；但对于在“横扫”和破“四旧”中积极支持贵族红卫兵的党内右派和中间派来说，这两

种政治诉求，都是无法容忍的洪水猛兽！

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那些当年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们，在左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大权旁落，成了众矢之的；那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运动中暴虐无比的为毛泽东立下赫赫战功的贵族红卫兵们，在左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变成了令人不齿的“保皇派”。但很快他们“清醒”起来，联手成立了右派造反组织，以打着狠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派”的造反旗号，与左派造反派相抗衡。

1966 年 12 月 26 日，在批“资反路线”的高潮中，迎来了的毛泽东 73 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在中南海游泳池摆了一桌寿宴，邀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参宴，江青当然其中。席间，当人们举杯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站起身来，举杯向赴宴者发出了令人惊愕的号召：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这是著名的“**生日号召**”——这是支持左派造反派用武力向右派夺权的号召！尽管事后御用精英们把这句狂言修改成“为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干杯”，但赴宴权贵们已经领悟到了“伟大领袖”号召的“精神实质”：**消灭一切反抗者**！于是，在四天后的 12 月 30 日，参宴者张春桥，便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所在地的康平路上，导演了“生日号召”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绞杀上海赤卫队，打伤 91 人；“生日号召”后不到一个月的 1967 年 1 月 25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石河子地区，发生激烈枪战，两天之内双方打死 29 人（另一说 24 人），打伤 80 人……自此，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伤亡的“**全国全面内战**”，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

对此，毛泽东有“最高指示”在先。1966 年 10 月，他在批复给林彪呈送的“快报”上，赤裸裸地展现了魔王的杀戮心态：

“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毛泽东为什么号召自己领导下的国家全面内战呢？枪手王力在他的《反思》中说，是毛泽东怕“**中国改变颜色**。”这是枪手给魔王的开脱和粉饰。实际上，这种所谓“中国改变颜色”的说教，亦即乌托邦共产理想主义的说教，是毛泽东和王力等精英们对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所做的“理论”包装，因而是为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最大谎言。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右派势力的强大阻力，使位极人臣的毛泽

东，倍感孤立，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多月中，一边冷静观察的毛泽东发现，受他支持的左派造反派的造反精神，虽已活跃起来，但各地党内右派扶植的右派造反派，势力日益强大，迫使左派造反派处于少数受压的境地。党内右派势力的反抗，使他有理由认为，全国政权的大部分权力，还在刘、邓党内右派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形成了刘、邓复辟的党内基础，从而使他的政令很难贯彻到全国。这种权大而不逞的局面，使他深感其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他越来越感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内决斗形势已经形成。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权力情结**使他决心对权力来一个根本解决。他从重庆左派红卫兵通过制造“一二四”武斗（详见第 13 章“纵火”）取得胜利的事件中得到启示：支持左派造反派剥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重组干部队伍，把刘、邓党内右派势力排除于各级权力之外。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置荼毒生灵于不顾，利用造神运动在芸芸众生中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借酒发飚，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内战”。1967 年 2 月 3 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政府领导卡博、巴卢库谈话时，暴露了他当时的心机：**“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们不听**。”这个深藏于毛泽东心底的**权力情结**，被他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等一类“理论”包装起来；而那个耸人听闻的发展成为“全面内战”的“**全面较量**”，又被中央文革包括王力在内的左派精英们，论证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毛的包装和王等的“论证”，使这个伪命题，在中国横行霸道了许多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历史再次证明：古往今来的大奸大恶们，都善以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之名，弄权欺世，强奸民意，从而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诱迫黎面黔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为了不给党内右派当权派们喘息的机会，在 12 月，毛泽东命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 10 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动员全国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到了 1967 年年初，毛泽东下令取缔了周恩来为后台的、以“保爹保娘”为目的的“联动”等贵族红卫兵组织，打倒了支持各地党内右派当权派的中共常委陶铸，以敲打周恩来。由于预见到党内右派当权派可能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造反派，1 月 13 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详见第 12 章一），限制各地当权派的权力，并警告他们说：**“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由于批“资反路线”和斗“走资派”受到了党内右派激烈反抗，特别是面对各地右派造反派势力迅速膨胀左派造反派

处境相对困难的形势，根据毛泽东提议，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要“**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决定要求军队“**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这是毛泽东运用权力，为改变左派造反派受压处境所采取的专政措施。

在毛、周，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鼓动和领导下，北京红得发紫的红卫兵组织，诸如聂元梓麾下的“新北大”、蒯大富旄下的“井冈山兵团”等，纷纷组成了名目繁多的类同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宣传队”等造反组织，把手伸向全国各地，从而构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首都红卫兵各司令部——驻各地联络站**”行之有效的指挥和反馈系统；与此同时，北京派出的密使、公使，也纷纷在各地主要城市登场、亮相。——全国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们，也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通过三个多月的步步进逼，毛泽东支持的左派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与右派“保皇派”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样，要“**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全面夺权战略部署的毛泽东，用中共中央主席的权力，把批判“资反路线”和揪斗“走资派”的**十月进击**，推向高潮，从而为在全国全面夺取刘、邓右派的权力，做好了准备。

二、一月拼杀

毛泽东的**十月进击**，并没有使党内右派束手待毙，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左右拼杀。

1966 年 10 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次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吃饭。饭间，江青对陈说，她“**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笔者：中共华东局书记)，**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要求陈“**站出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13 岁参加红军被誉为“红小鬼”的陈丕显，自恃清白无把柄可抓，竟不买江青的帐，借口有病休养为由，婉绝了江要他打倒曹、魏的指令。可悲的是，“不识抬举”的“红小鬼”，竟不懂得“**毛泽东≥江青**”政治公式的可怕，婉绝就会使自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疑于引火烧身！果然，上海造反派喊出了令他追悔莫及的口号：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曾经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造反派面前，威风扫地。



图 11-1：“一月风暴”中被打倒的上海市头头

1967 年元月 6 日，在毛泽东直接策划和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又称“一月风暴”（图 11-1）。对此，“一月风暴”的总导演毛泽东于 8 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在毛泽东的制导下，山西、黑龙江等省，步上海后尘，相继夺权。自此，“一月风暴”发展为全国夺权风暴！

“一月风暴”的前奏，是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

1、臥轨对抗

1966 年 11 月 7 日，在毛泽东御用工具北京红卫兵设在上海联络站的鼓动下，上海工人造反派贴出了海报：定于 11 月 9 日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以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向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清楚地写着：**“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等。接着，他又给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明确答复说，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因此，曹认为，成立“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在请示了养病中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后，做出了“三不”决定，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上海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三项严正要求”和“三不决定”的对抗，都有中央文件和中央大员的支持，矛盾迅速激化。

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11 月 9 日下午两点，“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

曹荻秋不但不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还拒绝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的要求。“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当晚决定“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王率领两千多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安亭车站接到市委命令，不准这一列车北上。9 日深夜，当列车开到安亭时，被安排停到铁道部材料厂的专用线上。上海市委的决定激怒了造反工人。几次谈判破裂后，10 日上午，工人们**卧轨**，导致京沪铁路全线中断 36 小时，酿成了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引发高层权力博弈。

上海告急电话打到了国务院、中央文革。总理周恩来立即派主管工交的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去同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商量。商量后，陈伯达果断地采取了三条紧急措施：1、《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要求工人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2、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身份通过铁路部门向安亭发去电报，告诫“工总司”造反派们“**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中央不同意两千多人上京告状，但可以派 10～15 个人赴京；3、指派副组长张春桥为特使，赴沪调解。

陈伯达的前两条措施传到安亭后，受到了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等待张春桥的到来。12 日下午，当张春桥一行来到安亭时，他们向张提出了五条要求。出人意料的是，张完全赞同他们的要求。13 日，张春桥在他答复的五条要求手稿上签了字。现照当年手稿抄录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 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 于上海

至此，安亭事件以“工总司”的胜利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失败而告终！

王洪文率领北上告状的“工总司”人员回到了上海，他们像凯旋归来的英雄那样，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

“工总司”的胜利使上海市委沮丧而愤怒。他们打电话找中央领导：中共中央常委、副总理李富春躲而不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哼哼哈哈而言他，表明李、陈已改变了立场，都站在张春桥一边。他们深感被耍弄、被出卖了；但令他们宽慰的是，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一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竟敢与上海市委对抗，特别是敢于对抗中共中央常委陶铸、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大员，他吃了豹子胆了？旁观者一看便知：他有“尚方宝剑”在手。

尽管张春桥没有炫耀他的“尚方宝剑”，却不自觉地露了一露“剑鞘”。13 日下午，张春桥在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他泄露了天机：**“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并十分得意地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

“这是中央希望的”吗？采取三条紧急措施的陈伯达，不到一天便来了个 180 度的急转弯，突显**中共机会主义文化**的魅力；李富春虽没急转弯，却把**中共避嫌文化**表演得恰到好处；只有受周恩来支持的陶铸例外。陶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并强硬地表示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

“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什么？9 月 14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工、农、交通、财贸等部门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面对不到两个月的既定方针，陈伯达怎敢来个 180 度大转弯呢？显然他已被告知了上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陶铸，因不知道上意，便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正在忙于“接见”红卫兵的毛泽东知道：发动工人、农民造反远比发动无知的青年学生困难得多，因为经过“三面红旗”严酷教训的工人和农民，懂得口号、红旗与吃饭的关系；他们比较务实，不像小毛孩子那样一触即跳，因此，那里基本上是右派的势力范围。为了防止工人农民干涉学生，9 月 7 日，他批准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通知》，并在文件上批复道：

“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9 月 7 日的《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通知》，与 9 月 14 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通知。然而，安亭事件使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以工人、农民同红卫兵学生相结合的造反

组织，更具有正统性，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杀伤力，因而更具有夺权威力。因此他推翻了九月的两个通知的规定，对江青、张春桥面授机宜：**如此这般**！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如此这般”的内容，但在 11 月 16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对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违犯中央两个通知规定的做法，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成功地导演了“安亭事件”这出“折子戏”；他的天才还在于：把**“如此这般”**的“唱词”偷换成**“先斩后奏”**和**“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并为出尔反尔的流氓行径，找到了政痞式的“理论”根据。于是，在“如此这般”之后的 12 月，他先后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 10 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两个文件，鼓动全国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从九月的两个“通知”到十二月的一个“规定”和一个“指示”，毛泽东把他那“理无常是”的政痞哲学，演绎到令人厌恶的境界。

2、绞杀赤卫队

1966 年 11 月 30 日下午，“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即“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12 月 1 日，王洪文率领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12 月 2 日，“工总司”派兵占领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遂停止发行。12 月 5 日，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压力下，王一平、宋季文两人代表上海市委，被迫同意并草签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12 月 10 日，曾经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不得不代表上海市委正式签了字。“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主要内容是：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事件以“工总司”、“红革会”的全胜而告终。

曾经独霸一方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委头头们甘心失败吗？经过秘密而紧张的策划，准备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复制《解放日报》事件，借以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示威。12 月 29 日，号称有 80 万人之众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出约 3 万多人占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院、“爱棠”大院。他们高呼着“打倒曹老头”口号，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并要曹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等八项条件。上午，曹荻秋在市委会议

室里，像演戏一样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并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赤卫队”头头们认为，他们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撤离上海市委。他们打算像“工总司”、“红委会”在占领《解放日报》社之后洋洋得意地撤离那样率领他们的将士凯旋而归，但为时已晚——“工总司”人马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

“赤卫队”是在上海市委策划下成立的。11 月 25 日，由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王玉玺**出面组建上海工人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对抗。上海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里召开筹建“赤卫队”的秘密会议。据说，曹荻秋出席了秘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表示承认和支持“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26 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跟“工总司”造反派不同的是，“赤卫队”里中共党员多，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这“六多”，注定它是个保守组织，即“保皇派”。但为了不带“保皇派”的帽子，他们也打出了造反旗号，高呼起“炮轰上海市委”、“揪斗曹荻秋”等口号。可悲的是曹荻秋，策划成立“赤卫队”的本意是对抗“工总司”，借以舒缓对上海市委和他本人的压力，谁知弄巧成拙，弄得他里外不是人：刚被“工总司”揪斗，又遭“赤卫队”批判，自己人也不敢放过他！

但最可悲的还是冥顽不灵的芸芸众生，他们在对立双方蛊惑人心的煽动下，争先恐后地去充当权力的炮灰！

正当“赤卫队”准备撤离的时候，他们发现道路已被堵死，“工总司”十几万人马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张春桥早已料到曹荻秋利用“赤卫队”假造反的计谋，而“赤卫队”也已成了“工总司”夺权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在聆听了“伟大领袖”“**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指示后，便产生了绞杀“赤卫队”打算。机会终于来了。当他听到 3 万“赤卫队”占领上海市委后，便密令王洪文**绞杀**。王洪文不敢怠慢，急令副手耿金章成立“联合指挥部”，调集人马围困住“赤卫队”。30 日凌晨 2 时左右，“工总司”在耿司令的指挥下，向“赤卫队”发动进攻。他们手持木棍、皮带等器具，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人，就拳打、脚踢、皮带抽、棍子夯。到早晨 6 点多，战斗结束，“工总司”大获全胜。是役，“赤卫队”被抓 300 多人，伤 91 人，被“俘”2 万多，“赤卫队”袖章全部被收缴，还缴获数百箱饼干。被“俘”的“赤卫队”员，被迫排成单行，分六路灰溜溜地逃出康平路。此后，“赤卫队”一蹶不振。事后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

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上海康平路战斗，是毛泽东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后发生的第一起大规模**内**战。这次战斗，不仅为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夺权扫清了道路，还为全国各省市**武力夺权**树立了榜样。

3、特使聂元梓赴上海点火

“安亭事件”使毛泽东认定全国夺权的突破口在上海。他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毛泽东还认定：上海学生的红卫兵运动是文火慢煎，其规模远没有北京大，声势远没有北京高，普及程度远没有北京广；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中，上海红卫兵的横扫方式过于文雅，特别在“红八月”里，战果远不及北京“辉煌”，其揪殴杀的火药味远不如北京红卫兵暴烈：在“红八月”里，上海红卫兵打死的“敌人”不足北京的1%，驱赶出上海的“敌人”不足北京的10%。“安亭事件”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要进一步发动红卫兵，并使其与上海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就会创造出远比北京红卫兵更大的战果，并能使夺权名正言顺地“无产阶级”化。因此，除派张春桥以中央特使身份赴上海排除上层阻力外，他决定速派聂元梓以北京红卫兵领袖的身份，到上海红卫兵中去煽风点火。

1966年11月12日上午，**李讷**到北大找到聂元梓，向聂传达了其父毛泽东要聂**“出去走一走”**和**“去上海串连”**的圣旨。“伟大领袖”的信任使急欲冲出北大问鼎权力中枢的聂元梓受宠若惊，把李讷口传圣旨当作未来飞黄腾达的机遇。经过紧张而充分的准备后，19日，她带着得力助手**孙蓬一**、**李醒尘**乘车上海，12月16日返回北京。

在沪的27天中，聂元梓果然不负圣命，在促进上海红卫兵大联合、促进“工总司”和“红革会”联合夺权上立了大功！

11月25日，在聂元梓的鼓动、参谋下，上海红卫兵组织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由于聂元梓“在战火中诞生”的建议，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在大会上，作为“钦差大臣”，聂元梓反客为主，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常溪萍是什么人？怎么能同上海市委联系在一起？

当是时，常溪萍不过是个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而已。炮轰上海市委怎么要从一个中层干部身上开刀？

这要从“四清”说起。

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两人素昧平生，是“四清”把他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964 年 11 月至 1965 年 6 月，受教育部委派，常溪萍任北京大学社教(即“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支持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要整聂元梓，常成了整聂的主要支柱：两人一唱一和，对聂毫不留情。对此，聂耿耿于怀：她的第一号仇敌是陆平，第二号便是常溪萍！这次受命来上海，使他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在北京，她借助中共中央文件直捣北大一号人物陆平，不仅报了一箭之仇，还一鸣惊天下，成了倒刘批邓的英雄；在上海，她要复制北大模式：在揪斗常溪萍报仇的同时，炮轰她的后台上海市委，为夺权制造舆论。她宣称“常溪萍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等等，她的计谋成功了：从常溪萍那里打开了炮轰上海市委的“缺口”，同时也因此最终把常溪萍逼上跳楼自杀的绝路。聂元梓终于假公济了私：在炮轰上海市委的同时，如愿以偿地了结了私仇！

在聂元梓的“串连”下，11 月 28 日，“红革会”进驻《解放日报》社，30 日成立“火线指挥部”。在聂元梓的说服下，12 月 1 日，王洪文率兵支援“红革会”，第二天派兵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自此，“工总司”同“红革会”、“上三司”等红卫兵联合在一起，在《解放日报》社共同战斗了九天九夜，迫使上海市委低头认错。上海市委接二连三的失利，终使上海大乱起来，为毛左派乱中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聂元梓来沪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归复命，12 月 16 日，她返回北京。

4、导演夺权

1967 年 1 月 6 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数百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在“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上海夺权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传下命令：向上海拍发贺电。周恩来、陈伯达等大员不敢怠慢，11 日，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紧急跟上，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夺权，并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一月革命”夺权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造反派，响应号召，先后夺了本省市党政领导机关的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是个另类：他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十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交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

不光赵紫阳；除愚昧无知者外，多数人都能看出：**这出“一月革命”连续剧，台上主角是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和王洪文；聂元梓、蒯大富也“反串”其中；摇旗呐喊、跑龙套和当炮灰的是上海工人和红卫兵；其总导演是中国人民的雇主、董事长毛泽东。**

据事后透露，1967 年 1 月 3 日夜，在北京平安里三号的《解放军报》社办公楼里，一场夺权风暴在秘密策划中。根据“总导”的圣旨，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来到这里，会见昨天才乘飞机来北京的上海“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常委陈阿大和王的秘书廖祖康。会见时，点火特使聂元梓也在座。当听到王洪文汇报上海政局混乱、“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时，张春桥当即明确提出夺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随即又表态说：“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他要王洪文等立即回上海，做好夺权的准备。——这种暗箱里的阴谋活动，在毛的红色辞典里，叫“光明正大”!

1967 年 1 月 4 日，根据“总导”安排，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飞到上海。在张、姚、王等人的密谋下，1 月 6 日，由“工总司”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并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大会上，尽管主角张、姚两人没有登台，但会场上的四幅巨标，明确了他俩接管上海权力的主导地位：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北京精英们，迅速把那四幅巨标赞誉为“上海人民的心声”；但却对毛“发动群众”的“暗箱”谋划视而不见，有意掩盖了“总导”幕后的决定作用。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落入钦差大臣手中后，“总导”自然喜不自禁地下令发贺电。

然而，事态发展并不尽如上意。尽管张、姚已接管了权力，尽管已发去了贺电，但倔犟的“曹老头”曹荻秋，公然与毛的中共对抗，他毫不畏

惧地宣称：“**我是按法律程序选出来的，我仍然是上海市市长**!”

对此，钦差大臣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扑”。12 日，他们便还以颜色，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张春桥传扬了毛泽东曾多次念叨过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借以弹压反抗者，批判“法律程序说”，为夺权的合法性张目。

“曹老头”们没有被镇住。他们成功地利用矛盾，收买了势力强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使他们与“工总司”决裂。当被告知张、姚要夺权时，“红革会”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1 月 25 日，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了上海党政首脑机关的二十三枚印章。也许他们以为，“夺”了印章才算夺权成功;“曹老头”们可没有红卫兵们那么天真，但他们却乐意把印章交给“嘴上没毛”的年轻人，而绝不愿交给那两个钦差大臣支持的“工总司”。

为了警告反对夺权的右派头头们，如“曹老头”等，在中央文革头头们的暗示下，北京红卫兵呼应上海“一月风暴”，便拿被毛骂为“走资派”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开刀祭旗，1 月 22 日，他们把张打死在北京矿业学院里，借以恐吓上海的“曹老头”们。

但上海的“曹老头”们没被吓住。1 月 28 日，“红革会”决议“干掉张、姚”，街头上“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的大字标语，很快被“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的大字标语所取代。1 月 29 日，“红革会”又决定：30 日上午，组织十万人“炮打张春桥”的大游行。

在大联合、大夺权道路上阔步前进的时候，“红革会”的倒戈，使张、姚两位钦差大臣大为恼火。在得到“总导”指令后，立即采取了镇压措施：一方面通过中央军委命令上海驻军支持“工总司”，一方面命令以驻军为后盾的“工总司”，出动数十辆卡车和数万人上街，赶在“红革会”出动前，把守各个路口，把十万反张大游行扼杀掉。对抗结果，“红革会”土崩瓦解!



图 11-2：上海人民公社

2 月 5 日下午，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成了上海市的新主人。（图 11-2）

在新主人面前，上海“红革会”的红卫兵付出了惨痛代价：两千五百多人被整，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四百四十多人在“学习班”里受审，自杀五人，逼疯六人，毒打致残十多人。五个多月前，即 1966 年 8 月 22 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文件，成了一张废纸。倔犟的曹荻秋，孤军奋战，因寡不敌众，被抓进“学习班”，并被定为“叛徒”，终被打倒、罢免。曹荻秋是个忠于共产党的党员，1965 年始任上海市长，在任职期间，逮捕并处决了为民主、自由呐喊的自由圣女**林昭**；但他并没有因而将功折罪，在“一月风暴”后，被罢免、关押，1976 年 3 月 29 日，病死于上海狱中。

“学习班”这个集改造、批斗、审讯、囚禁和劳教于一体的专政组织，被“创造”了出来。这个借“学习”和“群众”之名进行迫害的政治组织，在文革中被广泛采用，其专政的暴虐程度随全国和各地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本来用行政措施就可以解决权力更迭的所谓“一月革命”的上海夺权风暴，以“连续剧”的编、导、演职人员的全胜而落幕！

人们或许要问：按照当时毛泽东的权势，**“一个指头便捅倒”**不识抬举的陈丕显和倔犟的曹荻秋，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呢？有人论证说，因党内右派势力强大才有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看一看毛的一张大字报就能推倒刘少奇的事实，这种“论证”是不充分的。当你考察了“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运作方法后，你就会发现毛式阶级斗争策略的一贯性：毛泽东为了达到分而治之从而战胜政敌的目的，就要利用权力制造仇恨，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他的“群众”即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和愚昧的勇敢分子带头，发动一部分群众、并把他们捆绑在他的战车上，造成多数人拥护他的假象，借以威吓和镇压包括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大多数群众。对于这种运作方法，毛泽东称之为群众运动。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中，他屡试不爽。如今，在他导演的上海夺权风暴中，他要如法炮制，把不识抬举的陈丕显和倔犟的曹荻秋**“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犹如“村村见血”的土改运动那样。

在**“夺权！夺权！”**超高音的声浪里，由于众多工人、学生、红卫兵和市民被声浪震得浑浑噩噩，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了被权力任意耍弄的群氓：当他们为夺权摇旗呐喊的时候，甚至当他们为夺权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看到，他们的行动，除了能成全少数暴发户外，他们自己的贫困境况，不可能因夺权而得到改善，他们的自由权利，也不可能因夺权而得到保障。

三、二月角斗

1、京西宾馆大拍案

为了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和贺龙等人在军队中的势力，毛泽东借贺龙兵变的谣传，向军队发出“最高指示”说，**军队里也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此，军队也要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的“最高指示”正中林彪在军中排除异己、培值私人势力的下怀。于是，他在 1966 年 10 月，命令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起草了个《紧急指示》，经毛泽东点头后发向全军。军队由此卷入了文革的狂涛骇浪之中。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造反组织。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令林彪不曾想到的是,《紧急指示》下达后，包括国防部等最高统帅部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许多领导人被揪出批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例如：

11 月 8 日凌晨，门卫森严的国防部，遭到几百名学生的冲击；

19 日，10 多名高级将领，被揪去陪着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挨斗；

到了 1967 年元月，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等高级将领，也相继遭到揪斗、打倒；

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高级将领，也未能逃脱被揪斗的命运，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有的抓住被关在地下室里，打个半死；

更有甚者，有些高级将领性命不保，如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就死在能量通天的造反派手里。

一时间，各军区叫苦不迭，纷纷向中央军委发电告急求救。对于这种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做法，军中老兵们纷纷表示不满。

1967 年 1 月 19 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们，为了保住各自“山头”，力主保持军队内部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定”的方针与中央文革相抗衡。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陈伯达，反击将帅们，指责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死气沉沉，没按中央精神发动起来，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由于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陈、江无法，便改变策略，先找“软”的捏。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指责萧是“资产阶级政客”，责令萧当晚到十万人批斗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军内造反派接令而动，当晚直奔萧家揪人。萧华闻风从后门成功逃脱。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江青追问萧华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原来，萧华已看出江青的谋图，拿他开刀是要火烧老帅们。于是他将计就计，把火直接引向老帅：当晚他从后门逃出，跑进叶剑英家里躲了起来。

军中老帅们对江青狐假虎威的权势早已看不惯，早想找个机会教训教训这个悍妇。机会终于来了。当听到毛泽东保萧华的承诺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会上拍案而起，挑明是他昨夜收留了萧华，对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怒火难捺，猛拍桌子骂道：**“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由于用力过猛，右掌骨震裂。在叶拍桌子之前，徐向前元帅也拍了桌，指责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林彪得力助手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也毫不客气地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军头们咄咄逼人面前，不可一世的江青和陈伯达，只好转攻为守，汹汹气势有所收敛。叶、徐拍桌子，被史称为“大闹京西宾馆”。

如论“窝藏之罪”，周恩来在劫难逃，因为贺龙元帅夫妇躲在他家已经十多天了。但经验老道的周恩来，逢凶化吉，适时而巧妙地把贺龙夫妇“送”到西山囚了起来。对敌从不手软而对部属宽厚的周恩来，在京西宾馆里看出，中央文革一干人并不以囚禁贺龙一人为满足，他们还要通过打倒萧华而打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叶帅一倒，军队势必大乱，周心目中的党国将毁于一旦。于是，他立即和叶剑英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向毛陈述乱军的利害关系，提出了稳定军心的劝告。

京西宾馆里的尖锐对立，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他深知整肃军方将领、清除军中异己不可能像上海夺权那样，他们都是带枪人，弄不好会逼他们造反。而当是时，各地在展夺权斗争中，不少地方的左派造反组织势单力薄，领导权往往落入右派保守派手中，急需军队来支持居于少数派的左派。在这种形势下，他不得不接受周、叶的劝告。出于笼络军队支持左派造反组织夺权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情激愤的高级将领。1 月 22 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接见中，一方面他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他又捺着性子听完了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后，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等等。

林彪首鼠两端，既想紧跟毛泽东的部署，同中央文革携手整掉军内异己势力，又怕军队大乱，祸及自身，因此，一直躲在幕后观察形势。当得知将帅们大闹京西宾馆、毛出面安抚后，他立即出现在前台，站到将帅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来了一个下马威。

他质问江青：**“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盛怒之下，他把茶几掀翻，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挨了一顿痛骂的江青，着实领教了副统帅的厉害，只好老老实实听着，并勉强作了自我批评。

大闹京西宾馆以军方胜利、中央文革受挫而告终。打赢一月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军方，乘势出台了稳定军队实则限制军内文革运动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为党内右派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击败左派打下了基础。

2、怀仁堂内外硝烟弥漫

为了支持各地居于少数、处境困难的左派夺权，毛泽东命令军队“支左”。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大闹京西宾馆”使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进一步安抚他们，让他们在“支左”中做出贡献。善于玩弄权术的毛泽东，故作姿态，以批评军队将领们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来笼络军心。2 月 10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常委陶铸），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他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江二人。其实，批陶铸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就像屡屡干过的“先斩后奏”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帐。实际上，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以取代中央书记处，是毛泽东全面夺权的重要谋略。一时间，毛批评陈、江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并明确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使党内、军内的右派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的搞法憋了一肚子气，也知道文革作祟者是毛泽东，但因惧于毛的权威和手段，便想借毛批中央文革的机会，拿江青、陈伯达出出气。

机会被他们找到了。

2 月 11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狠批毛泽东的打手中央文革。叶剑英指着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

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徐不是不知道，中央文革只效忠毛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为毛所导演；但他们不敢碰硬，不妨也拿软柿子捏捏。中央文革成员因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冒然造次，会上处于守势，偶尔出来辩解一下。2 月 16 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图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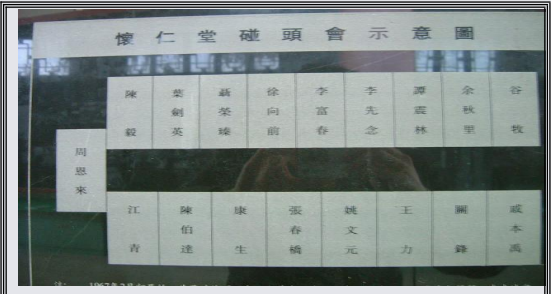


图 11-3：1967 年 2 月 16 日怀仁堂常委碰头会上排座次

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会上指斥中央文革成员：**“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泪水夺眶而出。末了，他愤怒地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将去，被周恩来拍案叫回。陈毅更是怒火中烧，炮口直指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他忿忿地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他提到了延安整风，幸灾乐祸又抱怨地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笔者：这次文革被打倒的大员），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没有反过毛主席的人。”“总理（在延安）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谭震林的泪水和陈毅的怒斥令人同情；但在“红八月”里，面对十数万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面对数百被斩草除根的绝户，却未见大员们一滴眼泪，未闻大员们的一声怒斥！谭、陈的怒斥，史称**“大闹怀仁堂”**，被毛左派称为**“二月逆流”**。

盛怒之下，谭震林在会后写信给林彪，大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扬言**“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林将谭信转给了毛泽东。

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当上层权贵们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里唇枪舌战、拍桌瞪眼的时候，下面各地当权派在中央元勋们的暗中支持下，纷纷向中央文革示威，以软性消极怠工，直接与毛左派相对抗，有的甚至对毛左造反派拉起了硬弓，动了真刀真枪，大开杀戒。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省机关内造反派刚刚组建时，便提着省委、省政府的几十枚公章交给了造反派，表示交权，使全省处于无政府状态；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见大势不好要挨斗，便自我了断而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比较聪明，中央工作会议后，他便拨款支持右派造反派，使右派造反派变成保护当权派的保皇组织，他躲进军区里暗中指挥……

在“二月逆流”中，除了软性对抗外，还有硬性对抗。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自命“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派军队支左，为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埋下了祸根。在开国元勋们的支持下，一些支左的军队将领，很快与地方右派当权派勾结在一起：他们把维护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保皇”组织，装扮成造反派加以支持，而真正的左派造反派，则被他们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例如，四川省军区和驻军，同他支持的右派造反派组织，从 1967 年 2 月 24 日到 3 月中旬，就抓捕了左派造反派十多万人，其中，成都抓捕两万多，重庆市取缔和捣毁左派造反派组织 118 个，迫其自动解散 146 个，抓捕 2,253 人。四川省军区打击左派造反派的行动，被史称为“**二月镇反**”。最恶劣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根据军委传达的毛泽东关于“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精神，在叶剑英的默许下，大开杀戒。在 1967 年 2 月 23 日，他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左派造反派 169 人，击伤数百人，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二二三惨案**”!

听到怀仁堂内外这种复杂形势的汇报后，毛泽东龙颜顿显愠色。在 2 月 18 日的一次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大发雷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惯于逢场作戏的他，指着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接着他危言耸听地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他越说越有气，言辞尖刻极端起来:“**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说罢，怒不可遏地甩袖而去。按康生的说法，“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此时，对中共大员心慈手软的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收拾残局，也不得不秉承“伟大领袖”的脾性严肃处置他的得力助手们。碰头会决定：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所谓“请假检讨”就是停职写检查，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称谓。（其实，在中共的词典里，这种词语同“黑帮”、“牛鬼蛇神”一样，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当权者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和好恶加以伸缩。因此，“请假

检讨”可以是停职反省写检查，也可以是监禁式隔离审查，如现行的“双规”，还可以是服刑坐牢，如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因被命令“请假检讨”后投入秦城监狱，一坐十五年。）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陈、谭、徐三人被严厉批判后从轻发落，暂时失掉了权力。他们下级就没有那么幸运：赵永夫被撤职，批斗后投进了监狱！

大闹**怀仁堂**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胜利、党内右派将领、元老们受挫而告终。

军队将帅、元老右派们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这种各有胜负但文革小组占了上风的对抗，激化并加速了权力结构的分裂。就在毛泽东“龙颜顿显愠色”后不久，下面还是发生了向毛示威的“二月镇反”和“二二三惨案”。

军队将帅、元老右派们受挫后，善弄权术的毛泽东，指令精英打手们于 1967 年 2 月 23 日和 2 月 24 日，先后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和文章：《**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明眼一看便知，这是毛泽东在玩弄软硬兼施的权术：在鞭打军队右派将帅和党内元老之后，及时向他们伸出橄榄枝加以抚慰。

*　　*　　*　　*　　*　　*　　*

本章结语：从十月进击、一月拼杀到二月角斗，上层权力的对抗和搏斗，使中国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导致亿万人挨批挨整，千万人致伤致残，两百到三百万人死于非命！

第 12 章 武力大夺权

12 章目录

一. 整合分裂 1、造反派的分裂 2. 警告右派 3. 支持左派

★二. “七二〇事件” 1. 毛到武汉 2. 武汉乱象 3. 毛的决定

4. 右派反抗 ★5. 毛夜半逃生 6. 左派反击 ★7. 武汉残局

★三. “八四指示” 1. 武装左派 2. 群众专政 3. 火烧英国代办处

★四. 挫败“清君侧” 1. 主动妥协 ★2. 抛出“王关戚” 3. 打倒“杨余傅”

一、整合分裂

1、造反派的分裂

任何革命都意味着分裂，现代文明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任何镇压都意味着分裂，现代文明需要的是**和谐**而不是镇压。毛泽东颠覆了“和而不同”的传统价值，实行血腥的革命和镇压，促成了国家和中共党的分裂，进而也促成了他夺权的工具红卫兵、造反派的分裂。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特别是听到了陈伯达竟然批判起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血统论”时，在“横扫”和破“四旧”中大显身手的贵族红卫兵们，突然发现大事不好。想当初，开始揪斗“三家村”和“彭罗陆杨”时，他们包括他们的老爹老娘，都没看透“伟大领袖”“层层剥笋”的战略战术，便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又打又闹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了起来，并充当了“横扫”和大破“四旧”的急先锋：用野蛮、残酷的手段，烤焦了“牛鬼蛇神”和“黑五类”。不成想，几个月后他们发现，他们的“红司令”的革命目标，不光是烧烤“牛鬼蛇神”和“黑五类”，还要烤焦他们的老爹、老娘、大伯、大叔等“走资派”，并要把他们同“牛鬼蛇神”、“黑五类”倒到一锅里“烩”。他们沮丧，他们悔恨，他们愤怒，于是，他们要造反。他们把“西纠”、“东纠”、“海纠”合在一块，于 1966 年 12 月初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以为有周伯伯的支持，就可以大胆放手、为所欲为。他们打、抄、烧、杀，把满腔怒火发泄到被他们“横扫”过几次的“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身上。他们见了“三司”司令蒯大富——这个揪刘少奇、斗“走资派”妄图“右派翻天”的急先锋，更是仇人碰面，分外眼红。1966 年 12 月 26 日，他们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讨伐毛左派的誓师大会。会场里群情激愤，不断高呼“打倒三司”口号，辱骂农民家庭出身的蒯司令是“右派翻天”。大会开到后半夜，放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电影里的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联动”成员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好一阵子疯狂。第二天，为了搭救他们的落难弟兄，

他们呼着“刘少奇万岁”、“油炸江青”和“火烧谢富治”的口号，向公安部冲去……但周恩来暂时没有保住他们；他们被毛泽东镇压了下去，头头悉数就擒入狱。

贵族红卫兵被取缔，大长了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在毛泽东的前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下，向党内右派政敌发动全面攻击，揪斗各级走资派。

毛泽东是“发动群众”的老手，但不是唯一老手。在毛泽东的长期指导下，党内左、中、右派大员们，也大都是“发动群众”的行家。因此，当贵族“联动”被取缔后，党内右派迅速利用平民红卫兵造反派政治上的幼稚和权力分配上的失衡，用“掺砂子”的策略来制造危机，在一派身上注入了党内右派的政治诉求，终使其分裂成势不两立的左、右两大派组织。

一派打着造反的旗帜，以帮助毛泽东夺权为己任，属激进派，是谓左派造反派；另一派也扛着造反大旗，以反夺权借以保护十七年的既得利益为己任，属保守派，是谓右派造反派，常被贬称为“保皇派”。实际上，两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仅仅是党内左、右两派**夺权和反夺权的工具和炮灰**！

如果说 1966 年是贵族红卫兵和平民红卫兵的分裂，那么，进入 1967 年，胜利的平民红卫兵迅速分裂为左、右两派造反派。如：南京的“好派”和“屁派”，重庆的“八一五”和“反到底”，武汉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河南的“十大总部”与“二七公社”，等等。这些造反派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高调宣称自己的组织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激烈攻击对方组织是名符其实的“保皇派”、“反革命派”；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造反派，他们今天组织示威游行，把异己当权派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明天召开声讨大会，把不愿表态支持他们的当权派拉到大会上，进行“坐喷气式飞机”、戴高帽式的批斗；为了证明自己造反“响当当”，他们相互指责，叫骂，拳脚“辩论”，冷兵器较量，热兵器战斗，等等。实际上，他们都已变成中共党内左、中、右派权力斗争的打手和炮灰，**都是“保皇派”，区别仅仅是各保其“皇”而已。**

在左、右派造反组织里，主要是左派造反派中，隐藏着一些民主组织和成员，他们对中共专制体制不满，有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民主诉求。但他们不敢公开地、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他们的诉求，只能打着毛左派的旗帜，提出一些毛左派暂时还能容忍的诉求，並且把这些诉求“策略”地隐蔽在批判刘、邓右派的洪流里。在平反问题上，他们只敢依照毛左派划定的界限提出一些平反要求，如要求给被刘、邓工作组打成反

革命分子的平反和要求给在刘少奇主导的“四清”中挨整者平反等；但他们却回避了毛泽东主导的历次“群众运动”及其运动的血腥，并与其运动的受难者划清界线。在经济上，农民工、临时工、集体工等组织和成员，提出了与国营工待遇平等的经济要求；但他们却不敢触及造成这种森严等级制的原因，因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等级制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主导的三大改造和把农民贬为二等公民的户口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造反组织里也出现了民主改革的呼声。如湖南“风雷”的造反派负责人杨曦光，他代表他们的造反组织，书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提出了仿效“巴黎公社”民主选举原则组建“中华公社”的民主政治诉求。

在中共极权压抑下，在平民阶层中出现代表他们利益的民主人士是必然的；在中共党内外左、右两派夺权混战中，这些民主精英借机提出些民主诉求也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产生的民主诉求，在毛式“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不过是一股涓涓细流而已。面对这股不成气候的涓涓细流，有人却提出了个“民主文革”的命题。显然这是脱离现实的幼稚想法。马克思倡导的“巴黎公社”民主选举原则，不仅马、恩、列、斯没有打算实行、毛泽东拒绝实行，正在困难中搏斗的党内右派更难容忍。全国“转复军”、“红旗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聋人造反总部”、 “军垦造反团”等有民主诉求的造反组织，先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19 岁的杨曦光被判 10 年重刑，毛泽东死后，右派政变成功，平民出身的左派造反派的头头们都被科以重刑，等等，都是中共左、中、右派共同镇压民主的结果。

在左、右两种造反派间，还夹着一个中间派，时称“逍遥派”或“不革命派”。在文革中，“不革命”离“反革命”仅一步之遥，因而有人把“不革命”等同于“反革命”。因此，“逍遥派”並不逍遥：他们人员众多而势单力薄，大多数属平民阶层，他们对刘、邓右派不抱希望，对毛左派更加反感；由于没有成形的组织来保护他们，使他们有时不得不跟在左、右两派造反派后面，为他人摇旗壮势，呐喊助威。

随着“全国全面内战”的展开，毛泽东发现：在党内右派当权派的暗中支持下，以党员、团员、干部、干部子弟、老工人、老劳模、老先进和老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右派造反派组织，迅速扩大，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干着保护右派当权派、打击左派当权派的勾当，并以压倒的优势，使左派造反派变成少数派，处于遭受打压的境地。同时，毛泽东还听到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民众民主呼声，更难容忍党内右派当权派的党内民主诉求，尽管策略上他可以暂时有限度的容忍这些诉求和呼声。显然，局势即将失控，毛泽东惴惴不安。

为了利用左派造反派造反，镇压右派和民众的民主呼声，毛泽东断然

采取两条对应措施，做出了发布《公安六条》和“三支两军”的决定。

2、警告右派、实行铁笼子内的民主

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根据毛泽东御旨，发布镇压党内外民主诉求的《公安六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1967.01.13,中发〔67〕19 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从《公安六条》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划定了严格界限：只准把矛头对准他的政敌及其支持者，不准把矛头对准他和他的亲信；任何批斗他的政敌以及支持者的言行，都是革命的，任何攻击他和他的亲信，“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对于平民百姓的造反组织和个人，他们的民主诉求，就是“利用大民主”“散布反动言论”，交“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对于“地富反坏右”等处于社会最低层、濒危于生存边缘的弱势人群，仍是十七年来执行的老政策——“不许乱说乱动”。显然，毛泽东的“大民主”，是在铁笼子内实行的民主。

由此可见，人民享有所谓的“大民主”，仅仅是“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的义务和批判“走资派”、“资反路线”的权利。显然，《公安六条》是坚守独裁、扼杀民主呼声的宣言，是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颠覆。三十年后，曾为虎作伥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竟说什么《公安六条》是个**“一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力**（利）”的文件。这位一心“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王力，临终前还固守着他作为“毛泽东打手”时的那种专政思维。今天，那些毛式“大民主”颂扬者，那些“民主文革”的立论者，看了《公安六条》，看了王力在《反思录》“中对《公安六条》的所谓“反思”，不知有何感慨！

3、支持左派，右派逢春

尽管在《公安六条》中，毛泽东已向党、政、军中的右派当权派发出了不准镇压左派造反派的严重警告，但他还放心不下，迅即做出了派军队支持左派造反派(红卫兵)即“支左”的决定。

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文件下达刚满五个月，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引用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并说：**“……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人民解放军……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 3 月 19 日，中共又将军队“支左”任务发展成**“三支两军”**，即**支左**（支持左派造反派）、**支工**（支援工

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据报导，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官兵，有二百八十多万名。

中共军队的将领同党政机关当权派一样，都是党内左、中、右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将领同各地党政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人都是老战友、老同事、老上级或老部下，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共军队又是个多个山头的军队，当彭德怀、邓小平、贺龙被打倒、陈毅靠边之后，原一野、二野和三野的将领惶恐不安,生怕“剝笋”剥到他的身上，被打成“军内一小撮”，尽管十七年间，山头势力已有所变化。面对胡批乱斗的混乱局面，以林彪为首的左派将领蠢蠢欲动，支持左派造反派揪斗党、政、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力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扩大自己权力和利益。他们支持李作鹏中将夺了海军大权，支持余立金中将主导了空军大权，支持黄志勇中将夺了装甲兵的权，等等。与左派将领相反，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为首的中、右派将领们，对造反早已反感，特别是左派造反派的行动，使他们不仅在精神上同情党政右派当权派，而且行动上也和他们站到一起，支持他们所支持的右派造反派，力图在文化大革命中维护住自己权力和利益。例如，武汉军区一位右派副司令就公开叫骂：**“造反,造反,造到老子的头上来了。不管你几十万,老子一个命令叫你解散**!”现在毛泽东要他们“支左”，正中他们的下怀。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左派将领的默许下，有了后台的左派造反派便有恃无恐，大胆地揪斗右派当权派，攻击右派造反派组织，冲击支持右派造反派的“支左”的军事部门，甚至大胆冲入军队戒备森严的营房军械库里去抢枪枝、抢弹药。右派造反派也不示弱，在他们后台支持下，效法左派造反派，攻击对立的左派造反派组织，揪斗左派当权派和抢夺枪支。

由于党、政、军内左、中、右派当权派和将领们的支持，各地接连不断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武器事件。为了控制局面，毛泽东再次裸露他的杀气。1967 年 2 月上旬，他在一份文件上做了“可以开枪”的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林彪将毛的“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转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曾大闹京西宾馆的叶帅，本来对毛的打手中央文革一肚子不满，见批示如获至宝，很快在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

谁是右派？谁是左派？什么样的派是“响当当的左派”？什么样的派是“顽固不化的保皇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和他的打手们，对刘、邓为首的政敌提出了许多罪名，诸如什么“牛鬼蛇神”、“黑帮”、“修

正主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但由于这些罪名概念模糊，意义混淆，没有明确的界限，谁也说不清它的真实含义，因而就为军队中的左、中、右派“支左”干部各取所需提供了不同选择的条件。尽管他们的选择不会一致，甚至相反，但有一点是清晰的：任何民主诉求都是反革命。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人们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是非”界限：只要紧跟他，只要没有民主诉求，即使搞过“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反之，如果紧跟刘、邓，或不能“反戈一击”，或同情刘、邓，即便没有民主诉求、沒有搞过“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的“是非”标准，这就是左派与右派或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因而当时盛传：“跟对人，就是跟对了线”。

对毛泽东这种以人划线充满了权力斗争色彩的做法，除少数左派将领外，占军队主流的中、右派将领们并不认同，甚至反感。但由惮于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他们也只好被动服从。但胆大者大有人在。如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他在叶帅有意纵容下，便认定自己支持的右派造反派是真正的“左派”造反派，认定中央文革支持的左派造反派是“右派”，在一次冲突中，他借口“开枪自卫”，公开挑衅中央文革，下令向“右派”开枪，结果造成了死 173 人，伤 224 人的“二二八惨案”！可怜满腔激情的学生、百姓们，成了毛左派的炮灰。

不惟如此，在新疆、重庆、湖北、四川、浙江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多起军队镇压造反派事件。全国夺权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左派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和左派将领的怂恿、纵容和公开的支持下，虽然能够打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来武装自己，但往往遭到右派将领“理直气壮”地镇压；右派造反派在右派将领们或明或暗的怂恿、纵容下，也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旗号下，得了大量武器，其数量远远超过左派造反派抢来的。如，广西省军区一次向右派造反派发枪 1,500 支。在左、右两派将领的支持下，“支左”使毛倡导的“四大民主”完全变质：从拳脚相加的“鸣放”，迅速升级为刀枪染红的“辩论”，两派怒目相视，冲突不断，**武斗**炮声震天，遍地硝烟，全国陷入毛泽东号召的“**全面内战**”之中。显然，“支左”已使军队走向分裂的边缘。

对此，7 月 28 日毛泽东赞扬道：“**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在他的授意下，7 月 22 日，江青向郑州左派造反派“二七公社”发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要他们以武力击败右派造反派“十大总部”。尽管毛已发现，许多将领“支右”不“支左”，但他坚持

认为，他能在内战中取胜，因而继续保持战略进攻态势。因为，他了解他们，稍施计谋，便可“为我所用”。

值得一提的是，恣意发动内战以击败对手的毛泽东，流痞的本性使他不愿把刽子手、杀人犯的罪名留给后世，因而，他在裸暴狰狞兽面的同时，适时展出了“替历史负责”的“佛面”：在武斗正酣时，他假惺惺地发表制止武斗的《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两个通告，以期达到推卸发动内战责任的目的。有人说，这两个通告等于要**为婊子树牌坊**，要为**刽子手树“伟光正”的纪念碑**。这话不无道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两个通告非但不能制止流血，甚至还有火上浇油之嫌。

恣意发动内战以击败对手的毛泽东，对军队忤慢行径早有戒备。善弄权术的他，对军队将领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说军队内有“一小撮”野心家、“走资派”，甚至还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无情拷打、处死一些将领，如彭德怀、贺龙、许光达、陶勇等，严厉警告将领们不得三心二意，要紧跟着他，另一方面，又给他们以信任，赞誉他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委以“支左”的重任，要他们在“支左”中“立新功”，并不急于给“支右”者“剝笋”。

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与党政机关右派当权派命运息息相关的军内中、右派将领们，对最高统帅“层层剝笋”的谋划已有戒心，他们已无“立新功”的打算，只有躲避“剝笋”的警觉。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对抗毛泽东的方针：以乱制乱。他们同各级党政右派当权派联合在一起，公开打着“支左”的旗号，暗里干起了“支右”的勾当。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与天才毛泽东的预谋相反，“支左”决定下达后，局势迅即恶化。

据报导：

1967 年 1 月 25 日至 26 日，新疆石河子地区对立的左、右派造反派双方发生激烈枪战，造成 24 人死亡，74 人受伤；

2 月 21 日到 24 日，武汉军区动用数十个连的兵力，向军事院校造反派采取行动，四天中摧毁和解散造反组织 24 个，逮捕造反派主要领导 175 人，宣布行政管制 43 人，被迫自杀 2 人；

5 月 1 日，黑龙江省鸡西市“红联总”、“三司”两派造反派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 9 人死亡，44 人重伤；

5 月 14 日，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讲话中透露：北京从 4 月 30 日到 5 月 10 日，武斗出动人数达 63,500 多，其中发生 50 人以上参加的武斗 133 次。对于伤亡人数，他隐瞒不报；

5 月 29 日，杭州对立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6 人被枪杀，150 人受伤；

6 月 4 日到 8 日，重庆由驻军支持的右派“八一兵团”，袭击、围攻左派西南师大“八一三”造反派，双方发生武斗，参加武斗人数多达 2 万，死伤上千，其中死亡百人以上。

随着毛泽东对右派镇压的加剧，右派反抗愈加激烈，左、右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共党内左、中、右派势力支持下，左、右两派造反派的力量互有消长，但天平逐渐倒向右派一边。于是，对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影响从而改变党内权力斗争形势的“七二〇事件”，在武汉发生了。

二、“七二〇事件”

1、毛到武汉

善于运筹内战的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拟定了乱中夺权的计划。他认为，乱可以打破秩序，从而打破刘、邓长期构建起来的权力结构。1966 年 7 月 8 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 8 月 2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到 1966 年年底，面对右派越来越激烈反抗，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反抗，善于从“敌我力量对比变化”中决策的毛泽东，决心把“**乱中取胜**”变为“内战中取胜”。12 月 26 日，在他的生日宴上，他向亲随宠臣们举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在 1967 年 4 月军委扩大会上，他再次公开号召打内战。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 5 月 16 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5 月 25 日，他对全面内战大加赞赏说：“**北京也在分裂成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 月 13 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会议上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全国全面内战”终于被毛泽东煽动了起来，其中武汉尤甚！

1967 年 7 月 14 日晚，胸怀“内战中取胜”自信的毛泽东，乘他的专列来到了武汉。先期于上午到达武汉的周恩来，将他接入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奉命到达武汉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大员，同随同毛泽东前来的

大员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等和随同周恩来前来的李作鹏等，分别住进了东湖宾舘百花一号和百花二号。

一年前的武汉，毛泽东曾在这里出尽了风头：他兴致勃勃地畅游长江，五千人伴游，十万人立岸欢呼，气势磅礴，巍巍壮观，令人叹为观止。一年后的武汉，已今非昔比。在他的**“全面内战”**的煽动下，大武汉已变成了大武斗天下：由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工造总司”等左派造反派和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右派造反派，两军对垒，武斗频发，不可调和。此行之前，毛泽东已经有了“内战中取胜”腹案：**大联合夺权——夺取刘、邓右派集团的权力**。为此，他修改了“全面内战”的方针，鼓励大联合。他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亲自解决两派纷争，促进两派联合，为全国各地“内战中取胜”——大联合夺权，树立一个样板。

2、武汉混战

天才的毛泽东低估了武汉形势，错估了他的臣民的精神状态。

当北京的将帅元老同中央文革成员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里唇枪舌战的时候，以司令陈再道上将为首的武汉军区，于 1967 年 2 月 18 日发表《严正声明》，谴责造反派的“二八声明”是毒草，因为他们在声明里主张**“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严正声明》促使造反派分裂：一派主“乱”，认为“二八声明”是“香花”，是谓左派；另一派主“稳”，认为“二八声明”是“毒草”，是谓右派。武汉军区以“稳定军队”为借口，从 2 月 21 日到 2 月 24 日，动用数十个连的兵力“支右”，向军事院校左派造反派采取行动，四天中摧毁和解散左派造反组织 24 个，逮捕左派造反派主要领导 175 人，宣布行政管制 43 人，被迫自杀 2 人。1967 年 3 月 17 日，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联手，宣布解散武汉最早、号称拥有 48 万成员的左派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并逮捕了以**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大小头头 485 人。

武汉军区对左派造反派的镇压行动，使中央文革非常恼火。他们一方面在 4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向武汉军区施压，一方面鼓励受压的左派造反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以“三钢”、“三新”为首的支持“工人总部”的左派造反派，喊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他们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释放被捕人员的要求，为此，他们组织上万名学生静坐示威，强化了对军区的冲击。

为了对付中央文革和左派造反派，武汉军区打着“支左”的旗号，被他们坚定支持的右派造反派——号称拥有130万成员的“百万雄师”，于5日16日正式成立。以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百万雄师”成员，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基层的市民：有工人、贫下中农，有待遇较好的国营工厂的工人，有收入相对稳定的基层干部，他们都是中共基层政权的依靠力量，是精神上有优越感的组群，都属于“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同生活艰辛的集体工、临时工和一般贫苦市民，比较起来,相对富裕得多，政治地位也相对优越得多。以出身好、成员纯的“百万雄师”，是名符其实的右派；但他们一成立，便打着“左派”的旗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成份混杂的以贫苦老百姓和学生为基础力量的左派造反派。他们骂左派造反派是牛鬼蛇神，是“老右翻天”，放言：**“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在武汉军区、驻军独立师、29师和各级人武部的支持下，“百万雄师”的“铁帚”扫向左派造反派：“谁替工总翻案，谁就是反革命”。左、右造反派矛盾迅速激化。在武汉5～7月里，由“百万雄师”挑起的大小规模的武斗数十起，造成数千人伤亡。其中：

6月17日，双方数千人马在汉口六渡桥处发生武斗。据不完全统计，死100多人，重伤300多人。6月24日，在汉口大智路，“百万雄师”调动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7,800多名武斗人员，向左派“工造总司”占据的武汉市文化局大楼进攻。以中共党员、团员为主的复员军人敢死队，冲进大楼，当场打死28人。其中，广播员**朱庆芳**，是个16岁的小姑娘，看见冲进来的敢死队队员，吓得跪地向“叔叔们”、“大哥们”求饶，却被残忍地活活打死。

武汉连续发生的大规模镇压左派造反派的武斗,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同中央军委一起，在6月26日向武汉军区发电责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对此，陈再道指责该电**“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拟定的”**。经过半个月的酝酿，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对“626来电”做出了回答。会议认为：**“军区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陈司令的“回答”，公然对抗中央文革。

3、毛的决定

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听取了汇报后，当即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1、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解散“工总”是错误的，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2、“工总”、“三司”、“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3、“百万雄师”是右派保守组织，但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据记载，支持中央文革的“三条方针”是 18 日敲定的。但实际上，在毛来武汉之前已经形成：**“走，去武汉保陈再道。”**毛来武汉前说的这句反话，就足以证明。

解决方针交给了周恩来等人去执行。15 日，毛泽东派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会同军区领导人，反复去江边踏勘和筹办游泳事宜，打算在 16 日纪念畅游长江一周年之际，再次畅游，再掀一次崇拜高潮。由于“百万雄师”在 15 日提前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游行中与左派造反派发生冲突，打死了几个人，酿成了“七一五惨案”。消息传来，畅游计划告吹！

7 月 15～18 日，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召集并主持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18 日，根据毛泽东业已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周恩来会议讲话中以“建议”的口吻命令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之前的 17 日晚上，周恩来已单独向陈再道、钟汉华传达毛的三条方针，劝他俩做好工作，争取主动。陈再道当时表示想不通。他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尽管如此，7 月 19 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在恭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的同时，都被迫在会上做了检查。

4、右派反抗——王力历险

陈再道说“我做不通”是实话。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后，部队里出现了动乱。

18 日的扩大会议一结束，负责在武汉市“支左”工作的独立师**蔡炳臣**政委，怒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当天夜里，独立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

蔡政委在传达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怀龙**师长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第二天牛师长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拍桌子，摔椅子，大叫“**拼了**”。

在牛、蔡师首长的感染下，独立师的战士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王力的“四点指示”。

其实，本没有什么王力的“四点指示”，那是周恩来在传达毛的“三条方针”时，将第一条方针分解成“检讨”和“平反”两部分，因而使毛的“三条方针”变成了他的“四点建议”。由于王力权大气粗，言语蛮横，蔑视武汉军区，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批评军区领导时说：“**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蔡炳臣政委在传达扩大会议精神时，蓄意张冠李戴，将体现“三条方针”的周恩来“四点建议”，说成王力的“四点指示”。于是，以讹传讹，周的“四点建议”变成了王力“四点指示”。

军区负责人要独立师领导做战士工作。一个副师长和一个副政委来到军区大院“做工作”时，对战士们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吧**。”

午夜，独立师六台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炳臣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对此,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政委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炳臣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是夜，六部宣传车大喊大叫着批驳“四点指示”，半个夜晚跑遍了武汉三镇。

19 日晚，要为“工总”翻案的消息传到 370 医院后，驻院军人连打三次电话问独立师师部。当师部回电证实后，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许多人大喊大叫：**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

处在武汉“支左”第一线的独立师，已经走到了“兵变”的边缘。

本来“百万雄师”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三条方针极为不满，因知道是“最高指示”，便强压怒火，也不敢挑战周恩来和谢富治。19 日，王力在武汉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批评军区领导时说：**“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接着，王力又在水利学院对左派“三钢”大加赞扬：“(武汉问题)**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消息飞快传了出去，“百万雄师”终于找到了替罪羊，把满腔怒火齐向王力发泄。

武汉街头贴出了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笔者:“谭氏”指“血统论”鼓吹者谭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 3,200 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独立师、29 师的一些干部战士，高呼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当天晚上，军区大院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有“支左”军车和“百万雄师”车辆 273 辆，“支左”军人、“百万雄师”和看热闹的市民有 13,000 多人。他们继续要求谢、王接见，并扬言要与王力辩论“四条指示”。

“百万雄师”的核心领导，已经被告知，“三条方针”是毛泽东确定的，而这个“巨无霸”现就在东湖宾馆里。他们没有精明政治家的远见，愚蠢地决定采取类清君侧行动，揪斗王力，向毛泽东示威，压他改变方针。他们一方面向下隐瞒毛在东湖的信息，一方面同“支左”军人联手，迅速成了“专揪王力指挥部”。到夜半时分，东湖四周都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控制起来，使毛泽东、王力等成了瓮中之鳖。

在毛泽东亲自督导下，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终于在他的眼皮下暴发了。

7 月 20 日凌晨，武汉独立师的六辆卡车，装载数十名独立师和 29 师的全副武装的军人急驶，后面跟着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的卡车，车上装满手持长矛的造反队员，他们要去东湖造王力的反。他们封锁北门，冲进西大门，解除了哨兵武装，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找到了谢富治和王力。他们质问谢、王，为什么把“百万雄师”

打成保守组织？打成反革命？他们用冲锋枪枪口对准谢、王，威胁他们，要他们宣布“百万雄师”是革命派。他们在草坪上，把前来解围的他们的司令陈再道，打翻在地，骂他是“投降派”。在同谢、王辩论中，愤怒的造反派依照“专揪”计划，将王力绑架上车，掳劫到军区。

历史值得遗憾的是，陈再道不过一介武夫，他错过了取而代之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机！

7 月 20 日上午九时，开始批斗王力。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此起彼伏，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将反剪着双手的王力推到阳台上示众。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造反派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当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时，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时，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这种顶牛式的回答，激起更加愤怒的呼声，有人喊出了“王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批斗中，王力遭到了围攻殴打，脚踝骨折，还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

与围攻王力的同时，“百万雄师”向毛泽东示威的大游行开始。据统计，大游行各种汽车有 396 辆，其中，消防车 27 辆，空军军车 15 辆，打 8201（独立师）、8216（29 师）旗帜的车 83 辆，用载重卡车改焊成装甲车 10 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有的军人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左派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

与此同时，独立师散发了“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

“百万雄师”也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 8201 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

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由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公然挑战毛泽东，武汉军区领导层十分害拍。政委**钟汉华**和副司令**叶明、孔庆德**等人来到大院内，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愤怒的造反派和军人根本不听。面对事态，钟汉华大声喊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可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呀**！”他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位“百万雄师”造反派愤怒地指责他说：“钟政委，你太不像话了。”

后来还是副司令孔庆德急中生智，使事件发生了逆转。他与 29 师政委**张昭剑**咬了一阵子耳朵后，促使支持“百万雄师”的张昭剑临阵倒戈，调 29 师两个连的兵力，与军区警卫营密切配合，利用吃饭的机会，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转移到 29 师师部的六号楼，当晚，又利用夜幕将王力秘密转移到西山，脱离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控制区。

5、**毛泽东夜半逃生**

瓮中的毛泽东，已成了惊弓之鸟。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急促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这里！”惊魂未定的毛泽东，又被“咣当”推开的门声吓了一跳。警卫员**小高**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

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学张学良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

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在惊涛骇浪中数十年的毛泽东，很快冷静了下来。他要小高要通**刘丰**的电话。

电话很快要通了。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等待什么！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恨恨地吸了一口烟，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乘着夜幕和树丛、花丛的掩护，急步向后院走去。

当穿越一段草丛时，毛泽东“哎哟”了一声。杨代总长弯腰一看，发现领袖没穿鞋子，一双拖鞋被荆棘扎透了。他慌忙把自己鞋子脱下来，给

领袖穿上，自己穿上领袖那双拖鞋，慌乱中忘记了检查领袖脚上是否有伤口。不过，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满意地笑着说：“**难为你了**。”过后，每当代总长想起那段疏忽事，内心好生不安，但当想到“难为你了”那句话后，心地又轻松得多了。

三个人急匆匆地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又翻过了一个斜坡，来到了东湖后门。所幸那里无人把守。

小高拧开了“将军锁”，打开后门，他们纵步来到停在沙滩上刘丰为领袖准备的轿车旁。毛泽东突然仰天笑道：“**陈再道一头蠢驴。在后门放上一个班，我们就难以走脱。真乃天助我也！**”说罢，钻入轿车，飞也似地奔向戒备森严的专列。

专列虽然戒备森严，但在动乱的武汉极不安全。众人劝他迅速离开武汉，正合他的打算。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国内旅行从不坐飞机的毛泽东，向代总长下达命令。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善于巧设疑兵的领袖说：“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半途，他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了汽车，直奔飞机，命令道：“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的确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从汽车上下来，朝飞机走过来。

杨成武说：“你们看见了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惊讶不已的战士们立刻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毛泽东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这时，毛泽东才示意杨成武告诉机长：“去上海！”

21 日上午 11 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6、左派反击

1967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在谈到武汉问题时，发出了“最高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这种左右逢源、始终主动的话语权，是毛泽东独自享有的。但对这种“左右逢源”的“最高指示”，大员们是心领神会的。

7 月 22 日，下午两点多，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到了北京。领会了最新“最高指示”的北京大员们，组织了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谢、王、李等英雄们。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先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向武汉军区示威。

当晚，林彪主持紧急会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历史表明，21 日下午，包围武汉的军事部署已经开始：会议期间，25 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火速向武汉开进；15 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已运动到距武汉四、五十公里的黄陂；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已先达汉口口岸待命……

22 日凌晨，在最新“最高指示”前，中央文革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组织“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的肇事者。同时胁迫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余将领于 23 日飞抵北京，参加“学习班”。在京西宾馆，陈、钟遭到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斗。

24 日，空 15 军的多支队伍，开进武汉市，迅速部属到指定位置。25

军也到达要地，东海舰队 30 多艘舰艇也先后云集到武汉。“支右”的独立师，被调出武汉整训。

25 日，毛左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回京，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都出席了大会。

当天，在武汉，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呼着“打倒陈再道”、“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口号，向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示威。

26 日，业已瘫痪了的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指出：一、“七二〇事件”是严重政治事件；二、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三、立即给“工人总部”平反，向朱洪霞、胡厚民等赔礼道歉，并恢复名誉；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7 月 26 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罪行。空军司令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便领着刘丰等将领冲了进去，抓掉陈、钟等五个人的领章、帽徽，进行拳打脚踢，把陈放倒在地。据说，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对此“很有意见”。在另一次批斗会上，目击者写道：**“陈再道下午就尝到了三军造反派的厉害，今天一上台就吓得手脚不灵，浑身冒冷汗，站在那里活像一堆没了筋骨的死肉。”**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令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指控为“黑后台”。同时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提升“七二〇事件”功臣武空副政委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自 1967 年 7 月 26 日到 8 月 2 日的一个星期里，《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主要喉舌，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抨击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把**“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的“精神实质”推向高潮。这些社论、报导是：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北京支持你们!》

《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玩火者必自焚》

《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新的考验》

《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在左派反击中，许多落井下石之徒沓沓亮相，纷纷“反戈一击”：

8 月 17 日，扮演“支右”脚色的独立师，以左派姿态发表了《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七二〇”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的调查报告，表示效忠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10 月 28 日，曾大肆镇压左派造反派的“百万雄师”打手们，摇身变成左派“公安联司”，也以左派姿态发表了《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文章，揭露“百万雄师”的罪恶活动，等等。

1967 年 7 月 27 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土崩瓦解，尽管他们在 24 日做最后挣扎：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在高呼“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的同时，继续狂呼“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历史清楚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从 7 月 14 日到 21 日的 7 天里，毛泽东不但没有树立起一个大联合夺权的样板，反而鼓动仇恨，加剧冲突，使武斗规模更大，更加血腥！

7、武汉惨局

同全国左派造反派一样，他们的头头大多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平民出身。“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们过着无权无保障的贫民生活，他们对中共官僚特权阶级深恶痛绝，因而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成了他们的渴求，也成了他们造反力量的渊源。但在十七年中，他们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想的熏陶下，“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如过眼云烟，已丧失殆尽。他们从贵族红卫兵、右派造反派那里，看到人类兽性张扬的价值。因此，当他们被套到造反战车上时，他们便走到了他们渴求的反面，用你死我活回敬对方，在冲锋陷阵中，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同北京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一样，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个卒子，他们看不见中共党内左、中、右派之间的冲突，**只是权力再分配上的较量，没有根本利害上的冲突**，无论那一派都是官僚特权阶级，而毛泽东则是这个特权阶级的总代表。因此，当“卒”子“过河”后，他们会发现，一旦左派把右派打倒，或不得已与右派成功妥协，他们的价值转瞬即逝，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他们这些“过河卒子”。那时，后悔晚矣！

“七二〇事件”后，左派造反派胜利了；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好一阵子得意，好一阵子疯狂！得意中，他们趾高气扬地目空一切；疯狂中，他们清剿残余“百匪”，残忍地报复杀人，主动或积极协同军方追捕逃亡的“百匪”头目，等等。据湖北省委统计，“七二〇事件”之后，在“清剿”与反“清剿”的战斗中：全省被打伤、打死的人高达 18.4 万；在武汉，打伤、打残者高达 6.6 万人，打死 600 多人；其中，多数是曾经不可一世过的又被骂为“百匪”的“百万雄师”成员。——这就是毛泽东来武汉树立大联合样板的成果！

左派造反派的出身背景形成的思想意识，证明他们不是中共的同路人。他们在革委会中得意了不到两年，因看不惯中共特权阶级的专横跋扈，打起了“反复旧”的旗帜，与新贵们对抗。很快，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中纷纷落马，右派政变成功后，他们的头头如**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等被追判重刑，其中曾诵诗铭志“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的“工总”头头**胡厚民**，因“顽固不化”，拒绝认罪，被科以 20 年重刑，九十年代死于狱中。

左派造反派没有右派造反派幸运。右派宫廷政变成功后，湖北省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研究后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于是，曾在 1967 年 7 月 18 日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1978 年 11 月 26 日被邓小平彻底平反（图 12-1）。“百万雄师”平反后，他的一号

头目**俞文斌**，这个曾组织过数十次武斗，造成数万人伤亡的罪孽深重、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文革中虽坐狱四年（据说他曾亲手射杀过多人），文革后却得到补偿：他先后荣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等要职。



图 12-1：邓小平为“百万雄师”平反

“七二〇事件”的制造者呢？支持武汉左派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四人帮”，同与事件没有太大关系的林彪一起，被推上了镇压“百万雄师”的被告席；而另一个事件制造者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则在被撤职而“委屈”了几年后，又返回了大军区领导的任上。当年大肆批判“百万雄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呢？他们摇身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成了“百万雄师”赞扬者，没有丝毫知耻负疚的表示。

“七二〇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和现场导演毛泽东呢？在中共党内右派掌权后，林彪、“四人帮”成了他的替罪羊，他本人则在右派蓄意掩盖下，仍旧是那样“伟大、光荣、正确”！

三、分裂军队挑动武斗的“八四指示”

“七二〇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由于右派军方和地方右派当权派的联合支持，右派造反派很快形成了对左派造反派的压倒优势，武汉拥有 130 万之众的“百万雄师”，以数倍的“兵力”压倒了以“三钢”、“三新”为首的左派造反派，郑州十多万人的“十大总部”，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区区数千人的左派“二七公社”，等等，就是这种党、政、军内右派联合支持的结果。因此，全国各地左派造反派，纷纷向中央文革告急，尽管“百万雄师”在中央巨大压力下已土崩瓦解。

军队“支右”举动，使善弄权术的毛泽东大失所望。为了不使夺权斗争毁于右派将领之手，毛泽东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做出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两项重大决定。

1967 年 8 月 4 号，穷兵黩武的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下达了**“应大量武装左派”**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高指示”。史称**“八四指示”**。这封信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宣读并交付执行。在毛泽东看来，“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相辅相成，都是制约党、政、军内右派当权派专政的手段：不把专政权力交给他的“群众”，“武装左派”会变成“武装右派”，“走资派”就会专“群

众”的政；没有“武装左派”，右派就会当道，“群众专政”就是一句空话。上海“武装左派”工人和学生，确保了左派政权的稳固；北京“红八月”里的喋血，鼓舞了各路红卫兵“横扫”、破“四旧”的士气，就是“群众专政”的典范。

1、武装左派——鼓动抢枪

早在“八四指示”前，毛泽东已做出了武装左派的决定，并在高层传开。7 月 18 日，他在东湖梅岭一号对周、谢、王等近臣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他还夸“钢工总”工事修得好，表示要去看看。——这就是后来称谓的**“七一八讲话”**。当获悉毛泽东“武装左派”的谈话后，7 月 22 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便提出了**“文攻武卫”**口号，号召左派造反派武装自卫。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8 月 11 日，在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时，他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有人说，“武装左派”的左派，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谁是左派？谁是右派？由谁来界定？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毛泽东喜欢政策的模糊性**。模糊性使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有了广阔的游刃空间：左或右均可按“政治需要”和“个人好恶”来界定，而且能使界定达到左右逢源、横竖是理的境界。这是毛泽东的重要统治权术之一。

在毛的“七一八讲话”特别是**“应大量武装左派”**的“八四指示”在上层传达后，“支左”部队向造反派发枪和造反派主动夺枪事件，相继在多地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并很快形成了抢劫武器运动；冲击军事机关、抢掠武器库事件也从武汉、北京向全国蔓延，各地左、右造反派纷纷加入了抢劫武器行列。

8 月初，林彪感到事态严重，有些坐不住了，他要下文严禁群众组织抢夺军队的枪枝，但毛泽东否决了他的计划。8 月 5 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的计划批示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显然，他支持夺枪；一句话打消了林的计划。这就是后来所称谓的**“八五批示”**。

8 月 1 日，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发表了。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的社论，再次强调了毛泽东“武装左派”和“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向军内右派将领发起猛烈攻击。

从“七一八讲话”到“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人们看到了一条分裂军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决心要与他“亲自缔造和指挥”的军队分道扬

镳！

但形势並没有完全按毛的意志发展，毛的乱军的谋图受到了强烈的对抗。“八四指示”后，各地右派造反派从中汲取教训，在各地右派将领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他们也像左派那样，疯狂地抢夺枪枝弹药，胆大到敢于把支援友邦越南的“抗美援越”军用列车洗劫一空。很快，他们不仅在人数上而且武器装备上，都对左派造反派构成优势，成了各地武斗主要挑起者。这样，右派将领们成功地将“支左”变成了“支右”。

据曾担任过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道远**回忆：“1967 年《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出来后，还发来文件，有‘武装左派’的精神。我和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几个人去找时任 15 军政治部主任**康星火**，要求发枪。**第二天他们就答复说，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但是群众组织很多，单给你们发枪其它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我马上召集会议，决定由武大、武测和武工三校学生去，守卫排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派了几个人开门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开进去了，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他还说：“武汉警备区部队派了很多校枪的、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还打过靶，此事还在《解放军报》上登过。”

据不完全披露，在毛泽东“七一八讲话”后的一个多月中，发生了数十起抢劫武器事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在**浙江**，7 月 21 日，温州军分区所属的 6515 部队 6 分队、防化连及军械库的武器，遭两大派组织抢劫。被抢武器中，除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外，还有 60 炮、82 炮、122 榴弹炮等重武器。8 月 5 日，受驻浙江 20 军支持的右派造反派“省联总”头头**张永生**等人，组织千余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骗开大门，强行砸开仓库，将 1,000 多件枪械和价值约 40 万元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9 日，张永生再次组织上千人，抢走省军区军械一库的汽车及子弹几百万发，手榴弹万余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记载，5 日和 9 日，两次共抢劫走长短枪 1,900 余支，轻重机枪 523 挺，炮 40 门，子弹 120 万余发，手榴弹 1.69 万余枚。

在**四川**，7 月下旬以后，泸县武装部的武器库就被造反派抢劫 21 次，被抢步枪 2,481 支，轻机枪 115 挺，重机枪 12 挺，手榴弹 115 枚，各种炮 72 门，子弹 28.4 万多发。8 月下旬，重庆市北碚地区造反派武斗人员 2,000 余人，冲进 404 团营区，抢走枪支 3,000 支，轻重机枪 49 挺，炮 16 门，枪弹 16 万发，手榴弹 8,000 枚，打死指战员 2 人，抓走 18 人。

在**广东**，广州两派造反派在抢劫武器上都大显身手。8 月 5 日深夜，他们冲进已实行军管的市公安局，捆绑起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砸开武器仓库大门，抢走各类枪支 1,850 支，子弹数万发；8 月 8 日晚，他们将广州市郊区金鸡岭枪械库洗劫一空；8 月 9 日，他们冲击广州市军管会，又抢去一批枪支弹药；8 月 10～12 日，广州警备区机关先后遭受造反派 8 次冲击，抢走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

在**吉林**，8 月 11 日，造反派“长春公社”，袭击了长春市英俊区武装部和长春拖拉机厂武装部，抢走大量武器；8 月 13 日，他们又联合长春军事院校数千人袭击了第 5 坦克学校军械库，抢劫走了大量枪支弹药，其中有机枪 120 挺，高射机枪 50 挺。另一造反派“二总部”也不示弱，8 月 14 日，他们出动近千人，50 多辆汽车，洗劫了白老虎屯武器库。据不完全统计：从 8 月 9 日到 8 月 14 日的 5 天中，长春市就发生 40 多起抢劫部队及人武部门枪支弹药的事件。

在**福建**，据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报告，停泊在厦门某地 10 艘军舰，8 月 21 日遭厦门造反派抢劫，一些人不断地冲上舰去抢夺武器。

在**湖南**，从 7 月底到 8 月下旬，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大批武器弹药被抢。共计被抢走各种枪支 818 支，“60”、“82”迫击炮 27 门，手榴弹 1 万多枚，子弹 250 万发。

在**江西**，据张春桥 9 月 28 日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讲话披露，江西全省造反派得枪 7 万多支，其中大多数是发的，少数是抢劫的。

在抢劫武器运动中，其他各省夺枪都有发生，只是规模相对小点。

据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中记载：到 1967 年 8 月 19 日止，全国共发生了 1,175 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事件。共抢夺走步枪 2.16 万余支，冲锋枪 4,600 余支，手枪 2,000 余支，其他枪 2,100 余支，轻机枪 1,190 余挺，重机枪 350 余挺，高射机枪 78 挺，60 炮 40 门，迫击炮 22 门，火箭筒 61 具，无后坐力炮 8 门，子弹 648.7 万余发，弹药 1,296 公斤，雷管 4,290 余支，手榴弹 163 万余枚，喷火器 10 具，高射机枪子弹 700 发，发射药 28 吨。

本来“武装左派”是毛泽东对付“支右”的右派将领和军队的，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与他预期相反：右派造反派得到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左派。此时，他忽然发现大事不好，急忙于 9 月 5 日下达了禁止抢夺武器的“**九五命令**”，似乎已完全忘记了一个月前他否决林彪的“严禁群众组织抢夺军队枪枝”计划的“八五批示”。但抢劫武器运动的惯性已势不可挡。据报

导，在“八五批示”下达后不到一年里，约有**180 多**万支枪、数百门火炮、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数艘舰艇，落入各种造反派手中。

在“**武装左派**”、“**群众专政**”和“**文攻武卫**”等鼓吹武斗的口号下，左、右两派造反派都在夺枪中武装了起来。实力大增的左、右造反派们，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旗帜下，相互攻讦对方是“右派”、是“反革命”。于是，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在全国展开，全面实现了毛泽东“**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

如果说“八四指示”前，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停留在棍棒、长矛、大刀等冷兵器的水平上，那么，“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后，武斗已升级为现代化战争。

河南左派造反派“二七公社”，在听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后，旋即在郑州等地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庞大的武斗队伍，修筑工事，配置武器。7 月 26 日，他们大规模洗劫了郑州卷烟厂和开封化肥厂，导致了 37 人毙命，291 人伤残，300 人当了俘虏，2 人被活埋的惨剧。此后，“文攻武卫”合乎逻辑地升级为“武攻武卫”。

8 月初，在**广西**梧州市驻军，一次向他们认为的左派造反派发枪 700 多支，引发了一场恶斗，双方死亡 1,470 多人。

重庆对立两派造反派，继 5 月 14 日打死 103 人、打伤 1,500 人的武斗外， 8 月 5 日，两派又在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展开大规模武斗；是役，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重武器，死 22 人，伤不计。8 月 8 日，两派的“重庆八八海战”，震惊全国；是役，打死 24 人，打伤 129 人，打沉船只 3 艘，打坏 12 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 8 月 12 日，武斗队又在嘉陵厂摆开战场，双方参战均在 700 人以上，支援者上万；除枪炮外，也动用了坦克；战斗到 13 日夜结束，双方均死伤一百多人。8 月 14 日，他们又在嘉陵江大桥畔开展战斗，一方猛烈炮击上清寺，当场炸死 11 人，伤多人，烧毁房屋数幢。

在**宁夏**铜峡，两派在 8 月 16 日展开战斗。8 月 28 日，驻军断定一方是“反革命叛乱”，遂下令镇压，当场打死 101 人， 打伤 133 人。

同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发生严重武斗，8 人死亡，700 多人受伤。下午 2 时多，六七四厂和港务局 200 余人，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在两辆坦克配合下，扫射另一派造反派人员，当场打死 12 人，重伤 20 人。

8 月 18 日，**广州**两大造反组织，在省总工会大楼展开战斗，枪战 4 小

时，双方死亡 3 人，伤 33 人。

在**浙江**，8 月 24 日，“省联总”部署所属组织，攻打富阳县城，死伤多人。8 月 26 日凌晨，**张永生**、**贺贤春**组织省级机关和杭州市经过军训的三四千人，全副武装攻打萧山，打死 90 多人，打伤 100 多人。10 月 3 日，“富联总”造反派谎称县主要领导被龙门公社对立派所绑架，在得到省军管会的支持后，“富联总”当晚组织攻打龙门公社，在攻打战斗中，打死 100 多人，伤残 300 多人，俘获 700 多人，烧毁房屋 1,200 多间，砸了 166 个单位和 2,000 多间房屋。

8 月 24 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军区司令**程世清**等人，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介入，先后打死干部、群众 65 人。

在毛泽东“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下达后的一年多里，在“文攻武卫”和“武攻武卫”的口号声中，武斗在全国各省、各县市、各乡镇全面展开，约有 50～60 万人在武斗中丧生，伤残不计其数。

毛泽东“支左”和“武装左派”的决定所引发的抢劫武器和武斗，使军队走向分裂。据报导：

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自 3 月 23 日正式成立以来，在“支左”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南萍**、**陈励耘**为首的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省联总”，而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则比较支持“红暴派”。8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任命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军内两派的分歧日益发展，从而促使左、右两大造反派抢枪和武斗日趋白热化。

云南省也出现了类同浙江的问题：自“支左”介入地方两派斗争后，省军区和军管会内部便出现了意见分歧，甚至出现了尖锐斗争。于是，对立的两大造反组织，在军管会内，都找到了它的靠山，从而对抢枪、武斗有恃无恐。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认为，江西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经毛泽东批准，改组了江西省军区，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并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毛的决定，加剧了军内的分歧，使省内各地抢枪和武斗进一步发展。

其他各省诸如甘肃、内蒙、湖南、河南、四川、东北三省等，军队内

“支左”分歧严重，使造反派抢枪、武斗的规模不断升级。

对此，毛泽东对他的“八四指示”所引发的全面大屠杀毫无悔意。1968年7月28日，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时，他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武斗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造成10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伤残的“全面内战”，竟获得了他的赞扬，再次凸现了他嗜血的本性。——这就是曾被御用作家们描绘为“**怕泪、怕血、怕死人**”的“伟大领袖”!

2、群众专政

对于“八四指示”中的“**群众专政**”问题，毛泽东解释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在“横扫”、“红八月”和而后的武斗中，抓人、私设公堂、打人、杀人和大兴、昌平大屠杀等野蛮暴行，都被毛泽东肯定了。一年后的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时，再次肯定了北京的“群众专政”：**“过去北京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谓的“群众专政”，就是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它的实质是**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论的有力证据之一!

在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号召下，特别是在北京红卫兵和民兵大屠杀被最高领袖赞扬之后，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机关迅即丧失功能；与此同时，“抓促小组”、“群众专政法庭”、“人民最高法庭”、“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等名目繁多的“群众政法机关”，在毛的“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的组织下，纷纷登台亮相，开始疯狂地反人类的大屠杀。

“群众专政”颠覆了“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的华夏文明，解放了人的兽性，使法制崩溃，道德沦丧，人性泯灭；在这种人造的政治情势中，毛泽东的那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变成了人们效法“说一套，做一套”的样板。其中：

1967年以湖南省道县的“群众专政”为最。据官方统计，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66天里，道县全县36个公社1,590个生产队，经“抓促小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共杀3,503人，逼迫自杀1,071人。全地区（包括道县）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

其他成份 411 人。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详见第 15 章一）

1968 年以广西的“群众专政”为最。据报导，在 1968 年广西全省杀死的十多万人中，有 4～6 万人是在省革筹委（政府）的“七三布告”号召镇压“阶级敌人”后，由县、公社、大队等政权机构用“群众专政”的办法杀死的。其中杀人上千规模的市县有：

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3,681 人，其中，国家干部 51 人，教师 87 人，工人 27 人，集体工 75 人，农民、居民 3,441 人，176 户全家灭绝；**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3,138 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 263 人，教师 156 人，学生 47 人，居民 106 人，农民 1,311 人，其它 1,255 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2,051 人，其中，国家干部 326 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 3,222 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 500 人以上，287 个大队都参与屠杀；**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 1,128 人，其中，干部、工人 556 人；**天等县**杀死、害死 1,651 人；**上思县**杀害了 1,701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 1．33%。（详见第 15 章二）

毛泽东领导下的“群众专政”，仅在中国贫苦的农村，从 1966 年 8～9 月以北京大兴县为代表的大屠杀起，再到 1967 年 8～10 月以湖南道县为代表的大屠杀，直到 1968 年 8～9 月以广西宾阳为代表的大屠杀为止，毛泽东就完成了从杀几百人再到杀几千人直到杀几万人的**“群众”屠戮三级跳**！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群众专政”中，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甘肃、江西等省的县城和农村，都发生过与道县、宾阳类似的屠杀，其规模、时间和波及的范围各有不同。

在毛泽东有领导的“群众专政”屠杀中，中共各级权力部门都有不俗的表现：乡社和大队一级肆无忌惮地大砍大杀，但也有不少地方按兵不动；县级暗中支持或公开纵容，但相当多的县级作壁上观；省、地市级装聋作哑或熟视无睹；“群众专政”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呢？他们在号召、鼓励和怂恿之后，便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和形势的发展，最后出来“纠偏”，继续扮演“**大救星**”的脚色！

据估算，在 1966 年之夏到 1968 年之秋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县城和农村，有 10～30 万人被“群众专政”杀害，伤残不计其数。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实质上是纵容、煽动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3、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 年的夏天，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当人们听到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最高指示”后，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被裹胁到“群众专政”中，并在那里呐喊、疯狂、颤栗和呻吟！但疯狂的造反派们并不满足，他们高举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革命红旗，把**“解放全人类”**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群众专政”**，推出国界。1967 年 1 月 25 日，69 名留学生回国途中，到苏联莫斯科红场上造反。他们高声朗读着毛的**“反帝”“反修”**语录，扬言要对苏共修正主义实行“群众专政”，因而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导致多人挨打负伤，酿成了红场血案。在巴黎的留学生，当听说留学生在红场上挨了打、流了血后，立刻带上刷子，提上油漆桶，列队前往苏联驻法大使馆前写抗议标语。当他们走到半路时，便被法国警察截住，不仅挨了打，还被法警用囚车押送机场，逐出法国。

“解放全人类”的“群众专政”在国外失利后，造反派把“反帝”、“反修”的目标，指向外国驻华使馆。

1966～1967 年间，由于红卫兵、造反派的造反行动，使中国与已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国家，先后发生过外交纠纷。继 6 月 18 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7 月 3 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后，到了 8 月，疯狂的红卫兵先后火烧了印尼驻华大使馆和英国驻华代办处。

为了“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的中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周恩来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受命于中共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政变，处决了一批高级将领。然而，政变失败了。政变失败后，拥有 200 多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遭到了残酷镇压，数十万印尼华人也因而丧生。1967 年 8 月 5 日上午，上千印尼人，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门，狂呼着反华口号，冲进了大使馆，打伤了四名中国外交官，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当天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当晚 8 时，他们决定对印尼实行“群众专政”：他们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制造了第一起火烧外国大使馆事件。



图 12-2：火烧英国代办处

火烧外国驻华使馆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图 12-2)

近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很难避免国内造反和“群众专政”的影响，而大陆驻港机构，已奉命在港输出革命。

8 月初，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年报》等三家中共报纸，奉命刊登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号召香港民众起来造反，推翻港英当局和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当香港的主人。香港舆论哗然。港英当局立即采取行动，武力查封了三家报社，并逮捕了 19 名新闻记者和三家报社的 34 名工作人员。香港政府这一举措，犹如火上浇油，激怒了中共支持的港九地区造反派，他们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港九，要让“群众专政”取代港英当局。8 月 4 日，首都新闻界召开盛大集会，“支持香港人民的抗暴斗争”，中共中央大员们和受毛泽东、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姚登山，都亲临现场，为大会助威。几天后，广州地区的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摸过尖沙嘴港穗分界线，缴了港英当局边防警察的枪。8 月 7 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可以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8 月 16 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要求姚登山出任外交部长。

香港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楼价暴跌 90％；8 月 4 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开来香港压惊。

8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的“滔天罪行”，要求港英当局在四十八小时内撤消对“三报”的停刊令，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与报社工作人员。接着，他们在京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与此同时，由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对代办处采取“革命行动”。

8 月 22 日晚，外交通牒的四十八小时时限到时，外交部“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人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由外语学院、外交部为主的约千人红卫兵和造反派，于 22 时 40 分，分别从西墙、北墙、正门三面冲进代办处。他们在代办处内进行革命：捣砸各类器物，放火焚烧东、西院楼，烧毁了卧室、车房、油库和 9 辆汽车，烧光了室内存放的档案，对英国进行了一次令世界瞠目的“群众专政”。

据报导，在“群众专政”的疯狂中，英国临时代办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纷纷逃离代办处：临时代办逃到使馆后面的印度使馆，躲在大门后；逃到芬兰使馆的两位姑娘，受到了保护；几位女士，逃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被拒于使馆门外，惊恐万状……

当年，英国《每日电讯》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恩做了这样的记载：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群）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的排外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导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红卫兵涌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点燃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破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

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齐躲进了保险库，……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通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当年，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 5000 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像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像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召开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行动**。”

8 月底，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部分英国人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一场外交史上的大丑闻，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本已孤立的中国外交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及其左派的倒行逆施，颠覆了保护外国使节的现代文明，使党内右派抓住了左派的把柄，有了反击的口实。

四、挫败“清君侧”

“八四指示”后，国内形势迅速恶化，支持中共的基本群众怨声载道，军队已处于分裂的边缘。对此，右派高级将帅们忧心忡忡，担心他们用血肉打下来的江山会因“武装左派”而毁于一旦，使他们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继“二月逆流”失败后，他们悄悄重整旗鼓，悄悄“逆流”而上，李商隐的两句诗在“逆流”中悄悄扩散：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1、主动妥协

熟读经史的毛泽东，对古代“清君侧”的史事如数家珍，十分清楚：

——汉景帝初年，刘氏宗室诸侯国势力强大，往往与朝廷分庭抗礼，威胁中央权力。御史大夫晁错向皇帝上疏，建议削藩，为汉景帝采纳。对此，当时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藩王，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为了平息叛乱，汉景帝将晁错杀掉，但叛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景帝始决心平叛。三个多月后，刘濞被杀，叛乱方止。

——唐武则天称帝后，男妾专权，引起朝廷大臣们的不满。神龙之春，宰相张柬之趁武则天重病卧床时，发动政变，带军队进宫杀掉了张易之两兄弟，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复位。**宰相武力“**清君侧**”，取得了成功。（这是深藏于毛泽东心底的“张柬之情结”，因而是他制造系列冤案的“秘密情结”。）

——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讨伐奸臣杨国忠”的名义，从幽州（今日北京）起兵，直捣京都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清君侧**”取得了成功，迫使玄宗杀了杨国忠，勒死杨贵妃，但他却兵败被杀，而唐朝也从此一蹶不振。

——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清君侧**”事件，当属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年轻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接受齐泰、黄子澄等大臣的削藩建议，着手进行削藩。盘踞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对此极为不满，他打着“诛杀齐、黄，清君侧”的旗号，发兵攻入南京，废朱允炆，自立为帝，改年号为永乐，是谓明成祖。

熟悉这些历史事件的毛泽东，听到李商隐诗句的传闻后，不免有些吃惊！

抢劫武器运动的快速发展，使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涉

外事件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使中国威信扫地，这都是他始料不及的，而党内右派和中间势力的暗中手脚，又使局面快速向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着实令他头痛。他十分清楚，他是这种恶化局面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澜者。他的“伟大、光荣、正确”光环也使他从未公开做过自责，更不用说下“罪己诏”了；但他的天才在于：处变不惊和冷静观察。

毛泽东发现，在造反派中两股令他担心的“逆流”正在形成，正在给恶化的形势推波助澜。一股是左派造反派，他们像群脱缰的烈马，不听招呼，任意狂奔，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以控制，正在向右派异化；其中，有的竟提出“巴黎公社选举原则”，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有的大反“血统论”，力图批判阶级斗争学说，等等，已经超越了他设定的造反底线，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右派。另一股是右派造反派，他们已经极左化：任意揪斗、残害中共当权派，任意制造事端、挑起武斗、镇压左派势力，任意制造红色恐怖，实行红色大屠杀。

对于左派造反派，他早有所料：他们是一股可以利用不可以重用的势力，他们只能充当向右派当权派即“走资派”夺权的主力和炮灰，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诉求，注定是新生政权的专政对象。对于右派造反派，他早有定论：只要他们能摆脱党内右派的控制，并反戈一击，同左派联合夺取“走资派”的权力，他们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但他最担心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为，对于前者，一个命令就可以镇压下去；而后者则不那么简单，他们在党、政、军内有靠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镇压他们势必引起链锁反应。

他已看准了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夺权动向：他们以“以乱制乱”为策略，支持和纵容右派造反派，力图把水搅混，借以干扰和转移向“走资派”夺权的大方向；他们蓄意挑起事端，滥杀无辜，制造党群、干群间的对立，为重新掌权制造口实，创造条件；他们挑动右派将领，以“支左”名义“支右”，镇压左派造反派，制造军队的分裂。

在反夺权的动向里，他还看到了“三老四帅”的影子。元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和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大员，在“二月逆流”中，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没有伤及他们的元气。一旦局势继续恶化，在下面，他们会得到强悍将军们的支持，在上面，他们会得到朱德、刘伯承等老右倾们的联手，甚至还可能得到周恩来、林彪等人的青睐；他们就会重新扛起反对中央文革的大旗，效法古代“清君侧”的故事，发动政变，逮捕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大员，武力要挟他就范。到那时，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将毁于一旦。

毛泽东冷静观察之后，他做出了以下判断：为了不让“八四指示”发

展成右派发动清君侧政变的口实，必须用稳住军队、强调秩序和纪律的策略，来挫败右派政变的谋图。于是，他开始调整自批《海瑞罢官》以来的进攻态势，亦即弱化批判“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烈度，约束红卫兵、造反派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倾向，强调大联合，强调“复课闹革命”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等等，不断向右派示好，8 月 12 日，他又发出了“**‘党内、军内一小撮’提法不策略**”的指示，淡化他早先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主动与党内、军内右派修好，并做好了与右派适当妥协的计划。

但妥协计划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时日。期间，如果有一个鲁莽将军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揭竿而起呢？怎么办？

正当他为实施新的谋略冥思苦想的时候，周恩来的“建议”送上门来。

8 月 4、5 两日，毛泽东发出了“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后，周恩来听到了“清君侧”的唐诗，也触到了军内“清君侧”的潜流，预感到中共大厦将面临倾覆的危险。

在文革中，周恩来同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并肩战斗，都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但他同江、陈等人并不完全同路。在“横扫”、破“四旧”和镇压弱势群体上，他们志同道合，目标一致；但在如何对待干部、对待军队特别是对待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八四指示”后，他们的分歧更加鲜明。

周恩来十分清楚，毛泽东并不信任他，一直通过中央文革对他实行监督：江青经常指责他“和稀泥”，甚至拿“伍豪事件”要挟他，就是这种监督的证明。他早想扳倒以江青为头领的江左们，苦于没有机会；“八四指示”后，江左们更加飞扬跋扈，特别令他反感的是，江左们根本不把他这个总理放在眼里，肆意在他主管的外交部里寻衅滋事。当听到毛泽东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后，他发现了转机，开始寻找整治江左们的机会。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他决定派代总长杨成武代表他，向毛泽东秘密进谏：状告中央文革小组，并报告他的提防“清君侧”的建议。

为此，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据《周恩来外交文选》记载，8 月 25 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话中，他向杨成武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他特别提到了**王力**在 8 月 7 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提到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连锁反应怎么办？他要杨向毛报告他的主要建议：“**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经验老道的周恩来，并不直接状

告“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策动者的后台老板江青，而把矛头对准江青的亲信**王力、关锋、戚本禹**，力图斩断江的左右手，并让江左集团的王、关、戚当替罪羊；也不直说军内“清君侧”的潜流，而突出毛泽东当前最关心的军队稳定问题，暗示毛泽东应自“清江侧”，以挫败他人“清君侧”。据说，周恩来后来曾这样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但对王、关、戚的后台老板——毛泽东的前台打手江青的分裂、破坏活动，却视而不见。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奏折”后，领悟到周的暗示。经过整整一天的掂量、权衡，他做出了令人吃惊的决定。

2、 抛出忠君打手“王关戚”

据报导，8 月 25 日上午，杨成武在周恩来处受领任务后，当即肩负重任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的“建议”。他还按周恩来的布置，带去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等人起草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等文稿，面呈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看着他早已看过并曾加以认可了的文稿，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先去休息，说**“考虑考虑”**再说。经过整整一夜的掂量和权衡，他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上午，他召见杨成武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敢怠慢？安排好飞机后，迅速回到毛泽东的住处，聆听“最高指示”。

毛泽东狠狠吸了一口烟，吐出后，在弥漫的烟雾中缓缓地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赶忙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做出了记录的架式。只听毛泽东不紧不慢、一字一板地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8 月 26 日下午，杨成武乘机飞回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异常兴奋，当即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解决。他决定晚上在钓鱼台召开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小型碰头会，并嘱秘书在会场外布置十多名军警，随时执行逮捕任务。考虑到王、关、戚都是中央文革大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老谋深算的周恩来，采取分化战术：把计划密告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取得了陈的支持，分化了小组的领导层，确保了逮捕行动的顺利进行。

是晚，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先后走进会场，坐到指定的位置上。除

陈伯达外，他们都不知将要发生的事，都在谈论者近几天发生的文革新闻。

碰头会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严肃地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

与会者都习惯地拿出笔记本和笔，做好了记录“重要决定”的准备。王力、关锋、戚本禹“三大才子”，不仅做好了记录准备，按照他们的思惟定势，他们还要猜想这个“重要决定”可能内容，甚至联想到这个“可能内容”将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当周恩来照本宣读杨成武的记录后，他们的脸色顿时大变，颤抖的右手已无法运笔记录了。不知情的江青，顿时脸色大变，一下损失了三员大将，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事先已被告知的陈伯达，正襟危坐，目光迷惘，已经在思考这个“重要决定”对他的工作的重大影响了。

“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后，在会场外等候的军警迅速走了进来，把王力和关锋逮到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地方。从轻发落的戚本禹，几个月后，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经过秘密穿梭，不费一枪一弹，周恩来成功达到了“清江侧”的目的！

从周恩来一个人的秘密“奏折”，经杨成武一个人的秘密穿梭，到毛泽东一个人的秘密决定，最后到周恩来等几个人的秘密执行，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中共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及其运作方式：**独断加暗箱**——这是中共赤文化的又一大特色。

“王关戚”何许人也？王者**王力**，原中共中联部副部长，曾当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宣传组组长(宣传部部长)；关者**关锋**，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戚者**戚本禹**，原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秘书局局长。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王、关、戚三人，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同时成了江青的左膀右臂，同时被尊称为“中央首长”，因而，同时发飙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得发紫的风云人物。

王力（1921～1996），原名王光宾，1921 年 8 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 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期间，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过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在中联部，他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十次去莫斯科，成了《九评》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1965 年 9 月，

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起草工作。1966 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了中央权力中枢。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和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上的历次讲话文稿中，都有他的手迹。他善于揣摩“圣意”，成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得力助手，被誉为中央文革一号笔杆子；他紧跟领袖的“战略部署”，在批《海瑞》、斗彭真、破“四旧”、倒刘、邓、陶中，特别是在煽动造反和促成“七二〇事件”中，曾大显身手，功勋卓著，实为毛泽东一大功臣。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他效法“伟大领袖”口吻说的“八七讲话”，成了他倒台入狱的罪证。这位曾在 7 月 25 日天安门广场上，被一百多万人热烈吹呼为“胜利归来的英雄”的他，刚当了一个月另一天英雄，便从巅峰上跌落下来，跌进了秦城监狱。

关锋（1919～2005），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 年 7 月，生于山东庆云县。1933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等职。1956 年，调任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38 年改名为关锋，使用至今。1964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他立马跟上，撰文大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来，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1966 年 4 月，他被钦点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不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工作。由于他善于揣摩“圣意”，很快取得了信任，成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得力助手，被誉为中央文革二号笔杆子。他伙同戚本禹成了揪斗彭德怀的策划者和主使者。在批《海瑞》、斗彭真、破“四旧”、倒刘、邓、陶中，特别是在煽动造反和主持《解放军报》、《红旗》工作中，他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功勋卓著，实为毛泽东又一大功臣。然而，到了 1967 年 8 月 1 日，他主持的“八一社论”，学着领袖的口吻，大讲起“揪军内一小撮”来，受到了毛的赞许。但由于“理无常是”哲学水平不高，他没有料到，不到半个月，“伟大领袖”竟改变了口气，使他栽了个大跟头，一下子栽进了秦城监狱！

戚本禹（1931～），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 年生于上海市，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初，他从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后，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1963 年，他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给李秀成扣了许多政治帽子。如，他在文章中说，李是太平天国的叛徒。他的这个观点，虽受到了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好感。毛在他的文章旁边，批了否定李秀成的 16 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他由此而发迹。1964 年，戚本禹得到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政治上十分敏感且摸到

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当看到姚文元用**政治图解历史**的方法批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受到了启发，很快用政治图解历史的方法，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再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姚文导致吴晗夫妇监毙，女儿神经错乱自杀于狱中，戚文致使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于北大校园。1966 年 5 月 22 日，他取代田家英掌管秘书室工作，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密大权。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的自杀，使他很快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5 月 28 日，35 岁的他，荣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挤进权力中枢，一跃成了“中央首长”。年轻得志，血气方刚，权欲强烈，头脑发烧，其革命热度远非王力、关锋所能攀比，成了中央文革第一大杀手。由于他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经常深入第一线，亲自策划、指挥红卫兵和造反派造反、夺权，又被誉为“戚大帅”。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戚大帅”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属，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例如：他指挥红卫兵把毛的死敌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打断了彭的肋骨；3 月底，他著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把刘气得口吐鲜血；8 月 5 日，他组织和指挥红卫兵造反派在中南海内造反，批斗刘、邓、陶，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翻在地；8 月上、中旬，他同中央文革其他要员，支持姚登山打倒陈毅，夺外交部的权，支持向港英当局发最后通牒，最终导致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他这种不顾一切的打手脚色，使他成了党内右派眼中钉，肉中刺，当领袖改变方略向右派妥协时，他不可避免成为牺牲品。随着他的倒台，一大批人因株连而遭清洗，仅北京市一地，就“清理”出戚派人物 150 多个。党内右派政变成功后，恶迹斑斑的王力和关锋，都被免于起诉，而这位为毛泽东立过大功的“戚大帅”，却被判 18 年徒刑。正是：

朝为座上宾，暮成阶下囚！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打倒他的功臣王、关、戚呢？

善于用真假搀和来打扮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说，一是王力于当年 8 月 7 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观点极左，二是王力、关锋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的那篇“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他们甚至指证说，毛泽东看到“八一社论”和“八七讲话”后，忿怒地批道：“**大、大、大毒草**！”

实际情况并非像御用史家们说的那样。作为毛泽东的打手，不论是“八一社论”，还是“八七讲话”，或是策划外交部造反派的“揪陈大军”揪斗陈毅，以及“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性事件，都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

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决定和**“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全面内战”**、**“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等一系列“最高指示”逻辑发展的结果。

王力“八七讲话”的极左观点是什么呢？王在讲话中说，要打倒陈毅，要夺外交部的权。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等等。

那么，在夺外交部的权和揪陈毅问题上，毛泽东持什么观点呢？**“全国展开全面内战”**是他号召的，**“一月夺权”**和尔后的全国夺权风暴是他煽起来的，造陈毅的反，夺外交部的权，他也是支持的。7 月 1 日，他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王力“八七讲话”后的 8 月 17 日，他还在说：**“外交部问题，对陈毅我也不那么高兴。……对陈毅这样的人，我，林总，总理有什么办法，这是要靠红卫兵……”**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指毛）**的原话的重复**。”

紧跟毛泽东状告王、关、戚的周恩来，在夺权和揪斗陈毅问题上又持什么立场？1967 年 1 月 17 日，他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说：**“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1 月 20 日，他在接见二机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巴黎公社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我们是用暴力保护你们夺权。”**1 月 21 日，他在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时说：**“政治统帅一切，要全面夺权。”**1 月 29 日，他在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矛头对准这里。有些单位不一定是这样也要夺……”**4 月 26 日，他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说：**“从夺权来说，在需要的单位进行夺权，如有的单位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存在夺权问题。”**5 月 12 日，他在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其他九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谈话时说：**“外交部夺权我是支持的。”**但揪出王、关、戚后，他改口了。9 月 2 日，他在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说：**“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还借机清理经常给他制造麻烦的江青的打手们。他向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吴德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明确交代：**“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结果“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应当肯定的是，他始终是保陈毅的。

在外交部夺权和打倒陈毅问题上，王力不过是一个前台打手。之于**“揪军内一小撮”**，既不是关锋的发明，也不是王力的创造。

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就在《通知》的文稿中，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段文字，就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原始版本。之后，毛泽东便开始逐步实现他制定的揪斗军内**“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计划：1 月 8 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上将被揪斗；18 日，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被打倒；19 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和一批高级将领，被拉到北京十万人大会上批斗，身负重伤的罗，还坐了残酷的“喷气式”；26 日，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被揪到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

1967 年 1 月 10 日，关锋会同王力和军报其他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上报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他们在建议中非常谨慎，没有敢使用毛泽东**“一批”**的估量，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比**“批”**量小得多的“一小撮”和“极少数”等量词。他们在建议中说：“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五一六通知》的合理延伸，是对**“一批”**范围的谨慎压缩。对此，江青划圈表示同意，林彪批“完全同意”。自此，“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正式登场。

7 月 25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大会。会上，旗帜鲜明地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大员都参加了大会。当时康生说，他请示过毛泽东，说毛主席完全赞同。1967 年 7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经毛泽东审定的这封信中，明确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自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席卷中国。例如 ，“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等等，充斥了全国大、小报刊的头版和首页，“八一社论”不过其中之一而已。

为了呼应“揪军内一小撮”声浪，毛泽东在 8 月初，做出了“武装左派”的决定，表达了对“军内一小撮”将帅“支右”不“支左”的愤慨。直到 8 月 12 日，国内形势恶化到快要失控的时候，特别是听到“清君侧”

的传闻，他那颗发烧的大脑才开始冷却，才不得不发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的指示，主动为“揪军内一小撮”降温。但“提法不策略”不等于否定“提法”；然而，御用上层精英们，却以此迫不及待地制造出了个毛泽东怒批“**大、大、大毒草**”的谎言。

由此可见，无论是“八一社论”的“揪军内一小撮”，还是“八七讲话”中的“揪陈毅和夺外交部的权”，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主导下的集体“产品”。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拿他的功臣王、关、戚问罪呢？

当听到周恩来要他自清江侧的暗示后，熟读历史书籍的毛泽东，立刻想到了曹操**借头平兵怨**的故事。

《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描写了这样一段故事。曹操与袁术战于寿春。时曹操率兵 17 万，日费粮食浩大，又逢各地大旱，接济不及，虽向孙策借粮 10 万斛，也只能解得燃眉之急。适逢仓官王垕入禀：“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曹操巧设“阳谋”告诉他：“**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说：“士兵怨愤，如何？”曹说：“**我自有良策**。”王垕遂遵命照办。因兵士食不果腹，遂生怨愤，军心不稳。曹操乃密召王垕来见，说：“**我欲借你一物，以压众怨，你可不要吝惜啊**。”王垕莫名其妙，问道：“丞相欲借我何物？”曹操不动声色，凛凛可畏地说：“**我欲借你人头示众**！”王垕大惊失色，力辩：“我无罪……”曹操成竹在胸：“**我也知你无罪，但不杀你，军必生变。你死后，我会供养你的妻子家小，不必多虑**。”王垕还要申辩，曹操喝令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王头于高竿，出示榜文曰：“**王垕故行小斛，克扣军饷，盗窃官仓，军法从事**！”蒙在鼓里的众兵士们，欢声雷动，怨忿顿解，只差没呼“万寿无疆”了。化解矛盾，赢得军心，突现刁雄曹操“伟大、光荣、正确”的魅力。

掂量和权衡了整整一夜后，毛泽东决定依典复制曹操借头史：他向杨成武口述了他清除王、关、戚的决定。显然，这个决定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霸道，安抚了将帅，稳定了军心，从而挫败了少数将领清君侧的谋图。在毛泽东的权弄下，功臣王、关、戚，稀里糊涂地当了“王垕”，成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所幸没被斩首。

也许良心再现，1967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给他的检讨信上批道：“**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做出了“我会供养你的妻子家小”的曹式安抚。

9 月 24 日，外交部保陈毅派的刘华秋和毛的表侄孙女王海容，急想探听毛泽东对打倒王、关、戚的真实态度。毛泽东也不避讳，对他们吟出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唐诗，表达了他对“王关戚”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惋惜之情。

毛泽东权术史不断证明，他每次搞权力平衡，都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因此，虽已改称“王关戚”三人为“同志”，却难以免除他们的牢狱之苦。

3、打倒“杨余傅”与张柬之情结

1968 年 3 月，为了调整中央文革与军队、军队内部左、中、右派之间的权力分配，借以强化他个人的权力，毛泽东再次施展平衡权术。这次的权力再分配的平衡术，付出代价的是代总长**杨成武**上将、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将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卫戍司令**傅崇碧**少将等三人，史称“杨余傅事件”!

1968 年 3 月 24 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驻京部队万人大会。会上林彪说：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陆、罗、杨那么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他做了事情不承认。例如，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拉了余立金夺权。”

“江青有病时，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

会议进行到凌晨 1 时 35 分，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大家招招手。他用这样一种特殊语言，表达了对林彪关于打倒杨、余、傅的支持。

这就是著名的“杨余傅事件”。但五年多以后的 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军委会上宣布：**“‘杨余傅事件’搞错了。这是林彪搞的**。”

这个“搞错了”的案子，当年是何等威烈！

⑴、“杨余傅事件”回放

逮捕总参代总长杨成武

3 月 23 日凌晨 2 时多，部队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楼里。杨成武的家人一个个被唤醒，睡眼迷离的他们，还没有还过神来，就被驱赶进了楼下的客厅里。门口站了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人上楼，敲开了杨成武的门。杨成武穿着一身睡衣，站起来看了看他们。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海军政委李作鹏站在后边，眼睛被那副变色眼镜挡了个严严实实。他们身后的士兵，手执短枪，如临大敌。

杨成武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大势不好，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想问问总理是怎么回事。电话线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

“怎么回事？”他火了。

邱会作很有几分得意地笑着。李作鹏仍旧在一旁不动声色。

杨成武知道他被捕了。他毕竟是久经风雨的高级将领，熟知中共秘密拘捕那一套，也是他曾多次用过的对付政敌的那一套。他转身拿了件军大衣披在身上，在士兵押送下下了楼。经允许后，他走进客厅，对惊魂未定的母亲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

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亲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儿子的话。

杨成武走出屋门，见有辆黑色的吉姆车停在楼门口。

很快，杨成武被押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在厅里，他看见林彪、周恩来、江青、黄永胜、汪东兴等人已庄严地坐在那里。这位熟悉中共“民主集中制”运作方式的高级将领，已经感知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林彪发话了：

“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接着他又宣布 ：**“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是晨，撤职后的杨成武，被武装押解到机场，送到湖北省武昌山坡机场关押起来。不久，他妻子赵志珍也被押解到这里，同他关押一起。其间，夫妻曾双双被转押于洛阳龙门，最后被监押于开封。这位自认为“我没问题”的高级将领和他的夫人，一关就是六年多。在六年多的时日里，没有人来审讯他们，也没有人核查他们的问题，更没有人要他们写材料。被关押期间中，他俩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母亲悲痛去世，大女儿杨毅和赵志珍弟弟赵晶溪先后被迫自杀身亡，他俩一无所知。

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

就在部队包围杨成武住宅前一个小时，空军政委余立金已被空军司令吴法宪铐了起来。

那是 23 日凌晨 1 点，余立金的秘书接到了吴法宪的秘书的电话：**“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刚刚睡着的余立金被叫了起来。他披着睡衣问：**“什么事**？〞

秘书说：**“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

余立金着好军服，走下楼梯，独自出后门，向吴宅走去。空军大院的首长居住区里，两宅相距不足 50 米，他出了后门，便看见吴家客厅里的微弱灯光。是夜，冷风飕飕，寒气袭人。走进吴宅的院中，在客厅微弱灯光的映射下，院里几乎是黑乎乎一片。

快到客厅门口时，冷不丁从黑暗中窜出四条汉子，其中一个问道:**“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回答他们。

四个人忽地扑上来，其中两个扭住余立金的胳膊，一个人咔嚓一下，给余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挥动着被铐住的手，吼道：**“你们要干什么？”**

“进屋去说!”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背。另外几个人连推带搡把他推进吴法宪的客厅。

余立金怒火满腔，对着坐在沙发上的吴法宪吼道：**“你凭什么铐我？”**

吴法宪从沙发上跳起来说：**“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的政委！你要干什么！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向毛主席控告你!”

“嘿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在空军的批斗中，余立金不承认他是叛徒。但毛泽东已经表了态：**“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对此，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余政委很快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六年另四个月的囚徒生活，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定罪。

就在余立金被捕半个多小时后，他的夫人**陆力行**也被捕入狱。她的罪名是：“解放”初年，她的姐姐陆迅行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时，曾接触过敌伪档案，可能知道演员**蓝萍**即江青的绯闻。姐姐早已被捕，可能知情的妹妹，自然“罪责难逃”。以**“可能知情”**获罪的她，同丈夫一样，开始了六年另四个月的监牢生活。但他们夫妇俩没有杨成武夫妇幸运，他们相互不知道对方的音息。

拘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

相对来说，对傅崇碧客气得多。

3 月 23 日零时，傅崇碧被召入人民大会堂。据报导，在会议厅里，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对他说：**“你到沈阳当第一副司令,温玉成接你的手,主管卫戍区**。”命令一宣布,周恩来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天快亮的时候，周恩来便催傅崇碧上任。他紧紧握住傅的手说：**“走吧，要经得起考验**!”傅崇碧想回家一趟，见周恩来有难色，便不情愿地随陈司令一起登上了飞机。走马上任的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傅崇碧，下了飞机，便被带到一幢楼里，旋被一个排的兵力“保护”了起来，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准同外面联系。就这样，当了“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傅司令，竟在一个排兵力的“保护”下，艰难地熬过了六年多的时日。据说，在长达六年多的“第一副司令员”任上，由于无权与外界联系，他的家人自然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当司令。也许历史在开他的玩笑，当听到外边造反派用高音喇叭高呼“打倒杨、余、傅”的口号时，他在冥思苦想：“谁叫杨余傅!”

尽管逮捕杨、余、傅三人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反映出来的赤文化却是一致的：**颠覆法制文明**——这是自“解放”以来，毛泽东的中共用野蛮颠覆现代文明的继续。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颠覆还在继续，就是举世闻名的“劳教”、“双规”和镇压法轮功!

⑵、杨、余、傅其人

后来杨、余、傅都被平反了，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都是中共党和毛泽东的功臣。

杨成武（1914～2004）,福建省长汀县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历任队、团、师政委，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兼政委，并参加了长征。在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战斗中，他率红 4 团一天奔袭 240 里，奇迹般地夺取了铁索桥，使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了大渡河，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团长、师长和军区司令等职。在太行山麓，他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曾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率部歼灭日军 1,500 余人，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纵队司令、政委和兵团司令等职，率部先后参加过石家庄、察绥、张家口、太原等战役。他发起的张家口围歼战，歼敌 5.4 万余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伟大胜利”。在韩战期间,他担任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三八”线东线夏秋季防御作战,“粉碎”了美军的多次进攻，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京津卫戍司令、北京军区司令、防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和代总参谋长等要职。参与指挥过炮击金门、大西南和大西北“剿匪”、西藏“平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台湾国民党海空军及武装“匪特”袭扰等的作战行动。还曾担任援越领导小组组长，为支

援越南、老挝、柬埔寨抗美斗争，做了很多工作。1975 年，他指挥了镇压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村回族的“武装叛乱”，取得了“毙敌”1,600 多的“胜利”。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中共中央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1983 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余立金（1913～1978），湖北省大冶县人。1928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加入中共。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历任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和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中党校副校长等职。“解放”后，历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和政委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傅崇碧（1916～）四川省通江县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加入中共。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历任宣传员、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委、特委书记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股长、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大队政委、团政委、军分区副政委等职，参加过“百团大战”和晋东南、晋察冀反“扫荡”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政委、旅长、纵队副政委、军副政委，参加了张家口、石家庄、平津、太原和进军大西北等战役。“解放”后，任军长，参加了韩战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全过程。1965 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杨、余、傅的历史证明，他们不仅是中共党的功臣，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还是毛泽东的忠臣。可悲的是，他们同周恩来没有拉开一定的距离。

在大陆允许出版的著作中，杨、余、傅都被塑造成忠于党、忠于毛泽东的英雄，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负面形象。但中共党的历史证明，几乎所有的中、高级干部，都有整人和被人整的历史，杨、余、傅不可能例外。

当毛泽东忠臣罗瑞卿的地位岌岌可危之时，杨成武从副总参谋长升迁为第一副总长，从中央军委委员升迁为军委副秘书长。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5 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多数常委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和林彪的策划下，他同叶群等人联手，把他的上司罗瑞卿赶下台，踩着罗的双肩，登上了代总参长的宝座。

1966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的由各中央局、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杨成武对罗瑞卿大加鞭挞。他说：罗瑞卿“**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

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是一颗‘定时炸弹’。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

在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唆使下，因跳楼自杀身负重伤的罗瑞卿，被造反派用箩筐抬出去批斗。在身体多处骨折未愈的情况下，又被暴力残酷地扭成“喷气式”，造成终身残废。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残酷批斗，把中共反人权、反文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文化，表演得淋漓尽致！。

为了紧跟“伟大领袖”，1967 年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登载了由新华社播发的杨成武进一步批判罗瑞卿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创造文章标题长达 57 个字的新纪录。这一次，即将失宠的他，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结结实实挨了一蹄——伟大领袖愤怒地斥责他：**“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受批后，他竟说**“当时就我的水平而言，是写不出这样大块理论文章来的。”**林彪、叶群摔死和陈伯达倒台后，他又把发表的责任推到陈、叶、林的身上，真乃迷天下之大谎。

此外，他还兼任中央专案组二办主任，负责全军专案工作，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1975 年，在毛泽东、邓小平制造的“沙甸事件”错案中，做为前线总指挥，他充当了毛、邓鹰犬，屠杀了 1,600 多个回族同胞，成了镇压少数民族的刽子手。

余立金和傅崇碧在整人上也有“建树”。

善于整人的余立金，被任命为“贺龙专案组”组长，并领导了“许光达专案组”等 6 个专案组，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他特别关照“许光达专案组”。在他的指示下，专案组开始批斗许光达。罚站、弯腰，三天三夜不让休息的车轮战，成了审讯的主要方式。由于没有达到让许“坦白交待”的目的，余立金下令，用饥饿来摧垮许的意志。由于许光达的“顽固不化”，拒不承认是贺龙政变的总参谋长，余立金怒斥专案组“右倾”，“办案不力”。在他的命令下，素与许光达有怨恨的都曼林、党志壁等人，都被调入专案组。都、党等人对许大打出手，最终使许光达大将死于马桶之上。

傅崇碧是在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后调任北京卫戍司令的，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上任后的傅司令，在导致北京数千人死亡的“横扫”、破“四旧”运动中，他命令卫戍部队“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成了红卫兵法西斯暴行的帮凶；在批“资反路线”和“支左”行动上，他都能毫不留情地打击异毛势力，为“伟大领袖”夺权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⑶、“清周侧”的张柬之情结

对于杨、余、傅这样忠心耿耿的功臣，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他们呢？

御用史学家把打倒他们的责任都推到了林彪、江青等左派人的身上，有意开脱毛泽东的责任。他们说：

杨成武将刘伯承元帅先安排到山东治疗眼病，后又到上海治疗；他将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都保护在西山军委的房子里，派两个营守卫；他还将贺龙元帅保护在象鼻子沟，派一个营守卫。**余立金**在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伴随其间受到信任，使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极度不快，欲除之而后快。**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时，林彪、江青向他发出的一些指示，他不敢公开反对，却经常请示于周恩来和聂、陈、徐等老帅；他曾按周恩来的指示，将 30 多名党政大员，藏到军事重地，使造反派找不到他们；更严重的是，傅以找鲁迅手稿为名，亲率数名军人，乘坐两部汽车，冲击中央文革，等等。杨、余、傅这些作为，使林彪、江青一伙非常不满。

笔者认为，他们说的也是实情，但不是打倒他们的关键。

老谋深算的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打倒杨、余、傅是打倒王、关、戚的映衬，是毛泽东新的平衡权术：他的权力过大，引发了毛泽东的**张柬之情结。**

足智多谋的毛泽东，已经发现：抛出王、关、戚后，中央文革威望遭到重挫，右派将领受到鼓舞，激烈的武斗越来越难以控制；**处于关键岗位上的杨、余、傅，正逐渐向周恩来靠拢，有架空林彪之势，**犹如当年罗瑞卿有投靠刘少奇架空林彪嫌疑那样。在杨成武“秘密穿梭”后，周恩来的权力越来越大，“一旦时机成熟”，他是否会效法唐神龙年间的张柬之？尽管周恩来当时还没有清君侧的意图，但为了防患于未然，生性多疑的毛泽东，再次施展平衡术，调整权力结构，在**“清江侧”**之后**“清周侧”**，使权力天平向林彪、中央文革一方倾斜，借以警告军内右派将领。这次打倒式的“调整”，使中共和毛泽东的忠臣良将杨、余、傅等人，个人和家庭都

付出了惨痛代价。

毛泽东“清周侧”式的“调整”，正合林彪扩大权力安排亲信的意图。于是，他自觉充当了打倒杨、余、傅的急先锋。因此，“杨余傅事件”，实际上是毛、林联手“清周侧”的结果。

第 13 章 文革无义战暨文革第二轮大屠杀

13 章目录

★一、全面内战起因　1、纵火者兼灭火者　2、纵火　二、各地武斗掠影
三、派性大血战实录　★四、 武力大镇压暨文革第二轮大屠杀
五、 武斗休止符　★六、人兽之间(1)——杀俘　★七、重庆红卫兵公墓

一、全面内战起因

1、纵火者兼灭火者

1980 年 11 月，在中共政治局的连续会议上，首次公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斗情况、军队介入情况和武斗造成伤亡人数等文件档案。其中：

“各地原始档案上报汇总武斗伤亡人数：根据一九七九年四月，全国各地公安、民政部门、各地驻军原始档案，上报汇总：文化大革命武斗伤亡人数：1,234,700 人。其中群众、干部、学生死亡 143,720 人，公安民警死亡 8,467 人，军人 31,086 人。另有失踪者 274,500 多人。”

“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省区：文革期间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省区有十二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四川省、黑龙江省、河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湖北省、山东省、陕西省、山西省。”

“武斗伤亡超过五千人以上的城市：文革期间武斗伤亡超过五千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二个：乌鲁木齐、石河子、郑州、开封、兰州、武汉、平顶山、新乡、合肥、芜湖、蚌埠、宜昌、思茅、昆明、金华、温州、南宁、邵阳、长沙、冷水江、石家庄、保定、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重庆、宜宾、南昌、湛江、贵阳、遵义、西安、宝鸡、枣庄、曲阜、徐州、南通、鞍山、丹东、湘潭、太原、包头。”

又据文革史学者们估计，文革武斗死难者约 50～60 万人，但也有人认为，武斗死亡不下百万。笔者倾向于前者。

从这个系列数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纵火者的身影。

善于运筹内战的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拟定了乱中夺权的计划。他认为，乱可以打破秩序，从而打破刘、邓长期构建起来的权力结构。为此，他成了一个颠覆刘、邓秩序的纵火者。毛泽东这种纵火脚色，

都被历史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1966 年 6 月 1 日，他下令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北大聂元梓的被他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向全国传递了他要武力夺权的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从而吹响了用红色恐怖血染中华大地的号角！

同年 7 月 8 日鼓吹“大乱”。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8 月 1 日，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说：“**造反有理。**”鼓动他们起来造反，揪斗、打倒以刘、邓为首的右派当权派——他心目中的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分子。

8 月 2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鼓吹“大乱”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又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到 1966 年年底，面对右派越来越激烈反抗，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激烈反抗，善于从敌我力量对比变化中决策的他，决心把“**乱中取胜**”变为“**内战中取胜**”。12 月 26 日，在他的生日宴上，他高举酒杯向宠臣们发出号召：“**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在 1967 年 4 月军委扩大会上，他再次公开号召打内战。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

5 月 16 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5 月 25 日，他对全面内战大加赞赏说：“**北京也在分裂成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

7 月 13 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会议上，鼓吹打死人。他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又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7 月 18 日，在武汉，他赞扬武斗。他对周恩来、谢富治说：“**钢工总的工事很好，我还要去看看。**”

在他的授意下，7 月 22 日，江青向郑州左派造反派“二七公社”，举起了“**文攻武卫**”的战旗，令他们以武力击败右派造反派“十大总部”。

他对许多将领“支右”不“支左”行径，早有戒备。善弄权术的他，对军队将领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说军队内有“一小撮”野心家、“走资派”，甚至还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无情拷打、处死一些将领，如彭德怀、贺龙、许光达、陶勇等，严厉警告将领们不得三心二意，要紧跟着

他，另一方面，又给他们以信任，赞誉他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委以“支左”的重任，要他们在“支左”中“立新功”。

7 月 28 日，他继续赞扬武斗道：“**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8 月 4 日，他下令“**武装左派**”，以武力对抗军队中右派将领“支右”不“支左”的“阴谋”，支持左派造反派的“**文攻武卫**”，演变成“**武攻武卫**”。

9 月 18 日　他在视察路经长沙时，召见湖南省军政领导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他对他们说：“**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支枪。**”当黎原说到“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时，他说：“**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他还肯定了黎原“发枪”的作法。他说：“**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又送回来，给你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就抢跑了，这是个好经验。**”

1968 年 7 月 28 日，他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赞扬武斗。他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又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个名符其实的文革**纵火者**。

但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权谋大师。他一生信奉“一分为二”的“理无常是”哲学，他不会满足于纵火者一种脚色，他还要扮演灭火者脚色。这种双重脚色，能使他左右逢源、横竖是理，从而确保他的表演能充分地体现出“伟光正”的本色。因此，文革以来，在作为一个肆无忌惮的纵火者脚色的同时，他的另一面——积极**灭火者**脚色，在历史记录里也得到了充分地展示：

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当他看见红卫兵强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伤人的野蛮行为后，便对《人民日报》发出指示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7 年 1 月 22 日，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时，他批评造反派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注：廖、刘、苏都是高级将领）

同年 9 月 16 日，他在浙江对武斗提出批评：“**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

12 月，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为了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他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随着武斗的升级，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武斗。1967 年 9 月 5 日，他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的《**九五命令**》；1968 年，他签发了“**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七三布告**》；紧接着，他又签发了“**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的《**七二四布告**》；7 月 28 日，他又派遣数千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那里的武斗。他警告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等人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1970 年 12 月 18 日，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表达了他反对武斗的立场：**一不赞成武斗，二不赞成虐待俘虏**。

毛泽东两种脚色的表演，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软硬兼施的权棍：他既是一个“为革命”的纵火者，又是一个“为人民”的灭火者。由此可见，毛泽东打着为革命为人民旗号发动的内战，是场名符其实的**文革无义战**。

对此，有人认为，此时的毛泽东，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人。他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口蜜腹剑的历史，都是他人格分裂的证明：一方面以权谋为中心，推重谎言，崇信“**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目的，强奸道德**”的哲学，甚至是“可以和魔鬼结盟”的**魑魅魍魉**，另一方面不忘往脸上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和耿耿为革命的“公仆”，一个人间无法类比的**天使或大救星**。有人甚至说，他人格分裂最为鲜明的是：一面是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是个道德败坏的**小人**！

人格分裂是双重人格的病态表现。双重人格，人皆有之：“**崇高与卑劣共存，坚强与怯懦同在，真诚与虚伪并行**”，是双重人格的自然态，毛泽东不能例外。所谓双重人格，有心理学家说：“**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心理学家们还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阶段，在个人的意识层上只有一种身份，称为**主体人格**。此时个人的情感、思想和言行，都能按照主体人格的方式活动，不会显示出另一身份的痕迹。但当受到精神刺激之后，可能突然转变为另一完全不同的身份，一切情感、思想和言行都会按照**后继人格**的方式行事。美国精神病医生则将双（多）重人格界定为“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据此，有些心理学家进一步认为：双重人格为人的常态，而人格分裂则是个人人格分裂的病态表现。

笔者不是心理学家。但依据心理学家们对双重人格的定义和对人格分裂病态的论述，人们能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他“情感、思想和言行”的反复无常，看到他对权力渴求的“主体人格”和不惜牺牲一切的“后继人格”之间的相互“突然转变”，而这些“反复无常”或“突然转变”，显示他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人。据此，笔者认为，毛泽东既纵火，又灭火，完全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态行为。

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和拥有七亿人的中国，被一个人格分裂的狂人玩弄于孤掌之中，难道不是我中华民族的悲剧吗？

但毛泽东的人格属智能型，人格分裂的病态却成全了他“权谋盖世”的天才。为了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他不惜生灵涂炭，号召**“全国全面内战”**。在发动内战前期，他曾多次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那是平衡权术的假言，而**“全面内战”**、**“武装左派”**，则是他内心的真语。与此相反，在内战后期，夺权目的达到了，他要鸣金收兵，那时他说他反对武斗就是真话，而他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纯系舞台戏言。由此可见，人格分裂的毛泽东，是个天才的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权棍或曰权力谋略家。

在天才的权力谋略家毛泽东的愚弄、蛊惑和导演下，全面展开了**文革无义战**：数百万红卫兵、造反派，高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激烈地展开了武装夺权大拼杀，数千万群众稀里糊涂地跟着摇旗呐喊，数亿人在怅然自失中默默冷眼旁观——中华大地呈现出一片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惨烈场面：50～60 万人在“保卫毛主席”的枪炮声中，“义无反顾”地成了短命“烈士”，一百多万伤残者，也随之成了“荣军”过客。

记者李肃写道：“在这场中国人奇怪的内战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始终清醒，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过程中清除异己，巩固统治。他，就是一手导演这场内战的毛泽东。”正是：

权棍施惑术，导演文革无义战；伏尸数十万，血染万里江山！

2、 纵火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他七十三岁生日的寿宴上，发出了令人惊愕的“生日号召”：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许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已经是说一不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怎么会号召全国全面内战呢？是造谣？还是丑化？

笔者在前面“十月进击”一节中写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右派势力的强大阻力，使位极人臣的毛泽东，倍感孤立，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多月中，一边冷静观察的毛泽东发现，受他支持的左派造反派的造反精神，虽已活跃起来，但各地党内右派扶植的右派造反派，势力依然强大，左派造反派处于少数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党内右派势力的反抗，使他有理由认为，全国政权的大部分权力，还在刘、邓党内右派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形成了刘、邓复辟的党内基础，从而使他的政令很难贯彻到全国。这种权大而不逞的局面，使他深感其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内决斗形势已经形成。对此，1967 年 2 月 3 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的政府领导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裸露了他当时的心机：‘**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们不听**。’因此，他决心对权力来一个根本解决。他从重庆左派红卫兵通过制造‘**一二四**’武斗取得胜利的事件中得到启示：支持左派造反派剥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重组干部队伍，把刘、邓党内右派势力排除于各级权力之外。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置生灵荼毒于不顾，利用造神运动在芸芸众生中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借酒发狂，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内战**’。”

那么，重庆“一二**四**”**武斗**是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8 月 28 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一部分红卫兵，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同一些反对造反的群众发生冲突。

为了稳住重庆， 9 月初，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示意，可以效仿国务院支持成立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即“西纠”那样，建立**重庆工人纠察队**。到了 9 月中旬，重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很快建立了起来。由于是各级中共组织、各地公安和各单位保卫部门发起的，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都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左派造反派无法匹敌。“工纠”中党员多，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生产骨干多，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认为造反就是“右派翻天”，这就注定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左派造反派势不两立；他们人多势众，且有各级党政权力撑腰，这也注定他们在与左派造反派发生矛盾冲突时，往往居于上风。尽管他们人多势众，却被骂成令人不齿的“保皇派”。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支持红卫兵造反派“炮打司令部”，已是大势所趋，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人，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等等。这时他们才发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为了稳住阵脚，争取主动，甩掉“保皇派”的帽子，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一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便调整策略，改“工纠”的组织名称为“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他们接过造反大旗，决定于 12 月 4 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十多万“工纠”队员参加的大会，学着左派造反派那样，将大会定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以此来证明，他们是造反派，不是保皇派。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演出”，怎能逃过左派造反派的眼睛。消息传出后，重庆左派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驻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12 月 3 日上午，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联席会议，制定了冲击大会主席台方案。由于冲击主席台必然引起武斗，他们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并计划将三辆救护车，安排停放到主席台后边的马路上。为下一步斗争做准备，他们还计划在武斗开始后，迅速占领和控制住火葬场。

也许当事者迷，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等人，都是政治角斗场上的老手，竟没有识破红卫兵娃娃们的诡计。12 月 4 日，“工纠”组织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如期召开。

令大会主持人没有想到的是，大会刚开始，十多万“工纠”队员参加的大会，竟被千余名左派红卫兵所控制。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红卫兵，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冲上主席台，夺过话筒，抓住“工纠”写的“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标语，以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进行了激烈批判。他们说，当我们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口号时，“工纠”竟敢提出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的“反革命口号”，是可忍？孰不可忍？台下的左派红卫兵冲着“工纠”队员，高呼挑衅性的口号：“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工人纠察队员被激怒了，双方发生了口角争执，继而推搡抓扯，接着便是拳脚相加……大规模武斗，终于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上发生了。

军警迅速介入，迅速将对立双方隔离，大会也因而迅速流产。

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抓住有利战机，发动哀兵攻势。他们以受害者身份血泪控诉重庆市委和“工纠”的暴行：他们声明，他们在“一二四血案”中，伤亡 200 多人；他们从控制的火葬场抬出五具待火化的尸体，摆放在重庆市委门前进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他们通电

中央文革和全国红卫兵造反派,“强烈抗议”重庆市委和工人纠察队的暴行;接着,他们又组成了“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告状——他们把中共妖魔化敌人的诡诈权术,运用得精妙绝伦,表演得有声有色。

他们的宣传攻势收到了立竿见影效果。当“一二四血案”传到北京和各地后,引起全国震惊和激愤。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来电慰问左派红卫兵,各地造反派纷纷致电重庆红卫兵造反派,表示坚决和他们站在一起。策动和帮助重大“八一五”制造这次武斗的“红卫兵首都三司”,于 12 月 17 日发起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提到:**“在重庆,……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重庆“八一五”代表在会上作了 40 分钟慷慨激昂的讲话。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莅临大会,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

在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全国左派红卫兵造反派的声讨声中,重庆工人纠察队和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土崩瓦解,重庆市委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尽管后来的调查证明,“一二四事件”只打伤了人,没有打死人。

重庆“一二四事件”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是以左派造反派胜利告终的一次大规模武斗。重庆左派红卫兵造反的胜利,鼓舞了毛泽东,使他看到了通过内战战胜刘、邓右派的光明前景。于是,他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在毛泽东举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的第四天,即 12 月 30 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所在地的康平路上,发生了号召内战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双方伤残 91 人;不足一个月以后的 1967 年 1 月 25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石河子地区,发生激烈枪战,两天内战中,双方打死 29 人,打伤 80 多人……自此,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伤亡的全国性内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有权就有理”的中共赤文化。无论是左派造反派或右派造反派,他们长期腌渍在**“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一切”**、**“驯服工具论”**和**“对敌人手软就是对革命残忍”**等血腥专制思想的染缸里,一朝权在手,他们便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容分辩的绝对真理。在这种“有权就有理”的薰陶下,他们便理直气壮地要为攫取权力而拼杀。

二、各地武斗掠影

从 1967 年到 1969 年的武斗期间，最流行的毛泽东语录或“最高指示”是：

造反有理！

要文斗，不要武斗。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武斗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枪杆子里出政权。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在这种自相矛盾、出尔反尔的“一分为二”思想指导下，全国各地无一例外的展开了**文革无义战**！笔者根据政府有意或无意散落于民间的不完整资料，将各省内战情况概略分述如次：

1、北京

据报导，北京发生过数百次武斗。其中，西单商场、国棉二厂、外语学院、钢铁学院、国棉一厂、京西煤矿、琉璃河水泥厂和通县等单位，武斗规模较大，通县参加武斗人员最多，多达两万以上。又据《鬼哭神嚎的五月》一文记载，北京从 4 月 30 日到 5 月 10 日的 13 天里，发生五十人以上规模的武斗 133 次。但最有影响的是著名高等学府——北大和清华两校校园内的武斗。

北京大学三次大规模武斗。1968 年 3～7 月，在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派造反组织之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武斗。

3 月 29 日凌晨一时，“新北大公社”的头头们经过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决定首先对“井冈山兵团”据守的 31 楼（斋）发起突袭，然后各个击破。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井岗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

28 楼、36 楼等 6 幢宿舍楼，打退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轮番进攻。在这场武斗中，双方有一百多人受伤。

4 月 26 日，双方为争夺 36 楼，发生了第二次大武斗。双方出动全部人马，全力拼斗。“新北大公社”的**孙蓬一**、**高云鹏**任武斗现场指挥。孙蓬一手拿“语录”大叫：“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啊！勇敢的不怕死，怕死的是胆小鬼!”这次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双方有 200 余人受伤。

“四二六”武斗以后，“新北大公社”一方占领了 17 至 24 楼、26 楼至 27 楼，对据守 28 楼的“井冈山兵团”，构成包围态势。7 月 22 日，“新北大公社”出动数千人的武斗队，个个头戴矿工头盔和铁网面罩，身着薄钢板盔甲，手持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向围困在 28 楼里的“井冈山兵团”发起进攻。面对数千人武斗大军的进攻，只有几百人的“井冈山兵团”，在停水断电、绝粮断炊的困难条件下，奋力抵抗。在多次冲击与反冲击中，双方都大批使用了自制的燃烧瓶，杀伤对方。期间，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和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没有参加武斗，却被活活打死，成了武斗中的无辜者。

清华大学武斗。在清华园里，一派独大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迅速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声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自称拥有战士一万多人；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声称为“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称“四一四派”，自称拥有队员七、八千人。

1968 年 4 月 23 日，两派学生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在夺去了十多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后，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个句号。

2、安徽

据报导，安徽省自 1967 年初到 1968 年底，在合肥、安庆、芜湖、蚌埠、淮南等地，伤 10 人以上的武斗数十起。其中蚌埠、淮南武斗最为惨烈。

1968 年 5～9 月，安徽省蚌埠和淮南，85 个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造反，要揪“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 12 天。经毛泽东、中央文革的调查，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是“**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因对方不服，便发生大规模的围剿和反围剿内战。军令如山倒，驻军和民兵参战，其中，参战民兵达五万多人。在长达 35 天内战中，先后有 7,300 多人伤亡，其中击毙“敌人”3,433

人，驻军、民兵伤亡 525 人，827 间建筑被毁。

又据报导，12 军进驻安徽支左后，三个月收缴了各种枪支 2.9 万余支，火炮 290 门，各种车辆 51 台，还有大量弹药。

3、福建

1966 年 11 月 24 日，受福建党内右派支持的工人赤卫队，在福州市体育场召开的一万多人大会上，发生武斗，造成 100 多人受伤。这个武斗被称为“一一二四事件”，是福建第一场大规模武斗。

1967 年 8 月 10 日，陈伯达与福建省对立双方谈判代表谈话时，“八二九”造反派当面控诉“革造会”造反派说：**“他们围攻我们，他们有四千人围攻我们，我们在楼上只有四百人。刚才通电话时，他们还在进攻，占领了三楼，还放毒气，还准备放火，用抢来的棉被、棉衣放火。冲击时他们用小口径步枪配合，我们大部分人被小口径步枪打伤，伤势很重，有的穿过肺部、心脏，他们还挖了三个洞，准备用炸药爆炸。我们重轻伤有二百多人。现在已断水、断粮。我们战友二天二夜没有吃了，天天被挂牌游街和强奸。”**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成骨折。武斗中，有人目睹，被对方抓获的俘虏，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为了对付左派造反派，各地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于是，全省各县市十多万农民纷纷进城，在福州、诏安、厦门、泉州、崇安、晋江、福清、仙游、建阳、建瓯、南平、宁德等市县，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先后参加了导致双方数千人伤亡的多次武斗，并酿成了“火烧交际处”事件。在沙县，1967 年 9 月 10 日武斗中，双方各有数十人受伤。11 月的武斗，又使 200 多人受伤，其中重伤 100 多人。又据报导：武斗使石狮县社会混乱，武斗频繁，死于武斗者，多达 30 余人；工厂、商业、学校曾一度关闭；侨汇、华侨存款也被冻结；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物资缺乏，物价昂贵，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4、广东

随着中英关系和香港局势的紧张，中英边界地区的中国造反派，不断发起“反英援港抗暴”事件。6～7 月间，宝安县造反派，在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经常举行集会、示威游行，而向英军、英警进行挑衅和过境

袭扰事件，即达数百次之多。1967 年 7 月 8 日，中国广东造反派与港英当局，在广东宝安沙头角发生严重武装冲突。那天，中方前线指挥部接到了可以开火的命令，几十挺机枪同时向联乡会大楼和两路英警开火。15 分钟之后，处于劣势的英方，被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 42 人。由于英港方克制，事态没有扩大。

1967 年 7 月，广东已形成“东风”和“红旗”两大造反派组织。23 日，在江青发出“文攻武卫”号召的第二天，两派在中山纪念堂前摆开战场，参加拼杀者超过万人。是役，“东风”公布本派“死亡与失踪”26 名，伤者无数，“红旗”公布本派“牺牲 33 人”，负伤 400 多人。

1967 年 7～9 月间，在广州，不断发生“红旗”派与军队的冲突，也不断发生两大派抢夺军用物资和武斗系列事件。8 月 5 日深夜，一造反派动员 1,000 多人，冲进已实行军管的市公安局，将两名值勤战士击昏后，捆绑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砸开武器仓库大门，抢走各类枪支 1,850 枝，子弹数万发——这是广州造反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抢枪；另一造反派闻讯后，于 8 月 7 日，抢走远洋公司黄埔仓库的枪支弹药。8 月 8 日晚，一造反派近百人，乘车到郊区新市附近的金鸡岭枪械库抢枪；8 月 9 日，另一造反派开着架有机枪的卡车，冲进市军管会大院，对办公室和警卫连大楼进行打、砸、抢、搜，抢去一批枪支弹药。8 月 10～12 日，一造反派 8 次冲击广州警备区机关，抢去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8 月 10 日晚，另一造反派则依恃人多，到长堤抢了广州市人民银行保卫金库的一连解放军的武器，8 月 12 日，他们又开两部卡车到市内海军后勤部，抢了该部的军用卡车和两卡车武器。由于大量枪枝弹药被对立造反派抢走，广州地区武斗加剧，随之发生了两派残杀数百名无辜群众和吊尸街头事件。8 月 20 日，一造反派出动十几部卡车，到石井军火仓库抢枪时，武力攻打广州条堤广东省总工会，残杀无辜群众 140 人。白云机场附近农民，不甘坐视，也携带抢来的枪炮，参加中南林学院内的武斗，造成数十人伤亡的严重流血事件。

1968 年 8 月，广东海南区革委会和儋县军管会，调集野战军、地方部队和全岛 8 个县 14 个国营农场的武装基干民兵，在革命老区儋县城乡，对“联络站”派组织人员，实行武装围剿和烧杀。在当时称为儋县“八月戡乱平暴”事件中，全县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有 700 多人，伤残无数，烧毁民房 700 多间；儋县军管会设置临时监狱 500 多所，非法关押干部群众 5 万多人，许多人受到了严刑拷打或逼供信，致伤致残者数以千计。

5、甘肃

1967 年 4 月 18～19 日，为了争夺《甘肃日报》的控制权，“红联”和

“革联”两对立造反派，进行了争夺“甘肃日报”大楼的攻防战。双方出动数千人参战，造成数百人受伤。

1967 年 7 月 28～30 日，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红三司”造反派，为“讨还血债”，向“红联”派的“长风司令部”武装占据的长风机器厂大楼，发动攻击。在强敌面前，“红联”被迫撤出了大楼，逃到兰州铁通学院。在那里，他们组成了“前线指挥部”，用卡车组织了上万人的武斗队，配置长矛、马刀等武器，准备对占据长风机器厂的“红三司”进行报复。从 7 月 28 月凌晨到下午，双方在长风机器厂大战了几个回合，最终以“红联”失败而结束。是役，双方死伤 200 多人。

1967 年 7 月 31 日到 8 月 2 日，“革联”与“红三司”两派在兰州二中校园里武斗。双方出动数千人参战。武斗造成数十人受伤，将教学大楼烧毁。

据报导：甘肃的“红联”与“革联”以及后来杀出来的“红三司”，**“在老干部、省军区、兰州军区的不同支持下”**，一遍接一遍地械斗、厮杀，造成伤亡不计其数，**“几乎阻截了兰新、兰青、包兰、陇海铁路的交通……”**

6、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也是武斗频繁、规模很大、死伤很多的省份之一。根据能查到枪杀百人以上武斗记录的有：

柳州市武斗。1968 年 4 ～6 月，“联指”派与对立的“四二二”派的“造反大军”，战于柳州。在“三大战役”中，双方相继投入武斗兵力高达数千人。武斗中使用的武器有：步枪、手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炸药包、高射机枪、自制大炮、高射炮、六 0 迫击炮、九二野战炮等。双方死亡数百人，伤残不计其数。

桂林市武斗。1968 年 5 月 24 日到 8 月 3 日，“联指”派与对立的“四二二”派的“造反大军”，战于桂林。在两个多月的攻防战斗中，两派投入兵力数万，战死 426 人，伤残不计其数。双方除使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外，还用加农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互相轰击。

南宁市武斗。1968 年 7 月至 8 月一个多月中，“联指”派在围攻“四二二”派据点事件中，参战人员使用了重机枪、手榴弹、炸药包、土坦克、无后座力炮、火箭筒、战防炮等武器。官方称：在这次武斗中，双方共被打死 1,587 人，枪杀俘虏 2,324 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 246 人，烧毁街

（巷）33 条，5 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另外，有近 7,000 人的“四二二”造反派及其家属，逃进地下人防工程里躲避战火，被“联指”派开闸引入邕江河水，除少数人逃出投降外，其余全部溺死。

梧州市武斗。1968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6 日，在两场大型武斗中，共打死 67 人，处决 43 人，伤残不计其数，烧毁房屋 1,029 幢，其中 181 间商店和 20 间厂房，建筑面积 387,300 平方米，致使 3,800 多户居民无家可归。

龙州县武斗。1968 年 4 月下旬到 6 月，“联指”派在龙州县对“四二二”派武斗后进行的屠杀，189 人被杀，其中 12 人是俘虏。

河池地区武斗。 1968 年 8 月 10 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率 6911 部队、 9 个县的民兵和“联指”派武装人员，围剿“四二二”派的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该战役共毙杀 1,016 人，伤者难以计数。

梧州平桂大战。1968 年 5 月 25 日到 7 月 7 日，“联指”派攻克“平桂井冈山”派的西湾战役，双方共计死亡 398 人，其中战死 101 人，被杀俘虏 297 人，伤者无数。7 月 11 日，“联指”派开始向“红旗公社”武斗据点珊瑚矿发起进攻，双方共死亡 351 人，其中，战死 112 人，突围中死因不明 10 人，突围过河时淹死 6 人，杀俘 223 人。

马山县武斗。3 月 19 日，“联指”派开始向县城内的“四二二”派据点发动总攻。整个县城枪声大作，硝烟弥漫。是役，双方被打死 387 人，127 间民房被炸毁。

柳江县武斗。1968 年 8 月 24 日，柳州军分区调动 8 县两矿一郊的“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的“四二二”据点，打死 146 人。

另外，在毛泽东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后，广西军区、广西区革筹小组负责人韦国清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道路。”

又据史料记载：1968 年 7 月至 8 月，即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的一个多月中，全区共屠杀和迫害致死 **84,000 多人**。其中：

宾阳县屠杀和迫害致死 3,951 人。贵县屠杀和迫害致死 3,138 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 263 人，教师 156 人，学生 47 人，居民 106 人，农民 1,311 人，其它 1,255 人。临桂县屠杀和迫害致死 2,051 人，其中，国家干部 326 人。灵山县屠杀和迫害致死 3,222 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 500 人

以上，287 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事件。桂林市屠杀和迫害致死 1,128 人，其中，干部、工人 556 人，全市冤、假、错案高达 11,522 起。天等县屠杀和迫害致死 1,651 人。上思县屠杀 1,701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 1.33％。钦州地区 7 个县市失踪 10,359 人。玉林地区屠杀 10,156 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同其他各省革委会一样，都是在腥风血雨中成立的！面对血流成河的广西自治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社论高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但广西老百姓却说，广西“**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人之惨，历史罕见**。”然而，广西杀人魔头韦国清，因屠杀有功，在步步高升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安然寿终正寝于 1989 年的北京！

7、**贵州**

据悉：贵州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1967 年 7 月 29 日，贵阳市暴发了紫林庵的“七二九事件”。“八一八”兵团借着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的支持，用刀枪“踏平”了“四一一”兵团。“踏平”中，双方伤亡数百。到最后，谁也没有沾光：两派的子女都得下乡当知青，两派摇旗呐喊的“革命群众”，都得继续在饥饿线上挣扎。

在铜仁县，“三红”派攻占县城后，满城墙上、街巷里、汽车上，到处都刷着“活捉杨平凡”、“杀死杨平凡”的标语。他们要“活捉”、“杀死”的杨平凡，竟然是李再含支持的“八五”派头头、铜仁军分区司令员兼革委会主任。据说，杨平凡曾带着警卫“**在街上走了一圈**”，扬言要“杀死杨平凡”的“三红”派，竟没敢向他开枪。不久，“八五”派杀回县城，夺回了县城的控制权。在“三红”与“八五”两派你来我往地拼杀中，数百人丧生，数千人负伤。他们的最终结局，同贵阳“八一八”和“四一一”的结局，别无二样。

8、**河北**

据悉：河北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保定“解放”以后，一直是河北省省会。“一月革命”后，1967 年 2 月，保定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即由 38 军支持的“工总”派和由河北军区、63 军及李雪峰、刘子厚支持的“工筹”派。5 月，两派展开武斗。目击者

称：**“两大派组织在保定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临街的房屋全都被打得弹痕累累。街上堆起了路障，用沙袋堆成的掩体随处可见。街上的血一滩一滩的，尸体随处可见。城内没有一天不响枪的，只不过有时激烈有时稀稀拉拉，激烈的时候如同炒豆一样，乒乒乓乓听不清个数。城内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居民大都躲出去了。在保定广大农村，战斗更为激烈。由于地域辽阔，枪炮能施展开来，对立双方投入了最大的火力。枪炮声爆炸声昼夜不停，有时火光映红了半个天，几十里外都能看见。当时，战斗最激烈的，当属满城县。此地由于有一个军械库，对立双方都想占据这块宝地，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连迫击炮都用上了，双方死伤无数。”**武斗断断续续持续到 1976 年 11 月，估计死伤数千人，省府被迫迁到石家庄。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 年 6 月 23 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 7 人，伤 250 余人。

邯郸地区磁县县城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解放军向正在武斗的造反派开枪，造成 51 人死亡，伤数百人，当地时称“二九事件”。

9、湖北

据悉：湖北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前，武斗导致数千人伤亡。其中，1967 年 6 月 4 日到 30 日，武斗双方共死 108 人，伤 2,774 人。

“七二〇事件”后，8 月 31 日至 9 月 6 日，湖北荆州和沙市两地的“钢派”与“新派”组织之间，发生了伤亡千余人的系列武斗事件。其中：荆沙“八三一”大武斗，前后进行了 7 天。两派参战人员 6,600 多人，包括大批轻、重机枪和 13 门大炮在内的轻重武器四千多件，消耗子弹 10 万发，手榴弹数百枚，炮弹 137 发，打死 43 人，打伤二百多人，烧毁棉花 9,010 担，损失粮食 48,000 多斤。9 月 1 日，“钢派”宣布对荆州城内戒严，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四处搜查“新派”。在 6 天戒严中，打死老人、小孩和其他无辜群众 8 人。9 月 2 日凌晨，“钢派”向沙市向阳纱厂开炮，打死 8 人，炸伤数十人。

1967 年 7 月到 1968 年 8 月，在广济县，两派组织之间发生了系列武斗事件。武斗中，全县共打死 252 人，打伤千余人。

在来凤县，“五一八”武斗最为知名。从 1968 年 5 月 18 日至 8 月 10 日，两派之间的武斗连续发生。双方共打死 87 人，重伤致残 300 多人，近

千群众挨打、负伤，数千人被俘后遭到虐待。

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 18.4 万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 6.6 万人，打死 600 多人。

10、**黑龙江**

据悉：黑龙江也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中共政治局还透露：1966 年 10 月 21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生了第一次武斗事件，造成 2 死 91 人受伤，是全国最早几起武斗事件之一。

1967 年 4～7 月，哈尔滨市有 97 个单位发生武斗 132 起，伤 146 人。武斗中，他们用自制的铁甲车参战。（图 13-1）



图 13-1：哈尔滨市武斗中自制的铁甲车

5 月 1 日，鸡西市“红联总”、“三司”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 9 人死亡，44 人重伤。

5 月 6 日，佳木斯市两派参战二万多人，死 11 人，被捕 150 人；6 月 30 日，两派又在佳木斯师范学校内展开武斗，死 3 人，150 多人伤残。

7～8 月，伊春市林业局在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对立的两大派组织，都以“革命造反派”自居，权力分配互不相让，矛盾随之激化，导致武装冲突。8 月 2～25 日，两派武斗全面展开：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37 幢政府建筑物被毁，伤亡 3,750 多人，其中死亡 1,944 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8 月 12 日，哈尔滨港务局造反派与哈工大造反派在哈工大门前武斗，当场死亡 3 人，伤 100 多人。

8 月 16～17 日，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两造反派发生武斗，8 人死亡，700 多人受伤。28 日下午 2 时多，六七四厂和港务局 200 余人，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在两辆坦克配合下，用机枪扫射另一派人员，造成 12 人死亡，20 人受伤。

8 月 27～28 日，哈尔滨市“捍联总”在哈一机厂与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展开武斗，双方动用了步枪、机枪、手榴弹、装甲车、坦克等武器，造

成十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28 日下午，哈尔滨市“捍联总”与“炮轰派”，又在松江罐头厂展开武斗，造成 9 人死亡，6 人受伤。10 月 12 日，“捍联总”围攻“炮轰派”最后据点哈一机厂，动用了机枪、冲锋枪和炸药，击毙 5 人，毙伤 100 余人。

1968 年 1 月 12 日，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两派发生武斗，造成 3 人死亡，51 人重伤。

2 月 10 日，佳木斯市两派在市电机厂等七个地方，同时进行武斗。双方参战 1,900 余人，动用步枪 227 支，冲锋枪 101 支，轻重机枪 4 挺，八二迫击炮 1 门，手榴弹 109 枚，汽车 55 辆。武斗至次日凌晨结束。造成 7 人死亡，119 人受伤。

11、**河南**

据悉：河南也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1967 年 2 月 7 日，河南郑州的几个左派造反派和“保皇派”为争夺《河南日报》社而发生的武斗。双方投入的武斗人员约三四千人。他们使用的武器，主要是石头、砖块、棍棒等。这场武斗，造成大批人员受伤。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公社”，就有 200 多人被打，受伤 40 人，5 人被绑架。

5 月 26 日，郑州市的“二七公社”和“十大总部”，进行了大规模武斗。两派武斗中，除使用石头、砖头外，还使用了“冷兵器”铁棍、钢条和刀具等，造成严重伤亡。双方伤亡千余人，其中死亡数十人，有名单查的重伤号，就有五六百名。

5 月 31 日， 河南“十大总部”、“河造总”与“二七公社”多次武斗，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

由于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为首的军内右派，“支右”不“支左”，江青号召河南左派“二七公社”，拿起武器，进行“文攻武卫”。“二七公社”旋即在郑州等地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庞大的武斗队伍。他们修筑工事，配置现代武器，进行“文攻武卫”。7 月 26 日，他们大规模洗劫了郑州卷烟厂和开封化肥厂，导致 37 人毙命，291 人伤残，300 人当了俘虏，2 人被活埋——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在河南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

8 月，开封市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

埋。

河南省会的武斗，迅速波及其他城镇。河南“二七公社”在一些地市级城市的组织，如：开封师院“八二四”、洛阳“八一六”、焦作矿院“八一八”、平顶山“二七”联络指挥部、新乡“八一八”、“河南二七公社信阳分社”、“河南二七公社鹤壁分社”、“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河南偃师高中“八二五”等等，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以河南军区何运洪政委为首的军内右派的残酷围剿和镇压，伤亡数千人。

确山县曾发生武斗事件 17 起，造成人员伤亡数百人，其中打死 18 人，重伤 91 人。

12、湖南

据悉：湖南也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1966 年 8 月 19 日，中共长沙市委认为，红卫兵造反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他们调动党团员和工人，组成“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殴打游行示威中的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打伤数十人。

1967 年 6 月 4～6 日，长沙“工联”派和“红联”派，在长沙中苏友好馆内外进行武斗，打死 10 人，伤 215 人。

8 月 20～22 日，“工联”派与“湘江风雷”派，在长沙市解放路、五一中路一带进行武斗，双方死亡 24 人，伤百余人，炮火烧毁湘绣大楼。

9 月 4～5 日，长沙“工湘”派与“高司”派，战于长沙县莲花桥、九江庙、坪塘镇和市二十四中等地，双方共杀死 80 人，其中，枪杀被俘人员 13 人，枪杀被俘伤员 8 人。

8 月 10 日到 9 月 20 日，长沙、湘潭两地的“工湘”派与“红联”、“革造联”派，在湘潭县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发生系列武斗，双方死亡 92 人，受伤上百。为了“垫棺”、“祭坟”，双方虐杀战俘 10 多名！

7 月 4 日到 9 月 25 日，常德地区“工湘”派和“红联”派，在常德市东风剧院等处进行系列武斗。双方死亡达 300 余人，伤数千。

1967 年 8～10 月，湖南零陵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湘南大屠杀惨案。中共道县党政负责人，发动“红联”造反派和基干民兵等积极分子，进行

“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运动。文革后，据零陵地区“处遗办”的查明：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的 66 天中，道县共杀死、自杀 4,519 人，其中被杀 4,193 人，逼迫自杀 326 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他 10 个县市，也先后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杀死、自杀 9,093 人，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当年“处遗办”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 4,500 多人；第二次统计，共杀 6,500 多人；第三次调查结果是死两万多人——究竟那一次统计真实呢？

零陵地区**下乡知识青年大逃亡**。1967 年 8 月，在零陵地区**“群众专政”**的大屠杀中，零陵县和江永县先后发生了枪杀、打死下乡知青 10 人、打伤 15 人的惨案，引发起远离家乡的知青们和他们的父母们的极大恐慌。其中，被驱赶到江永县的 6,000 多名长沙知青，先后从三个方向冒死逃向郴州、全州、桂林火车站，强登火车，逃回长沙。江永知青大逃亡，震撼了长沙市民。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驻军四十七军，破例对回城知青予以保护，并下令所有下乡知青返回长沙。

13、**吉林**

1967 年 10 月 16～19 日，吉林长春市“八一八野战军”、“长春公社”与对立的“红色造反军”发生武斗。双方为争夺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楼，死亡多人，伤数十人。

1967 年 9 月 18 日，“红二”派和“公社”派在火车站前，为争夺几处主要建筑展开激战。两派动用了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〇”迫击炮、“八二”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发射了 350 发炮弹和 47 万发子弹，40 多人在战斗中死亡，200 多人受伤。

又据报导，长春地区的两派四大组织（“长春公社”和“东方红公社”，时称“公社”派，“红革会”和“二总部”，时称“红二”派）之间发生数十次武斗，持续了半年多，先后造成 219 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14、**江苏**

1967 年 1 月 3 日，南京地区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与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两派，战于江苏饭店。为争夺饭店控制权，双方投入兵力上万，数十人负伤。6 月 27 日，南京机器制造学校发生武斗，造成伤员数十人，机校大楼被烧毁。8 月 16 日，南京市“红总”派与“八二七”派之间发生武斗，双方受伤达 60 人，其中多人重伤。

在无锡，1976 年 6 月 23 日晚上，“革派联总”主力军与“九二”两派，在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摆开战场。结果“九二”派寡不敌众，留下 9 具尸体，仓皇出逃。6 月 27 日，“九二”派出动用钢板焊成的土制“装甲车”，向“革派联总”据守的市一中和轻工业学院地区冲击。当土“装甲车”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时，驾驶失控，翻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 9 人全部烧死。7 月，“革派联总”出动三百多名武装人员，进驻无锡县洛社镇。“九二”派集中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使“革派联总”败走洛社。武斗死伤数十人，沪宁铁路被迫中断半日。到了 9 月，在两派武斗中，主力军派被对方打死了 20 多人。

宿迁县发生三次大规模武斗，以“七三”武斗为最。1967 年 7 月 3 日，“白派”和“红派”，在农村和城镇同时开打，双方 5,000 多人参战。武斗持续 5 天 4 夜，双方共被打死 10 人，打伤 200 多人，其中，重伤 50 多人。

此外，省内其他城市如镇江、常州、无锡、杨州、南通、徐州等，都发生过大规模武斗，伤亡数十到数百人不等。

15、江西

1967 年 6 月，南昌两派在南郊农学院武斗。县基干民兵和县党政军支持的“赤卫军”，共同将农学院团团包围。农学院的红卫兵见对方人多势众，急电省城求援。驰援的“英革司”造反派，在 13 岁的小学七年级(暂时无法升入初中)学生司令“黑皮”的率领下，在朱姑桥与“赤卫队”展开激战。当**“桥上的红卫兵看到老保们抬着几具尸体和伤员匆匆登车绝尘而去，不禁欢呼雀跃。但欢呼过后一清点战场，发现自己也损失惨重：牺牲 38 人，负伤 100 多。大家的心情顿时又沉重起来，不少女生还痛哭失声。”**

1967 年 6 月 29 日，南昌军分区发枪弹给右派造反派，支持他们与左派造反派武斗。

6 月 29 日到 7 月 4 日，赣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打死 168 人。7 月 13 日，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火烧萍乡煤校，死伤多人。7 月 15 日，他们用机枪扫射五十八次快车，打死 5 人，打伤 7 人。7 月到 8 月初，赣州军分区率领下的“反复辟大军”，枪杀左派红卫兵、造反派 223 人。

抚州市左派与右派发生冲突，军分区出兵镇压左派造反派，打死打伤数十人。遭到重创的抚市左派造反派，向省城告急，省城左派造反派立即派出数千人，驱车前往支援。车至铁路大桥，打前锋的红卫兵，遭到了军分区独立营的伏击。当场伤亡两百多人。其中，13 岁“黑皮”司令指挥的

“英革司”，又被打死了十几个。

在南昌军分区发枪弹给右派造反派的同时，6 月 29 日，受中央支持的“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左派造反派，在莲塘大肆夺枪。他们洗劫了民兵、武部、军区政治部、警卫团等军事单位，夺枪 85,000 多支，子弹 1,524 万多发。

8 月 24 日，在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清**的指使下，江西军区司令员**杨栋梁**和洪都机械厂工人**张羽**，以抚州军分区“扣留支左人员”、军分区独立营“不服从调动”和军分区部门以上领导“抗拒来南昌开会”等罪名，率部去抚州“平叛”，枪杀了包括抚州市人武部长在内的 65 名干部和群众。这是全国军队内部第一次火并事件。

16、辽宁

1980 年 11 月，中共政治局的连续会议上透露：1966 年 11 月 8 日，在辽宁省沈阳机械厂，发生了第一次企业民兵动用枪支参加武斗事件，造成 15 人死、170 多人伤残。这是全国最早发生的几起大规模武斗事件之一。

在沈阳，1967 年 5 月 18 日，沈阳黎明机械厂两派，在黎明文化宫发生武斗，打伤 60 多人，并造成大批工人游离。6 月 1 日，“辽革站”派冲击“辽联”派总部东北工学院，与“辽联”战士发生大型武斗，多人伤亡。6 月 18 日，沈阳医学院内的“辽联”和“八三一”两派发生武斗，双方动用了步枪、手榴弹一类军用武器，多人伤亡。8 月 6 日，“八三一”和“辽革站”两派，在铁西区兴华电器厂武斗，数十人伤亡。8 月 10 日，沈阳黎明机械厂两派，在黎明文化宫再次发生大型武斗，双方动用了轻重机枪、火炮等武器，死伤一百多人。8 月 17 日，沈阳纺织厂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烧毁原棉 1.7 万多担。

在鞍山，钢铁公司武斗急剧升级，数十人伤亡。武斗导致高炉、平炉被迫停产，整个工厂有瘫痪报废危险。中央决定成立以三十九军军长张峰、政治委员陈绍昆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大规模武斗才被控制。

在旅大，海军基地和旅大警备区各持己见，支持不同派别。由于部队支持，武斗双方几乎占据了市内所有制高点，据险武斗，导致数百人伤亡，从而使一个美丽宁静的滨海城市，到处弥漫着战火的硝烟。

在锦州，1967 年 6 月，“好字派”的“锦联筹”围攻锦州二高中，几百人负伤。8 月初，锦州武斗进入高潮：右派“好字派”和左派“糟字派”，

都分别用步枪、冲锋枪、重机枪和大炮武装了起来。8 月中旬，“好字派”偷袭“糟字派”的铁路局大楼，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多人伤亡。9 月 18 日，在锦州医学院外围，“好字派”伏击“糟字派”巡逻队，毙伤“糟字派”10 多人后，胜利撤出。1968 年 1 月，锦州“糟字派”的“石油兵团”，与锦州驻军支持的“好字派”的“锦联筹”，在四十军司令部门前武斗，双方死伤数十人。1968 年 5 月，锦州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左派“糟字派”遭到了残酷镇压。据事后的不完全统计：“糟字派”被打死和迫害死的多达 2,100 人，伤残无数。

17、内蒙

1967 年 2 月 5 日，在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军队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一名军官奉命开枪打死了一个学生，重伤 20 多人。

1967 年 10 月 20 日到 1969 年 5 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在惨案中，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大专毕业生），有 56,200 多人被杀害，377,000 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高达 355 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8、宁夏

1967 年 7 月 31 日到 8 月 1 日，宁夏银川“指挥部”派与“筹备处”派，在银川市西塔摆开战场。是役，“指挥部”派获胜，打死“筹备处”人员 5 人，打伤多人，重伤致残 6 人，抓获俘虏 300 多人。

8 月 5 日晨，“指挥部”调集万人大军，南下声援永宁“指挥部”派的时候，在永宁大观桥遭到永宁县武装部部队与基干民兵的阻击。据当事人回忆：**“大官渠里泡满了尸体，沟沟坎坎里，到处是狼狈不堪的人群，腰扭了的，脚崴了的，家人同事跑散了的，丢盔撂甲的，人人惊恐万分，懊丧不已。才知道，真正打起仗来，可不是看电影那么简单热闹。那炒豆子似的枪声，都是催命符，听得人心里只发毛，恨爹妈少长了两条腿！”**是役，数十人伤亡。

8 月 20 日后，青铜峡河东“筹备处”聚众数千人，向“指挥部”据守的最后据点青山机器厂发起强大的攻势。并顺势包围了驻扎在峡口、青山机器厂支持“指挥部”的 8047 部队。当接到反击的命令之后，8047 部队用迫击炮、轻重机枪构成了密集火网。在火网中，一排排人被机枪扫倒，一堆堆人被炮弹炸翻，一时间，青山机器厂前面的旷野，成了真正的屠宰场。是役，“筹备处”伤亡 200 多人。

8 月 30 日，“指挥部”与“筹备处”在银川市掌政桥公社进行武斗。“指挥部”派武斗人员 100 多人，携带机枪、步枪，突然袭击了“筹备处”设在掌政桥公社的基地和据点。双方共死亡 15 人，伤数百人。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判定青铜峡发生“反革命叛乱”，命令驻军 8047 部队协同“指挥部”武装，剿灭“筹备处”武装。是役，当场打死 101 人，打伤 133 人。

19、青海

1967 年 1 月 12 日，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在青海省实际主政的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对“八一八”造反派行经早已看不惯，在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的支持下，决心摧毁“八一八”造反派。机会来了。他趁着“二月镇压”的有利时机，宣布“八一八”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立即加以取缔。2 月 22 日，他派 13 个步兵连包围了《青海日报》社大院，那里有近两千名“八一八”造反派和支持者防守。23 日，他宣布西宁市全城戒严。下午两点多，他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二十多分钟后，战斗结束，打死造反派 169 人，打伤 178 人，军人死 4 人，伤 46 人。史称“青海‘二二三事件’”。

20、山东

据悉：山东也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1967 年 5 月 7 日，由山东两大派组织间发生的多达几十万人参与的武斗事件。6 日下午，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以“保皇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为由，调集二三十万造反派，包围了“保皇派”据点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大院。5 月 7 日凌晨 4 时，王效禹等人调动的大批人员，在宣传车前导下，拥进大院，对占据省革委会大院人群，进行分割围攻，双方棍棒、拳脚相加，打得十分激烈。两个多小时后,“保皇派”被制服。这次武斗，数千人受伤，致残数十人。

在山东郯城，还发生了件骇人听闻的虐尸事件：武斗中，一派在打死对方 18 人后，还不解恨，便将死者尸体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21、山西

据悉：山西也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为最。在这个中国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的长治地区，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对立两派。由于陆地交通被切断，空军被迫用“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为了攻城，军分区打开军火库，武装各县数万民兵，并集中组成“剿匪兵团”，由军分区司令统一指挥攻城战。其中，在攻占一座煤矿的激战中，打死守方 200 多人，致伤数百人。而在另一次攻防交火中，守方竟俘获参战的现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并缴了他们的武器。在攻防战斗中，“**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1967 年 8 月 1～9 日，山西省晋中地区平遥县的“总司”和“联络站”两派，在平遥县城，爆发了由陈永贵插手的系列武斗事件。8 月 7 日，陈永贵等到达平遥后，县武装部、县革委的一些人以及受其支持的“总司”头头，本来就是反陈派。陈永贵到达平遥一中后，随即通过“联络站”的高音喇叭发表讲话，明确表态支持“联络站”。“总司”派被激怒了。下午 5 时许，他们便对平遥一中发起总攻。是役，双方动用了重机枪、钢炮、土枪、步枪、硫酸和带钩长矛等武器，死伤 50 多人。在总攻开始后，“联络站”迅速将陈永贵转移到城隍庙里躲藏。

为了平息“总司”派平遥之难，山西省革委会旋派“红总站”十三冶的钢铁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乘坐 20 辆 10 轮大卡车，前往支援平遥“联络站”派。与此同时，太原和平遥附近各县的“红总站”派，也派出万人以上的武斗队伍，火速赶到平遥，支援钢铁工人，形成对“总司”派的夹击之势。8 月 9 日晨，六十九军军长解振华，率部陪陈永贵重返平遥，来“制止武斗”。上午 9 时许，在陈永贵等人指挥下，“红总站”向“总司”的所有武斗据点发起进攻。到下午 2 点左右，“总司”除部分人员突围和数十人伤亡外，其余全部当了俘虏。武斗基本平息。

22、陕西

据悉：陕西也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从 1966 年底到 1968 年 9 月间，全省发生的重大武斗事件有：

1967 年 1 月 28 日，西安庆华电器制造厂的“文革临委会”与“联合总部”两派之间发生武斗，造成数十人负伤。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西安两大派在持不同观点的现役军人师、团级

干部的“高参”下，组织了有工厂、学校、机关和现役军人参加的大规模武斗。双方参战人员近万，出动坦克 4 辆，汽车百余辆，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体育用枪等常规武器，造成交通中断，社会秩序大乱，机关、工厂被迫停工，停产，商店关门。武斗中，双方共打死 69 人，打伤数百人，相互俘虏近 2,000 人。

1967 年 8 月到 1968 年 5 月底，安康县城先后发生两次大规模武斗，打死 784 人，炸毁防洪堤 8,357 立方米，烧毁房屋 15,000 间，使 18,000 余人无家可归；城市防洪、自来水、照明等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损失达 1,400 多万元。

1967 年 8 月，宝鸡几个造反组织，先后抢走宝鸡市武装部、县武装部、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步枪 1,400 多支，轻机枪 110 多挺，冲锋枪 2 支，手枪 100 多支，子弹几十万发。

1967 年 10 月 14 日，铜川市两派出动 400 多人，以真枪实弹在前原村附近交战，双方打死 25 人，打伤 60 多人。

1967 年 10 月 24 日，横山县的“二红总部”与“红工机”两派之间发生武斗，双方打死 3 人，打伤 20 余人。

1967 年 12 月中旬，兴平县一个武斗组织，大搞打、砸、抢、抓的武斗活动；到 1968 年 6 月，他们先后数次抢劫武器 200 多件，拦路夺取部队高炮 1 门，抢劫银行现金 5 万多元，粮站面粉 4 万多斤，食油 1 千多斤，打死 17 人。

1968 年 4 月到 5 月中旬，汉中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步枪、冲锋枪 1,400 多支，轻机枪 150 多挺，发射子弹 100 多万发，打死 160 多人，炸毁电机厂、电影院、面粉厂、粮库等建筑，迫使城内交通中断。

1968 年 6 月 5 日至 9 月 10 日，陕西省佳县“红工机”与“东方红”两派发生持续 98 天的武斗，共打死 60 多人。

1968 年 7 月 19 日，西安市两派在市西郊白家口发生武斗，双方有数千人参战，动用了航空机关炮、土坦克等武器，打毁楼房 1 幢，打死 21 人。

1968 年 12 月到 1969 年 2 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个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当局借运动镇压左派造反派。在“清队”中，7 万名职工中有 45,400 多人（占 65%，）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 297 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对此，一年多前还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的左派造反派们，惊恐万状，被逼揭竿而起，真正造起反来，使全地区陷入动乱。驻军谎称左派造反派为“发生反革命暴乱”，经毛泽东的中央批准，他们出动坦克、装甲车、平射炮、喷火器等武器，展开了对左派造反派的围歼和追击。战斗中死伤 48,300 多人，其中死亡 13,300 多人，宝鸡驻军两栋营房被炮火击毁。

此外，陕西勉县武斗死亡 85 人；蒲城县武斗双方及无辜平民死 34 人，

城区十多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毁。

23、上海

1966 年 12 月 29～30 日，上海“工总司”与“赤卫队”两派在康平路进行大规模武斗。是役，重伤 91 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的“赤卫队”全军覆没。

1967 年 6 月 29 日到 8 月 4 号，上海“联司”与“工总司”两派在上海柴油机厂等地，进行了系列武斗。6 月 29 日中午 12 点，“联司”对“工总司”发起进攻。是役，双方 200 多人受伤，其中重伤 50 多人，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派受到重创。7 月 18 日，双方又在上海柴油机厂展开武斗，一千多人参战，300 多人受伤，一人重伤，不治身亡。上海“工总司”决定铲平“联司”。8 月 4 日，他们在上海柴油机厂周边地区，发动了上海最大规模的进攻战斗。4 日清晨，以总指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调动 10 万大军，号称 24 万，陆上出动一千多辆卡车和公共汽车，水上出动巡逻艇和打捞船数艘，天上出动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柴厂上空示威，他们从水陆空三路将上柴厂团团包围住。而此时，盘据在上柴厂厂区内的“联司”，仅有武装人员 1,000 多人。是役，双方死亡 18 人，伤 983 人，致残 121 人，“联司”寡不敌众，被俘 663 人，全军覆没。

1967 年 2 月到 1968 年 1 月，上海市青浦县的“工青联”和“农革司”两大派，在青浦县进行了系列武斗。其中上规模的有：5 月 4 日，一日之内连续发生三次大规模武斗，参战达 7,000 多人，伤数十人；7 月 18 日深夜到 22 日晚，双方使用了石头、棍棒、刀具、梭标等“冷兵器”和土制的炸弹、燃烧瓶等，打死 3 人，伤残 400 多人，大片房屋变成了废墟；10 月 17 日下午，“工青联”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对“农革司”派的两个据点进行攻击，造成 1 人死亡、2 人严重致残的恶果。

24、四川

据悉：四川也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四川成都一三二厂血案：1967 年 5 月 5～6 日，成都一三二厂的“一一一九革命造反派”与“八一兵团”、“赤卫军”之间发生武斗，打死 45 人。

四川成都双流中和场大武斗：1967 年 5 月 19 日，由成都“红成”、“八二六”与“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两派之间展开武斗，伤亡数十人。

重庆七月北碚大血战：1967 年 7 月，重庆“八一五”与“砸派”两派为争夺地盘，在北碚地区展开系列武斗，双方死亡 58 人，伤 1,000 多人。

重庆嘉陵江大桥武斗：1967 年 8 月 14 日，重庆“八一五”与“反到底”两派为争夺嘉陵江大桥的控制权，进行了大规模武斗，其中，“反到底”派在江北部署了 18 门大炮，一天发射炮弹 6,000 多发，炸死 27 人。

重庆夏季系列武斗：1967 年 8 月，重庆“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展开了系列攻防战。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迫击炮、无后坐力炮、122 榴弹炮和炮艇等武器进行战斗，击沉拖轮 3 艘，打坏 12 艘，死亡 351 人，伤残数千。

四川江津六七大武斗：1967 年 6～9 月初，四川江津县的“九七”（属“八一五”）派与“红总”（属“反到底”）派，在江津县城进行长达 3 个月的系列武斗。开始，双方使用棍棒、梭标、石头、砖头、瓦块、土炸弹、土炮进行武斗；当“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发出后，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坦克都派上了用场。系列武斗中，“九七”派死 9 人，“红总”派被击毙 4 人，双方数百人负伤。随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杀俘事件。

四川重庆“一〇二七”血案： 1967 年 10 月 27 日，重庆军地两方的“八一五”与“反到底”两派在总参通信兵学院进行武斗时，该校驻军向冲击营地的“八一五”派开枪，有 32 名造反派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 人受伤。

四川重庆空气压缩机厂系列争夺战：1967 年 6 月到 1968 年 8 月，重庆“反到底”派与“八一五”派在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内外，进行了系列武斗。双方动用了轻重机枪、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等现代武器装备，战死 124 人，伤残上千，还创造了一夜之间发射高射炮弹 1 万多发的纪录。当“发射纪录”上报到中央后，毛泽东赞道：“**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枪战：1968 年 2 月 17 日到 3 月 7 日，成都“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在成都人民南路进行武斗，双方死亡 44 人。

四川八县联防打中江事件：1968 年 3～5 月，四川革委会领导为“彻底铲平”中江地区的“红成”派和重庆“八一五”派，调动绵阳、江油、三台、德阳等八县武装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武斗。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武斗中，发生了“凤凰山事件”、“太阳山事件”和“乐玉事件”等几起

大惨案，打死 800 多人，致伤致残 6,000 多人，约有 3 万多人惨遭毒打和毒刑。

四川泸州三次“武装支泸”事件：1967 年 7 月到 1968 年 7 月间，四川革委会领导，调集 10 多万武装人马，打着支泸造反派的旗号，与“八一五”派在泸州进行了系列血战。双方使用了尚未装备部队的步枪、机枪等新式武器，动用了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武器进行厮杀。厮杀造成 43,800 多人伤亡，其中死亡 21,100 多人，致残 8,000 多人，动用国库 3 亿多元、粮食 6,840 万余斤，损失汽车 1,000 多辆和大批物资。

对此，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25、天津

1967 年 4 月 27 日，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体育学院、河北大学等院校学生，在南开大学校内，展开万人大武斗，伤 270 多人，其中重伤 50 人。

据多方报导，发生武斗的还有：天津铁路分局的“5.12 武斗”、天津钢厂的“7.28 武斗”、天津 609 厂的“609 武斗”等，伤亡人数不详。

26、西藏

1967 年 3 月，“二月镇反”被平凡后，西藏自治区形成了“大联指”和“造总”两大对立的造反派。6 月前，双派之间的武斗是拳脚，进入 7 月，拳脚被冷兵器如石头、砖块、棍棒、大刀、砍刀、梭镖等取代。在拉萨，以冷兵器对阵的大规模武斗发生过多次，参加武斗人员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据记载，7～8 月，两派大规模武斗有五次：7 月 9 日，争夺拉萨大昭寺内的市人委招待所；7 月 14 日，争夺拉萨第二招待所的广播权；7 月 30 日，争夺拉萨汽车保养厂“造总二司”的武斗据点；8 月 13 日，争夺拉萨工交小学据点；8 月 29 日，在拉萨市财经大院藏式大楼的肉搏战。五次武斗共打伤 1,100 多人，其中重伤 228 人，不治身亡 1 人。

进入 9 月，西藏武斗进入热兵器即现代化武装战斗时期。

9 月 6 日，“大联指”派在堆龙德庆县拦截住“造总”购进的一批粮食，双方以现代武器展开了战斗。是役，“造总”有 7 人当场被打死，20 多人重伤；随粮食车队进藏的 11 名“首都中学红代会”人员中，7 人重伤入院；“大联指”派的伤亡人数不详。

9 月 15～16 日，“大联指”和“造总”战于拉萨市郊曲水县，双方动用了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等现代化武器。是役，“造总”2 人当场被打死，1 人负伤后被抛入河中淹死，数十人被炸伤、打伤，100 多人被俘；“大联指”派伤亡不详。

1968 年 1 月 22～23 日，“大联指”同“造总”在拉萨市区摆开战场。武斗中，“造总”1 名成员中弹身亡；在市交通局，“造总”派有 3 人被打死。是役，“造总”派 5 人死亡，22 人重伤；“大联指”派伤亡不详。

1968 年 6 月初，大昭寺、西郊等地驻军，遭到“造总”派的围攻、辱骂、殴打、断粮、断水，有的还遭到射击，打死打伤军队官兵 20 多名，抓走数名。

27、新疆

据悉：新疆也是中共政治局承认文革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的十二个省区之一。

1967 年 1 月 26 日，在石河子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队与地区造反派“石造联总”交火。这是军队参与武斗、大规模开枪杀人事件，史称军队打响的“文革第一枪”。是役，部队共射杀 26 人，打伤 74 人，包括误伤“自己人”20 个。

1967 年 5 月 8 日，新疆两大造反派“三新”和“三促”，为争夺《新疆日报》社展开大规模武斗。双方参战达千人以上，使用石头、砖块、瓦片、棍棒等冷兵器，大打出手，造成数十人受伤。

1967 年 7 月 26～27 日，乌鲁木齐市的“三促”和“三新”两派，在新疆医学院展开大规模武斗。这场武斗，烧毁和炸坏了两幢楼房，死 5 人，伤数十人，有 400 多个“三新”派武斗人员被俘，遭到毒打和关押，有的被打死、致残。

1967 年 10 月 14～15 日，“三促”和“三新”两派，又在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学校摆开战场。武斗人员在机枪掩护下，用炸药包炸开教学楼和西楼。这次武斗，双方死亡 5 人，伤 24 人，两幢大楼各被炸开一个洞，教学仪器被毁。

1968 年 1 月 9 日，还是“三促”和“三新”两派，又在乌鲁木齐市一中展开激战。此次武斗，双方参战人员有一千多人，使用步枪、冲锋枪、

机枪、手榴弹等现代武器，双方死亡 10 人，伤数十人，财产损失达 7 万多元。

1967 年 12 月 19～23 日，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区，“革命造反军”派和多数派进行了长达 5 天的战斗。在战斗中，抄了 87 户社员的家，烧毁部分民房，双方共打死 19 人，打伤 162 人，其中重伤 60 多人。

28、云南

“炮派”与“八派”是云南省的两大造反派组织，分别受到昆明军区与云南省军区的支持。在昆明，两派武斗使昆明市一分为二：西城及西郊属“炮派”的势力范围，叫“炮管区”；东城及东郊属“八派”的势力范围，叫“八管区”。各地州市县也跟着一分为二；不同的是，当地哪一派占上风，该地区就基本上变成了哪一派的势力范围。

1967 年，“炮派”与“八派”在昆明市展开了系列武斗：

4 月 26 日，“炮派”在市内检阅台召开了“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准备会后游行，“八派”冲击会场，迫使大会中断，双方遂在广场上、东风路上展开打斗；5 月 29 日，两派在昆明市区拼杀，双方战死 266 人，重伤残逾千人；8 月 1 日，两派在昆明海口二九八厂拼杀，双方死 3 人，伤十数人；8 月 24 日，“八派”围攻“炮派”据守的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双方战死 9 人，伤残数十人；8 月 27 日，两派在三五六厂拼杀，双方战死 20 人，伤 230 人；8 月 31 日，“炮派”攻占“八派”据守的博物馆，双方战死 8 人，伤 10 人；9 月 3～7 日，两派在昆明电机厂展开厮杀，双方战死 68 人，伤残数十人；11 月 22 日，两派在昆明市粮食局第一直属库武斗，双方战死 2 人；12 月 10 日，“八派”攻打昆明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死 1 人，损失财产 42 万多元；12 月 13 日，“八派”攻打“炮派”据守的昆明钢铁公司桥头钢厂，双方战死 17 人，伤 4 人；12 月 22 日，“八派”攻打“炮派”据守的预制管厂，双方战死 14 人；12 月 22 日，“八派”攻打驻守元宝山的“炮派”，双方战死 15 人；12 月 27 日，“八派”在小麦峪设伏，打死过路平民 10 人，伤 1 人；12 月 27 日至 29 日，“八派”攻打“炮派”据守的云南砖瓦厂，死 21 人，伤残多人；12 月 27 日至 29 日，“炮派”组织大兵团作战，攻打据守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八派”组织“一一三 0”，双方战死 66 人，数百人伤残。以上合计死亡 520 人，伤残 2,000～3,000 人。

1967 年 8 月，在东川市城区、农村、工厂，杀害“八派”的工人、农民、干部 200 多人。“炮派”不准“八派”收尸，造成几十具尸体曝晒一周

之久。

昆明“炮派”有个闻名全省的“工八团”，他们是由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他们响应毛泽东“**全面内战**”和“**武装左派**”的号召，已深深地卷入了当地派性拼杀。1968 年 1 月 1 日到 18 日，他们全副武装从昆明乘坐汽车出发，沿滇缅公路西进 450 多公里，18 天内，先后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打死、打伤平民无数，仅下关一地，发现曝尸 200 多具。

1 月 27 日，下午 6 点 10 分，当地驻军党委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的帽子，围歼于甘海资矿区中，打死“工八团”184 人，煤矿职工家属 59 人。“工八团”480 人被捉。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将“滇西挺进纵队”定性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反革命匪帮的典型”，在云南全省掀起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导致 14,000 多人死亡，38,500 多人伤残。

此外，在一平浪、文山、大理、曲靖及其他一些地方，武斗频繁，伤亡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

29、浙江

1967 年 3 月，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导致对立造反派都有恃无恐。

1967 年 4 月以来，浙江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

1967 年 7 月，左派造反派“省联总”在中央文革和驻浙江空 5 军、20 军的支持下，武装镇压肖山、富阳等地的右派造反派“红暴派”。其中：在肖山县，打死 27 人，绝大部分是被俘后被活活打死的；在富阳县，打死 135 人，打伤致残 319 人，烧毁房屋 1,200 百余间，被砸单位 166 个，受害家庭 2,005 户；在嵊县，双方共战死 191 人。1968 年 8 月，“省联总”带领“宣传队”去浙南镇压“红暴派”，仅丽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 11 人。林彪摔死后，引发浙江省权力再分配，左派“省联总”逐渐失势。1974 年 12 月，失势的“省联总”，与军分区支持的右派“红暴派”，战于金华县城关镇，双方共战死 29 人，打伤 200 多人。

在浙江，武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军队和造反派一起战斗即军民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战斗，当属温州。

据报导，在温州，一派是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支持的“温联总”，

持“红暴派”观点，受到温州军分区司令员的公开支持，一派是由驻浙二十军支持的“工总司”，持“省联总”观点，受到中央文革的公开支持。都有强大后台支持的两派，从 1967 年起到 1976 年止，随着高层权力的不断调整和再分配，他们之间的武斗，也随着此起彼伏，整整持续了十年。十年间，双方战死 3,000 多人，平民死亡 2,000 多人，造反派和平民的伤残无数，难以统计。

三、派性大血战实录

自从毛泽东发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支左”和“大量武装左派”的指示后，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全面内战。由于资料不足，笔者根据政府有意或无意散落于民间的不完整资料，选择规模较大的武斗战例，简介于后，以飨读者。（图 13-2）

1、温州的十年大拼杀



图 13-2：广州红卫兵小报上刊登 1967 年“820”武斗中死难的部分“烈士”

在毛泽东“**全面内战**”和“**武装左派**”的号召后，浙江温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造反组织。一派叫“**温联总**”，其司令**姚国麟**是个卫护中共官僚体制的退伍军人，因而深受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的信任和各县区人武部门的支持；而王福堂的老上级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则是他们的坚强后盾。“温联总”组成人员，主要是党政机关基层干部、国企温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的工人，其外围支持者，大多是官僚体制的拥护者或既得利益者，是中共官僚体制的基本群众。因此，这个造反组织是个名副其实的右派保皇派。另一派叫“**工总司**”，其领导层面基本上是些政治嗅觉灵敏的文人和对官僚体制不满、向往自由、民主非国企的青年工人，他们的外围支持者，多数是文革前官僚体制的受害者和不满者。这就决定了“工总司”是中共官僚体制的颠覆者，因而是货真价实的左派造反派。因此，“工总司”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地方政府和军分区的排斥和压制；但他们能通天：通过串连，他们取得了中央文革的同情和支持，并建立起了密切联系。

各有后台支持的“温联总”和“工总司”，是温州十年拼杀的主要对手。他们都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拼杀；但这种拼杀却使他们付出了 3,000 多个宝贵的性命和上万个伤残者，也使温州市中区化为废墟，老百姓的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的损失，高达数千万元。

随着高层权力的再重组、再分配，十年中，他们经历了互有胜负的三

个回合大拼杀。

第一个回合是 1967 年初到 1968 年 8 月的大拼杀。

1967 年 1 月 23 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之后，以温州军分区司令员为首的军方，获取了主导温州形势的政治权力。他与温州地区右派当权派一起，暗中抵制毛的文革路线，扶植右派造反派“温联总”，压制左派造反派“工总司”，使“温联总”成了可以左右温州形势的强大保皇组织。一年多的数十次武斗中，“工总司”往往屈居下风，伤亡人数也比“温联总”多得多。

到了 1968 年 8 月，“工总司”时来运转，他们以受压着的身份昂首阔步，同“温联总”展开了第二回合大拼杀。

由于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主要领导在“支左”上严重分歧，省军区政委、省军管会主任**龙潜**和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被控为“支右”不“支左”，随即失去了权力。1967 年 8 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任命二十军政委**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省军区代政委，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为省军管会副主任，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代省军区司令员。

在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之前的 7 月 25 日，据称，“工总司”巧设纵火计，烧毁温州市商业中心区五马街的房屋 2,000 多间，并将罪责转嫁到“温联总”身上。据此，南萍决定派二十军一个团进驻温州，剿灭“温联总”“匪帮”。8 月 1 日，这支“支左”部队打败了“温联总”的阻击，杀进温州，协同“工总司”对“温联总”进行围剿。“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先后在仰义、牛山、三溪，藤桥等地组织抵抗，后在永嘉，瑞安等县进行反围剿战斗。由于有毛泽东爱将许世友暗中支持，到 1971 年 9 月的三年中，“工总司”和“支左”部队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进剿，除带来惨重伤亡外，并没有剿灭“温联总”。

1971 年 9 月，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国温都尔汉，他的爱将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纷纷落马收审，“工总司”因而军心动摇，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锐气大减。“温联总”乘机凯旋归城，同“工总司”展开了此起彼伏的第三回合大较量。

由于南、陈、熊的倒台，“温联总”逐渐得势。但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工总司”又获得了毛江左派的支持，旋又卷土重来：两派后台势力的消长，使他们在 1973 年到 1975 年间的多次大规模武斗中，各有胜负，无法独霸一方。然而，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温联总”再次失势，再次被赶出温州城，只好据山为“寇”。但由于许世友暗

中支持，“工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总”。

决定“温联总”与“工总司”两派最终命运的是1976年的宫廷政变。随着“四人帮”倒台和党内右派重新掌权，左派造反派“工总司”的头头们，或被处决，或被判刑，他们十年的“辉煌”战绩，也随之付诸东流——这就是他们紧跟“伟大领袖”造反和继续革命的悲惨结局，不论他们想到还是没有想到。随着“四人帮”倒台和党内右派重新掌权，右派造反派“温联总”的头头们，终于扬眉吐气了。这些以打、砸、烧、杀为业的头头们，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进入政界，如“温联总”司令姚国麟，荣任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支持“温联总”的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荣升浙江军区第一副司令。

温州两派拼杀，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十年武斗中，两派打死了3,000多人，绝大多数是年轻气盛的工人、学生，有的只有十四五岁。又据报导，十年拼杀中，无辜平民死亡，可能超过2,000人。有人看见，一个少年被打死了，造反派从冷库里拖出几扌东猪肉来作赔偿。在当时，这还算较有人性的。目击着说：**“第二天我再次从那里经过，见那少年的父亲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卖猪肉，一脸呆滞麻木的样子……”**十年武斗中，为“保卫毛主席”而“光荣牺牲”的人们，在天国里看见这位卖猪肉的父亲，不知会产生怎样的感伤！

2、广西烽火连天烧——四大武斗

在1968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之前，广西已经形成了以“联指”和“四二二”为代表的两大对立造反组织。“联指”是右派造反派，它的基本力量大多是中共官僚体制的受益者，他们的头头许多是中共官僚体制的卫护者，因而，他们得到了广西军区和地方各级武装部的支持。“四二二”是左派造反派，它的基本力量大多是没有权力背景的一般平民，他们的头头很多人都属弱势者。由于毛泽东“层层剥笋”的政治需要，他们被推为造反的先锋，封为“响当当”的革命派，受到了中央文革、周恩来等中共权力的支持。在各自后台的支持下，两派在广西自治区各地，展开了上百次的现代化大拚杀，**打死5～8万人，伤残难以计数**。到了1968年4～7月，武斗加剧，4个月间，上规模的大武斗竟有22次，**伤亡175,000多人，其中死亡101,000多人，失踪33,115人**。由于局面失控，中共中央不得不先后出台“七三”和“七二四”两个布告，为自己挑起的武斗降温、遏阻。（笔者年迈，确切数字只能寄托于中共档案解密和允许独立调查之后，由后代去修正。）1968年8月前，两派之间的拼杀，虽部队经常介入，但基本上属派性武斗；8月后，则质变成政府的军事镇压。根据政府有意或无意散落于民间的不完整资料记载，广西自治区上百次派性武斗中，双方战死数百、致伤致残数千人的大规模武斗有：

（1） 马山攻防战

1967 年底，马山县“联指”和“四二二”两大派的矛盾冲突越来越严重，抢枪事件不断发生。双方之间的武斗由拳头、石头、砖头、棍棒、大刀、长矛的“冷兵器”开始，逐渐发展为真枪实弹的大规模现代化战斗。

1968 年 2 月 15 日，“四二二”派向“联指”派据点发动进攻，双方展开石头仗。由于“四二二”人多势众，“联指”派被迫撤出县城。3 月 13 日，“联指”调动武装民兵 1,069 人和 3,000 多名群众，携带高射机枪一挺，轻重机枪 27 挺，步枪 894 支，炸药 2 吨，对马山县城实施包围。3 月 19 日开始向县城总攻。凌晨枪声大作，硝烟弥漫，整个县城陷入大屠杀中。

到 3 月 23 日下午，“联指”用炸药摧毁了“四二二”各个据点的工事。“四二二”被迫突围，撤离县城。“联指”在随后的追捕中，俘获数百名“四二二”派逃散人员，许多人被就地处决。

是役，**双方战死 197 人，枪杀俘虏 190 人，伤残难计其数**，127 间民房被炸毁，居民和机关财产损失达 30 多万元。

（2）柳州据点争夺战

1968 年 4～5 月，广西柳州“四二二”派的“造反大军”与柳州“联指”，在柳州市内摆开战场，展开了系列武斗，**造成 442 人丧生，数千人伤残。**武斗中双方投入数千兵力，使用的武器有：步枪、手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炸药包、高射机枪、高射炮、迫击炮和九二野战炮和自制大炮等。

4 月上旬，“造反大军”向“联指”派控制的柳铁文化宫首先发起进攻，死伤多人。4 月 20 日，“造反大军”拦截“联指”，打死 1 人，打伤 12 人，抢走现金七万多元和一些枪支。4 月 28 日至 5 月上旬，“造反大军”对“联指”派在柳州市水厂的武斗据点，展开进攻。战斗打响之后，“联指”派迅即从各单位的战斗队调来几百人增援。在长达半个多月的激烈交火中，双方死亡 20 多人，伤数十人。

三次战斗后，两派划江而治：“联指”占江北，“造反大军”据江南。

5 月底至 6 月上旬，柳州“联指”在江北的中共柳州市委礼堂私设监狱，先后杀害“造反大军”奸细 42 人。5 月 28 日，“联指”向柳州市区的“造反大军”武斗据点发起攻击，炸死 31 人。6 月，象州“联指保卫红色

政权野战军”派出 700 多人，携带长短枪 638 枝，轻重机枪 40 挺，炮两门，占领石龙、穿山、新兴农场、大桥园艺场，攻打柳州“造反大军”据点，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

据一位当年柳州二中红卫兵小将、如今已年近花甲、两鬓染霜的老人回忆：

在逐街逐巷的绝地反击中，我的冲锋枪子弹打完，正准备换弹匣。这时，一个鹿寨(县武装)民兵手持步枪翻墙而入。刹那间两人同时端枪瞄准对方。

我先发制人：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民兵：你也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当时巷子就我们两个人僵持在那，真的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啊！

横竖都是死，我只能硬着头皮打心理战:老俅，你那杆"老七九"打我只是一个窟窿，还不一定死。老子这把"五六式"扫过去，你会成蚂蜂窝死得很难看！我数三声放下武器，一……二……还没数到三,那个老俅吓得脚软缴枪!退枪膛一看,里面有子弹而且是上了(枪)膛的……

（3）梧州平桂矿区酣战

平桂矿务局是一家国营大型有色金属企业，位于梧州钟山、贺县境内。“全面内战”中，该矿形成了“平桂联指总”和“平桂井冈山”两大对立组织。前者属“联指”派，受梧州军分区和武装部支持，后者属“四二二”派，受驻平桂 6975 部队支持。1967 年底，两派先后在矿区进行武装割据，建立起了各自的武斗据点和领地。“平桂井冈山”占据了矿务局和珊瑚矿、新路矿、里松矿等地。到 1968 年 5 月，“平桂井冈山”处于有利地位，“平桂联指总”被逼向梧州军分区求援。

1968 年 5 月 25 日到 7 月下旬，梧州军分区派兵协同“联指”清剿“平桂井冈山”。他们先后调集钟山、贺县、昭平、富川四县的武装民兵和梧州地市“联指”派的武斗大军近万人，对矿区“平桂井冈山”派的武斗据点，进行了长达 54 天的清剿。**双方战死 147 人，残杀俘虏 389 人，伤残数千，平民伤亡 300 多人**。其中：

5 月 25 日凌晨,梧州军分区先后调集钟山县 2,000 人,贺县 460 多人,昭平县 300 多人,梧州地市“联指”近 200 人,富川县 200 多人,组成 3,200 多人清剿大军，配有迫击炮 3 门、重机枪 13 挺、高射机枪 5 挺、轻机枪 40 多挺、冲锋枪 140 多支、步枪 1,200 支、手枪 110 多支、手榴弹 3,500 枚等现代武器装备，向“平桂井冈山”的据点发动猛烈进攻，遭到了顽强抵抗，进攻受阻。

6 月 2 日，“联指”前线总指挥部，集中钟山、贺县、梧州民兵 2,600 多人，攻打选炼厂，11 日，占领该厂。

7 月初，“联指”又集中 5,600 兵力，与“平桂井冈山”战于黄华山，7 日大胜。

7 月 11 日，“联指”又集中 2,000 多兵力，向“四二二”的“红旗公社”珊瑚矿据点发起猛攻，21 日克之，杀死战俘 52 人。

7 月 15 日，“联指”又出动民兵 1,000 多人，兵分四路，围攻姑婆山。而“红旗公社”队伍逃至湖南江华，被俘人员多数遭杀，人数不详。

7 月 14 日，“联指”在西湾矿召开庆祝胜利和追悼“烈士”的万人大会。会上，枪杀俘虏 16 人以“祭奠革命烈士”，当天下午又杀 24 人以“追祭”。

矿区大战使平桂矿务局停产半年，造成财产损失达数千万元，1968 年直接亏损达 900 多万元。

（4）桂林夏季大拼杀

1968 年 4 月，在筹建桂林地、市革委会问题上，“四二二”派“造反大军”对桂林军分区和部分驻军支左人员偏袒“联指”派深为不满。4 月 29 日，“造反大军”上街游行，静坐示威。

5 月 4 日，两派开始抢占武斗据点，构筑工事，抢占地盘，扩大占领区域，并多次抢夺军分区、武装部、警备司令部和当地驻军的武器弹药。据统计，“联指”派共夺得各种枪枝 5,800 多支，各种弹药 325.7 万多发，手榴弹 12.44 万多枚，爆破筒 114 根，火炮多门，还有一批军用物资；“造反大军”共夺得各种枪枝 3,410 支，子弹 26.92 万多发，手榴弹 3,400 枚，火炮 8 门，以及炸药 50 吨。

6 月 5 日，“联指”向“四二二”派发出“最后通牒”：“**‘造反大军’必须无条件投降。如胆敢抗拒，则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6 月 6 日，“造反大军”在北门贮木场附近的铁路叉口，伏击“联指”汽车，当场打死“联指”人员 15 人，伤多人。 6 月 12 日，桂林“联指”派的“桂保总”，在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里，建立了一个“看守所”，先后关押“造反大军”258 人，其中，被打死 35 人，致伤、致残 75 人。6 月 13 日，“联指”向北站的“造反大军”发起攻击，炸死职工及家属 5 人，俘获“造反大军”6 人，打死俘虏 5 人。6 月 15 日，“造反大军”攻打“联指”据点，交火中伤亡多人，并烧毁了百货仓库和商品。6 月 25 日，“联指”在灵川县城一带与“造反大军”展开激战，双方死亡近 100 人，并打死无辜百姓 10 多人。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联指”连续 5 天 11 次冲击

军事 453 仓库，在抢夺枪支弹药中，打伤守围部队 114 人。7 月 13 日，在西山一带，“联指”从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军”的阵地发起进攻。在攻防中，双方使用了迫击炮、加农炮和榴弹炮展开激战，打死 249 人。 7 月 14 日中午，“造反大军”将桂林针织厂职工 12 人，拉到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这场历时近三个月的桂林大拼杀，直到 8 月初才结束。两派参战人员高达 1 万多，**打死参战人员和无辜百姓 600 多人，负伤致残者数以千计**。战斗使铁路运输中断，大片房屋被毁，大批物资被烧、被抢，学生停课，工厂停产……风景如画的桂林山城，腥风阵阵，血雨沥沥，全城陷入红色恐怖之中。

3、四川硝烟弥漫——四大武斗

1967 年 5 月 7 日和 16 日，中共中央前后作出了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两项决定，即当时称谓的“红十条”和“红五条”。决定撤销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第一书记**李井泉**的职务，并为李井泉关押的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市委书记张西挺平反，组成了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为首的省革筹组。由于在“支左”问题上，省军区和省革筹委领导内部意见分歧很大，驻军也不能步调一致。到了 7 月，造反派遂应时重新洗牌，分化、溶合成阵线分明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为拥刘、张的成都“八二六”和重庆“反到底”，他们被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称为左派造反派，受到了省军区的支持；另一派为反刘、张的成都“红成”和重庆“八一五”，他们经常受到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员的责难和压制，但却能得到五十四军的支持。拥护和反对刘结挺和张西挺夫妻官，成了两大派斗争的焦点；但其实质则是军方右派势力与中央文革矛盾在四川的反映。

在当四川武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第一夫人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针对四川等地的武斗，8 月 9 日，林彪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10 月 17 日，周恩来也说：“**外交部乱的不够，还要大乱。**”11 月初，周又说：“**乱得越透，解决得越快越彻底**。”显然，他们说的都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1968 年 7 月 28 日，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不自觉地流露出赞颂武斗的喜悦心情。他不加掩饰地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又赞道：“**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但在“舆论一律”的钳制下，御用精英们总能引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来证明毛是反对武斗的，总能用这个“通告”那个“布告”来证明毛、江、林、周反对武斗是真诚的；但他们却唯独隐瞒了**“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煽动者毛的真实目的：**“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显然，这都是御用精英们隐瞒真相的蛊惑。然而，血的教训使造反派们不再相信御用精英们蛊惑人心式的宣教：他们已经懂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出尔反尔、没有诚信的权力，“要文斗，不要武斗”和那些制止武斗的“通告”、“布告”，不过是一张张美丽的“画皮”，一旦他们放下武器，必遭灭顶之灾！因为，**“枪杆子里出政权”**已经是对立双方的行动准则，谁也不敢冒然放弃。因此，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喧闹中，在这个“通告”那个“布告”的漫天飞舞中，造反派之间的战斗，却愈演愈烈！

（1）重庆千人死亡大拼杀

1966 年 12 月 4 日，左派“八一五”造反派通过武斗击溃了老保“工人纠察队”后，在争权夺利中，很快被分化成新右派**“八一五”**和新左派**“反到底”**两大派组织。前者受到驻军五十四军的支持，后者得到周恩来、中央文革等中共高层的青睐。

1967 年 4 月 23 日，“八一五”与“反到底”两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继而推搡、拳打脚踢、砸宣传车和广播器材等。到了 5 月 23 日，两派又在石油学校进行武斗。武斗方式已从拳打脚踢升级到用钢钎、铁棒、匕首等冷兵器搏斗。这种升级版，迅速向全市蔓延，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单位，纷纷效法，导致数百人负伤。

6 月 5 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兵数千人前往支援。双方武斗使用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等常规武器，直打了三天三夜，死伤数十人，从而拉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规模作战的序幕。由于重庆有多个生产重型武器的兵工厂，两派得天独厚，很快用重机枪、高射机枪、机管炮、迫击炮、122 榴弹炮、高射炮、装甲车、坦克等重型武器武装起来，并投入了战斗。

从 7 月 8 日起，到 10 月底的三个多月中，“八一五”与“反到底”两派在重庆用现代轻重武器拼杀二十多次，造成近千人死亡。其中：

7 月 8 日，双方在红岩柴油机厂拼杀，射杀 9 人，伤数人；7 月 25 日，两派在重庆工业学校拼杀，造成数十人伤亡；7 月 31 日到 8 月 6 日，两派在市郊荣昌县拼杀，参战 700 多人，打死 78 人，打伤致残数百；8 月 3 日，

两派在国营望江机器厂，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打死艇上3名士兵；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拼杀，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沿长江炮击对方据点，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拼杀，双方参战人员逾千，支援人员上万，战死数十人，伤600多人；8月14日，为争夺嘉陵江大桥的控制权进行拼杀，“反到底”派用18门大炮，发射炮弹6,000多发，打死27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等多幢楼房和设备；8月18日到20日，两派在沙坪坎、杨家坪地区用坦克、装甲车进行战斗，打死128人，伤者无数；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战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8月28日，两派在北碚区歇马场战斗，投入兵力3,000多人，打死40人；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战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用高射炮打了一万多发炮弹，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打死200多人；10月27日，双方在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战斗，32人被打死，53人受伤……

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杨家坪武斗期间，一夜打了一万多发高射炮弹时，痛心疾首地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唯独没有疾首于被炮弹炸死的那200多个亡魂。

进入1968年，两派继续武斗。3月中旬，在长寿云台川东北石油钻探处本部拼杀，打死40多人；4月7日，两派又在国营长安机器厂战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把工厂炸成废墟，人员死伤不计其数；4月28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拼杀，40多人倒在血泊中；7月9日，两派又在江陵机械厂战斗，双方继续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战斗，造成大量武装人员和无辜居民伤亡，一百多幢楼房被打坏……

在一年多的系列大拼杀中，一、二千名造反派战士和无辜群众，都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伤残者难以计数，自认倒霉！（伤亡人数有多个版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考证越来越困难。看来，只能等到文革资料解密和官方允许独立调查后，比较准确的伤亡数字才能被考证出来。）

（2）三次支泸围剿“麻匪”

宜宾地区泸州市同全省其他地区一样，在反“二月逆流”的风潮中，逐渐分化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叫“红旗派”，对方送其绰号“黑匪”，属成都“八二六”和重庆“反到底”体系，拥护刘结挺、张西挺，他们被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册封为左派，因而也受到省军区、省革筹委部分

头头的支持；另一派叫“红联站派”，对方送其绰号“麻匪”，属成都“红成”和重庆“八一五”体系，反对刘、张，他们虽然受到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的批评和压力，但他们却能得到五十四军和省军区、省革筹委部分头头的暗中支持。

宜宾地区革筹小组组长和后来的革委会主任**王茂聚**，是一个信仰“枪杆子里出政权”屠夫，是“红旗派”的领导核心，因而为周恩来、江青等人所倚重。当他掌握宜宾地区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权力，他要效法毛泽东为巩固政权镇压反革命那样去剿灭盘踞在泸州市与他分庭抗礼的心腹大患“红联站派”。为此，他在中央文革默许和四川省左派头头的支持下，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支泸行动。

1967 年 7 月和 9 月，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茂聚先后两次调动数万名“红旗派”武装，配有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型武器，对泸州“红联站派”实施围剿。但由于“麻匪”受到五十四军暗中的坚定支持，两次围剿除造成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断绝、一些建筑物被毁和大量伤亡外，其目的并没达到，反使泸州更加混乱，“麻匪”更加“猖獗”。

机会终于来了。1968 年 3 月 15 日，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周恩来说：“**五十四军在重庆的态度有问题，助长了‘红成’打倒刘、张的气焰**。”康生说：“**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周恩来紧接着说：“**就是刘、邓复辟**。”江青说：“**刘、张是中央平反的**。”陈伯达说：“**说要李井泉，不要刘结挺，是反革命口号**。”由于五十四军“支右”不“支左”，受到了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的指责，中央军委的林彪，不得不拟定了五十四军调往云南、十三军入主重庆的计划。

王茂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了第三次武装支援泸州左派的“平叛”行动。1968 年 7 月 4 日，他调集数十个县、市的“红旗派”武装，配备无线电台和包括火炮、坦克等各种新式武器，四路齐发，水陆并进，围攻泸城。经过十几天的鏖战，“红联站派”兵败，被赶出城区，泸州成了“红旗派”的天下。

据《泸州历史大事纪》记载：“**1968 年 7 月，刘、张、王、郭调集数万人，非法动用国家资金 3 亿多元，粮食 6,840 多万斤，搞第三次武装支泸。结果，死亡 2,000 多人，伤残 24,000 多人，损坏车船 2,000 多辆(只)，并私设监狱关押干部、群众 3 万多人。**”这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好景也不长：随着毛泽东的战略转移、左派造反派利用价值告罄和刘、张失势，这位曾在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任上八面威风的王茂聚，终于被推上了“组织武斗”的被告席，不得不在“三忠于、四无限”的无限怨恨中，于 1969 年 11 月 21 日忿然自杀身亡。他又是一个“**武装左派**”和“**展开全国全面**

内战”的牺牲品，又成了一个罪有应得的替罪羊！

（3）涪陵三次围剿“贸匪”

1967 年 6 月，随着全国反“二月逆流”的发展，涪陵地区的涪陵县，也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忠实派”，又称“川涪工总司”，持重庆“反到底”派观点，受涪陵军分区的支持；另一派叫“红贸派”又称“红联司”，持重庆“八一五”派观点，因而也得到五十四军的暗中支持。双方都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1967 年 8 月 4 日，涪陵地区南川县“红贸派”的“红联站”，抢劫了县武装部军火库，数量不详。作为对抗，8 月 5 日，涪陵军分区根据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下令武装“忠实派”，给其发枪。“红贸派”闻讯后，立即组织数百人，强行打开军分区军械库，抢走枪械 3,000 余枝，火炮 22 门，子弹 100 多万发。8 月 8 日，“忠实派”用 5 艘机动船，将石柱、丰都两县武装部库存枪弹、火炮数千件，全部运到涪陵。至此，两派做好了进行现代化战斗的准备。

8 月 11 日，涪陵“红贸派”在龙潭车站附近，截击了“忠实派”军车 4 辆，激战中，双方共战死 58 人，伤 25 人。负责“支左”的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闻讯后勃然大怒，8 月 14 日，根据他的部署，下令“忠实派”对“红贸派”进行围剿。

8 月 15 日，数千名“忠实派”大军，在**李畔**亲自指挥下，对“贸匪”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把“红贸派”赶出了县城。两天战斗中，打死上百人，伤残上千。

战败撤离县城的“红贸派”，在焦石成立了“军法处”。到 9 月为止，该“军法处”先后进行了六次审判，处决“敌人”30 多名。

由于“红贸派”在涪陵城外、在涪陵地区其他各县对抗“猖獗”，李畔在 8 月 22 日、9 月 10 日，又先后组织上万名“忠实派”大军，又命令各县人武部武装复员退伍军人，组成一千多名“围剿贸匪”战斗队，协同“忠实派”大军对“红贸匪”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围剿中，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三七高炮、重机枪和望江 101 号炮艇等现代武器装备，起到了巨大作用。到 9 月 27 日，“忠实派”武装和协同作战的“围剿贸匪”战斗队，将突围到武隆县黄沙坝一带的一万多名“红贸派”武装，围而歼之，战斗结束。是役，历时 45 天，追击、围歼“贸匪”，经过了 4 个县、22 个区、67 个公社，打死上千人，伤残不计其数。据说，这位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李畔，曾因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身份，遭到四川军区司令梁兴初的整

肃，“整得很惨”；但他没走王茂聚的“路”，因而寿终正寝于 2009 年！

（4）八县联合破中江

到了 1968 年，当时的四川省绵阳地区，基本上是成都“八二六”派的天下，唯独中江县例外。中江县是抗美援朝红色英雄黄继光的故乡，英雄的价值在中江得到了充分利用。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责无旁贷地当了中江县“继光兵团”政委。“继光兵团”隶属于成都“红成”派，他们通过武斗，很快击败了隶属于成都“八二六”派的“东造司”，遂使中江县成了“继光兵团”的一统天下。“东造司”败出中江县城后，逃到中江县周围各市县避难，向成都“八二六”求援。在省革筹组的策划下，中江县周围八个县的“八二六”派，迅速成立了“八县联防指挥部”。他们调集了数万武装人员组成“联军”，准备对“四川的老保根据地”——成都“红成”派“继光兵团”盘踞的中江地区，来个“彻底铲平”。

“继光兵团”非等闲之辈，闻讯后便组织抵抗。他们在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和驻军的支持下，修筑工事，构筑据点，储备了大量粮食弹药，做好了迎敌的准备。他们扬言：中江城池“固若金汤”，是“八二六”的葬身之地！

在 1968 年 3～5 月间，“八二六”“联军”对中江县实行武装合围，切断了“继光兵团”的物资供应和公路交通，组织了多次大规模进攻。但由于武器落后，进攻中除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铲平”计划没有取得什么进展。4 月 27 日，当周恩来再次表态支持重庆“反到底”后，在权力的默许下，八县“联军”在广元市“砸开”重兵把守的战略物资库，“抢走”了大批援越武器装备。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联军”，对“继光兵团”构成压倒性的优势。进入 5 月，经过十多天的鏖战，“继光兵团”大部被歼，突围出去的千余人，几天后也被歼灭于他乡。到此，“继光兵团”全军覆没。是役，**800 多人死于非命，6,000 多人致伤致残**，三万人成了俘虏！

据知情者描述：“1968 年 5 月 15 日，大批武斗人员用双管高射机枪和三七炮对广福太阳山的对立派工事发起进攻，首先进行猛轰，然后以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武斗人员发起猛攻，最终攻占该阵地。”“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太阳山下 1 公里范围内就摆下了 200 多具尸体**，3,000 多名对立派武斗人员及群众被俘，武装押解驱赶到乐至后，宣布这些群众为‘俘虏’，五花大绑，押回中江。**沿途枪毙了 80 多人**。” 知情者回忆说，当胜利的“联军”入城后，这个“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左派造反派，任意掠夺钱财，奸淫妇女和女战俘，杀戮战俘，“**对自己的同胞却实施了比侵华日军、纳粹匪徒和苏联红军更为凶残的暴行**！”

唯一免遭灭顶之灾的头头是“继光兵团”的政委邓芳芝。当周恩来得知她被俘后，给四川省军区下达了个死命令：**保护好邓芳芝**！而其他俘虏的命运，都不在周总理“关爱”之内。省军区司令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一个团的兵力，把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解救了出来。

4、黑龙江伊春大武斗简介

1967 年 7～8 月，黑龙江省伊春市的两大对立造反派，都以“革命造反派”和“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在成立伊春市林业局革委会筹备委员会时，两派派性暴发。双方虽经过 15 天的讨价还价，但在席位占有上，没有达成妥协。于是，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在武装对峙中，为争夺财权，双方便派兵抢掠市财政、银行。8 月 2～25 日，双方的武装对峙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有 3,750 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 1,944 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在地方驻军的“支左”行动中，37 幢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 多名官兵伤亡。（资料不全，待补）

5、武汉大武斗事件略计

从 1967 年 6 月 4 日到 30 日，武斗双方共死 108 人，伤 2, 774 人。“七二〇事件”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和群众，高达 18. 4 万多人，其中，武汉市打伤、打残 6. 6 万人，打死 600 多人。

四、武力大镇压暨文革第二轮大屠杀

为了向刘、邓右派夺权，毛泽东在 1967 年初便发出了“**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以粉碎右派的反抗。为此，他下令“支左”部队“**可以开枪自卫**”；到 8 月 4 日，他又下令“武装左派”。但到 1968 年 7 月，他的夺权目的基本达到时，特别是他与右派做出妥协声明要“解放”右派干部后，左派造反派、红卫兵的利用价值由是告终，而且已经变成了他的累赘。于是，1968 年 7 月 28 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向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发出严重警告：“**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就歼灭之**！”随后，便下令全国各地展开对“不听劝告”的左派造反派进行武装围剿。由于资料不足，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选择规模较大的中共武力镇压事件，简介于后，以飨读者。

1、镇压西宁“二二三事件”

1967 年 2 月 23 日上午 11 点左右，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二炮驻青某军副军长**张晓川**等将领的直接策划

下，调动 13 个连的兵力，对占据《青海日报》社的左派“八一八”战斗兵团发起攻击。二十多分钟后，军区部队攻占了报社，占领报社的左派造反派全部就歼！是役，打死左派造反派 169 人，打伤致残 178 人，俘虏 1,000 多人，部队伤亡 50 人，其中死 4 人。这就是著名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青海二二三事件”是中共上层左、右两派在京西宾舘和怀仁堂政治角力的继续，也是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省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钩心斗角的总暴发。维护官僚体制反对毛泽东造反政策的赵永夫，在中央军委右派高级将帅的支持下，利用造反策略，一举夺了话不投机又支持“八一八”造反的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并把他软禁起来。这个事件也是中共军内右派对左派造反派的第一次血腥镇压！

一位现场目击者写道：“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们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23 日下午，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帅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在西宁大街上，也出现了“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标语。

有中央军委撑腰，赵永夫的胆子更大了。事件发生后，他下令省军区会同省公安厅联手逮捕左派造反派 4,131 人，拘留 2,522 人，管制 3,504 人。又据报导：“1967 年 2 月 26 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 所大学、12 所中专、职校、35 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 2 月 26 日到 3 月 5 日持续武斗，曾出动 T55 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 2,177 人伤亡，其中死亡 822 人。”（待档案解密核实）赵永夫也变成了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英雄，被招到北京作报告。

毛泽东对青海省的屠杀并不介意，因为是他发出“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指示；但在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的反复状告下，特别是“二月逆流”的

威胁使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拿赵司令是问，令周恩来处理。领了旨意的周恩来，于 3 月 24 日迅速下达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指责赵永夫夺司令员的权是**“反革命政变”**，开枪屠杀是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并把“赵永夫隔离收审”。但十多年后，左派被赶下台，青海省委撤销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表示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律予以平反昭雪。中央军委迅速作出了**“赵永夫受了冤屈”**的结论，使刽子手以正军职级别离休，寿终正寝于 1987 年 10 月 18 日。

那些惨死的冤魂们，当他们倒在刽子手赵永夫枪口下后，他们才明白：他们被愚弄了；他们不过是毛泽东手里一捧任意抛撒的炮灰！

2、湖南怀化大镇压事件

1967 年 8～11 月，湖南省怀化市左派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左派对抗，发生武装冲突。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都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与军队对垒。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 37,700 多人伤亡，其中死亡 13,300 多人，军队伤亡 430 人。

3、四川宜宾大镇压

1967 年 6 月到 1968 年 3 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造反派，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的不同观点，发生激烈冲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 1968 年 3 月 15 日先后表态说，**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之流的迫害**。应着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表态，拥护刘、张的左派“红旗”，在武斗中占了上风，先后发动了三次由部队和民兵直接参加的“武装支泸”行动，力图歼灭炮打刘、张的泸州右派“红联站”。但到了 1968 年 7 月，当毛泽东夺权战略开始转移左派利用价值因而告罄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及时重新表态，严厉批评了左派的“支泸行动”，并将“支泸”后台刘结挺和张西廷绳之以“法”，迫使“支泸”组织和指挥者宜滨地区革委会主任王茂聚自杀身亡。由是，泸州武斗形势大变，风光一时的左派“红旗”，最终惨遭灭顶之灾。后据统计，在部队直接参加下的泸州镇压，双方投入兵力高达 17 万之多，伤亡 43,800 多人，其中枪杀 21,100 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 15 个月之久。

一个当年的左派造反派回忆四十年前的经历后，写道：“40 年后想想，当造反派一文不值：武斗平息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除王洪文控制的上海和少数地区外，几乎没有造反派掌权。四川省的刘结挺、张西廷被

打倒，宜宾王茂聚自杀，郭什么被打倒，造反派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泸州周之良、赵殿国被判刑劳改，我们沙湾造反总部的头头某某，被‘红联站’人打的七生九死，还被扔进监狱，我本人也在‘一批双清’中以可笑的‘反军乱军’（我算老几!）等大帽子压着坐了几次‘学习班’，幸好我不曾坦白交待，不然也没此闲心坐在这里念文革经了！造反派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卸磨杀驴**！敢造反的绝不是好驴，该杀！于是有训子孙：不要参加党派**当炮灰**!”

4、 安徽蚌埠、淮南大镇压

1968 年 5～9 月，安徽省蚌埠、淮南两地 85 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他们打着要揪“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的造反旗号，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 12 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前往调查，毛泽东也派汪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调查后，中央文革和汪东兴认为，第二次造反是“搞反攻倒算”，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经毛泽东同意，新生的安徽省革委会，从合肥等地调动 5 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进行围剿。在长达 35 天围剿、追捕中，有 7,300 多人伤亡，其中死亡 3,433 人，军队、民兵伤亡 525 人，827 间建筑被损毁。因镇压有功，12 军军长李德生，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飞黄腾达，由一不见经传的少将，先后擢拜为大军区司令、总政治部主任，直飞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5、广东海南岛儋县“六八戡乱平暴”事件

1968 年 8 月，在“八月戡乱平暴”事件中，**全县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有 700 多人**，烧毁民房 700 多间，设置临时监狱 500 多所，“依法”关押的群众高达 5 万多人，其中，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和逼供信，致伤致残者数以千计。

6、陕西宝鸡镇压群众起义事件

1968 年 12 月到 **19**69 年 2 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7 万名职工中，有 45,400 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297 人被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面对野蛮暴政，当地老百姓已忍无可忍，他们在第二天揭竿而起，武装反抗当局的“清队”暴虐。驻军谎报称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并依毛、周谕示，对老百姓展开军事镇压。他们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两个月的武装镇压中，**打死 13,300 多人，打伤致残多达 35,000 多人**。

五、毛泽东的内战休止符

当毛泽东举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便亲手打开全面**内战**的“潘多拉魔盒”，解放了争权夺利者、挟嫌报复者、恣意妄为者、寻衅滋事者等众多**痞子、流氓无产者**。野心勃勃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推动下，统帅造神运动中制造出来的失却文明理性的芸芸群氓，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上厮杀。

到了 1967 年 8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策动武装左派、彻底打败右派，第一夫人江青还在继续号召左派造反派“文攻武卫”，8 月 16 日，毛泽东还在充满信心的对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说：“**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又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军内右派将领“清君侧”的呼声高涨起来。周恩来适时将这一“情报”以暗示的方式密报给毛泽东。此刻，毛泽东有所醒悟，**突然意识到右派势力强大**，短期内不可能彻底铲除，如不及时改变策略，调整部署，“退一步”寻求适当妥协，局面将很快失控。于是，天才的毛泽东，在发出“**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最高指示”后的二十一天，8 月 25 日，迅速做出改弦更张的决断：抛出他的忠诚打手**王、关、戚**，以慰抚高级将领；逐渐淡化打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以安抚各级党政官员；鼓励“走资派”和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官员们承认错误，同刘、邓一伙右派划清界线，听他的话，站到他这一方来。显然，他改弦更张的目的，是力争同党内中、右派联手，化解“清君侧”的危机，以稳定国内局势，并为体面地结束文革创造条件。

毛泽东的决断，很快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大班子”的名义，付诸实施：

8 月 25 日，发出了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9 月 5 日，**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史称“九五命令”；**9 月 13 日，**发出了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9 月 23 日，**发出了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10 月 14 日，**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 月 17 日，**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10 月 27 日**，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11 月 14 日，**发出了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此外，毛泽东多次召见地方大员，向他们伸出和解的“橄榄枝”，以缓

解对抗。

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他为了稳定局势，就产生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打算；而要体面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就是借助党内中、右派力量来稳定当前的国内乱局。于是，9月4日，他在回答文革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对，要解放一大批干部**！”

9月16日，他在同浙江左派当权派**南萍**（笔者：二十军政委、浙江省军管会主任、省军区代政委）、**陈励耘**（笔者：空五军政委、浙江省军管会副主任）谈话时说：“**龙潜**（笔者：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阮贤榜**（笔者：原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

9月17日，毛泽东在召见江西左派当权派**程世清**等谈话时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皇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这次谈话，成了镇压左派造反派的先声。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9月16日，他在同南萍、陈励耘谈话中还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笔者：1967年7月14日～9月23日），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又“满怀信心”地宣布：“**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两个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1968年春和年底。显然，他要以结束文化大革命来缓解右派对抗。

然而，毛泽东很快改变了他结束文革的路线图。

也许是受到御用精英们提示，毛泽东很快发现，他宣布明年结束文化

大革命，并不能结束右派对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和不满，也无法抚平右派心中的创伤和怨恨。于是，他发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样，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克敌制胜的谋略。根据这个理论，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秉旨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断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将其颂扬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显然，他警告右派，在解放干部中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为了同党内中、右派联手来稳定当前的国内乱局，他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让步，把文化革命方向转移到枪口一致对外上，让他们在“继续革命”中“立新功”从而达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目的，成了他的新的战略选择。

12 月 18 日，他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基于这样的认识，1968 年 4 月 10 日，他通过喉舌《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至此，毛泽东推翻了他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图，把由打倒“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向右派夺权等内讧式革命，转移到清理阶级队伍等与外部阶级敌人“继续革命”上来。

这一系列措施和谈话，使党内保权的右派和中间派备受鼓舞，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右派造反派攻击和镇压左派造反派；而党内左派如鲠在喉，他们暗中支持左派造反派反抗。因此，各地的武斗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向大规模方向发展。

到了 1968 年夏天，两派武斗愈演愈烈。同时，两派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和商店,烧毁和炸毁公共建筑和民居,抢劫车船，中断铁路、公路交通和邮电，私设电台,冲击部队机关和兵营，抢夺武器、装备和援越军用物资,等等，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不可胜数，各地纷纷向中央告急。混乱状态迫使毛泽东下定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两派武斗。

1968 年 7 月 3 日，他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

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7 月 24 日，毛泽东又授意中央“四大班子”发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实际上是剿灭左派造反派的命令。历史已经证明，在两个布告发布后的几个月里，各地革委会(或革筹组)、军区、军分区和驻军，同各地右派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对左派造反派进行了残酷镇压。到 10 月 13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以二三十万人伤亡的代价，才基本上制止了右派镇压、左派反抗式的大规模武斗。

同时，毛泽东还决定，由数万工人、士兵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驻清华、北大等北京高校，解除了两派武装。7 月 28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严厉斥责他们**“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毫不留情地警告他们，**“谁如果不听劝告……就歼灭之”**。北京大规模武斗也终被平息。

解铃还须繫铃人。从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开始，到《七二四布告》发布和“七二八召见”五大领袖为止，在 20 多个月的时间里，他这一“繫”一“解”，使全国 50～60 万人为他的向刘、邓夺权的大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六、人兽之间（1）——虐杀俘虏

当传统文明和普世价值被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颠覆，人类“天使”一面就会被压制，包裹着罪恶的“潘多拉魔盒”就会被打开，人类的兽性便被解放出来，从而能使“解放”后的中国人性泯灭，道德沦丧，许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善良的人在内，都蜕变成了痞子和流氓无产者。

在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拼杀和武装镇压中，虐待和滥杀俘虏的兽行，成了“**全国全面内战**”中普遍存在的一大特色。

据《**文革 40 年祭**》一文记载：河北雄县三十八军支持一派用大炮攻打对立派别，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俘穿肩胛骨，女俘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笔者：这都是从土改和镇反中继承下来的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笔者曾目睹过铁丝穿锁骨)，游街示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 286 人，自杀 20 人；乱打滥杀包括**矛刺、刀砍、石砸、枪打、绞决**，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在一次审讯后，一下子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缴械后，遭到肆意报复。作家赵瑜采访后记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据《**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一文记载：1967 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在将“温联总”赶出温州城后，对“温联总”被俘成员进行报复——打、砸、抄家、游斗和逼供，成了家常便饭。更令人发指的是，胜利者发明了空前绝后的惩罚手段：“爬棺材底”和“吮尸汁”。在温州“工总司”“烈士”的棺木集中供奉处，俘虏们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然后强迫他们一个个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时值酷暑，尸体腐烂，腐汁漏出，又威逼俘虏们张嘴吮吸。

《**泸州武斗亲历记**》的作者**唐伟励**，是当时四川泸州市沙湾公社的农民。他在文中写道：

大概是到“革大”的第三、四天的中午，因为天热，沙湾总部和“红司警卫连”的人都在食堂外面的过道上吃饭，只见二男一女押着一个头蒙黑布的俘虏走来。警卫连负责关押俘虏的任务，押俘虏来的人留下一个看俘虏另两个进办公室做什么去了（应该是办交接）。吃饭的红旗战士纷纷跟过去看，几十个人把俘虏围在中间，交头接耳地像看什么珍稀动物似的。俘虏是个男子，瘦高个，穿一身发白了的旧军装，头上被蒙了黑布，估计不到 30 岁。看着看着，不知是谁叫了一声：“他妈的裤子上有血，肯定是杀过人的！”本来打起武斗两派的人都和仇人般分外眼红，经这样一叫群情立即激愤起来。叫喊的声音刚落，一个满脸胡渣的人上前一脚就把俘虏踢倒在地，于是几根钢钎同时戳向了俘虏背上。大概是钢钎的钢火不好，间

或那俘虏的骨头特硬，钢钎戳到那人背上“空空”响就是戳不进里头去。胡渣人骂道：“妈的逼，看你硬得过钢钎！”说着，把钢钎插到俘虏身下一下子把他挑转过来，抡傢伙在俘虏的胸口上用力一戳，就听“噗”地一声钢钎钻进俘虏的胸膛中，一绞一拉，殷红的鲜血随着钢钎喷了出来！在这个杀人的过程中，有三点是需要特别交待的：一是我真没看见俘虏身上那有血；其二，当围观的人对俘虏动手的前前后后，押他来的人站在一旁像和他无关似地根本不去阻止；第三，那个穿一身旧军装的瘦高男子，在被踢倒到被钢钎扎进胸膛的全过程中，至死竟然没有哼一声！过去看电影小说，看那些被敌人严刑拷打、火烧铁烙宁死不屈的革命战士，只认为那不过是艺术形象而已，世界上那会有如此坚强的人。这一次算是开了眼界，世界上竟然还真有这样宁死不屈的人！这个可怜的“红联站”人是什么特殊材料做出来的呢！恐怕只有天知道。时过 40 年，现在回忆起那场景来，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仍使我心悸不已！

一位知情者在《**文革八县联防打中江**》一文中写道：

联军入城后，进驻一切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公共场所，民宅。他们抢窃粮食仓库，银行，开枪打杀百姓的鸡鸭猪狗。反正被占领地的一切都归胜利者所有。对于所有的“战俘”，不管男女老幼，全部脸上用锅烟墨涂黑，双手反剪，关在几处强占的平房里，并有持枪的联军士兵把守。

联军审讯俘虏的做法非常特别，几个人搭张桌子，到“战俘营”里随便抓一个来，先一顿拳脚后，便怒斥对方：“干了多少坏事，老实交代。”对方回答稍不如意，“法庭”便宣布，我们代表中江县人民，判你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将俘虏推出去，随便到一个地方实施枪毙。

比我年长的一位老哥向我讲述了一件事情：攻下中江后不久，我们每人发了二十元。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百元大抄，十元即是最大面额。这二十元对当时的低工资收入的中国人来讲，相当于一个中下级收入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我们用这二十元买了些酒肉，放开肚子吃喝，因战斗暂时结束了，可以开怀畅饮一下。在烈性酒充满血液后，人人云里雾里，昏昏然然。这时，有人提议，我们去拉几个俘虏来枪毙玩，怎么样？其中的有几个人附和。

晚上，到一个“俘虏营”中随便抓了五六个（到底是五六个，还是六七个，我的这位老哥说记不起了）。这位老哥说，他们几个人把俘虏用解放牌汽车押到一条河边，在汽车强光照射下，这些俘虏被強迫沿河跪下成一字型。一位头头大声吼道：“我们代表全体中江县人民宣布你们死刑，希望你们来世当造反派。”一阵枪声，俘虏全部倒地。俘虏中有个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一个造反派突发奇想说：“这么小的年纪，看看她那里长毛了没有。”于是，他把“六三式”步枪挺上刺刀，戳开了女尸的裤子，用双手将裤子撕开，然后高叫：“嗨，有毛了。”然后扬长而去。

更有些报私仇者，当着人家父亲的面，众目睽睽之下，强奸别人的妻

女。关于强奸妇女的事件，不知发生多少。只要联军士兵愿意，到俘虏群中找一个女俘虏就行了。

1968 年 7 月 14 日，在广西梧州平桂矿区召开庆祝胜利追悼“烈士”的万人大会。为“祭奠革命烈士”，会后枪杀俘虏 16 人。平桂大战共杀俘虏 297 人。

在湖南湘潭易家湾，从 1967 年 8 月 10 日到 9 月 20 日，前后大战 40 天，双方死 92 人，受伤人员上百。武斗中，双方都虐杀战俘。“工联”派的“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在埋葬他们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数名战俘，活活垫了棺，以报复湘潭“红色怒火”枪杀他们 7 名“工联”人员祭坟。

据披露的广州市档案馆材料记载：在派性武斗中，经常发生将对立派人员打死后吊在公共场合示众的事件。他们把尸体吊在繁华的北京路、越秀路的大榕树或其他大树上，制造惨不忍睹的红色恐怖，以震慑敌对者。仅 1967 年 7～9 月间，在广州市区和郊区，记录在案的**悬吊尸体，高达二百多具**。

作家**秦牧**这样记述他在广州街头所见：

“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

“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

“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中国虐杀俘虏的暴行，与美国在伊拉克的虐俘丑闻相比，任何一个正直而知耻的中国人，都羞于面对，更不要说指责他人了！

但在无情的虐杀中，也出现过人性闪光，使我中华民族真、善、美的文明传统，得已绵延不绝！

在《**震惊全国的文革“江津杀俘事件”**》一文中，记录了杀俘过程。笔者**择要改写**如下：

1967 年 9 月 6 日，四川江津县“九七”派攻陷“红总”派据点战斗中，战死 9 人，击毙“红总”派 4 人，抓获 15 名战俘。

9月6日晚，“九七”派“舰队”胜利返航，江津县通泰门码头已挤满了欢迎人群。当人们看见抬着9具“烈士”尸体上岸后，引发了呼天抢地的哭嚎声。

率领“舰队”出征的何司令，登高向欢迎人群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以毛泽东**“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来勉励大家，他以毛泽东**“化悲痛为力量”**、**“掩埋好同志的尸体，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前进”**的话来鼓励死者亲属们，他又用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来激励“九七”战士……“烈士”亲属被激怒了，“九七”战士被激怒了，他们冲向战俘，用拳打、脚踢和牙咬，来发泄他们的仇恨。从通泰门码头到民工纪念堂的路上，“红总”派战俘们，被夹道的人群辱骂、毒打；在众目睽睽之下，好几名战俘的耳朵、鼻子被咬掉、撕裂，一个个连滚带爬，鲜血淋漓。在第二天的“九七”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仇恨又被进一步煽动起来。悲痛欲绝的“烈士”亲属们，好友们，或用刀砍，或用手榴弹砸，当场活活打死4名战俘，当晚又杀了4个。

9月8日，在“烈士”亲属和好友的强烈要求下，“九七”派司令部根据**“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高指示”，决定当晚在船上处决另外7名战俘。

午夜，在“九七”派森严戒备下，包括白沙中学十五岁学生**魏炳炎**在内的7名战俘，被捆着、嘴里塞着布条，用汽车押送到江边。行刑队员们，个个戴着钢盔，穿着清一色的劳保服，人人手持枪械，两人挟一个，将已吓瘫了的战俘们架到汽车轮渡船上。

战俘魏炳炎忽然发现，在左边挟着他的是他白沙镇的邻居——长风厂工人**许智清**。求生的本能使他张口向许求救，但嘴里塞着布团无法说话，本能又使他扭着头拼命给许使眼色。令他失望的是，从小经常一同到长江里游泳、踩水、嬉戏的大哥哥许智清，此时面色冷峻如铁，视若仇敌。

当船到公园一带江心时，刽子手们开始杀人。已经站立不稳的魏炳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被推到船边，遭半自动步枪射杀后推入江中。终于轮到他了。朦朦中，他被许智清推到了船边。他仰天长哼一声，紧闭双眼，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瞬间。突然，砰地一声，震得他双眼火星四溅，接着被一脚踹入江中。清凉江水的刺激，使他很快清醒：他没有死。凭着好水性，他游离危险区，被一只渔船救起。他死里逃生，跑到成都，声泪俱下地向四川省“革筹组”报告了江津虐杀俘虏经过，华夏为之震撼。

七、愚弄的见证——重庆红卫兵公墓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只剩下不知不觉的日子无缘无故的欢笑。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曾经血雨腥风、遍野哀号。
谁都无路可逃，无路可逃。
你也曾伤痕累累，
你也曾命如芥草。
可是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今天的餐桌上，
连动物的尸体都是那么美丽高雅地细刻精雕。
你什么都遗忘了都遗忘了，
只留下那么心安理得的快乐消遥。
你也曾蒙冤受辱，埋头弯腰，
谁没有撒野一把，疯狂一遭。
你也曾因生而跪，
你也曾因死而逃。
可是你什么都遗忘了，什么都遗忘了。
阳光下，你在孜孜不倦地，
教给孩子们做人的诀窍。
走过的路都忘记了，都忘记了，
有多少明枪暗炮、鸡鸣狗盗，
有几颗活着的心还在蹦跳？
你难道没沾过血污？
你难道没迷过心窍？
可走过的路都忘记了都忘记了。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
哪个方向是你子子孙孙的人生目标。



图 13-3：重庆红卫兵公墓远眺

这是摄影家**田太权**一组摄影作品上的题词。

摄影作品的背景是重庆沙坪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公墓：纵横交错地排列着 113 座坟墓，掩埋了 400 多个亡魂，被时人称之为“**重庆红卫兵公墓**”。（图 13-3）

从 1967 年 7 月 8 日起，到 10 月底的三个多月中，崇拜“**枪杆子里出政权**”信条的重庆市造反派，为争夺市革委的控制权，在“**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下，制造了 20 多次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战斗从使用冷兵器开始，逐步升级到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坦克、高射炮、舰艇等现代化武器，从巷战发展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伤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三个多月里，炸毁房屋数千间，击沉船只 3 艘，重创 12 艘，打死近千人，伤残难以计数。

“八一五”和“反到底”是重庆市势不两立的两大红卫兵造反组织，前者得到驻军和军分区的支持，后者由省军区和省“革筹组”撑腰。

请看，两派旗帜鲜明，“不可调和”：

“**反到底**”——“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高举着“反到底”的战旗，高呼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口号，**向“八一五”开炮**！

“**八一五**”——“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高举着“八一五”的战旗，高呼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口号，**向“反到底”轰击**！

这是“**全国全面内战**”中司空见惯的一大奇观！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也是一个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的一大奇观！

在这匪夷所思的大奇观中，近千名红卫兵造反派，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为了缅怀“烈士”，“八一五”决定在沙坪坝地区沙坪公园角落里修建公墓，以纪念 400 多位为“八一五”献身的“烈士”。于是，一座“重庆红卫兵公墓”应劫而生。

人们可以从墓碑上看到一个个活鲜鲜的名字，老的有 50 多岁，小的才刚刚 14 岁！

在一块“红警区新十九中红卫兵八一五战斗团”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个十四岁男生**邹卫远**的名字，其上款是：（他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英勇牺牲！”

在一块“警备区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墓碑上，镌刻着九位“八一五”“烈士”的名字，其中有十四岁女生**杨武惠**和十六岁“校花”**唐明渝**。据一位当年处于杨、唐等死难现场的幸存着陈国英回忆：“唐明渝当时才 16 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

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

人们还可以从墓碑上看到一句句激动人心的、效忠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挨打，可挨揍，誓死不低革命头。”“砍头何所惧，革命志不移。”“敢上刀山下大海，誓死保卫毛主席。”**……

《孙子》曰：**“道者，令民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不诡也。”**毛泽东以马恩列斯为师，行老庄孙武之道，合二而一，可谓权谋天才！

人们还可以从墓碑铭文上感受到战斗的激烈：**“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姓名省略）**等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充满仇恨的暴言戾语，使曾身临其境的人们，仿佛又听到了当年拼杀的“战鼓”！

不！那不是鼓，那是喇叭，是架在楼顶上、汽车上、树干上、电杆上的银灰色的声压超过一百分贝的高音喇叭。

喇叭尖叫声，像撕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把人们从梦幻中击醒！

喇叭尖叫声，又像万里晴空中的一声霹雳，把人们的心灵震懵！

喇叭尖叫声，好似战鼓，以它那尖锐刺耳的声波，朗诵着《毛主席语录》，**煽动仇恨**，理直气壮！激励人们去猜忌！去构陷！去揭批！

喇叭尖叫声，又似号角，以它那超高分贝的音响，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挑动仇恨**，响遏行云！鼓舞人们去夺权！去拼杀！去牺牲！

……

在充满仇恨的尖叫声中，全国各地涌现出50～60万个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英雄”！

一切都过去了——在仇恨的喧嚣中，数十万个“保卫毛主席”的“烈士”走了；在“主旋律”悄悄“扫除痕迹”中，一座全国唯一的、唤醒记忆的“重庆红卫兵公墓”，侥幸存“活”了下来。

一切都过去了——在仇恨的喧闹中，高举酒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干杯”的伟人走了；在万众注目中，广场上突兀而起一座供人顶礼膜拜的神坛庙堂。

一切都过去了——“原罪”拉出了一群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要用“审判”来洗掉沾满双手的血污；再造一件“伟大、光荣、正确”的“皇帝新衣”，给恣意制造仇恨的嗜血魔王穿上。

一切都过去了——面对孤零零的公墓，“八一五”派司令**周劲松**说，“**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 15 年牢**”，一个服刑三年的“反到底”派头头也说，“**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他俩分明在说，仇恨难忘！他俩分明在说，他们已还清了文化大革命的血债，从此，谁也不欠谁人的帐！

一切都过去了——没见有人去为仇恨买单，也不见有人去忏悔，更没见有人去谢罪！ “原罪”用“导向”来掩盖地上的血污，再用“遗忘”来埋藏野蛮、邪恶、愚弄和荒唐！

一切都过去了——历史不会因“主旋律”的强暴而消亡。在生生不息的长流里，冲刷“导向”，荡涤“遗忘”，漂白谎言，泯没仇恨，继续谱写真、善、美的人性篇章……

笔者谨借**毛清江**的《**文革祭**》，权作本章的结束语。

文革祭 （毛清江作于 2005 年 10 月 10 日）

蓦然回望，悲愤满腔，一九六六，灾祸突降；
乌云压顶，长夜未央，日月失色，天地无光；
暴君蛊贼，混世魔王，伪善嘴脸，蛇蝎肚肠；
醉心权位，施展伎俩，只手云雨，兴风作浪；
名曰文革，实为国殇，纳粹行径，封建勾当；
剪除异己，诛杀同党，宠信奸佞，戕害忠良；
摧毁文化，毒化课堂，图书焚烧，文物遭殃；
邪恶横行，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愚昧高亢；
人妖颠倒，黑白无常，挑动群众，拉派结帮；
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同胞相残，狠如虎狼；
经济崩溃，斗争为纲，文字狱兴，武斗疯狂；
祸国殃民，自称帝皇，个人崇拜，无耻荒唐；
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接班人名，写进党章；
内外交困，前途迷茫，国家民族，元气大伤；
作恶自毙，余孽落网，十年浩劫，终成绝响；
冲破禁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势不可挡；

可恨僵尸，高居庙堂，腊肉腐臭，阴魂游荡；
涂脂抹粉，欲盖弥彰，有待来日，鞭尸清场；
审判罪魁，披露真相，告慰冤魂，正义伸张；
自由歌飞，民主旗扬，法制建立，人权保障；
中华复兴，国运隆昌，大道宽广，前程辉煌；
感慨行文，永志不忘，痛定思痛，奋发图强。

第 14 章 绞杀政敌

14 章目录

★一、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　二、浸死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
三、打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四、拷死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　五、药死贺龙元帅
六、瘐死政治局常委陶铸　★七、拖死国家主席刘少奇　★八、重伤囚死彭德怀元帅
九、抓叛徒和叛徒集团　★十、放过总理周恩来　附注

同农民出身的汉刘邦、明朱元璋建立王朝后大杀功臣一样，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也没有逃脱小农狭隘意识的束缚，而权力拜物教又使他在屠戮功臣上，远比刘、朱二皇行动更猛烈，手段更高明，株连更广泛。如为诛杀刘少奇、林彪等中共功臣，导致全国 200～300 万人丧生，伤残无法计数！

一、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

1966 年 8 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十六条》时，“封疆大吏”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阎红彦**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在小组会上，都表示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态度。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李连忙遮掩说：“通了！通了！” 李打哈哈，怎能逃出毛泽东的眼睛？

新的考验很快摆到阎红彦面前。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阎红彦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去揭发邓小平的问题。会上，谢富治上将对他的老领导邓小平大加鞭挞，揭发其**“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生性过“刚”的阎红彦，本来就看不惯谢富治落井下石的德行，他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赵增益（时任昆明市委第一书记）：“你知道不知道？”回答是“不知道”。反驳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会议因此不欢而散。不幸的是，在当“革命派”还是当“走资派”的考验上，他没有能像谢富治那样积极争当“革命派”，没有能像谢富治那样识时务地按毛、江所指进行检举揭发，落井下石，因而便不由自主地跌入“走资派”泥潭，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阎红彦跌入“走资派”泥潭后，本来形势十分严峻的云南，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冲击并占据了省委办公楼，抄了阎红彦的家，迫使他无法履行职责。

为了对付混乱局面，支持阎红彦工作，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出决议：“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并把阎的家安排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11 月，年近六十的阎红彦受到了严重冲击，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甚至有时从早晨 8 时斗到晚上 8 时，不能吃一点东西，没能喝一口水。

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等等。此时，不识时务的阎红彦，已被毛、江的中央正式列入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中。于是，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标语、大字报。受到支持的昆明红卫兵造反派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1967 年 1 月 4 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1 月 8 日凌晨 1 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正在小麦峪的阎红彦的电话。电话里陈伯达对阎红彦咆哮说：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本来就看不起“阉宦”陈伯达的阎红彦，反唇相骂道：**“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圣旨在身的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的指责，让激动万分的阎红彦无法入睡。他来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清晨 4 点多，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的消息后，急匆匆地乘车从昆明赶来揪斗。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马上去报告阎红彦，但阎红彦却躺在那里没有反应。曹贤桢大声

喊他，还是没有回应。开灯一看，才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阎红彦在临终前，愤然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是谁逼死的？真正的凶手是谁？按中共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中央文革不仅把阎红彦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名单，授权昆明造反派宣布他是“走资派”，阎红彦死后，还下令不准开追悼会，等等，就足以证明。

但在笔者看来，那个“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恰恰是中共最不愿反思、最不愿忏悔的表现。

1967 年 1 月 12 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时说：**“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接着 1 月 13 日，周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向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去支持电说：**“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当阎红彦的死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时，当谭震林在大闹怀仁堂中为阎死鸣不平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的记录传到毛泽东眼前时，毛有什么反应？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所谓的“无产阶级震怒”,大骂谭震林等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而对阎红彦的死未表丝毫哀悼或惋惜之情。从毛泽东冷若冰霜的态度上来看，同周恩来一样：阎红彦之死是咎由自取。

显然，逼死阎红彦的真正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对阎红彦的死冷若冰霜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么，为什么阎本人说是**“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呢？在株连成风的毛泽东独裁下，任何公开直接反毛者，都会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为了抗毛，把反对的矛头对准毛的打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良策，也是保护妻儿、亲友不受肆虐的最好选择！

从历史看，阎红彦是个不得不向毛泽东低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对毛的怨气由来已久，而这种积怨，最终使他走向毁灭！

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内部就产生了井冈山派和宝塔山（延安城东南）派的分野：前者以井冈山败逃到陕北的精英为代表，他们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后者以陕北土生土长的领袖为核心，其中包括阎红彦，他们则认为他们拯救了党中央。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利益和权力

分配上的不同诉求。

众所周知，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八万六千多中央红军，被迫从瑞金出发，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已被国民党政府军荡平了的井冈山湘赣根据地，开始了死伤惨重的、前途未卜的漫漫遁途。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几经险阻，到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不足 8,000 人。因此，在宝塔山派看来，没有他们的庇护，井冈山派难逃灭顶之灾。但毛泽东并不看重他们，而仅仅想利用他们。为了站稳脚跟，权谋大师毛泽东依托和利用中共中央的权势，对宝塔山派玩了个**“捉放曹”**的闹剧，摇身一变，成了宝塔山派领军人物刘志丹、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救命大恩人，初步稳住了宝塔山派的军心。但不久，宝塔山派内发出了要毛泽东另辟根据地的呼声。震惊之余，权谋大师又耍了个借刀计，让潜在的对手刘志丹和他的亲信杨琪、杨森等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光荣牺牲”**。(据说，延安党史馆证实：刘志丹是被警卫员从背后开枪击毙的，而这个出身中央红军的警卫员，以“被敌人买通”罪被处决。另一说法：刘被特派员裴周玉击毙。)为了控制住流痞成性的陕北红军，权谋大师又来了个换头术，把比较听话的、善于投机钻营而流氓成性的大麻子高岗扶植起来，让他当了中央西北局书记，成了群龙无首的陕北红军新头领。扶植高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刘志丹派在利益和权力上的诉求，从而使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此时，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阎红彦，刚从苏联返回陕北，手中已无兵权，但对重用高岗很反感。在阎红彦看来，作为刘志丹副手的高岗，同刘志丹一样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帮土匪，他们不能代表宝塔山派。阎说，在陕北，他们打家劫舍，到处**“抢东西，抢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对此，在三甲塬整顿时，负责整顿的阎红彦就清洗过他们军中的地痞、流氓 300 多人，还开除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此人在“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因此，阎红彦认为，只有已病逝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只有他和他的追随着，则应代表宝塔山派获得权力。可惜毛泽东没有看重他，甚至有意压着他，使他耿耿于怀。

陕北根据地开创者之间的恩恩怨怨，只有等档案解密后由史学家们去了结。从流传的资料看来，阎红彦确有过高估价自己的地方，至少性格刚而少柔，缺乏政治家应具备的钻营手腕。

1964 年 12 月 2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毛的一语道破了红军时代的天机。

有人这样描述红军时代：“**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没钱花了便抓人，叫人家拿洋钱赎人，一手交银元，一手放人；不拿钱，撕票：这不叫绑票，叫“打土豪”。没饭吃了，便拿着枪去“**借**”粮，还装模作样地打个借条什么的：面对带枪者，你敢不“借”？在陕北，大官们可以随军带着“妻妾”，随时发泄，逃跑也不忘用驴驮着她们跑。在井冈山，没有陕北人那么土气，她们可以穿上军服，扎上皮带，挎上手枪，俨然一名战士，不叫“压寨夫人”，叫秘书，或升级叫秘书兼妻子。例如毛泽东，在 1928 年，当他的发妻杨开慧(1930 年 11 月被害)还在监狱里服刑时，便“纳”土匪王佐、袁文才麾下挎着手枪的 17 岁战士**贺子珍**为“秘书”。小官呢？当兵呢？不是曾鼓励过他们像 1927 年毛泽东宣扬的那样“**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吗？“迎闯王，不纳粮！”至今还被某些专家、教授津津乐道。“不纳粮”千军万马吃什么？但这种胡说八道却大有市场。不近女色的阎红彦，想用土匪、流氓等罪名告倒高岗，是告错了地方。

不可否认，革命者也有另一面。当懂得“水可载舟，亦能覆舟”道理后，他们也能自我约束，即在裸露魔鬼一面的同时，也不忘张扬天使一面；两张脸皮的变换，随政治、军事需要的变化而飘忽。于是，“奸一民女，如奸我母”，被闯王叫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不准调戏妇女**”等较有人性的条款，便被毛泽东唱了出来，——这就是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禅机。如今，在“主旋律”作用下，经过一代接一代作家们的努力 ，“高大全”的“佛面”被塑造出来，擦掉血污的屠刀，装饰成“革命文物”。由此可见，在革命洪流中打游击的阎红彦，很可能也有两张脸皮表演；他把刘、高说成土匪，似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到 1942 年，机会来了。在 10 月召开总结陕甘宁边区历史经验的高干会议前，高岗主动与阎红彦修好，但被阎拒绝。阎不为名利许愿所动，严词以对：“**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得到毛泽东宠信的高岗恼羞成怒，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有野心”。对阎、高之争，毛泽东很快以党中央的名义表了态：“**刘志丹、高岗是正确路线**。”阎红彦败下阵来，还挨了整，自然又憋了一肚子气。

1945 年，阎红彦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会议，对大会选举高岗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表示不满。会后，他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高岗问题，提出了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望中央注意和要求记录存档的“几条意见”。

记录存了档，但“几条意见”没被采纳。在同年 7 月，在召开的第二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即解决刘、阎分争（实为高、阎分争）的会议上，阎红彦受到了批判。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得胜后的高岗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阎红彦又一次败阵。

陕北刘、阎之争或称高、阎之争，使毛泽东坐收渔翁之利：既可以淡化“陕北救了党中央”的不逊之议，还可顺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强化对宝塔山派的监控，从而进一步巩固井冈山派的主导地位。历史就这样为毛泽东积累、制造了“伟光正”的条件。

1954 年，又一次机会给了阎红彦：高岗因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被毛泽东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他那强奸、诱奸、玩弄一百多女性的流氓丑闻也被揭了出来，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 40 多名，迫使高岗自杀了结。但高岗的倒台并没有给阎红彦带来升迁的机会，还在副省级上徘徊。令他困惑的是，高岗党羽习仲勋、贾拓夫在高倒台后，都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还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级和部长级的高职，就连曾被他清洗出游击队的刘子丹弟弟刘景范，也当上了地质部副部长，而他本人仅免强进入后补中央委员序列，外放当了个副省级的四川省辖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8 年 3 月，终于有了转机。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公开道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又当众宣布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此时的阎红彦已经看透了毛泽东的计谋，对毛的“道歉”已经没有兴趣。

1959 年 8 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独当一面。也许是长期压抑的结果，使他良心再现，天使一面张扬起来；但握有重权的“封疆大吏”，他不得不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在三年饥馑中，由于他和他的前任或被迫或忠实地执行了毛的政策，使浮肿病蔓延，饿殍环生，从而使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13 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他在调查时发现，“三面红旗”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特别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为了吃一顿饭，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滚了一身泥。他动情了，良心使他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政策产生

了恶感。1961 年 5 月 9 日，他不顾朋友和助手们的劝阻，冲着彭德怀写信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而被打倒的教训上书，公然批评毛的人民公社政策，大胆提出了他的意见：社队规格**“该小就小”**，甚至**“可以包产到户”**；**“办不办公共食堂，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耕牛、大牲畜归生产队所有”**等等。这些公然同毛泽东**“一大二公”**相对立的意见，是抗上犯忌的，不仅自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会株连众多他人。他的上书，着实让朋友和助手们为他、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批示说**“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

可惜，阎红彦不懂权谋大师**“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以为毛接受批评，竟大胆作为起来。

1961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16 日，他在昆明西山召开的云南省委工作会议上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他对邓小平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他大胆地主张：**“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该集体不集体是路线问题；不该集体你硬集体也是路线问题。”“按空气办事是危险的”**。1962 年 12 月 21 日，他在中共云南省委批转的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中，公开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明确主张，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在他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比较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经过通盘调整以后，云南省政治和生产形势有了好转，出现了国民经济比较协调的发展景象。1966 年，粮食总产量比 1960 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 2.01 头，居全国第一位；边民外逃也得了控制。阎的这些较为开明的政策，**被视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声**。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阎红彦被赞誉为“生产书记”。

创造了云南黄金时期的“生产书记”阎红彦，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他针对阎的“该单干的坚持单干”和“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言论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作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是大胆地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地主观主义的求证。”**阎红彦面临受惩处的危险。

有人说性格决定一切。刚而乏柔的阎红彦，没有悬崖勒马，没有低头认错，反而固执地坚持他的对抗。1966 年 4 月，阎红彦明确倡导**“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落实在生产、生活上”**，又公开与林彪的“四个第一”

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叫板。于是，毛泽东和毛的意志执行者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周恩来，便把他打入“走资派”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中。他最后走向自杀的命运，为势所必然！

二、浸死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

陶勇(1912～1967)，原名张道庸，抗战时调任新四军二支队参谋长。为迷惑国民党，新四军军长陈毅为其改名陶勇。问其故，陈毅曰：“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 陶勇甚喜，遂用一生。

陶勇直鼻梁，厚嘴唇，卧蚕眉，性格刚烈，作战悍勇，临阵常脱外衣，袒臂露胸，举驳壳，挥战刀，赤膊冲锋，人称“拼命三郎”，又像张飞。

1940 年 9 月 30 日，驻江苏省泰兴县的新四军部队，在黄桥附近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部队进行决战。**黄桥决战**前夕，三纵司令陶勇，根据陈毅和粟裕死守黄桥的部署，对各旅领导下达作战命令。他端坐一桌前，突然站起，虎眼圆瞪，指挥刀和驳壳枪砰然甩桌上，大声喊道：**“谁他妈的敢丢黄桥一间房，一条街，要杀头，要枪毙，你们自己挑。我这两个家伙可不认得谁是爹，谁是娘！**”众部将闻之悚然。打响后，三纵官兵在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进攻下，顽强拼杀，终于守住黄桥，有力地配合了兄弟纵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计划。是役，内战内行的新四军大捷，消灭顽军（对国民党反共军队的称谓）一万多人。对这次胜利，中共御用史学家们著书说：**“黄桥决战，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而这次胜利，也载入中学历史教科书。遗憾的是，八年抗战中，这个“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的新四军，没能留下一次值得书写的抗日战例。

1940 年 12 月，乘陶勇率三纵主力离掘港兵发曹甸之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闻之，密令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保安一旅旅长詹长佑乘机夺掘港。曹甸役毕，陶勇急令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掘港解围，一路直捣徐承德老巢石港。陶勇则只身骑摩托车飞奔马塘，以阻詹长佑驰援。詹长佑正欲领兵出发，忽见陶勇推门入室，大惊。经陶勇说明厉害，詹长佑答应按兵不动。陶勇即驱车奔掘港，一举击溃徐承德部队。

1942 年春，孙二虎上岸向渔会要粮。孙系启东海匪头目，身佩双枪，百发百中。渔会惧其强悍，飞报陶勇。陶闻讯，出奇兵生擒之。孙二虎对陶大叫：“要杀就杀，无须多言。”陶勇喜其勇，亲为松绑。孙二虎谢恩以告陶勇：“如能一起上船，愿说服部下投诚新四军。”将军慨然应许。次日，陶随孙二虎单刀赴会，登海匪指挥船，会众头目。众匪见陶虎胆义胸，愿听候收编，遂交出 50 枝枪和所有船只。不久，孙二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

团营长。

1944 年 3 月，陶勇率三纵包围启东县久隆镇之敌。敌首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固守不出。陶勇命日伪镇长喊话，无应；令部下用掷弹筒发射两枚炸弹，毁其城东北角。徐宝富始回话说：“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陶勇决定亲往，部将彭德清等人劝道：“恐有诈。”陶取钢笔交彭德清说：“万一有诈，此笔打坏太可惜，请你代我保存一下。”即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近吊桥，大声喊道：“徐宝富，陶勇在此。”徐宝富震惊，折服，走下碉堡，放下吊桥，双手高举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陶司令大勇大义，坦荡豪侠，特送此刀，以表心迹。”遂率部投降。

1947 年 1 月，在鲁南战役中，陶勇率部向敌快速纵队进攻。突然，敌人发起反扑，数辆坦克隆隆而来，陶部官兵如潮而退。他见之，急至路口，坐一大石礅上，厉声喊道：“老子在此，谁敢往后跑，格杀无论！”随行人员紧急围住陶勇，以保安全。他分开保卫人员，怒吼道：“他妈的，闪开！”乃安坐在石礅上。溃退官兵见怒目司令，纷纷返身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反扑。是役，陶勇率部攻枣庄，连攻四日不下。陈毅、粟裕严令陶勇限时拿下枣庄。陶勇当即调整部署，命部将张震东说：“拿不下枣庄，咱俩都准备脑袋一块搬家。”张震东再次发起进攻，终克枣庄。张震东班师以归，陶勇率司令部迎接，双手抱起张震东，大叫道：“打得好啊，老张，咱俩脑袋都保住了。”两人仰天畅怀大笑。

陶勇开朗豪爽，尤重义气，人皆喜与他为友。苏北抗日，当地实力派人物纷纷慕名而归降，如詹长佑（韩德勤保安一旅旅长）、姚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四团二营营长）、徐宝富（日伪团长）、孙二虎（启东海匪头目）、汤景延（国民党中校炮兵营长）、陆洲舫（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季敦廉（“三友商店”商人）等。

在苏中的陶勇，但见他同国民党“磨擦”，不见他跟日本鬼子战斗。据一篇回忆陶勇革命生涯的《“拼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胆英雄”》文中记载，陶勇在苏中通海地区，有一次为**进击国民党顽军而“借道”鬼子地盘**，陶勇曾派警卫排长毛俊雄下书鬼子。鬼子队长乐于坐山观虎斗，欣然签字应允。由是，陶勇借鬼子之力，迂回到顽敌侧翼，一举击溃之。显然，这不是陶勇个人行为，这是新四军在江苏战略的组成部分。陶勇“借道”鬼子的官方行动，为文革中的暴毙，埋下了祸根。

此外，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陶勇的英名，如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等。他是中共历史上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

陶勇这个“拼命三郎”，生活情趣多样，又称“八好司令”。那“八好”是：好热闹，好美食、好鲜衣，好梨园、好打球，好玩牌、好饮酒，好交友。凡游戏之事，皆粗通而不精，只求刺激，不计输赢。他喜打牌，且常偷牌。若有人责其牌风不正，他振振有辞地反驳：“打牌如同打仗，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战斗间隙，他喜与士兵嬉戏打闹，装疯卖傻，以逗人乐为乐。凡打牌，输者或掌嘴，或刮鼻，或画王八，或钻桌子，他绝不恃权例外。与他玩牌，无论输赢皆有炫耀资本：“我今天打了陶司令两巴掌”，或“我今天挨了陶司令两巴掌。”他豪饮，凡打胜仗归来，必高呼“拿酒来”。四分区专员季方亦豪饮，当地有“季一缸”之诨名。一次胜仗归来，陶与季以茶缸对饮，酒过三巡，季不支而告饶，陶不允，遂拧其鼻灌之。季方大醉三天，醒后曰：“陶司令打仗是英雄，喝酒也是英雄。”陶喜看戏，无论京剧、话剧、淮剧、锡剧，皆入迷。

陶勇的婚恋简单明净得如一张白纸，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花边”。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团检查工作。来到九团团部门口，便有一个哨兵上去敬礼，并喊：“首长！”陶勇抬头一看，是个女兵。不禁怒气冲天而起：“**九团的人都死啦？怎么派个女的来站岗**？”也许第一印象的作用，他竟对这个眉目清秀的女兵产生了爱慕之心。善于察颜观色的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很快看出了陶的心思，有意当回“月下老”。韩念龙向陶勇介绍说，她叫朱岚，师范学生，22 岁，因父亲和弟弟被日本刺死，立志报仇，去年参军，进步很快。一日，陶勇突然来到朱岚身边，单刀直入地问道：“**唉，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给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问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么？”朱岚装起糊涂来。那时婚配，只要双方同意，组织决定，就成。韩念龙已代表党组织征求过她的意见。“**唉，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喜欢拐弯抹角！这不很明白嘛，就是咱俩的事呀！**”含羞的朱岚终于点了头。1941 年 7 月，陶勇和朱岚在沙家庄举行了婚礼。令朱岚没有想到的是，26 年后，她为她的这个刚烈丈夫，付出了生命代价。

“解放”后，由于战功卓著，陶勇官运亨通，由兵团司令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后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然而，刚烈好似张飞的性格，决定他必然像张飞一样死于非命。

陶勇是个骁勇战将，一个合格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军事上，他懂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兵法，能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但在政治上，他却不懂或不善于使用潜规则。然而，这些潜规则恰恰能证明，只有善施阴谋诡计、功于御人权术且心狠手辣的人，才能撑得起“人民领袖”的旗号，才能镶得上“伟大、光荣、正确”的金边，才能受到众人顶礼膜拜，因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到六十年代，海军内部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是党内左派林彪元帅、右派贺龙元帅和中摇派叶剑英元帅插手的结果。1965 年在中央军委解决海军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上，陶勇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本能地站在党内右派和中摇派一边，认为有人搞阴谋诡计，他怒火填膺，“拍案而起，愤然离席。”1966 年 7 月，中央军委再次召开海军权力再分配会议。此时的林彪已不是一年前的林彪，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已确立了军队绝对领导地位，即将登上副统帅的宝座。陶勇应叶剑英之邀参加会议，不识时务地痛斥以副司令李作鹏中将为代表的海军左派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被人当枪使的陶勇，他的痛斥无异于以卵击石，为半年后的家破人亡，埋下了祸根。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斗争残酷性就是你死我活，“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已被批得荡然无存。在权力斗争上，陶勇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966 年底，叶帅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要陶勇提高警惕；陈丕显如实转告。许世友上将专程到上海来看患有胃病的陶勇，规劝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性格决定人的一生。当致命的危险悄悄向他袭来的时候，刚烈的他，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67 年年初，被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陈丕显，想开个常委会都没地方开。陈向陶勇借地方，陶勇二话没说，便把东海舰队司令部礼堂借给了他。这件事很快被以舰队政委刘浩天中将为首的左派捅上了天。林彪在给陶勇的一份电报上，严厉批评道：**“军队不能成为地方走资派的庇护所。”**

挨了林彪批评的陶勇，理应有所收敛，但他却迎风而上。交通部长彭德清，是原 27 军军长，是陶的好友和原部下，因被揪斗，跑到东海舰队躲避。陶勇说：**“你就在这儿，哪都别去。”**左派政委刘浩天却告诉造反派，致陶勇被冲击，彭德清被掳走。

陶勇硬是不吸取教训。陈丕显被造反派抓走并被关压了起来。陶勇闻讯，便驱车前去寻找。他冲进造反派占领的市委，找毛泽东的鹰犬张春桥要人，因没有找到张，只得作罢。回司令部后，他挂电话给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

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

陶勇公然对抗文革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左派当权人忍无可忍了：陶的“**汉奸**”软肋，很快被左派翻了出来。

1967 年 1 月 21 日，五十五岁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已走到了自己的末日，死神随着一个不见阳光的秘密计划，悄悄来到了他的身边。

早上，妻子朱岚似有预感，她劝他不要出去。陶勇厉声说道：“**怕什么？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了**。”他是个坚信党的共产党员，但他的智力没有与时俱升，还停留在苏中跟孙二虎、徐宝富们斗智的水平上。

上午，陶勇和老战友、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在办公室里，一起发文革的牢骚，一起骂文革的“娘”，还说，他要带一个排，把陈丕显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午饭后，他在舰队招待所 501 号房间里休息，那是他经常午休的地方，舰队许多干部都知道他的这个秘密。由于他同廖政国一起大骂文革，使得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理发，下床踱出楼外，在小花园里散步。两点多钟，他看见招待所所长。他建议所长以后多养黑猪，说黑猪瘦肉多，好吃。初春的花园里，百叶凋零，寒风吹来，光秃秃的树枝在灰色天空中摇曳，发出呜咽哀鸣，似乎在为他送葬，枯黄的衰草在寒风中瑟瑟颤抖，好像已经看见死神的狰狞：这一切他都没有察觉，想到的只是理发。“**把周妙基找来，我要理发**。”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句话，传给了招待所所长。十多分钟后，招待所所长领着周妙基来到小花园时，大吃一惊地发现，舰队司令陶勇已死在直径仅及两肩、深不没顶的小水井里。

现场迅速被制造了出来：拖出井来的陶勇尸体，身上泼满了墨汁，胸前挂着打红叉的牌子，戴着一顶高帽子，头上的钝伤被巧妙地盖住……这个漏洞百出的自杀现场，把招待所所长和理发员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多说一句：制造者后台之强大，足以封住所有人的嘴。

事发不到两小时，政委刘浩天在舰队司令部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很快，他又把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电报，发往北京。不到四个小时，大权在握的李作鹏，便对陶勇做出“自杀”、“叛徒”的结论，并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从死亡到电报，到结论，到通报，工作效率之高，前无古人，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一个“张飞”死了；不同的是，张飞不是死于刘备或诸葛亮等首脑人物的策划。

由惮于舰队官兵对“自杀”结论的怀疑和不服，陶勇的尸体一直保存在冷冻室里。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没有人敢做复检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打斗拼杀在全国全面展开，陶勇之死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夏日的上午，陶勇的遗体被压送进龙华火葬场。焚尸炉的炉工蔡其家，看到陶勇的火葬申请单上，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家属不看，骨灰不要。”乘人不注意时，蔡师傅偷偷把骨灰埋藏了起来。

毛泽东时代是个株连成风的时代，一人出事，全家遭殃！

陶勇“自杀”的当晚，造反派闯进陶家，向朱岚宣布：“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这不啻是晴天霹雳，陶家陷入悲哀恸哭中。朱岚愤怒地对造反派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是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的凶手！”对她怒喊的回答是，三天反复抄家，抄查陶勇的罪证。

许世友上将派人来劝朱岚，尽快离开上海这块是非地，搬到南京住。陶勇的“自杀”改变朱岚温文尔雅的性格。她对来人说：“不把陶勇问题搞清楚，我不离开上海。”她谢绝了许司令的关照。她相信党会为陶勇伸冤，会严惩凶手。与许司令比较起来，她的“相信”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悲哀！她开始日复一日地申诉、上访，但她的一次次申诉和上访，换来的却是迫害的一步步升级：她，一个立志要替父亲、弟弟报仇的朱岚，被打成了日本特务。1967 年 8 月，朱岚突然被捕，被秘密关押起来。专案组夜以继日地轮番对她围斗、拷打，逼她承认是“日本特务”，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其中包括苏中“借道”之事。对于“借道”等不光彩的勾当，中共高级权贵们，在中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一家独霸的“舆论一律”环境里，谁都没有胆子站出来替陶勇分担责任。君不见：当年中共与日伪汪精卫相互勾结、分享情报为中共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当事人潘汉年，因嫌上海副市长官位太小，1955 年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勾结的详情，借以邀功请赏。不料毛泽东见字后，勃然大怒，遂被毛以**“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 CC 派人物”**的罪名逮捕入狱，终被杀人灭口，监毙于狱中；潘手下的知情人，也被一网打尽；当年根据毛、周的决定，派遣潘汉年与日伪勾结的新四军政委、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在“高饶事件”已中箭落马，也因有暴露与日伪勾结绝密事件的重大嫌疑，终被灭口于狱中；陶勇曾奉命“借道”日军，岂能好死？年轻的造反派，哪里知道个中的重大隐情？可怜替罪羊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随夫君而去。

朱岚死后，三个大孩子已参加工作在外，四个未成年孩子流落街头，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在陶勇生前好友的帮助下，他们逃出了上海，跑到南京军区司令部。他们跪在许司令的面前哭道：**“许伯伯，救救我们！”**许世友含泪扶起了落难的孩子们。由于南京军区也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下令部队接受他们。于是，南京军区部队里出现了一群娃娃兵。许世友是个好心肠的司令。然而，他的另一面不久呈现。当他成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在南京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全家“下放”运动。凡成份不好的家庭，都被武装民兵押送到苏北最为贫穷的农村……一时间全城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有人目睹：**“城南东西向的长乐路与集庆路接头处有座桥，名曰新桥，桥畔有个卖开水的老虎灶，因为老板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走劳改去了，由一个‘活寡妇’带着一群女儿在惨淡经营。那天我下班路过，正遇上武装民兵开来的一辆卡车，准备把这家人家扫地出门。一些破旧的家具已经被搬上了卡车，但那蓬头垢面的寡妇和她的几个衣衫褴褛的女儿们，死活不肯上车，躺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呼天抢地地哀号……她们拿定了主意：宁肯死在祖祖辈辈居住的南京，也不愿倒在人地生疏的边远农村。”**许世友还在江苏全省大抓“五一六”分子，受害者达数十万人之多。其中，仅在南京军区内，副军级以上干部就关押了五六十人，整死和自杀的超过 100 人。当权者**若不被人整，必当去整人**，这种习以成性的赤文化，许世友焉能化外？

一年多后，最高领袖再现“天使”，其他大员便紧随其后。周恩来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陈毅感慨万端地对夫人张茜说：**“陶勇不在了，可痛！可惜！陶勇不可能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他们都知道陶勇暴死的原因，都知道他是“通日卖国”政策的替罪羊，但他们都不敢直面“借道”之事。可见，他们事后替陶勇抱不平，不过笼络人心而已。

对陶勇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刘浩天中将，在林彪摔死后，安然无恙地度过审查，寿终正寝于 1984 年；另一个责任人李作鹏，在被审讯时，却能避开陶勇之死。这其中的隐情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大人物作梗，刘浩天能逃过审查吗？李作鹏的审讯者能回避陶勇之死吗？

陶勇之死是自杀还是他杀，本来是个并不复杂的案件，但为了掩盖“与日伪勾结绝密事件”，维护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尊严，在顶立巨人的干预下，这个不该成谜的陶勇之死，却成了千古之谜！

1984 年初，粟裕大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再三提到他所倚重的战将陶勇说：**“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

查出来。”也许他知道保护刘浩天的重大隐情，知道那是一个令他无法撼动的大人物，他只好做了个无可奈何的临终忏悔！

三、打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图 14-1：批斗张霖之

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高级干部是 59 岁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张霖之曾对毛泽东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大跃进政策有过不满，且颇有微词。文革中，在毛的默许和江青的怂恿下，1966 年 12 月，戚本禹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自此，张霖之以“不满”和“株连”的双重“罪恶”，多次受到批斗和殴打。1967 年 1 月 22 日，终于在矿业学院内被左派红卫兵暴打致死。(图 14-1)。

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1966 年 12 月 28 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 xx，载 x 猛扑上前，用力压。接著，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著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進衣领，张部长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著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 xx 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後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 年 1 月 12 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 xx 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後，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後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对于张部长的死因，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但在“舆论一律”和后来的“主旋律”的监控下，这些解读都被一一边缘化了，而在史无前例的大审

判中，官方则把他们的解读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历史。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审判》一书中，官方详尽地记录了对江青的审判：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 60 斤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和批斗。这是目不忍睹、骇人听闻的场景。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29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 年 12 月 14 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病中关押的 33 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 52 次。1967 年 1 月 21 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 30 多处，头部被打得伤口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证据放映后，针对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的辩解，“公诉人**江文**痛斥江青的无耻诡辩”。他说：“江青妄图把自己的罪行推到毛主席身上是绝对办不到的。”接着他列举了六宗迫害老干部和群众的罪行，执问江青说：**“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江青干的吗？”**当列举到张案时，公诉人**江文**大声执问江青：

“江青诬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煤炭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指使戚本禹煽动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残酷批斗张霖之 40 多天，**张霖之被迫害致死，难道这也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

江文痛斥江青时，可以说是理直气壮，所列罪行，条条都是有理有据，罄竹难书。但公诉人江文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的辩解，却不予采信，显然是内定好了的。

张霖之是不是被江青“咬”死的？历史不会忘记，张霖之的命运，早在两年前已经安排好了。那是 1964 年 12 月，在总结“四清”运动经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毛说“四清”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对毛的说法表示不满。他发问道：“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忿怒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自此，张霖之成了**争宠谄媚者、告密出卖者和落井下石者**的“众”矢之的。据说，张霖之对毛泽东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大跃进政策不满的私下言论，都从不同渠道，秘密地传到了毛的案上和耳里。由于是“据说”，张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已无据可考，但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又有《彭德怀自述》和《庐山会议纪实》两本书加以旁证，使这句话的真实性大为增加。人们流传说，张霖之曾说过一句“触讳犯忌”的话：

“历史上的第一任都很厉害，如秦始皇、毛主席等等。”

从“触讳犯忌”上来说，张霖之的这句话，即不“触讳”，也不“犯忌”，因为,早在 1957 年，毛泽东在回应右派指责他是“秦始皇”时，他痛斥道：**“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中，他命令全党用**“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铁纪律去完成大炼钢铁任务。面对一个自称为秦始皇的毛泽东，张霖之的话怎么能说是“触讳犯忌”呢？其实，张说的那句话，的确有不敬之嫌。中共是个等级森严的党，尊贵与卑微，界线分明，在延安时期，物资上就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别。言论上呢？言论上不仅内外有别，上下更有其别：毛泽东说自己是秦始皇，那是高尚的自谦，因而是革命的；臣民这样说，不是恶毒污蔑，便是卑劣攻击，因而是反革命的——这是赤文化规定好了的原则。

江文在“痛斥”江青时，有意回避了毛泽东大骂张霖之的那句致命的话，更回避了他和特别法庭都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录：江青当时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她那来的那么大的权力，能置一个中央后补委员于死地？

江文在“痛斥”江青时，还有意掩盖了历史无法抹去的杀戮氛围：毛泽东所支持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中，公开宣言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自此，批、斗、辱骂、罚跪、坐“喷气式”、颈上吊砖等“触及灵魂”的**毛式批斗法**被以抄家、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奸污、吊打、打死等暴力为主的**毛式揪殴法**所取代。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到 1966 年 8 月，在全国就形成了批、斗、抄、打、杀红色恐怖氛围，形成了导致十万人丧生的**“红八月”**——文革第一次大屠杀。其中，在北京，就有 5,000 多人被打死。在这个红色恐怖氛围继续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又在 1966 年 12 月 26 日的生日宴会上，举杯发出了**“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的**“生日号召”**，接着，又在他直接策划和江青的直接指挥下，乘着红色恐怖的腥风血雨，借着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之势，于 1967 年元月 6 日，掀起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又称“一月风暴”。在毛泽东掀起的“一月风暴”里，1967 年 1 月 8 日，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被逼自杀身亡，1967 年 1 月 21 日，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被打昏后推入井中淹死。同日，毛泽东向他的副手国防部长林彪下令：**“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第二天，1967 年 1 月 22 日，红卫兵应声把张霖之打死在北京矿业学院里。因为，在两年前的 1964 年 12 月，张霖之已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国第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人说，阎红彦、陶勇和张霖之是为毛泽东武力夺权祭旗而被逼杀、打杀的，这话不无道理。为了夺权，毛泽东要排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于是，拿反对文革的阎、陶和张霖之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开刀祭旗，是势所必然。由此可见，张霖之被江青“咬”了一口应属真实，但没有“主人”的口令，“犬决”张霖之是不可能的。

在“势所必然”的杀戮中，毛左集团里的江青、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等权贵，都是听命于毛的马前卒。然而，只有江青一人，敢于承认她是毛的一条“狗”。邓小平的中共谎骗乖谬之处在于：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把“狗”与主人分开，指责“狗”利用主人的“晚年错误”乱咬；但对主人养“狗”、训“狗”和纵“狗”的责任，却避而不审。

同**贬谪臣下、褒美君王**的封建传统一样，避而不审主人养“狗”、训“狗”和纵“狗”的责任，是赤文化规定好了的原则。但中国人都知道“马仁狗义”的真理，也知道“打狗看主人”的古训，因此，江文和特别法庭硬把江、毛分开，以打“狗”饰毛来媚主，也使自己堕入到巴儿的犬儒（1）行列中。

四、拷死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

许光达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学生，能征善战且能武尚文。十七岁加入共产党，十九岁参加南昌起义，先后担任排长、连长等军职，二十二岁便升当红二军团十七师师长。1932 年，同国民党军作战时，身负重伤。先赴上海手术，因身份暴露，迅即转入苏联手术治疗。在苏联伤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8 年年初，未满三十岁的他，由苏联回到延安。先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长，后任抗大教育长。这位风华正茂英俊飒爽且又留过洋的将军，一出现在延安，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成了诸多年轻姑娘瞩目的对象。

抗大是人才集中的地方，有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有才华出众的作家、记者，有能歌善舞、俊俏艳丽的演员，还有风度翩翩的女军官，等等。其中，不乏有向许光达求爱者，也有牵线搭桥者，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于是，“教育长这个人太清高，难接近，不懂得感情。”是不涎女色的**“彭德怀第二”**等飞言流语，在延安传播开来。其实，许光达是个情种，在他的感情深处，十年如一日地装着一个人，就是他的结发妻子邹靖华。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乳名五伢子，1908 年生于湖南省长沙东山乡萝卜冲；父亲许子贵，是一位老实的农民。邹靖华原名邹经泽，乳名桃妹子，1913

年生；其父邹希鲁，以教书为业，与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友善。当五伢子十四岁桃妹子九岁那年，在两家父母包办下订了亲。南昌起义失败后，许光达随部队转战南北。1928 年，他又奉党组织之命，打入国民党三十三军做兵运工作，在安徽寿县办学兵团当教官。事败露后潜回家乡。是年十月，在父亲主持下，与十五岁相貌平平的桃妹子完婚。由于叛徒告密，身份暴露，许光达不得不与新婚十天的妻子洒泪而别，逃到上海周恩来处。但这一别就是十年。十年思念的苦楚难于用语言表达清楚。当邹靖华从林伯渠那里得知许光达在延安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千里寻夫的路程。而在邹靖华奔向延安的途中，许光达已从林伯渠发来的电报里，获得到了这个令他晚上难以入眠的“情报”。几天后，邹靖华到了延安。远道奔波，十分疲劳，正想痛痛快快睡一觉的时候，一位小战士来到了她的住处。——“谁叫邹靖华?”——“谁找我?”——“我们教育长。”——“你们教育长是谁?”——“许光达!”一位高大的军人走了进来，借着微弱的麻油灯，邹靖华一眼就看出这是她思念多年的丈夫。夫妻十年后重逢，自是悲喜交织，无声的泪珠潸然落下，千言万语也难以名状（图 14-2）。在延安，有许多人当了大官后，就以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为由而另组家庭，造成了许多“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式的悲剧。许光达自是异类；但夫妻这段忠贞不渝的爱情佳话，却在延安广为传扬。



图 14-2：许光达与妻、儿合影

抗日战争时期，许光达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毛泽东评价甚高。1942 年 4 月，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在晋西北五寨、偏关一带，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忠实地执行了中共保存实力、积极发展的战略方针，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内战其间，许光达先任一野三纵司令，后任第二兵团司令，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城略地，战功卓著。其中，一次掩护中共中央机关撤退时，在背靠黄河的佳县乌龙镇北，阻击了国民党三个旅的轮番进攻，使中共中央机关顺利撤退到安全地点，被毛泽东称赞为“前无古人的胜利”。

“解放”后，许光达受命组建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1955 年授大将军衔。因在十个大将中年龄最小，怕人忌妒影响团结，遂上书让衔降级言：**“授得太高了”**。据说，毛泽东读了他的“降衔申请报告”后，甚为感动，举报告曰：**“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遂决定衔不降，行政级别由四级降为五级。

任何独立思想都是中共大敌。许光达提出的**“没有技术就没有坦克部**

队”、“**为掌握坦克技术而斗争**”等口号，就与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和林彪的“突出政治”相背；他还曾擅自在坦克兵部队中，一度实行过苏联的一长制，又与毛泽东“支部建在连队”的思想相左。这些都为他在文革中迅速倒台，埋下了祸根。

许光达还是个对亲友缺乏温情的冷漠将军。据将军的儿子许延滨少将说：“父亲在母亲面前念叨，‘爹爹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们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为了响应中共中央从简办丧事的号召，冒着“六亲不认”的骂名，派了一名政治干事代表他，草草埋丧了他的父亲。三年人祸饥荒中，装甲兵机关许多军官的亲属，因饥饿从四面八方拥进北京，在机关大院里长吃长住。为此，许光达主持召开装甲兵司令部党委会议，做出一项决议：“困难期间，司令部机关的干部，要动员亲属不要来北京；已经来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凡是来探亲的，只允许住三天，就动员他们返回原籍。”没想到这个决议刚颁布几天，许的四哥和六弟，也来到了北京，他们也是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来投靠他的。整个装甲兵机关大院的军官和家属们，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许司令。许光达二话不说，劝走了四哥和六弟。结果，刚走两天，六弟饿倒在安阳车站，他急将六弟接来北京抢救，因胃完全萎缩抢救无效而死亡。许光达为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决议，付出了饿死亲弟弟的惨痛代价！

许光达为了维护中共党的团结，他要求降衔降薪，为了维护中共党的威望，他六亲不认并饿死了亲弟，可以说，他是个忠于中共、疏于亲情、不苟淫欲、谦恭耿介、功勋卓著的共产党员。然而，这样一个共产党员，文革后不久，便在“二月兵变”的旋涡里挣扎，终惨遭灭顶之难。

在中共伦理共识作用下，为了向毛主席表忠，与许光达有隙的原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后任二十六军政委的**程世清**少将，向副统帅林彪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许光达对林副统帅“**最不满、最仇恨**”，“**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等等。这封告密信，不啻一颗重磅炮弹，轰向许光达和他的老上级贺龙元帅。“二月兵变”的“假说”有了新的证据，甚至可以说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了。由于检举有功，程世清少将很快升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九大时，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程世清飞黄腾达之时，许光达和贺龙正一步步走向地狱。

1966 年 9 月 8 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在起草对贺龙立案审查报告的当天，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便点了许光达的名。他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周恩来起草的审查报告和林彪的

点名，给而后审讯许光达定了总调子。贺龙专案组成立以后，便按周恩来的报告和林彪的讲话，把许光达定为贺龙一案中的第二号人物，是贺龙兵变的“总参谋长”。1967 年 3 月 6 日，善搞逼供信的“整人专家”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中将，便在装甲兵成立了**“斗许光达、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专案组”**，对许、张实行隔离看管。

1967 年 9 月 13 日，贺龙专案组成立，许光达专案组也紧随其后挂牌办公。从 1967 年 12 月起，专案组开始批斗许光达，经常罚他站立、弯腰，而“车轮战”使他三天三夜不能休息。由于没有达到让他“坦白交待”的目的，专案组请示后，将许光达伙食标准下降为犯人标准，即每月 8 元，力图用饥饿来摧垮他的意志。

许光达的顽固不化，激怒了贺龙专案组组长余立金。这位在“杨余傅事件”中含冤落马的空军政委余立金，文革初期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他怒斥许光达专案组“右倾”,“办案不力”，他要黄志勇从装甲兵里抽调一些得力骨干来对付许光达。于是，与许光达有怨恨的人如**都曼林**、**党志壁**等，都被调入专案组。

据占有机密资料的专家们披露，在专案组批斗许光达期间，林彪党羽**吴法宪**对许光达一案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李作鹏**的批示是：**“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邱会作**的批示是：**“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被中共斥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批示，却看不到专案组直接领导——“中央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批示。也许我们不能责怪占有机密资料的专家们的偏袒，因为，他们不能不慑服于“主旋律”的淫威！

在“刺刀见红”和“不怕许光达死”的批示下，专案组提出要**“血洗许光达”**。于是，他们从总后勤部借鉴了 23 种“行之有效”的酷刑，来对付许光达。肖思科在他的《超级审判》一书中，对这些酷刑做了以下描述：

1、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

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

3、下颏顶茶杯：把两个茶杯摞在一起，下边放在衣扣上，上边顶着下颏，使他不能动；

4、坐高低凳：叫他坐在一个矮木凳上，两脚放在桌上，两三小时不能动，只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体操”：身体靠墙，两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后颈骨，造成很长的时间抬不起头来；

7、打嘴巴；

8、刮伤：在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再用木棍拨弄伤痛的地方，增加痛苦；

9、“吃元宵"，集体拳打：审查人员站在四周，被审人员站在中间挨打，周围你一拳，我一拳，捅来捅去；

10、用劈柴、扫把打：打双肩、脖颈、屁股、踝骨，致使皮肤红肿、溢血、溃烂，长时间还有紫色伤疤；

11、脖子上挂椅子、铁凳子、砖头：将椅子倒立后从背后挂在脖子上或挂铁凳子，在椅子底部加上砖，或脖子上套铁丝，两边各挂三块砖，也有时双手各拿一块；

12、“捏羊蹄”：将手指屈曲后用大拇指猛压指甲处，痛得被审者在地上打滚，还不让喊出声，否则用擦桌布堵住嘴，捏后被审者手指溢血、青肿，致使手指变形；

13、让被审人员站在砖上，将其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起来，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后将砖去掉，脚离地面；

14、双手举铁凳：双手将二十多斤重的铁凳举起，因支持不了，只好慢慢套在脖子上；

15、烟头烧踝骨：留下黑色伤痕；

16、逼着吃带粪便的馒头，造成中毒性的痢疾，险些死亡；

17、拧大腿肉：看守者（注：利用犯人看守）用指甲掐他大腿内侧。

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打人是经常的，有时不愿打了，就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9、强制在身上练针灸：看守为学针灸，以治病为名，在身上多次练针，想扎哪就扎哪，乱扎一阵，不准反抗；

20、头顶大碗：为折磨人，曾几次用大碗装满凉水，顶在头上，每次半小时左右，还不能用手扶；

21、限制喝水，逼喝脏水：天热口渴，多次要求喝水不给，逼着喝洗脸水；

22、烟头烫嘴：不交代问题，审查人员就用烟头烫嘴；

23、捆在椅子上：为了不让走动，就用绳子将两手捆在椅子上。

以上 23 种酷刑并非解放军总后独创，更不是总后首长邱会作的专利，那是在中共伦理共识作用下，广大党内外积极分子长期共同创造的刑罚集萃。笔者少年时期，就从墙缝间偷看过解放军斗争逃兵大会，第一次听到“打！打！打！”的集体呼号，第一次见到吊起来用棍子打、皮带抽的刑罚。“解放”后，笔者经历了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拔白旗、抓小彭德怀、反后进、民主革命补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见过的刑罚至少还有六项未包括在 23 种中。那六项是：1、铁丝穿锁骨刑；2、晒太阳刑，即反缚双手，跪在砖上晒太阳；3、活体倒挂刑；4、跪砖触电刑；5、嘴塞脏布刑；6、鼻子灌水刑。在肃反运动中，笔者见一个被吊打者死不招供，有积极分子建议用“老虎凳”，政委说：“不**行，那是国民**

党对付共产党人的野蛮刑罚，我们共产党人讲文明！”文革后，刑罚又有所发展，其承前启后版广为流行，中国人已见怪不怪了。(图 14-3)



活体倒挂刑

图 14-3：承前启后版



跪砖触电刑



嘴塞脏布刑



鼻子灌水刑

没有资料证明这 23 种刑罚都用在了许光达身上，但从各方记载来看，专案组在借鉴中却有创造性地发挥。据《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书记载，专案组的打手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光达趴下去舔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专案组组长**薛振先**，是位与许光达素有芥蒂的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为了解恨，审讯时，他率先动武，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见领导动手，便纷纷赤膊上阵，把许光达打得昏死过去。当医生将昏死的许光达弄醒后，经过培养的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许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直把许打得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再打。只见一个粗壮打手，飞起一脚，将许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起来，再推到椅子上。鲜血终被打了出来，浸透了许光达的白衬衣和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身高马大的师团级军官党志壁和都曼林，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成九十度。主审人要许承认他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都曼林便一拳又一拳地猛击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给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算了!”原装甲兵保卫部军官党志壁，因许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原苏联内务部部长，刽子手），便怀恨在心，乘机对许大打出手，致使许光达口吐鲜血。

61 岁的许光达终于被拷打垮了。1968 年 11 月到 1969 年 1 月，许光达一次带伤病入院治疗六十天，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 年 5 月 23 日，许光达被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 月 31 日，病危的许光达已卧床不起，竟被专案组残忍地拖下床去向毛主席像请罪！1969 年 6 月 3 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死因迄今不明。

历史竟是那样的荒谬和无奈：

当听说要给许光达平反时，现场看管许光达的警卫连连长**罗治芬**，惶惶不可终日；1975 年 6 月 3 日，**罗**在受到恐吓的当晚，便在家中上吊身亡。

为了表彰专案组有功之臣，都曼林被提拔为兰州部队十九军副军长。许光达冤案平反后，打手兼刽子手都曼林却安然无恙。二十一世纪初，笔者发现，这位当年曾血洗过许光达的都曼林，在 2001 年 6 月 8 日上午，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军副军长”身份，出席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组织的“隆重举行陈树谷烈士塑像揭幕许岙战斗纪念室揭匾仪式”。据当地报导：**“老领导都曼林和市政协主席章永志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为纪念室揭匾。”**

五、药死贺龙元帅

“滚！你给我滚！”1969 年 1 月的一天，年近七十三岁的**贺龙**元帅，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对着“医生”大骂起来。

何以使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元帅大发雷霆？

原来，在 1967 年新年伊始，为了躲避揪斗，贺龙和夫人薛明，逃到老朋友、老上级周恩来家里躲藏。碍着共事四十多年的情面，周担着风险无可奈何地收留了他们。1 日 19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党组织下达了逐客令：20 日凌晨 4 时，派人将贺龙和夫人薛明“送”到北京西山囚禁了起来。囚禁的地方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从此，他们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战斗和紧张工作中度过的贺龙，突然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他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

本来主持军委工作雄心勃勃的贺龙，与总参谋长罗瑞卿联合在一起，大有取代林彪之势。1965 年，在解决海军问题时，贺龙与养病中林彪发生分歧。贺龙利用主持军委工作之权，公然向林彪发难：**“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又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这“有的人”当指林彪无疑。然而，贺的权谋技艺逊林一筹，被林彪来了个釜底抽薪。林的权谋是：**“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他先掀翻了贺的帮手罗瑞卿大将，然后徐图贺龙。随着罗瑞卿倒台、跳楼，贺也失去了主持军委工作权力；如果不是“南昌起义”总指挥的功劳在册，早被林彪掀翻了。

1966 年，是贺龙力不从心郁郁不乐的一年。忆当年，他指挥“南昌起

义”时，林彪不过是一个小小连长，今日竟在他头上拉屎拉尿；他不想则已，一想起便忿忿不平，大有虎落平川被犬欺之感。然而，年龄不饶人，本来健康良好的贺龙，在精神压抑又与世隔绝的孤寂环境中，性情暴躁起来，原患有轻度高血压、糖尿病也日渐加重：疲乏、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到 1968 年 3 月，又患上了脑缺血失语症——他终于被病击倒了。

随着贺龙病情日益加重，他的罪行也日渐升级。林彪在掀翻罗瑞卿后，便对这位南昌起义时的上司，频频出招，一心要掀翻他。开始他说贺是罗瑞卿的后台；在亲信面前他又指责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由于出身“黄埔军校”，自恃清高，他还背地里骂过贺是土匪、“刀客”。接着，他同支持他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成员，翻出了个“小手枪事件”。他们放风说，贺龙有支小手枪，常带在身上，随时准备暗杀毛主席。弄得毛泽东也起了疑心：在一次接见造反派领袖的谈话中，毛突然冒出一句“**那个贺龙，到哪都带著枪嘛**”的话，引发了“带枪刘邓”的**传言**。文革小组成员不敢怠慢，穷追猛查，最后，终于查出了小手枪的下落。原来，贺龙确实有支小手枪，但已锈蚀得不能当枪用，便送给董必武的小女儿当玩具玩；当从董家缴获了这支无用的小手枪后，这个案子才算了结。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不论党内党外，都是你死我活，不打则已，一打要往死里打：林彪掀翻贺龙的“二月兵变”，便被精英们炮制了出来。

“**二月兵变**”是毛泽东思想主导下，由毛泽东亲自出题目，林彪联合江青、康生等人做文章的一幕悲剧。悲剧的主人公是贺龙和他的老部下许光达等人。

毛泽东出的题目是“**保卫首都**”，防止政变。他亲自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为防止罗瑞卿旧部滋事，撤销了独立的公安部队，增调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据此精神，林彪在 5 月 18 日的中央全会上，发表“**防止政变**”的讲话，制造了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紧张气氛。周恩来根据“保卫首都”的“最高指示”，立即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的意见书；该意见书经毛泽东批准后付诸实施。1966 年 7 月初，北大学生**丁键**根据“保卫首都”的指示和林彪讲话，以二月份有部队人员来北大看房子为由，提出了彭真企图搞政变的“假说”，贴出了一张名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整人、杀人为乐的康生，见到大字报后，为了迎合林彪掀翻贺龙的需要，根据大字报的“假说”，7 月 27 日，他在北师大主持批判工作组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讲起了彭真联合贺龙试图发动“二月兵变”来。他庄

重肃然地说：“**今年 2 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随后，他又在中央文革会上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一时间，“二月兵变”流言充斥北京。对于这种流言，周恩来说“**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邓小平也说“**我们查了，没有这个事**”，但“二月兵变”流言却越传越神乎。什么贺龙“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还有无线电俱乐部”，等等。连周、邓都出来否认的“二月兵变”，为什么越传越神乎了呢？这当然同林彪、江青和康生紧追不舍有关，但关键是毛泽东对此态度暧昧。

毛泽东怀疑贺龙对他不忠吗？否！那两个“枪毙”他不会忘记。一件是当毛泽东执意要娶江青时，遭到党内许多人反对，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排众议，放出粗话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老子就枪毙他**。”另一件是毛泽东与王明争夺王位时，贺龙又放出粗话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主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震动了整个延安。有人说，在林、贺二虎相斗时，为了“大局”，毛泽东不得不重演**保林倒罗**的故技而**保林倒贺**。这种分析虽有道理，但不充分。毛泽东同一切独裁者一样，都有疑心重重的痼疾。无论是保林倒罗抑或保林倒贺，在“疑”字前面，“保”字和“倒”字之间，没有鸿沟。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的权谋，在保谁、批谁、倒谁的选择时，不仅要服从他在“大局”上的政治考量，还要留一手考察。他在贺龙问题上的暧昧，就是这种权谋的表演：一方面他开会时拉着贺坐在他的近旁，做出了“保”贺的宽容姿态，一方面默许或暗示林彪和江青等中央文革人员对贺制造流言和批判，借以警示一切“带枪”的将帅们，不得轻举妄动，从而达到一箭多雕的目的。

在林、江等人打倒贺龙的鼓动和穷追下，终于有人出来落井下石、往深处揭发了。

1967 年 2 月 14 日，武汉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揭发贺龙在历史上曾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林彪见信后，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9 月 13 日，经毛泽东批准，贺龙专案组成立，贺的“**企图叛变投敌**”和“二月兵变”等问题，被正式立案审查。祸不单行，1968 年 3 月，与贺有隙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向蒋介石“**求降**”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二月兵变”也株连了十多个高级将领和官员，如大将**徐光达**，中将**王尚荣**、**廖汉生**、**黄新廷**、**杨秀山**、**顿星云**和**成钧**，少将**雷英夫**、**金如柏**、**李贞**、**郭林祥**、**向黑缨**、**谭友林**、**陈鹤桥**和**樊哲祥**，高官**荣高棠**(体委副主任)和**张仲翰**(农垦部副部长)等。重刑之下，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画

供”：一共召开了八次黑会，兵变时间是十月一日。晏、李的揭发和成、雷的“招供”，使贺龙陷入挨打的困境。

往死里打，就要不断扩大打击范围。在林、周、江、康等人支持下，贺龙兼任主任的国家体委，被炮轰为重用坏人的“独立王国”。为了给打倒贺龙制造舆论，贺龙在体委的代理人副主任荣高棠在劫难逃。1966 年 12 月 24 日，在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上，周恩来大批荣高棠**“是彭真型的人”**，大声责问并旁敲侧击贺龙道：**“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为了保全自己、急于划清界线的贺龙，在这次大会上，对共事十多年的亲密助手反咬一口，说：**“荣高棠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粗的，因为我是老粗，根本看不起的**。”他还恶狠狠地大骂：**“荣高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大会开得很好，要把荣高棠斗倒！斗垮！斗臭！**”于是，一篇批判体委“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文章，在报纸上传播开来。

文章所说的“坏人”，直指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原来，1952 年，贺龙出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后，积极笼络海外运动人才回国效力，傅其芳和姜永宁，被一起从香港被贺、荣“统战”回国。在全国乒乓球赛中，姜永宁获单打冠军，傅其芳获亚军，后被双双选入国家队。1958 年起，傅和姜先后担任了国家乒乓球男队总教练和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培养出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何智丽等一批世界级乒坛名将。他们在 1961 年至 1965 年的世界杯比赛中，为中国队荣获男、女单打冠军和三次蝉联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容国团二十岁便夺得全港乒乓球单打冠军，并挫败了访港的日本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声名大噪。1958 年他从香港被贺、荣“统战”回国，当年便获全国单打冠军。在 1959 年的世界杯乒乓球锦标赛上，他一举登上冠军宝座，成为中国首位夺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然而，随着后台贺龙、荣高棠的倒台，他们也纷纷“落马”：1969 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傅、姜、容先后被打成**“三青团特务”**和**“日本特务”**。因不堪毛式揪殴法的残酷批斗，三人先后于 4 月 16 日、5 月 16 日和 6 月 20 日自缢身亡。据说，他们的死，与当时的乒坛精英包括他们培养的乒坛名将落井下石有关。虽然 1979 年三人都得到平反昭雪，但在当时，他们都是“畏罪自杀”，其后台贺龙也因而罪责难逃。在专案组的贺龙罪行录中，“二月兵变”、“乞降”、“求降”和乒坛三杰的自杀等证词，都成了贺龙“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罪行。

1966 年 9 月 5 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当面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然而，两年后的 1968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宣布**“不保”**

贺龙了，为倒贺开了绿灯。被御用精英们称为贺的“保护人”周恩来呢？1968 年 3 月 15 日，就是这个“保护人”，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就下令“**把斗争矛头对准贺龙**。”

绿灯打开后，贺龙专案组便伸入到西山囚贺处。由于贺脾气太大，专案组的面对面审察，往往以双方顶牛而无结果。权变方式，以较有人性的“背靠背”审，即提出问题，要贺龙老实回答。但他们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怒不可遏地吼叫：“**真是活见鬼**！”“**完全是栽赃**！”“**统统是假造的**！”等等。这种不屈服态度，使专案组十分恼火，因为他们常常受到上级领导“办案不力”的责难。于是，他们尝试从精神上、肉体上加大整治力度，迫使不低头、不认罪的贺龙屈服；同时，他们还从毛、林、周、江等“**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里，找到了这种尝试的“合法”性。

本来在囚禁中的贺龙，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专案组的“尝试”，又使他的身体越变越坏。专案组的“尝试”首先从饮食上入手。对此，有知情者写道：“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接着，他们“尝试”用“医疗为专案服务”去治贺。他们精心为贺龙选了个“医生”。据报导，这个“医生”是个神经科护士，对贺龙的糖尿病、高血压等病情知之甚少。这个“医生”按专案组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自备药品，继而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普通降糖药也得不到及时和按量服用。一天，“医生”“送错了”药，被薛明及时发现，“医生”也被迫承认了。贺龙本来就认为“医生”不是真正医生，而是个监视他的特务，早憋了一肚子气，今天顺势暴发，怒斥“医生”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毫不示弱，他顶撞道：“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于是，就出现了本节开始的那个场面。

不论贺龙如何怒骂，也不过是一只在铁笼里咆哮的猛虎。“尝试”很快显效。在政治上打击、精神上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等刁难下，贺龙病情迅速恶化，到 1969 年 5 月上旬，连续摔倒过 7 次。此时，贺龙已发现，专案组要饿死他、困死他、拖死他，他对夫人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说的“**他们**”是谁？是“贺龙专案组”两任组长余立金和张秀川吗？还是“贺龙专案组”的直接领导“中央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可惜，困兽犹斗的贺龙已无回天之力了。在“医生”给他输了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后，1969 年 6 月 9 日，被三零一医院医生确诊为糖尿病酸中毒，旋即送进医院抢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当天下午 3 时 04 分，因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

贺龙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他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 年 3 月 22 日，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一户农民家庭。因父母早丧，幼年便生活在姐姐贺英家里。少年时，曾赶着骡子行走于湘、鄂、云、贵、川之间，驮运贩买盐巴、烟土和马匹。1916 年 20 岁时，率领 21 名弟兄，带了几把菜刀和马刀，劈砸了桑植县芭茅溪盐税局，夺得十几支步枪，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1917 年，因刺杀湖南督军谭延闿失败后，逃回湘西。在慈利县，他同一名弟兄，各拿一把菜刀，干掉了知县的两名护兵，夺得两支步枪，又拉起 18 个弟兄的队伍，并通过打劫、抄杀，壮大了队伍，打起湘西援鄂军第一路游击支队的旗号。1918 年春，在石门县被编入湘西护法靖国军，先任营长，后任团长。由于年少得志，年轻力壮的他，难免有寻花问柳、男女苟且的传闻。这就是名闻遐迩的“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由来，同时也是林彪和造反派骂他是土匪、“刀客”的原因。

在 1924 年至 1927 年间，贺龙拥护蒋介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和第二十军军长，是北伐军中左派将领之一。1927 年，他倒戈站在共产党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中共起义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转战于湘、鄂、川、黔等地。长征期间，他任中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打破了国民党追堵、围剿。

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任八路军第 120 师师长，为中共保存实力、积极发展做出了贡献。1942 年 6 月，他担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国内战争开始后，贺龙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1949 年 12 月，他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二野，在成都地区歼敌数十万。西南各省“解放”后，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在领导清剿土匪、杀掠式土改和“解放”西藏中，做出了重大贡献。1952 年冬或 1953 年春，未满 18 岁的笔者，在重庆西南军区高干招待所里，曾有幸目睹了贺龙的风采。

1947 年 7 月，在山西兴县，中共用大刀秘密处决了一名“**要犯**”，把砍掉的头颅和尸体扔在一个枯井中。是贺龙下令处决的，体现了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的精神。这个“要犯”是一介文弱书生，他就是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精神的、直言不讳的、敢于大声批评中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级森严的天才作家、翻译家**王实味**。

又据报导，在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时，发现了一个案子。记者写道：“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

（原部下）说：女学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记者还说：“这事当事人还活著。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这个案子再次体现了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的精神。据说，贺在临终前曾**“为滥杀而痛悔”**。

1954 年，贺龙上调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 年底，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同罗瑞卿等领导了国防建设。1964 年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纵观贺龙的一生，可以说赤胆忠心为中共的一生，是中共重要开国元勋之一。然而，他被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的归宿令人心寒：终被“杀人不见血”地困死、药死！林彪摔死后，为了安抚军队将帅，毛泽东把处死贺的责任推给了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声言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毛的所谓“做点自我批评”，竟被精英们赞誉为**“他真诚地做出了自我批评”**。总管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周恩来闻讯后，下令对贺龙专案组提出的“证据”重新审定。重新审定结果**“证明”**：

晏章炎的揭发是**诬告**，李仲公上交的求降“亲笔信”是**伪造**，“二月兵变”**子虚乌有**，是康生的胡编乱弹，成钧中将和雷英夫少将的“供词”是**屈打成招**。正是：

来有形，去无踪，一切都在魔术师的皮囊中！

历史就是这样被中共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来！1974 年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晏章炎也因**诬告**罪被判八年重刑，放过了**伪造**罪的当事人八十多岁奄奄待毙的李仲公。

株连罪在毛泽东时代司空见惯！**最为惨烈的是**，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多年的大将**许光达**，在贺倒毙前六天，以“二月兵变”总参谋长之罪，被专案组严刑拷打致死。**最为冤屈的是**中将**秦基伟**。这位刘伯承、邓小平的部下，从没同贺单独共过事，仅因其妻是贺龙、邓小平领导下的西南军区里的一名干事，贺曾为他们牵过线，因而受审、流放、坐狱长达七年之久。好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叫他当了国防部部长并晋升为上将，算是对七年冤情的补偿。

六、瘐死政治局常委陶铸

陶铸这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 年起，因功勋卓著得宠于毛泽东，开始平步青云：1965 年 1 月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1966 年 5 月，又升任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 5 月，被毛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 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了中共排在毛、林、周后的第四号人物，可谓春风得意，红到极点。然而，刚刚“红”了五个月的他，功败垂成，突然被打倒，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与刘、邓并列的打倒对象。全国上下一致高呼：“打倒刘、邓、陶！”拉出去批斗时，罚站、挨骂、挨打、坐“喷气式”等毛式揪殴，成了他必须面对的“考验”。1967 年 8 月 5 日，是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南海内，红卫兵分别于刘、邓、陶所住的三处院子里，举行的批斗会，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他们的夫人跟着陪斗。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斗陶铸的有 300 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造反派要依“法”斗曾志，被主持人制止，让曾坐在一边。造反派后来得知，当年在井冈山上，曾志与毛妾贺子珍形同姐妹，关照贺生子非常尽心，有恩于毛。此刻，毛知恩报恩，谕示造反派放曾一马。遭受五个多月胰腺癌绝症反复折磨的陶铸，在 1969 年 10 月中旬，被无情地押解出北京，发配到合肥。本可以照顾病危丈夫的曾志，把政治生命看得比夫妻关係更重要，无情地抛弃了夫妻亲情的人伦道义，拒绝跟从随护。四十三天后，即 11 月 30 日，这位中共元老功臣陶铸，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独而痛苦地死于囚禁地安徽合肥，骨灰不知何所。

对于陶铸的倒台的原因，其妻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回忆说，是因为他拒绝了江青要求，在倒刘批邓上态度暧昧，不肯带头发炮，还当面痛斥过江青“干涉得太多了”，导致江青大哭大闹，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1967 年 2 月 10 日，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打倒陶铸问题大发脾气。他骂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然后又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1978 年 12 月，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篇题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文章，悼念她的亡父。她在《信》中写道：“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写道：“您知道女儿是单纯的，我不敢想，可无情的现实却逼得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江青、陈伯达他们要这样从背后捅您一刀？”然而，正是这位“单纯的”小姐，一位当年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10 月初，曾向毛、林状告军校领导镇压群众，直接促成林彪下达了一个“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紧急指示，即 1966 年 10 月 5 日的《关于

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下达后，军事院校乱作一团，院校中许多专家、学者和教职员工，被批斗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在“主旋律”的坚挺下，这篇遭到许多人反对的《信》，还是被教育部定为教材，印在广为传播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上。

看来，打倒陶铸系江青、陈伯达所为是确定无疑了；但看法并非完全一致。

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高文谦，在他的《晚年的周恩来》一书中写道：“**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抛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后已经表态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账，还陶铸一个公道，以免损及中央文革的声名。”

在那个时代，在毛泽东的辞典里，批分“批而保”和“批而倒”，其区别是最终处理不一样：“批而保”，即被批判者不一定要打倒，在认错、拥毛的条件下，还可使用，甚至重用；“批而倒”，则相反，被打倒者必须批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对哪些人“批而保”？对哪些人“批而倒”？毛泽东具有不可争议的决定权！

笔者认为，对陶铸，毛泽东先是“批而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在敲定中共政治局常委排次位时，一句话，把陶从末位提到仅次于周恩来的第四位。她说：“‘老夫子’（陈伯达）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由此，人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到毛对陶钟情之所在：1965 年把陶调到中央，就是毛泽东倒刘批邓的部署之一。但为了警告周恩来，毛泽东却默认了“打倒陶铸”的既成事实。

毛泽东重用陶铸是有道理的。

1950 年，陶铸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尚未进入毛泽东视线。当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后，在领导剿匪反霸斗争中，因取得巨大胜利才崭露头角。在剿匪反霸中，他向毛泽东报告说：“广西剿匪 45 万，杀了 4 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一万三千多冤魂就这样被追认为功劳，陶铸也因而被誉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典型，受到了毛的肯定。

1951 年 11 月，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方方在主管广东省土改中，犯有温情主义的错误，被毛泽东斥责为“土改右倾”和“迷失方向”。“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陶铸，被毛调到广州，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他一

上任，便大批“和平土改”思想，撤换了许多“对地主不够狠”的土改干部，其中 5.2%被判刑或处死。陶铸提出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新方针是：**“对地主要狠”**，即**“村村见血，户户斗争”**！不能让地主交出（包括主动交出）土地和财产，就算完事；要发动贫僱农，**追忆**地主剝削之苦，**控诉**地主压迫之恶，**打斗**地主之身，内部规定，每村至少**杀一个地主**“以立政威”，借以**提高**贫僱农紧跟共产党的政治觉悟。于是，杀地主定额秘密分配到县、乡一级，杀人审批权限也下放到县、乡一级。由于档案尘封，人们不知道广东省土改中枪杀的具体人数，但据知情者披露(待核实)，每县处死地主约两、三千人，全省处死约为 20～30 万人(含自杀)。又据《带刺的红玫瑰》一书透露，1953 年春季，广东粤西地区在土改中，有 1,165 人自杀,其中 2 月 3 日到 3 月 6 日，自杀者高达 805 人。由于功大不可抹，1955 年，陶铸被毛提拔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1956 年 9 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到了 1957 年，中共功臣陶铸在反右中又大显身手。5 月 19 日，他学着毛泽东也对知识分子玩了个**“引蛇出洞”**：他亲自到中山大学发动师生给共产党提意见，鼓励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和**詹安泰**、政治经济教授**林楚君**积极提。结果，这三个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统统被打成右派。据统计，广东省共划右派分子 36,610 名。其中，全省 8,076 人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 1,623 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广东反右斗争的胜利，使成百上千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于反右有功，陶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毛主席的好学生”陶铸，紧跟导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广东的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三四千斤以至一万斤;他以亩产数千到数万斤的“高产卫星”为根据，尖锐地批驳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的**“荒谬”**，嘲笑了他们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贫乏”**。据此驳论，他提出了**“三餐干饭不要钱”**的著名口号，叫响全国。他的文章和口号，对于当时处在“瓜菜代”饥肠辘辘中挣扎的广大农民来说，是张美丽馋眼而无法填肚的图脯和画饼；但他却在广大农民敢怒不敢言中，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一颗耀眼明星！在“三餐干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口号下，全省有 65.7 万人在图脯吞咽中倒毙，在画饼充饥中饿亡，这些在曹树基所写的《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 万）及其成因》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证。如果不是广东得天独厚，有数以十万计的华侨通过港澳接济，饿殍将超过百万。由于饿死人数相对较少，名列全国第 14 位，这个政绩，又被记在陶铸的“功劳薄”里！

面对“三面红旗”造成的可怕恶果，陶铸也许良心再现，有所反思。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对彭德怀敢于**“我为人民鼓与呼”**的万言上书，

曾表示过支持，差一点为此付出代价。但当毛泽东率众批斗彭时，在中共伦理共识作用下，他摇身一变，坚定不移地站在毛的一边，对彭大加鞭挞，痛斥彭德怀的**“《意见书》不过是公开放的箭，在背后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庐山会议后，全国饥馑迅速扩大，陶“功”不可抹。此时的陶铸，已经是说一不二的“封疆大吏”，被人称之为**“南霸天”**!

上调中央后，特别是在“横扫”、破“四旧”和支持红卫兵**批、斗、揪、打、砸、抢、驱、游、抄、烧、杀**中，在批刘、邓和批“彭罗陆杨”中，陶铸紧跟导师的部署，赤膊上阵，“刺刀见红”；他积极参与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中，他主持起草了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历次讲话稿，等等。由此可见，他在支持和推动文化大革命中，功勋卓著，理所当然地飞黄腾达，从一个普通中央委员，一跃成为地位仅次于周恩来的党国第四把手。然而，好景不长，在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他同周恩来一样，不自觉地维护了一些右派高干，特别在上海夺权风暴中，同情和支持老朋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偏离了导师的教诲。1967 年 1 月 8 日，他在被他的导师斥为**“很不老实”**后而惨遭大难。他同周恩来一样，对“阶级敌人”立场坚定，从不手软，而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却是佛心高照，总是心慈手软，关爱有加；可惜手段玩得不如周恩来高明，最终促成他对毛晚节不保，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对待中共功臣是关爱有加的，只要不威胁他的权力；毛泽东对待犯错误的功臣，也能网开一面，只要你能低头认错，紧紧地跟着他。在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毛泽东见陶铸同周恩来一样同情和支持一些老朋友，偏离了他批斗“走资派”的大方向，自然非常恼火，在高层中说了些**“很不老实”**和**“打倒”**的气话，也借以敲打一下周恩来，其内心深处还没有准备打倒陶铸。不料，早想扳倒陶铸的江青听了后，如获至宝，便伙同陈伯达、康生等人，把“打倒陶铸”捅了出去。对此，毛泽东自然生气，在常委会上怒斥江青、陈伯达也在情理之中，并非像有人分析的那样是“逢场作戏”。而从“批而保”到“批而倒”，诚如高文谦所说，是毛泽东对既成事实的不得已认可。

由此看来，尽管**曾志**的回忆有谄媚邓小平之嫌，但她和她的女儿把陶铸悲剧直接归罪于江、陈是有道理的。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她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腌渍中执迷不悟，而那种无法摆脱的根深蒂固的顽钝和偏见，使她们无法承认发生这种悲剧的根源。当陶斯亮顿足锤胸、大声哭喊**“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时，那些在陶铸铁腕统治下的数十万冤魂的在天之灵，听了陶女的哭嚎，会有何感受？也许有人认为：他们会幸灾乐祸，大骂陶铸死有余辜。不！那是官方和上

层精英们的思维模式；恰恰相反，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听到陶女的哭嚎，也会痛心疾首、落下同情的泪珠。因为，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血腥镇压的洗礼，他们都已懂得了真、善、美华夏文明和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之可贵，多年洗脑所形成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酷虐观，在另一个世界里，人类兽性一面的仇杀、冷酷、淡漠和冥顽等恶疾，都被恢恢天道自动洗涤干净，变成了天使具有的恻隐、宽容、仁爱和理智等**天理之心**！他们对良心再现者如是，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不例外——这一切都是陶斯亮母女和官员们无法或不愿理解的。

七、拖死国家主席刘少奇

1966 年 12 月 25 日，北京红卫兵“三司”，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了“彻底打倒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凌晨，约 5,000 名红卫兵的人流，迅急地涌到这里，几辆安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上，插满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旗帜。在红卫兵和数万围观者的仰视中，一个头着军帽、身披军大衣、眼戴近视镜、仪表文质彬彬的青年人，即席发表演讲。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口若悬河的他，以其极富煽动性的语音，激起台下阵阵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声。突然，高音喇叭中传出他声嘶力竭地呼号：

“打倒刘少奇！”

这是全国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地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蒯大富吃豹子胆了？事后人们知道，这是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根据毛泽东发出的**“要公开批判刘少奇”**的“最高指示”所导演出来的大作。于是，全国各地红卫兵们，纷纷学步北京，开始组织游行示威，亦步亦趋地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

刘少奇曾说过：**“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听命于中央文革一心上爬的蒯大富等人，接过“拍马好”论，把枪口对准了“拍马好”论的发明者。这是历史的幽默？抑或历史的嘲讽？

原来，1966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代表毛泽东做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支持。这篇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激烈指责他们所代表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公然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路线。然而，在几天后的 24 日会上，毛泽东却对刘、邓“网开一面”。他郑重地说：**“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在 25 日会上，他又说：**“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这种“打

一把，拉一把”的权术，被御用精英们捧为“领导艺术”!

应该承认，毛“**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的理由是充足的。远的不说，从“解放”后开始，1950 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三年多，接着便是 1950～1951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1952 年的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4 年的批高岗、斗饶漱石和批俞平伯、斗胡风运动，1955 年的肃反运动，1957 年的反右运动，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拔“白旗”运动，1959 年的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运动，1960 年的反后进运动，1963～1966 年的“四清”运动，等等，制造了数百万件冤假错案，导致数千万人惨死，数百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千万人被打、抓、管、关和发配，无辜受株连一个多亿。从 1949 年到 1966 年的十七年间，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仁义理智信和真、善、美的中华大地，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假恶丑横行天下，批斗杀甚嚣尘上，从而为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的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这场悲剧的主帅，而刘少奇则是其头号帮凶。

毛对刘、邓“网开一面”的恩惠，一个多月中刘、邓竟无任何表示。长期在毛泽东手下工作的刘、邓，对毛的权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熟悉毛泽东的“**二皮脸**”，一张是“佛”脸，一张是“魔”面，在“**理无常是**”的“一分为二”理论支配下，两张脸变来变去，交互使用，其“精神实质”难以琢磨。因此，他们对毛的“恩惠”采取观望态度。但这在毛泽东看来，分明是大逆不道，分明是负隅顽抗，其“无产阶级震怒”可想而知。不用命令，善于察言观色的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康生、戚本禹等人，便洞悉到“伟大领袖”的“精神实质”。

12 月 18 日，在周、江的支持下，**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司令**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向他布置了中央文革小组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计划。12 月 24 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按计划扇风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 月 26 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按计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12 月 27 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根据中央文革的布置，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报告。

红卫兵被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按计划煽动起来。到 25 日，按计划由蒯大富带头，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喊遍全国。

毛泽东迅速表达了对红卫兵们的支持。12 月 28 日他说：“**现在看起来，对刘少奇问题不能象过去那样内外有别了，现在不公开批判不行了，要公开批判**。”这样，毛泽东用天才的“阳谋”，完成了他“走群众路线”的杰

作！

期间，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动员她“要与家庭划清界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在中共伦理共识文化熏陶下的刘涛，为了自保，果然出卖生父，贴出了《**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也来了个落井下石！

1967 年 1 月 1 日清晨 6 点钟，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进来者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涂写了两条大字标语：“**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

1967 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 月 3 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姚文元在文的一条注释中明确写道：“**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大人物”指的是刘少奇。这是中共官方喉舌报刊，第一次公开用不点名的点名方式攻击刘少奇。

1 月 3 日傍晚，中南海造反派出动二三十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到走廊门口批斗达 40 分钟之久，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1 月 6 日傍晚，北京“三司”，成功地上演了“智擒王光美”闹剧。(详见第 09 章)

1 月 8 日，周恩来紧跟毛泽东，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在京革命造反派的讲话时，他振臂高呼：“**我们要彻底批判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垮！**”

为了显示伟人的宽大胸怀，1 月 13 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一见面，毛泽东满面春风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苦笑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聪明一世的刘少奇，竟然以为毛不知这个骗局！

据报导，这次会见，毛泽东态度和蔼，姿态高雅。刘少奇则不识时务地、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

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独生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这一番话，使毛泽东犹遭五雷贯顶。他强压怒火，不停地大口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阵子，火压了下去，终于开口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专门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前，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从书名可以看出，毛要刘少奇不要太“机械”，太死板，要刘向他低头认错。

由于刘少奇没有低头认错，遂被毛推定为死不悔改，批斗迅即升级。

1 月 18 日，即毛找刘谈话后的第 5 天，中南海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刘少奇办公室，二话不说，将电话线扯断，撤了刘的电话。

3 月 3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 年第 5 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之前的 2 月 23 日，毛泽东在对此文作些修改后批示道：**“看过，写得很好**。”

戚本禹在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文章在揭露和批判刘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和刘说要当“红色买办”之后，用匕首直刺刘少奇的心窝：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 1962 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这篇经毛泽东修改和首肯的文章，从政治上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悲愤之极的刘少奇，把刊有这篇文章的《红旗》往桌上一摔，愤怒地说：**“假话！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这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说着说着，“哇”地一声，一股鲜血夺腔喷出……退一万步论，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就是“彻底的卖国主义”吗？就是反革命吗？这是什么逻辑？当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之时，造谣、诽谤、栽赃和诬陷，便成了马列毛革命者的必然选择，因而横行无阻。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对付对手的伎俩，刘少奇过去也曾多次使用过；令人哀叹的是，当别人又用这种伎俩对付他时，竟忿怒得口吐鲜血。可怜呀可悲！

反“二月逆流”后，党内右派溃不成军，实权完全操纵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手里。一些高层领导，倒的倒，垮的垮，人人自危，谁也不敢站出来为刘少奇开脱。然而，一个党外人士、曾当过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章士钊**，自恃年高且曾有恩于毛，其养女**章含之**做为英语教师，又零距离服务于毛，毅然致信毛泽东替刘少奇讲情，却成了墙倒众人推中唯一侠义之举。章在信中说：

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不要打倒。

见信后，毛泽东当即回信如下：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3 月 10 日

随信附去的是当时中央所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罪状的材料。章士钊读了这些材料之后，仰天长叹，对养女章含之说，毛已“**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

4 月 10 日，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批准，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揪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高级干部做陪斗。

接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遭批判。1967 年 5 月 8 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而早在 1962 年 8 月，曾赞扬过《修养》又面谕康生要刘少奇尽快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毛泽东，此时却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在赞扬这篇批《修养》文章的同时，还在文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1967 年 5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号召全党批《修养》!

7 月 9 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发起了“揪刘行动”。在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这就是名震全国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1967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去武汉。他前脚走，批斗刘少奇“大火”，便在北京中南海内外燃烧起来。毫无疑问，江青领了“圣旨”。

中央文革向北京各路红卫兵下达了批斗刘少奇的命令。7 月 17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首先发出了《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勒令刘少奇于 7 月 22 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图 14-4：刘少奇做梦也没想到……

7 月 18 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年近七十的刘少奇，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多小时。对此，曾亲临现场的人回忆道：**“刘少奇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斗他们的人。许多是秘书局的干部。（图 14-4）

1967 年 8 月 5 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配发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召开了 300 万

人的誓师大会，声讨刘、邓、陶。而在同一天，大会后的中南海内，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批斗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肆意谩骂和野蛮扭打。他的每一次辩解，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打断，他的每一次张口，都招来一本本语录本劈打，**打得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办公室。

经过残酷批斗的刘少奇，似乎有所醒悟。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拿出事前准备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正如章士钊所言，毛已“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无论他如何辩白或抗议，都没有用了。在中南海的小规模斗争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毛主席语录》本敲打他的嘴和脸，喝令“不准放毒!”刘少奇的嘴也就从此闭上，再也没有作任何辩解和抗议。

刘少奇同其他挨批、挨斗、挨打的官员一样，到了无法忍受迫害时，才想起了《宪法》。在“一化三改造”中，在“反右”中，在“肃反”中，在大跃进和反彭德怀中，在“四清”中，甚至在文革初期的“横扫”、破“四旧”和“红八月”里对无辜者的抄、打、屠杀中，面对无数人挨批、挨斗、挨打、挨罚、自杀、枪杀，面对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试问国家主席刘少奇：你什么时候想到过《宪法》？你什么时候用《宪法》来约束过自己侵犯人权的行径？你什么时候用《宪法》来规劝过毛泽东独断和暴虐？当然，人们不会忘记，你对“三面红旗”罪孽的良心反思，大胆地指责其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们也不会忘记，你策略而谨慎地采取“三自一包”等修正主义补救措施，缓解了毛泽东一意孤行给广大农民带去的饥馑和灾难!

从集体遗忘《宪法》到受害时才想起《宪法》，是一个令中国每个人都要认真反思的沉重话题。可惜，这种反思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没真正实现，许多人还在幽梦中酣睡!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一张废纸时，迫害刘少奇的行动紧锣密鼓地逐步升级。

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为代表的帽子不足以定罪，也不能令人信服，寻觅其他罪行便成了毛左派的当务之急。机会终于出现，东北有人揭发刘少奇曾被捕叛变过。1967 年 6 月 3 日，以周恩来挂帅、江青、谢富治、戚本禹等人负责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迅速成立。

据报导，为了查找刘的叛变罪行，专案组在东北三省查阅了 245 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却一无所获。面对这种状况，专案组并不死心。他们把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名单、奉天军警宪特名单和奉天钞厂职工名单，编印成花名册，分发到东北三省各市、县、街道和农村，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并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他们找到了十多个证人。接着，他们展开了对证人的攻心战：在四个证人自杀未遂的情况下，依靠诱供、逼供和酷刑等刑讯手段，最终找到了几条刘少奇叛变的“根据”，终于完成了毛、周、江等中央领导交给的重大政治任务。

为了证明王光美是美国战略特务，周、江领导下的专案组，批准逮捕了几个有关证人。其中，一个证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另一个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两个教授均为重病在身的老人，又都在狱中的反复提审中审毙。据叶永烈在《江青传》中披露，1967 年 11 月 9 日，在江青等人圈阅的专案组审毙张重一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因张犯（笔者：张重一）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又据披露，在张重一咽气前的最后一次审讯中，审讯录音带录下了审问者和张重一临终前的对白：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张：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话没说完，张气绝身亡。）

“审毙报告”和“临终对白”，使人们看到了毛式无产阶级专政的野蛮和邪恶。

1968 年 9 月 16 日，刘少奇专案组（此前，刘、王专案组已分开）终于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共中央。**江青**大笔一挥，在《审查报告》上写下这么一段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周恩来**批示说：**“此人该杀**。”9 月 29 日，**林彪**在《审查报告》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专案组建议对刘处以极刑，但毛泽东不同意判刘死刑，却默认其他处置方法。

10 月 13 日至 31 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会上只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一人反对，成了一百多个中央委员中的唯一另类。

对于这段历史，著名传记作家是这样描述的：

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什么叫**“极不正常的情况”**呢？作者迴避了。据报导：第八届中央委员 97 名，候补中央委员 73 名，合计 170 人；其中，被毛、林、周和中央文革等认定为“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等罪名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高达 121 人，占总数的 71.2%，他们都被剝夺了参加全会的资格；在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 10 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 40 人，仅占中央委员人数的 41.2%；为了凑够党章“规定”的半数以上之数，便“依规”从候补委员中晋级 10 人，使中央委员人数过半，达到了 50 人；与会的中央候补委员 19 人，仅占应与会人数的 26%，除 10 人晋为中央委员外，剩下 9 人与会。又据报导：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成员共 133 人，其中正式成员 59 人，占参加会议总人数的 44.4%，而由毛泽东指定与会的非正式成员，

高达 74 人，占参加会议总人数的 55.6%。据此有人推定，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个非法的全会。在这个“非法的全会”上，中共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双开除了。

此外，著名传记作家在“**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一段话中，有意迴避了专案组总负责人**周恩来**的大名。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的时机，选定在 1968 年 11 月 24 日，即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一天。这是一种“**致刘少奇于死地**”精神摧残。果然，听罢决议，刘少奇高烧 40 度！

1969 年 10 月 17 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在重病之中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披着盈尺白发，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被武装押送到河南开封囚禁。又有报导说：“**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

到了开封，刘少奇陷于持续高烧之中。对此，《文革十年史》一书中这样描写：“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图 14-5： 左：刘少奇在人大会上做《宪法》修改报告　　中：刘少奇死于囚室
右：火葬申请单

又据《**刘少奇最后 27 天的<监护日记>**》一文披露：

在**北京特派员**的严密监控下，在缺医、少药最后断药的着意安排下，在没咽气的前几天已经做好了火化准备的情况下，刘少奇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了难以名状折磨和摧残。这位钦定不判死刑的国家主席，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毛泽东默许下，在没有一个亲属在场的情况下，被**拖死在开封囚室里**。火化时，根据北京特派员的事先安排，执行者在火葬申请单“死人姓名”一栏里，将刘少奇名字改称为“**刘卫黄**”，而在“申请人”一栏里，又冒充刘少奇小儿子刘源，填上了“刘原”两字：执行者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共官方设计的“历史”纪录！(图 14-5)

当接到刘少奇死亡报告后，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自作孽，不得活！”**

历史记录了这样一组数字：株连刘案或为刘鸣不平而被逮捕法办的有28,000多人；被批、斗、开除党籍和撤职下放的达十万人以上；令人遗憾的是，因刘案被处决的人数不详。笔者不得不拾遗补阙：仅在本书第18章“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血案中，记录了因同情、支持刘少奇、高呼**“刘主席万岁”**的福建农民，有21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12人被逼自杀身亡，8人被打伤致死，还有为数不详的“犯人”妻子、母亲，被逼自杀身亡；在第19章“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中，记录了陆兰秀、王申酉、史云峰、李九莲等四人，因替刘鸣不平而惨遭处决的经过。

对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惨死，有人在《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中写道：**“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但笔者认为，中国人应为这种悲剧默哀！

笔者还认为，中国人应当从刘少奇的悲剧中看到：他的“反动路线”是他曾一度对冷酷无情的毛泽东思想做过微不足道的**民主化反思**；他的“修正主义”是他曾一度对残忍暴虐的无产阶级专政做过无足轻重的**人性化修剪**。因此，中国人应当记住：刘少奇的这些“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曾给苦难中的人民带来过短暂生机；尽管他不可能会立地成佛！

八、重伤囚死彭德怀元帅

1966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默示，**江青**打电话给在成都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头头**王大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戚本禹**听后心领神会，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另一个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韩爱晶**，对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12月27日晚，北京红卫兵，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共同将彭德怀押解到北京，囚于北京卫戍区某部。

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文革四十年祭**》文中写道：

（1967 年）7 月 11 日，北京市 50 多所高等院校师生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动员开展大批判、大揭发。江青几次对红卫兵说：“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啊！”

12 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造反派头头会议，戚本禹对韩爱晶等人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对他客气。”

18 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彭德怀是个军阀，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要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

19 日酷热的中午，彭德怀刚吃完有人塞给他的一个玉米饼，就被拉进吉普车，押到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几十个红卫兵。

红卫兵厉声地要彭德怀交代问题！

“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彭德怀昂着头态度温和地说：“我几十年来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

韩爱晶扑上来，一拳打在彭德怀的下巴上，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群红卫兵跟着围了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一连七次，把这个年近 70 的老人，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个穿皮鞋的坏家伙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彭德怀被人拉起来时，他头上淌着血，站不住。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起来。

这次批斗会上，彭德怀受了重伤。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内伤，彭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

同其他体制内作家一样，在批斗彭德怀问题上，纪希晨有意回避了决策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在 1967 年，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简略介绍了他被关押的经过，希望毛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并说：**“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毛阅后，“拿起一支黑铅笔，迅速在**信上画了一个不规整的圈**，没有任何批语。”显然，那“一个不规整的圈”，放出了可以任意批斗彭德怀的信号。

7 月 26 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万人大会”。身负重伤的彭德怀又被拉去批斗，张闻天也被拉去“陪斗”(图 14-6)。会上对年近七十的老人彭德怀、张闻天大搞“喷气式”。会后，红卫兵又把重伤的彭德怀押上卡车进行游斗。游斗中，彭被迫弯着腰，两个人揪着他的耳朵，一个人托着他的头，另有人时不时对

他拳打脚踢。游斗是从北京航空学院开始，经新街口到天安门，由于游斗距離过长，致使彭德怀伤势恶化，昏倒在车上，红卫兵不得不把他从汽车上抬下来，送回“特监”。



图 14-6：批斗身负重伤的彭德怀——彭德怀元帅戎装像(左 1)　台上批斗(左 2)　揪斗(左 3)　张闻天陪斗(左 4)

没有毛泽东的默示，江、康、陈、戚、韩等人，敢对开国元帅大打出手吗？没有毛泽东那个“不规整的圈”，处在第一线代表毛泽东指挥文革的周恩来，能对昔日患难与共的战友无动于衷吗？更为恶劣的是，在那“一个不规整的圈”的信号传播下，与彭有积怨的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借机把便纸篓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亲手把彭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恶狠狠地骂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

毛、彭怨恨由来已久。在 1959 年 4 月庐山会议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曾强压怒火，对亲信们脱口说出了心存已久无法疏解的愤懑：“**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给毛泽东提供了整肃异己的机会。在毛看来，彭的“万言书”，就是向他下的“战书”，不应非君子也！于是，他率众罢了彭的官，并把彭逐出中央决策层。(详见“序幕”图注 19：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整肃彭德怀的表面理由是彭反对“三面红旗”，但其深层原由则是**两人积微成著**的怨恨。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同彭德怀三十一年芥蒂关系：“**是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成融洽，七成搞不来**。”

那“搞不来”的“七成”是什么呢？

其一. 彭德怀翦除王佐、袁文才土匪武装，获罪于毛泽东。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能站稳脚根，得力于王佐、袁文才两支土匪武装的包容，而毛的“秘书”兼妻子贺子珍，是袁的部下，又

是袁促成其美，因而同王、袁两人情同手足；但土匪武装为共产国际所不容。中共在前苏联莫斯科兹维尼果罗德镇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对土匪武装作出了决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亦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均应当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时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应完全歼除。**”由于毛同王、袁情深意厚，气味相投，对六大决议深不以为然，在红四军前委讨论六大决议时，毛把处置土匪的条款删掉了，有意保护王、袁两人。但王、袁后来还是看到了原文，遂生叛意。

为了翦除王、袁，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联合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于 1930 年 2 月 23 日,将王、袁骗到永新县城中。次日凌晨，朱昌偕将袁文才击毙在床上，王佐闻讯逃跑时，被彭德怀的红五军枪杀于城东冬瓜潭中。

毛泽东在赣南闻听王、袁被杀的消息后，愤而生怨，怒而生恨。机会来了，特委书记朱昌偕在当年年底，被打成“ＡＢ团”成员，遂遭“错”杀，抚慰了王、袁幽灵！五十年代初，毛将王、袁追任为烈士，又接见了他们的遗孀，算对情谊做出了补偿。由于种种原因，毛放过了彭德怀。

其二. 彭德怀对打“AB 团”有所反省，使毛不快。

1930 年 2 月，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主持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上，发出了捕杀“ＡＢ团”号令。

从 1930 年 5 月起，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开始了“反 AB 团的斗争”。11～12 月中旬，毛泽东在他直接率领的一方面军内，迅速发动了“快速整军”运动，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处决了 4,400 多名“ＡＢ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毛泽东在一方面军内开展的捕杀运动，为中共苏区党、政、军内的肃反，做出了榜样。

与军内捕杀的同时，12 月 3 日，毛泽东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向中共苏区地方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江西省行委发出一封《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信中说：“**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信中指名道姓说省行委**李白芳**等几名常委是“AB 团”分子，而且要求“**对红二十军内也必须找得‘AB 团’分子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他在另一封致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的信中命令道：“**党内地主富农成份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来**。”——这是二十年后的土改和三十

五年后的文革大规模捕杀“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先声！

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接信后，在他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的主持、审讯下，几天中用残酷的肉刑进行“逼供信”，即“**抓起来就逼，一逼就供，一供便信，一信便杀**”的审讯办法，先后把120多个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把读过几年书的小知识分子和其他异己分子，打成“AB团”分子，杀害了其中的41人。据知情人回忆：“**李韶九在十二月七号到了富田，当晚就开始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你，叫你长久地痛。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又据一位受害者事后控诉，李、曾“**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李、曾的滥杀引发了红二十军兵变：12月12日，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发动兵谏，逮捕了军长刘铁超，李、曾逃脱，释放了全部被关压的“AB团”分子，高呼“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事变迅即被已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毛泽东定性为“AB团”分子“叛乱”，尽管事变后，刘敌派人给中共中央送去200斤黄金，并请求处分。

1931年4月18日，当刘敌按约来到宁都县青圩村中央局“解决纠纷”时，迅被毛泽东捕杀。接着，毛又指令彭德怀、林彪处决了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以下、副排级以上军官近800人。接着，毛泽东便在全苏区展开了肃“AB团”分子运动。

据报导：在肃“AB团”运动中，先后处决了一万多（另一说七万多）“AB团”分子、“改组派”和数千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肃“AB团”运动虽没有正式平反，但六十年后的1991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里，明确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在肃“AB团”问题上，毛、彭“搞不来”发于1945年1月。当毛泽东“征求意见”时，彭德怀竟毫不客气批评道：“‘**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面对彭德怀的反省，毛泽东愀然变色，极为不满。

肃“AB团”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者是毛泽东，但“主旋律”的史学家们，却把罪责算到王明等人头上。由此可见，在“主旋律”面前，**历史是个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

其三. 在毛泽东落寞中，彭德怀有落井下石之嫌。

193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受到了多方指责：批评他“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保守”、“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和“单纯防御路线”等等。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担任。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挑战中，毛窥见到彭的不逊身影。

1932 年 6 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共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围剿的矛头首先指向兵力较弱的鄂豫皖与湘鄂西两个苏区。为了配合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敦促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快速北进，威胁南昌。但为了保存实力，总政委毛泽东等人，命令红一方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毛的按兵不动，特别是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失利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迁怒于毛泽东。10 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违抗中央命令和肃反扩大化等错误，受到了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中央局负责人的指责。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权力长达两年多，是他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日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成了“千古一帝”的毛泽东，提起“宁都会议”，那忿忿不平的心情难以自制。而此时，谨小慎微的周恩来不得不经常检讨，说“宁都会议”是他**“一生中最大错误和罪恶”**，乞求毛高抬贵手。彭德怀呢？在当年这场周胜毛败的角力中，他荣升任军委副主席兼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因此，生性耿直、孤傲又不愿请“罪”的彭德怀，能逃落井下石的嫌疑吗？

其四. 毛泽东疑林彪要他让权的信系彭德怀所为。

1935 年 3 月 10 日三渡赤水前，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会议讨论。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打，但毛泽东坚持不打。张闻天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打的决定，并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取代毛泽东去指挥作战。但到第二天，应毛泽东的要求，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多数人，改变了张闻天打打鼓新场和彭德怀取代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的决定，组成了以周恩来为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团”，负责指挥作战。在毛泽东看来，在打不打打鼓新场问题上，不是胜算多少的分歧，而是张、彭勾结要夺他的兵权。

四渡赤水后，中共高层又出现了严重分歧。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为了摆脱敌人，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他回忆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吗？”**

1935 年 5 月 11 日，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后，利用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他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随后，林彪直接给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写了一封长信。据聂荣臻回忆：林彪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要朱、毛下台，让权给彭德怀。

为了整合分歧，1935 年 5 月 12 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举行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他还指责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遂将夺他兵权的企图，推到了彭的身上。

对彭德怀“鼓动”夺权之事，毛泽东耿耿于怀。据彭德怀回忆，从 1935 年到 1959 年，毛泽东曾四次提起此事。他说：**“在这 24 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彭的担心不幸言中。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矛头直指彭德怀。令彭意外的是，紧跟毛的林彪，在会上立即声明，说他写的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时彭不知道。**”对林彪的声明，彭十分感激；但为时已晚，怨恨已有结果：毛泽东彻底打倒彭德怀的决心正在付诸实施中。

其五. 彭德怀反对毛泽东消极抗日的卖国思想。

彭德怀亲自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是中共整个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上规模的抗日战争。然而，这次真正的抗日战役，却受到中共和毛泽东的无理责难，引发了“骂娘四十天”的冲突，成了彭德怀的“罪证”之一！（详见“序幕”图注 05“抗日战争”图注 06“百团大战”。）文化大革命中，精英们在声讨彭德怀的“滔天罪行”时著文说：**“一九四〇年八月，彭德怀背着毛主席伙同朱德擅自搞了个‘百团大战’。战役进行了三个月二十五天，暴露了我军主力，使日寇攻打蒋介石的军队来进攻我军，保护了蒋介石，使我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这种无耻的消极抗日的自我保护主义，至今仍有很大市场。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纪念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显然，当年中共和毛泽东为保存实力而对“百团大战”的谴责，并不影响中共做出中共是“中流砥柱”的结论！这就是中共领袖和上层精英们的历史观！

其六.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彭德怀不情愿地发动了第五次战役。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当中朝军攻到三七线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引发高层激烈争吵。金日成和苏驻朝大使兼北朝鲜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认为，志愿军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联合国军赶下大海。他们毫不客气地批评彭德怀右倾，并把“状”告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处。

连续三次战役使彭德怀意识到，今天的对手不是当年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毛泽东的消灭美军一个整师和速战速决的方针不现实。他清楚，在第四次战役反击时，中国曾以五个师的绝对优势，包围了美 2 师 23 团的阵地，力图歼灭一个整团。但攻击几天后，除阵亡两千多人外，一无所获。最使他痛心的是，由于没有空军掩护，一次在大江南岸，因接不到撤退命令，四个军的 6 万多志愿军，大部分死于炮火和轰炸之中！因此，他认为，必须改变消灭整师和速战速决的方针，为此，他必须说服最高统帅。（见“序幕”图注 09:抗美援朝战争）

1951 年 2 月 21 日，彭德怀夜飞北京，赶到毛住地新六所，排闼直入，唤醒酣睡中的毛泽东，力陈兵员不足、后勤保障困难等问题，并晓之以速胜的危险性。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修改了他的战略，敕令彭德怀：“**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了彭德怀，但却下令彭德怀组织第五次战役，把联军赶到三七线上。彭德怀不得不按照毛的旨意发动了损失惨重的被西方媒体称为“绞肉机”的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的失利，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彭的右倾情绪错失“战机”，特别对 180 师全军覆没，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其七. 毛、彭个人品质的某些方面相形冰炭。

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共党的指导思想。“解放”后，毛的威望如日中天。1949 年 10 月 1 日，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朱总司令万岁”两个口号。由于这两个口号散发着浓厚的封建臭气，与中共“人民当家做主”的理论格格不入，因此，在设计 1950 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时，宣传部门没有把这两个口号收录其中。但在审定口号时，矜而持之的毛泽东，大笔一挥，添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口号。自此，“毛主席万岁”口号以中央文件形式固定了下来，自动成了各级领导人和群众必须高呼的口号，一直呼唤了 27 个春秋；而“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则在一年后逐渐销声匿迹。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更不靠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共产党的《国际歌》歌词。《国际歌》的词曲，是《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战斗精神的强烈张扬。然而在中国，领袖毛泽东却被赞誉为“人民的大救星”，其颂歌《东方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二十一世纪！这种理论和实际的背离，是中共赤文化的又一大特色。在大唱《东方红》中，总理周恩来的“功”不可抹。为了争取毛宽恕“宁都会议”之罪，他配合“学雷锋”、“学大庆”、“学解放军”等造神运动，在 1964 年 9 月，亲自导演了有 3,500 多名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了古今中外少有的歌舞鸿篇巨著。直到 2008 年，这部“史诗”还在公演。这对于**“须要点个人崇拜”**的毛泽东来说，难掩内心之欢愉！

从延安时代起，中共首脑们就有组织舞会跳舞的习惯。据说战争年代也没间断过。“建国”后，每星期六晚成了例行舞会时间。到了星期六晚上，首脑大员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舞厅，由各军种总部派出的女文工团员们陪舞。许多年轻的文工团员，以能陪毛主席跳舞为荣。有时夜半，她们中有人还会有幸被召入“伟大领袖”下榻“促谈”。

对毛泽东这些习性，彭德怀很反感。据传，大员们见毛泽东时，除朱德常称“润芝”外，其他都喊“主席”，唯独彭称其为“老毛”。这显然是对毛尊严之不敬。平时，彭不加掩饰地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反对唱“东方红”，这些在庐山会议上都被揭发了出来。这显然是对毛最高权力的蔑视。毛对于彭德怀这种孤高自傲的德行，常强压怒火忍受；最不能容忍但又无法拿到台面上去的是，彭对他好色隐私的攻击！

彭德怀是中共不涎女色的少数大员之一。在女色方面，他对属下要求更严。

1953 年夏天，他在视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闲暇之余想看看松花江。在院长陈赓和院政治部副主任张衍的陪同下，来到松花江边。夏季松花江江水浩大，年轻人们在堤下游泳、玩水，传来阵阵嘻嘻哈哈的打闹声。彭德怀突然问：“江水这么急，淹死过人没有？”张衍不经意脱口而说：“听说每年都有人淹死，我们学院最近就淹死了一个女护士。”彭德怀认真地问道：“为什么淹死了？”张衍说：“她是我们医院里的一个女护士。有个干部追求她，姑娘不愿意，可顶头上司又出面‘劝’她，姑娘心眼小，一时想不开，晚上跑上江堤投了江。” 彭德怀听了眉毛一拧说：“自杀？”然后大声问道：**“你们怎么处理**？”见部长变色，张衍赶快煞车：“我们正在调查处理！”彭德怀怒道：**“有什么好调查的？把那几个干部统统开除党籍**！”说罢，不看松花江了，转身对陈赓说：“回学院！”

1956 年，为了防止军官借舞会搞不正当男女关係，他下令军以下机关不准跳舞。彭的这种生硬、粗暴的领导方式，得罪了不少将领和高级军官。1957 年，笔者曾在任教的高级工程兵学校目睹了一场为跳舞问题引起的分争：最后，校政委以“下级服从上级”为由，“说服”了校政治部主任——下令不准跳舞。笔者从此告别了舞场。

彭德怀的悲剧在于，他对下级如何严厉都不要紧，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矛头对准最高领袖：当听说毛泽东夜召女文工团员到下榻“促谈”时，他一怒之下，撤销了由年轻貌美女孩子组成的总政中南海文工队建制，没给毛泽东留一点面子。他还毫无顾忌地批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总政治部主任箫华，斥责他们经常挑选漂亮女孩子往中南海里送是“选妃子”。当“选妃子”一说传入中南海后，毛泽东有什么反映？人们不得而知；但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便把彭德怀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里通外国”的罪犯，便可窥见到“选妃子”一说的严重性。

八年前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挟中共中央大员罢黜了彭德怀的官，应该说已解除了毛的心头之恨，但为什么到 1967 年又把这只“死老虎”拉出来当“活老虎”来打呢？——“痛打落水狗”，毛泽东怨恨之深之至矣！正是：

量大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彭德怀这位在中共高级大员中少有的比较耿正、较有良心的元帅，**为指挥为**毛泽东所反对的真正抗日的百团大战，**为批评为**毛泽东所发动的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祸国殃民政策，**为反对为**毛泽东所怂恿大唱《东方红》的个人崇拜，**为责难为**毛泽东所笑纳的“选妃子”、输送女孩子的卑劣行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长达 8 年的囚禁中，彭德怀备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终因年老体弱，不胜其虐，郁郁成癌，于 1974 年 11 月 29 日 15 时 35 分，心脏停止了跳动，是年 76 岁。

九、抓叛徒和叛徒集团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但反对《十六条》的中央委员不在少数，多数人同情和支持刘、邓，思想上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对此，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决定利用红卫兵打、砸、抢、烧、杀的法西斯无畏精神，去摧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内右派官僚的反抗。于是，从 8 月 18 日开始，历时三个多月，他先后八次“接见”了 1,200 多万红卫兵，把北京红卫兵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屠杀“地富反坏右”以及

毛式揪殴法的经验，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但形势的发展却应了他常说的一句话：**“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按照这句话的逻辑，形势已向失控方向发展：在右派官僚的暗中支持下，各地右派“保皇派”红卫兵，迅速壮大，使造反的左派红卫兵变成了少数派；同时，不少地方官僚甚至公然骂“娘”，阻挠中央决定的贯彻；有的甚至公然利用权力，派出军警干涉、镇压左派红卫兵。然而，天才的毛泽东技高一筹，他决定在“接见”红卫兵的同时，适时采取非常手段，不停顿地向右派官僚发动攻击：8 月 22 日，他指示公安部发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通知，使打、砸、抢、烧、杀等法西斯暴行合法化；10 月 5 日，他下令林彪和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引发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高潮，极大地支持了左派红卫兵；10 月 9 日至 28 日，他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让陈伯达代表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全面讨伐刘、邓右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力图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成为过街老鼠；1967 年 1 月 13 日，他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严惩文革反抗者、骂“娘”者，等等。

尽管毛泽东对右派官僚不停顿地发动攻击、攻击、再攻击，但心里仍不踏实。他明白，他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可以挑动年轻的红卫兵为他冲锋陷阵，但却很难说服党内广大干部。实际情况确也如此。在广大干部看来，如果不是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即在农村实行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政策，在干部问题上实行“甄别平反”和“神仙会”等较为开明、较有人性的政策，很难走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大饥荒的困境。因此，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批判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得鱼忘筌、卸磨杀驴之举**。毛泽东对他长期训导下的干部们的这些想法，十分清楚，因此，他必须在打倒刘、邓问题上，找出一个比批走资本主义道路更有说服力的“实质问题”。于是，**由康生策划的“抓叛徒”策略，便应劫而生**。

“抓叛徒”对以选票定成败的民主党派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党派成员，没有义务为他所在党奉献一切，他们有权自由出入于这个党，甚至有权自由加入对立的党，他们的自由没有因而受到生命的威胁。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党则完全相反：他们的成员，无权自由脱党，更无权自由参加对立的党，否则，他的自由将受到党的严惩。

刘少奇是在白区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带出的一大批白区干部，都在党政军显要岗位上工作，构成了右派官僚主干。这批人被捕、脱党甚至叛变、当特务的机率很高，从他们中抓出叛徒、特务，将会给刘少奇增加一项“招降纳叛”的新罪名。于是，在“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康生在天

安门上对南开大学的红卫兵说：“**要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查出几个实质问题来，比如叛徒、特务，就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茅塞顿开。在查校党委书记高仰云的历史时，查出了个包括高在内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在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里，集体办理了自首出狱手续。他们发现，在 1936 年 8 月 31 至 9 月 2 日《华北日报》上，先后刊登了他们的反共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

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信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笔者：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人

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们还查明，在这个叛徒集团还活着的成员中，有二十二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职务，十三人为司局级干部。其中：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廖鲁言**、国家经委副主任**周仲英**、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徐子荣**、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西藏工委书记**王其梅**、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等等，这些都是在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干部。

11 月 1 日深夜，南开大学红卫兵，秘密上书向康生邀功，说他们已“查明”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对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明”的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康生了如指掌。1931 年前后，一批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入党入团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 年，他们的刑期已满，需要履行一个“反共启事”手续才能出狱。当时的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中共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建议，让他们履行手续出狱。刘少奇表示同意，并致电党中央。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在与其他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商量后，做出了同意北方局建议的决定。由是，张闻天向刘少奇发了回电，表示中央批准了“履行手续出狱”的建议。于是，在押的薄一波等六十一

名中共党员，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后，先后分九批出狱。

这件康生了如指掌且早已定论的往事，为什么引起他的关注呢？这要从康生的个人品质说起。

康生非等闲之辈。他才艺稍佳，长于鉴赏，书画也颇有名气；政治上则多谋善变，阴险狡诈，以罗织罪名为能。因从师于苏联政治保卫局“格伯乌”，丰富了他的肃反经验，崇拜杀人不眨眼的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被诩为中国的“捷尔仁斯基”。

在中共党内，康生最初是拥护王明起家的。由于王明握有斯大林的“尚方宝剑”，他便把他的未来压在王明身上。当他察觉到王明在党内嫡系不多，对手强悍，如林育南、何孟雄等，他决意帮助王明铲除林、何等对手。他设计了阴毒的借刀计，有意将林、何等人的机密泄露给国民党。1931 年 1 月 17 日晚到 18 日凌晨，准备召开反王明会议的林育南、何孟雄等 36 人，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不久后惨遭处决。康生的借刀杀人计，成功地帮助王明扫除了党内反对派，也为他自己捞到了好处：不久成为中共特工部的首脑，负责中共在整个国民党白区的安全和谍报工作；两年后受命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深造，并成了王明的副手。在莫斯科，他在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但康生在中共党内的迅速攀升，却又开始于出卖王明。1937 年 11 月，初到延安的王明，受到毛的亲迎，赢得延安知识界的拥戴。那时的康生也在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然而，当他察觉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稳固与王明分歧日益尖锐时，他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向毛泽东。表面上他仍然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王明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他同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成了拥毛倒王的打手。康生还力排众议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由此获得毛的完全信任。1939 年 2 月，毛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到了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几乎成为毛最信任的前台打手，变成了毛手中的狼犬，一跃而成为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号人物，升任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嗜血污、好眼泪、喜看家破人亡，是康生的乖僻嗜好。当发现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将被毛泽东整肃时，康生一改过去对他们的迎奉笑脸，成了批判他们的冷酷无情的急先锋。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篇“杰作”，就是他暗授聂元梓那张大字报。在那张大字报里，他通过聂的手，提出了要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主张，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被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5 月 28 日，毛泽东任命他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从此，他开始了新一轮的打手脚色。

这个“反共启事”案，是个中共早已定论的问题；但作为打手的康生，却发现了其中的新内涵。他查阅档案发现，尽管不少人回忆说，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但没有查到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记录，这就为重审这个案件提供了可能。经过与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要员的秘密策划，1966 年 9 月 16 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我找人翻阅了 1936 年 8、9 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附上了 1936 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而此时，南开大学红卫兵还在为康生直接交给的挖叛徒任务忙碌着。

1966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南开大学红卫兵发表了号召揪斗叛徒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进驻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南京、苏州、广州、郑州、长春、乌鲁木齐等地，在各地掀起了抓叛徒的风暴。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等人，先后以叛徒罪名被揪斗。而此时，不知内情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11 月 24 日，周恩来在西北局请示中央的急电批复道：**“23 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同样的复电也打给了东北局和吉林省委。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件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当时毛泽东没有想到康生的心计，挥笔就批准了周的报告。

到了 1967 年初，毛泽东发现，文化革命的阻力相当大，尤以来自刘少奇系的干部阻力最大，而他能用来清除这些干部的罪名并不多。而此时，“执行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不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抵制，1 月 13 日深夜刘少奇的抗拒态度，就是这种不服和抵制的表演。信奉“理无常是”辩证哲学的毛泽东，根据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政治需要，决定改变态度，采纳康生的意见。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在做 180 度的大转弯时，力图转得“有理、有利、有节”：2 月 3 日，他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现在一查出来”是毛泽东发明的一大**“专利”**武器。1955 年他宣布

胡风是反革命时，就举着这个“专利”武器说：**“胡风的这个简单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1959 年庐山会议上，为了打倒彭德怀，他又举起这个“专利”武器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1966 年 5 月，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点火，他把这个“专利”武器指向邓拓，他宣布：**“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个“专利”武器，被他运用得从心所欲，令人瞠目结舌！

毛泽东对巴卢库的谈话，显然给了康生出了一个明确的题目，要他在重审重做结论即**“现在查出**”上做文章。

在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下，嗜血的康生开动了他善于整人的天才，重新审定的结论很快被写了出来。1967 年 3 月 16 日，康生起草了一个《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中共中央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文件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全国，引发了全国抓叛徒的高潮。

这个中共文件的形成，**周恩来**和**张闻天**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落井下石作用。

善于看风转舵、左右摇摆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态度明朗，蓄意要借叛徒问题打击刘少奇和他的势力，便不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说话。他装聋作哑，好像当年他不知道这件事；去年 11 月 24 日他给毛写的信，以及毛的批复，也好像压根儿都没有发生过。

张闻天的表演则更上一层楼。这位当年的总书记、中共第一把手、“履行手续出狱”建议的批准者，1967 年 2 月 18 日，他致信中央文革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他还昧着良心说：“（我）**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在信里，他还嫁祸于人说：**“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招降纳叛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

周恩来的装聋作哑的表演和张闻天嫁祸于人的信，使“履行手续出狱”的原结论顺利被推翻，从而使当年“六十一人”中的存活者，全部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其中，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公

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监委会副书记**刘锡五**、西藏工委书记**王其梅**等多名中共高干，先后倒毙在毛式揪殴法的残酷批斗中。

毛泽东死后，为了开脱张闻天撒谎的责任，他的妻子**刘英**辩解说，当时张闻天如果承认六十一人出狱的事毛泽东知道，就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罪名他“**担待不起**”。由于“担待不起”，就可以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促使他死于非命？这种“理直气壮”又毫无廉耻的“辩解”，这种为了保全自己不惜采取昧着良心、嫁祸他人和落井下石等恶劣作风，不就是司空见惯了的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吗？

在全国抓叛徒的高潮中，抓出一个“冀东反革命党”。1938 年，中共冀东党组织李楚离等领导人，没有领悟毛泽东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指导思想，便与当地国民党以及当地的民众爱国组织，联合在一起，发动了名震全国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然而，同“百团大战”发动者的命运雷同，二十九年后的 1967 年，李楚离等冀东党组织领导人，因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被打成叛徒和国民党特嫌；参加当年抗日大暴动的八万多人，都受到了审查，其中，在毛式揪殴法的残酷批斗中，有 2,955 人自杀或被枪杀，致残者达 763 人。（详见第 16 章“冀东大血案”）

在全国抓叛徒的高潮中，江西省省委书记**方志纯**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等九十人，被打成“新疆叛徒集团”。他们曾在新疆国民党狱中服过刑。1946 年 6 月，他们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办理了“声明脱党”手续后，被放出监狱。这批人回到延安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亲自参加欢迎晚会。但二十二年后，他们都成了“新疆叛徒集团”成员。他们的命运是：方志纯被宣布为叛徒集团的头头，包括方在内的 91 人，被投入监狱；其中，包括马明方在内的 24 人，先后死于残酷批斗的折磨中。

此外，在抓叛徒的高潮中，还“挖出”了“东北叛徒集团”和“南方叛徒集团”，数百名曾被中共党组织批准“自首”出狱的党员干部，都被以叛徒论处，遭到清洗式的批斗。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全国不完全统计，仅在 1967 年头五个月里，因历史上曾被捕、被俘过的中共人员，被指控为“自首变节”或有自首变节嫌疑者，高达 5,200 多名，其中，有数百人在毛式揪殴中遭折磨而死。

毛泽东抓叛徒的决策，大大削弱了刘少奇党内右派集团势力，为左派集团全面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放过总理周恩来

1967 年 5 月初，在抓叛徒的风浪中，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天津南开大

学红卫兵，从 1930 年的旧报纸里，翻到一条“**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认为挖出了个大叛徒，便迅速上报到中央文革请功。伍豪是周恩来化名，“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无疑是一颗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的重磅炸弹。早对周恩来在打倒“走资派”中所持的中间立场和在处理“二月逆流”中的和稀泥态度很不满意的江青，对红卫兵的发现，如获至宝。5 月 17 日，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就“伍豪事件”写信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本人，直接向周发难。信中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影印件。

周恩来已有所料。5 月 19 日，他断然否认“伍豪启事”。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为防不测，这一天，他把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与之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将其拍照下来，印制多份。就绪之后的当天，他即亲笔致信毛泽东，说明事件真相。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令周恩来意外的是，对这个简单而明白的问题，毛泽东竟这样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的批示等于说：“**挂起来**！”

为什么说“伍豪事件”是个“简单而明白的问题”？其一，“启事”发生在 1931 年 12 月，当时周恩来已潜到了江西中央根据地；其次，在 1932 年 3 月，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布告辟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其三，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启事”已作了否定的结论。显然，“伍豪事件”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但三十五年后，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怎么又成了个问题呢？这是中共整人赤文化之使然！

“伍豪事件”是由“**顾顺章灭门事件**”引发出来的事件，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

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负责人。1931 年 4 月 25 日，顾在汉口被捕后即叛变，供出他所知的一切中共机密。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将顾叛变的绝密情报，迅速报告给周恩来。周得到情报后，抢在中统特务动手之前，迅即组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转移。据

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当顾顺章还没有来得及出卖中共中央机关而中央机关正在仓皇撤离时，周恩来人格的另一面迅速展现：他当即立断，**消灭顾顺章全家，斩草除根，以儆效尤**。于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灭门大案，便在上海出现！

在四月底一个漆黑的夜里，**周恩来**亲率**康生**和**宋再生**、**王竹友**、**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龙章**等中共特工红队人员，分坐两辆小汽车，悄悄地开到威海卫路（今威海路陕西路）802 号门口停了下来。这是幢二层结构的新式楼房。房间里陈设堂皇，一楼客厅摆放着成套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一副殷实的生意人的样子。楼里住着顾顺章妻子**张杏华**和八岁女儿**顾利群**，同住的还有顾的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爱宝**，小舅子**张长庚**，顾姨母的女儿**叶小妹**。这就是用苏俄卢布供养的顾顺章八口之家。周恩来带领杀手，鱼贯般地闪进 802 号。当是时，张杏华正在二楼陪着顾的好友**朱完白**夫妇和**斯励**打麻将，而张长庚当晚住校不在家里。周恩来看见了正在打牌的斯励，不觉苦笑了一下。1927 年“四一二”清党时，周恩来和顾顺章被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抓获，却被他的弟弟斯励放走。斯励自然成了周和顾的恩公，也成了顾家的座上客。但一不作、二不休，**“对待敌人从来不手软”**的周恩来，脸一沉，下达了执行的命令。九人一齐动手，人不知、鬼不觉，先后用细麻绳勒杀了顾顺章家庭主要成员（放过顾的八岁女儿）和包括**斯励**在内的牌友等 8 人。勒杀之后，趁着夜幕，他们将尸体深埋好，上面栽上花草，作得干净利索，不留一点痕迹。**事毕，从不抽烟的周恩来，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又缓缓吐了出来**。那天晚上究竟杀了多少，说法不一。据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极好的美籍作家韩素音说，杀了 17 人，留下了一个 12 岁的男孩和一个 8 岁女孩。但有的资料说杀了 7 人或 9 人，也有说多达 30 多人。又据周恩来为申辩“伍豪事件”上交给毛泽东的《大事纪》中说：**“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 10 人**。”

顾案发生四个月后，王竹友被捕，供出了上述案情。国民党当局向法租界当局接洽，会同法警方，按王竹友指认的地址挖掘尸体。消息传出后，市民挤满墙头，爬在树上，围观挖掘。在充满怀疑和期待下，人们在毫无痕迹的花草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终于在八尺深处，挖出了被勒杀的 8 具尸体。接着，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挖掘出了三十多具尸体，其中，有顾顺章的哥哥中共地下工作者**顾维桢夫妇**，顾维桢的妻弟中共地下工作者**吴克昌夫妇**。这些尸体都是被

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领导下令或亲手勒杀的所谓动摇、叛变嫌疑分子。挖掘出的尸体使全上海市为之惊颤！灭门和屠戮新闻不胫而走，传遍全国，震撼世界。1972 年来访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周恩来亲切握手后，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特别关照了这件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灭门大血案。他写道：**“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

历史是无情的。它昭示了周恩来对中共忠诚和对敌人凶狠的历史形象！

当年上海报纸上登出照片：顾顺章抱尸大哭，发誓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

1931 年 9 月 1 日，国民党当局悬赏两万大洋，缉拿周恩来或人头，而此时，周恩来正在潜向中央苏区的途中；11 月，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而此时，周恩来已潜入中央苏区。由于没有抓住周恩来，离间中共中央领袖关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便被炮制了出来。

国民党这种笨拙的离间计，当年没有得逞，但在三十五年后的文革中，却起到了作用。

当看到一个佼佼者在他面前点头哈腰、诚惶诚恐的样子，毛泽东便油然产生一种快意和满足。因此，为了控制周恩来，使其俯首贴耳、惟命是从，把“伍豪事件”挂起来，是个理想的选择。但对周恩来来说，这是不公正的，是一个令他难咽的苦瓜。周恩来无法怨天尤人，因为，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把毛泽东推上了说一不二的九五帝王之尊。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个不得不重用又不得不警惕的特殊人物；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的才智过人，嗜权如命，但居高临下的霸气和不择手段整人的残酷性，难免众怨，他早晚必取而代之。毛、周的关系史，就是一部即联合又争斗、充满恩恩怨怨的历史。

正当周恩来在上海屠杀顾顺章全家和亲朋好友之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大搞肃反，开展轰轰烈烈反“AB 团”的运动。他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用残酷的肉刑进行“逼供信”，即抓起来就逼，一逼就供，一供便信，一信便杀。先后屠戮所谓“AB 团”和“社会民主党”成员等异己分子万余人(另说：有大约七万人被冠以 AB 团分子遇害)，其中，在红二十军，包括军长、政委在内的副排级以上干部近 800 人，全部被处决！这就是著名的中央苏区肃反，史称“AB 团事件”。

12 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为了夺权而笼络人心，周恩来批评毛泽东肃反扩大化，并在 1932 年 10 日的宁都会议上，罢了毛泽东的官，夺了他的兵权，迫使他离开军队。自此，周取毛而代之，并同王稼祥和苏俄特使德国人李德，组成了中央苏区军事三巨头。

周、毛怨恨也由此引发，使毛泽东耿耿于怀，终生难忘。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化了三巨头的权力，使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坐冷板凳长达两年之久，成了他一生中最为失意、最为落寞日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恩来等人不得不突围向云贵方向逃跑，这给毛泽东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周恩来等人率队逃跑前，处决了近万名俘虏、伤病员和动摇嫌疑分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同时，周恩来等人，还以打游击的名义，将异己的中央要员如患肺病的瞿秋白、患疟疾的毛泽东等人，留在中央苏区，让他们在国民党围剿中自生自灭。不久，留在苏区的瞿秋白，在福建上杭濯田附近被国民党抓获，1935 年 6 月 18 日，被杀于长汀。

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能看破周恩来等人的借刀计。在疟疾康复中的他，紧紧跟在他熟悉的队伍后面，没有执行周恩来等人要他留下的命令。翻盘机会终于来了，在清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反客为主，对中共头头博古和三巨头，大张挞伐，赢得了一些将领的支持，但却无法撼动博古和三巨头的地位。然而，周恩来的突然倒戈，成全了毛泽东，使张闻天取代了博古，撵走德国人李德，换上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毛、周积怨并没缓和。在延安，毛泽东借助刘少奇、贺龙、彭真、高岗、康生等人之力，爬上了中共权力峰巅。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借批王明左倾路线之名，整肃对手周恩来。正当周恩来处境险恶之时，1943 年 12 月 22 日，苏俄党魁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首领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密电要求**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密电说：**“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政治上是错误的**。”莫斯科的支持，使毛泽东不敢对周下狠手，周也因而保住了他的权力。

领教了毛的报复手段后，周恩来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开始用“太极软功”与毛周旋。1957 年，当他在经济上反冒进的举措被毛斥为**“离右派只有 50 米的错误”**后，他立马改弦更张，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1958 年经济计划，完全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张安排。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他同刘少奇一样，成了毛的主要帮手和积极执行人。1959 年，当中国农村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他不顾人民的死活，着意拉开与**“右派”**的距离，力图完全甩掉**“50 米的错误”**，把出口粮食从 1958 年的 266 万吨，提高到 415 万吨，出口量猛增 56%！他这种改正

“错误”的丑行，加速和扩大了中国的饥馑发展，至少增加了 1,000 万个饿殍。在饿殍遍野之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派别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左、中、右三派。善于左顾右盼的周恩来，摇摆于左右之间，没有像右派刘少奇、邓小平那样，把大跃进失败的责任，用暗示的方式推到左派毛泽东的身上，巧妙地往自己身上贴金，而是主动承担经济失误的责任。他没往毛身上泼粪，使处境困难的毛泽东舒缓了一口气。

在谋划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中，天才的毛泽东充分利用周与刘、邓的矛盾，把老对手周恩来，当作可团结的对象加以利用。果不出所料，周恩来在“**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中，亲临一线，指挥红卫兵打、砸、抄、烧、杀，可谓赤膊上阵，废寝忘食，为毛打倒刘、邓党内右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立下了汗马大功。对此，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当斗争的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毛发现，周在高喊“打倒”的同时，却在暗中保护党内右派和中间派的老干部，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不过，毛也发现，周恩来虽有暗保“走资派”的嫌疑，但在保谁、打倒谁上，都在看他的眼色行事，没敢擅自做主。为了打倒党内右派，团结中间派，毛泽东做出决断：**放过周恩来，把“伍豪事件”挂起来**；同时又默许中央文革，利用“五一六”红卫兵来敲打周恩来，使他不敢轻举妄动！

周恩来卑躬屈膝的“太极软功”也收到了效果，使他涉过险滩，稳坐第三把交椅！

第 14 章附注：

附 1、犬儒：

原指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哲学家学派，这里借来泛指像犬忠一样的知识分子。

第 15 章 “群众专政”暨文革第三、四轮大屠杀

15 章目录

★一、“群众专政”在湘南道县暨第三轮大屠杀 1、大屠杀借口种种 2、大屠杀组织实施
★3、大屠杀模式选择 ★4、人兽之间(2) ★5、题外话星空
★二、 “群众专政”在广西暨第四轮大屠杀 1、广西魔头韦国清 2. 左派“四二二”的末日
3.《七三布告》前的“群众专政” 4.《七三布告》后的“群众专政”
★5. 人兽之间(3) 之一：政治构陷 之二：活体人笼展 之三：戮男霸女掠财
★之四：人食人 ★本章点评：“群众专政”

1967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左派**”和“**专政是群众专政**”的指示——著名的“**八四指示**”。对于“群众专政”问题，毛泽东曾解释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1966 年的“横扫”、破“四旧”和而后的武斗中随便抓人、打人、私设公堂、杀人以及大兴、昌平县为代表的农村滥杀无辜等那些曾使全国十万多人丧生的野蛮暴行，都被毛泽东纳入到“群众专政”中加以肯定了。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谓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同他一贯倡导、标榜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其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中共党和政府，蔑视个人自由、人权，蓄意违宪、犯法，制造出一种混乱的无政府局面，动员、唆使包括那些无法无天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等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所谓“群众”，在混乱中对守法公民（老百姓）实施暴力专政。因此，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和他一贯倡导、标榜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实质上都是**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的法西斯专政**。

毛泽东发出“**群众专政**”的指示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根据这两条指示行动起来。毛的“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等法西斯分子，大显身手，很快酿成了比北京“红八月”里**大兴、昌平**两县为代表的农村大屠杀范围更广泛、刑讯更野蛮、手段更残忍的大屠杀！

在全国各地“**群众专政**”中，湖南湘南和广西农村大屠杀，最具代表性。

一、“群众专政”在湘南道县暨文革第三轮大屠杀

（本节根据以下十多篇资料撰写：《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老虎坪纪事》《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等）

1982 年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回故乡探亲。当中共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中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会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 地委书记很清楚，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群众专政**”中，被残忍杀死的。

1984 年 5 月，中共右派当权者，根据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在湖南省零陵地区成立了有 1,389 名干部参加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对以道县为中心的全地区屠杀情况，进行了清查、处理和遗留安置。据“工作组”清查后透露：

道县大屠杀，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该县 10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都进行了屠杀。共屠杀 2,778 户，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打死、枪杀 4,193 人，被迫自杀 326 人。

大屠杀向零陵地区其余 10 个县市扩散,全地区各县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屠杀。据清查统计：全地区（含道县）屠杀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迫自杀 1,397 人，致伤致残 2,146 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为：四类分子 3,576 人，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贫下中农 1,049 人，其他成份 411 人。按年龄划分为：未成年 826 人；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大屠杀直接受牵连者，高达 14,000 多人。

又据不完全统计，除道县外，零陵地区各县和相邻地区的县市屠杀情况如次：

宁远县：从 1967 年 8 月 18 日开始屠杀，共屠杀 1,092 人；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 1967 年 8 月 29 日起，历时 57 天，共屠杀 898 人；

双牌县：共屠杀 345 人，其中被迫自杀 48 人；

江永县：先后屠杀 325 人；

东安县：屠杀 11 人，但在杀人腥风停息了 8 个月之后，该县又屠杀 141 人，自杀 278 人，致伤致残 1,132 人；

祁阳县：33 个公社，共屠杀 218 人；

永州市：9 月间的几天内屠杀 158 人；

南山县：共屠杀 145 人；

常宁县：共屠杀 83 人；

邵阳县：杀死 295 人，自杀 277 人.

新田县 9 月 8 日开始屠杀，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 21 个公社就有 18 个公社先后在现场大会上杀人；冷水滩市也发生了全市性屠杀事件。此外，在湘南的郴州、桂阳、嘉禾等地，都传出了大批杀人的消息。但遗憾的是，新田、冷水滩、郴州、桂阳、嘉禾等地，都没有留下杀人记录。

湖南零陵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县市杀人手段，大致归纳为以下 10 种；

⑴、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⑵、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⑶、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⑷、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⑸、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棒打）；
⑹、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⑺、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⑻、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⑼、火烧（含熏死）；
⑽、摔死（主要对付未成年的孩子）。

在毛式有政府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专政”**下，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甘肃、江西、黑龙江等省的县城和农村，也都发生过与湖南类似的屠杀，其规模、时间和波及的范围，各有不同。

也许是巧合。正当湘南**“群众专政”**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1967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驻脚湖南长沙，进行视察。他在视察时的讲话内容，竟只字不提湘南屠杀，却对湖南省、地一级领导面对屠杀放弃管理的不作为行为，大加赞扬，对大屠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请听，当湖南省委领导们反映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时，毛泽东赞道：**“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当湖南省委领导们反映“公检法”不能发挥作用时，主张**“群众专政”**的毛泽东回答道：**“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在坐的省委大员们，听到毛支持大屠杀、鼓动政府放任不管的讲话，无不因震惊而颤栗。这是否可以证明有人说**“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是有根据的？

那么多共产党组织、党员，难道没有一个主持正义吗？下面一则报导，请读者剖析。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

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见“序幕”简评四清运动附注）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后来县“处遗办”查明：“**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投飘到湘南的传单；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七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是子虚乌有。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然而，一个握有“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事管制和军训大权的零陵军分区，不仅“**情况上报**”中有袒护屠杀之嫌，且明知“**不宜滥杀**”却又不采取强制措施去制止滥杀，如军事管制等。对这种熟视无睹的不作为行径，同毛说的“**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和专家说的“**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联系在一起，难道不能发人深思吗？

1、大屠杀“理由”种种

毛泽东每次发动镇压运动前，都要做妖魔化阶级敌人的舆论准备。道县毛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也学会了这一套，但他们妖魔化的水平，远比毛平庸、低劣。然而，平庸、低劣妖魔化的手段，在落后、愚昧的农村，还是起到了作用。他们屠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理由”是：

⑴、“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道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上说：“**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 这是一个最普遍、最统一的“理由”。

⑵、“四类分子要造反”。这又是一个最普遍、最统一的“理由”。中共零陵地委处理文化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组，对这段历史所作的总结中说：“**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

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 8 月 17 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他们说的四类分子，实际上是指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

“理由”是中共赤文化“**目的崇拜**”的一种：为了达到屠杀之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敌人。因而，“理由”等于谎言。

但也有不是谎言的“理由”——毛的党员、干部们，亦即毛的“**群众**”们，还从“官本位”出发，规定了多项维护官员尊严和官僚体制的屠杀条条：

⑶、不尊敬干部者，杀！第一个被“开刀祭屠”的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当过军统特务的光棍**朱勉**。此人读过很多书，曾因特务问题坐过 12 年大牢；出狱后，仍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他对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和大队治保主任**陈甫厉**的历次“管教训话”，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而是不以为然地随便站着，大有不**尊敬**之嫌。两陈早想整整他，杀杀他的傲气。机会来了，已升任寿雁公社“抓促小组”组长的陈智希，请示上级后，便以子虚乌有的“搞反革命组织”的罪名，下令陈甫厉把朱勉“搞掉”。8 月 13 日晚上，接受命令后，陈甫厉便以“不老实”、“不请假”的“罪名”，叫了几个民兵，把朱勉挟持到山上打死。

⑷、“表现不好”者，杀！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 22 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便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他这一回家，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的父亲叫**蒋勋**，194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 年后，曾在道县担任过教师和一中校长等职，因出身不好被开除回家。其时，蒋晓初竟天真地跑到大队部，向大队干部宣传“**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干部不要乱杀无辜。但这种宣传在毛的“**群众**”看来，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表现不好”之罪，对此，毛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们，岂能容忍？于是，他同他的父亲蒋勋、二弟**蒋晓中**和几十个地富子女一起，被抓了起来，遂遭屠戮。

据零陵处遗工作组统计：零陵地区被“**群众**”屠杀的 9,093 人中，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四类分子”有 3,576 人，占 39.54％，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四类分子”子女有 4,057 人，占 44.61％，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其他成份者有 1,049 人，占 11.53％。

⑸、持不同政见者，杀！当了右派造反派“红联”司令的四马桥区杨

家公社秘书**蒋文明**，成了地方当局的保护伞和打手。8 月 13 日，他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向公社各大队干部发出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蒋四条指示中的“革联”，是湖南省左派造反派“湘江风雷”在道县的下属组织。参加“革联”的大多数人，都是长期受压的弱势群体，而对立面“红联”，则是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下中农和基干民兵为骨干的右派造反派。两派政见不同，在**“全面内战”**的号召下，自然势不两立。在省城长沙，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下达后，“湘江风雷”红火一时，大有半壁河山之势；但在县城和农村，那里却是右派的天下。在那里，左派造反派“革联”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湘江风雷”鞭长莫及，爱莫能助。会上，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郑逢格**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于是，会议决定先把**钟佩英**“搞掉”。

8 月 15 日晚上，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和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和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向钟佩英喝斥：**“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话没说完，便被握着生杀大权的民兵捆了起来，拉到山上，用锄头和棍棒把她“搞掉”。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民兵们按分付，又将她的一个 20 岁、一个 18 岁的两个儿子，分别拉到两个山头上，先后用锄头和扁担打死。这样，在道县的**“群众专政”**中，第一起灭门案便被毛的“群众”制造了出来。

⑹、生性耿直者，杀！清塘区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三四十人冲到右派分子**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他打死，然后抛尸于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何以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1957 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许多人说他“蹲点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为人生性耿直的唐玉，帮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特派员告了，害得蒋不仅受了批评，仕途也受到很大影响。自此，蒋白举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他把他捏造的**“唐玉是‘人民党’成员、想当区长”**等“罪行”，“举报”给区领导**周仁**。

8 月 17 日，在部署杀人的干部会议上，清塘区武装部长兼“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说：**“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

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周仁也附和说：“**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当说到蒋白举“举报”唐玉要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说：“**我们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拿到“令箭”后的当天，蒋白举便带领三四十人，用乱棒将唐玉打死在禾坪上。

⑺、未婚妻漂亮者，杀！7月，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xx。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秀丽，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妒忌生恨，他一口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把他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脱了臼。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

伤好后的贺远能，鬼使神差使他自投罗网，竟于8月24日回到了的家里。此时的蚣坝公社，杀人已杀红了眼，屠杀人数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公社。他见势不妙，便连夜逃跑，躲到洲背岭上草丛中。第二天，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贺主席，以放跑“奸细”罪，处决了他的父母和弟弟全家人，并下令追捕他。躲了一天的贺远能，因思念未婚妻而冒险下岭，终被民兵抓获。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后，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不停地喊着未婚妻何端珍的名字。对这个可怜的情种，贺主席下令用鸟铳处决。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在支撑，鸟铳三声响后，贺远能竟没有倒下，依在石头上痉挛。贺主席又下令，把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大块石头，推到潇水河里。有人说，贺主席由此赚得了“棒打鸳鸯作话传”的恶名。其实，在中共党员干部中，棒打鸳鸯寻常见，本书就记载了多例。

2、大屠杀组织实施

道县“**群众专政**”，是由中共县委以下各级党政机关和武装部的领导人会同以干部、工人和农村基层民兵为骨干的右派造反派“红联”联合组织实施的。其实施模式是：**谎言——命令——虐杀！**

⑴、召开动员大会。8 月 8 日下午，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县各区紧急会议上，他用毛式谎言炮制法炮制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谎言。他说：**“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这是大屠杀的先声：舆论准备的动员大会。

⑵、层层动员，层层部署。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 8 天时间，毛的**“群众”**共杀人 1,054 人，全区 50 人中就杀了 1 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杀人冠军”。蚣坝区敢于大规模杀人，主要原因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动员，层层部署：区委先召开由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和会计参加的核心成员碰头会，进行动员和部署，接着，召开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部署，然后再由各个公社召开各个大队负责干部会议，贯彻执行。

⑶、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8 月 22 日，小甲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己已落后于形势，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计划杀 5 人。大队党支部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 5 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 5 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正当县里召开会议讨论停止杀人问题时，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闻风组织了一次大砍大杀。他率领 120 名民兵，三天突击杀了 569 人，成了道县快速杀人之最。

⑷、向下摊派杀人指标。在兴桥公社坐镇的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下令民兵杀“阶级敌人”**杨贵清**。8 月 22 日晚，将杨押送到上关河边时，被民兵杨飞吉从背后砍了一马刀，抛尸潇水河中。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求部长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第二天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会议，部署杀人。

⑸、现场大会制作杀人样板。8 月 22 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虎子坪生产队作杀“阶级敌人”的动员报告。参加大会有齐心、

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等一千多人。大会场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周永记依照部署作动员报告：**“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现在，毛主席把专政权力交给了我们贫下中农，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接着，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押来批斗批斗，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还没有还过神来，头颅被一刀砍掉，鲜血四溅，喷洒到碧绿的稻禾上。杀人样板就这样被毛的**“群众”**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出来。于是，各大队纷纷效法。

⑹、“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人。最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是，在 8 月 23 日的鞭炮声中，相当于省级“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宣布正式成立。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白底红字的**“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招牌，也堂堂正正地挂在公社大院的门口。“高级法院”成立后，迅即开庭审讯了 13 个人，判处 8 人死刑。然而，几天后，公社下属的各大队，都纷纷成立了相当于中央级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那些“最高法院”自动拥有杀人的最高权力，并接二连三地判处了数十人死刑，从而使这个代表公社的“高级法院”名字上成了下级。于是乎，这个牌子没挂几天的“高级法院”，不得不灰不溜丢地摘牌收场。

⑺、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的六条。人们不禁要问：道县县委领导**熊炳恩**明明说“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为什么公社一级政府杀人即不请示也不上报而肆意屠杀呢？这是中共长期形成的赤文化决定的。毛泽东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即能反左也能反右，关键是要下级领会其**“精神实质”**。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学会了这一套，他们也要求下级领会他们讲的“精神实质”。在反复说教中，公社领导干部终于也领会到熊书记讲活的“精神实质”：**发动“群众”，进行“群众专政”**。因此，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屠杀中，道县县委没有人出来制止屠杀，熊书记也许还在为有这么多下级能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暗自高兴呢。

相对“诚实”一点的是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他们的《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文件最具代表性。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 1967 年 8 月 29 日起到 10 月 25 日 57 天里，共杀了 898 人。当时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为了“制止”滥杀，他们在 9 月下发过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文件中说：**“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

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当然文件中也有“制止”的规定。其中最明确的规定是：“**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他们在制止杀人还是鼓励杀人？文件说“**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这种反咬一口的伎俩，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1966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准备“横扫”知识分子为牛鬼蛇神时说：“**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知识分子）**先挑起斗争。**”

应当肯定的是，在“**专政是群众专政**”和“**革命是暴烈行动**”的“最高指示”下，江华瑶族自治县敢于以文件形式公开说毛的“**群众**”杀人的“**大方向是对的**”，远比装聋作哑、作壁上观和掩盖屠杀恶行的中共省、市、地级当权派和道县县委“诚实”得多。

3、大屠杀模式选择

在“**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最高指示”下，毛的“**群众**”——道县的基层党员干部，创造了许多集体大屠杀模式。以下四种具有代表性：

⑴、洞口屠杀“大老虎”

8 月 26 日早晨，21 名被五花大绑着被称为“大老虎”的青壮年汉子，汇集在通往山里的三叉道口，旁边站着数十名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蚣坝公社河滩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绑来的人清点了两遍，然后下令往山里押送。这是大队党支部**周书记**根据公社“**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的部署，所采取的一次革命行动。

投错娘胎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们，由于十八年来已过惯了没有做人权利的屈辱生活，对五花大绑也习已为常了。他们对管教他们的大队、公社乃至县里的干部，再熟悉不过了：这些毛的“群众”，许多人都是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其中，不少人是心狠手辣的地痞、无赖、混混甚至流氓，在土改和而后的合作化、大跃进、四清等运动中，这些人大都变成了大小干部，因而，在这些干部面前，他们只有点头哈腰，恭顺谨饬、唯命是从的权利。而今，他们不知道他们将被押送到那里，更不知道前面等

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走着，走着，他们已预感到有些不妙，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落，依依不舍之情出现在他们的脸上。那里有他们年迈的父母，有他们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里有他们贫困中的温馨，有受屈辱时的安抚……总之，那里有他们理不清的思念，有他们割不掉的牵挂，但他们只能在这条任人宰割的路上走着，自由地想着。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投错了娘胎，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屠场设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他们被押到洞口，每个人都被两三个民兵挟住，动弹不得。他们知道大事不好。只见何兴盛对着他们大声宣布：**“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你们死刑，立即执行！”**他们在十多年的肆意蹂躏下，已经麻木了，在死刑判决面前，他们认命了。有人回忆道：**“面对死刑，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出人意料地平静**。”

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推到洞口边，或用马刀砍死，或用梭标刺死，或用棍棒打死，或用锄头锄死，然后被推入洞里。没有人哭，没有人叫，唯一一声惨叫，是一个被打昏的人堕入洞底时发出的。

工作认真负责的何主任，在细心观察洞底的情况时发现，有人没死，还在呻吟。他决定要民兵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后扔到洞底薰烧。由于他还不放心，便打发人回村里，拿来了一包炸药，点燃导火索后，抛入洞里。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往日的寂静。共产党员何兴盛，在胜利完成这一次**“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后，紧张的心情并没放松下来，因为还有三十多个“小老虎”等着处理。

⑵、船上沉溺“小老虎”

还是这个河滩大队，还是这些共产党员，当完成了“搞掉”“大老虎”后，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摆在他们的面前：其一是，“大老虎”除掉了，还留下三十多个老的老、小的小的“小老虎”，谁来养活他们？这对于终日以“瓜菜代（粮）”为生的贫困的河滩大队来说，未始不是一个牵动利益的大问题；其二，“小老虎”长大要报仇怎么办？对此，一个毛的“群众”理直气壮地提出：“索性斩草除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主任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中共党员，他知道公社领导部署杀人时，没有说过要“一窝端”，尽管有“群众”要求这么干，他也赞成这么干。他本能地拿起电话，请示公社领导。区委秘书回答说：“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秘书的回答，使他不知如何是好。杀“小老虎”符不符合政策，他一时也吃不准。但他坚信，这几天他们的

革命行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党的阶级路线，符合毛主席**“对敌人要狠”**的“伟大教导”。回想起土改时的幼稚，他悔恨不已。那时，那些大打出手、大搞“村村见血”的同龄人，一个个都升迁到公社、到县里甚至到省里当干部去了，而他呢，因受孔老二的毒太深，下不了手，当时也不知道有“对敌人要狠”的“伟大教导”，犯了右倾错误，因而多年都在小队、大队干部中徘徊。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他提供了改正错误的机会。现在，毛主席把生杀的专政大权交给了贫下中农，我们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他决心要在这次处决“阶级敌人”的革命中，先拔头筹，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怀疑秘书的回答；他要直接请示公社领导。电话又接通了，那边传来了公社书记**叶成虎**洪亮而铿锵的回答：**“全部杀掉！”**

何兴盛兴奋得跳了起来。他很快同大队党支部**周书记**决定了“行动计划”，并及时向各生产队(小队)部署了晚上的革命行动。

太阳快要落山了，潇水在静静地流着，在夕阳的映射下，河水彤红如血。早上杀人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村，死难者的亲人们在哭泣；看见村内村外立林的岗哨，老人们已经知道，中共已经对他们撒下了天罗地网，使他们有理无处诉，插翅难以飞，他们预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土改前，地主分子**张秀姣**同她那个不苟言笑平时不愿意说话的**丈夫**一样，以积德行善称道于乡里。土改时，分他们的房产土地，她不敢有任何怨言，因而，在“村村见血”的魔难中，她和丈夫躲过了一劫。土改后，她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勤快，不争不怨，把邻里、干部关系处理得很好，为人称道；丈夫虽然不爱说话，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谅解。当他俩听说到处都在杀四类分子和子弟时，她和丈夫已预感到在劫难逃了。

敲门声，打断了思虑，中止了哭泣，难属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上集中。一个形容枯槁的生病老人问道：“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带到那里去？”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干脆利落地回答说：“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一句话使晒谷坪骚动起来，小孩在哭，老人在呼叫……他们都已变成了死囚。双方力量太悬殊了，很快在虎视眈眈的民兵驱赶下，死囚们跌跌撞撞来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在那里，身强力壮的民兵们，没费多大力气，便像老鹰叼小鸡那样，把死囚们捆得结结实实，外吊一块大石头，然后把他们架到船上。当船划到潇水中心时，张秀姣那个不苟言笑的丈夫，突然冲着何兴盛大喊道：**“我们犯了什么罪？”**

何兴盛面对这些老老少少的死囚，其中不少与他还沾点亲，带点故的，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但一想到革命，一想到“伟大领袖”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谆谆教导，革命便战胜了亲情。他干咳了一声说：**“你**

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说罢下令执行。

几分钟后，31 名死囚被推入河中溺毙！其中，老的 74 岁，小的只有 56 天！

潇水河水静静的流淌着，时而发出悼念逝者的呜咽哀鸣；清晨，公社的高音喇叭又尖叫起来，播放起激励人们去拼杀的战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⑶、土窖吞噬六十二

从 8 月 13 日杀朱勉开刀祭屠和 15 日杀钟佩英一家开禁灭门起，诛杀四类分子和子女风暴，迅猛地刮向道县各地。到 8 月 25 日，跃进大队却不见动静。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说他们右倾，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是一个争胜好强的干部，是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和“四清”运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干部，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经验告诉他，要当一个优秀的出人头地的支部书记，必须紧跟党、紧跟形势，而紧跟党和形势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紧跟上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现在，上级党组织号召杀“阶级敌人”，他能不紧跟吗？看见其他大队都在大砍大杀，他的手早已痒痒了；怎奈，他在大队里遇到些麻烦。全大队四类分子和子女有 64 个，占全队人口近 10%，他们与大、小队的干部、党员、团员，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和朋友关系，而其中，还有他的远房亲戚。当屠杀风刮到跃进大队时，许多贫下中农来找他说情，有的人甚至公然批评说，杀四类分子和子女不符合党的政策。在杀不杀、紧跟不紧跟的问题上，他的确有些犹豫不决，被戴上“右倾”帽子，不算冤枉。但在李部长批评后，他幡然悔悟，决定用陈永贵“大批促大干”的办法来解决杀不杀的问题。

8 月 25 日晚上，即遭公社李部长严厉批评的当天晚上，在副支部书记**左隆交**的有力支持下，何书记在召开了支委会后，便连夜召开党支部紧急扩大会议，扩大所有党员、团员和各生产队干部参加。会上，何书记在念了几段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后，严厉地批评

了要亲情不要党性的说情风，尖锐地判定“杀四类分子和子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批评是反革命言论，并以极其强硬的口吻宣布：**“你要是革命，就站到党支部这边，你要是不革命和反革命，就站四类分子那边。”**“大批”这一招果然奏效，那些说情者和批评者，立刻蔫不溜湫地低下了头。与会者很快便“统一”了思想，并根据党支部制定的“解决方案”，接受了规定的任务。

一切都按“方案”顺利进行。26 日上午 9 点多，64 名五花大绑着的四类分子及子女，被以何方前为首中共干部、党团员和民兵们，用武力押赴到石头山水库尾端的坪上。半途，两个有病的老人走不动了，何书记下令就地处决。两声鸟铳响后，老人倒地，抛尸河中。坪上三口昨晚连夜挖成的地窖，一字儿排在那里。在窖口前，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何光美**、**左南方**等 6 2 人死刑，立即执行！在一片哭喊叫骂声中，62 人悉数被推入窖里，接着按“方案”点燃浇上煤油的稻草，投入窖里薰烧。少许，当听不到哭喊叫骂和咳喘声后，按“方案”把地窖填平封死，上面覆盖上一层地表土！

跃进大队在党支部的率领下，把大屠杀做得干净利索，不留一点痕迹。这个后来居上大队，来了一次大跃进，放了一颗大卫星，从没有名次的落后者，一下跃进成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当何方前用电话向公社请功时，传来了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的赞美声：**“哇！好家伙，这么多，你真了不起**！”遗憾的是，他无权向何方前颁发“杀人大跃进”勋章，也没法鼓励何方前再放了一颗“杀人大卫星”。

⑷、“土飞机”炸飞一十二

8 月 30 日，小甲公社全社 13 个大队已有 12 个大队杀了人，但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却迟迟不见行动。其原因人们都很清楚：这个大队里的几个四类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很听话，表现很好；“雷公不打笑脸人”呀，小甲大队的干部咋下得去手？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见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勃然变色。在严厉批评他们“右倾”、对敌人“温情”之后，气呼呼地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当小甲大队的 12 个四类分子和子女，正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领导人时，飞祸天降：基干民兵将他们五花大绑起来，并用一根绳索将他们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然后点燃导火索，把他们 12 个人炸得血肉横飞。一位老人回忆当年的惨状时，周身寒战。他说，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像雨点一样砸落了下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有几个炸掉了屁股，没有死的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拥而上，用锄头、马刀结束了他们的痛苦。对此，刽子手们谑而虐之说：**“请他们坐了‘土飞机’！”**

在毛泽东“**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最高指示”下，道县基层党员干部所创造的这些集体屠杀模式，令人发指。但一位知名史学家却说：“**文革是全民犯罪**！”我们质问史家：被溺毙的56天婴儿犯的是什么罪？还有一位知名教授，他经过多年研究后，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央政府无力左右地方官员的行为**。”和“**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显然，他在为毛泽东和中共辩护。试问教授：中国人被“解放”十八年了，唱《东方红》也唱了十八个年头了，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中央政府”怎么可能会“无力”？“国家权力”怎么还会“失灵”？你的“结论”能令人信服吗？

4、人兽之间⑵：滥杀无辜

当毛泽东用“**群众专政**”打开“潘多拉魔盒”放出贪婪、野蛮和杀戮后，他的“群众”即痞子和流氓无产者，便被各级权力部门以不同方式“收买”或重用，变成了邪恶歹徒和凶残杀手！

杀人“英雄”。目不识丁的贫农**胡茂昌**，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干净，穷得叮叮当当，没人看得起，连老婆都讨不到。但在“群众专政”中，他一跃变成了“英雄”。当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刑、立即执行时，没被安排当刽子手的胡茂昌，手心发痒。当他见一些民兵有点畏缩下不得手时，他突然跳了出来，大声喊道：“**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手起刀落，先砍掉了一个人头，接着一口气又连砍掉六个人头。当砍第八个时，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一刀接一刀猛剁，硬是把那个脑袋剁掉了，弄得他浑身是血，连他的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在他的带动下，其余13个人头也被民兵砍掉。杀完人后，经大队党支部书记批准，他又杀回村里，杀了地主子女的三个毒麻仔（小孩子）。

大队党支部规定：杀一个人奖5元。这一天，胡茂昌便得到55元奖金，比他去年一年收入还多好几块。高兴之余，他用奖金打了一斤酒，一伸脖子，灌了下去。醉意朦胧中，他想到了女人。然而，自痞子当了“英雄”之后，连丑陋的寡妇见他都躲得远远的：无形的道德审判，注定他光棍一辈子。

贪婪的公安。8月14日，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督促杀人时，听说何国新家里存有许多光洋，身上还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觉得立大功的机会来了。他决定先把何的母亲75岁的**秦秀容**和5岁**小儿**抓起来，逼他们交出光洋和存折，然后开刀示众。然而秦老太“顽固不化”，至死不承认有光洋和存折；他又拿手枪吓唬小孩。从未有

见过光洋的孙子，哀求奶奶交出光洋。奶奶摇摇头说：**“那有什么光洋。他们要杀人，还要找点理由。好细崽，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特派员大怒，遂下令将祖孙二人一块打死。

刀刃孕妇。19 岁的**唐水兰**再过一周就要做母亲了。摇篮做好了，尿布叠好了，小衣小袜都准备好了，等待着幸福的降临。然而， 8 月下旬，骤然而起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她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将被押解到娘家下柳大队受审。押解的民兵是送方的**张天沙**和接方的**唐 XX** 两人。时值夏末秋初，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着，走得很慢。当三个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剩下还有一大段路程。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送到娘家也是死，还不如就在茶林里搞掉她，省得麻烦。主意已定，张天沙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底。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抽出背上的马刀，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对准在跳动的胎儿，在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也随着血浆倒下去了。刽子手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报复杀人。梅花公社东风大队民兵营长中共党员**何子良**，在 1950 年因一棵樟树纠分同区代表**何定信**打起官司来。官司打到区政府后，何子良败诉。对此，何子良耿耿于怀，十七年来一直伺机报复，苦无良机。在大砍大杀“阶级敌人”中，给生杀大权在握的何营长提供了机会，但何定信是贫农，何营长十多天也没有找到可置何定信于死地的“理由”。冥思苦想几天后，“理由”最终找到了。他以同左派造反派“革联”搞串连的“罪名”，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报请公社处决。公社也竟同意了他杀何定信的意见。9 月 5 日，何子良营长率领 20 多个民兵，将何定信枪杀于狮子山槽古里。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当晚，他以押送何定信儿子**何若英**到公社受审为名，半途将其枪杀，终于完成他的报复心愿！

昧债杀人。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部书记**唐兴浩**，是个对党忠诚的老党员。8 月 26 日，他决定处决 14 个四类分子和子女，其中包括原小学教师夫妇：男的叫**蒋汉镇**，家庭成份不好，女的是 32 岁的**周军阳**，娘家贫农成份，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当年，唐兴浩生活困难时，曾向蒋氏夫妇借过 100 元。晚上，被捆得结结实实的 14 个四类分子及子女，集中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他们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说是往区里押送。突然间，唐兴浩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这样蒋氏夫妇和他们三个 4 到 8 岁的小孩，都在被“押送”之列。押送队伍来到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接着民兵们将 17 个人用鸟铳、梭标打死后，推入十多米深的天坑中。也许有些民兵

下不了狠手，最后被推下去的蒋氏一家，都摔到死人堆上，一阵大雨后，他们先后醒来。但最先醒来的周军阳，却眼睁睁地看她的丈夫和三个子女在而后的几天里先后死去。七天后，她被她的两个学生成功救出。周军阳说：**“到了 1985 年，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唐兴浩才托人将那 100 元还给我，但他永远还不了我的四个亲人！”**

手刃养母。当历史被权力诠释为阶级斗争史后，维系亲情和温馨的孝道被颠覆，家庭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战场。她，一个豆寇年华、朝气蓬勃、容颜娇美的大队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当养母。**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视为己出。在阶级斗争的腌渍中，成人后的她，成了一个**“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的狂热信徒。当她为生身父母是贫下中农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时候，却又为养母是个地主婆而感到无比羞耻和痛苦。大队砍杀四类分子那天，她的养母不在砍杀之列。党支部研究杀人名单时，也提到了她的婶娘。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于是，党支部决定“特殊对待”，放过她的婶娘。然而，她把党支部不杀她养母的决定，当成对她的莫大侮辱。她用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亲手把婶娘押到了刑场。当大队贫协主席兼“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提醒她要“特殊对待”时，姑娘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说罢，抄起刀来，对准了他的婶娘。婶娘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冰霜的侄女问道：**“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姑娘大喝一声：**“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砍了下来。

当然，她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受到了无形的道德审判。尽管她长得很漂亮，附近几十里的后生没有人敢娶她。容貌衰谢多年后，她才被外地一位因出身不好、三十多岁尚未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原作者说，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可怜她，可怜她这个可咒的乡下女孩！”**

奸杀无名女。一个资料，记录了东门乡政府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所讲的一段往事：

1967 年 9 月 2 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个过路的女青年。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奸毕，有

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以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到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把她打到深水中淹死。

读到这里，笔者已泪流满面：她，一个可怜的姑娘，可能刚刚逃出狼穴，旋又堕入了虎口，一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没有她立身之地？无法否认的是：那四个流氓无产者的狰狞嘴脸，使她倍感恐怖，因而，在石块的无情追打下，软弱无助的她，带着愤懑，带着屈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向深水区蹚去……

轮奸少妇。她，隐去她的名字，是朱家湾一个贫农的女儿。去年 10 月，才与田广洞大队的一个为人厚道、能吃苦耐劳、模样不错的地主子弟**陈高肖**结了婚。8 月 26 日晚上，丈夫被人叫走。不一会儿，噩耗传来，丈夫被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等人用乱棍打死，又砍掉了头。突然飞来的横祸，吓得她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她乘机逃回了娘家。少妇的出逃，引发了民兵们的不满。他们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什么叫“开大锅饭”？就是轮奸。于是，经党支部批准，逃跑到娘家的少妇被抓回来。这个被抓回来的“地主婆”，呼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旋遭 12 个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奸后，少妇又被强行嫁给老光棍陈高月，遂又遭奸污。被野兽般蹂躏的少妇，神志稍稍清醒，便又乘机逃回娘家。轮奸少妇的贫下中农都是些什么人？后来“处遗办”查明，按施暴顺序排列，他们是：

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贫协主席；三号，**陈锡位**，有犯罪前科；四号，**陈高和**，涉嫌杀人犯；五号，**陈吉光**，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赌棍；七号，**郑 XX**，游手好闲；八号，**陈 XX**，赌徒；九号，**陈 XX**，有贪污前科；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有奸污妇女前科。——“伟大领袖”用**“群众专政”**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就放出了这些恶棍！

支部逼婚。也是 8 月 26 日，在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党支部**周书记**亲自领导并指挥了一场革命：继上午在葫芦岩洞口搞掉了 21 个“大老虎”后，晚上又在船上沉溺了 31 个“小老虎”，成功地取得了“对敌斗争”的完全胜利。在这场革命中，**何兴盛**是当之无愧的头号杀手。之所以说周书记指挥的革命“成功地”和“完全胜利”，是因为在全大队 53 个“阶级敌人”中，已“成功地”杀掉了 52 个，留下的一个“敌人”，也被“成功地”“改造”成贫农，从而达到了“完全胜利”的目的。那留下来的一个“敌人”叫**张秀华**，是地主的儿媳妇。在那可怕的一天里，她一下子就失掉 5 个亲人：丈夫已死于葫芦岩，婆母和三个孩子，也被淹死在潇水中。她之所以能被留下，完全是因为贫农**蒋癞子**看上了她。蒋癞子虽然癞，又好吃懒做，

但他是三代单传贫农，至今已 37 岁，还是光棍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该为蒋癞子们“**谋幸福，呼儿咳哟**”。在蒋癞子的苦苦请求下，为了繁衍贫农后代的革命需要，党支部最终“呼儿咳哟”地留下张秀华。可怜张秀华为了活命，麻木了，被征服了。当她被蒋癞子搂到怀里时，还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个蒋癞子从她怀里夺走了才 56 天的孩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她完全麻木了，无可奈何地成了仇人任意发泄的工具，成了仇人蒋癞子繁衍贫农后代的一台肉欲机！

宁死不嫁。在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为了苟活，像张秀华一样在刀口下屈从嫁人。但在沉沉黑夜里，也有闪耀的星光，也有威武不屈的烈女。

在竹山园子刑场，小学老师右派分子**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处决了，留下了一个女儿**向丽丽**。她，向丽丽，一个刚刚十八岁、风华正茂、天生丽质的女孩，被一个 30 多岁的穷光棍看上了。贫农光棍像蒋癞子一样，向大队党支部苦苦请求。出于繁衍贫农后代的革命需要，支部书记亲点“留下”；但向丽丽死活不嫁。于是，大队党支部又决定，把她这个不识抬举的“狗崽子”押往竹山园子——杀！在押解路上，许多社员看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临刑前，刽子手们给了她一个最后机会：“**答应嫁，就放你**！”她仍坚定地喊道：“**我不嫁！我要父母！**” 一个刽子手气急败坏地举起锄头，对准她的头就是一锄，刹那间，脑浆四溅……

比起向丽丽，三个姐妹的命运要幸运得多。三姐妹分别叫**涂月华**、**涂美珍**和**涂秋蕾**，她们在同一个大队里，都只有 17 岁，三人的父母都被杀害了，都成了孤女。根据几家贫下中农的请求，党支部做出了令三孤女嫁人的决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分别嫁给本队的三个贫下中农，其中一个是傻子。这是大队党支部对她们三个人的“恩赐”。但三姐妹并不领情，没一个表态愿嫁。大队头头们火了，发出威胁说：“**不嫁就杀！**”三姐妹竟异口同声顶撞说：“**杀了也不嫁！**”大概是风向在变，头头们嘴硬手有些软了，三姐妹得以死里逃生，意外保全了自己。

多余的史话：像向丽丽这样宁死不屈的烈女，在封建时代是要给她立牌坊的；但在社会主义“新社会”，谁敢为她树碑立传？

贼瞟母亲下身。还是那个 1967 年 8 月 26 日。下午，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口——一个天然的坟墓走去。老妇人叫**唐长凤**，一个地主的寡妇。在十几年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她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含垢忍辱的耐力，拉扯大了三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又养

育下了两儿两女。她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的清福了。然而，道县八月的腥风血雨，毁灭了这个传统老人的最大心愿。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一齐被拉出去杀掉，推到了这个天然坟墓的洞底。她想：儿孙们都死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了好，死了干净！在押向天然坟墓的黄泉路上，她走得安然，平静，无牵无挂。当她快走到洞口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脱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民兵和旁观者贼眼溜溜地嘻嘻唏唏。她本能地“啊”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同时乞求刽子手说：**“求求你们，松松绑，让我提起裤子！”**作为人，她知道羞怯，知道维护人的尊严。然而，民兵们却嬉皮笑脸地对她说：“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快走！”唐长凤哭了。她再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民兵们用《毛主席语录》“驳倒”了老人的尊严。而后，民兵们一边骂着、嬉笑着、贼眉溜眼地乜斜着，一边推着老人快走。就这样，唐长凤被迫光着下身，一步一步走到生命的终点！

三光政策。你可能听说过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因为“主旋律”经常在宣传；你可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光政策”闻所未闻，因为“主旋律”禁止人们回忆和书写。下面的现实给你提供了些什么，请你自断。

在道县黑八月的腥风血雨中，桥头大队的右派分子**周文棟**，当一家大小 5 口全部被杀光后，家中留下的一切，当晚便被村民吃光、分光。道县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说，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惨遭灭门的当晚，周文棟家灯火通明，桥头大队的党员、干部和民兵们，一窝蜂似的来到周家，跟着吃，帮着分，忙着拿。他们先把周家的鸡、鸭和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宰杀后，支起炉灶，进行煎炒烹饪，然后大吃大喝起来。酒足饭饱后，他们又将周家的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衣被、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除不动产房屋外，像土改运动中分胜利果实一样，把周家分得干干净净！

对右派周文棟一户这种杀光、吃光、分光的三光政策，在道县并非桥头大队一家。

在河滩大队，当“成功地”杀掉 52 个“大小老虎”和把一个四类分子儿媳“改造”成贫农老婆后，当晚就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对灭门的几户财产，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分配。第二天，他们用抄来的鸡、鸭和肥猪，在晒谷坪上摆开了庆功宴。大队党支部**周书记**同文革主任兼“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一起，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敬酒道：**“昨天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现在，请大家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干杯！”**周书记仰头干了第一杯。尔后，他每敬一次酒，都要情不

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好事者也先后举杯回敬周书记、何主任。

毛泽东“**群众专政**”的暴虐，使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残忍，相形见绌。

5、题外话星空

⑴、正义的闪光

当道县“黑八月”的恐怖正在向四周扩散的时候，当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等市县到处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候，当五类分子和子女们被红色恐怖搞得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桂阳二中教师**周家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了一个 13 人的“反屠杀代表团”，北上进京告御状。

在 13 个人中，有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是死里逃生的三个人证之一。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捆着，强迫跪在薯窖边等待处决。只听一个刽子手说，吃了晚饭再来杀，另一个则说，杀了再吃。只见一刀从背后砍来，在刀刃砍进皮肤的一刹那，他顺势倒进薯窖里，砸在几具死尸上。他发现，先被砍倒的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在受重伤的弟弟帮助下，他爬出薯窖。王永和爬到大队**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制止不住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永和忙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老支书背着他来到公路上，搭上过路车，把他送到桂阳县医院。

代表团还从双牌水库和潇水里提取的水样做标本，带到北京。后经化验，标本含血量达千分之三。

北上途中，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到达北京后，他们大声吁请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关注湘南大屠杀；他们还把“湖南屠杀”简报送入中南海。强大的声势和压力，终于震动了中南海，使他们不得不摇身变成菩萨。与中央文革同在一线指挥文化大革命的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下令四十七军进驻零陵，制止以道县为中心的大屠杀。湘南大屠杀在周恩来、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下，终于被制止了。侥幸存活下来的五类分子和他的子女们，都感动得高呼起“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来!

⑵、迟到的通告

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开始的大屠杀，在正义人士的状告下，终于“感动”了“上帝”！1967 年 9 月 27 日，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紧急通告》20 天后，即 10 月 17 日，大屠杀才被控制。

⑶、我不能超越时代

正当县里召开会议讨论停止杀人问题时，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这个从土改、镇反、大跃进等运动的大砍大杀中成长起来的基层领导干部，为了证明革命立场坚定，闻风又组织了一次突击杀人行动。他率领 120 名民兵，三天突击杀了 569 人。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当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被判十年徒刑。对此，这个血债累累罪有应得的流氓无产者，在服刑中无限委屈地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尽管袁礼甫罪有应得，甚至有人愤怒地骂他是罪大恶极的魔鬼，尽管

他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他说“**我不能超越时代**”却切中“伟大、光荣、正确”作祟的要害。因为，这个滥杀无辜的时代，是“伟大领袖”一手造成的！

⑷、历史的记录

1966 年，当“伟大领袖”号召破“**四旧**”、“**横扫**”和造反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以北京大兴县为代表的“**红八月**”农村大屠杀，仅大兴县一地，就有 325 个农民惨遭屠杀。那次大屠杀传出后，被“伟光正”制止了。1967 年，当“伟大领袖”又号召“**内战**”、“**群众专政**”时，全国各地又出现了以湘南道县为代表的“**黑八月**”农村大屠杀。仅湖南零陵地区，就有 9,093 个农民遇害。这次大屠杀传出后，又被“伟光正”制止了。

这两次农村大屠杀传出后，都被“伟光正”制止了，体现他们恩威兼施的统治权术：**他们既是代表革命撕毁法律的怂恿纵火者，又是代表”正义”制止乱法的“积极”灭火者。**

常言道：“只有再一再二，无有再三再四。”两次大屠杀被制止后，理应不会再有第三次大屠杀，然而，到了 1968 年，中华大地又迎来一轮新的、规模更大的大屠杀，这就是以广西为代表的“**韦六八**”大屠杀——1968 年广西革委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在广西农村的大屠杀，仅广西一省就导致 4～6 万农民死亡，200～300 人被吃掉。（见本章**二**）

在中共领导下的**和平环境里**，这种“号召→屠杀→制止＝＞又号召→又屠杀→又制止≡＞再号召→再屠杀→再制止”的悲剧，年复一年地不断发生；而其组织屠杀的领导干部，1966 年是公社一级，1967 年提高到县一级，1968 年又蹿升到省一级，这种不断升级的“提高”和“蹿升”，难道不能令那些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深醒吗？

⑸、当“卖国贼”和“亡国奴”的经历

当笔者从一些资料里摘录、编辑、评述上述屠杀事件时，双手颤抖得几乎无法自制。人们不禁要问，在和平的年代里，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野蛮、残忍？是我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基因的遗传？还是马列毛先生的仇恨主义在作祟？这不由自主地使笔者想起了那遥远的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

那是在 1944 年的洛阳，笔者九岁。鉴于南京大屠杀的教训，在日军攻陷洛阳前，十万城中市民闻风逃离家园，国民党 15 军撤退后，留给鬼子的是一座空城。笔者随舅父母仓皇出逃乡下，在三个村子里展转流亡了三个多月。国民党撤走了，鬼子尚未进村，没听说过共产党，也没有见过以村

民为肉盾、“打了就跑”的游击队，那里的农村出现了权力真空。然而，真空很快被中华文明自动填充。在乡间士绅的安排下，邻里间包括像我们这些逃难者，都能相互关照，和睦相处，村民生活、生产都能照常进行，连村里私塾都能照常上课。三个多月里，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一起仇杀、奸杀和抢劫事件。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唤醒，朦胧中见两个舅父非常紧张，正在召唤我的五个表姐表姨往一个矮洞里爬（她们都处在鲜花般的年令段），然后用柴禾堆把洞口堵住。原来鬼子要进村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坦克开到村寨的大门口，又退了回去。第二天，“空气”十分紧张，年轻的妇女都躲了起来，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点心糖果之类好吃的东西，有的上面还插着一面纸糊的像膏药一样的鬼子太阳旗。一夜没合眼的舅父，脸色苍白，借了一张桌子，也忙着往上摆放好吃的。不记得是谁塞给了我一个纸糊“膏药”旗，要我拿着。**显然，村里人都作好了“欢迎”鬼子进村的准备**：摆设糕点面食以迎日军，俨如当年毛泽东所赞“**箪食壶浆以迎红军**”那样。那一天，我随着长辈们当了一天小“卖国贼”，也没见鬼子进村。第三天，来了几个“皇协军”（伪军），和大人们嘀咕了一下，紧张“空气”才算缓和下来，表姐表姨们才敢爬出黑洞。三个月后，鬼子展开“和平”攻势，鼓吹“**中日亲善，打倒英美**”。在他们的软硬兼施下，特别是在相对宽容的同化政策诱惑下，逃到乡下的城里人，都陆续应召返城。洛阳街道又热闹起来。学校也纷纷开学，像当年满人用辫子来征服汉人一样，设日语为主课以同化中国人。在“中日亲善”的攻势中，每逢节假日，家家户户门口两边，都必须插上两面国旗：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面日本帝国的“膏药”旗。就这样，我又随着长辈们，当了一年多的小“亡国奴”。

在记忆中的童年时代，笔者虽曾目睹过中国人有奴性基因的表现，却未曾见过中国人有野蛮、残忍基因之乖张。——童年所见所闻，埋在心底数十年。今日借书外泄，静候“爱国者”的叱骂！

二、“群众专政”在广西——文革第四轮大屠杀

（本节根据以下数十篇资料撰写：《广西“文革”时的吃人事件》《红色纪念碑》《韦国清南宁屠城四二二全军覆没》《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官方文书：文革中的杀人记录(广西)》《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广西文革杀人记录》《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等）

1、广西魔头韦国清

魔头**韦国清**，原名韦邦宽，壮族，1913 年生于广西东兰县，狎称“广西王”。文革前，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区政府主席，文革中，历任区“革筹组”组长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文革中，他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紧随周恩来的指挥棒转，在广西屠杀了约**18万**“阶级敌人”，是广西抗战八年中死亡115,159人的1.56倍，当上了全国省级第一杀人魔头。据《广西文革大事记》记载：1968年5月，在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委会后的几天里，全区县以下农村，共杀死“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等各种“阶级敌人”**18,000多人**。1968年7～8月的一个多月中，又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屠杀“坏人”**84,000多**人。由于革命立场坚定、“**对敌人狠**”，杀人不眨眼，很快荣升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1989年6月14日，他恶贯满盈，病死于北京。

韦国清是个标准的、忠诚的共产党党员。1928年，十五岁就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1929年12月，他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成为红七军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一个排长。在井冈山时代，他参加了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中共撤出湘赣根据地，参加了向陕北逃遁的“长征”。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第3师第9旅政治委员，第4师第9旅旅长，第4师副师长等职。1943年春，善搞内战的韦国清，率九旅主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主攻据守山子头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部队，歼灭其总部并生俘韩德勤。歼灭国民党韩德勤部队的胜利，为新四军报了“皖南事件”的一箭之仇，又为新四军在苏北开僻根据地借以为“保存实力、积极发展”的战略，“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为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解放”后，率领军事顾问团援越，帮助越共胡志明打胜了越南奠边府战役，为建立北越政权做出了贡献。归国后，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韦国清是个文革中的不倒翁，是个唯一在原地从未下过台、从未靠过边又始终站在台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区委第一书记。在中共高级大员中，他是个善于钻营、工于心计又心狠手辣的人材。韦国清之所以能稳住他“广西王”的位置，与他对毛泽东忠贞不二、百般献媚分不开。1956至1966年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到南宁来冬泳冬憩。韦国清投其所好，拨巨款在邕江两岸修建了明园和西园两座大花园，配以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供毛选择休闲、娱乐和纵欲，因而被毛誉之为“**我的广西老朋友**”。文革中，在“老朋友”的保护下，他涉险滩、渡急流而安然无恙。曾声嘶力竭地叫喊过打倒邓小平的他，当洞悉邓小平的潜在价值后，便改弦更张，力主邓小平复出，受到邓的赞许。他看风转舵的痞气，又确保了他的仕途得意。

文革伊始，作为“广西王”的韦国清，首当其冲，被“四二二”左派

造反派打成了广西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韦国清同各地一把手一样，很快把保守派组织了起来，与左派造反派相抗横。在他的支持下，广西党团基础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工人、民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成立了右派造反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这一派人多势众，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其中许多是毛的“**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是韦国清政权的支柱，因而是韦国清名符其实的“御林军”。左派造反派“**四二二**”呢？由于它是以与韦国清政权素有芥蒂的或出身不太好的大中学校学生、干部、工人和农民群众组成，其中也不乏痞子、流氓无产者，很快被韦国清打成“**牛鬼蛇神总司令部**”，并加以取缔。

取缔左派造反派“四二二”，显然背离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周恩来和左派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四二二”重整旗鼓，不断冲击自治区党政和军区，向韦国清发难。1967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接见广西双方代表时，批评了韦国清和省军区。周表态说，“四二二”是革命造反组织；批评保韦派“联指”的“**方向错了**”、“**越搞越不象话**”了；批评省军区“**压制了**”“四二二”，“**把‘工总’解散是错的**”。周的表态和批评，使韦国清处于困难之中：尽管他暗地里还在鼓动“联指”对着干，但明里不得不表示支持仇敌“四二二”。由是，广西派性武斗愈演愈烈。在周恩来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在当年 11 月 6 日写了个“**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报告，上报中央；但支持“联指”依旧。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赤文化，已溶化在韦国清的血液中。

进入 1968 年，善于窥测上层权力斗争方向的韦国清，察觉风向在逐渐变化，毛泽东正在不断地向党内右派当权派、向右派将领伸出橄榄枝；特别是当毛泽东 4 月 8 日发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最高指示”后，他敏锐地察觉,“老朋友”斗争大方向已开始从党内“走资派”向传统阶级敌人身上转，左派造反派的使命行将结束，终将被抛弃。于是，他抛开“检讨”，支持各县武装部武装“联指”，支持“联指”冲击军械仓库，夺取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为了给剿灭“四二二”和实行“**群众专政**”制造借口，他一手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号召“**刮起十二级台风**”进行“**群众专政**”，指导“联指”全面清剿“广西分团”的“四二二”，毫不手软地镇压包括“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在内的一切“阶级敌人”。《七三布告》公布后，他乘风借势，派部队协同“联指”作战，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清剿和屠杀。

2．左派“四二二”的末日

1967 年 7 月到 8 月，毛泽东虽然知道“**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造反派，但他深信，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左派造反派的支持，可以迅速改变少数派的被动局面。因此，他信心十足地做出了“**武装左派**”组建第二武装和发动他的“群众”进行“**群众专政**”的两项重大决策。但当听到周恩来“清君侧”暗示后，权谋大师立即做出了“清江侧”的决定，抛出爱臣王、关、戚，做出了与右派将领妥协的姿态。显然，这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故技重试，借以先稳住军队，再徐图良策。为了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1968 年春，权谋大师又做出了“清周侧”的决定，抛出了爱将杨、余、傅，强化了林彪等左派将领对军队的领导。从此，林彪也开始走上了不归途。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打得并不如意。他所期待的类于重庆左派完全胜利的“一二四”事件并没有在各地重演。各省党政军当权人都在玩弄权术，**或**打着“支左”的旗号“支右”，**或**借着武装左派的名义武装听话的右派，**或**将中央文革支持的左派一分为二，变成势不两立、相互争斗的两大派组织，**或**武装左派为我所有，变成打击政敌的工具，等等。到了 1968 年，全国已告别了冷兵器内战时代，进入了除飞机、导弹外的现代化热兵器内战时代。武斗双方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旁观者谁也分不清谁左、谁右。到此，天下一片混战，终于达到了毛泽东向往已久的“**天下大乱**”的境界。

但要实现毛的“**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谈何容易？1967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本想乱中夺权，使党内左派主导国家一切的毛泽东，到此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内战已经失控，如不加以控制，一旦那些骄横狂躁的右派将领们和党内右派当权派联起手来，势必发动兵变。到那时，不仅文革毁于一旦，他缔造的“新中国”也将分崩离析。但权谋大师的天才在于：他清楚地知道，对于右派当权派和将领们来说，**权力高于一切，亦即权力高于主义，高于路线，高于法律，高于道德**，一句话，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建立在权力拜物教基础之上的。因此，只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转移到枪口一致对外上来，积极恢复秩序，满足他们权力上的追求，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于是，权谋大师在抛出爱臣王、关、戚之后，便发明了“继续革命”理论，开始了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的进程。为此，他频频向党内右派伸出橄榄枝：在最大限度孤立刘少奇党内右派集团和释放出区别对待邓小平和解信号的同时，适时地、逐步地“解放”了很多被打倒了的党内右派当权派，把他们“三结合”到各地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以分享权力来共同控制局势。

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就要做出牺牲。于是，他又做出另一个重

大决定：适时地抛弃左派造反派。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左派造反派被抛弃的命运在所难免。**对左派造反派，毛泽东早有定论**：左派造反派是股可利用不可重用的势力，他们只能充当向右派当权派即“走资派”夺权的主力，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诉求，注定与新生政权格格不入，终会被抛弃或镇压。1967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在这里，他点明“跳出来”不是指共产党官员、当权派，而是在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即左派造反派。**对右派造反派，毛泽东也早有定论**：只要他们能摆脱党内右派的控制，并反戈一击，紧紧跟着他，去夺取那些敢于与他分庭抗礼的“走资派”的权，他们同过去一样，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依靠的基础力量。

一年前还被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赞誉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四二二”左派造反派，其利用价值已消耗殆尽：在毛泽东新的**妥协、分享权力**的决策下，他们被扣上了**“牛鬼蛇神总司令部”**和**“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两顶大帽子，倏忽之间，他们便从一个“响当当”的革命派，变成了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组织”**。尽管“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事件到十五年后的 1983 年，被中共彻底平反。

196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准，发布了针对广西左派造反派**“四二二”**的《**七三布告**》。《布告》以严厉的措词命令“四二二”：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接着，1968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批准，针对陕西出现的左派专业武斗队，发布了《**七二四布告**》，进一步敲打“四二二”。《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紧接着，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北京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警告曾为他夺权而冲锋陷阵的左派领袖们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尽管五大领袖争辩说，把杀人放火都归到他们头上“不公平”，他还是毫不留情地警告这些痞子、流氓无产者：“**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此刻，毛泽东所借助红卫兵造反派的那口屠刀的使命已经完成，“狡兔死，走狗烹”，他的痞性使他毫不犹豫地推翻了 1966 年 8 月 22 日他批准公安部下达的《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平民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召见五大领袖的决定，使党内右派当权派扬眉吐气，他们同右派将领一起，开始了围剿左派造反派战争行动。广西韦国清是这种行动的典型代表。

3.《七三布告》前的“群众专政”

鼓吹“**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的确把全面内战鼓动了起来。但到 1967 年秋后，他发现内战中没有占多少便宜的左派，不听话的倾向有所发展。于是，他改弦更张，加快了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的进程，开始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的哲学观是“**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理无常是”的“一分为二”哲学，却又使他常常变成外因决定论者。当 1960 年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消息传入中南海时，毛泽东本能地一拍脑袋就知，这是“外因”“地富反坏右”搞破坏的结果，与他的“三面红旗”的“内因”政策无关。于是他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

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 1967 年的混战中，他本能再现，一拍脑袋便知，混战是“外因”“**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搞破坏的结果，与他的“**全面内战**”、武力“**夺权**”号召等“内因”无关。1967 年 12 月 18 日，他对来访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接着，他便做出结论：“**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显然，在这里，“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已把“外因”变成了“根据”。因此，为了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他要卸磨杀驴，煎烹走狗。自此，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大方向”开始由向“走资派”武力夺权转到镇压传统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上来——左派造反派面临灭顶之灾。

听到这个“最高指示”后，党内左、中、右派大多数都能团结对敌，因为，镇压 18 年来被他们反复清算过多次的弱势群体，是他们共同的理念和本能。当然，也会有少数较有良心者，他们反对那些右派痞子、流氓无产者的胡作非为；但当听到毛泽东在 5 月 11 日发表的支持右派的讲话后，为了安全，他们只好变成了旁观者。因为，在那次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警告他们：“**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他们十分清楚，此时毛所指的“群众”，就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右派痞子和流氓无产者。

在镇压左派“四二二”和弱势群体上，韦国清力拔头筹，成为利用毛的右派“**群众**”进行“**群众专政**”最为突出的佼佼者！据史料记载：

1968 年 2 月 6 日，玉林地区右派“联指”组织 2,000 多人，配备步枪 800 多支，轻重机枪 26 挺，冲锋枪 407 支，各种炮 8 门，手枪 164 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左派“四二二”的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四二二”派 13 名俘虏，全部枪杀。

从 2 月 7 日至 5 月 27 日，**上思县**大搞“**群众专政**”，揪斗左派和弱势群众 1,125 人，打死 39 人。

2 月 11 日至 20 日，**灵山县**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期间，打死 3 人，陈尸示众。会议号召对弱势者“阶级敌人”进行“**群众专政**”。会中，新圩公社代表们，一马当先，晚上赶回公社，力杀 5 个“阶级敌人”，第二天一早。赶回县城邀功，“捷报”传于会议中。

2 月 16 日，右派“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时，抓获俘虏 36 人，押解途中，随意处决了 15 人。

2 月 25 日至 28 日，**大新县**召开了县区村“抓促”领导、厂矿武装部长和民兵营长会议。会议由武装部长**周永山**主持，政委**韩奇传**达了区革筹小组领导人实行“**群众专政**”的讲话。会后的 17 天里，全县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等弱势者 239 人。

3 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右派“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数千武装人员，围攻“造反大军”据点。8 日“造反大军”的支持着近万人，从城里撤出时，被枪杀数十人。

1968 年 3 月 16 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在成立大会上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和坏头头。从 3 月 8 日至 27 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 190 多起杀人事件，共屠杀弱势者 630 多人。其中祥元乡共杀 46 人，造成 16 户无男人，9 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迫嫁于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3 月 19 日，**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于是，在筹备成立县革委会期间，他们效法天等县，一口气就屠杀了弱势者 94 人。

面对天等、崇左县“**群众专政**”的滥杀行径，在 7 月 5 日的专区革委会上，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赞扬道：“**天等县是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则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南宁专区革委会对天等县滥杀无辜的坚决支持，“**群众专政**”旋在南宁专区展开，滥杀无辜迅即扩散到全专区各个角落，数十人惨遭杀害。

3 月 18 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中写道：“**3 月 5 日至 12 日全专区共杀‘阶级敌人’2,000 左右，其中灵山县杀 1,000 多人**。”

3 月 27 日到 5 月 22 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原乡长**覃锡明**等人，分 12 批用枪棍、锄头打死“阶级敌人”40 人，有 13 户男性全被杀光。在被杀者中，未成年的“阶级敌人”12 人；还有两个特殊的“阶级敌人”，

一个是双目失明老妇人，一个是未满 10 个月的婴儿。

三月下旬，**陆川县**右派“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围剿“四二二”派。“四二二”派被杀 110 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支持“四二二”派的县委书记**周履光**等 8 人，被枪杀后，又用炸药毁尸。

4 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四二二”派的部分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后，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和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组织了数百民兵和右派“联指”武装，对其进行围剿。役毕，全屯 46 户有 30 户遭“**群众专政**”，被杀弱势者 56 人；全屯 140 间民房被烧毁 133 间，44 户无家可归。

4 月 13 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会后的 10 天里，捕杀“四二二”派和“阶级敌人”230 多人。由于中共贵县县委“**群众专政**”的示范，各公社纷纷效法，成立了“**群众专政**”组织“贫下中农法庭”；他们召开杀人大会，先后公开枪杀“阶级敌人”38 人，斗死 90 多人。

4 月 21 日，**龙州县**右派“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了“四二二”派的工商联据点，“俘虏”90 多人，枪杀 12 人。从 4 月至 6 月的两个月中，共打死、杀死弱势者 177 人，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的 40%。

4 月 23 日，**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布置“**刮十二级台风**”进行“**群众专政**”问题。专区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号召：在“反击右倾反案风”、“击退二月逆流”中要“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在文革中死亡的 10,156 人中，大部分是在“刮十二级台风”进行“**群众专政**”中遇难的。其中，**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后，掀起了“**群众专政**”高潮。全县 11 个公社的 155 个大队中，有 154 个大队杀了人。到 29 日，全县共屠杀无辜“阶级敌人”1,229 人，陈尸百里。

又据官方“**处理文化革命遗留问题办公室**”统计：到 5 月 11 日，全自治区“**群众专政**”中惨杀“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军”、“五类分子”及其子女 18,000 多人。

1968 年 5 月 17 日，韦国清根据“最高指示”，虚构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当“破获”该案《报告》得到了毛、林、周等中央领导首肯后，韦国清便拿到了对“四二二”和弱势群体进行“**群众专政**”的“尚方宝剑”，遂将大屠杀推向一个新高潮。

5 月 24 日，梧州地市右派“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 5,600 多人的武装，以到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围剿“四二二”派为名，枪杀无辜群众 800 多人。

6 月 12 日，桂林右派“联指”，在桂林南站东方红饭店前的“看守所”里，打死 35 人，致伤致残 75 人。7 月 14 日中午，平乐县“联指”**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 24 人，冲到“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 12 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枪杀。

6 月 19 日下午，**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时，布置杀人，煽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把县委书记**赵永禧**等三十多干部、教师和学生，拉到大街上游斗。赵永禧等 11 人当场被打死，20 多人被打伤致残。“积代会”后，全县各公社掀起了“**群众专政**”高潮，数百名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惨遭枪杀或自杀。其间，**河池地区**的包括凌云县在内的十个县，共打死、逼死 7,864 人，遭关押毒打者有数万人之多！罪大恶极的王德堂，这个被韦国清表彰为省军区“支左”的好干部，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 6 名被害人的妻子和女学生。

1968 年的武鸣县，在“**群众专政**”中，就杀死弱势者各类分子 2, 463 人。其中，6 月中旬到 7 月初的一次“**行动**”中，就杀死 1, 546 人，为全省杀人之最。

1968 年 6 月至 8 月，**融安县**右派“联指”，在部队、县革委会以及县人武部的武力支持下，大肆屠杀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其中包括当时被称为“阶级敌人”的“**二十一种人**”。那 21 种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巫（婆）、道（士）、尼（姑）、流（氓犯）、小商、小贩、娼、僧。1969 年 12 月，融安县公检法军管会上报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打死“阶级敌人”1,089 名，自杀 126 名。

由此可见，在《七三布告》前，韦魔屠杀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应在 25,000 人以上。

4.《七三布告》后的“群众专政”

1968 年 7 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已宣判了广西“四二二”左派造反派的死刑，而《七二四布告》的

发布，则宣判了全国各地左派造反派的死刑。两个布告公布后，广西“联指”与“四二二”之间的派性武斗，随之转变为政府派军队、民兵与右派“联指”联合在一起对“四二二”左派造反派的武装镇压。此时的“联指”等右派，也随之名正言顺地转变成新的官僚特权阶级的打手和炮灰。

《七三布告》后，得到指令的韦国清，加快了镇压“四二二”左派的军事部署。

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为了一举剿灭对手“四二二”派，从 1968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3 日，在《广西日报》上连发九篇社论。社论祭起中共党的传家宝——**煽动仇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敌人，**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号召毫不手软地屠戮所谓牛鬼蛇神的“**二十一种人**”。九篇社论史称“杀人九论”。

《七三布告》发表后，“四二二”派的头头们，这些昔日的“**革命先锋**”们，当年以“**追随毛主席起来造反，为保卫毛主席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为己任，大有唯我革命、唯我响当当的自豪感；然而，两年后的今天，他们却变成了“**革命对象**”，陷入了“狡兔未死烹走狗”的惨境。上当受骗的感觉，使他们无法接受失败这一严酷现实。于是，他们中间的死硬分子，便孤注一掷地“悲壮应战”，直到“悲壮牺牲”!

据官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下称《年表》)记载，7 月 24 日，**柳州军分区**经广州军区批准，调动八县和两矿、一厂、一郊的右派“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左派“四二二”据点，共打死 146 人。是役，政府开支 104,000 多元，消耗粮食 53,583 斤。

同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了上述消息后，全自治区掀起了对“敌”实行“**群众专政**”新高潮：从城镇到农村，再次刮起“**十二级台风**”的杀人狂飙。

宾阳县在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在成批杀人。7 月 27 日，新宾镇墟日，被压到墟集上游街的 14 个“四类分子”，全部当场打死。29 日，县革委会主任、6949 部队副师长**王建勋，**在县政法会上推广新宾镇杀人经验时说：“**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教育意义较大**。”显然，他是土改成长起来的中共干部，那时就有不杀地主不能教育农民的口号。宾阳有 4,000 多“四类分子”。他鼓动说：“**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干光了，不花一枪一弹**。”他下令说：“**这次行动，时间三天。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据《年表》记载，从 7 月 26 日到 8 月 6 日的十一天里，在他和县革委会副

主任、县人武部副政委**王贵增**的直接指挥下，全县打死“阶级敌人”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民、居民3,441人，有3家全部男性被杀，170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4户斩草除根、全家灭绝。处决手段除少数几个枪决外，其他处决手段是刀砍、绳勒、矛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等等，几乎全部实现了王师长“**不花一枪一弹**”的“指导”。显然，这是自上而下地、有政府地、有组织地杀人。没有韦魔头的指示或暗授，王师长敢这么干吗？由于杀人有功，文革后期，他被韦魔头提拔为广州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就足已证明。

1968年7月，韦国清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明确支持下，调动6912部队、6936部队、6966部队、广西军区警卫营、南宁军分区独立营和两个炮兵连等部队，会同南宁、玉林、陆川、贵县、马山、邕宁、横县、崇左、武鸣、上林等市县的右派“联指”武装，数万大军联合围剿南宁左派“四二二”。据《年表》记载，7月16日中午12时到晚上，部队和“联指”在南宁市区，用炮火将“四二二”派控制的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十几条街道，轰成一片火海，炸成一片废墟。到8月5日，战斗基本结束，共打死1,470人，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幢（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1万多户的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达六千万元以上。是役，抓获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人，被打成“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头头”等罪犯，交各县拉回去“处理”。在“处理”中，有2,324人被打死，246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据一位知情者回忆：

就在二舅逃出南宁的这一天，被关押在二中的反革命，绝大多数被一个接一个用麻绳拴着，一车车拉到邕江边用机枪射死！足足三天，邕江河畔枪声不断。那几天，河上漂满了尸体，江水全都染成了红色，西津水电站连夜开闸，好多天过去，仍有源源不断的尸体向下游冲去。一具具尸体从上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

围剿战斗基本结束后，有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四二二”派成员和他们的家属，逃进市郊一座有独立供水、供电、通风系统和防毒设施的地下人防工程里坚守。当时，正值邕江大水，超过了1958年的历史最高水位74.71米。8月8日，“联指”前线指挥部，在请示了韦国清后，在邕江上游开闸放水，将躲藏在地下人防工程中的数千人，大部分溺毙。几天后大水退去，解放军从地下人防工事里清理出数千具发臭的尸体。南宁市武斗到此宣告结束。

在**上林县**，“联指”总部分别于8月2日在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

8 月 7 日在乔贤区召开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先后打死“四二二”成员和“五类分子”24 人、43 人、72 人，共 139 人。杀人手段之野蛮之残忍，为世人罕见。例如：16 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联指”阵亡民兵潘连标墓地，当场枪杀陪祭；古楼大队潘成昌的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被打死后，不准潘成昌收尸埋葬，强迫他拿出柴火 500 斤，黄豆 5 斤，火油 5 斤，用火烧两个儿子和的两个兄弟的尸体；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因持“四二二”观点，被铁钉钉死在墙壁上；令人震惊的是，高长大队大队长**周 xx**，因持“四二二”观点，一家五个党员全部被杀，周的 18 岁女儿，赤身吊在梁上，下用煤油烧其阴毛，然后又叫一民兵当众强奸之。文革后，其主谋者，仅判 20 年徒刑。

8 月 10 日，**河池军分**区奉韦国清之命，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的“联指”武装，会同 6911 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 4,400 多人，围剿逃到凤山县的南山和北山属“四二二”派的“七二九”人员，抓捕了一万多人，枪杀 1,016 人。25 日，凤山县革委会在枪杀“七二九”的腥风血雨后，宣告成立。

据《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 年》记载：8 月 10 日，以**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的融安县革委会成立。15 日，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镇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五人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在长安镇大刮“**十二级台风**”，并通过了杀人名单。16 日，长安镇圩日的早上五时，先枪杀了长安贫民**周老关**；上午八时，又杀了县教育局干部**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 26 人游街示众，当天在大街上，用木棒、铁棍、转头、石块，活活打死了 21 人；21 日，又在街上打死了 56 人。“**十二级台风**”的腥风血雨，使整个长安镇陷入红色恐怖中。在韦国清的领导下，红色恐怖的“十二级台风”，正在刮向融安县各个角落。8 月 21 日，融安县革委会副主任韦宗芬，在县革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党和政府，赞扬了长安镇打死 77 人的革命行动，是个“值得推广的好经验”，号召全县学习。于是，红色恐怖迅猛扩展，从 8 月 21～23 日的短短三天里，融安全县就又打死了 1,006 人。其中，大将乡的龙妙街为最，被后人称之为"十八寡妇街"。

洒在长安镇街头鲜血的人，都属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弱势人群。在官方的机密档案中，只有死者数字，没有名单。为了抗拒遗忘，民间记录了被打死的 77 人中的 60 人名单。他们是：

公靖波、**锺维錞**、**岳朗**，县财政局干部；
周富云，县委工作队；
黎继昌，长安税所公务员；
莫海明，县教育局干部；

朱伯初，县工商联主任；
殷远芳，县邮电局职工；
向金荣，县粮食局直属粮库工人；
覃美荣，长安粮所干部，复员军人；
黄　斌，大巷粮所干部；
胡　雄，县油脂公司干部；
黎　锡，县粮油加工厂工人；
锺玉明，县粮油加工厂技术员，转业军人；
刘显扬、李智元，县粮油加工厂干部；
覃启明，县酒厂青年工人；
傅剑秋，服务公司照相工人；
刘祥斌，服务公司饮食店工人；
王德裕，服务公司旅社工人；
覃国雄，县桂剧团扮演杨子荣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员；
韦超元，县供销社干部；
韦　亮、杨捷荣，县公路段工人；
罗美和，县水电局技术工人；
满举世，县拖拉机站青年拖拉机手，死时被用杀人的木棒插进嘴里；
陈德渊、戴景松、孔繁树，长安铁木厂工人；
戴景培，教师；
王振声，长安护林队工人；
陈友才，长安和平街居民；
杨贵安，长安竹器社职工；
张德尧，长安服装厂工人；
曾碧英，女，五金社钟表组工人；
韦克利，长安车缝社工人；
李引弟，竹器社工人；
黄太成　与其岳父（姓名不详），长安渡船社工人；
张炮光，理发社工人，复员军人；
蒋喜田，理发社工人；
杨火美，长安棕绳社工人；
林世民，长安服务社劳工；
黄太培、甘雄飞、杨冬梅（女），长安新华街居民；
陈云发、曾安苟，长安大庆街居民，劳工；
尹新贵，和平街居民，手工业工人；
江绍先，和平街居民，劳工；
雷振强，35 岁，教师；
李庄和，长安插队青年；
周老关，长安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公；
余寿宽、余寿松、龙安志、陈汉英，立新街居民；

余万春，长安诊所医生；
兰水养，长安车缝社社员之子，年仅十多岁；
曾漫涛，教师。

8 月 23 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下令枪杀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群众和干部 973 人，其罪名是“通匪，济匪，窝匪”。“枯那反革命事件”源发于 5 月 17 日。当时，段振邦命枯那大队“联指”派民兵营长梁国雄，去收缴“四二二”派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的枪，引发宁协利抗命不缴，争吵中，宁开枪打死“联指”派民兵李巨才。

据作家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一书中记载：8 月 17 日，在**钟山县**三里区召开的“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爆炸红色政权”的万人大会上，一次打死 167 人。

随着军事围剿的胜利，韦国清根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下令大“**刮十二级台风**”，乘胜镇压一切“阶级敌人”。据有关史料记载：1968 年 7 ～ 8 月的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和各地、市、县革委会以及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追剿“四二二”，镇压“**反共救国团**”和“**二十一种人**”等“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 84,000 多人**。其中，杀人较多的县市有：

宾阳县杀害、迫害致死 3,951 人，是抗战时期日寇杀害宾阳群众 300 余人的 13 倍；
贵　县杀害、迫害致死 3,138 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 263 人，教师 156 人，学生 47 人，居民 106 人，农民 1,311 人，其它 1,255 人；
临桂县杀害、迫害致死 2,051 人，其中国家干部 326 人；
灵山县杀害、迫害致死 3,222 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在 500 人以上，287 个大队进行过屠杀；
桂林市杀害、迫害致死 1,128 人，其中干部、工人 556 人，全市冤、假、错案 11,522 起；
天等县杀害、迫害致死 1,651 人；
上思县杀害 1,701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 1.33％；
融安县打死 1,089 名，其中地主分子 112 名，富农分子 61 名，伪军官 21 名，农民 475 名，工人 9 名，学生 21 名，其它 391 名；自杀 126 名，其中地主分子 18 名，富农分子 10 名，农民 64 名，工人 2 名，学生 14 名，其它 8 名；
钦州地区 7 个县市失踪 10,359 人；
玉林地区杀害 10,156 人。

另外，由民间调查而获得的死亡数有：

都安县杀害、迫害致死 441 人；
开鸣县杀害、迫害致死 698 人；
上林县杀害、迫害致死 1,906 人；
蒙山县杀害、迫害致死 850 余人，其中，6 月中旬的五天中，杀 500 多人；
百色地区杀害、迫害致死 1,073 人；
河池地区杀害、迫害致死 7,864 人，其中，有五个县打死千人以上。

在大**“刮十二级台风”**里的广西，**韦国清的“群众”**，极尽了残忍之能：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韦国清的“群众”**，还大搞成批屠戮：成批打死，成批戳死，成批爆破炸死，成批推下矿井困死，成批推到山洞里下石砸死，成批推入江河中溺死。**韦国清的“群众”**，还在屠杀中寻欢作乐：先奸后杀，杀夫奸妻，杀父奸女……**韦国清的“群众”**杀人手段之残忍，使侵华鬼子和希特勒党徒相形见绌——毛泽东**“群众专政”**的魔法，使**韦国清的“群众”**为代表的兽性表演，达到了无以附加、令人发指的境界！

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情惨况，史无前例。这个被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连连擢拔为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被他们誉为“革命领导干部”的韦国清，就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1984 年，官方“处遗办”对广西“群众专政”的评述是：**“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在**“群众专政”**的红色恐怖中，腥风血雨也在其他省市中扩展！

在四川武胜县双星公社，当年曾身临其境的周公正，在他的《**“文革”中的一场棍棒屠杀**》一文中，记录了 1968 年 8 月 2 日公社党和政府制造的一起集体棒杀“五类分子”的红色恐怖事件。笔者根据周文记录改写如下：

当场打死多人，周公正的地主分子母亲险遭毒手。一个女人在被砖头砸死前，哭喊着她儿女的名字说：**“我再见不到你们了。”**一位贫农母亲林老太太看不下去了，大声哭道：**“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哪个政府这样随便把人打死的呀！”**她毫不危惧地走上公社领导正襟危坐的主席台，拉住坐在台上的女儿(妇女主任)骂道：**“走！我们回家！不当这个干部了！他们哪里是人啊？简直畜生不如啊！要把这么多人活活打死，天底下哪有这种道**

理呀？”贫农林老太太义正辞严的哭骂，竟震住了那些痞子、流氓无产者，遏止了他们的屠杀，使那天少死许多无辜者，周公正的母亲也因而幸免于难。

大义凛然的林老太太的行为表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虽有阶级斗争，但基本上是个和谐相依、休戚与共的社会；这个相对平和的农村社会，却被马列毛主义政治化、妖魔化，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鲜血淋淋的战场！

另据披露：1968 年 5 月 23 日到 6 月 20 日，云南省巧家县人民武装部某副部长和红派头头决定，从农村调集 3,350 人进县城。在县“贫总”常委扩大会和县武装部政工会上，决定把对立派中跳得凶的人干掉几个。于是，全县批斗 2,438 人，杀 277 人，其中“五类分子”53 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和为贵**”和“**先礼后兵**”；中共赤文化传统则是“**杀一儆百**”和“**先杀后抚**”。1968 年 9 月 23 日，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发出了《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晓之以中共“反对”乱抓、乱杀政策的“**伟大**”；1983 年，中央军委纪委为“严明军纪”，对参与杀人事件的军队指挥者给予“应有”的法纪、军纪、党纪处分，动之以中共“实事求是”政策的“**光荣**”；1984 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推动的、韦国清等人部署的、在全区造成大批无辜群众死亡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案，几经周折，终获平反，广西政府也对受害人进行了抚恤，据以证明中共“有错必纠”政策的“**正确**”！中共“先杀后抚”愚弄权术，数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天，在解决官民、民族纠纷时，仍沿袭不变。

“**先杀**”以镇压反抗，“**后抚**”以慰悦民心：这种帝王宽猛相济、软硬兼施、恩威交加的御民权术，被中共玩得得心应手；他们还以其淋漓尽致的表演，蛊使芸芸群氓安之若素，甚至惑使蒙难人之亲属中产生大量斯德哥尔磨综合症患者，对刽子手感激涕零！

5．人兽之间⑶——兽行种种（人食人等）

以韦国清为代表组织实施的广西农村大屠杀，比 1966 年“红八月”里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屠杀和 1967 年“黑八月”里以湖南湘南为代表的大屠杀，无论在数量和残忍上，都更加肆无忌惮；北京、湘南的种种屠杀暴行，在广西都复制重演，其暴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层的政治构陷、活体人展和下层的霸女敛财、烹食人肉，构成了广西魔头韦国清实行“**群众专政**”的特异色相，其中，尤以吃人肉为甚！

兽行之一：政治构陷

中共不但善于构建一群异类，诸如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走（资派）等敌人，善于虚构一个 xx 反革命组织，套在 xx 异类族群头上，而且还善于妖魔化这些族群或组织，“揭露”他们已给国家造成了某种迫在眉睫的威胁和耸人听闻的破坏。这是中共最拿手的统治策略——政治构陷，是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构陷不断重复上演，做为“革命领导干部”的韦国清，自然轻车熟路，对其运用自如。

为了给政治对手致命一击，1968 年 5 月 17 日，韦国清得意之作“**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正式出笼。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破获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 63 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 2 月 2 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等等。

这个子虚乌有的、1984 年终得平反的特大假案，在当时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是被毛泽东首肯的“铁案”。韦国清等广西官僚特权阶级的政治对手“四二二”左派造反派，在“铁案”笼罩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群体，随着“四二二”派的覆没，其生存权也惨遭“**群众专政**”的肆意践踏！

在 1968 年，韦国清政权发动的围剿“四二二”的军事行动，都是打着清剿《反共救国团》的旗号进行的，而且取得了成功。

在反《反共救国团》中，无辜的群众和干部，遭到了“**群众专政**”的蹂躏。据《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 年》记载：南宁市部分单位不完全统计，被列“反共救国团”的有 3,547 人，其中，已被批斗的 1,722 人，关押 957 人，打死 37 人，自杀 34 人，致残 2 人，下落不明 4 人；柳州市十四个单位统计，受审查的 438 人，其中，被关押 45 人，致死 16 人；百色地区共追查“反共救国团”嫌疑案 104 起，批斗 9,274 人，其中，打死、逼死 1,073 人，伤残 2,135 人；那坡县追捕“反共救国团”551 人，其中，活活打死 8 人，打伤致残 43 人，47 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判刑，等等。

上行下效。玉林专区容县的“贫下中农”，一马当先，双手轻轻一抬，便抓出了一大批“反共救国团”组织。他们抓出的“反共救国团”组织有：容县“四二二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国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顶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团军”；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军”；三岸公社的“新编步兵师第一独立师”；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国军第三集团军”；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青年独立团”；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在短短几天间，**一个小小**容县，遍地都是“反共救国团”，而坐在县委大堂上的中共权贵们，竟都能安然无恙！

直接死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的干部和群众有多少？1968 年 7 月至 8 月的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地方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各地“联指”指挥部，在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 84,000 多人，其中多数与“反共救国团”一案有关。据此，有学者认为，直接死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的干部和群众，应在 50,000 人以上，致伤、致残者难以计数。

在罗织罪名的赤文化熏陶下，1968 年 6 月 10 日，宁明、崇左、扶绥三县又先后“破获”了“**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和“**二〇三战略部**”等四个“反革命集团”。此案涉及南宁地区五个县，连越南的陆平县也牵涉了进去。涉案“罪犯”宁明县 619 人，崇左县 222 人，扶绥县 11 人。1970 年 4 月 9 日，四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黄志忠、卢秀业、黄敬贤、黄吉林、林春初、陈韬、王石养**等 7 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80 年 11 月，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所谓“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二〇三战略部”纯属冤假错案：一无反革命纲领，二无反革命组织，三无反革命行动计划。

南宁地区的扶绥县笃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县、区三级重点，是韦国清政权严抓“**群众专政**”的样板。1968 年 5 月中旬，扶绥县革委会在笃邦公社所在地，召开了一次有 1,064 人参加的现场会。会后，笃邦公社根据现场会对敌斗争的部署，经过对受审人踢、打、跪、吊、吃屎、喝尿，或将受审人衣服扒光滚 20 米高的陡坡，或将受审人塞进泄洪管用水将人从另一端冲出，或将受审人脱光衣服推进石灰池中翻滚，用等等系列酷刑，挖出了“**反共救国团**”、“**红青战斗团**”、“**中国救民党**”等三个“反革命组织”，揪出“阶级敌人”1,500 多人。其中笃邦大队抓出“反革命分子”58 人，打死其中 6 人。

在韦国清的领导下，南宁地区革委会，把扶绥县笃邦公社用酷刑深挖

的验方，总结上升为“笃邦经验”，向全自治区推广。

兽行之二：活体人笼展

科学界常组织活体展览，诸如“活体昆虫展览”、“活体动物标本展览”等。在动物园里，笼圈中动物，也可叫活体动物展览。文化大革命伊始，毛式揪斗法是把人押到台上批斗，或拉到大街上游斗，或押到汽车上游斗，可叫做活体人示众；但从广意上来说，这种斗法也可叫做活体人展览。韦国清政权在“**群众专政**”中，从活体人展览和笼圈动物展览中获得了灵感，创造了一套新的批斗形式：**活体人笼展**。

5 月 12 日，韦国清御用的“联指”总部，制造了一些木笼，将持不同观点的区水电厅副厅长**林执真**、地质局处长**张祖贵**、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黄海泉**、“四二二”派成员以及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展出，组织群众观看。在三天的展览中，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肉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酷折磨和摧残。活体人笼展的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因而被推广到全自治区各县市。据悉，被笼中展出的人达万人以上。

可悲的是，施刑者把这种活体笼展命名曰“禽兽展览”。当施刑者不把人当人而当禽兽看待时，人兽之间的鸿沟被他们填平了：此刻，施刑者也自然而然地、不由自主地变成了禽兽。也在此刻，只有观展者还有机会在人兽之间做出选择。

兽行之三：杀男霸女掠财产

同湖南道县许多党组织杀人有奖一样，**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会，从 4 月 15 日到 17 日的三个晚上，共杀“**二十一种人**”22 人，杀绝 5 户。刽子手民兵，每杀一个，得奖金 3 块，看守民兵每天补助五毛。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革委会，从 4 月 5 日到 5 月 6 日，杀 92 人，祸及 56 户，杀绝 15 户。

旱田、十专学大队革委会，对杀光的绝户，同湖南道县一样，实行**三光政策**：杀光后，对其财产吃光、分光。

同湖南道县许多大队党支部一样，他们都能对“**二十一种人**”家中的年轻妇女“高抬贵手”。这是出于怜悯吗？不！这是出于满足贫下中农光棍们的生理需要，出于繁衍贫下中农后代的承袭需要，更出于将“反革命分子”改造成“贫下中农”的政治需要。根据三个需要，他们采用了同湖南道县一样手段，**以杀相逼**：或嫁、或死，要新生寡妇和未婚姑娘们，迅速

做出选择！

但旱田、十专学的做法，比湖南道县技高一筹：他们还要收取改嫁、出嫁“**证明费**”。例如，旱田大队的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出嫁时，大队革委会共收取改嫁、出嫁“证明费”894 元；十专学大队革委会收取改嫁“证明费”218 元。“证明费”用以证明，她们改嫁、出嫁后，开始享受贫下中农政治待遇，不再遭受歧视、批斗、打骂和杀戮。

兽行之四：人食人

白居易在《轻肥》诗中咏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读此句曾使我惊颤！岳飞在《满江红》中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读此句几乎使我发抖了！笔者思忖：连我们所崇拜的英雄都是餐胡虏肉、饮匈奴血，难道我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真有嗜人血、啖人肉**悖逆天道的邪恶**吗？

翻开历史一看，笔者大吃一惊地发现：果真如此！

《吕氏春秋》记载：卫懿公被翟人所杀，“尽食其肉，独舍其肝。”《资治通鉴》记载：王莽被悬首示众后，“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晋书》云：“士众从之，啖死人肉。”《旧唐书》说：“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取婴儿蒸而啖之。”《太平广记》中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伏诛后，“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新五代史》说赵思绾：“城中食尽，杀人而食。”元《南村辍耕录》曰：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明史》写道：“把缚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乱射杀之，复割裂肢体，烹啖诸壮士。”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云：“盖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彭遵泗《蜀碧》卷四云：明末“蜀大饥，人相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云：“是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又据史载：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江淮之间民众相食；清同治三、四年间，皖南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三十文一斤，后来涨价到一百二十文一斤，同时，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一斤。……

尽管如此，这种悖逆天道的兽行，在华夏文明的洪流里，不过一股邪恶逆流而已！

到了中华民国，人食人的邪恶兽行似无改变。陈沅森在《佛怀煽仇录》

中写道：“**农运大王彭湃**(笔者：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 20 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笔者少年时期，也曾听老人们说过灾荒年人相食的故事，只因年代久远，细节忘却，无法书录于此。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了，“当家作主”了，人食人的邪恶兽行理应终结；遗憾的是，在马列毛仇恨主义的教唆下，在和平环境里，人食人的邪恶兽行非但没有终结，反而有所发展。在 1960 年前后的三年里，当“三面红旗”在大陆上空猎猎飘扬、数千万农民在饥饿中纷纷倒下之时，为防止四方异见的传播，毛泽东用“舆论一律”撒下天罗地网，给人的嘴头、笔头贴上能过滤负面信息的封条；但封条密而有漏，人吃人的丑闻，还是被人从毛的监控疏漏中偷越，悄悄从安徽、河南、甘肃等地传出。到了文革高潮的 1968 年，在毛泽东阶级仇恨主义和“**群众专政**”的鼓噪下，人食人的邪恶兽行又发起飙来。在广西疯狂屠杀弱势群体时，有数百人被毛的“**群众**”即痞子、流氓无产者吃掉。如果不是邓小平急于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曾一度允许官方和民间调查、报导、著书，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还会被“舆论一律”封锁在官方的档案中，或者被“主旋律”闷死在人们的“腹中”。

在继承人食人悖逆天道的兽行上，广西武宣县当属首恶之县。

1968 年 5 月 13 日，韦国清的“御林军”右派“联指”总部，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 900 多人，攻打“造反大军”盘据在武宣县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打死 97 人，毁掉房屋 67 间，价值 37,900 元；抄家 37 户，被抄去财物价值 26,600 多元。自此而始，“联指”中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兽性逐渐发飙，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吃起“造反大军”人的肉来。6 月 14 日，武宣县革委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军分区“刮台风会议”精神。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部长**文龙俊**在会上号召：“**对敌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专政，把政策交给群众。搞阶级斗争不能手软……**”于是，武宣县处处变成杀人场，队队大摆人肉筵。中共广西整党办的内部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披露了 1968 年鲜为人知的机密（文字稍做修订）：

6 月 15 日，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多人，将仇敌“造反大军”的**刘业龙、陈天掌**等 4 人，拉到三里圩游斗。游斗到车缝社门口时，便将四人活活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去死者的肝，割掉他们的肉，拿着回大队部会餐。到 8 月底，该县与“联指”观点相左的干部群众，有 75 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吃掉。吃人者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和中共党员，他们都是毛的“根红苗正”、先进阶级出身的“**群众**”。

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集**，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 18 大队大队长，“解放”后，曾任仓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集被打成“叛徒”；又因他同情左派造反派“造反大军”， 7 月 1 日晚，在该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的批斗会上，被残忍打死。翌日晨，**黄佩农、张继锋**等人，遵照毛“**对敌人要狠**”的教导，挖出他的肝，剥下他的肉，剩下一副骨胳。接着，凶手领着一群人，在学校宿舍巨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和肝吃。一时间，学校里火烟缭绕，腥风飘荡，其阴森可怖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

7 月 17 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时，**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当场把他们杀死，然后把尸体拉到平昭码头，割下他们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下酒。有二三十个“根红苗正”的“**群众**”，参加了人肉酒筵。

又据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记载：6 月 18 日，武宣中学教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当药用。

当宣武县吃人猖獗时特别是学生也吃起老师、校长的肉时，县文化馆工作的“摘帽右派”**王祖鉴**，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向中央控诉。他避开邮局的严密监控，通过友人将控告信送进了中南海。两个月后，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少将率兵一个连，直趋武宣，才制止了近三个月的人食人红色暴行。吃人肉被制止了，举报人王祖鉴却遭到了残酷批斗。

武宣县官方“处遗办”，根据各公社 1983 年 7 月 4 日的统计，列出了个《**武宣县被吃人肉者名单**》：

黄茆公社九人：1 新贵：黄礼康、覃伟成、黄德安、黄德惠、覃乃光、黄荣昌；2 大浪：覃世情；3 上兀：覃会文；4 马天：覃守珍。

二塘公社二人：5 四通：覃国良；6 朗村：方宏南。

武宣公社九人：7 官禄：韦尚明、谭正清、黄振基、谭启荣；8 雅村：覃荣生、卢汉才；9 大禄：陈魁达；10 草厂：黄志华、郭冀基。

武宣镇六人：11 武北：覃乃武；12 北街：周石安、周伟安；13 河边：杨贵才(？)；14 西街：汤展辉、梁文振。

三里公社十人：15 上江：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廖天龙；16 台村：陈承云、陈汉宁、陈徐建；17 五星：李占茏、李锦良；18 五福：陈大长。

东乡公社八人：19 三多：雷炳绪、吴华堂；20 金岗：刁其棠、刘达瑞、刘茂槐；21 长龙：张福展；22 李运：李瑞仔；23 麻村：刘业龙。

禄新公社二人：24 古碌：林信忠；25 上堂：梁道邦。

桐岭公社三人：26 统安：韦国莱；27 大同：廖耐南；28 新龙：谭世

X。

通挽公社十一人：29 **花马：陈国萝**；30 **大昌：张文美、张永亨**；31 **大团：甘加杞、甘大作**；32 **尚满：陈光厚、张孟团**；33 **江龙：陈炳现**；34 **古佑：覃和家、覃允琢**；35 **安村：陈天然**。

国家干部四人：36 **桐岭中学：黄家集**；37 **武宣中学：吴树芳**；38 **黄茆小学：张伯勋**；39 **组思灵卫生所：韦金光**。

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 1 人，挖心肝的 56 人，割生殖器的 13 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 18 人；活割生剖的 7 人。

根据中共制定的处遗“宜粗不宜细”方针，官方没有做深入调查；上面 64 人名单，显然是个各公社大大缩了水的上报名单。又据《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武宣县在‘文革’期间，有七十五名死者被挖肝吃肉。”**

武宣县毛的**“群众”**究竟吃了多少人？官方与民间说法很不一致。民间人士认为，吃了一百几十人；据吃人肉举报者王祖鉴说，武宣一个县，他个人即可列出 100 个以上名单。对此，官方不予承认！

为了平息民愤，根据中共**“先杀后抚”**的惯例，武宣县当局对吃人肉者也做了处理。县“处遗办”有一份因吃人肉而受党纪政纪处分者的名单：

1、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的共二十七人，他们是：**韦善端**……（其他名字从略，下同）

2、非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干籍、行政开除留用的共十八人，他们是：**甘兰光**……

3、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的共五人，他们是：**龙集**……

4、非党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的二十一人，他们是：**谭振芳**……

5、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的共五十九人，他们是：**何久海**……

此外，“处遗办”还记录了两个干部的恶行。他们是：

武宣县革委会副主任**王文留**(女)，群众揭发她专吃男性生殖器，但调查时她死活不承认；“处遗办”根据“宜粗不宜细”方针，对她只做了开除党籍、降为工人处理。策划杀人并参与吃肝的县委干部**谢锦文**，“处遗办”仅给了他开除党籍处分。

广西其他各县，也先后发生过吃人事件。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记载，在隆安、大新、上林、武鸣、浦北、灵山、贵县等县，都有雷同于武宣县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记录。

1968 年 3 月 23 日晚上 9 时，在**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的策划下，该区高峰乡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然后剖腹、取肝、胆，煮食。

4 月 25 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 24 人，被剖腹、取肝、煮食、下酒。全公社被杀害 180 人。**刘维秀**、**刘家锦**等人，先把**刘振坚**打死，再将其 **16 岁的女儿**轮奸、打死，然后剖腹、取肝、切乳、割阴，煮食下酒。

5 月 28 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连长**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 20 多人，持械抢杀**何以路**等 3 人。杀后割腹取肝，准备食用，余下陈尸野外。

在**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阶级敌人”，先后被挖肝、割肉，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直到 1983 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被迫交出来。

在**上林县**，据说当地人认为吃人肝大补、壮胆。8 月 7 日，在乔贤区乔贤大队“四二二”分子**蒙光忠**被打死后，凶手剖其腹取其肝，煮吃。

据**钟山县**公安局预审档案“**易晚生杀人案**”中记录：在四哨村，一个叫**易晚生**的贫下中农，亲手杀死了地主子弟**邓记芳**后，举刀剖其腹，掏其心、肝、胆、肾，并将其切成手指头粗细，分给其他人吃，他自己拿了三个指头宽、两寸长的肝回家吃。

但据广西“处遗办”调查统计，该自治区从 1968 年 3 月下旬至 5 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事件 11 起，共 21 人。显然，这是个大大缩水的政治统计。

人吃人，并非广西一家。

在四川省**资阳县**，一个当年亲历现场年仅十三岁的马由子写道：

我对共产党并无私仇。文革时也才十几岁。没有挨过批斗。但却看够了杀人、死人的场面。我亲眼看到割人肉，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第一个被割的是一个红卫兵武斗头目，叫**孟长江**。那大约是在一九七零年。孟住我老家四川省资阳县正东街。他当时是“文攻武卫第二指挥部”总指挥。全

家根红苗正，母亲人称“双枪老太婆”，是街道革委会主任，阶级觉悟高，爱憎分明。武斗中都是英雄，为捍卫无产阶级思想冲锋在前。

马由子说，在一次“孟又主动‘义务’到街上‘值勤’”时，开枪打死了一个农民，被判处死刑。在孟被枪决后，发生了一件让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他写道：

谁知突然一个农民掏出一把菜刀，喊着：“我要挖他的心，剥他的皮！”几刀之下，热气滚滚的肠子便流了出来。我好像闻着腥味，赶快就躲了出来。蒙住眼却又从指缝里看。只见几个人拿着肠子翻，把肝、肾、心都摘下，分成几块。又有几个扒掉孟的衣服，割臂上的肉，舌头也割下来了。有人在一边鼓劲：“**干得好！老天为我们伸冤报仇啊！**”突然还有人喊了一句“**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没有人跟着喊，大家多在看热闹，笑的哭的各半。有几个拿着要件的还显示了一番战利品，说是回家下酒去，先走了。

一会，又来了几个农村女人，大声哭着，一个说是要找药引子，苦胆。可下不了手，求人帮忙。正好苦胆还在残肝上，于是有“好心人”去摘下，河水里洗了洗。她接过去，千恩万谢走了。

更晚回来的人告诉我，孟的头被砍下来，挖了眼睛，耳朵也被人割走“下酒”去了，肚腔塞满了石头，下身也给砍走。晚上，孟的母亲和兄弟去拖走了尸体埋在了无人知晓之处，以免再被鞭尸。

这个右派造反派“文攻武卫”总指挥的下场，着实让人可怜！

笔者恸而评曰：当仁义理智信和真、善、美的传统价值，被毛泽东的中共当成罪恶的渊薮加以批判并颠而族之之后，人食人的邪恶兽行，就被毛的“群众”——包括痞子、流氓无产者在内暴民们继承了下来，并把他们自己与禽兽等同起来！

《吕氏春秋．顺民篇》曰：“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

在赤文化的词典里，中共拥有撒谎、批判、杀戮的特权，没有商汤“**万夫有罪，在余一人**”的胸臆，因而也不存在效法商汤致歉或下《罪己诏》的义务。在他们的教化下，一代“**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禽兽本性。作家郑义在钟山县采访了那个叫**易晚生**的凶手，并为其留了一张魔影。面对采访，这个穷困潦倒、干瘪憔悴、奄奄待毙而又飘飘然的八十六岁老头儿，还以“革命者”自居，举着他那指如猴爪的左手，“大义凛然”地说：“**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

他们，就是他们来杀了我们！” 他挑战采访者说：**“是我杀的，谁来问也是这个话。”**活脱脱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泼皮！——这就是毛共实行**“群众专政”**时所依靠的**“群众”**！这与毛说红军时要**“靠那些流氓分子”**打仗，何其相似乃尔！

历史再次证明：不论什么时代，不论那个民族，不论谁人当权，只要当权者肆意毁弃法律，恣意泯没道德，不惜用铁血取代文明，人的兽性就被解放，便会张牙舞爪、荼毒生灵。历史不会宽恕那些禽兽式的痞子、流氓、刽子手，更不会宽恕那些打着解放旗号去解放禽兽的领导者和纵容者——利用痞子、流氓无产者即暴民进行血腥**“群众专政”**的中国魔王毛泽东和广西魔头韦国清，势必被铁钉在人食人的历史耻辱柱上。

*　　*　　*　　*　　*　　*　　*

本章点评：“群众专政”

八十年代，笔者曾想赴道县调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中国儒家崇“仁”尚“义”，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朴归真的目的，即“道法自然”。——这就是使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的儒释道文化。如果没有权力阻挠，这种文化可以自然而然地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文明价值融合在一起。

中共引入的西方马列理论是一种什么文化？它是权力拜物教文化或曰乌托邦共产主义。这种丛林乌托邦文化，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的“科学”包装下，两个主要特征强烈地表现出来：**“暴力崇拜”**和**“目的崇拜”**。笔者在本书“前言”中这么写道：

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恩格斯说：**“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列宁说：**“暴力比 100 次辩论更有效。”**因而，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继而，邓小平说（网传待考）：**“杀 200 人，保 20 年稳定。”“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等等，就是“暴力崇拜”的宣泄。“成王败寇”是“目的崇拜”，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罪恶导师”马基雅维里说：**“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普列汉诺夫谴责他的学生列宁，为了胜利**“甚至可以和魔鬼结盟”**；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胜利者不会受责备。”**

因此，胜利者的任何谎言、任何“妖魔化敌人”的卑劣手段，都是革

命者的最佳选择，都应加以美化包装，任何“责备”都是对革命的“反动”。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造成亿万人死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丛林乌托邦文化，或曰赤色恐怖文化。这种文化是对真、善、美的蹂躏，是对自由、民主和人权普世文明价值的颠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邪恶向文明挑战的赤色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即**“打天下，坐天下”**、**“朕即国家”**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文化糟粕支撑下，以马列主义与中国专制文化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主宰了中国，打开了人类兽性的“潘多拉魔盒”，解放了一大批屠戮杀人狂、挟嫌报复狂、见利忘义狂、借刀杀人狂和落井下石狂，还造就一大批崇毛媚共的犬儒，使华夏文明的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付出了 200～300 万人惨遭屠杀的巨大代价！

对此，天才的毛泽东早有预期。1967 年 5 月 16 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总之，在毛泽东看来，他解放出来的**“群众”**，乱批、乱斗、乱打、乱砸、乱烧、乱抄、乱游斗、乱驱赶和乱杀戮，都是天经地义的，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仅**“天掉不下来”**，而且**“女人照样生孩子”**！

显然，毛泽东**“群众专政”**，表面上看是无政府主义的，实则为有政府、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在湘南和广西的大屠杀，以及他说**“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引发的**“红八月”**大屠杀，正是这种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作祟的结果。湘南和广西的大屠杀，仅仅是赤色革命下中国老百姓苦难中的冰山一角。有些专家、教授把**“群众专政”**的大屠杀归结为**“中央政府无力左右地方官员的行为”**和**“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甚至说**“文革是全民犯罪”**等等，看看毛泽东说的、做的，看看他领导和放纵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你们的结论是无知呢？还是无耻？

第 16 章　清理阶级队伍暨文革第五轮大屠杀

16 章目录

★一. 毛氏规律　二. “清队”简介　三. 大案剖析　★1. 镇压蒙族“新内人党”血案
2. 广西“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血案　3. 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叛徒血案　4. 冀东大血案
★5、二七机车车辆厂血案　★6. 新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血案
四. 第三波自杀风潮　忆容国团　研究员肖光琰全家自杀　张东荪及其子孙的恐怖遭遇
★史家鼐伯赞夫妇之死　第 16 章附注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文化大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受害面最宽的一次运动。1967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但史学家丁抒在研究了许多档案资料之后，他结论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死亡！**”

一、“清队”中的“毛氏规律”

1967 年 6 月，毛泽东派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统帅的“御林军”——中央警卫部队即 8341 部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化工三厂，北郊木材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对“六厂二校”实行军事管制。为了能获得第一手资料，毛泽东还先后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军宣队”中工作。据披露，毛身边的“徐秘书、服务员小周、警卫员和护士长吴旭君，”都参加了“军宣队”；那些能经常同毛在一起的人民大会堂 118 厅的女服务员，也参加了。“**这些女孩子们，穿上军服，风风光光地去了工厂**”。

这是权谋大师毛泽东要亲自指导汪东兴在“六厂二校”制造出个典型来。制造这个典型的目的是在密室中确定好了的：不仅要证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雜性**，还要证明阶级斗争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更要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群众运动**”，都要刻意树立一些“阶级敌人”加以打倒，借以昭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心领神会的“总管”汪东兴，不负重托，很快总结出多个挖出“阶级敌人”的“先进经验”，用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军宣队”进驻后，随即在“六厂二校”开展“对敌斗争”。其中，新华印刷厂“军宣队”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 10 个“反革命分子”。由于其中多个是国民党时期进厂的

老工人，因此，“总管”轻而易举地给他们扣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的罪名，并由此总结出了一个“**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对二七机车车辆厂实行“军管”后，“军宣队”挖出了历史反革命 215 人，现行反革命 31 人，国民党等反动组织成员 373 名；全厂 155 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49 人，占 31.6%；这些人“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理论，找到了新的“证据”。他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到了 1968 年 3～4 月间，为了与党内右派妥协，控制武斗加剧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开始了新的战略部署：把文革“斗争大方向”，从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权力斗争上，向党外的传统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身上转移，并给发布镇压左派造反派的《七三布告》以理论和政策上的支持。于是，他本人导演的新华印刷厂“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典型经验”，便派上了用场。

1968 年 5 月，姚文元根据毛的新部署，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整理修改后，呈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5 月 15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内部指示，率先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 号文件转发了《**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严令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批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由是，在全国多地武斗犹酣之时，清理阶级队伍（下称“清队”）运动即在全国展开。对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暗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为了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亲临一线，以“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为蓝本，亲自为“清队”大造舆论。

1967 年 12 月 18 日，他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显然，毛泽东是个形而上学的外因论者。当年，他把他**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政策所造成数千万饿殍的“三年人祸灾难”，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因而一意孤行地掀起**“民主补课运动”**，使数万基层干部和数十万“地富反坏右”弱势群体，蒙受不白之冤，成百上千人自杀或被杀。如今，他在煽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又鼓动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斗“走资派”，为了向刘、邓夺权，他又号召造反派“全面内战”、“武装左派”等等。他一系列破坏法制的倒行逆施，使红卫兵成了打、砸、抢、烧、杀的歹徒，造反派成了“全面内战”中的炮灰。但在“舆论一律”的独裁条件下，他却颠倒黑白，竟把他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说成是“地富反坏右”、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阶级敌人**“幕后指挥”**的结果。

然而，历史记录的是：他毛泽东的这些敌人，包括这些敌人子女、亲属，几乎无权参加任何组织；人们也不会忘记，他的这些敌人，在土改、镇反、反右、合作化、民主补课和“四清”等运动中，已遭受过反复清算和镇压；人们更不会忘记，在文革中，他的这些敌人，先后又在以北京大兴和湘南道县为代表的全国各地，遭到了灭绝人伦的大屠杀！显然，他的这些敌人，早已被他整得服服贴贴、毫无反抗能力，已变成了二十世纪最为穷困的弱势群体。然而，在失控的“大规模武斗”中，这些“最为穷困的**弱势群体**”，在他的眼里，亦即在毛泽东思想里，却变成了武斗的**“幕后指挥”**者，变成了能左右武斗的**强势群体**。

为了与党内右派妥协，找出一条党内右派可以接受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1968 年 4 月 10 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用黑体字传达出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此刻，毛泽东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已变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血统论”者。他念念不忘那些在 18 年前已经被他打倒了的阶级敌人，而这些敌人又在而后的历次运动中又被他整得死去活来早已退变成弱势群体，但他们有影响，有后代，人还在，心不死，一定会把“反革命”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因此，他不仅要对阶级敌人**“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与他们的子子孙孙做长期不懈的斗争。

1968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同尼雷尔总统谈话时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

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1968 年 7 月 12 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1968 年 11 月 4 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善于制造舆论的权谋大师毛泽东，通过亲临一线的说教，终将文革“斗争大方向”从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权力斗争上，拉回到清理“解放”后被他清理过多次的早已被清理成弱势群体的“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上来。

然而，历史给毛泽东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共执政六十年后的今天，埋葬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独裁社会主义并用“改革开放”理论和“特色”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人，既不是他“念念不忘”的“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也不是他深恶痛绝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后代，即以红二代、官二代为代表的红色地主和资本家。

任何天才都有局限性，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把文革“斗争大方向”拉回到清理“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方向的决策，应当说是高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决策，使中共党内左、中、右派，迅速形成共识；党内右派们像左派一样，纷纷向毛效忠；作为“受害者”的党内右派们，刚刚摆脱掉套在身上的“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枷锁，便投入到镇压弱势群体的“斗争大方向”上来。——清理阶级队伍的决策，使走向分裂边缘的中共，复又团结了起来。

同其他**政治运动**一样，清理阶级队伍也是通过**“群众运动”**组织实施的。在蔑视人权的赤文化腌缸里，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发动的每次政治运动之前，都已熟知毛氏“群众运动”的无政府性和法西斯性：大“敌”当前，为了发动**“群众”**，不要怕犯“宁左勿右”的错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而**“对敌斗争要狠”**，不可姑息，不得怜悯，不能宽容——这是毛泽东考察干部对他、对党是否忠诚、立场是否坚定的党传准则。在腌缸里，各级领导干部也摸透了毛泽东领导**“群众运动”**的

心态：犯“宁左勿右”的错误，属左倾，是方法问题，可以谅解；犯姑息、怜悯、宽容的错误，属右倾，是立场问题，不可宽恕。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们，谁也不敢忘记这个教训：在土改运动中，广东省委书记方方，因对地主仁慈手软，搞“和平土改”，违抗了他“村村见血”的教导，犯了右倾错误，被撤职查办，险些坐牢！

为了利用那些敢打、敢骂、敢冲、敢杀和敢于构陷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包括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父母官”，如广西魔头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南宁军分区司令员**熊光武**，6949 部队副师长兼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湖南道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等等，借以达到**“群众运动”**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对他的这些**“群众”**，关怀备之，呵护有加。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还把专政的权力交给了他的**“群众”**。他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为了保护他的**“群众”**，他曾严辞警告过各级领导干部们：**“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显然，毛泽东要支持、要保护的所谓**“群众”**，就是那些痞子、二愣子、勇敢分子和流氓无产者等法西斯分子，以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领导干部。

前面已说过，毛泽东是炮制**“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的老手；在他的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成了按**“毛氏规律”**操作“群众运动”的行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中，**“毛氏规律”**成了**“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死亡”**的魔爪。由于造成大量伤亡，这个魔爪，理应在这里再晒它一晒，尽管在“序幕”中已曝过：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采编人员，组写文章，放送广播，以制造舆论；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作报告，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 3 或 5 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大胆怀疑，大胆揭发，以排查、筛查的方式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 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训练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杀等刑讯逼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新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重点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横扫”、

破“四旧”、夺权武斗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随着轰轰烈烈“清队”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各级政府设立的“专案组”，成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触目惊心的敌情**”，也被他们先后制造了出来。

在《七三布告》发布后《七二四布告》发布前的1968年7月21日，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在上报的《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报告》几乎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主意写的，因此，毛泽东迅即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宣扬仇恨主义、传播“**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也培养了一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些“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干部领导下，“清队”中的“**专案组**”，都成了逼供信的刑堂，其成员都成了职业杀手。吉林省某设计院“清队”领导小组，在向上级报告的“群众办案”体会中写道：“**专案组是尖刀班、爆破手，广大革命群众是审讯斗争的主力部队。只有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才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使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呢？我们采取大会（全院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揭发批判、核实对质相结合的办法。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性质的批判会（主要是肃清流毒、批深批透）、斗争会（主要是斗态度，斗倒斗臭）、审讯会（主要是揭发、核实、审讯其罪恶）等多种形式。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忆敌情、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一点，采取‘一点两面’（即突破一点，两面以上围攻）、‘三猛’（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审审、批批、斗斗，追罪恶、挖根源、上挂下连，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搞臭敌人，歼灭敌人……**”——这是“群众运动”中“**毛氏规律**”的真实写照之一。

任何一个暴君，之所以能成其为“君”，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能天才地运用恩威兼施两手，亦即“宽猛相济”的君王统治权术。毛泽东在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立威的同时，决不会忘记张扬“天使”的一招，借以树立他赐恩泽于民的“伟大”胸怀，从而达到控制“群众运动”的目的。

1968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

1968 年 5 月 11 日。毛泽东在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时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1968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同时，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表示认同和支持，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的“**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意欲引起各级干部重视。

在“清队”高潮的 10 月，他又发出“最高指示”说：“**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此时，他明确提出在“清队”中“**要注意政策**”，对敌斗争中“**要稳、准、狠**”。

一贯坚持封建人治传统的毛泽东，他的上述说教，并非都是对“清队”讲的。但他的这些讲话，远比他在发动“清队”时说的那些杀气腾腾的“最高指示”，显然“宽容”、“理性”得多。但他的“宽容”是蔑视人权条件下的“宽容”，“理性”是毁弃法制基础上的“理性”：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亦即通过利用流氓无产者的暴戾恣睢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宽容”和“理性”，注定是个美丽的骗局和动听的谎言！请看：

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却使武斗愈演愈烈，导致五六十万人丧生；

毛泽东强调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要注意政策**”，不“**搞逼供信**”，却使逼供信泛滥成灾，导致三千多万人被斗，五十多万人死亡：

毛泽东多次强调“**重证据**”、“**要稳、准、狠**”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却使全国各地，捕杀成风。最高法院供认，文革中政府错判十七万多人，错杀数万人，“**狠**”得发狂；而在“横扫”、破“四旧”、“**群众专政**”中，又杀掉了数十万人，造成的冤假错案高达三百多万件！

在文革中，不论毛泽东发布的什么“立威”或“赐恩”的“最高指示”，都是以**毁弃法制、践踏人权**为前提，都是以肆意侵犯人权的“**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方式付诸实施的。

这就是毛泽东有党、有政府、有领导的“**群众运动**”！这是蔑视法制、践踏人权的中共赤文化。

毛泽东不愧是个天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他的理论家天才在于：他能把唯物辩证法哲学，归结为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理论，使人们无法指责他出尔反尔、信口雌黄的那种霸王兼恶棍的痞气。他的政治家天才在于：他策划的每项政治任务，都能借“群众运动”中的“**群众**”之手，进行批、斗、抄、打、杀，借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使人们无法指责他是残暴的打手和鲜血淋淋的刽子手。他的理论家兼政治家天才还在于：他能在把权力拜物教的无产阶级专政列为他的核心价值的同时，掩盖住他那嗜权入魔的权力情结；还能在拒绝自我反省的基础上，用“外因论”创造出一套“**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论**”，把政策失败的主要责任，“论证”成阶级敌人破坏或下面“歪嘴和尚唸错经”的结果，妄拒自我反省，借以掩盖他领导下的中共的祸国殃民的罪行。

1968 年 7 月 12 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看一看毛式有党、有政府、有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操作过程，这句“最高指示”难道不是无耻的谎言吗？

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许多人都曾按“**毛氏规律**”成功地领导过多次“群众运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都是侵犯人权的帮凶。

诚然，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中也不乏有良心者，例如原广东省委书记**方方**等。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当看见“**群众**”中出现侮辱、吊打、逼供信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法西斯暴行时，并不认可，甚至反感，但却不敢制止，不敢“**泼冷水**”降温，害怕挫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犯下同方方

一样不被毛泽东宽恕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心态，已深根于中共赤文化的基底中，使中共和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次“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地犯下**严重践踏人权的罪行**。对这种屡试不爽又司空见惯的法西斯暴行，中共利用“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专权，把它淡化为**“过左”**、**“过火”**，或诡称为**“扩大化”**。这是中共拒绝认错、认罪、不思悔改的表现！

因此，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再次根据**“毛氏规律”**去复制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在所难免！

二、“清队”简介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对他的“御医”李志绥说：**“我也常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百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 又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不怕死人的精神，各地诸侯和“父母官”们，遵照毛泽东确定的**“毛氏规律”**，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在运动中，他们充分运用毛的**“群众运动”**的专政武器，掀起了**“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的高潮，很快取得了“辉煌战果”。文革后，中共领袖们很快意识到，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辉煌战果”不宜宣传。为了树立亲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高大形象，他们决定封杀“清队”信息。为此，中共先后用“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监控系统，布下了天罗地网：尘封档案，扼阻调查，严控媒体，封锁“战果”。但在茫茫监控中，难免有忽忽之疏，眨眨之漏，致使许多“战果”经过不同渠道，流传了出来。

笔者从互联网上和官方出版的著作中，搜集到一小部分中共疏漏流出来的“战果”，将其摘要整理如下：

1、“清队”运动“捷报”频传

在**上海市**，局级以上干部有 1,019 人，其中，有 853 人被审查并遭毛式批斗；处级干部有 6,161 人，其中，5,868 人被审查并遭毛式批斗。1968 年 12 月的“清队”高潮中，全市被列为重大案件的有 965 起，重大集团性

案件 731 起，立案审查并遭毛式批斗的高达 169,405 人，其中，打死、自杀、折磨死（在遭毛式批斗中，突发急病或致病情恶化而死亡的）等非正常死亡有 5,449 人。在宝山县，文革初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 70 多人，而“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 334 人，为“横扫”时的 4～5 倍。在松江县，5,063 人被审查并遭毛式批斗，致死 236 人。金山县在审查和毛式批斗中，自杀 291 人，6 人出逃。在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 456 人。青浦县在 1967 年，一年武斗死亡 20 人，1968 年 4 月开始的“清队”，不到一年，非正常死亡的高达 170 人，为武斗死亡人数的 8.5 倍。在奉贤县的新寺人民公社，91 人被批斗，48 人遭揪殴，11 人致死。在华东师大，成百名学生被“隔离审查”，30 多个学生被逼跳楼自杀！

在**北京市**，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968 年 11 月的报告称：“**在刚刚过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揪’出了 8 万多‘阶级敌人’。**”伤亡人数不详。

在辽宁，凌源县“父母官”们，虚构了个“国民党反共救国团”案，立案审查、批斗了 913 人，致死 25 人，致残 51 人。长海县在“清队”中，109 非正常死亡，其中 5 人被刑具拷死，其余多为自杀。

在**广东**和平县，全县被立案审查批斗的“阶级敌人”，有 12,000 多人。伤亡人数不详。

在**陕西**西乡县，“父母官”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大打了一场‘清队’的人民战争”，揪斗了 10,000 多个“阶级敌人”。在安康县，清理出“阶级敌人”11,000 多名，其中 8,500 多被定为“敌我矛盾”。仅 3.25 万人的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 名，其中 8 人自杀身亡。清出的“敌人”数约占全县人口的 3.6%，符合毛泽东规定每次“群众运动”中的“阶级敌人”不超过 5%的教导。

四川省的新津县，被毛式揪斗审查的达万人以上。什邡县“清队”中，在批斗了 10,000 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各类敌对分子 2,600 多个。射洪县在“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先后导致 73 人自杀身亡。

1968 年 6 月，**河南**新安县召开了“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先将各类“敌对”分子挂牌游街示众，后将其中的 10,000 多人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

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敌人”11,000 多人。在武义县，9 月掀起

“清队”高潮，有 11,471 人被审查并遭毛式批斗。1968 年 5 月 1 日，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肩负起“清队”批斗来：先后关押了 6,425 人，其中，打成重伤 181 人，打死、自杀 59 人。

江苏昆山县人口为四十六万，“清队”中，各类“敌对”分子天天挂牌游街。到年底，全县共揪斗 18,000 余人，约占总人口的 3.9%，其数量也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在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队”，“有 13,326 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在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 15,000 余人，其中，8,400 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敌对分子。武进县“清队”时，“父母官”大喊大叫“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他们先将县一级的“牛鬼蛇神”100 多人，挂上牌子游街，大会批斗。有了榜样，上行下效，县以下各级革委会，先后揪出 14,600 多“敌人”进行批斗、挂牌子游街。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是个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虽不足一万，但到 1969 年 2 月，全旗从中挖出“阶级敌人”6,600 多人，打死 37 人，致残 30 人。

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揪出了三千多人，约占县人口的 1.5%，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扶绥县的昌平公社，“清队”时非正常死亡 23 人。其它各县“清队”状况，参看第 15 章“‘群众专政’在广西”一节。

总人口十二万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 2,648 个“敌人”，约占县人口的 2.2%，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金寨县的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清队”中打死 30 多人。

在**黑龙江**省宾县，“清队”中揪出各类“敌对”分子 925 名，致死 143 人，致残 32 人。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数万，关押看管了 1,500 多人，死亡 65 人。望奎县，“清队”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达 1,883 人，致死 55 人。伊春市带岭区，挖出 13 个“反革命集团”，整死 20 人。在兴凯湖边的密山县，揪出各类“敌对”分子 3,000 多人，打死、自杀 110 多人。笔者所在的三梭通公社，打死 1 人，自杀 1 人。笔者曾在 1959 年日记里批评过“三面红旗”因而获“恶攻罪”的那三篇日记，1962 年已被中共免于刑事处分，但在“清队”中，又被翻出来“清理”，险些被“**群众**”打死在那里。

在**云南**，镇雄县，由省革委会派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 107 人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在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 121 人非正常死亡。”

思茅县的“清队”历时两年，全县干部有一半被划为各类“敌对”分子，计 631 人；其中，叛徒 72 人，特务 24 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116 人，地主 86 人，富农 3 人，坏分子 72 人，右派 31 人，历史反革命 82 人，现行反革命 145 人。

据《长春公安志》记载：**吉林省**长春地区，从 1968 年 5 月至 12 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929 人。其中，打死和刑讯中拷死 184 人，自杀 1,745 人。长春地区外的**五个县**，情况最为严重：自杀 1,031 人，打死 172 人，共计 1,203 人；其中榆树一个县，就打死 61 人，自杀 342 人，共计 403 人。

江西万年县总人口为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揪出“阶级敌人”8,107 个，约占县人口的 3.9％，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酷刑。这些酷刑是：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子、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高温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斗时，用电触奶头，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文革后，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折磨死的有 214 人。

1968 年 5 月，**山西**乡宁县“清队”时，“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 1,200 多人次，打死 26 人，打伤、残 50 多人。6 月，他们抓捕了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中，打死 3 人，打伤、残 10 多人。

以上仅为 17 个省市部分地方的很不完整的记录。

当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口传这样一首民谣：

站不完的队，
请不完的罪，
埋不完的亲人，
流不完的泪。

这个民谣，道出了在“**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最高指示”下“**群众运动**”悲惨情境的一角。

史学家丁抒认为：全国两千余县，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城市，约有三千万人在“清队”中遭迫害、折磨，五十万死亡。

2、**革命军人风光无限**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指挥者。这些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拼杀的慓悍将军们，打着“支左”的旗号介入地方后，便找回了昔日战场上的感觉：以强而有力的威慑征服“阶级敌人”，恫吓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当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后，便本能地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大喊大叫“**刮红色台风**”、“**刮十二级台风**”和“**刮二十四级台风**”，成了毛泽东镇压包括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阶级敌人”的先锋官。全国各地发生的大规模迫害事件，几乎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进行的。“清队”运动展开后，他们再次找回了战场上的感觉：要取得“胜利”，就要充分利用“**群众运动**”的群羊战术，不顾一切地“地毯轰炸”、“密集扫射”，从而达到征服“敌人”的目的。

⑴、在黑龙江大庆油田，担任军管会主任后又当了革委会主任的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从 1968 年初“清队”开始，便制造红色恐怖。据报导：“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由于“清队”有功，不久晋升为陆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⑵、原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少将，因向副统帅林彪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许光达大将对林副统帅“**最不满、最仇恨**”有功，荣升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并当了“封疆大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在“清队”中，他提出了“三查”任务和“三群”方针。所谓“三查”是：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所谓“三群”是：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他的所谓“**群众**”，当然就是包括各基层单位掌权人在内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一个标准流氓、强盗的官腔！

“三查”中，**江西**各地疯狂屠杀“阶级敌人”。据披露：兴国县杀了 270 多人，瑞金县杀死了 300 多人，于都县杀了 500 多人。其中，在江西瑞金县屠杀时，一位目睹者写道：

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

兴国县的“革命干部”屠杀的 270 多人中，有 19 个人杀得随心所欲。xx 公社抓来了 19 个“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和反革命组

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事后查明，这些官衔都是中共“革命干部”出于杀人需要而捏造的。）当他们被捆在树上准备杀掉时，县里来人下达了不准随意杀人的通知。公社“三查”领导小组的这位“革命干部”，不听那套，他“**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 19 条人命就这样被断送掉了。

在**武宁**县黄沙大队，“**群众**”根据“三群”方针，创造了多种刑讯逼供和处决方法。如棒打、烟窑、火烤、踩杠、跪瓦片、吊光砖、打土雷、假活埋等，先后处死了 3 个“阶级敌人”。大队“三查”负责人**龚兼兴**，从县里开会回来，便把地主孙子**郑家树**拉出来批斗。他煽动说：“**县里‘三查’还要厉害，打得肉都喷到墙上去了，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斗反革命就得凶狠一点，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还节约几颗子弹，怕什么**！”话音刚落，他的弟弟**龚兼隆**手起刀落，便把郑的右耳朵割了下来。负伤的郑家树，连夜出逃，在外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回来时已家破人亡：祖母病死，妻子改嫁，弟弟伤残，唯一宽慰的是儿子，侥幸长到 15 岁！

在**瑞金**县一个小理发店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那里有三个理发师傅，其中，两个出身成份好的师傅说自己是革命群众，将另一个闹别扭、合不来的师傅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根据**程**司令“三群”方针，两个人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宣判另一个“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将其打死，并在理发店门口张贴布告公示。对此，许多过来人都认为，在“**群众专政**”荒谬绝伦的年代里，“**群众**”什么事干不出来？因此，看似荒谬事件，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⑶、1968 年 5 月 19 日，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中将，取代李成芳当上了昆明军区政委，8 月 10 日，又被任命为**云南省**革委会主任。他上台伊始，正值“清队”运动蓄势待发，他便以“划线站队”切入运动，使“清队”声色具厉地开展起来。

为了追查所谓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曾作过很多“指示”。他说：“（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 990 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

谭说“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是什么意思呢？1964 年 5 月 16 日，毛泽东曾说：“**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

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换言之，专政的对象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五。显然，**谭**要“群众”抓、揪“阶级敌人”的数量，可以突破毛的 5%的“最高指示”。

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一地，在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 700 多人，打残 1,000 多人，打伤 10,000 多人。临沧地区在追查“慰问‘滇挺’”一案中，就株连 10,000 多人，其中 2,000 多人被吊打，500 多人被打伤、打残，600 多人被打死、逼死。

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 600,000 人；其中，曲靖有 20,000 多人被批斗，2,000 多人被关押，4,000 多人被打伤，2,000 多人被打残，200 多人被逼死，100 多人被打死。

在**蒙自**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宣布：“炮派”组织“站错队”的，都是刘少奇、阎红彦（原省委第一书记）、赵健民（原省委书记）在蒙自的代理人。当晚，他下令就抓捕了 200 余人，数十人打成重伤。全县 7,823 人被划为站错队；其中，被捆绑批斗的有 2,624 人，打伤 385 人，打残 103 人，非正常死亡 67 人。此案受株连的亲属子女，约 10,000 余人。

腾冲县从 1968 年 12 月开始划线站队，被批斗人数达 4,654 人，吊打致死 15 人，逼死 71 人，打伤、致残 247 人。

据 1982 年 4 月 29 日报导，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透露，在追查“ 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等案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达 1,380,000 人，其中，打死、逼死的有 17,000 多人，打伤、致残的有 61,000 多人。仅在昆明市，迫害致死的就有 1,473 人，打伤、致残的有 9,661 人。

又据 1975 年的统计，全省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 300,000 多人，其中，37,000 人死于非命。

这个沾满云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谭甫仁，当了中共和毛泽东土地革命、阶级斗争等制造仇恨政策的替罪羊，1970 年 12 月 17 日遇刺，死于被隔离审查的当年还乡团的嫌犯军区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的枪口之下。

⑷、天津市塘沽碱面厂有 8 个工程师，被**军管会**定为特务。据报导：**“军代表指挥打手，将他们抓起来刑讯，不久 8 个工程师全部死于酷刑。其中一位刘姓老工程师的妻子已五十六岁，也被关押。她被逼交电台，交不出就打，还不给饭吃。折磨了两年后放回到家里，军代表扔给她一个骨**

灰盒了事。”

⑸、又据报导说：**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 809 人，受审查的有 262 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 120 人……并有 5 人被迫自杀**。”

⑹、**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少将，宣布“**陕西敌情严重**”，在“清队”中大揪“国民党特务”。**汉中**制造飞机的一七二厂，在国民党时期就在该厂做工的老工人，先后有 60 多人被抓进“学习班”里。“学习班”用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和全身通电等手段刑讯逼供，很快逼出了个“特务集团”。其中，500 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 1,000 多人。运动中，逼死了 21 人，自杀未遂 15 人，打伤、打残 74 人。其中一个工人妻子，听说丈夫被打成特务后，在极度悲愤中，用煤油浇身自焚。在**铜川**市焦坪煤矿，胡炜少将深挖“反共救国军”组织，株连 500 多人，逼死 8 人。最终证明：“**此案子虚乌有**”。

⑺、**辽宁台安**县成立革委会时，原县委**武装部长**被任命为主任。他一上台，便在全县按全国统一部署，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报导：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坐‘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运动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1,288 名，135 人死于非命，许多人致残，43 人被判以徒刑。

⑻、1968 年，**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提出要在农村“**刮十二级台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如何办？知情人这样写道：

㈠、利用民兵举办“劳改班”。譬如庆阳地区关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几十种。

㈡、以“大干社会主义”为名，不论炎夏寒冬，强迫农民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

㈢、在“专政”的口号下，农村干部打人骂人罚人成风。有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扬言“**打出了高产就受奖励**”、“**学大寨还不死几个人**”!

由于冼恒汉已被打成林彪死党，国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便组织一个联合调查组，赴甘肃调查。调查后，联合调查组在报告中写道：“**普遍侵犯农民人身权利的县，在甘肃不会少于二十个**!”“**估计全省直接被迫害致死的农民不少于万人，冤案如山。**”

⑼、**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中将任主任。在“清队”中，区革委会正式提出深挖“内人党”后，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内，“胡抓乱捕”随之成风。全区有 346,000 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终身致残者多达 87,180 人，整死的则多达 16,222 人（另说死者达十万人以上）。挖“内人党”事件引发自治区上层分裂，政局不稳。1969 年 12 月 19 日，中央不得不对内蒙实行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赴内蒙，取滕海清而代之。

⑽、在**广西**魔头**韦国清**的治下，“清队”运动妖雾翻腾，许多军人都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在广西大刮“**十二级台风**”的“**群众专政**”，屠杀了 18 万“阶级敌人”，当了全国省级第一杀人魔头。

3、**革命干部频出绝招**

由于黑河地区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因此，他确定，“清队”的重点是抓日特、苏特、国民党特务。黑龙江岸边小城**嘉荫**县也抓起特务来。全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刑讯中致死 7 人，致残 192 人。离嘉阴县 400 多公里的**望奎**县，也大挖苏特、蒙(外蒙)特和朝(北朝鲜)特，挖出特务等“阶级敌人”1,883 人，导致非正常死亡 55 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抵**邯郸**市指导“清队”运动，彻查“国民党员案”。在他的指导下，邱县搞得尤为激烈。教育局局长刘雷被打成了“国民党员”，在刑讯中被拷打致死。为了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有 50 多人先后被打成“国民党员”，拷死多人。

在**云南**省左、右两派角斗和“清队”中，毛的“群众”，借助“群众专政”的威力，揭出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健民是其负责人。1968 年 1 月 21 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指控赵健民是叛徒之后，整个云南便掀起了抓“**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特务分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有 138 万人受牵连，17,000 多人被打死、逼死，61,000 多人被打残。其中，昆明市就打死、逼死 1,473 人，打残 9,661 人。

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头头们，在“清队”中提出了个“**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的口号。显然，他们要力争头筹，要把“刮十二级台风”的广西，远远抛在后面。5 月间，他们先将县一级的现有的“牛鬼蛇神”100 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小会斗，满城游街，为县以下各级政府做出了个榜样。

湖南凤凰县的“父母官”，把所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子女，

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查抄，美其名曰**“政治大搜查”**。在**攸县**，革委会头头们提出了**“横扫政治垃圾”**的口号，并武力实施：1968 年 9 月，他们在县城召开大会，批斗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然后挂牌游街示众。据官方记载：全县抄家 5,000 多户，拘捕 9,000 多人。

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和副主任**杨德志**上将，在枣庄制造了一个**“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事件中，有 11,720 被抓，10,659 人遭毒打；其中，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 2,425 人，致残者 692 人，打死、逼死的 94 人。在**临沂地区**，他们“挖出”了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深“挖”中，全地区有 40,000 多人被抓、关和毒打；其中，有 9,000 多人被打伤、致残，569 人被打死、逼死。

江青说句**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后，天津市革委会不敢抗旨，立即行动。于是，天津市公安局 1,200 多干警被审查；其中，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在内，被逼死、整死的多达 44 人。

河北深泽县是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在江青说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之后，天津市的**“群众”**头头们，便制造出了一个由 307 人组成的“深泽叛徒集团”。并抓出叛徒 1,500 多人。在抓叛徒过程中，非“群众”的老百姓，受株连的竟高达三万多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5%的敌人指标。在白庄，“深挖”中打死“叛徒集团”成员 3 人。

4、**工人阶级难免灾祸**

工人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不是文革斗争目标；但自毛泽东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和发出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最高指示”后，曾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工人的老工人，便成了“清队”中的主要清理对象，堕入了挨批、挨斗和刑讯逼供的灾难之中。

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也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的典型之一。“御林军”8341 部队在“清队”中，把 900 多名“解放”前老工人确定为“审查”对象，约占“解放”前 1,400 多老工人的三分之二。又从“审查”对象中抓出“敌嫌”200 多名；其中，32 名被戴上了各类“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4 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14 名老工人被逼自杀身亡。

⑵、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石油企业。“清队”中，凡中共接管油矿时已年满十八岁的工人，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

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个“阶级敌人”。革委会还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 9 名干部和 8 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

⑶、在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 **32109 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进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⑷、在“清队”中，**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打成“反共救国军副司令”；一个不识字、以买豆腐为生的**矿民**，被打成了国民党“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矿民**，也被打成“胡宗南部少将旅长”，等等，结果都是子虚乌有。

⑸、**在石家庄铁路局**，“清队”使该局 1,000 多人变成了“特务组织的成员”。他们被关进“牛棚”后，遭到了名目繁多的刑讯逼供。如：坐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他们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犯人趴在地上吃，早晨起床，逼迫他们用小便互相冲头，互相拷打，舔血和喝尿，等等。文革后，官方的记载也不讳言：“**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达 1,645 人，其中，致死 48 人，致残 128 人。

5、知识分子再遭横扫

文革伊始，毛泽东先拿被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开刀祭旗：在“横扫”和破“四旧”中，使他们首当其冲，对他们进行了**批、斗、打、抄、杀**式的“革命”；这还不解恨，“清队”中又把他们拉出来“再革命”。

⑴、大学“清队”

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捕、关、游斗的就有 300 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有 18 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有 6 人，被错判刑的有 16 人。

兰州大学：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 450 人，迫害致死的就有 23 人。

安徽大学：在“支左”军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教职员工被审查的有 262 人，约占全部 809 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 120 人，有 5 人被迫自杀身亡。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中，五分之一被“审查”，178 人被定为“敌

我矛盾”，12 人自杀身亡，包括两位一级教授。

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队”期间，共有 24 位教授自杀身亡。

苏州大学：有 10 多个“有历史问题”老教师自杀。自杀方式是跳楼、跳河、跳井、喝农药；更为惨烈的是，一位老教师朝自己脑门上猛砍一斧，脑壳迸裂而死！

华东师范大学：“清队”运动半年，800 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 多人卧轨、跳楼、割脉、服毒自杀身亡。

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清队”中被打死，4 月 21 日尸体从三楼扔下。周恩来闻讯后，“安慰”郭氏夫妇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是符号和女作家谢冰莹的女儿。谢冰莹在抗战胜利后，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符号 1950 年应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职，1957 年反右时，与部长章伯钧一道成为右派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中，符号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符冰在戏剧学院“理所当然”地成了“清队”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爬上学院建筑的最高层，纵身而下。学院“**群众**”和“革命领导”们，很快给符号发了一则电文：“**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

以上九所高校，约占当年高校数的 3.5%左右。由于档案尘封，调查阻扼，笔者无法知道毛的“**群众**”在其他高校里“清队”中的“战果”。

⑵、中、小学“清队”

江西崇义县将全县近千名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

河北邢台县，400 多名教师在“清队”中被“审查”，8 人被逼自杀身亡。

山西省山阴县 600 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队”，一位刚从北京分配去的大学生记述道：“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栓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

广东和平县 1,100 百余名中、小学教师，424 名被抓起来“审查”。全县被揪斗的“阶级敌人”12,000 多人，致非正常死亡 243 人，伤残 750 多人。其中有多少是中、小学教师呢？笔者无法考知。

笔者仅知以上四县。全国县以上市镇 2,000 多个，中、小学校数万所，“清队”中有多少教师伤、残、死亡？与大学“清队”雷同，在档案尘封、调查阻扼的专政下，包括笔者在内的老百姓，无权知晓。

⑶、科研界“清队”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和**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负责“清队”。他们说：**“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像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像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 40 多处监狱，先后关押 4,000 多人。在那里，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政治审查调来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被“清理”成“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扬言：**“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他们所杀就杀，先后枪毙了 5 人，并命令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埋尸体的坑，待以后枪毙人时使用。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 59 人，打伤、打残有 300 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1968 年 5 月下旬，“清队”的台风刮到该所，157 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成员。在那里，拷打是“家常便饭”，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先后被拷打致死，许多人受伤、致残。12 月，省革委会下令撤销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全体教员、研究人员，被遣往农村和工厂去劳动改造。

在**中国科学院**的“清队”中，自杀的一级研究员有 20 人，其中有被后人称为“人造卫星之父”**赵九章**。在赵自杀前，一级研究员、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在 1968 年 6 月 8 日那天，被打死在批斗会的现场。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 600 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 多人被“隔离审查”，2 人被活活打死，10 人被打成残废，4 人自杀，9 人自杀未遂。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1950 年从美国被“统战”回国，1957 年划为“内控右派”，“清队”又升级成了“反革命特务”。1968 年 10 月，该所“工宣队”派人将他家的财物查抄一空，把他关进“牛棚”。宁死不屈的萧，在遭侮辱和鞭打后，服安眠药自杀。“工宣队”并不罢休，他们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到研究所“继续交待”。甄见到丈夫的遗体后，便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萧络连**一同服药自杀。萧光琰一家死后，“工宣队”在以“特大喜讯”的大字报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的同时，成立专案组，全面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使数十个无辜者因株连而惨遭批斗。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了这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后，将其“经验”写成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⑷、文艺界“清队”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张海默**，1968 年 5 月 16 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年四十五。

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在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后，自杀身亡。

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团体人员，被集中到“**学习班**”“学习”。“学习”期间，被班里毛的“**群众**”打死、逼死 7 人，包括著名电影演员**冯哲**，打伤 40 余人。在各县，打死、逼死、打伤、致残的不计其数。其中，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惨死在“学习班”里。

3 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一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

4 月，黄梅戏一代名优**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七岁。

11 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主席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当晚，这位曾与毛“亲密”接触过的上官云珠，从家中窗口跳下，自杀身亡。

革命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演出。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组织起来，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遂将 4 个主要参演者逮捕。1969 年 9 月，**谈元泉**被处以极刑！

6、传统“阶级敌人”再遭魔难

在数十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中共树立了 3,000～4,000 万个“阶级敌人”。其中：土地革命和土改运动中，树立了一千多万个地主、富农；镇压反革命和肃反运动中，又抓出了上千万个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反右运动中，除反出了 55 万个右派分子外，同时还反出了数百万个坏分子、档案右派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一化三改造”、“三面红旗”运动中，又划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白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四清”运动中，又反出了数十万个“漏划”的地主、富农、右派和坏分子；到了文革，又揪出了以千万计“牛鬼蛇神”、“黑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除文革新揪出的“阶级敌人”外，其余约三千多万人统称“**传统敌人**”。这次“清队”，“传统敌人”都要重新“清理”一遍。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改时已被没收，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开始大规模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传统敌人”再次任人宰割。

在**湖南**，凤凰县把所有“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查抄，是谓“**政治大搜查**”。在攸县，全县开展“**横扫政治垃圾**”，查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5,000 多户，拘捕了 9,000 余人。9 月，邵东县用两个晚上，全县统一行动，绑走“坏人”9,243 人，查抄财物折人民币 71 万元。醴陵县在“**刮红色台风**”中，抄家 7,824 户。

在**甘肃**，正宁县革委会头头们认为，1966 年的破“四旧”不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等农户，强行查抄。全县查抄出白银 2,585 两，银圆 15,000 元，使已过了十七年清贫生活的“传统敌人”，陷入赤贫中。

在**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4 月成立的革命委员会，5 月里就下令“**揪斗牛鬼蛇神**”，没收“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黄金、白银和银圆，折合人民币 287,885 元，房屋 92 幢。

在**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 3,000 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 60 人被关押，183 户“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被封门抄家。1966 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圆，这次基本搜罗干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

在**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400 多“传统敌人”被抄家，造成 10 人死亡。

在**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李玉堂在 1949 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在台湾被枪决。“清队”时，李玉堂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因此，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人，都成了审查对象。如：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都成了审查问题。大王桥 500 户的庄子，揪出了 200 多“阶级敌人”。枣庄在“清队”中，“传统敌人”被抄家的有 5,014 户。

在**北京**，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被批斗成“反动学术权威”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劳改。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1968 年 9 月底，**米母**自缢身亡。

在**甘肃**，庆阳县开展“深挖底财”和“金银大扫除”运动，有 5,062 人被揪斗，对他们实行批、斗、抄、打、杀式的“**群众专政**”。

“清队”中，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1970 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两万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查“二十六种人”，共抄了 4,683 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

又据报导，1968 年秋，**江苏高邮县**一个村子的贫协主席郭金贵，找到本村的地主分子王世昌说：“**你要不挨斗，就把女儿嫁给周家，我就给你把帽子摘掉。不然，挨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王屈服了。但他的女儿王

家娟却不肯如此嫁人，见周家送来订婚礼后，便以死抗婚。获救后，母亲哀求她：**“要成全父亲，否则你父亲的帽子永远摘不掉。你们做子女的也就要背一辈子黑锅。”**她终于屈服了。就这样，一个二十年前的地主女儿，被带到周家，做了贫农儿子的老婆。

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单身笔者寄宿在三梭通公社食堂的公炕上。除舖盖和几件衣服外，主要财产是两个木箱装的 300 多本书。“清队”中，被公社专案组以查抄“反革命”为名，连木箱全部抄走。

7、狠抓“漏划”，增加新敌人

每次“**群众运动**”都要新增加一批敌人，这是毛泽东的统治权术。据报导，在“清队”中，毛的“**群众**”运用“毛氏规律”，挖出了“漏划”或“漏网”的“地富反坏右”等“**新增加的阶级敌人，高达数百万人之多**。”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农村牧区搞重划阶级成份运动。“漏划”的“阶级敌人”480 户，株连 2,118 人，批斗 683 人，死亡 17 人，严重伤残后死亡 20 人，致残 30 人。

江西景德镇在“清队”中，新挖出的“敌对阶级分子”972 人。其中，地主 156 人，富农 145 人，资本家 464 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 207 人。 此外，还有 380 个“怀疑对象”，当做下次运动的“漏划”储备。

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清队”中，新挖出的“阶级敌人”达 9,835 个。

尽管在“主旋律”的监控下疏漏出来的历史记录少得可怜，但笔者仍然认为：**“新增加的阶级敌人，高达数百万人之多”**是可信的。因为，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都能拍脑袋“证明”：他代表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数“**群众**”；他告诫各级干部，“**不要扩大打击面**”，阶级敌人“**不超过百分之五**”，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二、三左右**”。对此，笔者做了个粗略计算：“解放”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有 27 次之多，而当年全国平均人口约为六个亿；如果每次运动“挖出”的“阶级敌人”按百分之一计算，则每次运动“新增加”的阶级敌人应为六百万。实际上，小运动可能远远低于这个数，大运动则可能超过这个数。据报导，“清队”清出“新”的“阶级敌人”，约在千万以上。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当运动高潮过后，毛泽东的中共，会用“先严后宽”亦即“**宽猛相济**”的权术，采取“落实政策”和“平反”等“降温”措施，去缩小打击面，压缩这个数。例如，笔者曾三次打成“反革命”，又三度被“解放”成“人民”!

8、少数民族难逃厄运

四川凉山彝族区的“罗罗王国”，1956 年“民主改革”后，“奴隶主”黑彝阿侯交出了一切财产，仅允许留一点土地和牲口以维持生计。十二年

过去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清队”中，副县长下令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在血泊中还在吮乳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人，侥幸躲过屠杀。那个区革委会主任因立场坚定，杀人有功，遂升任为副县长。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在“评审四类分子”时，刑讯逼供，打死和用刀子捅死 6 人，被迫自杀 10 人。

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鼓动“**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 110 户人家，有 44 人被揪斗，打死、致伤 41 人。

9、海归、留用人员命运凄惨

在海归、留用等统战人员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与“解放”初期收罗人材的“开明”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充分暴露了中共统战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从香港统战回国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和为中国争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清队”中，都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在遭到多次侮辱、游斗、毒打后，相继在 1968 年 4 月、5 月、6 月，悬梁自杀。

傅其芳，1923 年生，原籍浙江宁波；姜永宁，1927 年生，原籍广东番禺。1952 年，傅其芳与姜永宁从香港一同来参加全国乒乓球赛，姜永宁获冠军、傅其芳获亚军。之后，他俩都被选入国家乒乓球队，成为国家乒乓球男队的主力队员，多次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赢得荣誉。1957 年后，两人都退役，傅其芳出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对中国队在第 26 至 28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和男子团体冠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姜永宁先担任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后担任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

容国团，原籍广东中山县，1937 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海员之家。1957 年从香港统战归来，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 年，入选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59 年，在第 25 届世乒赛中获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1 年，参加第 26 届世乒赛，成为中国队第一次获得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功臣。1963 年，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1965 年，率领中国女队获得第 28 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名曾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民族精英，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工宣队**”挖出的这个香港“潜伏特务组织”，是一颗特大的“定时炸弹”，而傅、姜、容三人的“畏罪自杀”，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体育界“**取得了辉煌胜利**”的又一证明！

1938 年国共合作，周恩来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主任，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周、

郭利用权力，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文革中，这些文艺工作者多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清队”时有 14 人被迫害致死。第三厅下属的电影制片厂，属国民政府军编制，女演员**舒绣文**被授校级军衔，文革却成了“反动军官”。1968 年她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从**菲律宾统战归国的干部**中，有 200 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中，致死 10 多人。

在**辽宁凌源县**，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案，被揪斗 913 人，致死 25 人，致残 51 人。

1968 年 6 月，**上海市**革委会《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的报告中说：**“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 400 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国民党的特务、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200 多名。”**

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构陷了一个**“反共救国军库北地下野战军”**，100 多人受审，其中 7 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

10、卸磨杀驴造反派殉教

贵族红卫兵和右派造反派，都是卫旧派、保守派，他们保卫的是中共一党天下，保护的是 17 年的既得利益；平民红卫兵和左派造反派，多是改革派，他们渴望通过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教义，合法地冲击旧的专制体制，造官僚特权阶级的反，来争取平等权利和改善贫困状态。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前者正在接近目标，后者则离目标越来越远。其中，多数左派造反派，已变成了“造反有理”教义的殉教者。本书中，第 12 章的“武汉左派残局”、第 15 章的“左派‘四二二’的末日 ”和第 17 章的“取缔左派红卫兵”，就是殉教者证明。

在在“二月镇反”中被捕而到 4 月《军委十条》下达后被释放出来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派，在内战中冲锋陷阵，为毛泽东夺取刘、邓右派集团的权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被誉为“响当当”的左派造反派，成了毛、林、周和中央文革的宠儿。但当毛泽东与党内右派达成妥协，遂收回“造反有理”教义，使“响当当”的宠儿们命运突变，旋即失宠，迅即成为毛和党内右派镇压的对象。到了“清队”，他们在劫难逃，坠入“狡兔未死烹走狗”之中。

在**湖南宁乡县**，左派造反派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等罪名关押起来，造反派组织自此解体。

云南省“清队”的主要内容是“划线站队”。在两派斗争时，站到左派一边的都成了审查对象。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最为惨烈的是**广西**“四二二”左派造反派。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变化，很快被戴上了“牛鬼蛇神总司令部”和“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帽子，变成了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组织”。仅在 1968 年 7 月至 8 月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军区、各人武部和各地右派造反派，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四二二”及其支持者，全区枪杀和迫害致死“阶级敌人”达 84,000 多人！

三、大案剖析

各地诸侯和“父母官”们，遵照毛泽东“**群众运动**”的“**毛氏规律**”，在发动和领导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中，充分运用“**群众专政**”武器，轰轰烈烈地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灭绝人性的大血案！

1．镇压蒙族“新内人党”血案

1968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根据中央决定，指示在内蒙古抓“**新内人党**”。在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的领导下，在包括内蒙古军区在内的整个内蒙古地区，开展了一场“深挖新内人党”运动。运动株连上百万人，其中，70～80 万人遭逮捕和关押，近十万人被迫害、折磨致死，受害者 70%以上是基层蒙古族干部和群众，堪称文化大革命中天下第一大血案。但官方承认的数字却少得多。官方承认：有 346,000 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在刑讯逼供中，打死、自杀的有 16,222 人，致残 120,000 多人，致伤者不计其数。

这就是因**怀**疑蒙古人有二心，毛泽东特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赴内蒙古，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新内人党”事件。

主仆权斗，毛乌角力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乌兰夫汇报时，对民族问题作了规定。他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主义**。”显然，他要共产主义丛林文化取代民族自治文化，推翻了他亲手制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民族自治的条款。如：《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等。历史已经证

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独裁下，无论是毛泽东或是中共的其它当权派，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立场都是一致的：强调自治，就是分裂；由党全面控制，就是“自治”。他们对汉族占绝大多数的香港人尚存疑虑，不放心，拒绝兑现“港人治港”的自治承诺，何况其它少数民族？他们不放心那些在自治区里担任一把手的本族干部，不论他们是否是忠实的中共党员。因此，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国五大自治区的一把手，都是由清一色的汉族担当。《宪法》上规定的自治，完全是一派谎言！

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使蒙族吃尽了苦头，政治、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外蒙古；文革中，又使他们雪上加霜，陷入贫困加迫害中。

当时，身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的**乌兰夫**，对空头“自治”很不高兴。良心再现使他利用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权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的民族、民主措施，与毛泽东的僵死教条相周旋。

乌兰夫称赞中共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民族政策，他提出在牧区实行和平过渡，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较为宽容。1962 年 4 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干部，都是过去的亲王、公主，……而且工作得很有成绩。所以，各族人士，各阶层、宗教上层人士和一切爱国的，赞成实行民族自治的各阶层人民，我们都团结了，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同时放手使用他们**。”又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保卫着宗教信仰**。”1965 年 12 月，他在一次会上说：这个政策**“调动了牧主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他主张与牧主和宗教上层和谐相处。

乌兰夫的这些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中共 1961 年起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群众的物资和文化生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受到了内蒙古大多数人的拥护。但这一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却受到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的指控。他们指责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指控乌安插亲信、打击汉族领导干部，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5 月 21 日，中共华北局按毛的指示，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批判乌兰夫工作会议，史称前门饭店会议。内蒙古党委常委、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等计 146 人，参加了会议。8 月 16 日，中共中央根据“前门饭店会议”精神，下令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并将其监护在北京。于是，一场以批判和打倒乌兰

夫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自治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构陷升级，肃乌流毒

乌兰夫是个对中共忠诚的大员，历史清楚，没有叛徒、特务的嫌疑，也没有投靠苏修、外蒙修的把柄，因此，仅以“走资派”的理由去打倒他，很难服人。于是，紧跟圣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政治局委员**江青**等人，便将主持内蒙古政权的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等人召到北京，面授机宜。1967 年 10 月，康生对滕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壁、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面对由毛泽东挑起的内战因而使内蒙古政局动荡、武斗频繁的局面，康生栽赃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此前的 4 月 27 日，周恩来曾当众高呼：“**彻底批判内蒙古的反动路线的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把他们批倒、批臭、批垮**!”领到“圣旨”的滕海清，回到内蒙古，便打起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时称“**挖肃**”的“人民战争”来。

祸起萧墙，作家虚构

在“挖肃”中，作协内蒙古分会主席、长篇小说《草原烽火》作者**乌兰巴干**，以小说家的敏锐观察和巧妙构思，罗织一篇《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这篇构陷“新内人党”的报告，秘密送进了“滕办”，飞入了中央文革和中南海。所谓“新内人党”，它的前身是成立于 1924 年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年，这个党是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1946 年它接受中共指示，已停止活动。权力在手的小说家，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一个女演员同刚从外蒙古归来的蒙大一位男教师的暧昧关系上，切入制假，把已停止活动二十多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演义成重新恢复活动的地下“新内人党”。严刑之下，竟从女演员嘴里挖出了个“新内人党”人单。“新内人党”案由此浮出水面。

康江面示，海青出手

清理阶级队运动伍前夕，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召见了滕海清一行。康生、江青向滕海清等人施压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还严厉批评道：“**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还向他们面授机宜：“**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

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滕海清及其打手们，秉承北京旨意，在内蒙古继续“挖肃”的同时，又发起了深挖“新内人党”运动。滕海清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六个“需要”把深挖小说家乌兰巴干虚构的“新内人党”案，摆到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案首：一场人为的新的兵燹之灾，又烧到了内蒙古人民的头上。1969 年 2 月 26 日，以滕海清为首的区革委会，做出了关于清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规定》说：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新内人党”是在 1946 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1947 年 4 月 20 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 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藏、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的组织。

“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特务机构，采取特务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盗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活动。

《规定》发誓说：

总之，“新内人党”反动透顶，罪恶累累。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我们必须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把这个反革命集团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从政治上彻底批臭，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规定》还做了具体规定：

1、坚决打击证据确凿的首要分子（上层领导机构成员）和支部书记以上有重大罪恶的分子。对这些分子也要区别对待，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对坦白交待好的，有主动表现的应从宽处理，贯彻执行“给出路”的政策。

2、一般党徒要通过办学习班，讲清问题。只要他们彻底交待就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虽系一般党徒，但有重大罪恶，民愤很大的而态度恶劣的分子则应严惩。

3、对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农村、牧区的大、小队干部、青年学生、干部家属和职工家属中受蒙蔽参加了“新内人党”的人，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对“新内人党”反党叛国罪恶的革命大批判，启发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只要他们从组织上、思想上与“新内人党”划清界限，就不再追究。

4、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如发现有混进来的“新内人党”分子，应上报材料经领导机关批准，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5、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子女应坚决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1968 年 12 月 26 日的通知的精神执行。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家属也不应歧视。

6、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主要在公社以上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农村牧区也要把“新内人党”挖出来，但主要应采取正面教育，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

7、凡是由“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操纵的，它的纲领与“新内人党”基本一致的组织，如“统一党”、“兴蒙党”等均为“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一律按“新内人党”对待。

随着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入发展和层层加压，内蒙古“挖肃”和深挖“新内人党”运动，在自治区全面展开。

层层加压，直捣“羊群”

滕海清在中共中央首长们压力和直接督导下，亲自深入到挖“内人党”的第一线指挥作战。1969 年 1 月 8 日，他说：**“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来了。”**

1969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首长们又给滕海清加压。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说：**“军队里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煞有介事地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又说：**“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黄永胜**杀气腾腾地说：**“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遗憾的是，没见有跟康、江同在一线指挥“清队”的**周恩来**的谕示，显现“主旋律”褒贬人物潜规则的狡黠，也再次显现草根难觅秘密档案的无奈。

中共中央首长们的压力，使滕海清及其打手们更加有恃无恐。他们陆续派出了大批工宣队、军宣队去领导深挖“内人党”运动。由于人手不够，他们把北京和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唆使他们为工宣队、军宣队打头阵。其中，有北京的知青典型，成了深挖“新内人党”的杀手。各级工宣队、军宣队，都接到了各个上级的层层压力，与各级**“群众专政指挥部”**结合在一起，私设牢房，大搞逼供信，实施**“群众专政”**。各级工宣队、军宣队队员和知识青年，绝大多是汉人，其中，许多人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整肃起蒙古人来毫不手软。就这样，一场在中共中央不断压力下、由汉族刽子手滕海清督战的、祸害百万人致死近十万人的深挖“新内人党”运动，到 1968 年 12 月，已进入了高潮。

在上层，在内蒙古党、政、军、群机关里，运动整死了许多“新内人党成员”，其中包括：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吉雅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哈丰阿，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原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将**达理扎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和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人。在下层，运动直挖到蒙古包的“羊群里”，致使数万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都死于非命。例如：昭乌达盟挖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 450 多个，其中，集团性质的 146 个，全盟 27,000 多人受害，非正常死亡 2,000 多人；汉蒙杂居的一百二十多户人家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打斗“新内人党”毫不手软，14 人被打死，16 人被打成终身残废；武川县由汉人领着深挖“新内人党分子”，致全县 80 人死于非命，伤残不计其数。

恣意妄为，酷刑种种

汉族刽子手**滕海清**及其打手们，“群众专政”手段之残忍，达到恣意妄为、令人发指的境地！

据披露：刽子手们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已是“家常便饭”。此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法西斯刑法：一个男青年拒绝招供，被割下生殖器；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男青年，被架在火上烤死，名曰“烤活人”；一个女青年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在哲里盟，有一个妇女被逼与公牛交配；还是这个哲里盟，一个牧民被挖掉两眼，名曰“取走两只灯泡”；在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者，有被割去耳朵者，有被砍断胳膊者，有被砍断大腿者，其惨状目睹者不堪回首。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到了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 1,600 多次后，他申辩道：**“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剖胸自杀，露出来的心脏还在微微搏动……

受害者在酷刑折磨下，屈打成招。根据专案组人员的诱导，受害者编造出了令刽子手们满意的假笔记、假文件、假党旗、假印章，等等。如：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的白音公社，一位教师被指是“内人党”人，为了换取“从宽处理”，他不得不按专案组的要求，伪造了一份“党纲十二条”上交；在内蒙古军区，一位军官被指是“内人党”人，在严刑之下，他不得不让妻子用孩子的红领巾，伪造了一面画有锄头和套马杆的“内人党”党旗，上交专案组；伊克昭盟的一个受害者，严刑之下，他不得不伪造了一枚“内人党”印章，而这枚印章所刻蒙文，竟不能成字。经过一场行之有效的**“群众专政”**后，“新内人党”陷入了内蒙古**“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先后从中挖出了一百多个“井眼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等等“内人党”的变种组织，连草原上的一个民兵连，也被打成“内人党”的武装组织。

在“清队”深挖中，7 月 20 日，滕海清及其打手们，又抛出了一份文件——《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份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打破了既往中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决定在自治区牧民和佛教喇嘛中划分阶级，树立牧主、富牧为“敌人”，然后再加以打倒，借以“教育”蒙古人。

在“清队”深挖“内人党”运动中，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它少数民族，有一些汉人也受到牵连。

天怒人怨，恩威兼施

从“挖肃”运动到挖“内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旷日持久，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刑讯逼供花样不断翻新，死亡和残伤人数不断增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偏远的山区和草原，许多人连“内人党”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却不明不白地被打成了“内人党”党徒；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打成“内人党”，许多忠于中共的党员，都稀里糊涂地成了“内人党”党徒！

这是汉人政权对蒙古人民犯的一大法西斯暴行。面对如此残暴的政权，蒙族人被激怒了，汉族人被激怒了，其它民族人被激怒了，许多干部、军人、党员也被激怒了——天怒人怨之火以燎远之势，烧向内蒙古各地。成千上万蒙古人先后涌向呼和浩特：**“五十孤儿上访团”**，在首府街头哭声震天；**“一百寡妇上访团”**，在刽子手衙前顿足呼号；**“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到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大放悲声。数以千计的蒙古人突破封锁，涌向北京：**难属们**在天安门前跪地嚎啕；**“八百铁汉”**，裸露着上身，将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肌上，鲜血淋漓，在中南海新华门门前要求接见……

“上帝”被触动了。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毛泽东，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采取了宽猛相济、恩威交加的两手对付蒙古人。**一手施之以恩**：1969 年 5 月 22 日，他批示称**“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下达了“纠偏”命令；谕示周恩来纠正“扩大化”，停止挖“内人党”，落实政策，安抚受害人，平息内蒙古人的怨恨；以强手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取代滕海清。**另一手立之以威**：先将内蒙古自治区一分为六，即将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使自治区缩小了三分之二，借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再对内蒙古实行军管，命郑维山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所，调六十九军、四十二军、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进驻内蒙古，借以威慑敢于轻举妄动的蒙古人。

毛泽东的恩威两手，使善良的蒙古人失望了。他的**“扩大化”**批示，明确训示蒙古人：**“反乌兰夫、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而在“清队”和深挖“内人党”中，那些肆意破坏《宪法》、恣意侵犯人权、随意砸毁寺庙、任意虐杀生灵等种种反人类的法西斯暴行，在他看来，不是罪，而是错，而且仅仅错在“扩大化”上。这样，毛泽东便给法西斯暴行披上了一件“扩大化”的外衣。这种反文明、反法治、反传统和反人类的批示，充分暴露了毛泽东思想的虚伪、流痞和强盗本性。

毛泽东的“扩大化”批示，**袒护**了不断向内蒙古刽子手们施压的一线指挥官周、康、江等大员们“宁左勿右”的冷酷无情，让他们继续在一线

指挥“清队”；**赦免**了刽子手滕海清忠心耿耿的残忍本性，把他调往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处理**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喽罗”，让他们当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借以抚慰民心。毛泽东玩弄的软硬兼施或**“先杀后抚”**的封建统治权术，也收到了效果，反抗行动被压下去了，尽管反抗的声音还在无声处传播！

毛泽东死后，他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推翻了他的导师“扩大化”的结论。

1978 年 4 月 20 日，内蒙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对此，中共中央批示道：**“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希望认真贯彻执行。”**

到此，由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造成十万人死亡、伤残无数的“新内人党”一案，从**“罪恶累累”**到**“扩大化”**，再到**“应该完全予以否定”**，经历了十年猖獗、变色之后，才被画上了个句号。

2、广西“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血案

血案致死 50,000 人以上，致伤、致残难以计数，是文化大革命中杀人仅次于“新内人党血案”的第二大血案。本书在第 15 章“兽行之一：政治构陷”中做了概述，此不重笔。

3．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叛徒血案

1967 年上半年，云南全省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持各种不同观点的造反战斗队，经过不断分化、组合，出现了全省性的两大对立的造反组织：以云南大学学生**方向东**、**李毅**、云南省物资局司机**杨凯**为代表的“炮兵团”右派造反组织，简称**“炮派”**；以昆明工学院研究生**黄兆琪**、昆明市公安局干部**刘殷农**、云南省建筑工人**杨树先**为代表的“八二三”左派造反组织，简称**“八派”**。这两大对立的造反组织，左右了云南武斗的形势。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云南省党政军大员之间的分裂已无法调和，已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争，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搏斗。

为了自我保护，他们必须抓住权力不放。于是，他们纷纷公开支持或暗地保护某一造反组织。如：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委书记**赵建民**等大员，公开或暗地里支持“炮派”，炮打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云南省委书记省长**周兴**等大员；而李成芳、鲁瑞林、周兴等大员，则公开或暗地里支持“八派”，攻击陈康、张力雄、赵健民等大员。由于两大派后台都过硬，斗争激烈，武装冲突不断扩大，很快失控。为了在云南实现联合夺权的目的，**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大员，曾多次试图调解“炮派”和“八派”的分争，均未奏效。他们恼羞成怒，决定按 1967 年 12 月 18 日的“最高指示”，抓“**武斗的幕后指挥**”的“黑手”。“黑手”很快被揪了出来，他就是原省委书记**赵健民**。

把赵健民打成挑动武斗的黑手是有“道理”的。1966 年 12 月，赵健民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打倒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我想不通**。”就在这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要他说出阎红彦的去处。他毫不危惧地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阎红彦自杀后，云南政局进一步混乱。1967 年 5 月，赵健民反戈一击，在省委大院贴出了一张《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已死了四个多月的第一书记阎红彦。赵由反对造反派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受到了以司令员李成芳为首的昆明军区的欢迎，也受到了周恩来、中央文革的首肯。令人意外的是,“站出来”的赵健民，没有站到周恩来、中央文革和昆明军区青睐的“八派”一边，而越来越向右转与“炮派”站在一起。

赵健民的“软肋”很快被周恩来、中央文革、昆明军区和“八派”翻了出来：1936 年他曾被国民党逮捕过，按照凡历史上被敌人逮捕过都是叛徒的“文革逻辑”，**他无疑是个大叛徒**；其次，**他是刘、邓路线的人**——1958 年在担任山东省省长期间，因对“大跃进”不理解，在整风“补课”中，他被打成“山东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总代表和“反冒进”的急先锋，曾被贬到一家工厂当副厂长；最严重的是，在毛泽东的夺权狂热中，他不识时务地向康生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使康生有“理由”得出他**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结论，要李成芳司令员“注意”他的“动向”。经过几个月对赵“动向”的“注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做出了逮捕赵健民的决定：1968 年 1 月 21 日，康生、谢富治在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将赵健民当场“监护起来审查”。自此，赵被投进监狱长达 8 年之久！

为了打垮和消灭“炮派”，“八派”在周恩来、中央文革和昆明军区的支持下，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赵健民身上。造反派从毛泽东反复无常的言论中，抓住了毛的一件“法宝”：要打倒当权派，光用“走资本主义道路”

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他们，不行，难以服众，唯独叛徒、特务两颗炮弹，最具杀伤力。于是，“八派”的“打赵作战部”，先后编织了《叛徒赵健民的自白》《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等文章，向赵发难。到了 1968 年 7 月 10 日，秉承康生和周恩来旨意，精明的研究生黄兆琪和富有办案经验的公安干警刘殷农结合在一起，又构陷了一个《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的报告，呈送给中共中央，欲置赵于死地。

黄、刘的报告是有背景的。当时康生曾说过：**“赵健民就是耍两面派的典型。”“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键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时，周恩来也说：**“像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于是，在昆明军区和“八派”的共同炒作下，赵健民不仅是个大叛徒，而且还是个执行国民党计划的大特务，几乎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刽子手谭甫仁主政云南后，便以谭字号的“站队划线”切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在云南全省积极推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路线，以是否支持赵健民划线，力图把支持赵的干部和“炮派”群众打成反革命。1968 年 12 月 2 日，他授权《云南日报》发表了《**大叛徒赵健民是云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文章，发出了深挖、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号令，把“清队”运动推向高潮。为此，他亲临一线指挥，作过很多重要讲话，如**“有一万抓一万”、“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等，使上层权力搏斗，演变成对普通老百姓的血腥镇压，导致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高达一百三十八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有 17,269 人，被打伤、致残的有 61,000 多人。

1976 年十月北京宫廷政变后，在云南，在给赵健民平反的同时，开始了新的“划线站队”行动，横行数年的左派“八派”头头，悉数就擒。其中，原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黄兆其**，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原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刘殷农**，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原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胡延观**，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原云南省文化局干部**涂晓雷**，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刘殷农**的判决书中说：**“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一千四百七十三人，被打伤致残的有九千六百六十一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在黄兆其的判决书中说：**“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

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六万一千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与“间接责任”相对应的另一部分直接责任应有谁负呢？对此，判决书失语。但历史不会打扮权力，它忠实地记录了那段“失语”的历史真相：当年，是周恩来、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中央大员以及“封疆大吏”谭甫仁、李成芳、周兴等人，公开表态支持左派“八派”、打压右派“炮派”的，又是他们决定逮捕赵健民的。

到此，痞子、流氓无产者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和胡延观等人，无一例外地成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理论和实践的牺牲，变成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而饱受周恩来、江青、康生压制的“炮派”，同各地的右派造反派一样，也取得了最后胜利。他们中那些痞子、流氓无产者，洗掉双手的血污，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弹冠相庆而觥筹交错。

4．冀东大血案

1938 年，中共冀东党组织**李楚离**等领导人，没有领悟毛泽东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指导思想，便与当地国民党以及当地的民众爱国组织，联合在一起，发动了名震全国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然而，这个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中共冀东党组织，在二十多年后的文革抓叛徒高潮中，却变成了“冀东反革命党”，遭到了残酷迫害和镇压，致使 **84,000 多人受害，2,955 人死亡，763 人致残。**

对于这个“冀东大冤案”，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书中写道：

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 1,604 人，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 737 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 84,000 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 2,955 人，致残的 763 人。

1980 年 11 月 29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问了陈伯达，调查了他制造“冀东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当时庭审的记录：

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起诉书控告你，1967 年 12 月 26 日，你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现在我问你，1967 年 12 月 26 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答：“我也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了。”

法庭宣读了李准记的陈伯达 1967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

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引者注：“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答：**“我没有说是反革命的党。”**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

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刑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 1980 年 8 月 1 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 年 12 月 26 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 20 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 1,604 人，涉及到中央 29 个部门和 24 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 737 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 84,000 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 2,955 人，致残的 763 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 1980 年 9 月 29 日证言（节

录），他陈述了 1967 年 12 月 26 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 84,000 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 238 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看了传记作家的描述，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使八万多人受害、近三千人死亡的大血案，似乎是陈伯达“记不得”、“东听西听”、“有可能”的几句讲话造成？河北省委和唐山市委都干了些什么？那些具体执行者都干了些什么？当时革委会权力大都集中在军人的手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1967 年以后的文革历史证明，各地发生的血案几乎都有支左军人的身影，许多大血案几乎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据说，陈伯达说，把“冀东冤案”算到他的头上是“**最冤枉了**”的。因为，他的几次华北之行，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集体讨论并报请毛泽东批准的，而且行前有请示，归后有汇报。显然，“冀东冤案”不是陈伯达个人行为，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到“**群众**”共同犯罪的结果。但在“主旋律”的作用下，见过秘密档案的作者，却有意回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群众运动**”的血腥，有意回避河北省委、唐山市委和驻军首长们操作“**毛氏规律**”的直接责任，而“最冤枉了”的陈伯达，却也想借公审机会，用“记不得”、“东听西听”、“有可能”等词藻来包装自己，力图洗刷掉他那罪有应得的替罪羊的罪行！

笔者一介草根，无权查看档案资料，只好对传记作家的描述进行全文转抄。看来，这个冀东大血案，还有待公正的史家们去挖掘、澄清。

5、二七机车车辆厂血案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之一，同新华印刷厂一样，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工程。“清队”中，这个样板工程，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取得对敌斗争的丰硕成果：挖出历史反革命 215 人，现行反革命 31 人；全厂 155 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49 人，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 24 人，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挖出国民党员等反动组织成员 373 名；对该厂“解放”前的 1,400 多名老工人，审查了其中的 900 余人，14 名老工人自杀身亡。在 196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

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依据二七机车车辆厂挖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的“经验”，得出结论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但到 1978 年 9 月 1 日，新华社高级记者**夏俊生**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题为《二七厂清队的经验是假的》的报导，揭露毛泽东亲自抓的这个典型，几乎全是冤假错案！三十年后，人们从 2008 年第 8 期《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了他公开发表的《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文章，了解到了毛泽东炮制的“清队”典型的概貌。

现将夏文《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摘录如下**：

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六厂二校”之一。由于“六厂二校”的军宣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 部队）派出的，这些单位被称为毛主席的试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一些老帅、副总理和省部级的老干部都在这六个工厂里参加过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毛泽东主席当年曾批转的“六厂二校”的“经验”，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纠左的，但现在看来，只是左了 100 步往回纠正几步而已。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前身是长辛店机车厂，是 1897 年在建设京汉铁路时建立的。工厂里解放前也有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其它政治组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深挖阶级敌人”，不少老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

1969 年 5 月 27 日，北京市革委会向全市转发了由二七厂革委会、8341 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总社记者联合署名的《北京二七厂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 196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大量引用了《报告》中“经验”材料。当他引用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一段话之后说：“**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8,000 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 9 个区分部，三青团有 3 个机构，另有 8 个什么特务机构**。”

1978 年 7 月，铁道部派出工作组，与北京市工交办的领导一起，帮助二七厂落实政策。经调查核实，1969 年影响全国并被毛主席引用的这个《报告》里的许多材料，**竟然是假的。**

打倒一切怀疑一切

《报告》说：**解放前，这个厂残留下来的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

面广、根子深。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有国民党区分部9个；三青团分队4个；有“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8个，包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此外，还有叛变了的地下党员，有日本特务、几十种会道门的大小道首，以及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这些反动组织交织在一起，遍布全厂各个车间、科室。

事实是：解放前，二七厂内确有9个国民党区分部。但4个三青团分队是长辛店地区的，并不都在厂内。所谓的8个特务组织，有的根本不是特务组织，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搞出来的大冤案。涉及全厂278人（连同厂外计500多人）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什么“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二七厂解放前的地下党支部不能定为“叛变了的地下党支部”，地下党员没有一个能定为叛徒。至于所谓的里通外国分子和进行间谍活动的天主教骨干分子，都是没有的。

在解放后进行的镇反和肃反中，二七厂的反革命组织都早已基本查清，一些骨干分子也都已逮捕法办。“清队”的结果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清队”中新挖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只有8个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员、1个伪保长和2个特务分子。绝大多数为了保饭碗而参加国民党等反动组织的老工人，在解放后都主动作了交代，许多人还参加了共产党，被提拔为领导干部。《报告》却说，“解放后，在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二七厂代理人的庇护下，这些阶级敌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出来，有些竟窃据了厂和车间的领导岗位。”

《报告》说：**在全厂155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49人，占31.6%，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24人，占15.5%，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叛徒当上了干部部长，一贯道坛主当上了组织部长，保卫科3个科长有2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全厂27个车间中20个车间的领导权和17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这些人手中。**

事实是：二七厂在“清队”中因历史问题被审查的中层以上干部有97人，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有42人。经过1975年落实政策的复查，只有1名副厂长能不能定为叛徒还有待进一步复查（他的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按一般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其余41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报告》中所点的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副总工程师、干部部长、组织部长、2个保卫科长，除了上面说的那位副厂长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复查外，没有一个人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所谓全厂27个车间中20个车间的领导权和17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反革命分子手中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报告》说：**全厂已清查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215人，清查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和其它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373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厂敌特组织的系统和关系，**

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并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等若干重大线索。

事实是：“清队”中定的215名反革命分子，1975年复查时，只有12人仍定为敌我矛盾，其余203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之于373名国民党员等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多数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大多数早已主动作过交代。所谓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的重大线索，纯属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案；所谓“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没有一个能落实；所谓“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错案。如，工人**许彬**被揭发为一起火灾的纵火犯，可是他当时参加抗美援朝根本不在厂内。《报告》说的制材车间两起大纵火案，其实当时只烧了点刨花就被扑灭了。在“清队”中，工人党员**王玉**被逼供认是这两次火灾的纵火犯后上吊自杀，现在也无法证明是他放的火。所说煤水车间的投毒案，是工人杜某怀疑他的老婆与人有不正当关系，杜某在这个人喝的酸梅汤中放了巴豆霜。所说的破坏生产案，多是生产事故，不是故意破坏。

二七厂“清队”扩大化，完全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产物。为了“挖得深，战果大”，肆意扩大敌情，制造冤案，把二七厂说得似乎到处都是阶级敌人，领导权根本不在共产党手里，老工人和绝大多数从老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受到严重摧残。在“清队”中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几乎都是解放前入厂的老工人和从这些老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其中一半是共产党员，中层以上干部有60%受到审查。这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后，党员都被开除出党，干部全部监督劳动，其亲属和子女也受到株连。

从几例冤案看二七厂“清队”的真相

《报告》说：**二七厂在“清队”中“强调突出一个‘准’字，防止扩大化，对他们（指审查对象）交代的问题认真调查，反复核实，对他们检举的问题不轻易相信，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定案。”**事实却完全相反。请看下面几例冤案：

铸工车间1944年入厂的老工人**康长**，出身贫农，解放后一直表现很好，1960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康长曾替国民党员、情报组长刘某通知人开会，但本人并未参加过刘召集的会议。这个问题入党时已向组织作过交代，此外历史上再没有任何问题。“清队”中，据此怀疑康长也参加了反动组织，给他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在压力下，康长被迫承认参加过国民党、情报组，但又否认，先后反反复复了多次。同时，在逼供和指供下，刘某等12人证明康长参加了国民党、情报组。1969年10月，康长因“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指清队中“态度恶劣”，先后“翻案”100多次，“不交代问题”等），被开除党籍、厂籍，全家遣送原籍。1970年5月，康长在几次来找军宣队负责人申诉都被拒之不见的情况下很生气，打破了门上的玻璃。军代表找人把康长扭送到保卫科，康进行反抗，双方动起拳

脚。康长被殴打一顿后被捆在暖气管上。他趁看管人员吃饭时，挣脱绳索，拿起屋内一枝气枪准备自卫。军代表和保卫人员发现后，夺过气枪，将康长五花大绑送到公安分局。当年6月，康长以“**打骂军代表、革命群众，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等罪名，被判处15年徒刑。直到1978年7月，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作了批示，康长才被无罪释放，恢复厂籍、党籍，全家返回北京。

原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在“清队”中，军代表从一个人的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一个姓孔的日本特务的口供说:“我们村的王敬贤是日本特务。”本来，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可判明这是同名不同村也不同县的两个人。但当时却张冠李戴，认为厂内的王敬贤就是易县岭西村的日本特务王敬贤，马上给王敬贤办了隔离“学习班”，并派人到家里交底，让家属帮助“政策攻心”。结果，王敬贤被逼自杀。人死后，车间还开批判大会，说他“畏罪自杀”。王敬贤被逼死后，其夫人脑溢血加重，1975年去世，剩下的3个孩子都因受到刺激精神不正常。历史清白的王敬贤，就这样被搞得家破人亡。这样明显的冤案，二七厂1973年复查时却对王敬贤作了个“**因对清队不理解自杀，按非因工死亡处理**”的结论，不给彻底平反。

工人党员**马永**是个转业军人。一次在“学习班”上同军代表争论问题，说除了毛主席，没有一贯正确的。军代表说，那江青呢？对江青“文攻武卫”那一套早有不满的马永说，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也值得怀疑。就这一句话，马永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实现**群众专政**一年多，整党中被开除党籍，并不准重新入党。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完全是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大冤案。1948年5月，蒋介石政权于覆灭前夕曾在全国逐级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北平的委员会只存在一个多月就因无经费停止了活动。当时，二七厂有的工人参加了铁路的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进行反动宣传的训练班。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材料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并不是特务组织，在二七厂也没有其下属组织。但在清队中，二七厂却捕风捉影地搞出了个“戡乱救国潜伏小组”,说这是个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潜伏特务组织”，而且内部纪律森严，订有“攻守同盟”，其成员还有不少兼有中统、军统等多种特务身份。为了攻破这个“顽固堡垒”，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作为突破口。其实，厂里并没有掌握和林有历史问题的任何材料，只是认为他形迹可疑：一是每逢政治运动他就歇病假；二是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当时工会负责人的女婿。据此，就怀疑他是特务，给他办了隔离“学习班”。和林不承认，就采取车轮战“政策攻心”，每天只让他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日子一长，和林受不了，只好交代。交代特务身份以后，又追问他的同案人、组织活动和潜伏活动。在办案人员的指供、诱供、逼供之下，和林只好胡编了一通“内幕和罪行”，并检举了103个“特务分子”。《报告》中所讲的铸工车间副主任**康治**，也是在这种逼供、诱供之下，被迫承认是“戡乱救国潜伏小组”的特务分子，1962年开过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反攻

大陆”，还往香港送过情报，并检举了不少同案人。就这样你揭发我，我揭发他，“特务”越来越多，“特务组织”的活动越来越玄。

二七厂在“清队”时规定，不管本人承认不承认，只要有三个人揭发就可以强行定案。所谓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其实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假口供。

以“政策攻心”为名大搞逼供信

二七厂“清队”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调查组办案与群众办案相结合，以群众办案为主；查档案、搞外调与发动群众、政策攻心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为主。”**这两个为主，实际上就是不要证据和调查研究，靠捕风捉影和逼供信搞假口供。工人们说，二七厂的“清队”不是突出一个“准”字，而是突出一个“狠”字，不是政策攻心发挥了威力，而是逼供信发挥了威力。

所谓“**以群众办案为主**”，就是把群众中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怀疑、猜测，作为“活档案”提供的线索，又不认真分析核实，就作为办案定罪的依据。《报告》说，有一个解放前参加四个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分子，调查组调查了 20 多次，问题也没有弄清，后来群众中有人认为他四个孩子的名字连起来是反动口号“建立中华民国”，就抓住这个问题对他展开“政策攻心战”，终于使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反革命身份和罪行”。这个人指的是劳资科的**张洪儒**。其实，他的四个孩子的名字按顺序是建华、建国、建中、建民，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口号。他本人也没有加入过四个反动组织。所谓“坦白交代”完全是逼供下的“顺杆爬”。

所谓“**以政策攻心为主**”，就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先定性，后逼供。“政策攻心”时，常常是三班轮流“熬鹰”，不交代问题就不让睡觉，不让回家，或者白天劳动，夜里被“攻心”，甚至搞变相体罚。这样搞上几个月，身体再好也顶不住，只好“坦白交代”。还有被隔离审查的老工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事无人管，为了能够回家料理家务，只好“缴械投降”，争取“从宽处理”。

二七厂的“政策攻心”还有树立“宽严样板”和“发动家属参战”两种做法。

所谓宽严大会实际上是引供、诱供大会。被从宽处理的人在大会上发言说，“参加特务组织的还有同我在一起的张某某、王某某，你们赶快交代吧！”会后，被点名的人只好赶快去“坦白”。

所谓“发动家属参战”，就是把要审查对象交代的问题告诉其家属，要家属做审查对象的工作。家属怕审查对象被从严处理后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造成生活困难，又影响子女分配工作，只好苦苦劝说审查对象去“坦白”，有的甚至下跪哀求，搞得全家不得安宁。有的车间让家属办家庭“学习班”，帮促审查对象交代问题，什么时候“帮出来”什么时候结束，家属不能上班就减少了工资收入。还发生过审查对象“交代问题”后车间敲锣

打鼓向家属“报喜”的笑话。审查对象受到家庭和工厂内外夹攻，精神压力很大。二七厂在“清队”中有 20 人自杀，大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些人死前无任何证据证明本人有问题，完全是在死后才想法“取证”的。

8341 部队进厂前，二七厂曾搞过一段“清队”工作。那时，对审查对象严刑拷打，有的被活活打死。8341 部队进厂后，武斗逼供的现象确实大大减少了，但这种“政策攻心”对审查对象的精神折磨和政治压力更大了，乱供乱咬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一人就“交代”了几百人的中统和军统特务名单。不少人被揭发参加了中统、军统等七八种反动组织，当时只有 14 岁的小徒工也被揭发为“中统特务”。有的人被迫咬了别人之后，就找到这个人打招呼：“对不起，我投了你一票。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办法。如果找到你，你就说吧。”全厂职工中 1949 年前入厂的老工人占 58%。当时，二七厂各个车间把 1949 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集中在一起办大“学习班”，让每个人都交代历史，搞得老工人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底架车间 1949 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 54 人，53 人被整了材料，36 人受到审查。

据调查，这个厂当时的一些外调人员采取武斗逼供、诱供、指供的做法，从反革命分子那里搞来许多假证明材料。外调人员对刑满就业人员、原二七厂锻工车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某**拍桌子，搞体罚，让张在解放前二七厂锻工车间的人员名单上标出哪个人参加了哪些反动组织（比如，参加中统的打叉，参加国民党的划勾），张某一下子就证明解放前锻工车间的 100 人中，有 80 人参加了反动组织，其中 32 人参加了 5 种以上的反动组织。找原二七厂机械车间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押犯**齐某的**外调人员，拿着解放前二七厂机械车间的一张图（每台机床设备的位置及操作人员名单），强迫齐交代特务组织情况，齐就照着名单乱咬，出证 164 人参加了中统等反动组织，全部是假的。

1975 年，二七厂对“清队”中处理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复查，“清队”中定为敌我性质的 246 人（历史反革命 215 人，现行反革命 31 人）中，仍定为敌我性质的有 24 人（历史反革命 12 人，现行反革命 12 人）。被搞错的 222 人中，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 40 多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被强行戴上特务帽子。二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三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军宣队有意见，或存在一般的思想政治错误，被无限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如《报告》中说的**徐振海**，是在大家猜谜语“东门外失火，内里烧死二人，一男一女，酉时三更”时，随手把谜底繁体字的“烂肉好酒”四个字记在一本刊有周恩来总理和江青讲话的小册子封面上，便被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四是把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当成故意破坏。五是本人早已交代并做过结论的一般历史问题，翻出来炒回锅肉，或无限上纲，或妄加莫须有的新罪名，打成反革命。这一类人有 100 多人，占绝大多数。

我在 1978 年 8 月到二七厂采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分社领导的支持下，写了题为《二七厂清队的经验是假的》的内部情况反映，1978 年 9 月 1 日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

通过采访者夏俊生的报导，人们对毛泽东“**要注意政策**”和“**要稳、准、狠**”的说教，应该有一个清醒的理解：所谓“**要注意政策**”，是蔑视法制不要政策的政策，也是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同义语；所谓“**要稳、准、狠**”，是践踏人权鼓吹人治的逼、供、信，亦是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毛氏规律**”的集中反映。

6．新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血案

（血案初见于郑义所著《红色纪念碑》。由于该书是网络版，编辑上存有诸多纰缪，不便直接引用。笔者依据该书内容和参照相关回忆录，编缀撰述成篇。）

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中，根据林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号召，“群众”创造出现身说法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新形式，涌现出了一大批“讲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其中，许多人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辽宁省旅大市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就是个以“讲用”毛泽东思想闻名遐迩的佼佼者。

1968 年的中国，是“伟大领袖”号召“**群众专政**”全面开“花”的一年——一个多灾多难之秋！

5 月，毛泽东下令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一切阶级敌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分子王立龙，闻风而动，而紧跟，他要在 7 月间的一次大型“讲用会”上，更上一层楼，力争他的“讲用”有新发展，新创造，从而能在他这个“老典型”的花冠上，再罩上一个霞光四射的新光环。于是，他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目光，搜寻、审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终于他从听来的一件民事纠葛传闻中，嗅到新“敌情”，而这个新“敌情”的发现，的确使他的“讲用”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赢得了阵阵掌声。

然而，王立龙政委“讲用”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和博得的掌声，却使一个农民家庭付出了惨痛代价：**一家七口人含愤集体自杀！**

王立龙洞察到新“敌情”的传闻，是个什么样的传闻？

原来，夹河庙公社栾家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李本柱，**殴打了妹夫，他的妹夫为了报复他，便在村中散布谣言说他同他没过门的弟媳**许连荣**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由于许连荣是“反革命”家庭出身，谣言株连了许家，好事者讹传许家有攀高枝、找大人物做保护伞的谋图。谣言传播

中，又被好事者不断放大，许连荣被放大成了一个曾扔掉过私生子的荡妇。这个传闻不过一桩民间纠分而已。但这个传闻，却使王立龙发现了新“敌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立竿见影”地推断到：敌人用“美人计”腐蚀党的干部，“走资派”在“美人计”前屈膝投降——这是一个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王立龙带着助手现役军官**王成海**、公社革委会常委**张玉德**，火速赶到栾家大队。在大队民兵连长**徐作善**主持下，开始了为他的“讲用”攻略“美人计”的进程。

在撤职、关押、批斗下，李本柱不承认中了“美人计”。王便亲自出马，先对李来了一个下马威，呵斥道：**“告诉你，李本柱，你今天不是犯错误，你是犯罪。今晚上如不交代，就要加重处分**。”接着又施出软的一招诱供道：**“只要你老实说出来，不戴帽，不逮捕，也保证不给其它处分**。”

略知宦海风云的李本柱，对软硬兼施那一套并不陌生；但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了避免挨打，他承认了那种关系。他低声向王政委供认：**“既然首长这么讲，我就没什么顾虑了……”**

“走资派”被攻破。首战告捷，王立龙便命移师审讯“反革命”许家。

许连荣的父亲**许长家**，是个忠厚、老实、本份的贫农。在株连成风的年代里，因他的儿子(据说是四子许连祺)上中学时，曾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被判处管制三年，从此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许长家这个有七口人的家，因一人获“罪”而全家遭殃：原来的红色贫农家庭，旋即改变了颜色，变成了白色的“反革命”家庭，连成家后分出去的儿女们，也受到了株连。

长得俊俏的许连荣，与李本柱的弟弟订了婚，本是件很普通的民事；但在王立龙等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这件很普通的民事变成了“美人计”，变成了“走资派”与阶级敌人相互勾结的罪证。

“反革命”家长许父许长家，被抓到大队部实行**“群众专政”**；但批斗和毒打并没有使这位农民屈服。他和他的家人，满怀着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人民政府主持公道的强烈渴望，走上了去沈阳、去北京告状之路。然而，他们失望了，他们得到的答复竟是那样千篇一律：**“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懊丧而归的他们，又陷入“群众专政”的魔窟中。

7 月 10 日，在连续酷刑之后，许长家受刑不过，只好按“美人计”招供。但根据“讲用”者构思讲稿的“标准”，许还必须交出“美人计”的“黑

心”，即主观故意。因此，审讯者喝令许在第二天交“黑心”。

招供已使许长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父亲，怎么能往自己女儿身上泼脏水！

7 月 11 日晨，许长家又被提审。在“群众专政”面前，许长家已无法用言语来证明自己了，他决定以自伤来表达清白。趁着上厕所的机会，他用玻璃在胸部划开了十公分长的口子，用衣襟捂住，然后颤巍巍地挪蹭到审讯室。当审讯者要他交“黑心”时，他痛苦地说：**“我昨天交代的都是假的，这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没有黑心，我要向毛主席交红心……”**说着撩开两襟，露出鲜血淋漓的前胸。

自伤报到了王成海处。王冷酷地说：“不要怕，老耗子给咱施加压力了，他这是威胁我们嘛。你们问问他，这是不是威胁！”得到军方支持的张玉德，便叫人把许长家又绑在大树上，边打边问：“你是不是要威胁我们？”

许长家汗泪俱下，与胸部鲜血混在一起，淋漓黑土地。他又被打昏了过去。

张玉德看着昏死的许长家恶狠狠地说：**“赶紧整理材料，判了算了。只要宣判了，死就死吧**！”

于是，根据全国各地正在推行**“群众专政”**的**“三群”**新经验，即**“群众破案、群众审讯、群众判决”**的“新”政，栾家大队在 7 月 12 日，召开宣判大会，宣读了由栾家大队农代会署名的判决书：

“根据许犯的罪恶事实确凿，供认不讳，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许长家有期徒刑十年，监外执行，交群众管制生产（劳动）。”同时，23 岁的许连荣因“腐蚀”干部罪，也被“群判”有期徒刑十年。

事情并没完。因为没有“美人”的口供，首长的讲用稿子就不够完美。为了完成首长交给的“革命”任务，王成海、张玉德等人决定：撬开许连荣的嘴巴！

7 月 15 日，栾家大队开始对许连荣进行“群众审讯”。以沉默不语相对抗的许连荣，在反复咒骂、侮辱和毒打下，嘴终于被撬开了：不仅“供认”了通奸的“罪行”，还“供认”了她曾在皮口医院做过“人工流产”并“把私生子扔到南山沟”的淫荡“事实”。

据传：“奸妇”的口供，当晚迅速上报给了王立龙。第二天，破获“美

人计”的材料，使王立龙的“讲用”光芒四射，赢得了阵阵掌声。当他走下讲坛时，有人向他耳语了一番；一阵短暂惊诧之后，他双肩微微耸动了一下，便若无其事地走开。

当是时，遍体鳞伤的许连荣，被搀扶回家后，全家人精神崩溃了：一人获罪全家反革命，在“英明”的“给出路”政策制导下，没有出路的许家，做出了用全家集体自杀来抗议迫害的选择。

1968 年 7 月 16 日上午，正当**王立龙**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讲用”得光芒四射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民兵发现许家动静异常，撬开屋门后发现：许长家夫妇和他们的五个子女全部自杀。

“老许一家人全都自杀了！”像一颗巨型炸弹突然爆炸，震撼了栾家大队的老老少少！惊骇了远乡近里的男男女女！

勘查现场的官员们来了。很快有了勘查结果：

——房梁上并排悬挂着四具尸体，分别是许父**许长家**（57 岁）、五子**许连福**（26 岁）、四子**许连祺**（28 岁）、四女**许连荣**（23 岁），五女**许连玲**（20 岁）自缢绳断，卧尸于地，许母**王朝臣**（57 岁）和小女儿**许连清**（18 岁）自缢后，两具尸体端端正正躺在炕上。

——死者颈上均有索沟痕迹。除许长家外，其余的都洗过脸，梳过头，穿上了新衣服，有的脸上还留有泪痕！

——在屋内墙上的醒目位置，用粗犷的笔锋写了两个大字：“屈死！”柜子上整齐地摆着一套用红纸盖好的“红宝书”，两扇门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逝者许连荣身上发现了他们留下的四封遗书，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十分一封，九点零五分一封，午夜十二点两封。他们在遗书中悲愤地高呼：**“我们全家的死是走投无路啊！”“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全家屈啊，屈！屈！冤枉！冤枉！”**遗书上留下了七个人的签字笔迹和血红手印。

——许连荣在遗书中写道：**“今天把我叫去大队毒打，打得我皮肉分家，没有的事叫我承认，不承认就打，我不懂的事，你们处处往上领，我要求把我的尸体送到医院检查，还我一个清白。”**

在死难现场，许母和小女儿的遗体停放在炕上，身下铺着褥子，枕着枕头，娘儿俩手拉着手。显然，她俩是先走了的。

试问后走的五位亲人：

“你们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上吊？

“你们在眼睁睁地看着或帮着自己亲人上吊时，手发抖了吗？气发喘了吗？

“你们看着或帮着自己亲人上吊时，是否曾低泣、哽咽？是否曾大放悲声？

“你们把先走的亲人卸下来抬到炕上，让她俩手拉在一起，想向后人说些什么？

“你们在走前洗脸、梳头和更换新衣时，都互相说了些什么？

“你们脸上的泪痕，是低泣哽咽的遗痕？还是声泪俱下的残迹？

“你们是如何强压悲伤？又如何从容不迫？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一齐上吊或先后自缢的？”

地也，谁能知道？！**天也**，谁能回答！？

然而，从他们走前留在门上、墙上、遗书上的字迹和四封遗书写的时间可以判定，他们的精神在遭到残酷折磨后很快镇静了下来：他们走得那么坚定，走得那么从容，走得那么坦然，走得那么理智，因而，他们走得凄婉，走得壮烈，走得惨不忍睹，走得催人泪下！

啊，风萧萧兮遼水寒，全家自杀兮为哪般！

医院很快做出了鉴定：**许连荣是处女！**

天呐，人性何在？人权何在？公理何在？

在700多年前黑暗腐朽的元代，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呼喊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700多年后的今天，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里，有谁敢写《许连荣冤》？谁敢高呼“地也”、“天也”、毛也、党也？也许人民只配有权像许家临死前书写的那样——只配有权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清队”的高潮中，在“群众专政”的高压下，善良正直的人们，对许家的惨死敢怒而不敢言；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了，人们的怒吼才迸发了出来。由是，许长家一家的奇冤才得到了伸雪；由是，冤案执行者亦即那些痞子、流氓无产者，才得到惩处。其中，策划者**王成海**（军官，已转业）判刑十五年，主持批斗者**张玉德**判刑十二年，主持刑讯逼供者民兵连长**徐作善**判刑十年，打手**朱广殿**、**李永贤**判刑八年，其余主要参与者也都受到了不同处置。

然而，**首恶流氓无产者王立龙**却能消遥法外！何也？据传：有的说他恶贯满盈已死或病入膏肓奄奄待毙，有的则说他能紧跟**“群众专政”**的发

明人，是个老革命、老先进、老雷锋，故而对他网开一面：“将功补过”。孰真孰假？留给后人去查证吧。

四、第三波自杀风潮

毛泽东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引发了文革第三次自杀风潮。粗略估计，“清队”中全国死亡的 50 万人中，自杀人数应在 20～30 万之间，其中，农村约占一半。笔者当年身处黑龙江省密山县三梭通公社，“清队”中全县死亡 110 多人，多为自戕，其中，三梭通公社打死 1 人，自杀 1 人。如按此 50%推算，“清队”中全国农民自杀者，应在 10 万人以上。

笔者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等有关纪录和本人见闻，编录出了第三波自杀名单：1968 年自杀身亡者名单(1)和 1969 年自杀身亡者名单(2)，供参阅。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纪录甚少。

下面几位知名人士，都是“清队”运动中的受难者，各有学者著文为其立传。

忆容国团　（作者：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

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作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

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

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研究员肖光琰全家自杀 (作者：王友琴)

肖光琰，男，1920 年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经留学美国，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 年 10 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和毒打，12 月 11 日死亡。他被宣布是服用安眠药自杀的。时年 48 岁。两天以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 15 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一起自杀。

笔者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网页上检索出肖光琰的学位论文，对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论文是 1946 年印制的。当时没有电脑网，电脑网上的索引是后来做的。论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新楼里面。这是一篇关于叶绿素和光合作用的论文。科学也许日新月异，但是这些论文将要长久保存下去，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长河中的一部分。

但是，在文革时代，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因此，不要说论文，肖光琰一家人都被害死。

肖光琰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0 年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是二级研究员。他长期从事催化剂研究。他的妻子甄素辉在美国长大，其父曾任孙中山的卫士，随肖光琰到大连在海运学院教授英文。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萧络连。

肖光琰在 1952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遭到批判，被迫作检讨。1958 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被当作“白旗”批判。

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肖光琰被关押进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监狱，也就是所谓“牛棚”之中。两个月后，他死在被关押地，并被宣布是服用大量安眠药“畏罪自杀”。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全国所有的学校、科研单位和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在“军代表”和“工宣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化学物理研究所有一百多人被指控为“特务”。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在这过程中，有七个人死亡。

这七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他们的家属都认为他们是被打死的。比如说，对所谓“跳楼自杀”的人，家属认为是被打死以后扔下楼去的。

肖光琰的一家最为悲惨。在肖光琰死亡两天之后，邻居见他们的家里没有动静，打开门看到，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已经一起死在床上。他们服安眠药自杀。一个三口之家就此彻底被毁灭。

张存浩是这个“特务案”的幸存者之一。他也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到美国留学。1968年，他38岁。他被从家里押上汽车带走的时候，他的妻子正锁骨骨折不能行动，家里有四个孩子。他被抓走后，工资一分不发，全家和他的一个老姐姐全靠他妻子的60元工资过活。

他的家被抄了7次。地板都撬开，柜子里的东西都被翻出来。他的工资比较高，每月有200多元。但因为孩子多，他又买了很多书和政府公债，因此没有什么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银行存款，审问他说：你家为什么没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

他的12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他们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特务是什么？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张存浩在“牛棚”中被关了一年。他被抓进去以后，人们看到在他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牌子。不过，即使在文革后，他从来都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对家人也从来不提。他只是告诉过家人一件事情，也许是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悲惨，但是也有些可笑：

被抓进“牛棚”以后，给了张存浩一个长长的单子，里面全是人的名字。“专案组”叫他承认那些人是他们组织的“特务”。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当时并不老，38岁，但是气糊涂了，而且，也绝想不到自

己 12 岁的儿子会在所谓“特务”名单上，所以坚决否认他认识一个名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说他“态度不老实”。他说，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

文革以后，政策改变，张存浩担任过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但是，1968 年和他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亡的七个人，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也不能说出他们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

张东荪及其子孙的恐怖遭遇 （作者：王友琴）

张东荪，知名政治学学者，1949 年以前曾任大学校长。1949 年时 63 岁。1949 年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文革中，他在 1968 年 1 月被“逮捕”，其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他被关在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 年，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老二张宗燧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五十年代成为中科院院士。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1949 年以后一直在天津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 年，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一起**自杀**。

1968 年 1 月，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在“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那里。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宗炳被逮捕后，他的妻子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还被“扭送”海淀公安局，她被关押了半年多。(当时，有“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的流行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文革群众组织来捕人的办法。)张宗炳在监狱中精神错乱。1975 年被释放。

1969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自杀。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和长期关押在特别监狱中。

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最佳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和**陈同度**教授一起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的两位教授,很受学生欢迎。1980

年代初他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普通生物学”的公共课，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 1968 年 8 月 28 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服毒自杀了。

张东荪的一个孙子**张鹤慈**，1963 年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因为和另两个学生结社写诗和发表了一些议论，张鹤慈被“劳动教养”三年。后又因“文革”爆发，直到 1978 年，也就是 15 年之后，才被从茶淀劳改农场放出来。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被“劳动教养”了 15 年。

张东荪还有一个孙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1968 年因“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 15 年。1978 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 10 年。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像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不可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人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史家翦伯赞夫妇之死　（作者：于松然）

1968 年 12 月 4 日，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巫中**，身着军装，腰挎手枪，带着几名副手，直奔燕南园。他要**翦伯赞**交待 1935 年国共在南京谈判时刘少奇的叛卖活动；但翦伯赞否认那次谈判中刘少奇有叛卖活动。双方话不投机，无奈之下，临走他撂下一句话：**“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

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他警告翦说：过几天他还要来。18 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问翦伯赞。由于翦拒绝做伪证，巫中勃然大怒，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骂道：**“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翦伯赞闭口不语。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下面，大吼：**“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但巫中并没有达到目的，而是空手悻悻而归。巫中的逼供，再次使翦伯赞的尊严受辱，斯文扫地，遂产生了轻生念头，做出了立即自杀的决定。

就在翦伯赞自杀前的 1968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共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对已被打倒、斗臭了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施恩”，借以证明他的“宽容”。他发布的“最高指示”说，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要**“给出路”**，他还特别关照北大的翦伯赞和冯友兰，指示北京当局和北大校方**“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有了这一“最高指示”，备受折磨的翦伯赞夫妇看到了希望，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被安排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 64 号庭院内居住，生活费也由 30 元增至 120 元，还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他老两口的生活(实则为监视)。翦伯赞对毛泽东的关照感激涕零。他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毛泽东看信后，称赞翦伯赞**“信写得很好**。”高枕无忧的翦伯赞夫妇，胸戴毛主席纪念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参加了落实政策大会。会上，他再三感谢“伟大领袖”对他的特别恩典。然而，**巫中**的出现，使他突然有所参悟。他悟出善搞“阳谋”的毛泽东，痞气再次大发作：原来对他发出的“最高指示”是虚晃一枪，毛泽东要置他于死地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俩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平卧在床上。人们还发现，在翦伯赞穿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不忘为监视他的杜师傅开脱责任。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是封建连坐时代自杀者的共有心态：恳求统治者对他的子女们**高抬贵手**！

这次翦伯赞**判断错了**：毛泽东虽没有完全放过他，却也无置他于死地的打算；置他于死地的是毛泽东营造的血腥氛围，**巫中**不过是在这种邪恶氛围里的一个卒子——一名上窜下跳的痞子、流氓无产者而已。

翦伯赞（1898 年 4 月 14 日～1968 年 12 月 18 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在周恩来领

导下搞过统战工作的政治家。

1916 年他进北京法政学校学习，不久又转入国立武昌商业学校学习，1919 年毕业。1924 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历史学和哲学。193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撰写文章批判中国国民党的亲日独裁政策，与反蒋的民盟章伯钧等政要交往甚厚，与反蒋的社会贤达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等交往频繁，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要职。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等著作。

他是个马列主义信徒，在中国史学领域，他开创了唯物史观的先河：用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梳理历史。他积极配合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当获悉毛泽东要批判教授**张东荪**时，他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批判的重任。1952 年 1 月，身为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东荪，已经是“改造知识分子”运动中的众矢之的。

翦伯赞在批判他曾统战过的张东荪时，言辞锋利，杀机昭然，指出张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在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批判中，他列举了张的许多“罪行”，如张东荪曾在几本书里曾写过：**“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历史业已证明，张东荪的这些思想是至高无上的。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批判结果，张东荪被打成“特务”。据报导，张东荪“国民党特务”身份的唯一“知情人”是毛泽东，因为，“伟大领袖”的感觉就是“铁证”。从此，被统战回国的张东荪和他的子孙，接二连三地遭遇横祸：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自杀身亡，两个孙子被重刑入狱，82 岁高龄的张东荪本人，也没有逃脱监牢之苦，五年后的 1973 年，死在狱中。

翦伯赞是一个史学家，一个有见地的学者；也曾是善搞统战权术的政治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学术领域，有任意驰骋的辽阔空间，使他自由地选择了马列主义；在那里，他还是个政治家，但他能找到政治和学术的平衡点，像平衡木上的体操少女一样，能自由地、主动地调整自己的“体态”。“解放”后，政治与学者的平衡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向政治上倾斜。初期，他似乎认为，用“改造”去确立马列主义是合理的，批判张东荪就是这种“合理”的体现。也许是史家的学术良心再现，他越来越感受

到政治对学术的压力，毛泽东的“改造”政策，正在变成学术发展的桎梏。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他开始反对“以论带史”和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权力史观，偏离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到六十年代，他逐渐完成了从**“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历史学家”**到**“首先是历史学家，然后才是共产党员”**的过渡。此时的他，已强烈地意识政治对学术的压抑。他说，当史学拜倒于权力的脚下时，**“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他的历史主义观点受到了批判，但他却坚持己见。当看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不知就里的翦伯赞，竟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他甚至还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公然反对对吴晗的批判。于是，毛泽东被激怒了。1966 年 3 月 17 日至 20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出打倒翦伯赞的“最高指示”。他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翦伯赞应声变成了“反动权威”、“反共老手”、“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遂被“革命师生”揪出批斗，备受肉体摧残和人格凌辱。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前一个“最高指示”说“打倒”就打倒了，而后一个“最高指示”说“给出路”却找不到出路了呢？**伟大的学者张东荪**在五十年代就预言：**“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预言是最好的答案！

1978 年 8 月，中共新领导人邓小平对翦伯赞的自杀亲自批示说：**“我认为应予昭雪。”**1979 年北大为翦伯赞举办了的追悼会，追认他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翦伯赞的学生中，有一佼佼者，师生关系甚佳。然而，文革一到，他便贴出大字报，大骂《**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还配有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的漫画，对老师加以人格上的侮辱。但当官方正式为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摇身一变，撰文《**我的恩师翦伯赞**》，以为纪念。这种司空见惯的无耻表演，是中国特色的赤文化之一。

第 16 章附注：

附 1、1968 年自杀身亡者名单（大部分死于“清队”）

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纪录统计。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纪录甚少

编号	姓名	职业	性别	年龄	死亡月份	死亡地点	何种运动、说明
1	安铁志	干部	男		2	北京	北京农大工会
2	毕金钊	医生	男	60	?	天津	天津总医院小儿科主任
3	常溪萍	干部	男		5	上海	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
4	蔡妻		女		?	山西	平陆县张村小学蔡启渊被打死后自杀殉夫
5	陈步雄	中师	男	40	?	上海	上海复兴中学制图教师
6	陈传碧	中师	男		7	石家庄	河北师大附中学教员
7	陈孚中	中师	男		8	江西	江西德兴中学教导主任
8	陈浩烜	教授	男	40	7	上海	同济大学建筑副教授
9	陈同度	教授	男		8	北京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10	陈永和	大师	男		11	北京	北大数学系教师
11	陈又新	教授	男		12	上海	上音学院管弦系主任
12	陈祖东	教授	男	56	9	北京	清华大学水力系
13	陈子信	干部	男		?	北京	中央乐团办公室主任
14	程应铨	讲师	男	49	12	北京	清华大学土建系
15	程远	大师	男		?	北京	北大西语系德语教师
16	崔雄昆	大师	男		10	北京	北京大学教务长
17	陈天池	教授	男	48	12	天津	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
18	戴立生	教授	男	70	12	天津	南开大学生物系主任
19	丁苏琴	大师	女		?	上海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
20	董铁宝	教授	男	51	10	北京	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
21	董友道	大师	男			上海	上海戏院文学系教师
22	范步功	学生	男	24	7	西安	西安交大学生“地主”家庭
23	范乐成	医生	男		?	武汉	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24	高景星	医生	男	54	6	武汉	武汉协和医院院长
25	王祥林	医生	男		?	南昌	在南昌一医院
26	孙　明	医生	男		?	南昌	南昌妇幼保健医院院长
27	樊庚苏	中师	男		?		上海松江二中教师
28	樊　英	教授	女		?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
29	方婷之	中师	女		?		北京三女中教师
30	费叔子	学生	男	24	6	上海	上海同济大学地质系
31	冯文志	员工	男		4	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员工
32	傅国祥	学生	男	24		北京	北京化工学院化工系
33	傅其芳	教练	男	45	4	北京	国家乒乓球队男队教练
34	姜永寧		男		4	北京	国家级乒乓球运动员
35	容国團		男	31	6	北京	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
36	郝立	大师	男		3	上海	上海华东师大教师

37	何光汉	中师	男			北京	北京五中俄语教员
38	贺小秋		女		4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女儿
39	胡秀正	中师	女	35	8	北京	北京师大附女中化
40	黄家惠	中师	女		12	上海	上海市长缨中学语文老师
41	老保姆		女		12	上海	黄家惠的保姆
42	黄耀庭	大师	女		5	上海	上海华东师大教育系讲师
43	黄钟秀	教授	男	46	8	西安	西安交大基础系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
44	张瑛铃	护士	女		9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保健室护士长黄钟秀之妻
45	翦伯赞	教授	男		12	北京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46	翦妻		女		12	北京	
47	蒋梯云				7	上海	上海同济大学副校长
48	焦庭训	中师	男			北京	北京第六中学
49	金大男	大师	女		8	上海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
50	雷爱德	医生	男	50		天津	天津医大教材科科长
51	李季谷	教授			7		华东师大历史系
52	李丕济	教授	男	57	11	北京	清华大学水力系教授
53	梁希孔	中师	男			北京	北师大附女中
54	卢锡锟	教授	男		6	北京	北大化学系副主任，其妻林芳北大化学系器材室职员
55	林芳	职员	女		7	北京	
56	林丽珍	中师	女		5	上海	上海市育才中学老师
57	施济美	中师	女		5	上海	上海市七一中学语文教师
58	?	校工				上海	上海市七一中学校工
59	刘承娴	干部	女		6	北京	清华大学统战部副部长
60	刘承秀	中师	女			北京	北京四中老师“清”
61	刘　浩	医生	男	42	5	北京	陆军总医院骨科医生，母亲听到刘浩死讯后自杀
62	刘母		女		6	山东	
63	刘培善	中将	男		5	福州	福州军区第二政委
64	刘书芹	教授	男		4	北京	北京农大兽医系副教授，“清”中全校死 16 人
65	陆谷宇	讲师	男		12	西安	西安交大工企教研室
66	罗森	大师	男	40		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
67	罗仲愚	教授	男		6	北京	北京农大兽医系
68	马圭芳	技师	男	54	9	上海	上海新沪玻璃厂技师
69	马思武	教授	男	63	7	上海	上海外语学院教授
70	马幼源	讲师	男		3	上海	上海华东师大
71	莽大令	教授	男	67	7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英语教授
72	毛一鸣	家属	女		9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家属
73	蒙复地	大师	男			北京	北大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
74	莫德勒	军人			11	内蒙古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图						
75	牧仁	军人			11	内蒙古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副科长遗书：“逼人太甚，不得不死。”
76	沐家云	干部	男		8	北京	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
77	穆淑清	小师	女			重庆	重庆市区东升楼小学
78	饶毓泰	教授	男		10	北京	北京大学物理系
79	任服赝	学生	男		8	西安	西安交大铸工 21 班
80	上官云珠	演员	女	48	11	上海	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演员
81	尚鸿志	干部	男	45		天津	天津电器传动研究所处级干部
82	尚女		女			天津	随父自杀
83	沈天觉	医生	男	60	4	北京	陆军总医院骨科医生
84	沈宗炎	职员	男	31	12	西安	西安交大 230 教研室实验员
85	孙国楹	讲师	男	30		上海	同济大学数学系讲师
86	孙兰	干部	女		4	上海	上海市教育局长
87	孙历生	中师	女	34	7	北京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
88	孙明哲	大师				北京	原北京地质学院政治课教师
89	孙若鉴	大师	男		7	上海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
90	谭立平	学生	男			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
91	唐　亥	干部	男			北京	夫妻分别是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和汉语系主任， 双双自杀。
92	徐　垠	干部	女			北京	
93	唐兴恒	工人	男	47	11	西安	西安交大福利部工人
94	汤家汉	大师	男			北京	北大东方语言系教师
95	陶钟	讲师	女	40	5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
96	王德宏	工人	男	60	8	西安	西安交大机械系修配组
97	王厚	炊工	男		7	北京	北大附中食堂炊事员
98	王惠敏	干部	女			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书记
99	王玉珍	中师	女		12	北京	北京一女中副校长同丈夫（无名氏）一起投河
100	无名氏		男		12	北京	
101	王振国	助教	男	32	12	西安	西安交大零件教研室助教
102	汪国庞	讲师	男	40	12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350 教研室讲师
103	翁超	工程	男			上海	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土木工程师
104	吴湖帆	画家	男	74	8	上海	上海中国画院
105	吴淑琴	校长	女			南京	南京古平岗小学校长
106	吴伟能	干部	男		11	北京	北大历史系办公室主任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
107	肖光琰	专家	男	48	12	大连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同英语教师的妻子、女儿一起自杀。
108	甄素辉		女		12		
109	萧络连		女	15	12		
110	谢龙甲	干部	男		9	忠县	四川省忠县县政协副主席

111	徐月如	专干	女			北京	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干部
112	许连荣		女			辽宁	新金县七口人一起上吊死
113	严裕有	工人	男	40	8	上海	上海星光工具厂工人
114	杨爱梅	中师	女			广州	广州第十七中学语文教员
115	杨景福	大师	男	36	11	北京	清华大学外语教师
116	杨朔	作家	女	55	3	北京	中国作协外文委员会主任
117	姚秉豫	干部	男		5	上海	上海华东师大生物系总支书
118	姚剑鸣	工人	男	66	7	宿松县	武汉建筑公司退休职工
119	殷贡璋	讲师	男	42	11	北京	夫妻都是清华大学基础课讲师双双自杀
120	王慧琛	讲师	女	41	11	北京	
121	于共三	中师	男		8	北京	北京景山学校中学部语文老师
122	袁丽华	小师	女		11	成都	四川成都市龙江路小学教师
123	钱宪伦	讲师	男	59	4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教研室讲师，同妻、岳母一起用煤气自杀
124	袁云文	钱妻	女		4	西安	
125	张淑修	袁母	女		4	西安	
126	章申	教授	女	50		上海	上海外贸学院教授
127	张放	中师	女			新乡	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中学英文教员
128	张富友	工人	男	30		天津	天津市葛沽锻铁厂工人
129	张健	大师	男			上海	同济大学水暖教研室教师
130	张景福	中师	男			上海	上海市复兴中学英语教师
131	张景昭	大师	女			北京	北京大学数学系老师
132	张燕卿	小师	女		11	北京	北京小学的生活老师
133	张友良	干部	男		3	上海	上海电影制片厂海燕厂副厂长
134	赵福基	教授	男	57	夏	哈尔滨	哈尔滨交通学院教授
135	赵光远	编辑	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136	赵九章	专家	男	61	10	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137	赵希斌	教授			4	北京	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副教授
138	赵晓东	中师	男		8	北京	北京清华附中体育老师
139	锺显华	中师	男			四川	四川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学教员
140	邹莲舫	家属	女	68	11	上海	因是文学史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之妻被斗
141	邹致圻	教授	男	57	12	北京	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
142	周寿根	工人	男		12	西安	西安交大“五七”工厂
143	周瘦鹃	作家	男	67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
144	周醒华	校长				上海	上海模范中学校长
145	周学敏	中师				北京	北京师大附女中语文老师
146	无名氏	中师	男			北京	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物理教师
147	无名氏	校长				山西	山西曲沃县下裴乡小学校长
148	无名氏	裁缝	男		6	黑龙红	密山县三梭通公社社员
149	无名氏		男			郑州	郑州大学附中炊事员

150	无名氏					北京	从财政部楼上跳下自杀的人
151	无名氏	中师	女		12	上海	上海红旗中学高中老师

附 2、1969 年自杀身亡者名录(大部分死于“清队”)

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纪录统计

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纪录甚少

编号	姓名	职业	性别	年龄	死亡月份	死亡地点	何种运动、说明
1	阿迪雅	军人	男		4	内蒙	军区政治部副处长“新内人党”
2	陈伯铭	会计	男	50	2	上海	上海女六中会计
3	陈文章	军人			4	内蒙	军区政治部科长“新内人党”
4	韩珍	医生	女		1	重庆	重庆市公安学校医生
5	季新民	小师	男			北京	北京景山学校小学部语文教师
6	江　楠	讲师	女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俄语讲师
7	姜一平	局长	男	47	11	北京	国家计委化工局局长
8	李　良	干部	男	51	2	天津	天津市公安局三处
9	李永康	干部	男		2	云南	云南省法院干部
10	李玉珍	职员	女	58	4	北京	清华图书馆职员“清队”
11	林庆雷	医生	男		?	福建	福建医学院医生“清队”
12	刘继宏	科长	男	45	2	西安	西安交大科研处科长
13	刘文杰	农民	男			巍山	云南省巍山县庙街公社新华大队
14	路学铭	大师	男	41	2	北京	清华大学体育教师
15	覃淑贞	职员	女		3	新平	云南省新平县医院工作
16	沈家本	讲师	男	48	1	西安	西安交大企工教研室副主任
17	孙兆禄	讲师	男	50	1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
18	汤聘三	中师	男		4	北京	北京 51 中学体育教员
19	王大树	助教	男	31	5	北京	清华大学电机系助教
20	王熊飞	医生	男	60		上海	上海浦东六里中心卫生院医生 ，住东昌路，一家三口自杀
21	张启行	医生	女	58		上海	
22	王祖华	学生	女	20		上海	
23	杨家发	干部	男		3	新平	云南省新平县戛洒区副区长
24	张永恭	干部	男		1	重庆	重庆市公安局二处干部
25	张宗燧	专家	男	52		北京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人员

第 17 章 权力更迭

17 章目录

★一、解放右派当权派　二、整肃左派当权派　★三、取缔左派红卫兵
1、“工宣队”开进清华园赶走红卫兵　★2、红卫兵全军覆没于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四、成立各省、市革委会　五、中共九大 1、十二中全会　★2、大会盛况 3、权力再分配
六、核战危机——两党玩火，美帝灭火　★七、五七干校　第 17 章附注

从 1966 年 12 月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起，到 1968 年 9 月，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简称“革委会”），毛泽东达到了夺权的目的，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一．解放右派当权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打倒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教训紧跟刘少奇而不听他的话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让听他话的左派上台执政。为了这个目的，他把妖魔化阶级敌人的惯用伎俩，搬到了中共党内。他把长期追随他的刘少奇比成“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是“牛鬼蛇神”。当刘的死讯传给他时，他咬牙切齿地批道：“**自作孽，不得活**！”他把追随刘少奇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斥责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走资派**”。他还把稍显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入“地富反坏右”的传统敌人行列，统统打成“牛鬼蛇神”。

但他也不是事事都能从心所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他发现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同情和支持刘、邓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甚至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时，他便煽动和“接见”年幼无知的红卫兵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借以向党内右派施压。当他发现各地右派当权派镇压红卫兵时，特别是贵族红卫兵摇身变成了“保爹保娘”派时，他便发动党内外左派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批判“资反路线”受到党内右派顽强抵抗时，引发了他的“无产阶级震怒”：号召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他还下令军队“支左”，即支持左派夺权。当他发现他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导致造反派分裂、75％军队“支右”不“支左”时，1967 年 8 月 4 日，他竟孤注一掷地抛出了“**武装左派**”、建立第二武装的决定。

显然，毛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中共推到了分裂的边缘。当是时，忠于中共的周恩来，心急如焚，生怕中共被毛之不争而毁于一旦。他借机向毛传出“**清君侧**”的暗示。接到暗示的毛泽东，大吃一惊，发热的大脑才开始渐渐冷却。8 月 26 日，“武装左派”的决定刚过 21 天，他便来了个 180

度的急转弯，做出了打击左派、令党内外左派瞠目结舌的决定：**抛出王、关、戚**。这个“清江侧”的决定，向党内、军内右派伸出了橄榄枝，释放出了妥协、和解的信息。

曾几何时，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咬牙切齿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接见”红卫兵时，他又通过林彪的嘴喊道：**“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他还通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恶狠狠地号召红卫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还要**“彻底打倒”**党内右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但为了释放和解信息，此时的毛泽东，摇身一变，竟成了广大“走资派”和执行“资反路线”当权派的保护神！

9 月 16 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上海，到各地视察，向党内、军内右派伸出了橄榄枝，同各地要员大谈起正确对待干部等问题来。

9 月 16 日，在浙江，他告诫浙江左派军干——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南萍**、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励耘**说：**“龙潜**（前省军管会主任）、**阮贤榜**（前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

9 月 17 日，在江西，他警告江西左派军干——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人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9 月 19 日，他在武汉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据跟随视察的代总长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

9 月 20 日，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人说：

“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但贺龙没有邓小平那么幸运：1968 年 10 月 13 日，他宣布“**不保**”贺龙后，贺的“罪行”旋即升级，审讯恶化，第二年的 6 月 9 日死于非命。

中共中央刊印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文件中记载，视察中，他还反复训导各地“诸侯”：**“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显然，毛泽东是要重新起用党内右派干部，只要他们能跟刘少奇划清界线，反戈一击，能听他的话，紧跟着他走。

重新起用党内右派干部，并非毛泽东心血来潮，是他在周的暗示后深思熟虑的选择。

尽管他的文革初衷是要左派掌权；但他很快发现，左派“曲高和寡”，没有他的支持，他们很难成气候，因此，将权力交给他们他并不完全放心。对于右派当权派，毛泽东很清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跟着他拼杀出来的左派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特别是在镇反、土改、肃反、反右甚至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中，他们大都立场坚定，能武善文，是对敌“从不手软”的“好干部”；而这些在他一手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好干部”，构成了**中国官僚特权阶级**，是他“打天下，坐天下”的依靠力量。然而，当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后，他们变了，变得对他敬而远之了，不听他的话了，纷纷站到相对务实的刘、邓一边，形成了党内右派。这种党内势力重新洗牌的结果，使他变成了少数派，深深陷入大权旁落的痛苦之中，憋了一肚子恶气，迫使他“别无选择”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发动文革，仅仅是想教训教训除刘少奇以外的右派干部：叫红卫兵、造反派打打他们的威风，斗斗他们的官气，冲冲他们的不听话，出出憋在他心头的恶气，并不想全部打倒他们。文革伊始，他在大叫“打倒”“斗臭”的同时，不断地高喊要“**正确对待干部**”，反复地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等等，意在警告党内右派的同时，敦促他们“改邪归正”：只要能听他的话，紧跟着他走，就是左派，他还会把权力交给他们。但当文化大革命遭倒党内右派的激烈反抗时，引发了他的“无产阶级震怒”，诱发了想彻底打倒党内右派的一闪念：下令批斗刘、邓、陶，做出了“**支左**”和“**武装左派**”的决定。

但毛泽东毕竟是个天才的毛泽东：当接到周恩来“清君侧”的暗示后，很快能自我反省，重新评估他的“无产阶级震怒”，决定向党内右派、军内右派伸出橄榄枝，释放出妥协、让步信息，以重新驾驭全党、全国。

毛泽东的急转弯，使许多党内外左派跟不上队，先后渐次倒台、挨整或被杀。

二、整肃左派当权派

为了重新驾驭全党、全国，不仅抛出王、关、戚，适时解放和保护右派干部，还让军事将领出任各地“封疆大吏”等要职，借以安抚军方。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中，有21人是军队干部，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其中多数都是中、右派将领。这种军管式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可以看出，毛泽东利用右派官僚主义阶级控制全国的心态。

按说，这些革委会的主任，都是在刘少奇被打倒、“走资派”遭整肃以后上台的，都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用当时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因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他们都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但由于当时的革委会是以党内左派为主左、中、右派妥协的产物，因此，当权谋大师的“战略转移”时，许多左派大员跟不上“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纷纷中箭落马。据统计：在最初的29个省、市革委会主任当中，先后遭到整肃的有13人，占了45%，他们大部分都是文革中崭露头角的左派干部；而稳坐台上的55%，几乎都是党内中、右派大员，他们多数都是曾经遭受过残酷批斗的“走资派”或执行过“资反路线”的人。

第一批遭到整肃的党内左派“封疆大吏”（省革委会主任）的有6人。他们是：

1. 山西的**刘格平**，1969年7月被免职，由69军军长谢振华接任；

2. 贵州的**李再含**，1969年10月被撤职，1975年去世。由54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

3. 河北的**李雪峰**，1971年1月被撤职。由“走资派”文革前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接任；

4. 山东的**王效禹**，1971年3月被撤职，由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

5. 内蒙的**滕海清**，1971年5月被免职，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

6. 黑龙江的**潘复生**，1971年6月被撤职，由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

在这些大员中，除李雪峰因株连“陈伯达案”被撤、滕海清杀人过多被免外，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和军队干部李再含，都是文革早期站出来表态支持左派造反的左派干部。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由于他们过分依靠和支持左派造反派，没有平衡左、中、右势力的手段，因此，在毛泽东与右派妥协后，他们便成了众矢之的，替罪羊的命运不可避免。

第二批遭到的整肃的党内左派“封疆大吏”有 3 人，都因与“林彪事件”有牵连而下台。他们是：

1. 浙江的**南萍**，1972 年被撤职，由“走资派”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任；

2. 江西的**程世清**，1972 年被撤职，由“走资派”文革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任；

3. 新疆的**龙书金**，1972 年被撤职，由“走资派”文革前的自治区主席、省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接任。

在中共的赤文化里，有两条重要原则是：一条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一条是**一人获罪，亲朋遭殃**。九届二中全会后，风云突变，毛泽东发现副统帅林彪威胁到他的权力，便与周恩来联手，开始了整肃林彪的进程。第一个被抛出来批判的是他过去的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常委陈伯达。由于李雪峰同陈走得较近，因株连而遭撤职。黄永胜、南萍、程世清和龙书金，在“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后，遂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而遭罢黜、整肃。

第三批遭到整肃的党内左派“封疆大吏”有 4 人，都是在 1976 年 10 月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后遭整肃的。他们是：

1. 上海的**张春桥**，1976 年 10 月被隔离审查，由右派将领前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

2. 吉林的**王淮湘**，1977 年免职、调离，由“走资派”前的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

3. 甘肃的**冼恒汉**，1977 年被撤职、降级，由“走资派”前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

4. 北京的**谢富治**，已于 1972 年去世，1979 年遭到鞭尸式的清算。

毛泽东“驾崩”后，党内右派发动宫廷政变，毛的左派干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束手就擒，所剩无几的左派“封疆大吏”，或被隔离审查，或被撤职，或被调离。

值得一提的是，1975 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遭过残酷批斗的“走资派”或执行过“资反路线”的右派大员，纷纷走马上任。他们是：

前江苏省委书记**彭冲**，接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前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接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前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接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接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右派将领**曾绍山**，接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

1979 年 12 月前后，撤销文革“一元化领导”的“革委会”体制，恢复了文革前“四大班子”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建制。自此，中共右派，通过十多年的权力搏斗和厮杀，以中国老百姓死亡 200～300 万人和伤残上千万人的代价，击败左派，重掌大权，毛左派骨干大员，悉遭整肃；与此同时，党内左、中、右派势力，开始重新洗牌，新的左、中、右派派系，便在酝酿、串连、汇合中逐渐形成，为展开新一轮的权力搏斗聚集能量。

三、取缔左派红卫兵

毛泽东为了重新驾驭全党、全国，在整肃左派当权派之前，要先解决支持左派当权派的红卫兵。那些紧跟他的战略部署的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在“横扫”、破“四旧”、造反、揪斗“走资派”、批“资反路线”、夺权和武装镇压贵族红卫兵、右派红卫兵的战斗中，为保卫他的革命路线，付出过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要团结党内右派，他必须抛弃他们，因为他们同左派当权派一样，只能是他可利用的炮灰，而不是依靠对象。这不叫“卸磨杀驴”，叫“规律”：老祖宗留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

1、“工宣队”开进清华园，赶走红卫兵

1968 年 7 月，随着以广西、陕西为代表的镇压左派造反派军事围剿行动的进展，毛泽东决定把五大领袖为代表的红卫兵赶下历史舞台。

1968 年 7 月 27 日，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组成 1,500 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院校。

当年，1966 年 8 月，毛泽东宣布，刘、邓派“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是镇压“革命师生”，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两年后，他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北大，镇压的对象，恰恰是当年被刘、邓镇压过的“革命师生”，却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不同的是打手不同：前者叫“工作组”，

由干部组成；后者叫“工宣队”或“军宣队”，由工人和现役军人构成。在这里，毛泽东把出尔反尔的“一分为二”哲学思想，演译得有声有色。

“工宣队”的进驻十分突然。一直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的井冈山派司令蒯大富，由于没有人同他打过招呼，便敏感而迅速地作出判断：“工宣队”同两年前的“工作组”是一丘之貉，是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蒯大富，他那里知道，一贯支持他的中央文革，在王、关、戚事件后，锐气大减，正处于逐步丧失权势的过程之中，也无暇关照他了；他那里知道，晁错伏诛，七国平定，左右妥协后，兔未死而烹走狗，他所崇拜的“红司令”毛泽东，要收拾他们了。

作出错误判断的蒯大富，“义正辞严”地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

圣旨在手的“工宣队”，则针锋相对地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面对“毛主席派来”一说，蒯大富根本不相信。他相信中央文革：过去毛泽东许多最新最高指示，都是通过中央文革传给他的。因此，没有中央文革的指令，就是右派反扑。于是，他当即立断，迅速召集几千名红卫兵，将“工宣队”团团围住，进行说“理”斗争。在文革中，“理”与“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阵雨点般的拳头和脚踢之后，“工宣队”员被打得晕头转向，仓皇逃出清华园。

红卫兵与“工宣队”的第一次交锋，大获全胜。他们欢呼，他们雀跃，他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然而，欢庆不过是回光返照，红卫兵墓穴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

五个小时后，近三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士兵，潮水般地涌进了清华园。他们兵分七路，在校内实施分割包围，使红卫兵所构筑的条条封锁线，顷之化为乌有。紧接着，他们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两派放下武器，走两派大联合之路。

得到党内右派支持和特别关照的“四一四”右派红卫兵，紧急会议后，决定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了武器。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 98 名“四一四”派红卫兵，在“工宣队”的保护下，抬着两具棺材，低着头走出了科学馆大楼，到达了安全区域。

以蒯大富为首的左派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没有中央文革的指令，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固守在据点里顽抗。黄昏时分，在绝对优势兵力面前，他们见势不妙，28 日凌晨 2 时多，从大礼堂后门突围逃出了清华园。当逃经西单电报大楼时，蒯大富向毛泽东、党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发了一则紧急呼救的电报：有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背后有“黑手”指挥，形势万分危急，请中央紧急救援。发完电报，他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工宣队”终以五名工人死亡和几百名工人受伤为代价，把蒯大富赶出清华园，为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战”，划了个句号。

2、红卫兵全军覆没于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28 日凌晨 2 点多，当蒯大富驱车奔向昌平之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开紧急会议，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院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北地院的**王大宾**。五大领袖的“爵号”，据说是毛泽东钦封的。毛泽东的“召见”，是给红卫兵下达的最后通谍。但下达最后通谍的方式别出心裁，令人回味无穷！

据韩爱晶回忆，当他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跟着谢富治来到湖南厅门口时：

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

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为了防止各取所需，召见时毛泽东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

官方的录音是否整理成文，档案尘封，人们不得而知。目前流传的“召见”版本主要有：《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革中文字》、《红卫兵档案》、《余汝信:七二八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和《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等。从流传的多个版本来看，似乎有人看到过录音文本。也许是受“主旋律”的制约，这些版本在讲话顺序、内容详实和删节上不尽一致，但倾向性明显一致。

尽管流传的版本颇多，但一些内容的可信度还是较高的。笔者根据流传版本的基本内容，编撰、点评如下：

⑴、抓“黑手”

当谈及蒯大富为什么没有来时，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显然，这是毛泽东针对蒯大富向他发出“紧急呼救”的电报说的。

⑵、大联合

毛泽东说：**“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林彪也说：“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对此，

毛泽东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显然，“军管”和“斗、批、走”是事前定好的基调。

⑶、“七三布告”

重申1968年7月3日和24日发布的两个布告。这是毛泽东下令歼灭各地左派造反派的布告。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接着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说：“**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接着说：“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又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又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周恩来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显然，这是把左派红卫兵与左派造反派等同起来，实行歼灭！

⑷、“关怀”五大领袖

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 **又说：“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王大宾反映说“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时，谢富治说：“他的二

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王大宾反驳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对此毛泽东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王大宾坐到了毛的身边。

当林彪说：“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毛泽东表示同意林的意见。他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

谈到聂元梓，毛泽东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当陈伯达等人批评韩爱晶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又夸奖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江青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陈伯达批评说：“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毛泽东反批陈伯达说：**“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当陈伯达批评蒯大富时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显然，毛泽东处理五大领袖与处理打手王、关、戚手段不同，亦与围剿广西“四二四”、取缔陕西“工联”、“工总司”等组织手段各异，体现了**“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的关怀，由此，人们可窥见到权谋大师城府之深邃。

⑸、蒯大富的号啕

蒯大富到昌平县不久，便接到了毛泽东通知。他带着几分惶恐，捎着几分安慰，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到来之前，谢富治在向蒯头上泼污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他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但毛泽东认为：**“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

见到毛泽东的蒯大富，真如见到了大救星。他泪流满面地告状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

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蒯大富的号啕，给召见蒙上了一层悲壮的阴影，江青哭了，毛泽东也落下了眼泪。但悲壮气氛很快被打破。

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等大员纷纷指责蒯大富。周恩来要求蒯“现在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枪支和其它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蒯大富站起来，态度强硬地对抗道：“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又说：“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作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过错都归结到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这不公平。**事实上，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从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某些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使红卫兵始终处于受压之中……”

毛泽东把话接过来：**“我看，现在不是别人杀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杀自己，自相残杀。”**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道：**“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会场气氛旋即紧张起来。

吴德趁人之危奏道：“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善做方向性引导的权谋大师，对吴德的奏本不予理睬。他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一句恨铁不成钢的话，冲化了紧张气氛。

批评蒯大富多少有些尴尬的江青，灵机一动，顺着毛的思路说：“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泽东顺着他确定的思路问道：**“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泽东毫不犹予地许以官衔：**“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上午八点召见结束时，毛泽东反复嘱咐大员们：**“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尽管就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园一事吴德向蒯大富打过招呼，尽管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但在整整一天里，他们都隐瞒了派“工宣队”是毛的决定的重要信息**。在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蒯司令，骄横狂暴，一意孤行，以“一贯正确”自居，怎会把吴德、迟群等辈看在眼里？面对“工宣队”的步步进逼，他下命开枪，打死了五个工人，终于使他跌入毛泽东设的圈套中：隐瞒毛决定的信息，是诱导他反抗；他的反抗，能使“工宣队”名正言顺地取其而代之，并使他陷入四面楚歌中；进而借“群众”之名，名正言顺地将五大领袖和他们所代表的红卫兵清除掉！

五条人命使毛泽东的计谋成功了。八月八日，他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时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此时，“理无常是”的毛泽东，已经“忘记”了一年前他曾说过的那句名言：**“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也“忘记”了1966年8～11月在“接见”1,200多万红卫兵时他那灿烂的笑容（图17-1）；“忘记”了“接见”中林彪代表他发表的对红卫兵充满信赖的超高赞语：**“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图17-1：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灿烂的笑

姜还是老的辣。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扶植和豢养的五大领袖，在毛泽东等人的“柔性”围剿下，很快都举手投降、束手待笞了。第二天，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监控下，写了一纸《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向全国公布。《要点》实际上宣布：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在召见中，五大领袖都受到“关怀”；但过后不久，他们同王、关、戚一样，先后失去了自由。十月宫廷政变后，他们又先后“领”到了他们各自罪有应得的不同期龄的徒刑，结束了他们即轰轰烈烈又可耻、可悲、可怜的走狗生涯！

在湖南厅里，那没有硝烟的围剿，是“清江侧”和“清周侧”的续篇，而这种对红卫兵的围剿，则是党内左、中、右派妥协和共同发力的结果！

四、成立各省、市革委会

1、黑龙江省（1967.1.31/3.20——革命委员会成立日期，下同）：

文革初，在取代欧阳钦当了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支持下，由二十三个大专院校和单位组成的造反团总部，在 1967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委员会”。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负责人范正美为核心小组班长，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为成员。成立“红色造反者委员会”后，党内右派省长李范伍，省委书记王一伦、陈雷、任仲夷等，悉数被打倒，交“**群众**”批斗。1967 年 2 月 2 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人民日报》编辑部配发了《**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对成立“红色造反者委员会”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1967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范正美**等为常委。1967 年 3 月 22 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从即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省革委会成立后，左、右两派武斗加剧，成了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1980 年 11 月中共政治局的连续会议档案记录——下同）。到中共九大前后，党内右派卷土重来，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又重回到领导岗位。党内左、右两派勾心斗角，斗争激烈，潘复生逐渐孤立而失宠。

1971 年 6 月，招架不住右派进攻的潘复生被撤，由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历任主任是：潘复生、汪家道、刘光涛、杨易辰。

2、山东省（1967.2.3）：

原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是个受排挤的干部，又是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因而受到毛泽东赞扬的革命领导干部。1967 年 1 月 22 日，他同康生的儿子青岛教育局局长张子石联手，支持并参加了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成立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武力一举夺取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得到了中共中央承认。1967 年 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编辑部文章中，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声音：“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青岛夺权后，王效禹肩负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到济南夺权。

1967 年 2 月 3 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组织，宣布成立“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武力一举夺了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权力。同月 23 日，“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为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等为副主任。1967 年 3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对山东省的夺权给了坚决支持。历任主任是：王效禹、杨得志、白如冰。

在中共等级森严、论质排辈的官场里，在省级第一把手的配置上，王效禹级别最低，权力最大，因而受到了党内右派势力的抵制。左、右两派武斗加剧，成了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到了 1969 年，随着党内右派势力卷土重来，王效禹发动的使左派造反派重新上台的“反复旧”运动，遂告失败，旋即失宠靠了边，山东革委会改由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工作。1969 年 11 月，王效禹遭到公开批判，1971 年 3 月被正式撤职，省革委会主任一职由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党内右派上台后，到 1979 年，王效禹被开除党籍。

3、上海市（1967.2.5）：

文革前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在毛泽东的导演下，1967 年 2 月 5 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用武力一举夺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的权，成为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同时他还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文革中，他步步高升，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内左派灵魂人物，誉为“军师”。尽管张春桥是毛的宠儿，权力极大，炙手可热，但却受到了党内右派势力的强烈抵制，左、右两派武斗接连不断。到了 1976 年 10 月，他与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右派发动的十月宫廷政变中，同时被捕，并以反党、反毛的“四人帮”罪名隔离审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由文革前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1977 年 7 月，张春桥被永远开除党籍，1981 年 1 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4 年死于狱中。

1968 年 4 月 29 日，伟大的自由战士**林昭，**被上海革委会处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英年 36 岁。1977 年 4 月中旬，苏振华上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半年多，不屈的民主社会主义斗士**王申酉**，被枪杀于上海卢湾区体育馆，英年 31 岁。

4、贵州省（1967.2.14）：

一心想当“封疆大吏”的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大校，同“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号兵’战斗队”等 40 个造反组织勾连在一起，组建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 1967 年 1 月 25 日晚上，“总指挥部”武力一举夺了贵州省委、省人委

和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一切权力。1967 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西南的春雷**》，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李再含的支持。2 月 14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终于如愿以偿地爬上了“封疆大吏”的宝座：担任省革委会主任，兼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和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

由于李再含坚决镇压右派造反派，受到了毛、林、周、江等中央头头们的赞许；但当毛泽东改变初衷与右派妥协时，他没有跟上，没有采取措施安抚右派，使贵州武斗愈演愈烈，成了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9 年 10 月，当了两年多贵州省“一把手”的李再含，被撵下台，由 54 军副政委蓝亦农接任。1971 年 3 到 4 月间，李再含遭到点名批判，之后又遭多次批判，当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深有“卸磨杀驴”之感的李再含，窝了一肚子火，终于气出病来：1975 年 56 岁时，据说，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气绝身亡。历任主任是：李再含、蓝亦农、鲁瑞林、马力。

5、山西省（1967.3.19）：

1967 年 1 月 7 日，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同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进行了“谈话”。这位副省长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1938 年 8～9 月间，在国民党狱中服刑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个中共党员，都按中共中央的要求，向当局写了“悔过书”后出狱，而同在一个监狱里的他，却拒绝这样做，结果又多坐了八年大牢，被康生讥为“太古板”。

经过“谈话”的刘格平，突然灵活起来。1 月 9 日，他同其它五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书记王谦。1967 年 1 月 12 日，在他的组织下，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武力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省市公安机关，夺了他们权。原省委、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交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山西夺权的支持。1 月 29 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杀身亡。

1967 年 3 月 19 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出任革委会主任，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和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夺权后，造反派分裂成“红总站”和“红联站”两大派，前者受刘格平、陈永贵等支持，后者受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等人支持，矛盾加剧，内战不止，终于成了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随着党内右派势力卷土重来，1969 年 7 月，刘被免职，由 69 军军长谢振华接任。历任主任是：刘格平、谢振华、王谦。

6、北京市（1967.4.20）：

在 1966 年 5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罢黜，以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的新市委应运而生，6 月 4 日向全国宣布。

但新市委好景不长。1967 年 1 月 17 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卫兵，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支持下，武力一举夺取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全部权力。2 月 11 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1 月 18 日，北京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武力进驻了市委大楼，夺了新市委的权。因派工作组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第一书记李雪峰受到批判，被迫逃到天津市躲藏。对于 1 月 18 日的武力夺权，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大加赞扬。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任命**谢富治**为主任委员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吴德、郑维山、傅崇碧和聂元梓为副主任委员。4 月 21 日，《人民日报》配发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日，《北京日报》也配发社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历任主任是：谢富治、吴德、林乎加。

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两派拼杀如火如荼。其中，仅在 1967 年 4 月 30 日到 5 月 10 日这 13 天里，发生死伤五十人以上规模的武斗，就有 133 次之多！

1972 年，谢富治病死于任上，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一职由副主任吴德接任。谢富治是个坚定的毛左派政治家，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却又是反邓的急先锋。邓小平执政后，死了多年的谢富治，遭到掘墓鞭尸式的全面清算：1980 年谢被开除党籍；1981 年谢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鉴于其已死亡，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70 年 3 月 5 日，27 岁的人权先驱**遇罗克**，被北京革委会枪杀于北京工人体育场。

7、青海省（1967.8.12）：

1967 年 2 月 23 日，青海省西宁市发生死伤 397 人的“青海二二三事件”，震惊海内外。这个事件是上层权力角斗的结果。

1967 年 1 月 12 日，受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支持的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力一举夺了《青海日报》的

权。1 月 29 日，又用武力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素与杨植霖有隙的第二书记王昭省长，见势不妙，以治病为由躲离青海。素与刘贤权不睦的副司令赵永夫，在中央右派将领的默许下，武力一举夺了刘贤权的权，并发动了“二二三”大屠杀。随着反“二月逆流”的发展，左派得势，3 月 14 日，周恩来宣布赵永夫夺刘贤权的权“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由是而成阶下囚。随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

1967 年 8 月 12 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贤权**任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等任副主任，第二天，《人民日报》配发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加以肯定。

但青海左派的好景不长，到 1968 年 4 月，支持左派的刘贤权调出青海，先到内蒙古，9 月又调任铁道兵政委。主任一职由被打成“走资派”的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任，右派很快东山再起。十月宫廷政变后，在济南军区副司令任上的刘贤权，遭清算、撤职，刽子手赵永夫则被平反，恢复名誉。历任主任是：刘贤权、谭启龙、张国声。

8、内蒙古自治区（1967.11.1）：

1967 年 2 月 5 日，呼和浩特市左派“三司”造反派，在内蒙军区门前静坐示威。中午 12 点 15 分，内蒙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在喊话，被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重伤，死于医院，酿成了“二五惨案”。“二五惨案”是上层权力角斗的结果。

进入 1967 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已分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以“三司”为代表的左派造反派，他们受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的支持，炮打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王绎等领导干部；另一派以“红卫军”为代表的右派造反派，他们受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副政委刘昌、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的支持，炮打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领导干部。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曾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吴涛逐渐得势。4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内蒙军区，刘贤权任内蒙军区司令员，吴涛任政委。刘贤权到任之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

中央决定下达后，内蒙古军区部分干部、战士，不服中央的决定，组织 1,000 官兵赴京上访，到中南海门前静坐。5 月 26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黄厚、王良太隔离反省；刘昌、张德贵停职反省；内蒙军区降为省军区；上访人员禁止外出，集中整训。同时，滕海清和吴涛亲率一个师开进呼和浩特，以弹压军内反叛势力。

1967 年 11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吴涛**任副主任。11 月 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红太**

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文章，表示支持。历任主任是：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孔飞。

1968 年 7 月 5 日，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区革委会正式提出深挖“新内人党”，在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内胡抓乱捕。全区有 346,000 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致残 120,000 多人，整死的则有 16,222 人（另一说“被迫害致死者达十万人以上”）。挖“新内人党”事件引发自治区上层分裂，政局不稳。1969 年 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赴内蒙，取滕海清而代之。1971 年 1 月，郑维山因株连陈伯达案被撤，尤太忠取郑维山而代之。

9、天津市（1967.12.6）：

1966 年 9 月 18 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在一场批斗会后，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这是一起典型迫害致死案例。9 月 19 日，有五十万人参加了万的追悼会。毛泽东接到报告后，龙颜勃然变色，怒批曰：**“这实际是向党示威，是用死人压活人”**，遂确定万晓塘、张淮三(市委书记)为“万张反党集团”。但到毛死后的 1979 年，“万张反党集团”案被平反。

1967 年 1 月 4 日，中央宣布天津由河北省辖改为中央直辖，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由于上层左、右派的角力，天津市“大联筹”和“五代会”两大派造反组织，横眉冷对，武斗频繁，政局混乱。2 月 14 日，当局决定对天津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经过近一年的流血武斗，1967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终于批准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任命**解学恭**为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为副主任。12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配发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颂扬天津革委会的成立。历任主任是：解学恭、林乎加、陈伟达。

10、江西省（1968.1.5）

1967 年 3 月 16 日，《江西日报》已实行军管。5 月 30 日，周恩来批评江西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7 月 6 日，毛泽东为了制止赣州武斗，命令**“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军区司令员；责令原江西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向群众作认真的检讨；要求全省把斗争矛头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派”；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把左派群众武装起来**。但到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由于令出多门，又反复无常，使部队无所适从，

在 8 月间，抚州军分区一些官兵用武力反抗军令。9 月 27 日，毛泽东定性说：**“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杨栋梁率部平叛，包括抚州市人武部部长在内的 65 名官兵和群众，惨遭枪杀。

1967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任命**程世清**为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为副主任。1968 年 1 月 5 日，革委会成立，1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九一三事件”后，1972 年 4 月 27 日，中共在“中发[1972]17 号文件”中指出：**“程世清同志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由是，程被撤，革委会主任一职由**江渭清**继任。历任主任是：程世清、江渭清。

1977 年 12 月 14 日，赣州维权斗士**李九莲**，被判处死刑，枪杀于赣州西郊青光岭。

11、甘肃省（1968.1.24）：

1966 年 6 月 25 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与常务书记裴孟飞联手，罢了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年，江任北大党委书记时，曾抓了七百多个右派分子，为中共做出了贡献），当日下午，江隆基自杀。8 月 22 日，为了保全自己，汪锋将裴孟飞打成“黑帮”，是裴遭受到戴高帽，挂大牌，坐“喷气式”等毛式批斗（1968 年 3 月 29 日，裴又被冼恒汉打成**“以裴孟飞为总头目的刘、邓第二套班子”**，最终导致裴孟飞自杀身亡）。11 月 10 日，汪锋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

11 月 14 日，兰州军区机关拉开文革序幕，开始搞“四大”。政治部副主任张 xx 和王 xx，掌握了领导兰州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使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的权力受制。半年后，张 xx 和王 xx 被打成“篡党反军集团”。12 月 30 日，兰州军区决定对甘肃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

在兰州军区和省军区内系派的支持下，造反派分裂成“红联”、“红三司”和“革联”三大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67 年 2 月，以“红联”为代表的造反派宣布夺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权力。于是，“红联”、“红三司”和“革联”三派之间矛盾迅速激化，导致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1968 年 1 月 24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冼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任副主任。1 月 2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历任主任是：冼恒汉、宋平。

1977 年 6 月，由于冼恒汉不听命叶剑英，多次无视叶要他为刽子手赵永夫平反的指示，兰州军区开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清查“冼家帮”。最后的结论是：冼站在“四人帮”一边去了，但还不是“四人帮”的死党，故免于刑事处分，降低政治生活待遇，提前离退休。冼的职位由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

12、河南省（1968.1.27）：

1966 年 8 月 14 日下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北京会见郑大学生党言川等时，明确宣布：“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刘的宣布，使他从中间立场转瞬间变成了左派，从而使他的副手如文敏生、赵文甫、戴苏理等省委书记们，成了红卫兵炮轰的目标。

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 1967 年，红卫兵很快演变成对立的左、右两大造反派：一派是左派“二七公社”，一派是右派“河造总”和快要瓦解的“十大总部”。左派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揪斗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清算他造成饿死数百万农民的“蛮干”罪行。毛泽东发布“支左”命令后，河南军区右派将领省军区政委**何运洪**，迅速行动，打击左派势力，党言川、陈红兵等左派领袖相继被捕。两派武斗遂呈白热化，使河南省成为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6 月，周恩来表态支持“二七公社”。7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下文，批评了河南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文件明确指出：“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何运洪被撤职，由王新取代。

1968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命**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等为副主任。1 月 30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72 年 11 月 4 日，王新变成“林彪死党”被撤，刘建勋依然稳坐第一把手交椅。1979 年，刘建勋被段君毅和平取代。

1975 年 8 月 8 日，驻马店地区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和 2 座中型水库、58 座小型水库，从零时 30 分起，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决堤，57 亿立方米的特大洪水，使驻马店等地区的 20 个县(镇)，俄顷变成泽国。受灾人数 1,100 多万，死亡 23 万多人（官方公布死亡 2.6 万人）。

13、河北省（1968.2.3）：

上海“一月革命”后，当时的省会保定市，造反派已分裂成遍及全省

的两大派组织，即“工总”派和“工筹”派。前者受驻军 38 军的支持，后者由河北军区、63 军以及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书记刘子厚的撑腰。1967 年 5 月，两派武斗白热化，使河北省成为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8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命**李雪峰**为主任，刘子厚为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人为副主任，并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市。2 月 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李雪峰、刘子厚、李尔重。

3 月 2 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设立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核为 80 人。1971 年 1 月，李雪峰因株连“陈伯达案”被撤，由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刘子厚接任。

1976 年 7 月 29 日，唐山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死亡 24 万人。世界各国纷纷来电慰问，并伸出援助之手，但病危中毛泽东，拒绝接受任何援助，发出了自力更生的“革命号召”，置数十万伤残、一百多万灾民生计于不顾。

14、湖北省（1968.2.1）：

“七二〇事件”后，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曾思玉，取代陈再道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原武汉空军政委刘丰，取代钟汉华为武汉军区政委，两人主导湖北政事。

以“七二〇事件”为代表的两派激烈武斗，使湖北省成为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8 年 2 月 1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左派造反派为主体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曾思玉**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任副主任。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配发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曾思玉、赵辛初、陈丕显。

随着“斗、批、改”的发展，革委会趋于分裂，左派造反派中出现了“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组织，时称“北决扬”，与革委会中的曾、刘主导势力对着干。1969 年底，革委会的曾、刘主导派，在湖北开展“两批一清”运动，将“北决扬”打成“五一六”加以取缔，许多左派造反派的头头被打成“五一六”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处于省革委会核心的左派造反派头头，也被迫“靠了边”，失去了权力。1972 年，刘

丰因株连林彪案倒台后，副主任张体学，指责曾、刘在大抓“五一六”和“北决扬”中，抓了 60 多万，犯了扩大化错误。

随着“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展，左派造反派时来运转，头头们又得以“补台”，恢复了一些权力。十月政变使上层权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下层干部和群众的权益也随之变形。1976 年 11 月，右派“百万雄师”死灰复燃，摇身变成了“工农兵”，在党内右派的支持下，他们把昔日仇敌左派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张立国、夏邦银、胡厚民等多人抓了起来。1982 年，朱、张、夏、胡等人被交付“审判”，分别科以重刑，其中胡厚民判 20 年徒刑。

15、广东省（1968.2.21）：

1966 年 9 月 28 日，广东省委召开批判省委后补书记、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王匡大会。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会上说：**“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显然是“舍车保帅”，王匡只能认命。

1967 年 1 月 22 日，省“革联”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赵紫阳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十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交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革联”。赵的交章行动，被周恩来斥为“是逃避责任”，“很可笑”。

1967 年 3 月 15 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由于军管会内部分歧严重，广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东风”和“红旗”两大造反派，武斗频发，年轻学生都变成了上层权力角斗的炮灰。

1968 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黄永胜**为革委会主任，孔石泉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任副主任。2 月 23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黄永胜上台以后，狠批赵紫阳，并把赵的材料报送到中央专案组。周恩来对广东的造反派说：**“赵紫阳就是个小爬虫，你们斗他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触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是搞农业的，只会说养猪**（众人大笑），**不懂阶级斗争嘛**。”周巧妙地保护了赵紫阳。1968 年“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上调北京取代杨成武任总参谋长。1969 年 6 月，革委会主任由广州军区司令**刘兴元**取代。历任主任是：黄永胜、刘兴元、丁盛、赵紫阳、韦国清、习仲勋。

16、吉林省（1968.3.6）：

1967 年 1 月，长春市多个造反派组成第二总指挥部，时称“二总部”。2 月初，“二总部”分裂，分裂出去的组成“长春公社”。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向“长春公社”广大革命群众赔礼道歉的“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1968 年 1 月 24 日，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造反组织（“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的“公社”派和“红革会”、“二总部”的“红二”派）实现革命大联合。

1968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任命**王淮湘**为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为副主任。3 月 10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77 年 2 月，王淮湘因株连“四人帮”案被免职，1980 年被开除党籍。省革委会主任一职由文革中的“走资派”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历任主任是：王淮湘、王恩茂。

17、江苏省（1968.3.23）：

文革初期，以第一书记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做出系列决定，支持文化大革命：1966 年 5 月，他们抛出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等多人进行批判，导致吴氏夫妇被学生打死；6 月 6 日，他们决定撤销南大校长匡亚明的一切职务，支持学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7 年 1 月 3 日，他们支持“赤卫队”与中央文革对抗，导致“一三”江苏饭店武斗事件；1 月 26 日，他们默许“红造总”单方夺权，促使造反派分裂成“好”派和“屁”派。由于“好”派和“屁”派在党内军内都有支持者，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其装备不断升级。3 月 5 日，公安厅、公安局被军事接管。

为了逃避揪斗，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逃到大别山军事重地躲藏，扬言造反派敢来抓他，他就开枪。“七二〇”事件后的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许世友。许应召从山里赶赴上海，“扑通”跪在毛的面前请罪。毛扶起许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后来又对许说：“**江苏革委会主任由你来当**。”

1968 年 3 月 23 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任革委会主任，吴大胜、杨广立等任副主任。3 月 2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许世友、彭冲、许家屯。

许世友是个聪明的大老粗。在江苏当政后，在“清队”、抓“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借机镇压左派造反派

和军内异己分子。据报导，仅百万人口的南京市，就抓出“五一六”分子二十多万，六十多万人口的无锡市，也抓出七万多个“五一六”分子，使成千上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九一三”事件中，他反林彪，在十月宫廷政变中，他又反“四人帮”，因而使他当上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核心。

1975 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许世友调往广州，省革委会主任由“走资派”原省委书记彭冲接任。

18、浙江省（1968.3.24）：

1967 年 1 月 15 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评浙江党、政、军当局，指责他们压制革命造反派“省联总”，支持群众斗群众。3 月 15 日，中共中央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任主任，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南萍（二十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任副主任。由于军管会内部分歧，逐渐形成的“省联总”和“红暴”两大派之间的武斗，愈演愈烈。8 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

1968 年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南萍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为副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南萍、谭启龙、铁瑛。

“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被捕，1972 年 6 月，“上了林彪贼船”的南萍、熊应堂被隔离审查。1973 年 5 月，原山东省最大“走资派”谭启龙，接任浙江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1976 年 4 月，谭启龙因镇压左派张永生等，在批邓中再次中箭落马，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铁瑛接任。十月政变后，党内“走资派”掌权。1979 年 4 月 3 日和 8 月 13 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判处“省联总”头头张永生和翁森鹤无期徒刑。正是：

“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

“走资派”要“造反派”的命。

19、湖南省（1968.4.8）：

1966 年 8 月 17 日，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正式成立。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李正**、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王虹霞**等高干子弟，为“总部”

负责人。9 月，在省委、省军区支持下，以保卫党、政、军的“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等造反派相继成立。在官方红卫兵、造反派成立后，非官方的也纷纷亮相。其中，9 月 7 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宣告成立。

9 月 24 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发动抓“黑鬼”运动，全省数千人被打成“黑鬼”和“右派”。10 月 12 日，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张宣布停抓“右派”和“黑鬼”，并给被抓被斗的人恢复名誉。为了与官方右派造反派抗横，10 月 14 日，左派造反派“湘江风雷”成立，矛头直指张平化。1967 年 2 月 4 日，“湘江风雷”、“红旗军”等左派被打成反动组织，大小头目悉数就擒。7 月 13 日，毛泽东公开支持左派造反派，他说：**“我们要为‘湘江风雷’平反。”**对此，7 月 31 日，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被迫写了检讨，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8 月 10 日，中共中央改组省军区，成立以 47 军军长黎原和华国锋、章伯森等为首的湖南省革筹小组，领导全省革命和生产。10 月 11 日，以“湘江风雷”为主的“省无联”成立。由于造反派系林立，武斗频繁，湖南成为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8 年 1 月 6 日，“省无联”杨曦光发表《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抨击党内左、中、右派势力，都是“红色”资本家阶级。2 月，“省无联”被取缔，其头头和《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曦光等人，被捕入狱，其中杨被判 10 年徒刑。

1968 年 4 月 8 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主任，龙书金、华国锋、张伯森等任副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按规定配发编辑部社论，表示热烈祝贺。历任主任是：黎原、华国锋、毛致用。

1970 年，中共中央发出 3、5、6 号三个文件，提出对在“一打三反”中被清查出来的对象，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此刻，毛泽东多次重复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讲话，成了千古谎言。为了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长沙晚报》在一篇社论中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一口气喊了七个“杀”，空前绝后。在“一打三反”和 1971 年的“清查五一六”中，多数左派造反派被整肃。在而后的“批林批孔”中，左派们的日子虽然好过了些，但到十月宫廷政变后，他们都被科以重刑，如“工联”头头、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勇，被判 15 年徒刑。

20、宁夏自治区（1968.4.10）：

1967 年 1 月 27 日，银川市“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宣称大联合夺了自治区党政机关的权。2 月 11 日, 宁夏军区发表声明，撤销

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支持，并对一些单位和学校实行军管、军训。

3 月 10 日　反对“一二七”夺权的造反派，以民兵为骨干，成立了“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由省军区和各级人武部支持；3 月 18 日，肯定“一二七”夺权的造反派，以学生为骨干，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由中央文革遥控撑腰。自此，宁夏对立两大派形成。由于双方都有后台，武斗经常发生。8 月 28 日，六十二师在青铜峡，协同“总指挥部”镇压“筹备处”。结果当场打死 101 人，打伤 133 人。

自治区军区司令朱声达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对着干。他死保自治区书记杨静仁、马玉槐等“走资派”，支持“筹备处”，镇压“总指挥部”。7 月 26 日，中共中央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定性为保守组织，8 月 18 日，改组宁夏支左领导小组，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靠了边的朱声达，旋即失去了自由。8 月 25 日，徐洪学率部进入宁夏银川等地，支持左派“总指挥部”。

1968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任命**康健民**为革委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任副主任。4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按规定配发编辑部社论，表示热烈欢呼。历任主任是：康健民、霍士廉、马信。

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仅银川市就挖出“叛、特、反、资”等“阶级敌人”1,200 多人。文革后，悉数平反。

1969 年 11 月 15 日，革委会开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为理由的遣散弱势群体的“群众运动”。仅银川一地，就有 1.5 万多人被迫落户到偏远山区农村。

1970 年 4 月 29 日，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因发表《砂不见木》的讨林彪檄文，被革委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枪杀于银川市郊。

21、安徽省（1968.4.18）：

1967 年 1 月 21 日，南京军区向林彪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22 日到 23 日，在合肥召开 15 万到 20 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 21 日 14 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1 月 21 日，毛泽东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毛的批示，催生了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 年 1 月 26 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人联合委员会”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省委的权。但由于没有实行大联合、三结合，遭到了“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 “红革会”、“工人一司”、“工人三司”、“红卫军”，“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的反对。自此，以对待“一二六”夺权的态度，分裂成两大派：支持者叫“G 派”，反对者叫“P 派”。由于两派各不相让，同全国各地一样，从辩论到武斗，又从冷兵器相拼杀到现代化兵器攻防战，连续不断。3 月 27 日，中共中央认定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立即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军管会，取严而代之。但由于军管不力，武斗不断。10 月 28 日，军管会改组，由 12 军军长李德生任主任委员，张文碧、廖成美、杨广立任副主任委员。12 军进驻合肥等地。李德生果然不负使命，仅用了三个月，便从造反派手中收缴了各种枪支 2.9 万余支，火炮 290 门，各种车辆 51 台，还有大量弹药，基本上控制住了省会合肥市大规模武斗。

1968 年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李德生**为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为副主任。4 月 20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按例配发编辑部文章热烈祝贺。历任主任是：李德生、宋佩璋、万里。

在省革委会领导下，5 月起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报导，到 1968 年年底，全省揪出“阶级敌人”43 万多人。在残酷的逼供信中，数万人致死、致伤、致残，以霍邱县最为严重。

22、陕西省（1968.5.1）：

1966 年 9 月 17 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西安市号召“炮打司令部”。他把陕西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对准了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和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此外，在“炮打司令部”讲话中，他把文化、教育、学术界人士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人，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显然，他是中共惯用的以打倒他人来保护自己的左派当权派！

1966 年 9 月 20 日，以西北局、陕西省委和部分军队高干子弟组成的“红色恐怖队”在西安成立。时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开基之子**张文光**

任司令，西中、十一中等高干子弟云集学校的学生，是“红色恐怖队”的主要力量。他们在陕西煽文革之风、点文革之火和大破“四旧”中，大显身手，其中，许多人都是专门对付弱势群体的杀手。文革后，他们中许多人同北京“联动”中的高干子弟一样，得到了陕西省各级党政当局的重用。

同全国各地一样，从 1967 年到 1968 年间，陕西武斗不断，成为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为此，中共中央于 1967 年 11 月 9 日，下发了“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要求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监督铜川地区的“铜总会”和“铜总司”两派之间、渭煤系统的“红造总”和“联委”两派之间，实行停火，并收缴武器。

196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于 5 月 1 日成立，任命**李瑞山**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等 11 人为副主任。第二天按例，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文章表示热烈祝贺。历任主任是：李瑞山、王任重、于明涛

据报导，省革委会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共清出“阶级敌人”46,724 人，增补地主、富农 10,048 户。在一打三反中，拘捕“反革命分子”1,934 人，其中，判刑 1,539 人，处决 101 人，“畏罪自杀”8 人，潜逃 13 人。又据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陕西省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

23、辽宁省（1968.5.10）：

1966 年 6 月 4 日，辽宁大学因反校党委，有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到 7 月 25 日，全校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增加到 409 个，其中，哲经系陈玉凤被逼疯。

1967 年 1～2 月，沈阳军区宣布“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并多次出动部队镇压。1967 年 4 月，“辽革站”、“八三一”和“辽联”三大造反组织先后成立，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党内、军内派系的支持下，他们之间武斗频繁发生。

8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常委李富春宣布:“王鹤寿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关于鞍山问题的决定指出：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王鹤寿和其它市委领导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等人，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严重武斗，对鞍山市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央决定撤销王、赵、罗、钟四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对王鹤寿实行隔离反省。中央决定成立以 39 军军长张峰、政治委员陈绍昆同志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12 月 7 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做了书面检讨。12 月 8 日，沈阳军区党委承认“支左”中犯了错误：支持“辽革站”，却对“八三一”和“辽联”两派支持力度不够，感情上有所疏远。

1968 年 5 月 10 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革委会主任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副主任由李伯秋，毛远新，尉凤英等十五人担任。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依例配发“热烈欢呼”的编辑部社论。历任主任是：陈锡联、曾绍山、任仲夷。

省革委会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搞“群众专政”，随意抓人、抄家，私立公堂，大搞逼供信。全省被立案审查 10 多万人，被关押 19.4 万人，上万人致伤、致残或致死，十几万家属亲友受到株连。

1975 年 4 月 4 日，敢于批评毛泽东的共产党员**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枪杀于沈阳大洼刑场。

24、四川省（1968.5.31）：

当“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时，在叶剑英等右派将帅的支持和林彪的默许下，四川省军区和驻军，从 2 月 24 日到 3 月中旬，就抓捕了造反派十多万人，史称“二月镇反”。其中，成都抓捕两万多，重庆市取缔和捣毁左派造反组织 118 个，迫其自动解散 146 个，抓捕 2,253 人。

当中央挫败“二月逆流”后，左派造反派翻身，但很快又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造反组织。在成都分裂成“红成”派和“八二六”派，在重庆分裂成“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有后台，都有军区或驻军的支持。他们之间的对立，与全省各地的造反派之间的对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各派都有军队的支持，他们之间的争斗很快白热化，成为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7 年 4 月 4 日，中共中央决定为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夫妇平反，给四川两派武斗火上浇油。

5 月 7 日，周恩来批评成都军区，把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接着他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一切职务，任命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刘结挺为副组长，负责筹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一切职务，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 54 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等人组成，负责筹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1968 年 5 月 31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国华**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 15 人任副主任。6 月 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依规发表编辑部文章“热烈欢呼”。1972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又指责“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林彪）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张国华病死后，主任一职由广州军区司令刘兴元接任。历任主任是：张国华、刘兴元、赵紫阳。

1969 年 3 月 25 日，重庆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群众专政大军”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建立“群众专政大军”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到 7 月止，全市“群众专政大军”人员已发展到 30 余万人，出现了大量乱抓人、关人、抄家、刑讯逼供等武斗行为，伤亡数千人，被群众骂为“**专群众政大军**”。又据报导，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揪斗了一万多人后，宣布清理出 2,600 多个各类“分子”。

1969 年 12 月，在周恩来主持下，调整了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12 月 25 日，周说：“**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由是，刘、张被撤。但在两年前即 1967 年 12 月 19 日，周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指示说：“**打倒刘、张就是反对四川十条，就是反对了中央**。”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25、云南省（1968.8.13）：

1966 年 6 月 10 日，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地委书记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6 月 26 日，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说：“**全国要抓 40 万右派**”。又说：“**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还行。这次恐怕不止此数，搞的面会大大超过**。”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7 月 5 日省委决定舍车保帅，抛出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高治国进行批判。阎说高是“牛鬼蛇神”。

从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到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发出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止，共经历了 43 天。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

外。9 月初，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焦急地说：**“毛主席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组织反击，还在稳坐钓鱼船。”**因为从公布《五一六通知》起已经三个月了。显然，阎、赵还在做九年前反右的梦。然而，他们失算了：毛泽东把矛头对准了他们。

11 月 3 日，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昆明市造反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阎红彦被迫在大会上作“检查”。

1967 年 1 月 8 日，阎红彦自杀。1 月 12 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时说：“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接着，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去支持电说：**“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1 月，昆明形成“炮派”与“八派”两大造反组织。26 日，“炮派”兵分两路：一路夺了省人委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晚上，“八派”开进省委机关，当面向省委书记周兴、赵健民宣布夺权。

3 月，中央批准成立云南军管会，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为主任，副政委张子明、云南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为副主任。李成芳支持“八派”，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省委书记赵健民等却支持“炮派”。两派武斗迅即激化。

1968 年 5 月 19 日，中央任命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取代李成芳。8 月 10 日，中共中央任命**谭甫仁**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等 8 人为副主任。8 月 13 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8 月 1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文《**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谭甫仁、周兴、贾启允、安平生。

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数万人在逼供信中致死、致伤、致残；在边疆地区建立政治边防中，揪出九种人 28,162 人，导致德宏州 17,961 人外逃到缅甸，红河州 1,311 人外逃到越南。

1970 年 12 月 17 日，恶贯满盈的谭甫仁遭暗杀身亡。中央任命**周兴**为省革委会主任。

1976 年十月宫廷政变后，安平生执行中央关于清查“帮派体系骨干”的指示，依靠“炮派”，把“八派”作为主要清查对象。据报导，清查波及全省一百五十万人，清查出“四人帮云南帮派体系骨干”5 万多人，数千

人被判刑入狱。

26、福建省（1968.8.14）：

1966 年 11 月 1 日，红卫兵封闭福建省委办公厅大楼，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要调军队镇压，省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能去，群众运动是符合大方向的。”

11 月 24 日，叶飞支持的工人赤卫队在体育场召开的一万多人大会。会中，与红卫兵发生流血冲突，多人受伤。韩先楚表态，支持红卫兵，抨击叶飞。

在毛、周和中央文革的压力下，1967 年 1 月 4 日，叶飞向全省发表“向全省人民请罪”书：“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压制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打击了革命左派，使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1967 年 1 月 26 日，保叶造反派冲击军事指挥机关，要韩先楚承认冲司令部是革命行动；2 月 7 日，厦门取缔了十六个造反组织。于是，福建一些地方出现“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的标语口号。

对“一二六” 冲击事件和“二七”取缔事件的赞成和反对，福建形成了以“八二九”中心和以“革造会”中心的两大对立造反派别。前者受中央左派和省军区的支持，后者受中央右派和各级地方政府、人武部的暗中支持。两派都有坚强的后盾，各不相让，武斗频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总理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同志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但有困于以叶飞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强大，韩先楚“病”了一个多月。“病”好后，他改变了策略：在孤立叶飞的同时，向地方势力修好。8 月 22 日他说：“我身体不好，正在治疗，对家里的事情不了解，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没有彻底走群众路线，没有和地方领导干部很好商量……”

1968 年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任命**韩先楚**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副司令皮定钧等十一人为副主任。8 月 21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依规发表编辑部社论“热烈祝贺”。历任主任是：韩先楚、廖志高。

在“一打三反”中，以韩先楚为首省革委制造了一起大血冤案：枪杀“**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主要成员**谢洪水、谢永祺**等 21 人，打死 8 人，

逼死 12 人，致残者 28 人，自杀多人。

27、广西自治区（1968.8.26）：

1966 年 7 月，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通知要害部门加强警卫，要求各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

1967 年 1 月，韦为自保，抛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贺希明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霍泛进行批斗。贺希明曾当过国民党政府广西航空学校政治教官和寿县县长，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霍泛曾被捕过，被打成叛徒。

1967 年 4 月中旬，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声明支持红卫兵造反派。

1967 年 5 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

1967 年 6 月 14 日，周恩来发表了“保韦”讲话。在回答毛曾赞扬“**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的话时说：“**主席是说过的，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笔者：指韦任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时，在击败法国的“奠边府战役”中作出的贡献）。**对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中央是要支持。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毛、周对韦的支持，确定了广西文革的走向，注定了“四二二”反韦的派的命运。

但到 1967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改变了立场，他要军区端正态度支持“四二二”派。1967 年 11 月 6～8 日，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被迫先后作了检讨，承认压制“四二二”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967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军区司令欧致富、军区政委魏佑铸、空七军政委焦红光等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7 年 5 月以后，“四二二”与“联指”之间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烈度不断升级。直至 1968 年 8 月，已导致十多万人伤亡，成为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在韦国清的省革筹组领导下，不少地方刮起了大杀“阶级敌人”之风。资料显示，到 1968 年 5 月 11 日为止，在县以下，全区共诛杀“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等各种“阶级敌人”18,000 多人。

当知悉中央取消对“四二二”派的支持后，韦即开始了剿灭政治对手

的部署。从 1968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3 日，《广西日报》连发九篇社论，煽动仇恨，挑起屠杀，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资料显示，区革筹组和广西军区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大开杀戒，仅在 7～8 月的一个多月中，全区又枪杀包括“四二二”在内的各类“阶级敌人”84,000 多人。

1968 年 8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腥风血雨中成立，双手沾满血污的屠夫**韦国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人任副主任。1968 年 8 月 28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韦国清、安平生、乔晓光。

28、西藏自治区（1968.9.5）：

1966 年 10 月 15 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的谈话中，传达了中共中央消灭藏族文化的决心。他以“解放者”的姿态说：**“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又说：“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

1967 年 2 月 5 日，“造总”等群众组织在拉萨市开大会，宣布夺权。西藏军区支持。

1967 年 3 月，“二月镇反”平凡后，西藏自治区形成了“大联指”和“造总”两大派对立造反派。武斗由是开始，一发不可遏制。1967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确认双方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1968 年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批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示中确定：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原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王其梅（原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67 年 8 月 15 日含忿去世。）等勾结达赖、班禅叛国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批示中确定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人任副主任。9 月 5 日，西藏革委会在敲锣打鼓中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予以祝贺！历任主任是：曾雍雅、任荣。

1970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

示》。《指示》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出现，要求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这是继 1959 年强行消灭“农奴制”后以“解放者”自居的汉人，主导的第二次强行消灭！

29、新疆自治区（1968.9.5）：

1967 年 1 月 2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新疆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反革命歹徒；但新华社记者则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1967 年 2 月 11 日，中共中央规定：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7 年 3 月中旬后，乌鲁木齐市的造反派逐渐分裂成两大派：“三新”派和“三促”派。前者由省军区和原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的支持，后者由周恩来、中央文革撑腰。由是，两派互不相让，武斗不止，成了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8 年 5 月 4 日，周恩来说：“**兵团还有张仲瀚的余孽**。”周说的“余孽”除“五类分子”、劳改犯、国民党起义官兵和盲流外，还包括支边青年。他说：“**动员的上海、武汉、天津支边青年，上海尽量把工人子弟留下，把资本家的子女送去，从上海来讲，是对的，但你们那里增加了负担**。”

1968 年 8 月 31 日，新疆军区党委在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武光（原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吕剑人（原区党委书记）、张仲瀚（原新疆军区副政委、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伊敏诺夫（原区政府副主席）、包尔汉（前新疆人民政府主席）等，代表了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妄图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报告建议**龙书金**担任革委会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人任副主任。9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9 月 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予以祝贺！历任主任是：龙书金、赛福鼎、汪锋。

1972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文说：“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龙由是被撤，由赛福鼎继任。

1975 年 5 月，新疆生产兵团发生“兵变”，新疆军区出动军队镇压，伤亡 7,330 多人；其中，枪杀 2,170 人，失踪 8,137 人。到八十年代，“兵

变”被平反——这是中共先镇压、后平反即“**先杀后抚**”的又一例证。

*　　*　　*　　*　　*　　*　　*　　*

笔者评语：

二十九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都是通过武力夺权实现的，其血腥性无一例外——这是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的写照。

据悉，在海外，有“民运人士”声称：“**当年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人民群众在文革历史条件下，争取民主斗争的政治成果**。”如果你不健忘，请回头看一看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过程：在那里，除了赤裸裸的权斗和鲜血淋漓的内讧、武斗外，**你能感受到“天鹅绒”民主的温馨、嗅闻到“茉莉花”自由的芳香吗**？又有人说：“（革委会）**其得而复失，完全是因为老‘走资派’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可悲的是，这些“民运人士”还在“走资派”、“走无派”之间徘徊。他们竟然没有看到，无论是在毛泽东鼓噪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五、六十年代和“继续革命”的文革年代，还是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年代，抑或是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江、胡、习”时代，他们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旗号，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的**官僚特权阶级**。这些官僚特权阶级的共同特点是：一谎言，二镇压，三腐败！寿命短暂的革委会，同“人民政府”的德性一样，都是一党专政工具，有什么值得赞扬、值得怀念呢！

五、中共九大和选举秘笈

1、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党内右派伸出橄榄枝

1968 年 9 月 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是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的任务已经完成的标志。9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宣布“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当中共官员们在用社论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同时，还特别印发了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以资纪念。然而，“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竟把港、澳、台排斥在“全国”之外，犯了分裂国家的严重政治错误。但当发现这个错误时，为时已晚，那张“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

已无法全部追回。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张“犯了分裂国家的严重政治错误”的宝贵邮票，已经成了天价抢手货。

权谋大师毛泽东本想以“横扫”、破“四旧”、批“走资派”、批“资反路线”、抓叛徒、“群众专政”、武装左派，甚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争方式，一举将党内右派悉数歼灭；但当他发现党内右派势力强大，强大得足以毁灭掉他几十年来构建的一切时，他后退了，决定与党内右派妥协，以期左右共治。一年来，他通过“清江侧”、“清周侧”、取缔红卫兵、围剿左派造反派等一系列权术，抚慰了党内右派，鼓舞了党内左派，孤立了刘少奇“一小撮”政敌，巩固了他至高无上的独断地位。29 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他认为以左派为主、左右共治的局面已经形成，发扬一下民主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决定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大会不仅要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更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显而易见，他要创造条件，来体面地结束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于是，1968 年 10 月 13 日，为“九大”做准备的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旋律”精英们，在主编的《毛泽东传》一书中写道：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它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主编精英们刻意回避毛泽东违犯党章的主要事实：党章规定每五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而“八大”是 1956 年开的，毛利用权力拖了近十三个年头，等把他的政敌一一清除掉并把权力牢牢握在他的手中后，才放心去召开这次大会。

在全会上，毛泽东为已经失败了的文化大革命辩护。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他的默许下，左派大臣们围攻

了几个还不太服气的开国功臣。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全会还通过了为“九大”准备的几个文件。全会的主要成果是：完成了开除毛的政敌刘少奇党籍的“民主”程序。对此，上层精英们在他们编纂的《中共大事纪》中写道：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3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上层精英们有意隐瞒了一个重要史料：刘少奇专案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道：**“此人该杀!”**

为了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十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频频向党内右派伸出橄榄枝：

1968年12月1日，北京新华印刷厂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时，他批注道：**“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12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中写道：**“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1969年1月3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道：**“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3月3日，他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一句话，决定了中央文革小组被踢出政治舞台的命运。

3 月 22 日，他在同将被“踢出政治舞台”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时说：**“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毛泽东伸出的橄榄枝，使党、政、军内右派得意洋洋。他们借机东山再起，理直气壮地镇压起左派造反派和“地富反坏右”等传统阶级敌人来。

2、“九大”大会盛况和选举秘笈

在中、苏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有人建议推迟召开“九大”，但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则认为，召开“九大”是当务之急：其一是一个胜利的团结的大会可以凝聚党心、民心，是最好的备战；其次是苏修还没做好准备。为了防止苏联可能的突然袭击，3 月下旬，他要外交部通告苏联，准备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以为缓兵之计。

1969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在北京召开。1,512 多个代表，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北京。据报导，代表们到京以后，分别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已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到丝毫痕迹。几天后，代表们才从通知中得知，4 月 1 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安排：先乘车在市内兜圈子，然后分时、分批、分门隐蔽进入。滴水不漏的保密工作，令境外媒体有些惊讶。

1 日下午，“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会议议程包括宣读、审议政治报告、党章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以及备战等。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由于他的致词不断被“暴风雨般”掌声、欢呼声、万岁声打断，短短 649 字三五分钟就可念完的开幕词，他竟讲了二十多分钟。——在领袖崇拜的共产主义国度里，这种赤文化的顽强表现，十分正常！

接着，副统帅林彪代表八届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据说，林彪对这个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过多次的政治报告，不很满意，但他必须照本宣科。

政治报告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宣扬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报告把毛为保卫个人权力向刘、邓夺权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贴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标签，概括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政治报告还把毛泽东权力情结的阶级斗争思想，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把大会开成“胜利的大会”，政治报告严辞规定大会的方向：“**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为了把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政治报告在强调正确执行知识分子、干部、“可教子女”等政策的同时，鼓吹“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权力拜物教理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4 月 14 日，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

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引人注目的一条规定是：“**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胆之举？当鲜花盛开的时候，已经开始凋谢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被写入党章，是左派胜利的标志，但也是走向分裂、走向陨灭的开始。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是江青提出来的，而且“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并说“张春桥第一个赞成。”据此，精英们著文说：“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是“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的解释”。精英们的批判，刻意回避了周恩来的支持和毛泽东不容争议的决定权——这是真假搀和、文过饰非、阿谀谄媚赤文化的顽固表现。

“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的选举，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亦即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原则。全会提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是经过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反复“民主协商”产生的，体现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279 人，都是经过代表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来的，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种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就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据报导，参加全会的代表除 2 人因病缺席外，都参加了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投了自己一票，得了满票 1,510 张；周恩来没敢投自己一票，得票 1,509 张，仅次于毛；林彪不敢与毛平起平坐，他同妻子叶群都没投他的票，故得票 1,508 张，位居第三；第一夫人江青得票 1,502 张，除一张“谦虚”票外，尚有 7 人敢不选她，也算发扬民主了。

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制导下，出现两个意义不同的选举结果：前者是有意设计，后者是无知自封。

一个是如何对待党内右派领军人物，如五老：陈云、李富春、邓子恢、李先念、张鼎丞，五帅：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犯过不同程度的这样或那样错误，但他们在党内、军内威望较高，很可能高票当选；为了约束他们并以示惩戒，主持者提出了他们的得票率不得超过 2 / 3 的设计。按此设计，各代表团把选与不选他们的人数，通过“民主协商”，落实到每位代表的人头上。“民主选举”结果证明，这个设计取得了成功：得票最低的是徐向前，获 808 张，得票最高的是张鼎丞，获 1,099 张，其它人得票都在 809～922 张之间。

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工人**王白旦**的当选。王 1935 年出生在河北景郅太行山区，初中文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后，他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这位王白旦有点“二愣子”品性,名字因与“王八蛋”谐音,工友们便以此戏称之，他也不介意。1969 年“九大”召开前，因他是贫农出身，根红苗正，被推选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当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时，他“阴差阳错”地被指定为九大的代表。令人惊奇的是，他不但当了代表，还“阴差阳错”地当选为中央委员。也许“时势造英雄”，当是时，“工宣队”把红卫兵撵下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已家喻户晓。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他，在选举时，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往他的名字上划钩。怎奈他不知就里，也给自己名字上划了个钩。他的这一钩不打紧，把自己钩成了一个唯一与“伟大领袖”同得全票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这个敢于同“伟大领袖”平起平坐的行为，就构成了一个“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重大政治事件。时代宽恕了他的“二愣子”品性，成就了他的官运。

对“九大”选举中出现的这两种不同的选举结果，文革后被精英们抨击为“**很不正常**”。

精英们对五老五帅不能高票当选忿忿不平,说这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糟踏”。精英们错了：民主集中制不仅不会去干涉这类“糟踏”，而且还会力促这类“糟踏”。精英们嘲笑“王八蛋”的当选是“阴差阳错”，甚至说他

“二愣子”品性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精英们又错了：王白旦当选甚至高票当选是否是“阴差阳错”？他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承认不承认他的代表权？民主集中制不仅蔑视“阴差阳错”问题，而且对王“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质疑，也不屑一顾。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腌渍中的精英们，已无法摆脱那种根深蒂固的顽钝和偏见，他们不会承认，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毛主席正确领导下”的民主制，或曰刀架在脖颈上的民主制，正如林彪在日记中表白的那样：“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他们更不会承认，所谓民主集中制，是中共专制体制下滋生出来的一种变态民主的赤文化。

精英们的抨击，并不证明他们有了什么新思惟，他们的思维仍然是**仰头思**维，即看当权者的颜色行事的思维模式。当今主子要否定文革，他们便找理由抨击“九大”选举“很不正常”，闭眼不看过去主子和当今主子的做法并无不同。毛泽东用不太听招呼的右手,夹住铅笔，在纸片上颤抖抖地划了**“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请看，一代“英明领袖”华国锋便呱呱落地；邓小平说了句**“江、李体制好”**，这不，江泽民、李鹏便在第一、二把交椅上正襟危坐了 13 个年头；邓小平生前交待江泽民说，两届后把权力交给小胡，江乖乖照办；于是乎，13 年的媳妇熬成婆，胡锦涛羽扇纶巾，粉墨登场。这就是“协商民主”的典范。在典范的示导下，中共各级党代、人代、政协的选举和干部选拔，都纷纷效法。由此可见，无论是毛泽东的“九大”选举设计，或着是邓小平的指定接班人的设计，都是“服从——纪律”即民主集中制的一脉相承，如果有所差别，不过同工异曲而已。精英们对“九大”选举的抨击，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仰头**秀。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权贵和精英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对“九大”“民主协商”和“民主选举”的批判，再次检起“协商”和“选举”相结合的牌子。2010 年 9 月 16 日，他们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划清中国特色民主同西方民主界限》文章中宣称：**“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他们还号召要**“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划清界限，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昨天，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曾使“九大”成了毛泽东的独裁天下，而今，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已使中国官场买官卖官泛滥成灾。

3、一中全会权力再分配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 1969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他所说的“无产阶级领导”，就是他个人的绝对领导。

他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也有好人。但是，他们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他所说的“刘少奇那种路线”，无非是刘少奇对他的路线做了较有人性化修正的路线。

全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常委 5 人，中央政治局委员 21 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人。九届一中全会的公告中说：

会议的内容是选举中央机构。选举结果：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和以上不按，反映了中共根深蒂固的腐朽的等级观念！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 23 人（死亡 2 人）政治局委员和后补委员中，左、中、右派的比数是：**4：1：16**。经过几届打倒、靠边和调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26 人组成的政治局中，左、中、右派的比数变成：**5：2：19**，左派虽有增加，但右派仍占优势。新的九届一中全会 25 人的政治局名单中，左、中、右派的比数是：**16：3：6**，显然，左派取得了胜利，右派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右派并没有完全失败：不仅在中央一级保住了翻盘的筹码，看看中委名单便知，各地左派并不占绝对多数，右派还占相当份额，许多省市是左、中、右派平分秋色。

笔者评曰：

中共“九大”，这个被宣布为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是党内右派受挫毛左庆功大会。尽管大会高唱“团结”、“胜利”，但人们还是能嗅到没有散去的腥风，看到还在徘徊的血雨。因为，在庆功的祭坛上，陈列的牺牲就有 200～300 万个，而伤残者则超过 1,000 万：历史不会让中国人忘记毛泽东所谓的“团结”和“胜利”。更不能让中国人忘记的是，在那些牺牲中，有 50～60 万个是“为保卫毛主席”而献身的“烈士”，有 100 多万个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负伤的“荣军”。这些“烈士”和“荣军”，为毛左集团夺取刘右集团的权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惜，毛泽东关心的是个人权力，不是他们的贡献：他们遗留下的斑斑血渍，被毛的“舆论一律”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被埋葬的遗骨，也被毛的“舆论一律”分解得无影无踪；因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为中国历史留下来的竟是：千古愚弄，万古笑谈！

六、核战危机——两党玩火，美帝灭火

正当中共“九大”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之际，1969 年 3 月 2 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展开激战，造成数百人伤亡。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吗？非也！

自苏共党魁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热变冷，又从论战向武装冲突发展。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在当时两国 7,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上，摩擦事件接连不断。据统计，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2 月，中苏边境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就高达 4,180 余起之多。尽管冲突事件频发，双方都没有做打仗的准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狂躁起来的中国人，那些曾在砸印度使馆、砸印度尼西亚使馆、砸缅甸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大显身手的造反派们，那些曾在莫斯科红场上造反、扬言要对“苏修”实行“群众专政”因而导致同苏联军警浴血肉搏的大学红卫兵们，那些曾在派性厮杀中百炼成钢的“英雄”们，以及那些热衷内战、支持红卫兵、造反派横行霸道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权贵们，对摩擦事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频频发出“教训”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下称“苏修”)的呼声。

红卫兵高呼：“油炸勃烈日涅夫！”(苏共总书记)造反派高呼：“绞死柯西金！”(苏联政府总理)据说，江青曾扬言，给她十万红卫兵，便可踏平莫斯科！这个“据说”似有丑化之嫌，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特有的骄狂和浮躁！

中苏对立中，客观形势是敌强我弱，至今未变。在敌强我弱又无外援

的情况下，索要被侵略者侵占的领土，外交谈判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例如，日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承认俄占其北方四岛的合法性，即坚持**不承认、不冲突、维持现状**的立场，为后代子孙有力量在向俄国讨还失地时，创造了占据国际法理高地的有利条件，不给侵略者留下任何赖帐文字或口头把柄。但在毛、林、周、江等人的鼓动或默许下，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国情被“**人民战争所向无敌**”的愚昧所湮没，冒险主义占了上风，解决边界冲突的**外交谈判**被边缘化。

在 7,000 多公里的边界上，除根据中俄不平等条约被苏俄侵吞的约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外，还有许多被苏占领的有“争议”国土，其中有：0.74 平方公里的**珍宝岛**，350 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半岛**，4,815 平方公里的**江东 64 屯**，约 103,000 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30,000 多平方公里**帕米尔的部分地区**，等等。此外，尚有许多被苏俄蚕食但多数中国人不知情的地区。如笔者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三梭通公社发现：大顶山大队边境线以南，有一块约 10 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五十年代被苏军蚕食掉(1)。

珍宝岛北距饶河县城 45 公里，是个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西靠中国一侧的一个小岛，长约 1,700 米，宽约 500 米，面积 0.74 平方公里。枯水期，小岛几乎与西岸连成一片，**是一块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图 17-2）。就国际法而论，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是霸道。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以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西侧为由，把该岛划归苏联所有，称其为达曼斯基岛，从此形成争议，摩擦不断。



图 17-2：航拍珍宝岛

边界冲突不断激化。**据中方统计**：从 1967 年 1 月到 1969 年 2 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苏边境上的我方边防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与苏军发生肢体冲突达 10 多次。其中，在 1968 年 12 月 27 日冲突中，我边防军人被打伤 8 人；1969 年 1 月 6 日，苏军抓走两名捕鱼的我国农民；1 月 23 日，苏军打伤 20 多名我边防军人，其中重伤 9 人；2 月 6 日至 25 日，苏军又连续多次围攻、毒打我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据苏方当年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康斯坦丁诺夫上校回忆**：1968 年，仅在伊曼边防段，双方就发生过 40 次打斗；1969 年 1～2 月，在达曼斯基岛（珍宝岛）地段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不再使用棍棒，而是使用枪托来互相打击；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 15 支枪，非常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枪膛里都有子弹；于是，我们把边防哨所值勤人员加强到了 50 人，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同时下令，只要中国人一出现，边防人员可以向他们射击，将他们赶走；但我们并不知道，2 月底，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已经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并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为了给“九大”壮势，造神运动冲昏了头脑的毛泽东，已将苏联晋封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因而对帝国主义针锋相对地斗争，就有了“理论”根据。于是，他回应“**群众**”要求，决定用武力“教训”一下没有赫鲁晓夫的“苏修”。于是，沈阳军区组成以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为首的前线指挥部，集中黑龙江省合江军分区边防部队和陆军第 23 军 1 个步兵团、2 个侦察连、2 个加农炮营和 1 个高炮营的数千兵力，准备“教训”。这是以全世界人民领袖和导师自居的毛泽东，继 1968 年 4 月 16 日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之后，再次以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身份所做出的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决定！

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毛泽东撇开**外交谈判**，选择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进行武装“教训”，是基于“苏修”不会为这个小岛大动干戈的**冒险主义**判断，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利用外患，强化专政，为召开“九大”凝聚党心！

经充分准备后，1969 年 3 月 2 日，沈阳军区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潜入珍宝岛，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 32 名苏联军人。苏联人恼羞成怒，立即调来坦克、直升机、重炮和当时被称为“冰雹”的“秘密武器”BM－21 火箭，于 15 日和 17 日两天，在珍宝岛南北数公里的正面上，实施报复性袭击：重炮、火箭射入我国领土纵深达 6～8 公里，造成大量军民伤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沿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

苏联人显然是认真了；其反击手段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由于担心苏联入侵，毛泽东下令“**不要打了**”。之后，苏军对珍宝岛和附近沿岸进行了狂轰滥炸，使珍宝岛旋又落入苏军控制中。对此，我边防军听之任之，没再认真反击，间或放一、二冷枪以示主权。但在“舆论一律”的强权下，蒙在鼓里的中国人，还以为我军已夺回并扼守住了珍宝岛。

是役，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 17 辆，死 58 人，伤 94 人。苏方认为，他们“吃了亏”。但据报导：我边防军伤亡 100 多人，而民兵和平民的伤亡约 600 余（另说 800 多）。

毛泽东的冒险主义在国外败北，在国内却取得了成功：全国各地都在欢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取得了胜利。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戴着战斗英雄的光环，在“九大”上，出尽了风头。由是，在“自卫反击战”中，负责指挥作战的沈阳军区副司令**肖全夫**、副政

委**李少元**以及那些参战的团长营长们，都无法公开亮相，因而无法享用孙玉国的荣光。

尽管毛泽东宣布“取得了胜利”，也达到了为“九大”壮势的目的，但判断上的失误，非但没有夺回一寸领土，反而引发了中苏热核战争危机。

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后，共产主义者嗜血的本能，使苏共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在以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鹰派人物主导下，苏共决定**“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计划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的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同时，调动百万大军，陈兵中苏边境，随时入侵中国。于是，在新沙皇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冒险主义占了上风，开始了与中国打大仗、打热核仗的准备。

准备就绪的北极熊，为了给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刺激中国反击，1969年8月13日，苏军300多人在6辆坦克和两架直升机的支援下，突然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一举围歼了一支我国边防巡逻队，致连长以下38名官兵无一生还(另一说为79人)。

令苏联意外的是，已获悉“苏修”核战谋图的毛泽东，此刻冷静得多：他开始正视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国情，没敢下令反击，因而无法宣布“胜利”。对于这个国耻事件，他不愿让老百姓知道,便下令不准报导。文革后，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军方在当年巡逻队罹难处，修建了79个墓碑。

毛泽东多次“论证”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图17-3）。但他对自己的“理论”并不当真，那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一旦“纸老虎”真地扑来，天才的他，决不会愚蠢地率领红卫兵，**举着火把**去迎击。



图17-3：在珍宝岛缴获的“纸老虎”苏军军帽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在苏共准备打大仗、打热核战争的压力下，毛泽东撤掉了“纸老虎”学说的伪装，在全国掀起迎击真老虎的备战活动。

1969年？月，他提出大搬迁的**“地、后、山、分、小”**的五字方针，开始把主要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按地下、后防、山区、分散和小型化配制方案进行拆迁、转移和分割，并使许多企业转为军工生产。8月，获悉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后，他下令全国各地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开展了挖防空洞活动。这种活动到1972年，演变成他的**“深挖洞，广积**

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9 月起，他开始大规模疏散大、中城市人口和物资，其中，在京的中央党政机关、各主要单位、学校及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都按备战要求集中装箱运往“三线”或山区保存。在边境地区，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按备战要求向内地迁移。备战中，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到农村，等等。10 月，笔者在密山县县政府大楼里看到，空空如也的档案柜、文件箱上，都贴上了“苏修，小心炸弹！”之类的封条……据报导，全国共拆迁、分割了数百家大型工厂企业，疏散了 94 万多人，还疏散了 4,100 架飞机，600 多艘舰艇。大疏散，大搬迁的备战活动，使数百亿元付诸东流。**毛泽东在珍宝岛玩火，一寸领土也没有夺回，却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69 年 9 月，全国已进入临战态势——北极熊这只真老虎，果真要来了！

1969 年 8 月 20 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征求美方的意见，并要求美国保持中立。基于**“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对苏共本质的判断，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大规模核战争的后果极其严重，直接危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一方面通知苏方，明确表示美国反对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设法告知中国。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又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巧妙地把“绝密情报”透露给一个不起眼的小报，借以让中共深信不疑。

狡谲的美国人，充分利用中苏交恶之机，徐图渔翁之利。

8 月 28 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对美国的失信气得发疯。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话虽轻松，但他对真虎北极熊的威胁，没敢掉以轻心。他明确地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好家伙，要准备死 4 个亿！这与 1957 年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漠视生命的狂言，同曲同工，一脉相

承。那时他说：“（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什么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

苏联鸽派出于全球主要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和遭中国核报复等多方面考虑，9 月 1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力图缓和紧张关系，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逝世后归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由于**周恩来坚持过去中国与苏俄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会谈没有达到缓和两国关系的目的。但毛、周这个正确的民族主义立场（2）和错误的冒险主义立场，到九十年代，成了卖国贼江泽民、李鹏等留苏派卖国的借口。

柯西金回国述职后，鹰派勃列日涅夫主义卷土重来，冒险主义又占了上风。

9 月 16 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刘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美国很快判明，维克多是苏联克格勃新闻代言人，他的文章是对中苏热核冲突中美国态度的一个试探。同时，美国侦察卫星显示，数千帐蓬一夜之间在中苏边境竖起，苏军已进入攻击阵地！

在中苏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召开了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安全助理基辛格等人参加的紧急国安会议。会议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为此，美国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三大措施：1、向苏联重申美国反对核战的立场，表明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2、利用各种渠道向中国示好，释放善意，通报情势；3、为了防止苏联一意孤行，巧妙运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准备的总统指令。**”

苏联克格勃把“破译”到的美国“总统指令”，迅速上报给苏共总书记。一直在利用中美矛盾、认为**中美仇恨不可调和**的勃列日涅夫，忘记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名言，看完报告后，愤怒地大叫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建议，下令恢复边界谈判。

一场可以由外交途径来解决的珍宝岛争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在两个共产党“教训”和“消除中国威胁”的强权运作下，演变成两国之间的热核战争危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可能导致亿万人死亡的危

机，却在“美帝国主义”尼克松政府的干涉下，烟消云散，转危为安！

对此，中国上层精英们自有“特色”高见。他们著文对中国老百姓说：**“由于中国装有核弹头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目标，才使他们没敢轻举妄动**！”还有人这么对中国老百姓说：**“第二炮兵很快进入临战状态，展示了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使苏联领导人最终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企图**。”

由此，珍宝岛这个巴掌大的荒岛，力排其他比它大几十倍乃止几万倍的被占领土，一跃成为名扬天下的耀眼红星，成为中共“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寸土必争”的象征！这种力排外交谈判而用**“检芝麻，丢西瓜”**结果连**“芝麻”**也没守住式的武装“教训”，尽管没有收复一寸国土，尽管备战又使中国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却使毛泽东和中共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不仅达到了为“九大”壮势的目的，而且达到了利用外患强化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从而使血腥镇压异己者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找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借口！

核战危机雨过天晴后，一直被中共骂为“反共狂徒”、“战争贩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被中共重新包装：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赞扬尼克松道：**“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登陆中国，开始了中、美修好因而惊诧世界的“破冰之旅”！

行文到此，不得不说几句看似离题的话：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四十多年间，中共几代领导人，在解决被苏侵占的领土上，其立场几经变化：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是亲苏的**放任主义**；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冷淡时，变成了**不承认、不冲突、维持现状**的**民族主义**；到了中苏关系恶化时的六十年代末，走上了**冒险主义**；九十年代，为了抵御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对一党专政的威胁，又认敌为友，求助于中俄合作，最终走上**卖国主义**。为此，他们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以“既成事实”为由，抛弃民族主义，采取了与解决南沙群岛、钓鱼岛争端迥然不同的立场，偷偷干起了卖国勾当，与北极熊签订了领土条约，使俄国侵占我国的 16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合法化，没有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丁点讨债的余地。他们做贼心虚，不敢让全国人民知道谈判内容和相应地图，只在《人民日报》不起眼的地方，发布一条简短“新闻”，力图让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忘记。他们的偷偷摸摸丑行，与俄方大张旗鼓地公布谈判内容和相应地图，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这么说，他们连日本国历代政治家们的徒子徒孙都不配当，他们只配当遗臭万年的中华民族天字第一号大卖国贼！然而，正是这些卖国贼，当了

婊子还要给自己树牌坊。他们继承了毛“太祖”愚弄中国人的衣钵：在中俄领土谈判中，用出卖大量土地其中包括 350 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半岛几乎一半的土地，换回了大名鼎鼎的仅有 0.74 平方公里大的**珍宝岛**（图 17-4），然后在岛上修建了一座“功德牌坊”——纪念馆，对中国人进行“寸土必争”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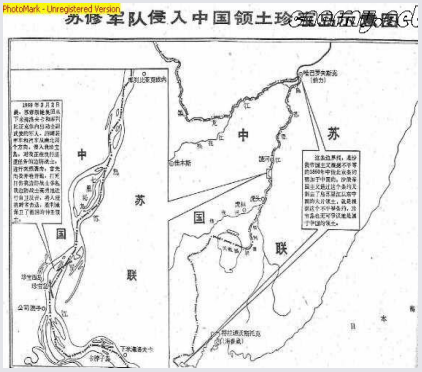


图 17-4：左图为珍宝岛位置，
右图上角为黑瞎子半岛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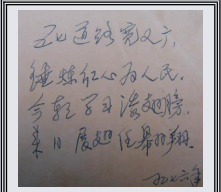
七、五七干校

在权力再分配中，许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被迫“靠边站”，失去了工作和权力，发配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笔者用曾写过仅在博客上发表过的一篇短文《点评两首诗》，重现当年毛泽东五七干校的原形。

点评两首诗

第一首：《五七道路》　作者 牛玉儒（2004 年 8 月 14 日，病逝于内蒙古自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任上）1976 年（图 17-5）

五七道路宽又广，
锤炼红心为人民，
今朝学习添翅膀，
来日展翅任翱翔。


图 17-5：《五七道路》

第二首：《江城子 五七干校》　作者 高国彬　1969 年 （图 17-6）

枯树寒鸦啼声咽，
金风烈，
日西斜。
残秋将尽，
观衰草遍野。
暮霭沉沉黄昏后，
号声起，
归队列。


图 17-6：学员“劳动课”间休息

夜阑更深人不寐，
倚窗望，
宁静夜。
骨肉分离，
伫立对残月。
来时有日无回期，
何时归？
音信绝。

*　　*　　*　　*　　*　　*　　*　　*　　*　　*

点评前，先说啥叫五七干校。

啥叫五七干校？年轻人可能不太懂。简单地说，就是按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建立起来的干部学校。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要求：“**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之后，人们常说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思想，也是现代版的**陶渊明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经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批“资反路线”、夺权、“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和武斗等，一场接一场的厮杀，该杀的杀了，该判的都关起来了，剩下了大批“问题干部”，仅中央机关就占干部总数的 82%。在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高学历、高素质，他们过去在组织上或思想上，大都与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与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的嫌疑，因而有应得之“错”或“罪”；但毛又无可奈何地说“**查无实据**”。怎么安置？还有学校里的那些“**王八蛋**”，诸如那些教授、学者、专家等；毛泽东曾愤怒地厉声责骂大、中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怎么安置？留在城市里，他们会做小动作，无事生非，甚至兴风作浪。中国无法继承清代充军发配那套，因为，他们是封建专制，我们是“人民民主”，过不了这个“理”；也无法借鉴苏俄流放政策，因为，没有可供使用的西伯利亚，那里遥远而辽阔，且常被冰雪覆盖，是个放逐的好地方：苏共列宁、斯大林时代，曾使

数百万个“政治犯”“思想犯”在那里自生自灭。正当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人为处置上述干部犯愁时，1968 年 5 月，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庆安县，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据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说：“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这位负责人还说：“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到底是“**安置**”还是“**培养**”？这位负责人大概不想也不敢说得太明白。

毛泽东发现柳河五七干校的材料后，大赞“培养”说，欣然命笔，在材料上批道：**“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批语传阅后，中共中央于 1968 年 9 月 30 日，通令全国照办。于是，五七干校遍地开花，全国一片“红”。

“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怎样改造和培养呢？**学工**，就是盖房、挖渠、砸油、磨粉之类。**学政治**，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林彪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林彪跨台以后，便学毛主席的其他著作。**学文**呢？对于那些高知学员们，诸如那些专家教授们，他们虽然懂得什么运筹、模糊等高等数学，或会做诗写文章，但由于“伟大领袖”说“**书读得越多越蠢**”，急需由工农兵给他们补一补文化课。**学军**呢，有吹哨起床，排队下地干活的操练。只有**学农**范围较广，春种、夏锄、秋收、冬备，样样得按时，样样不能少。这就是五七干校。从当年干校学员们写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反修、防修”和“培养”这种堂而皇之又荒谬绝伦的口号压抑下，他们对被遣送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的失落、无奈和愤懑。

1979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数十万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先后从劳改生涯中解脱了出来。自此，历时十年辉煌的五七干校寿终正寝，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给历史留下了一页令人难忘的篇章。

看看五七干校的历史，再看看当年干校学员们所写的回忆录，你就会对上面那两首不同心声的诗作出自己的评断。

不管人们怎样评断这两首诗，作为一个过来人，笔者对这两首诗的点

评是：

第一首《五七道路》是“真实的谎言”

为了摆脱困境，当时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向上表忠心。这是一首典型的阿谀表忠诗。作者绝不会相信，学会种地就会给他“添翅膀”，学会锄草，学会“**你前腿弓，那个后腿蹬**”(《朝阳沟》学锄草唱词)，就能使他“**来日展翅任翱翔**”。但要表示忠心，就必须有这样美丽动听的谎言，而这种谎言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不过，不容否认的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毛泽东，用真假搀和的谎言，夺得了天下；作者用“真实的谎言”，“翱翔”在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任上。

第二首《江城子 五七干校》是“深藏的真情”

那个时代是残酷批斗和争相表忠的时代，许多人的真实情感往往被那美丽动听的、感人落泪的、甚至神圣得不容置疑的谎言所掩盖。“**骨肉分离，伫立对残月**。”分明是真情的宣泄。这是一首典型的泄愤诗。这种另类忿恚权势诗，当时必须深藏不露，否则，作者早已是高墙囚徒，甚至还有暴毙荒野、永别妻儿的可能。

第 17 章附注：

附 1、被苏军蚕食掉的国土

在黑龙江密山市的地图上，兴凯湖上有一条直线分界线，东南起于龙王庙，东北止于当壁镇。在六十年代以前的地图上，这条直线边界线一直延伸到二人班乡。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为了“**便于管理**”，农村大搞合村并屯，“大搞集中居住”，住在直线边界线一侧的零星居民，被迫北移，为苏联蚕食中国领土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这条实地边界线，从当壁镇起便向北弯曲。这一弯曲，使我国丧失约十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比珍宝岛大十多倍。事实也确如此。1966 年 5 月，笔者在大顶山大队以南的边界我方巡逻线上，即地图上兴凯湖西侧向北弯曲线的顶端处，发现了一块石碑。记得石碑露出地面高约 60 厘米，宽约 35 厘米，厚约 6～7 厘米，正面刻着“**拉字牌**”三个大字(不知其意)，落款是“大清国光绪三十二年立”。我问大顶山大队的大队长：“这是界碑吗？”大队长说是界碑。他指着南面苏联管控的一条山岭说：“十多年前，界碑还在山梁南面坡底，不知什么时候被搬到这里。”他还告诉我：“(他们) 大队里有几户祖坟都在南山坡上。五八年前，老毛子还叫过去上坟，后来他们修了路，设了铁丝网，盖了瞭望塔，就不让去了。”我问他：“向上级反映了没？”他说：“反映了多次，说外交部知道。以后没有了下文。”我目测了一下：“拉字牌”距南岭岭脊约 4 华里，约为地图上“向北弯曲”距离的 1/2（按兴凯湖湖面直线分界线长约 70 公里的比例计算)；岭南坡长不得而知。

附 2、民族主义立场

解决中俄边界的原则应是**不承认**、**不冲突**、**维持现状**。其一是要俄国人承认过去的九项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其二是维持现状，不挑衅，等待时机。毛泽东、周恩来在与俄国谈判边界时，曾经坚持过这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就是当时机成熟中国有条件收复失地时，无论在外交上、军事上，都会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个占据国际法理高地的有理、有利空间；但当江泽民的中共，偷偷与北极熊签订条约使其侵占中国领土全部合法化后，收复失地的路子就被卖国贼彻底堵死了。

中卷完

请继续阅读下卷